

目 录

三中扩大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一九三〇年九月).....	1
一、中国革命高涨的估量.....	2
(1)中国革命整个估量的两个前途.....	2
(2)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4
(3)政治局估量目前形势的错误.....	6
(4)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7
(5)学习进攻的策略方法!——反对右倾的曲解.....	8
二、策略问题和革命高涨的新时期.....	9
(1)长沙战争是革命战争局部的开始——从工农运动 部分的进攻进到总的革命进攻的过渡时机.....	9
(2)政治的同盟罢工问题.....	11
(3)发展新的苏维埃区域和土地革命问题.....	14
(4)下层统一战线的问题.....	15
(5)苏维埃区域土地政策经济政策上的问题.....	19
三、新的革命高涨和党的任务.....	20
(1)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	20
(2)反动统治区域群众斗争和苏维埃运动.....	21
(3)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	23
四、组织问题.....	24

(1)党的本身问题·····	24
(2)群众路线问题·····	24
(3)青年团问题·····	25
(4)妇女问题·····	26
五、党内反倾向的斗争·····	27
(1)自我批评·····	27
(2)两条战线的问题·····	27

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

案——一九三〇年九月，接受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政治秘书处一九三〇年七月的中国问

题议决案的决议·····35

一 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	35
一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兴盛和全世界的经济危机·····	35
二 世界革命的高涨和中国革命·····	36
二 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37
三 中国政治经济危机的深入·····	37
四 中国革命运动高涨的新时期·····	38
五 现在革命运动的特点·····	39
六 国民党的屠杀和帝国主义的出兵干涉中国革命·····	40
七 国民党改组派和取消派等的拥护白色恐怖政策·····	40
八 中国革命进展的前途·····	41
三 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现时革命情形的正确估量·····	42
九 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一致的总的政治路线·····	42
十 中央全体会议对于过去错误估量的纠正·····	43
十一 反对动摇党的路线·····	44

四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	45
十二 共产国际指出的任务的总意义	45
十三 苏维埃根据地的建立	46
十四 苏维埃区域里的政策	46
十五 城市工人运动里的任务	48
十六 争取群众和积极准备暴动的联系	49
十七 革命武装力量的扩大和准备	49
十八 苏维埃区域和反动统治区域任务的相互关系	50
十九 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运动	50
二十 苏维埃政府的大政方针	51
二十一 党的组织任务	52
二十二 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	54
二十三 革命转变问题和反对孙文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55
五 反对倾向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55
二十四 自我批评和反对倾向的斗争	55
二十五 “左倾”的错误	56
二十六 右倾的主要危机和调和主义	57
二十七 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党和革命任务的执行	59
辛亥革命纪念和苏维埃政权——拥护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三〇年九月三十日)	63
反对国民会议的欺骗(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七日)	68
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的意义(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日)	71
中国革命战争的组织 and 领导问题——长沙战争的教训	

和苏维埃根据地建立的任务(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日)·····	76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三〇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96
吉安的取得和丧失——立三同志路线对于苏维埃 区域的影响(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四日)·····	111
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为坚 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 召全党(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16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一九三一年一月)·····	121
致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中央的信(一九三一年 一月十七日)·····	128
声明书(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134
国民会议上蒋介石说些什么?(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	137
陈独秀的“康庄大道”(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149
托洛斯基派和国民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	154
一 飞机炸弹枪炮大刀之外的又一武器·····	154
二 国民党和托洛斯基派眼光里的共产国际·····	157
三 托洛斯基陈独秀派的革命消沉论和国民党的统治·····	159
四 “盲动主义的过火”恰好是国民党杀人放火的理 由呀!·····	163
五 共产党组织力量“薄弱”,可是,国民党和托陈党 且慢高兴!·····	165
六 国民党对于托陈党已经钦赐“批评自由”了!·····	166

七 国民党口中的托陈派的立场·····	168
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	170
一 中国人权派的“反对”国民党和政府·····	170
二 “反革命大竞赛”之中人权派的新鲜旗帜·····	171
三 人权派替地主资本家想着的“出路”·····	174
四 人权派赞助屠杀的“聪明”方法·····	176
五 人权派所有的一些儿有限的常识·····	178
六 人权派用“共产嫌疑”恐吓国民党·····	179
七 人权派用“共产足以召共管”来吓人·····	182
八 人权派原来也用“流氓土匪”的口实反对真正的民权·····	185
九 人权派的理想原来如此!·····	187
巴黎会议和瓜分中国的阴谋——进攻苏联的积极	
步骤(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93
恭请列国联军!(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198
五年前是“到黄埔去”——现在到哪里去?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	203
国民党的两个四中全会——反革命的大竞赛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	208
注意巴黎会议的结果——瓜分中国和进攻苏联的	
急进步骤(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214
南京新政府的下马威——十二月十五日枪伤三十	
多学生的大屠杀!(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219
流氓政策和立宪政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26
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一九三一年秋)·····	231
文件处置办法(一九三一年)·····	237

种地的乡下人怎么样过活呢？（中国农民的生活）	240
农民要的是什么？（中国农民的要求）	245
苏维埃是什么？红军是什么？	246
组织女工代表会的根本原则	261
中国无产阶级要做什么？	269
反对国民党的鬼法律	273
工农兵会议的劳动法	275
谁要国民会议！	276
工农兵会议大革命！	278
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	280
苏联是工人的祖国	282
德国革命的失败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问题 ——从苏联共产党第十三次大会到第十四次党 务会议	284
苏联发展的总路线和新经济政策的“重新估量” ——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大会	309
列宁主义克服托洛茨基主义——苏联共产党 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斗争	338
从恢复时期到建设时代——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 年苏联的经济政治状况	362
三民主义的清算（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	374
有国大家卖（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五日）	378
国民党各派的一致和矛盾（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七日）	384
当前的重要问题（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	389

太平洋战争中的上海问题(一九三二年二月十日)	394
谈谈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	399
国民党出卖上海的无耻勾当(一九三二年三月六日)	405
从马占山到蔡廷锴(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	411
国民党还配谈领导权吗?(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	415
工人阶级和上海和平会议(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420
中国的假革命党和中俄复交问题(一九三二年 四月一日)	424
国难会议和民宪协进会的丑态——地主买办军 阀资产阶级进攻工农的两种策略(一九三二年 四月九日)	430
日本对于苏联的不断挑衅(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八日)	435
《申报》的武断宣传(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440
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么? ——对于华岗 的《中国大革命史》的批评(一九三二年五月八日)	444
中国的经济和阶级关系——对于方亦如的批评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472
孙倬章先生的土地问题(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日)	493
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一九三二年五月 三十一日)	506
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一九三二年五月)	522
马克思和昂格思(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	533
列宁(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	539
托洛茨基(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	546

当前的问题(一九三二年)	552
帮助团赶上党超过党(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	567
我们帮助了团些什么?(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569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	572
国民党棉麦大借款的目的(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	599
临死的呼号(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	606
从公债到外债(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	610
“自动的”卖国(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	613
庐山会议的大阴谋——“有组织的饥饿政策” (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	616
又是一笔卖国账(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	618
国民党的“理论斗争”(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	621
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新鲜把戏(一九三三年 七月三十日)	624
四川的军阀混战和上海废战同盟(一九三三年 七月三十日)	627
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九三三年八月七日)	630
这回不“自动”了!(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	634
宁可送热河,不可失南昌!(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	636
狗抢骨头吃!(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	638
国民党的“仁爱”(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	640
最大的奸商——国民党政府!(一九三三年八月 二十二日)	641
国民党的所谓统制经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643

国际反帝大会——反对国民党的外债政策！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645
我对于错误的认识（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647
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五中全会召开的意义 与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意义（一九三三年 十二月十日）	654
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一九三四年 三月二十九日）	657
在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	660
努力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一九三四年四月三日）	661
纪念“五一”与援助华北工人斗争（一九三四年 四月十二日）	664
阶级战争中的教育——论教育系统的检举运动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	666
中国能否抗日？（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七月七日）	674
〔补遗〕	
劳农俄国之国内商业（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684
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发言（一九二三年六月 十二——二十日）	691

[附录]

多余的话(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二十二日)	693
何必说?(代序).....	694
“历史的误会”.....	695
脆弱的二元人物.....	700
我和马克思主义.....	703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708
“文人”.....	712
告别.....	718
附: 记忆中的日期.....	723

三中扩大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

(一九三〇年九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次扩大的全体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应当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次全会，是在中国革命发展进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时候，召集的。我们的第一个议事日程，就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总任务”——这就是说：目前中国革命发展的阶段已经要使我们郑重的来讨论党的新的总任务问题，当然，同时，就要审查中央政治局过去的政治工作和策略。政治局的报告(特生^①同志)和少山^②同志传达国际^③最近对于中国问题决议案^④的报告，就都是这个问题讨论的基础。各位同志在讨论中的发言是充分的表现了党和群众的联系；是彻底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伯山^⑤同志的发言，尤其能够用布尔塞维克的精神，来批评检查自己和政治局过去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会议上，更加证明他自己的确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唯一的领导者——党已经更加能够领导起中国工农群众的斗争，已经能够发动并领导无产阶级，领导农

* 1930年8月，瞿秋白由苏联回国后，于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全会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本文是瞿秋白在会上所作政治讨论的结论。

民的革命战争；党在这两年来有了非常伟大的进步和成功，克服取消主义^⑥（独秀等）破坏党和党的路线的企图，尽力的反对机会主义右倾的斗争。现在是在根据这些已经得到的成绩，更进一步的适合目前革命发展的阶段，而定出总任务上的新方针。政治局已经提出政治议决案的草案和关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问题的告民众书的草案——大家的讨论，都并没有对于这些草案表示有原则上不同意的主张——政治局委任我来做结论，我也就用不着来重复报告里面和草案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的各个问题；我只提出大家讨论之中的几个中心问题：（1）中国革命高涨的估量；（2）革命高涨新时期之策略问题；（3）革命高涨时期的主要任务；（4）组织力量，群众团体与红军的问题；（5）党内斗争，两条战线的斗争及其他。

一、中国革命高涨的估量

（1）中国革命整个估量的两个前途

这一问题首先应当分为两部分来讲，才说得明白，这两部分是：第一、中国党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整个估量；第二、目前实际情形的估量。为什么要分清这两部分呢？因为党的对革命的整个估量在历史上有过很长久的争论。第六次大会之前，在广州暴动后这一争论即开始了的。一种意见以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虽然失败，可是，新高潮无疑的要很快到来，中国无产阶级必定能够恢复他的力量去领导农民战争推翻国民党的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第六次大会的意见）；另

外一种主张，则以为中国革命在一九二七年大失败之后，中国资产阶级能够稳定下来，中国资本主义将有长足发展的可能（王若飞^⑦），或者以为至少一时没有恢复无产阶级力量的可能，中国革命的新高涨将要“遥遥无期”。（见共产国际一九二九年二月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这两种主张的不同，就是党的正确估量和右派机会主义认识，根本不同的分水岭。张国涛同志在一九二八年冬，及二九年春，还是主张：“中国革命的新高涨已经推迟了”的，他以为中国革命的新高涨是在不可捉摸的辽远之乡。国内同志，也有这样情形，听说二八年五三济南惨案^⑧时，中央所发通告上指出：“五三的发生是催促起中国民众的反帝运动复兴；已经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所谓‘巩固’、‘稳定’到了最高峰而开始崩溃的时候了。”我在党的文件上曾看见说到有人反对过这种说法，好像和江苏问题^⑨上有一点关系罢！（立三：对的，不过并没有发生大的争论。）在这个“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估量的一问题上，也就是共产国际和各国托落斯基派之间的一个最大的分水岭。托派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在托落斯基^⑩当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时所写的批评共产国际党纲草案的论文里说得很明白；他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将得到长期的稳定统治，故应以国民会议运动来代替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整个革命的估量方面是和国际完全一致的。现在党内右派要说中国党和国际路线不同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要曲解共产国际的路线；说共产国际的路线，至少是认为中国革命现在还不是从部分的进攻反动统治进到总

的革命进攻的过渡时机，所以共产国际据右派的意见，是反对积极准备暴动的路线。中共中央最近有一点错误，决不是总的政治路线不正确，而右派机会主义的分子却利用来反党。我以为孟雄^①的立场显然是这样的；至于国涛最近亦说中央路线不正确（他的书面意见远在二万里外，我们还没有看见）^②，是否亦是如此的立场，我们固然还不能断定，可是只在这一点上，已经可以知道：他对于国际和党的一致路线，是不了解的。

（2）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再说第二部分目前的估量问题，即是目前国际状况与中国状况和任务与策略，也就是我们三中全会上要回答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国际最近决议案中，及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草案中，已说得很多了；各个同志发言中也表示完全同意这个估量。我也不必再详说，可是必须简单的提出他的重要点。

现在的时期，是世界大战后第三时期^③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上又发展着全世界的经济恐慌，在这个基础上自然是又更加激烈发展着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五年计划，工业化，集体农场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深；我们应当认识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一个营垒中是站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国家，虽然在面积上是比苏联要大，可是在这一营垒中的只有各国的资产阶级。目前各国无产阶级力量和世界革命运动的生长，例子很多（印度等等），我

们只说两个简单的：第一即是最近红旗报上所发表的，德国共产党的胜利，他们在这次选举中增得的票数竟达比以前加了百分之四十，这个标志，是能明显的看出德国共产党的影响扩大到如何程度了。再说一个例，安南^⑭近来的斗争，现在发展着类似云南、广西一带的游击战争，他们以前是没有共产党的，现在安南共产党已发展，其中有许多是中国革命的“广东时代”，以至广州暴动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员^⑮。我们只举这两个例，就可以知道右派的胡说。右派说中国革命不足以掀动世界革命。右派是否认“第三时期”，或者曲解“第三时期”。他们有另一种解说世界大战后第三时期的方法，如布哈林^⑯、洛夫斯敦^⑰那样，他们承认第三时期这个名称，而说第三时期的内容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来了“第二次的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稳定而向着有组织资本主义发展，则自然可以说：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尚不能引起世界革命，今日更谈不上（全场笑声）。国际第六次大会上，我就责备布哈林对于“第三时期”的不清楚的。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斯大林同志之报告，他说：现在只是有些国家已由经济危机转变到政治危机，但是如法国则尚是还在准备经济危机到来呢。——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明显的有着不平衡的现象。在这时期我们不能说如果其他国家革命不能兴起，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要难能“持续”；这必然是减少对于中国革命自身力量的信仰，所以这一解释是错的。在世界大战后“第三时期”中，中国革命必然是世界第二次大革命（十月革命以后的一次）极大的推动力。中国革命胜利虽然不是即刻，然而是有能力继续或保

障他的胜利一直到推动世界革命的。

(3) 政治局估量目前形势的错误

现在我说到对于中国国内形势的估量问题。中央的路线，是“发动群众斗争，集中革命势力，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暴动”，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最近几月，中央政治局对于目前形势的估量，有不正确的地方，这是必须指出的——这些是中央政治局已经承认了的。我现在要说，这些错误的来源。这个来源是由于将中国革命向前推进中革命发展的速度估量得过分。可是，对于速度的估量，一定要根据于一个对于目前形势的估量。事实上决不会完全没有目前形势的估量，而只有一个悬空的对于速度的估量的。如果对于目前革命与反革命力量估计得很正确，如果我们能够很明白的指出：统治阶级是崩溃分裂，使全国的工农极端痛苦，形成全国民众必然要起来推翻他们的前途，可是现在他们还没有在绝路呢，如果这样说，自然是不错了。同样的，对革命力量估计也不正确。工农的斗争发展是走向平衡，但是现在是还没有平衡，还极端需要主观上去努力组织革命势力，去争取群众；能有这样的清楚认识，自然不会做出武断的结论，自然不会说现在“在重要城市只要一个伟大的斗争，马上可以引起全国客观革命的形势”（以前叫做“高潮”，“直接革命形势”）。中央政治局最近三个月来的估计是不切实，因此策略上、工作布置上也就发生不正确的地方。总之，关于估量目前形势问题，我对振鹏^⑧同志的以为“过分”两字不适当，是不能同意的；伯山同志自己的发言

之中虽然很着重的——太着重了——说明估量发展速度的错误，可是也注意到了对于现时革命力量估计的错误。

(4) 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我再讲一个特点的问题，这问题即是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问题。现在是不平衡的，就应知道为什么不平衡的，不但如此，我们还应当知道：在这种不平衡状态之下现在怎样去行动。贺昌^⑩同志说，过去在北方因为北方同志的落后，所以怕向同志说不平衡问题而右倾，现在觉得非向他们去说明不可。但他又只说到北方政治经济危机、工农生活痛苦是和南方一样，群众需要斗争也是一样，如他所举的南乐县农民斗争的例；他（贺昌）又没有明了不平衡原因，更没有说如何可以使革命的发展走向平衡。再如徐海特委代表提出不平衡的原因是革命经验的问题，这是对的，但是还不够，这里的最主要点就是要说到推动走向平衡的动力问题。国际决议案上指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前有过党种下了根基的地方，就首先有游击战争发生，而后推及其他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将共产党看成主要推动力之一。北方群众是缺少革命经验，如在北方饥民中什么大刀会、红枪会^⑪一样的运动是群众运动，在国际决议中亦有指出，但他们是被小豪绅富农领导去了，所以不是苏维埃运动，不是中农贫农的土地革命，而只是红枪会等类的运动——原因即是因为党的组织未扩大，群众未在党的影响之下。不但农村，城市工人群众亦是如此的。所以要赶紧努力去用党的政治口号，用独立领导工农群众斗争的策略，去

争取群众，去加强，扩大并且巩固党在革命之中，在群众之中的领导作用和组织作用。

(5) 学习进攻的策略方法！

——反对右倾的曲解

总之，中央一向是站在国际路线之下的，就是完全同意中国革命新高潮一定到来的总路线上的，在这立场上来布置工作是对的，不是做长期国民会议运动，黄色工会内的革命反对派运动等等，而是积极的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这不容怀疑的。错是错在目前的实际问题：第一就是对于革命发展速度估计得不正确；第二也就是对于革命力量估计的不正确；第三是对反革命力量没有看准。所以遂发生了个别问题上策略的错误。一定要了解问题不是以前中央不知道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现在才要知道。所以：(甲)不能够说以前没有看见不平衡，现在就只要看见不平衡，因此就说革命力量“大”的地方，进行游击战争，力量小的地方，很小的地方，就要做合法主义的运动，就要采用退守政策；(乙)不能够说以前估量速度太快了，太紧张了，现在就要估量得过分慢些，就要松懈些，“慢慢的不要忙”。这就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说明不平衡主要原因之一是党的领导作用组织作用（自然不是机俄的说数目字）须要更加紧张的更坚决的去加强，才能战胜不平衡。我们必须对于革命和反革命双方的力量和阶级关系，有正确的估量，去决定我们进攻的策略和方法。如果说以前的进攻

政策是根本错误了，现在要退后些，要退守政策，那就更错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在过去的错误上得到正确的教训，来学习进攻。进攻的方针丝毫没有错，错在进攻的方法不对。我们现在要努力组织已经有的革命战争，要巩固的向前进攻，要更加加紧的去争取群众——准备重要城市的武装暴动，更加积极的联系这些斗争。在策略上应根据这原则变更，不是像以前那样布置方式。目前主要的具体任务是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组织革命的临时政府，争取群众与组织革命战争准备暴动联合一起。

二、策略问题和革命高涨的新时期

(1) 长沙战争^①是革命战争局部的开始

——从工农运动部分的进攻进到总的革命进攻的过渡时机

策略问题，大家也说了很多关于策略方面问题，因此我解释也要详细一点。首先要说策略不是空的去讲，自然中国党中央对于列宁主义马克思辩证法是缺乏深切的了解，可是要知道没有一个列宁的策略能运用在每一个环境都能符合的，因为列宁的策略不是呆板的，不是机械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是德国那样环境，我们是不是能运用我们现在所用的策略呢，这是很明白的不能够。国际决议案指出中国目前的策略是一面建立中央革命政府，和强固的红军，发动极广大的农民战争和苏维埃运动，一面和扩大工人政治斗争相联系起来。这是合于中国当前的形势的。因此，中国党的责任是要具体的来

估量中国目前的形势，方才能够真正执行国际的指示。我同意刘明佛^②同志所提出要大家注意，对于长沙事变的估计，我们是否在国际指示之下，对于长沙问题会发生不清楚的观念？我想到会的同志是不会得的，但是下层同志是会不了解的。第一次进占长沙而又退出，第二次进攻长沙不能得到胜利，这本来是在军事行动上常有不足为奇的。党就可以发生一种观念：国际议决案写在长沙占领之前，现在长沙战争的暂时没有得到胜利，是否是可以估计成为广州暴动的情形一样，会有长期一个休息才能再起来呢；或者另一种看成进占长沙和退出长沙与进占吉安退出吉安的一样不足轻重呢，这样都是错的。在这里更可证明国际指示的正确了。我们在攻长沙之前是有长期的游击战争，在游击战争是长大了集中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在这次进攻长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其他许多苏维埃区域仍旧有进攻前面的城，失去后面的城的现象，我对于这样作战的方式，加一个名字，叫做“无后方的作战”。长沙事变之中的战争，规模虽然很大，可是，严格的说来，也还带着许多“无后方的作战”方式的残余痕迹，虽然这次不是全无后方的攻长沙，如果没有平浏^③先得，也不会有攻长沙的事，虽然这次作战是后方的军需上的供给，虽然集中了四、五、八各军力量，我们还要说，后面太弱了，太不巩固，指挥上也太不集中和统一了。我们知道现在已经不是去年九月的情形，现在是要转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但只是这样一个口号，已经不够了，因为现在部分的已经有了革命战争。转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口号，已经部分的开始变成事实。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提出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独裁口号，季诺维也夫^{②④}和嘉米聂夫^{②⑤}反对说：布尔塞维克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都是用的工农民权独裁的口号，现在这一口号还没有实现，为什么又要换新的口号。列宁回答他们说：你们太蠢了，你不看见俄国现在到处已经有苏维埃么？现在的（一九一七年四月）苏维埃，事实上正是工农民权独裁的实现；现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是资产阶级独裁（俄国二月革命的临时政府）^{②⑥}和工农民权独裁（少数党等占优势的苏维埃）的两重政权的特殊现象。中国现在的战争问题上，我们要用列宁这种方法来观察。所以我们说：共产党转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口号，已经开始在一种特殊形式之下实现起来——当然，还只是开始，还只是局部的开始，还只是局部的开始了一种形式的转变（红军和国民党军队之正式战争）。这正是目前形势下的一个特点：革命战争已经局部的开始了。所以必须同时不但提出以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的口号，而且还要提出“组织革命战争”的任务。我们决定策略，也就要根据这一特点，全国一般的工农运动都带着从部分的进攻进到革命的总进攻的过渡时机的现象——从“无后方的作战”进到巩固的向前进攻的形势。

（2）政治的同盟罢工问题

策略上的问题，在全国都要根据这种情形来配合。可惜，大家讨论的时候，只是各说各的：北方代表说北方的事，南方代表说南方的事，上海代表只说上海的事，仿佛北方土地革命或者上海政治罢工可以和这种全国重要的形势分割开来似

的。这表示着：对于新的策略任务还没有更深切的了解。各位同志说，政治斗争的口号是停留在党部，还没有深入群众，这是实在情形，如同红五月政治斗争是不少，但是长沙占领曾否提出拥护长沙胜利的罢工呢，也许有地方有罢，但是曾否真罢下工了呢？在这情形之下，再加上对于目前环境的估计不正确，对日常斗争的忽视，更加上许多经济罢工群众自己也提了有许多政治口号，我们不能抓着而扩大他，自然我们策略就不会不错了。并不是以前过分重视政治罢工，并不是以前过于注意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而现在是要将他放得很遥远的前途去。如果以为现在占第一位的问题是“小范围的斗争”，那就客观上是犯了右倾。章龙^②同志认为政治罢工和总同盟罢工现在不应当占“第一位”，就是犯了这种错误。可是，我们积极准备政治罢工，应当拿出总的政治斗争口号，这口号一定要和经济要求口号相联系。我们现在只是怕主观力量的不足，不能发动、实现罢工，可是，并不能因此就抛弃这个口号。不然的！我们要去抓住一切群众自发的经济政治的部分斗争的领导，要自己去发动这些斗争，要密切联系政治的总口号和日常经济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要把所有这些工作都放在组织政治罢工和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之下。全国政治问题上去鼓动号召总同盟罢工，这是现在一刻都不能停止的，更不用说把这件事放到第二位，第三位……“遥远的地方去”！即使我们一个同志也没有的地方，我们也应当公开的号召这个地方的工人群众来努力准备同盟罢工，号召他们拥护苏维埃和革命战争。举铁路罢工的问题来说。难道长沙战争期间，我们

应当很迟缓的，很定心的，先号召一站罢工，再号召一路罢工，等一站一路都罢过了工，然后再替工人去讲政治的同盟罢工。这种主张是犯着很严重的政治错误，革命不是像木匠做桌子一样，先将桌脚做好以后，再把桌面子做好，然后再把桌面子装上去。

同时，我们应当指出来：在指导政治罢工问题上，中央政治局有些错误。就是没有充分的注意抓住群众日常部分斗争的领导之重要，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是组织政治罢工之中应当特别着重的——因为单是说明、提出政治口号去发动群众是不够的，是争取群众的策略上的缺点。问题不是不应当组织政治罢工，而是没有正确的知道怎样去组织政治罢工。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联系的。所以如果说出“小斗争是没有用处的”，“一站一路（铁路）的斗争和罢工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那亦是很大的错误。昨天有一位同志说：只能“从政治口号发动罢工，再去联系经济要求”——亦就犯着这种左倾的错误。在现在拥护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拥护革命战争的斗争的全国形势之下，一定要密切的联系群众的部分斗争，一定要抓住群众经济政治的日常斗争的领导，领导到党的总口号之下来，一定要使政治口号更加深入群众，政治要求更加能够发动群众，这样去组织政治罢工，去加紧准备总同盟罢工。离开目前的实际形势，空口的来争论：究竟一般的应当是先来政治罢工，还是先来经济罢工——这又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3) 发展新的苏维埃区域和土地革命问题

关于地方暴动，用土地问题领导南北一切农民运动，富农问题，深入土地革命问题等，这次议决案上（国际议决案也是如此）都不须要再重复的详细来写，因为国际和中央政治局早已决定这些问题的答案；现在不写，并不就是取消了以前的决议。可是，有些同志昨天和今天都说到地方暴动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更明显的答复。要问：地方暴动是为着什么的？自然是为着建立苏维埃政权。所以与其说地方暴动，不如明白的说“发展新的苏维埃区域”——尤其北方要注意，因为北方并非没有自发的农民暴动，而是不能得到苏维埃的领导。同样，关于土地革命问题，有些同志说：单是抗租抗税不够，必须说土地要求。甚至于说，“在北方必须从土地革命做起，然后再去联系到抗租抗税等等。”这句话就不正确了。共产国际告诉我们抗租抗税等的口号，是要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总口号之下发动农民群众。抗租抗税抗债的口号，决不可以和土地要求对立起来。请问：游击战争发动之前，农民暴动胜利之前能不能没收土地，能不能分配土地；所以抗租只是要求土地的具体化的口号：“土地是农民的，土地上的收获用不着交给出租土地的地主（富农），我们要土地，所以我们抗租不交”——这就要达到游击战争，武装抗交，就要进到没收和分配土地——这就在农民群众的前面，具体的显示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必要。抗税问题，更是反对军阀政权的问题。不能说富农有时会利用这一口号，我们就要反对这一口号。真正相

反，共产党应当领导反对当地军阀的农民群众斗争，把这种领导抓到自己手里，要彻底实现这一口号——武装抗交，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使军阀政府剥夺小农土地之上的收入部分（税捐），留在农民群众自己的手里，使这些农民真正取得土地。

（4）下层统一战线的问题

黄色工会以及富农等是“改组派”^⑳、“取消派”^㉑、“民权派”^㉒、“社会民主党”^㉓（邓演达^㉔）等类政治派别的工具（至少客观上是如此）。民族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性，大家已经很明白。斯大林同志给我们说，现在更重要的是要指出这些派别（“国民会议派”）的欺骗的企图，企图表面上中立——站在国民党专政和苏维埃政权之间；我们要努力在群众之中去暴露他们的真相。固然，这些政治派别，不一定和黄色工会及红枪会等组织上正式联系得很密切；可是，在群众之中黄色工会的作用是和这些派别一样。黄色工会表面上总要“帮助”工人说几句话，调解仲裁劳资之间的经济冲突，企图欺骗工人，诱惑工人，阻碍破坏工人的革命斗争，工人不受欺骗，他们就公开告密，公开压迫，用法西斯蒂的手段。红枪会首领等等（富农、小豪绅），表面上有时还反对当地军阀，其实是勾结别一军阀，往往和黄色工会一样：黄色工会首领，常常公开告密拘捕工人，红枪会首领，自己也往往帮着“清乡”，出卖农民群众的斗争。这是现在通常的现象了。

因此，我党的任务是必须加强反对这些派别，以及黄色工

会和红枪会等类的首领的斗争。这是争取广大工农群众任务之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投降政策的右倾机会主义，对于罢工斗争，主要只要限于小斗争——限于日常经济斗争，事实上是投降黄色工会，对于农民斗争，主张只要停留在抗税抗捐运动，事实上也是投降富农。对于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必须集中火力来反对，否则就不能进行反对改组派、取消派、……黄色工会、富农路线的斗争——因为党内现在党部落在自发斗争之后的现象，尾巴主义的实际工作，政治口号的没有深入群众，土地革命的深入不足，农民意识的保守割据主义……的确是主要的危险。

同时，必须明了黄色工会等仍旧还能够欺骗一部分群众的事实。问题不止是他们有没有真正的会员群众。问题还要看得深些。至少他们还能够使群众犹豫，不坚决，认不清目标。群众在他们包办公开宣传的情形之下，在白色恐怖的镇压之下，还会存着一种心理：以为共产党虽然好，但是一时一刻来不得暴动，日常斗争之中的经济要求，还得暂时请黄色工会去向资本家说几句话；一方面等待暴动来解放，别方面暂时请黄色工会“想想法”。这种情形之下，如果犯着“左倾”的错误，共产党不去注意领导工农群众（极广泛的下层群众）的日常部分斗争，那么，事实上是帮助黄色工会，帮助富农。就是苏维埃区域，也要更加严重的注意到“左倾”的危险。不但要集中火力去反对投降富农的右倾路线——阻碍土地革命深入，阻碍分配土地，或实行利于富农的分配方法等等；还要同时反对反中农的倾向。我们决不能够：因为黄色工会只提经

济要求的问题，我们就一定要只提政治要求的问题。这算反对黄色工会么！？刚刚帮助了黄色工会！我们决不能够：因为富农只提抗税抗捐的口号，我们就一定要只提分配土地的口号。这算反对富农吗！？刚刚是帮助富农！因为富农在苏维埃区域有地方甚至占有苏维埃下级机关，我们就一定要提出“杀尽富农”（南通几个同志）的口号，或者“凡是不是雇农的人，一律开除出党”的口号么？这算是反对富农路线么！？刚刚是帮助富农，使他们容易煽惑中农也来反对苏维埃。

总之，这些“左倾”的错误，至少给了黄色工会或富农一个绝好工具，他们可以宣传：“如果听我们的说话，则可以得着两个铜元的增加，如听了共产党的话，则捕去吃官司”，“共产党只要利用工人去暴动杀人放火，我们是替工人争求切实的经济利益”（！）；富农也可说：“共产党要没收一切土地，连我们‘老百姓’的土地都没收去；可是，如果听我们话，我们可以领导你们抗捐抗税，还能够联络吴大帅^③，打倒冯总司令^④，或者联络张大帅^⑤，打倒蒋介石”。所以我们共产党必须和非共产党员的一般广大的工人群众，农民群众，直到最落后的群众，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在一切斗争，直到最细小的斗争之中，去领导他们。同时，随时随地都要将这些部分斗争，联系到争取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总口号和总斗争。只有这样，党才能真正积极的去准备武装暴动，去发展游击战争；这样才能更亲切的解释给工人听：在国民党压迫之下，黄色工会欺骗和恐吓，费尽了极大的力气，才能得到两个铜元，而在那些苏维埃政权之下的工人，如何能够自己改变他的地位和生活；农民在国民

党政治之下减租减税都要受到这样的压迫，而在苏维埃区域是如何取得自己的土地。

一定要如此说明，在总的方针之下总的政治方针之下做部分斗争，也就是必须在建立全国苏维埃政府，彻底土地革命的方针之下，领导局部的日常斗争，去争取群众。否则，准备武装暴动和争取群众两种事分了家——没有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那就一定是要走到冒险主义脱离群众的错误。

贺昌同志说的例子，非常之可以注意：例如河南的陈源道^⑥同志有一种说法：“翻尽列宁主义全集，也找不到抗租抗税的策略”，于是他们决定抗租抗税的斗争，至多只能号召二十亩土地以下的农民来参加，这样决定了，自己又怀疑起来，马上又改为只号召十亩地以下的农民做抗租抗税运动，像这样的同志简直是富农的奸细。凡是这类的同志，客观上是不反对富农，是反对反对富农，因为他们不是去使农民群众脱离富农的影响，而到党的领导之下来，却是使富农借此可以来动摇农民，中农必然因此而动摇——富农可以煽动中农脱离党的影响说：共产党反对抗捐抗税。因反富农而及于反中农问题，在联共党内是有长久历史的争论问题，我们对这问题的经验尚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力量更要加重。苏维埃区域更加要注意，如在闽西的帮助富农的方法，依生产工具而分配土地，即共产国际所指的富农路线的分地法。对于这种富农路线，必须集中火力，加紧反对。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一定要加深。但是同时要坚决的反对动摇中农的办法，听说有人提议要现在就改变党的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口号”要

改为“没收地主富农土地”，南通、如皋的有些同志的“杀尽富农”的口号，这种倾向的发展，一定要走到向反中农的道路上去，是很值得注意的。这和职工运动上的错误一样，反对黄色工会而不抛弃在黄色工会之内的工作，而抛弃经济战斗的领导。其实在赤色区域的错误问题是更严重，因为这里是有我们政权的，是要做给全国的工人农民看。

(5) 苏维埃区域土地政策经济政策上的问题

苏维埃区域的政策上，不但要注意现时革命阶段民权主义的任务，而且要注意根本上列宁主义政策的问题——要使全国工农群众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否明白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不是“消灭小农经济”而是“改造小农经济”，领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像托洛斯基的主张一样，认为小农是不堪走向社会主义的，所以用强迫的办法去建立苏维埃国立农场和集体农场（共耕）——这种办法现时民权主义革命之中不能用，就是将来进到社会主义阶段也是不能用的。我想那些要现在就没收富农全部土地，不许土地买卖，不许租佃（资本主义的），就算是贫富均匀保证剥削关系消灭净尽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这会场上也许没有了。但是我们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了，是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在里面，有十六万以上的农民，还有地方会发生这一类思想而且实行起来：不是投降托洛茨基的反中农的思想，就是投降富农的富农路线。我们在群众中，不仅是领导苏维埃区域的斗争，而是要做给全国民众看：在我们的政府之下是如何的设施；不仅农民

问题如是，即经济政策亦如此。这里我们是说右和“左”的倾向都要反对，在执行这些问题时候，我们自然还是要认清以反右倾为最严重的，是因为党现在主要的危险现象，并非比群众走得太远，却还是落后——落在群众斗争之剧烈和深入的后面。我们在许多斗争中还不能抓紧自己的领导权，在工作中，或是反黄色工会而不加入黄色工会，政治斗争中不注意经济斗争，不深入土地革命，不扩大红军，在拥护和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中，不注意与一切斗争相联贯。这些问题上所以国际决议案上指示要集中火力反右倾的危险。别一方面，左倾的危险仍是不可忽视的严重，如对富农问题，对经济政策问题，不再详细说。这种错误不仅是太急进，而且是加强了右倾的立场，使他们可以说：“我们是对的。”在党内是如此；在群众中就是帮助了富农、黄色工会，使群众离开我们。革命进攻和争取群众的任务互相隔离起来，那就是策略上的根本错误。因此，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是非常之重要。我们要能够真正胜利的从群众局部的进攻形势，进到总的革命进攻，就应当更加努力地去发动领导极广大的，以至落后的群众起来，同着他们的先锋队一同斗争——达到苏维埃政权在全国胜利的目的。

三、新的革命高涨和党的任务

(1) 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

这问题是紧接前“革命高涨的新阶段”的问题的。在这问题中，本来应讲到革命的转变问题，但是因为时间关系，这一

部分我完全不讲了，我相信以后还有机会或者在党报上更详细来解释这一问题。目前党的第一等重要任务是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巩固他，发展他。特生、少山同志报告国际决议案，中央提出草案中均讲到这个任务的重要。可是，大家讨论中的发言仍是没有注意。虽然大家讨论中可看得出进步是很大，但我不得不很严重指出这一缺点。大家讲话只偏重于他个人工作范围的一部分，而未将建立全国苏维埃政府问题加以注意，自然我也不是希望大家在讨论时说些空洞不实际的完全是些原则上的话。要知这一问题是可以很实际的来讨论，即如举一例——“小”一点的罢，如何征调广大妇女群众来参加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呢？青年问题、游击战争问题、城市工人斗争问题等等均是如此。至于建立强有力的铁一般的红军，彻底执行土地革命，经济政策的灵活运用等，更是密切和苏维埃根据地联系着的问题，但是不要再重复的——叙说。我只希望各同志不仅向中央贡献如何调动好的干部等等来执行这一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并且要在政治上动员全党来解决这一最重要的问题。

（2）反动统治区域群众斗争和苏维埃运动

我们目前工作是有两方面的，一是在苏维埃区域，另一是在反动统治区域。反动统治区域之中，最严重的问题，是领导工人斗争的问题。我们不是将武装暴动问题收入到抽屉中去，而是要将这一问题，作为一个中心问题去斗争。怎样去斗争呢？很明白我们在群众中已有大的政治影响，但是中心任务的

问题是怎样去深入这些影响，是怎样在组织上巩固这种影响。现在许多地方有群众自发的斗争，我们不能充分的抓得住，影响还没有充分的深入，这是很明白的。我们必须明了：——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必须要把群众现在的斗争，由我们领导起来，组织起来，统一集中起来。即如上海现在组织工厂委员会的能力已有了，但这一新方式如何在现在加紧的要做呢，这也是要使群众知道的。工厂委员会是包括全工厂的工人组织方法，——这里必须有党的支部的核心作用，必须有赤色工会的积极行动和广大发展；这不仅是日常工作中争取广大群众的问题，一定要和建立全国政权的问题联系起来，要知道工厂委员会就是苏维埃运动里基本的组织。各种觉悟程度不同的阶层，以及最落后的工人，只有在这样政治训练之下，才能围绕着党及赤色工会而广大的动员起来，成为将来苏维埃巩固的支柱。我们如果在上海没有工厂委员会的工作，则上海暴动时是要更费许多力量，即使能有政治上很强的革命委员会，可是与群众联系的薄弱，将要成为严重问题的。同时，工厂委员会，也就是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上的运用，是部分斗争之中争取群众的行动机关，是要发展广泛的群众组织，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至于反动统治区域农民游击战争的发动，新的苏维埃区域的建立和发展（地方暴动），兵士运动的重要和正确指导；反帝国主义运动，贫民斗争……草案上有、报告之中都已详细讲到，我没有时间来重复的说了。主要的是使这些运动，都要联系配合——成为集中统一的为着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是在

正确的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和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及红军革命战争联系配合的，极伟大的广大群众的整个革命战线。

(3) 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

在最近要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特生同志讲话时特别指出这一点重要，现在全党是否已很注意了？是没有罢，到现在还是站在中立的态度罢(?) 虽然是没有反对，但是也没有看见积极的帮助。这是不容许的。这一运动——苏大会准备运动，正是联系苏维埃区域和反动统治区域革命民众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是目前一个最重要的具体任务，是和苏维埃根据地的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有最密切联系的问题。这一运动在十月十号即要做起广大的群众示威，广州暴动纪念日就要开会，日期是不多了。这一工作的准备，一定要首先注意下层统一战线问题，一定要和工人日常斗争，青年、妇女、士兵运动联系在一起。我只指出大家对总的任务方面注意力之缺乏——具体的问题，在草案中已说到了。

苏维埃大会是建立中央政权的最严重的问题。现在在苏维埃区域中对于政权建立的观念也是模糊的。各区苏维埃还不能深切的和民众联系。所以广西的农民会说出“苏先生是比国民党先生们要好些”(不说老爷已经很客气!)。我听苏维埃区域来的代表的话，就可以知道，当地是如何将政府问题看得轻，他们有的只县党部门口挂一块苏维埃政府的招牌，就完了。这如何行呢，一定要使群众了解苏维埃政府是什么，一定要使苏维埃真正成为群众能够运用的自己的政权。

四、组织问题

组织问题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草案中已说得很多，现在我只说两个原则上的问题。

(1) 党的本身问题

无产阶级基础的加强和指导机关加强是非常重要的。这指导机关问题，不仅中央、省委的加强，是要有工人干部的选出，这个加强是应当深及支部。支部的干事会，不能再像现在的情形（怕不仅支部罢，区委还是如此罢）！支部干事会现在不能自己担负起工作来，一切事情都要跑到区委或省委来请示，都要待省委来解决，甚至于自己连问题都还找不出，提出来要省委指示，还要省委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问。上海还是如此，各地可想而知了。支部干事只能尽传达的责任，真是严重问题。十九万党员中只有二千工人分子，这样自然难怪落在群众之后了，真是最严重的问题，红军之中党的领导问题也是如此。

(2) 群众路线问题

对党在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中发展的问题，尤其是群众组织的发展问题，如工会问题等等已指出很多，虽然是有进步，但不能满意啊！我们赤色工会全国只有六万多人，除了苏维埃区的会员外，几乎和党内工人数量相等，无怪乎国际代表

问到市政工会中情形而说是共产党工会了。英国的共产党，在党的数量上和我们比是差十万八千里，可是虽他们党员只三千人，但是在他们影响之下的有组织工人总以十万计，我们比英国那样弱的党都比不上，我们还不值得严重自警吗！

此外，我还有两点意见：

(3) 青 年 团 问 题

大家讲了很多取消团的取消主义，这点上我不再多说，我要指出真正极严重问题。在团的五次全国大会之后直到如今，发展上显然是落在党之后，近来更是无工作可讨论的情形，一点不要隐瞒，这是团的极严重危机。全党必须加以极大的注意，不过我们一定要将问题弄清楚。如青年团中央代表裕成^⑩同志所指出团的取消问题发生的原因：（一）因为理论上的弱。（二）因为对于行委^⑪认识不清楚。（三）对于任何时候不能取消独立原则不了解。（四）过去取消主义的反映。这四点我以为都还不是主要的，最最主要的是因为青年团在历史上始终成为第二党的情形，工作上没有真正切实的青年工作。——没有形成青年的，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群众团体。团的工作不能变转不仅是因为两条战线斗争问题没有弄清楚，而且尤其是工作不青年化。必须自上而下的审查工作青年化的实在情形。青年问题的严重，青年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重要，如近来我发现的上海法电赤色工会的主要负责人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工人的例子，也完全证明了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不必再多讲了，党对团的问题不是陪罪划分，而是如何帮助团的工

作上青年化。

(4) 妇 女 问 题

妇女问题的重要，也不必再讲了，但大家不注意是可以指出的。党内女同志的稀少。我们应记起上海三次暴动时的对丝厂女工的费力罢，丝厂女工自从有工人运动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没有办法，不只上海，各地都是如此，苏维埃区域亦是如此。黄安^②的代表在苏维埃区代表会上曾说过他们别的问题都容易解决，当前第一的大问题是妇女问题，它们对于离婚问题没法解决。这不是笑话，不仅黄安如此，各地亦均如此，要注意，我们现在苏维埃区的解决方法，正是要给全国妇女看的，是给她们问的“共产党的男女平等”是如何样的题目一个答案。

共产国际妇女书记部将要有一封信寄来，将要说到婚姻问题上。中国党内有些观念，是右倾的——例如有些苏维埃区域在法律上规定：一定要男女两方同意才能离婚。（场中有人说：鄂东民众离婚要在党的支部会上通过。）正当的办法，是法律上要完全承认女子一方面愿意便可以离婚，这才是真正取消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束缚妇女的关系。如果个别的事实上发生困难，只能用其它办法。例如同志审判会等类的办法来解决来和解这种问题很要慎重的，不能随使用官僚主义式的法令来解决。

五、党内反倾向的斗争

(1) 自我批评

党内问题上，先讲自我批评工作。我们是要给全党以及群众看，党有错误是不自己隐藏的，而向群众宣布的，这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特有精神，才是反对无原则斗争的最有力武器。

无原则斗争问题，特生同志说过了，我们一定要将这种斗争方式打下去。党在六次大会前后小派别斗争是非常利害（江苏问题，顺直问题等^④）。现在不能够了，已经在中央指导给以严重的打击，而消灭了大部分。因为我们的党是一个很大的党了，现在就是发生表面上是无原则的斗争，而实质上一定是有政治观点的不同。我们对于用私人活动、背后说话、会场上说“同意”的国民党的办法一定要肃清。

(2) 两条战线的问题

两条战线的斗争问题，我不再说大家已经说过的了。现要指出：大家说的有一个毛病，或者是说一切毛病都由于两条战线斗争不清楚的原故，或者是说由于重视打右倾所以有左倾的危险，或者说是上级“热昏”（是左）下级是“冰冷”（是右）——这样，岂不是“小热昏”碰着了“冰桶”真正没有办法了吗？这正如陈独秀对武汉时期说政府太右，群众太左，而要调和一下^⑤；是不是我们现在上面要右一些，下面要左些，这个

路线就会正确了呢？不是的，第一，中央对于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做过的，但是未曾明白指出来，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的经验还没有充分。事实上，不是中央没有反对“左倾”，没有知道两条战线，没有知道“左倾”并不比右倾好些。并不是这样。事实上是：由于对于形势估计错误，自己犯了些“左倾”的错误，因此也就对“左倾”危险的反对是不充分。第二，要知道“左倾”决不会比右倾好，像某个地方党部总觉得“左倾”比右倾总要好些（我不记得谁昨天说的），所以宁可以左一点，不要右了，这是不对的！我们看联共党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对“左倾”评语是最恰当没有了。……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公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同样，也反对加强这种机会主义的“左倾”的“过火”，我们在这一观点上看来，六次大会时便已经明显的指出两条战线的主要——当时亦有人企图利用中央反对“左倾”盲动主义没有充分的错误，而曲解国际的指示，仿佛认为以后只要反对“左倾”了；然而国际和六次大会决定：反对机会主义，亦反对盲动主义，等到一九二九年二月国际的信就指示反对机会主义是更重要的了，仍然要反对盲动主义；所以两条战线不是现在的“新发明”，现在是否上面“左倾”，下面右倾呢？国际指得很对，现在主观力量发展，落在群众斗争后面，所以主要的要集中火力反右倾。这完全是一般环境决定的，决不是上级和下级要分别看待。在一九二四——二六年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内托洛茨基派活动得厉害，在国际在义、比各国都很大，所以那时斯大林同志曾提出过反“左倾”是主要的，集中火力反对“左倾”。现在自然不同了。中国党上级反对右倾的

经验比较多，但是也未能传达到下级支部里去。右倾是我们主要危险。但是如果说下级没有“左倾”是不然的。“左倾”的表现如要“杀尽富农”、“不理黄色工会”等等都是的，反右倾反“左倾”同一要加紧，但现在还需要集中火力于右倾，因为右倾是主要危险。

我再说到立三同志对罗迈^②同志的批评。罗迈同志有书面声明，它不是说所有支部整个右倾，而是部分右倾，并且解释支部右倾的还有许多保存，是因为反右斗争还没有深入群众。这样是无多大毛病的。总之，各位同志举出许多群众生活，党部生活之中的事实，只是更加证明两条战线的重要，更证明我们现在要集中于反右倾。

两条战线斗争，不必多说，问题是为什么而做斗争？决不是“为反对倾向而作反倾向的斗争”，而是为坚定党，强固党，使党更布尔什维克化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对于明佛同志提出之张国焘同志问题，大家都注意，这不是反对个人，而是为党反对倾向，我们必须将张国焘、何孟雄的问题公诸全党，在政治上郑重的解决，因为这决不是某人合不合我们的意的问题。我们要是容许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而不和他们坚决斗争，则决不能完成目前革命新高涨之下的历史的任务。有这些倾向存在，也就不能将日常斗争与总的任务联系起来，我们必须同样加紧的斗争，去反对右倾与“左倾”，尤其是要集中火力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我们也只有如此，才能锻炼党的战斗力，发展工人群众的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巩固苏维埃根据地而扩大发展一直到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和完成。因此，对于

反“左倾”和右倾,都不能采取任何的调和主义的态度,尤其是对于对右调和的精神要特别注意,因为已经有些同志表现这种精神——这是妨碍反右倾的斗争的。

三全会的总任务,也就是这样,草案在政治委员会,再行详细审查,各同志有意见,可再书面通知委员会。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汇集》1930年第3分册

署名:之夫

注 释

① 特生,即向忠发(1880—1931),湖北汉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② 少山,即周恩来(1898—1976),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

③ 国际,指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成立于1919年3月,1943年6月正式宣布解散。

④ 中国问题决议案,指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即七月决议。

⑤ 伯山,即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等职。

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机会主义者,采取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是为取消主义。

⑦ 王若飞(1896—1946),贵州安顺人。历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

记、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等职。在党的第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任中共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在由重庆飞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遇难。

⑧ 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在英美支持下的蒋介石军队“继续北伐战争”，向进驻济南的中国军队大举进攻，占领济南城，中国军民数千人被屠杀，蔡公时等17名国民政府外交人员亦遭杀害。

⑨ 1928年党的“六大”以后，中央领导认为江苏是全国经济的中心，产业工人集中，需要改组和加强领导。为此在上海工作的党中央领导人，经常参加中共江苏省委的活动。1928年11月20日，为领导法商电车工人罢工成立的江苏省行动委员会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并统管全江苏工作，引起省委反对，认为这有碍省委行使职权。以后，江苏省委行动委员会与省委合并，中央又准备将江苏省委归并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得到消息后，未得中央的正式通知就把消息告诉下级，引起省委和区委的反对。这就是党内通称的“江苏问题”。

⑩ 托落斯基，今译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1940），苏联政治活动家。十月革命后曾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因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成为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后被指控组织反党联盟，1927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开除其党籍，1929年被驱逐出境。1940年被害于墨西哥。著有《我们的政治任务》、《十月革命》、《不断革命》等。

⑪ 孟雄，即何孟雄（1898—1931），湖南酃县人。早期北方职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曾创建京绥铁路工会。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委农民部秘书，上海沪西、沪东、沪中区委书记等职，曾反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1931年被捕牺牲。

⑫ 当时张国焘在苏联。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他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1931年回国。

⑬ 第三时期，是共产国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所提出

的一种论断,认为1917年至1923年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时期;1923年开始,为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第二时期;1929年起,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第三时期。

⑭ 安南,今越南。

⑮ 中国大革命时期,一部分越南革命者曾在广东、广西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参加中国共产党。

⑯ 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1888—1938),苏联政治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十月革命后历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真理报》主编等职。1929年1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其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37年被开除党籍,次年被处死。1988年平反并恢复其党籍。著有《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共产主义ABC》、《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等。

⑰ 洛夫斯敦,今译罗夫斯通(Jay Lovestone,1898年生),美国共产党人。1927年任美共总书记,1928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9年被开除出党。

⑱ 振鹏,即吴振鹏,当时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

⑲ 贺昌(1906—1935),山西离石人。中国共产党第五、第六届中央委员。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委书记,1930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后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春,在江西会昌地区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英勇牺牲。

⑳ 大刀会、红枪会,是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民间结社,带有封建迷信色彩,参加者多为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

㉑ 长沙战争,指1930年7、8月间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的战争。7月27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十天后被迫退出。8月30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合,组成红一方面军,再次向长沙发动进攻,攻城不克,于9月中旬移师江西。

㉒ 刘明佛,当时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

②③ 平浏，即湖南省的平江、浏阳。

②④ 季诺维也夫 (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Зиновьев, 1883—1936)，俄国工人运动和布尔什维克党早期著名的活动家和领导人。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主席等职。1927年被开除党籍，1936年被处死。1988年6月苏联最高法院宣布其无罪，予以平反。

②⑤ 嘉米聂夫，今译加米涅夫(Лев Борисович Каменев, 1883—1936)，苏联政治活动家和国家领导人。十月革命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9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6年被处死。1988年6月苏联最高法院宣布其无罪，予以平反。

②⑥ 俄国二月革命的临时政府，指1917年二月(俄历)革命胜利后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领导的资产阶级政权，十月革命时被推翻。

②⑦ 章龙，即罗章龙，又名罗仲言。生于1896年，湖南浏阳人。当时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中央工委书记等职。

②⑧ 改组派，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汪精卫的国民党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党合流以后，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等不满蒋介石独揽大权，于1928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鼓吹重新改组国民党，形成了国民党内部的改组派。

②⑨ 取消派，是由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部分参加托派组织的学生被遣送回国后，同陈独秀等人结合而成的小团体，亦称托陈取消派，或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参见本文注⑥。

③⑩ 民权派，是以胡适、罗隆基等留美学者为骨干组成的资产阶级政治流派。他们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主张人权、专家治国和言论自由；同时也反对共产党，宣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曾以《新月》杂志为阵地，号召讨论人权，因而又被称为人权派。

③⑪ 社会民主党，这里指邓演达等于1930年8月在上海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提倡农工革命，是中国农工民

主党的前身。

③② 邓演达(1895—1931)，广东惠阳人，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早年参加同盟会，北伐战争期间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大革命失败后流亡苏联和德国。1930年回国，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从事反对蒋介石集团的斗争。1931年11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

③③ 吴大帅，即吴佩孚(1874—1939)，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

③④ 冯总司令，即冯玉祥(1882—1948)，安徽巢县人。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为国民军，自任总司令。

③⑤ 张大帅，即张作霖(1875—1928)，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

③⑥ 陈源道(1901—1933)，安徽巢县人。1929年初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1930年2月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秘书长，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赴天津，任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1931年11月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③⑦ 裕成，即温裕成，当时担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工人经济斗争部部长。

③⑧ 行委，即中央行动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下，在1930年8月1日的会议上决定将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合并成为中央行动委员会，各地方的党、团、工会亦合并成为地方行动委员会，以加强准备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

③⑨ 黄安，今湖北省红安县。

④⑩ 顺直问题，指“六大”前中共顺直省委内部的派别斗争。北京以前称顺天府，河北称直隶省，顺直即今北京、河北地区。

④⑪ 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发表了这样的观点。

④⑫ 罗迈，即李维汉(1896—1984)，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组织部长。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 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

——一九三〇年九月，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
秘书处一九三〇年七月的中国问题议决案的决议

一 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

一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兴盛和全世界的经济危机

现时世界的状况是：在资本主义一般危机的基础之上，开展着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整个系统的一切主要矛盾剧烈到极点，开始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末日；同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业化和集体农场运动已经有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成绩，虽然还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在布尔塞维克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赞助之下，苏联的发展已经是大踏步的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这样，使全世界的劳动群众更加看见现在世界的主要矛盾的日益深入，这种主要矛盾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日益兴盛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日益动摇。因此帝国主义列强，更加加

* 这是瞿秋白为中共三中全会起草的决议案。

紧对于苏联的侵略，积极准备进攻苏联的战争。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也因为更加要加紧争夺市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所以发展着相互的冲突，日益促进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也极端的剧烈起来——资本家对于工人实行残酷的进攻，群众的大批失业，工资的降低，工作时间的加长，社会保险的取消，税捐的加重等等；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蒂化，剥夺群众的政治自由，社会民主党和黄色工会也法西斯蒂化，他们和资本主义的政府机关混合起来；工人群众正在用广大的罢工斗争来反对这种资本的进攻；国际的群众政治示威，失业工人的广大运动，德国、法国、波兰，以至英国、美国都有广大的斗争爆发，殖民地的劳动民众，也发动革命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中国、印度、安南^①等）。总之，世界的经济危机，引起无产阶级更进一步的反攻，和殖民地革命斗争的兴起，在有些国家里面，经济危机已经引导到政治的危机；所以全世界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革命高涨已经开始，而最近的世界危机只是更加促进殖民地上，尤其是中国革命的国内战争的开展。这种情形，很明显的把国际的和中国的托洛茨基派^②和党内右派对于世界革命的悲观的取消主义的估量，打得粉碎。

二 世界革命的高涨和中国革命

同时中国的反帝国主义革命，已经是在世界革命的总高涨的情形之下进行，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所以说只有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列强国内革命胜利之后，中国革命方才能够胜

利的说法，固然是错的，同样，看不见中国革命胜利，有促进世界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掀动世界革命的伟大意义，亦是非常之错误的。

二 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三 中国政治经济危机的深入

中国最近的事变^③指示出：中国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阀政府更加密切的和帝国主义列强的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到中国，使中国的经济危机——巨大的工业、农业、金融的危机，更加深入（工业的停滞和衰落，巨大饥荒的继续，失业之增加，银价低落和米价等的高涨）。工人受着中外资本家极端残酷的进攻，农民群众和小资产阶级贫民，亦大批的更加破产和贫困化。而帝国主义列强，正在为着抢夺劫掠中国市场，而加紧侵略中国，重新瓜分中国，争夺中国的势力范围。于是中国国民党——中国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他的各派军阀政客，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各种集团，互相倾轧和排挤，在经济危机深入的推动之下，更加加紧争夺着对于工农贫民群众的“剥削权”，同时他们也就各自勾结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受他们的实际支配，而替他们争取势力范围。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斗争，不但已经爆发成为连续将近两年的军阀混战，而且已经完全毁灭了所谓“青天白日旗统一中国”的幻想，公开的分成几个互相排挤互相战斗的政府

(北方政府的成立,满洲政府的“中立”和最近张学良④的出兵进占天津、北京等),一次战争没有完全结束,立刻又暴露更加扩大范围的第二次战争的准备步骤。更明白表演着:中国全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国民党军阀制度的崩溃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反革命的军阀混战的延长,和统治阶级的更加分裂,愈益削弱地主资本家的政权,同时这是更加加重对于群众的剥削和压迫,而日益引起群众方面更加积极的反抗和斗争。

四 中国革命运动高涨的新时期

中国革命势力的发展,也正在走进新的时期。中国的工农红军,占领过长沙一次,接着在退出长沙之后,利用占领长沙的一切军事政治上的教训,集中并且改编自己的力量,而进行更有效的反对反动统治的战斗。长沙十天的苏维埃政府,不管帝国主义国民党各派和陈独秀托洛茨基⑤等怎样诬蔑咒骂,他对于全国以至全世界的劳动民众都引起极广泛的同情和赞助。固然,第一次占领长沙之中:第一,红军各部队的力量没有充分的配合行动,第二,红军的进攻和长沙的群众斗争没有充分的联系,第三,当时没有充分组织后方和根据地,第四,仍旧保留着许多游击战斗的性质。然而,长沙的占领,开辟了中国革命高涨之中的新时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苏维埃暴动,是前一次革命失败过程之中的“退兵的战斗”;而现在长沙十天的苏维埃,却已经是新的革命爆发的“进兵的斗争”——他开始了为着全国苏维埃胜利的革命战争。江西、湖北、广西、福建、广东的红军,正在这个时间更加发展自己的力量

的斗争；新的苏维埃区域的建立和发展，农民的游击战争，地方暴动，以及自发的农民斗争，也都在扩大。军阀军队里的兵变和士兵暴动的酝酿和发动比以前更加增加了他的力量，扩大了他的范围，尤其是和红军接触的部队。城市贫民自发的斗争，也往往成为广大的骚动和抢米运动。最主要的城市工人群众，在最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发展着群众的罢工运动，时常发生和警察、巡捕、军队的武装冲突（一九三〇年全国红五月的广大运动和政治示威，八一运动，上海水电罢工，上海五万人丝厂女工的罢工，青岛的纱厂和人力车夫的大罢工，武汉裕元纱厂的罢工等等）——虽然运动和斗争的规模和力量，还没有充分的巨大，可是斗争的剧烈和日益高涨的形势是很显然的。一般工人反对黄色工会和国民党的斗争，更加普遍，更加剧烈，这是证明对于除出武装暴动没有出路和必须推翻国民党政权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认识，开始更加深入到工人阶级里面去。这种斗争情形明显的表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长沙的占领和革命战争的开始，是在中国一般的新的高涨的背景之上的，而且苏维埃已经是能够总合一切革命运动的唯一的旗帜。

五 现在革命运动的特点

现在革命运动的特点，是从工农群众部分的革命行动进到总的革命进攻的过渡时机：（一）城市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充分的力量，足以袭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整个统治，可是正在更加剧烈和日益高涨；（二）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力量，也

有各地方不平衡的现象，有些地方刚在开始农民的游击斗争，有些地方却已经能够推翻当地的国民党政权；(三)而且红军战争的主要区域已经进到规模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正式战争，跟着军阀军队的兵士的革命哗变和响应红军的运动，也正在日益扩大。——这样，部分的说来，军阀混战已经开始变成革命战争；(四)苏维埃区域的逐渐汇合，要从零星散乱的地方革命政权的树立，进到建立苏维埃的临时中央政权，来指挥组织革命的战争，集中革命的势力——用统一的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去和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对抗，去领导起全国的革命运动，为着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胜利而斗争。

六 国民党的屠杀和帝国主义的出兵干涉中国革命

中国国民党就用发狂的白色恐怖和屠杀政策，企图挽救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凡是反动统治现时还维持着的地方，不论是城市和乡村，都是这样情形。国民党军阀，在帝国主义军事顾问、包探、专家的帮助之下，特别布置主要城市(武汉等)的“防御工事”。国际各国的帝国主义的海陆军和国民党各派军阀，都用极残酷的手段来攻打苏维埃和红军，施用飞机炸弹，整个的轰毁许多村镇，杀死成千成万的民众。国际帝国主义的列强，已经公然计划，并且实行出兵几十万到中国来干涉革命。

七 国民党改组派^⑥和取消派^⑦等的拥护白色恐怖政策

这样，革命和反革命决定胜负的斗争一天天接近，使一切

种种所谓“第三派”更加加紧的企图用“国民会议”等口号的欺骗宣传，来蒙蔽群众，破坏革命。可是，国民党的改组派，汪精卫^⑧等，最近参加北方政府，公开勾结帝国主义，赞助军阀，宣传并且实行反对苏维埃革命的白色恐怖政策，使改组派的假面具完全揭露，甚至于完全丧失。托洛茨基陈独秀等取消派，亦跟着改组派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反对苏维埃，说“长沙是土匪占领的”，这很明显的表示他们实际上拥护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政策。其他胡适之^⑨的“民权派”，邓演达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⑩，也是同样的作用。取消派等都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实际上也是在努力维持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

国际的托洛茨基派，以及白朗德尔派^⑪，也和中国国内的陈独秀一样的，他们对于残酷的白色恐怖，以及长沙、汉口等处最近屠杀几千工人和共产党员，并没有表示半点抗议，而对于中国红军、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却极力的诬蔑。

八 中国革命进展的前途

帝国主义的列强，这样积极的实行领导反对中国革命的战争，运用他们一切种种走狗的赞助，来镇压那争取中国解放的工农苏维埃革命；中国国民党各派的白色恐怖政策，以及陈独秀、邓演达^⑫等的反动宣传，都这样一致的来反对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这足以更加明显的指出：一方面对于中国革命敌人的力量（帝国主义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需要更伟大的更有组织的发动极广泛群众的革命力量，来和他们对抗和斗争；别方面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自己已经认识清楚——在全世

界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劳动群众，一般的革命高涨的情形之下，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对于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都有极大的危险，对于中国国民党的统治，那简直是死亡的日期一天天的接近。

三 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现时革命情形的正确估量

九 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一致的总的政治路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一九三〇年七月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估量中国革命的运动说：中国“革命的爆发，一天天的接近”，“最近期间，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包括到整个中国，至少也要包括到几个主要省份的地域”，不过是“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的形势（武装暴动的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总合起来，这些运动还没有保证必需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然而“中国革命运动的新的新高潮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和一切取消主义机会主义的预言完全相反，中国最近的事变，照上面所讲的看来，正是确切的证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估量完全正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的这种指示。

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根据于中国的一般的革命运动的新的新高潮情形，党的路线的确应

当是：发动群众斗争，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为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就是说：要在工人群众之中，首先是在工厂中加紧党和赤色工会的作用，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日常的经济斗争，并且把这些斗争密切的与政治口号及斗争联系起来，以动员和组织工业城市之中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同时，使工业城市群众运动，与革命的农民运动以及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创造总罢工武装暴动的必要条件，巩固并且扩大苏维埃区域的根据地。

十 中央全体会议对于过去错误估量的纠正

同时，中央全体会议认为必须指出：中央政治局最近期间对于目前形势的估量，在许多重要问题之中，有模糊而不正确的地方——对于时局有过分的估量，对于不平衡发展的观察不清楚，忽略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忽略工业区域日常斗争和政治问题的联系；总起来说——就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没有充分的估计到：现在的事实是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力量，还没有平衡，还没有汇合，农民战争之中还缺乏充分的无产阶级领导和组织作用；政治局亦没有充分的估计到：目前统治阶级还没有完全削弱完全破产；于是对于帝国主义反革命统治崩溃的形势和可能，对于革命势力的现状，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速度，都有过分的估量。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的决议案，在一般的正确路线之下，就已经有这种估量上的错误——认为“城市工人尚未走到‘客观革命的形势’的主要原因，只是由于白色恐怖的镇压”，而忽略共产党在群众之中和革命之中的组

织作用的还不充分，亦是这种情形的一种重要原因；甚至于认为“只要在产业区域和政治中心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客观革命的形势。”这种估量是不清楚而不正确的，一定可以，而且已经引起策略上的错误。

这种估量之中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到：(一)现在大城市的产业中心里，还缺少更加广大的群众动员和群众发动；(二)各地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发展扩大，还需要领导的加强和集中，需要建立巩固的阵地，去迎接更加残酷巨大的决定胜负的战斗。因此，政治局过去的策略上，就有个别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的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所以冒险倾向的轻易暴动的布置，代替了切实创造武装暴动前提的斗争。

为着更加坚决彻底执行国际和中国党一致的路线起见，必须遵照国际执委的指示，立刻完全纠正这些错误，而在一般策略和工作上，实行必要的转变。

十一 反对动摇党的路线

同时，中央全体会议指出来：实行纠正政治局过去策略上的错误，决不是变更党的路线。最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利用这些个别的错误，企图进攻中央的路线，企图用曲解国际路线的手段——认为现时应当采取保守政策——而来推翻中央和国际一致的路线。总之，左倾的估量认为全国客观革命的形势已经到来，应该马上到处布置暴动；右倾的估量就否认全国总危机和一般的革命高涨事实，而认为应该抛弃准备总同

盟罢工,和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方针,这都是违背国际和党的一致路线的。而右倾的估量,简直是投降政策——客观上是取消派埋伏在党内的奸细。

总之,空喊“工人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和示威”的“左倾”机会主义,以及反对政治斗争,反对创立武装暴动必要的条件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两种倾向都阻碍着争取广大群众及发动和领导坚决的战斗。党应当坚决的斗争:——反对空喊总罢工武装暴动而忽略工厂之中日常的群众工作,和群众直接的日常要求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只看到经济斗争而否认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联系的密切,不去努力创造总罢工武装暴动的必要条件的右倾机会主义——而且现在右倾是主要危险。

四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

十二 共产国际指出的任务的总意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一九三〇年七月的中国问题议决案,根据对于中国形势正确的估量,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目前任务,更有详细明确的指示。这任务的意义是:(一)巩固和发展各苏维埃区,集中农民斗争的力量,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工农红军的直接领导,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临时中央政府,去组织革命的战争——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二)同时,积极的扩大中心城市工人群众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发动并领

导全国反动统治区域里面各种方式的群众革命斗争，争取极广大的劳动群众来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加强并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权；——这样去坚决的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

十三 苏维埃根据地的建立

革命势力——工农红军的发展，正在从零星散乱的游击战争，进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正式革命战争，长沙占领事变的经过，更加明显的指出这样情形。中国红军的三、四、五、八军的汇合和广大的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正是证明当前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巩固的阵地，就是建立集中统一的真正和工农群众密切联系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最有保障的地域——苏维埃的根据地，创造并且巩固真正坚强的，政治上军事上有充分无产阶级领导的红军，以便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政治中心——这种形势，现在是湘鄂赣区域最为成熟。

十四 苏维埃区域里的政策

这种任务的执行，首先就要不但继续扩大发展各苏维埃区域，而且要切实加强这些区域里无产阶级的领导：（一）要切实组织并且整顿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吸引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的参加，排斥富农和投机分子；（二）要坚决彻底的实行土地革命，分配田地；（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最小限度的保护劳动的社会法令；（四）实行适当的以承认自

由贸易和施行劳工监督生产为原则的经济政策，和一般抑制剥削者的政策及租税政策；(五)实行坚决的肃清反革命政策，和革命的民权独裁；(六)实行经过群众团体定期征调志愿兵的办法，去坚决改良红军的社会成份，建立红军之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干部，提高和巩固党在红军之中的领导作用及绝对的威信。……这就必须发动当地更广泛的群众，组织他们的斗争，发展并且巩固当地的赤色工会、雇农工会、贫民团等，去团结中农群众于自己的周围，而肃清富农的一切反动影响和领导。只有这样，苏维埃才能有巩固广大的群众基础。国际执委的议决案，对于这些问题的详细指示，应该立刻坚决的去执行。

对于这一个问题——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创造并且巩固真正的红军，以确立最有保障的地域(根据地)以及随着这个方针而必须执行的许多步骤和办法——中央政治局直到最近才加以充分的注意。这个任务的执行，决不是“割据偏安”的“和平建设”，恰恰相反，只有在斗争之中，才能够发展出坚强的政治上稳固的真正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这种巩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肃清苏维埃区域内部反动势力的方针，正是要用更加巩固革命阵地的方法，使胜利的进攻得到多分的保证，这样去真正扩大苏维埃区域，——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现在不彻底的去准备苏维埃根据地，不加强和改造红军，不做政治上军事上更好的准备，而使单纯扩大战斗的政策束缚了自己——这是很有害的。

十五 城市工人运动里的任务

反动统治区域里城市工人的斗争、女工运动、青年工人和童工运动，以及失业工人运动，必须加以更加充分更加切实更加坚决的领导，对于自发的经济战斗和反对国民党及黄色工会的斗争，以及还在黄色工会等箝制之下的运动，必须加以更多的注意；要保障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使他不但不至于比客观自发斗争的剧烈化还要落后，而且能够得到组织上的巩固——首先就是党和赤色工会的发展，以及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切实执行和扩大，这就必须更坚决的去执行独立领导斗争，团结广大下层群众，反对黄色工会，消灭黄色工会的策略。城市工人运动的中心问题就是在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之下，去加紧组织政治罢工——因此，必须努力加强对于日常部分的经济政治战斗的领导，扩大罢工运动，直到各业同盟罢工，并且发动群众的更广大的政治斗争，不但不把经济和政治要求机械的分割对立起来，而且要能够综合联系政治和经济的要求去组织伟大的政治罢工。要能够发动群众的经济战斗和政治战斗，从这种部分要求的群众运动的领导，联系到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总斗争，这样去真正切实的准备政治总同盟罢工，以至于武装暴动。

对于罢工运动不能充分领导群众切身要求所激起的部分斗争，同时又并不能使政治罢工的鼓动深入群众，并且不能联系部分要求的斗争和总的政治斗争——这是争取群众的很大的障碍。至于机会主义的动摇分子，企图分割政治的和经济

的斗争，要使运动停顿在经济的小斗争范围之内，并且把准备总同盟的政治罢工推到第二等的地位——那就简直是尾巴主义的最严重的表现。

十六 争取群众和积极准备暴动的联系

反动统治区域的农民运动、饥民运动、兵士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等，亦都应当在这种原则之下去进行。总之，对于目前任何细小的斗争，党都不应当忽视；必须认清：争取大多数工人群众，一直到落后的广泛的劳动群众——是和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发动游击战争和地方暴动的任务，绝对不能对立起来的。恰恰相反，正应当利用工人和厂主，店员和雇主，农民和地主，兵士和军官……以及帝国主义军阀和中国民众，反动的中国政府和境内弱小民族之间的一切冲突，去领导和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削弱反动的统治，争取，动员，并且组织革命群众，这样去积极准备武装暴动。

十七 革命武装力量的扩大和准备

这些斗争的发展之中，应当注意到工人军事上的编制训练和武装训练；应当坚决的从抗租、抗税、抗债等斗争里，从发展新的苏维埃区域和土地革命运动的斗争里，发展更广大的农民武装、游击队和游击战争，适当的去创造新的红军；应当对于兵变给以正确的领导，并且在适当的条件之下组织士兵暴动，使他们的发动，的确能够削弱反动军队，而加强革命的武装势力——和工人农民以及红军的斗争联系起来。主要的

问题是在所有这些运动之中，实现并且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这里，不能够有冒险的行动和布置；因为准备的不充分，以及和兵士群众的联系的缺少，或者因过于夸大计划而等待不可能的配合——这些行动和布置，反而可以断送我们在敌人军队之中的力量。

十八 苏维埃区域和反动统治区域任务的相互关系

自然，反动统治区域的这些斗争任务，决不可以和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割离起来，尤其不可以互相对立起来。恰恰相反，这两部分的任务，只是一个整个任务的两方面，——这个整个任务，就是为着全国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所以两方面的任务，应当互相适合，互相联系。例如要在日常斗争里去引起广大群众的发动，在反对军阀混战，变军阀战争为反对军阀的革命战争的总口号之下，起来拥护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反对攻打红军，阻挡运输军械、军队去打苏维埃区域，号召兵士投到红军，工人替苏维埃政府去工作……等。总之，党的总方针，是要组织现在的革命战争和积极准备城市暴动，互相配合和联系起来。

十九 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运动

一般的全国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的斗争，苏维埃区域的政策，以及红军的战争，都要集中统一的组织起来，领导起来，适当的联系和配合起来。所以最近党的具体任务就是要领导起极广大的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准备运动。要能够切实的把全国大城市和一般反动政治区域里面工农群众的解放运动,以至日常斗争,和苏维埃大会的准备运动,密切联系起来,并且要能够真正发动各苏维埃区域极广泛的群众,来积极参加大会的准备,这样,使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和将要在大会产生的临时中央工农苏维埃政府,的确有全国斗争的劳动群众做他们的支柱。

二十 苏维埃政府的大政方针

全中国以及全世界范围之内,要发动广大的赞助并拥护中国苏维埃大会而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的广大运动。——要百倍的加强列强驻华海陆军里面革命的兵士运动。要经过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群众自己的政府,在一切宣传鼓动的运动里,提出主要的中心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劳工团体监督生产,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建立独立的解放的统一的苏维埃中国,取消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权——中国境内,不论是中国和外国的资本家,凡是违背和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法令的,都要受到严厉的制裁,一直到把他们的企业租借区收归国有;——要公布这种苏维埃政府的目前大政方针于全国和全世界。并且要特别提出联合苏联的口号,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群众,来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及民众,共同拥护苏联,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进攻苏联以及压迫中国革命的战争。

二十一 党的组织任务

所有这些任务，很明显的要求党努力去加强主观的力量。首先就是要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广泛的征求产业工人、女工入党，而征求农村工人、雇农、苦力等入党，亦是非常重要之重要的问题；同时，要在广大的半无产阶级的贫民群众之中，发展党的组织；要坚决提出工人干部，训练新的干部，要百倍的加强党的各级指导机关，直到支部干事会。要扩大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一切革命的群众团体，尤其是赤色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以及劳动童子团、工人纠察队、赤色先锋队、少年先锋队、革命的农民及兵士团体、反帝国主义大同盟、革命互济会等等。

现在，一方面要努力加强党对于青年团工会以及其他革命群众团体的领导作用；别方面正要更加扩大群众的非党团体，广泛的发动他们的组织，提高他们自己的活动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并巩固党对于广大群众的政治影响，使有组织的革命势力，不仅仅限于最先进的先锋队伍，而能极广泛的包含到伟大的群众。任何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上的某些办法，足以妨碍这种任务的进行，甚至于事实变成取消青年团以及妨碍工会工作等的现象的——都极端的有害，而不能不立刻改变；要真正建立并且强固各种群众团体里的党团工作，要努力扩大并加强党的支部和他在群众之中的核心作用，尤其是产业支部。

以后党的最主要的组织任务之一应该是：有系统的扩大赤色工会的基础，使他们在工厂之中成为真正的群众组织。全

总^⑬，上海工联，各省的总工会，以及各产业工会，都要成为有战斗能力的组织。要从工厂里面最好的最积极的工人之中，特别是从罢工及各种斗争里面最积极的分子之中，提拔新的工会干部。应当铲除害怕和不信任非党的无产阶级分子做工会指导机关工作的倾向；党的支部和党团，应当在工厂和工会里面，把这些选拔出来的广大的无产阶级干部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党团和工会，都应当特别注意劳动妇女运动，尤其是女工运动，必须各级党部、团部、工会的整个指导机关，一直到每个支部，每个工会下层组织，都负责积极去进行妇女工作。

党对于青年团要注意到现时极严重的青年团的危机状态——青年工人的工作薄弱到极点，团员的工人成分，比党还要稀少，苏维埃区域虽然有青年群众的组织，而极端缺乏团的正确领导。党必须百倍的加强对于青年团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加强青年团的反对右倾主要危险，同时加紧反对障碍青年团实际工作转变的“左倾”清谈和关门主义，而切实执行青年共产国际^⑭所指示的转变，实行工作上的青年化，尤其要反对党内轻视青年工作的倾向。党的中央政治局的关于“总行委”决议^⑮，事实上得到了取消团的组织的结果——这种错误直到最近方才纠正；——这种错误引起了取消青年团倾向的加强，所以特别要坚决的反对这种取消主义的重要危险。同时，也要加强斗争，去反对因为这些最近的错误而更加激起的先锋主义的“第二党倾向”^⑯。

二十二 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

现在革命发展的形势，是革命和反革命开始日益接近决定胜负的战斗，国民党改组派、陈独秀托洛茨基的取消派、邓演达的社会民主派、胡适之等的民权派，凡是这些企图站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中间”派、“第三派”，都自然要更加努力帮助统治阶级——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地主资本家——想出比较巧妙的方法，来欺骗群众，拉住群众，阻碍群众的革命化，而维持反动的统治。他们一致的口号是“国民会议”；他们多多少少相同的策略，便是企图诱惑群众走到合法主义的“正轨”上去，甚至于露骨的做破坏罢工的工贼，出卖农民群众斗争的奸细——已经成为通常的现象。就是不成派别的工头、帮口、红枪会^①等类的首领（富农豪绅等），事实上也是传达改组派等影响到群众中去的工具。这种政治派别和破坏革命分子，甚至暗藏在苏维埃区域里去活动。他们的活动，尤其是在反动统治区域，往往还能够欺骗落后群众，至少是使群众暂时的犹豫，散乱，认不清目标。所以共产党的任务，就要更加加紧反对这些派别和这些分子的斗争，争取群众自发运动的领导，主要的是要在政治上解除他们的武装。这就必须实行“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在一切斗争，尤其是日常部分要求的斗争之中，共产党应当和非共产党的一般下层群众团结起来实行斗争，独立的去领导他们的运动，使这些运动都走到苏维埃政权的总口号之下来。这样，在斗争的过程中，要在每一步，每一件事情上，都切实去暴露这些派别，黄色

工会的领袖，——红枪会等类的首领……的反革命作用，以及他们欺骗、箝制、出卖、压迫群众的真相。

二十三 革命转变问题和反对孙文主义、托洛茨基主义^⑱的斗争

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是斗争急剧的发展和迅速的深入。因此，共产国际执委特别指出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前途问题。中央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最近几次议决案上，指出“两个革命完全隔离”的说法，以及“革命开始胜利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的说法，固然是正确的，可是，自己的群众，也是不清楚的，而且是机械的（“一省或几省革命胜利就一定是革命转变开始”的说法）。党必须根据国际七月议决案的详细指示纠正这些错误，更切实更明确的指出并且解释：中国革命现时阶段，还是民权主义的性质，而他的胜利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并且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更加加紧反对孙文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五 反对倾向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二十四 自我批评和反对倾向的斗争

党现在要担负起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严重任务，要在组织上加强自己的战斗力，要加紧反对一切反

革命派别在群众里的影响，而争取广大的群众。为着执行这些任务，党必须根据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的七月议决案和本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切实检查党的工作，实行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从中央一直到支部，都要站在国际和党的路线上，审察批评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而坚决的执行纠正，使全党都了解这些错误的实质和教训。别方面要防止调和主义精神的非布尔塞维克的“自由批评”——离开党的路线，甚至攻击党的路线的批评。并且党在现在情形之下，应当比任何时期，都要更加保障思想上布尔塞维克的一致，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右倾和调和主义。

二十五 “左倾”的错误

因为必须坚决的领导罢工斗争，尽量发展农民的游击战争，和地方暴动的关系，除主要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危机之外，又发现了盲动主义、关门主义倾向的错误——就是往往不去争取群众，不能估计群众的力量而只有脱离群众的发动计划等等。同志之中发现“不理黄色工会”，“凡是不是雇农，一律都应当开除出党”，“杀尽富农”，“只要领导十亩以下的贫农去抗税抗租”等类口号的提议。并且已经有放弃群众日常斗争的领导，忽视组织上巩固党的影响和群众团体等的现象。甚至于借口“群众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只要大干，不要小干”的论调，而实际上走到极有害的机会主义的消极。群众之中的这种情绪，只足以表示群众对于国民党统治的仇恨的增长，以及群众力量组织的需要的增加。如果因此就不去领导群众日常

斗争，那就成了等待暴动。别方面，这一类的“左倾”情绪，在革命战争之中，往往会引导到表面是“坚决向前进攻”，实际是继续“没有后防的作战”方式；在苏维埃区域里，就是不会适用对于帝国主义的应付政策，脱离农民群众的“左倾”幼稚政策，反对富农而不会团结中农于自己的周围；以及一般的不会在政治上解除改组派、取消派、黄色工会、富农等等的武装，而反对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

“左倾”的错误，是在于只看到先进分子的情绪，而不去切实艰苦的去争取群众，因此，脱离广大群众而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急进主义。“左倾”的错误，事实上是巩固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所以一定亦坚决的反对一切“左倾”，不应当有任何调和的态度。

二十六 右倾的主要危机和调和主义

同时，现在党要在斗争的过程中，准备力量收集力量去迎接最近将来决定胜负的战斗，要勇敢的去发动，并且独立的去领导几千百万群众的革命斗争——在这种斗争条件之下，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

现在的状况：最严重的危险事实上的确是对群众斗争落后的尾巴主义——有些同志甚至于说“群众都是右倾落后的”来掩护他们自己的怠工。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上实际上的表现，就是：工会的合法主义（投降黄色工会，放弃独立领导斗争的黄色倾向），农村里的“富农路线”（阻碍土地革命，保守和平发展的主张，放任群众在富农影响之下等等事实），对

于农民战争的蔑视，恐惧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过分”发展等等。可是最近这些个别表现之外，还有更严重的现象——甚至于形成整个的右倾路线，企图鼓动同志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种右倾路线是：（一）说“国际无产阶级帮助中国革命是空话，而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是实在的力量”，所以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二）说城市工人没有革命的斗争，没有同盟罢工的可能，只能实行日常的经济的小斗争；（三）说农民的斗争，因为没有工人革命斗争起来，所以不能成为什么大的力量，说农民战争是“部落式的暴动”（“长沙的占领是决没有前途的”）；（四）借口发展不平衡，否认世界的总危机和一般的革命高潮（否认“第三时期”）^①，否认中国全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和总的革命高潮；（五）因此，认为不应当有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并且根本否认党的成绩，发展悲观的论调——主张避免剧烈斗争来和平的发展“主观力量”，说一定要赤色工会组织了大多数工人之后，才有别的办法；（六）造谣挑拨说党内实行纯粹的委派制度，“弄得同志都不敢讲话”，发展煽动无原则的派别斗争。这个路线显然是反对党的整个路线——亦就是反对国际的路线。可是这些右倾分子却利用着中央政治局策略上组织上的个别错误，不但造谣诬蔑挑拨离间，进行小团体的活动，而且宣传中央的路线和国际是不一致的，用政客外交的手段，冒着“拥护”国际路线的名目，实行反对国际和党的路线。这些分子的领袖，又正好就是从二中全会以前，江苏问题的争论^②，反对陈独秀斗争的最初阶段以来，一贯的是反对中央的。

而且，在党批评和打击这些右倾分子的时候，居然有些同志还采取调和态度，说右倾路线并没有形成，说思想上反对右倾固然需要，组织上的制裁是用不着提起，只说中央和国际不会不一致，而不答复右倾分子的诬蔑中央；总之，调和主义的特点，就是说，在组织系统上当然服从中央，可是思想上的自由，讨论上的自由，即使是要动摇党的路线的也还要保留着。这些调和派是向来有小组的派别主义倾向的一些同志，他们现在事实上是在阻碍党反对右倾的斗争，如果他们不抛弃暗藏的机会主义的立场，那么，自己也始终要走上公开的机会主义的道路。

党必须同时反对调和主义，然后才能无情的克服这种右倾的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然后才能战胜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工头富农的意识，如果这些同志不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且继续坚持，那么，党必须肃清他们——因为这种形成整个路线的右倾分子，客观上不能不是取消派埋伏在党内的奸细。

二十七 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党和革命任务的执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一致的认为共产国际执委最近对于中央政治局的一些纠正和指示，都是完全正确的。为着要执行这些指示，以及为着要执行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案，纠正过去个别的策略上工作上组织上的错误，并为着更加坚决的执行国际的路线起见，为着要担负起当前的严重的革命任务起见，必须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倾，反对右倾和调和主义，尤其要集中火力

打击主要的右倾危险。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任务，就是同时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右倾——右倾是现在阻碍党去执行当前重要任务的主要危险。

〔注〕中央政治局从六次大会之后，大致已经习惯了把“革命高潮”的名词与“直接革命形势”的名词，用成同等的意义。字面上“高潮”和“高涨”极容易混淆，而“直接革命形势”（国际这次决议案上称之为“客观革命的形势”）和“高涨”在实质上却大不相同，所以“高潮”的名词应当废除。

以后划一名词：

（一）凡是表示革命运动向上生长的普遍意义的，一律只用“高涨”。

（二）凡是表示可以有武装暴动直接袭击统治阶级的统治之形势的，应当用列宁的名词“客观革命的形势”，以后不用“高潮”。（马鲁伊里斯基^①同志最近的解释：“直接革命形势”是以前齐诺维也夫^②所用的，也有不妥当的地方。）

选自《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注 释

① 安南，今称越南。

② 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即托陈取消派。参见本卷第30、33页注⑥、⑳。

③ 中国最近的事变，指1930年新军阀之间发生的蒋阎冯中原大战。

④ 张学良，生于1901年，辽宁海城人。1928年张作霖死后，被推为东三省保安司令，成为东北的最高统治者。同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担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和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1930年中原大战中，张学良通电拥蒋，入关助战，坐镇北京。“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党西北“剿总”副司令。1936年12月同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长期扣押。

⑤ 托洛茨基，见本卷第31页注⑩。

⑥ 改组派，见本卷第33页注㉘。

⑦ 取消派，即托陈取消派。

⑧ 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同盟会。1910年因参加暗杀清摄政王载沣被捕。辛亥革命后参加组织国事共济会。1925年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1927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1931年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1938年底公开投降日本，1940年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任主席。

⑨ 胡适之(1891—1962)，又名胡适。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和罗隆基等曾结成人权派的政治流派，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宣传人权。以后又与蒋介石妥协。瞿秋白曾批评他“人权丢却说王权”。

⑩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邓演达领导的反对蒋介石的第三党组织。见本卷第33—34页注㉑、㉒。

⑪ 白朗德尔，今译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 1881—1967)，早期德国共产党领导人。1921年担任德共主席，1923年底因汉堡起义失败被撤销领导职务。此后，曾在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及农民国际

工作。1928年因发起组织反对派，次年被德共及共产国际开除。

⑫ 邓演达，见本卷第34页注⑫。

⑬ 全总，即中华全国总工会，1925年5月在广州成立。

⑭ 青年共产国际，即少共国际。是各国进步青年团体联合的国际组织，接受第三国际的领导。1919年11月在柏林成立，1943年6月解散。

⑮ 关于总行委的决议，见本卷第34页注⑮。

⑯ 先锋主义的“第二党倾向”，是当时部分青年团员中一种“左”的思潮，即认为团比党更先进，更“革命”，青年团才是革命的先锋，甚至把团视为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第二党”。

⑰ 红枪会，见本卷第32页注⑰。

⑱ 托洛茨基主义，是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中用“左”的词句伪装起来反对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它主张跳越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剥夺农民，反对工农民主专政；在战争与和平以及其他问题上也反对列宁的方针政策。

⑲ 第三时期，见本卷第31页注⑲。

⑳ 江苏问题的争论，见本卷第31页注⑳。

㉑ 马鲁伊里斯基，今译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ильский, 1883—1959)。曾任苏共中央委员。1924—1943年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委员，以及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

㉒ 齐诺维也夫，今译季诺维也夫，见本卷第33页注㉒。

辛亥革命纪念和苏维埃政权

——拥护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三〇年九月三十日)

今年纪念辛亥革命，首先我们就要知道：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已经有许多区域里面早就成立了工农兵民众自己的政权——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这才是真正革命的政权。这些区域里面，辛亥革命的任务不但已经真正完成，而且更加彻底的进行着革命的斗争。

辛亥革命的任务是什么？——是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打倒一切封建势力，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是建立真正劳动民众自己的政权。然而，当时领导革命的国民党出卖了革命，革命的任务没有实行，没有完成。当时孙中山想出什么国会制度，说是民权。可是，他自己请出袁世凯^①做总统；他的党徒(宋教仁^②等等右派)更是公开勾结军阀。这样，北洋军阀^③得到政权，国会变成公开的猪仔议员^④的猪圈。这是国民党第一次出卖辛亥革命。

五卅屠杀引起了全国民众广大的革命斗争，中国的工人——无产阶级就成了革命的先锋。可是，这次革命发展起来

的时候，国民党的蒋介石马上掉过枪来屠杀工人和劳动群众（四月十二），跟着，国民党的汪精卫也在武汉背叛革命，广州暴动工农举起苏维埃的旗帜，他，汪精卫更是屠杀广州五六千工人的凶手。这样，中国革命又受着残酷的压迫。这是国民党第二次出卖辛亥革命。

现在，国民党还有脸皮“庆祝”辛亥革命！

现在国民党早已经是反革命，早已是地主资本家压迫工农的政府，早已是世界帝国主义的走狗。现在国民党政府（蒋、冯、汪、张^⑤等等政府）之下，帝国主义得到许许多多中国的权利，军阀的混战继续不断，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一日饱饭都吃不到，农民受地主的压榨，几万万人都饿着等死，一般劳动民众都是破产失业，穷困得不得了；工农民众没有丝毫自由，兵士还要挨着饿替军阀去当炮灰。这国民党的政府是谁的政府？——显然是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的政府！这种政府还叫着中华民国的政府，还庆祝辛亥革命的“国庆”！他们庆祝些什么？——庆祝自己当着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庆祝自己还能够吃工农的血！

可是，有些资本家的“聪明”走狗，看见今年工农兵的苏维埃运动，力量一天天的大起来，中国工农的血快要吃不成了，于是想出了“好”方法来救反革命的命。什么方法——原来是叫“国民会议”。现在倒台的北方政府里面，有个国民党改组派^⑥（汪精卫），以前就宣传“国民会议”的。改组派屠杀压迫北方工农，差不多要完全骗不到人了；于是又有邓演达等等成立一个在野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⑦，再来号召国

民会议。资本家等还恐怕这种走狗也不中用，又派出些新走狗——就是工人阶级叛徒陈独秀托洛茨基派^⑧，也来宣传国民会议。国民会议是什么？——就是要工农民众迷信国民党现在的专制，还有方法可以用国民会议来改良。这次汪精卫、邓演达、陈独秀等等，是要破坏工农的革命，是要欺压工农民众——主张国民会议可以完成辛亥革命的任务。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只有苏维埃能够完成辛亥革命的任务！

苏维埃是工农民众自己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是真正彻底的民权，就是要禁止地主资本家参与政治。苏维埃的革命，不但能够真正彻底完成辛亥革命的任务，而且他的胜利，还要开辟中国的真正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现在，苏维埃的民权独裁政府，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要实行八小时制和保护劳动的法令，要实行劳工监督生产，要严厉处治违背苏维埃法令的一切中国外国资本家，一直到没收他们的工厂。……

我们要这样完成辛亥革命，要这样解放中国，要这样解放我们自己，就一定要进行坚决的群众的斗争。湖南、湖北、广东、江西……苏维埃区域的群众和红军，正在勇猛的拼死的斗争。全国各地的工人、兵士和劳动群众，赶紧团结组织自己的力量，不要放过一切机会；每一次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资本家压迫我们，我们都要勇猛的反抗，组织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兵士委员会、贫民协会……起来领导斗争，同时，就可以赶快选举各自的代表，去和各苏维埃区域代表在广州暴动纪

念日，开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成立苏维埃的中央临时政府，来统一指挥红军的革命战争，根本消灭混战的国民党军阀和地主资本家的政府，帝国主义走狗的政府！

这就是我们劳动群众的纪念辛亥革命！

九月三十日，庐山。

原载1930年10月9日《红旗日报》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出任清内阁总理大臣。他一面派兵南下，以武力胁迫革命派让权，一面挟制清帝退位。1912年3月，他利用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取得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建立了北洋军阀政府。1915年12月准备称帝，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次年6月忧惧而死。

② 宋教仁(1882—1913)，字遁初，湖南桃源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法制院总裁。同年8月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热心政党活动，主张成立责任内阁，被袁世凯派人刺死。

③ 北洋军阀，袁世凯建立的封建军阀集团。1901年袁任北洋大臣，所建军队称为北洋军。1912年袁任临时大总统后，广植党羽，形成控制中央和地方的军事集团。袁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系。1926—1928年，三系军阀先后垮台，北洋军阀政权从此覆灭。

④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召开国会，以5000银元一票的价钱，贿赂国会议员590人，选举他当总统。人们辱骂这些受贿的国会议

员为“猪仔议员”，曹锟国会也被称为“猪仔国会”。

- ⑤ 蒋、冯、汪、张，指蒋介石、冯玉祥、汪精卫、张发奎。
- ⑥ 国民党改组派，见本卷第33页注⑳。
- ⑦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见本卷第33—34页注㉑、㉒。
- ⑧ 陈独秀托洛茨基派，参见本卷第30、33页注⑥、㉓。

反对国民会议的欺骗

(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七日)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可算“统一”了一次中国^①。其实只是张学良^②割据了北方，代替了以前的阎锡山^③。这正是准备第二次军阀混战的局面。现在蒋介石宣布甚么五大政策（剿匪清共、整理财政、澄清吏治、发展经济、地方自治），提出什么“大赦”、“约法”、“国民会议”的问题。这是要用“和平统一”的招牌，实行战争的准备。这同时也是要更加残酷的进攻工人和农民，进攻苏维埃区域和红军。这样，可以更加求得帝国主义的欢心，巩固自己的走狗地位！

“国民会议”、“约法”、“大赦”的把戏，一面是要用来做军阀之间互相攻击和勾结的名目；一面也就是企图欺骗民众，缓和革命斗争的发展。

中国劳动群众，工人和农民，会受他们的欺骗么？不会的！

谁不知道，蒋介石说甚么澄清吏治，完全是鬼话。国民党军阀各派政府，都是贪官污吏，你“澄清”我，我“澄清”你，结果是去一批贪官，又来一批贪官，轮流刮削。所谓整理财政，就只是加税加捐，顶多不过改变几个名目。所谓地方自治，更是

要实行白色恐怖的“保甲”、“联坐”，换句话说，就是剥夺民众的一切自由。至于发展经济，蒋介石自己也公开的说，是要大借外债，借名发展实业，实际是大批的拍卖中国权利。

这些，都是工农群众应当看得明明白白的。而且，现在国民党特别要讨好帝国主义的，就是更加加紧压迫工农和进攻红军。现在地主资本家的国民党所最担心的，也是工农革命运动一天天的更加紧张，红军的势力一天天的更加集中，更加扩大。于是蒋介石五大政策的中心，也就是“剿匪清共”。为什么？因为全国的工农群众不会相信什么国民会议等的把戏。工农群众正在为着自己的政权——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所以国民党一面抬出国民会议的欺骗口号来，一面就在大动人马痛剿痛杀。

全国的工农兵士群众呵！更加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反对国民会议的欺骗，选举代表去开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一致的起来反对进攻红军，拥护红军的革命战争，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各派的军阀政府，争取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

原载1930年10月17日《红旗日报》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1928年底，国民党新军阀占领北京、天津后，在美国驻华大使的斡旋下，东北的张学良于1928年12月29日发表通电，宣布“改旗易

帜”，把五色旗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归顺国民党南京政府。至此，国民党政权在形式上暂时获得全国的统一。

② 张学良，见本卷第61页注④。

③ 阎锡山(1883—1960)，山西五台人。辛亥革命时任山西都督，此后，长期盘踞山西。1927年9月起投靠国民党。1930年同冯玉祥出兵反对蒋介石，失败。1931年又被蒋任命为太原绥靖主任；九一八事变后，支持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曾与中共合作抗日。1939年发动十二月政变，破坏抗日统一战线。1949年3月逃出太原，5月南京解放后，在广州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随后前往台湾。

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的意义*

(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日)

现在中国的形势是从工农群众部分的革命行动，进到革命的总进攻的过渡时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最主要的意义，就是在这种过渡时机之中，能够更加明白正确的规定出进攻的策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的指导（参看中国问题议决案^①），承认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同时，对于三中全会给了极伟大的帮助，帮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无产阶级学习进攻的策略。

中国革命有着不可避免的发展的前途，工人和农民要直接反对着资产阶级，来执行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的任务。而且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这种前途之下，我们看见新的革命高涨，将要在最近的将来使革命形势至少包括到中国几个主要的省份。然而，暂时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的形势（直接革命的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他们的力量还没有平衡。南部中

* 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副刊《实话》，于1930年10月30日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专栏”；这是作者为这个“专栏”撰写的社论。

国的许多区域里面国民党的政权已经推翻，那里建立了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政权。可是，有些其他的区域，尤其是主要的工业政治中心里面，革命运动虽然正在日益高涨，却还没有必需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这种情形之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进攻策略，应当是怎么样的一——这是当前最中心的问题。

现在这种情形的具体事实是“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的鼓动口号已经部分的变成事实。长沙战争^②、各个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发展（和军阀军队里面兵士的革命哗变），很明显的已经是革命战争的局部的开始。城市工人斗争虽然大半还是自发的零星的经济斗争，可是，这些斗争的政治化是日益剧烈。反动统治区域的农民斗争，更加剧烈的转变到游击战斗，以至于地方暴动。所有这些运动，都更加汇合到苏维埃旗帜之下，这正是明明白白的表演着“从工农群众部分的革命行动进到革命的总进攻的过渡时机”；促进这个过渡的完成，大部分要看共产党有没有正确的策略。首先是能不能正确的解决那领导和发展苏维埃运动的任务。这种领导和发展苏维埃运动的任务，现在有两方面应当注意的：第一，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就是要使苏维埃区域巩固的发展，有阵地的向外扩大，有后方的向前进攻，这样去组织已经各部开始的革命战争。这个意思是说，现在已经胜利的苏维埃区域之中，必须建立一两个军事的基础地，可以改造和加强红军到最高限度，集中军事的指挥，统一红军的领导，造成战斗力极强、政治上坚定的红军，以便在最近的将来，能够进而取得一

个或几个工业行政的中心城市。这个意思，亦就是在各苏维埃区域之中，要更加发展扩大群众的阶级斗争，肃清反革命势力的残余，深入土地革命，切实执行劳动保护法和八小时工作制，发展赤色工会、工农苦力工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扩大群众的武装和军事训练，在容许自由贸易的原则之下进行劳工监督生产和一般抑制剥削分子的经济政策。这样去建立和劳动群众密切联系的工农兵会议政权，只有这种政权，才能动员广大群众来执行组织革命战争的任务。第二，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问题——就是现在在反动统治区域里面，一切运动都要和为着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联系起来。这个意思是说，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的日常部分斗争应当要始终发动和领导起来，应当要集中到为着政权的斗争，不单是组织兵士暴动，去削弱反革命的武力，而且要兵士群众自觉的拒绝攻打红军，自愿的投到红军里去，不单是要从农民游击战争发展到地方暴动，而且要明确底定出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的方针。最主要的尤其是不单要组织政治罢工，而且要在日常斗争的过程之中就巩固扩大工厂委员会的运动，使政治罢工的发展，在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之下进行，这就是要广大的工人群众自觉的积极的进到为着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这样去真正的积极准备武装暴动，这两方面的任务应当要密切的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以实现中国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目前具体的问题，就是综合全国一切斗争，组织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集的问题，就是根据于群众和红军斗争力量之上来建立苏维埃的临时中央政府的

问题。

这里，最主要的，很明显是保证并且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权，保证并且巩固共产党对于一切革命斗争和群众的领导作用及组织作用。所以党本身组织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加强，党的组织的扩大，党的干部和领导机关的加强……党对于红军、赤色工会等等的领导力量的提高——都成了极端的重要的问题。尤其要保障党的布尔塞维克的思想上的统一，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倾”右倾以及调和派的斗争，集中火力的对付右倾的主要危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战斗力的加强，而发动领导起最大的群众斗争。

三中全会对于这些问题详细的规定，正是明显的指出，现在还是进到革命的总进攻“过渡时机”，如果认为现在已经是革命的总进攻，那末，这就对于客观形势的估量，犯着过分的错误。因此，进攻的策略上，就会发生冒险主义的倾向。但是更严重的危险，现在还存在于党里面的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理论上实际上的表现，许多地方总是党部落在群众斗争之后，右倾的错误是认为革命斗争现在至多只有部分的开始发动，根本不应当有向着革命的总进攻方面进行的方针，甚至于认为应当退守。这样，他们可以把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解释成为“割据偏安”，认为必须向富农妥协，必须缓和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运动，他们可以把发动领导城市工人等的日常部分的经济政治斗争的任务，解释成为抛弃组织政治罢工和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方针，认为只应当领导经济的小斗争，事实上走上投降黄色工会的尾巴主义。

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揭破这些“左倾”、右倾的错误，坚决的用自我批评的精神纠正党的领导机关过去的部分错误；同时，绝对不调和的反对一切不正确倾向，尤其是右倾的主要危险。这样，三中全会就对于现在进攻的策略有更加明确的规定，组织革命战争和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互相配合的进攻策略，首先就要和争取广大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就是要更加加紧的去发动领导广大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斗争，和革命战争及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互相联系——和配合实行群众的下层统一战线，反对并且肃清富农、工头、黄色工会、一切种种“第三党”^③、“取消派”^④等类的反动影响。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必定能够领导广大群众，从部分的革命行动迅速的进到革命的总进攻。

原载1930年10月30日《实话》第1号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中国问题议决案，指共产国际执委会1930年7月23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② 长沙战争，见本卷第32页注②。

③ 第三党，即邓演达等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今中国农工民主党。参见本卷第33—34页注③、④。

④ 取消派，即托陈取消派。见本卷第30、33页注⑥、⑨。

中国革命战争的组织 and 领导问题

——长沙战争的教训和苏维埃根据地建立的任务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日)

—

中国现在革命运动发展的形势，正是“从工农群众部分的革命行动进到革命的总进攻的过渡时机”。当前具体的事实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现在革命运动的特点：（一）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充分的力量，足以袭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整个统治，可是正在更加剧烈和日益高涨起来。（二）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力量，也有各地方不平衡的现象，有些地方刚在开始农民的游击斗争，有些地方却已经能够推翻当地的国民党政权。（三）而且红军战争的主要区域，已经进到规模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正式战争，跟着军阀这种战争的开展，军阀军队里面的兵士的革命哗变和响应红军的运动，也正在日益扩大，——这样，部分的说来，军阀混战已经开始变成革命战争。（四）苏维埃区域的逐渐汇合，要从零星散乱的地方革命政权的树立，进到建立苏维埃的临时中央政权，来指挥组织革命的战争，集中革命势力，——用统一的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去和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对抗，去领导起全国的革

命运动，为着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胜利而斗争。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这种具体的形势之下的最主要的斗争任务，就是：一方面，巩固和发展各苏维埃区域，集中农民斗争的力量，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工农红军的直接领导，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临时中央政府，去组织革命的战争——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别方面，同时积极的扩大中心城市工人群众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发动并且领导全国反动统治区域里面各种方式的群众的革命斗争，争取广大的劳动群众，来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加强并且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权。这两方面的任务，绝对不能够互相割离起来，自然，更不能够互相对立起来；恰好是相反的：这两方面的任务，应当密切的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中国共产党现在所有的，是一个整个的任务，就是坚决的去领导群众斗争达到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胜利；这在现在的形势之下，就明显的是怎样运用正确的策略，去促进群众局部的革命行动进到革命势力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总进攻问题。城市中心的积极准备暴动和苏维埃区域的组织革命战争，只是这个总任务的两方面。同时，这两方面的中心，都在于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权，都在于共产党争取广大群众的任务。

对于城市中心争取广大群众来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应当有更深切的认识，——将要另外有一篇文章来解释。我们这里，首先要特别说明的就是农民战争的开展和胜利，尤其是苏维埃政权普遍到全中国的斗争，必须有胜利的城市无产阶级的暴动来完成。可是，这已经是无产阶级

对于农民战争领导的更高的阶段。现在，我们要详细的来解释：组织现在已经开始的革命战争的问题。这是目前无产阶级实行对于农民战争领导的具体问题；而且只有正确的解决目前组织革命战争的任务，以及城市工人斗争和革命战争互相联系的实际任务，方才能够使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从现在的阶段更顺利的更迅速的进到更高的阶段。

二

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领导的现在阶段的情形是怎样呢？

首先，我们就要讲到长沙战争的意义。一九三〇年七月底红军占领长沙，八月初退出长沙，而集合红军第三、四、五、八军四军的力量再进攻长沙，直到九月底停止进攻止，——这次战争，我们称他叫“长沙战争”。长沙战争的意义是：第一，他的爆发和经过，显然是在全国革命高涨的背景之上。长沙战争虽然暂时没有得到胜利，可是，他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当时，正是蒋介石和阎、冯、汪的军阀战争^①进行得非常剧烈的时候：全国大城市的工人斗争日益高涨；许多地方的农民，继续扩大自己反对军阀混战、抗租抗税的斗争，进到游击战斗的武装冲突；许多地方军阀军队里的兵士实行哗变，反对军阀混战，同情红军，以至于直接投到红军方面来；其他区域的红军，如鄂西、鄂东北、赣东北、赣西南、闽西、东江的红军，都正在发展和扩大；甚至于河北省的南部也发生红军的组织，当地还有

许多红枪会^②的群众表示不满意自己的首领，要求改变红枪会的名称，改做红军，“请共产党来领导”。这种情形之下，长沙战争的爆发，决不是简单的“农民游击队攻城”，决不是革命高涨前夜偶然的一次比较巨大的游击战斗。不是的！他已经是全国革命高涨进一步发展的表现。第二，因此，长沙战争之中，湖南省城十天的苏维埃，已经是新的革命爆发的“进兵战斗”。广州暴动的失败，是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末期，当时是全国革命高涨的形势已经开始过去的时候，所以他成为“退兵的战斗”。现在，从广州暴动以来三年的革命斗争，已经走到新的高涨：城市工人斗争挫折的状态已经恢复过来，从一九二八年下半年的全国邮政罢工，上海法租界电车、自来水的罢工之后，到一九二九年五一、五卅的示威，这一过程，是表现得很明显的；一九二九年八一前后全国群众“拥护苏维埃”的示威运动，就开辟了革命新的高涨的发展；今年一月到五月各大城市工人斗争的大大开展，尤其是红色五月的全国群众运动，以及随后各地的罢工斗争，都在日益剧烈，时常发生工人群众和警察、巡捕、军队的武装冲突。农民斗争的广大发展，不但传播到西北的回民暴动，满洲、高丽^③农民的游击战斗，不但北方红枪会、大刀会等群众运动之中共产党的影响日益扩大，而且从广州暴动时期保留下来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游击斗争的力量，继续发展，经过去年八一运动，开展成为扩大的农民战争，扩大了许多苏维埃区域（现在已经有三百余县），从游击队之中创造了很大的正式红军（极严格的计算，也有十万人以上）。这些工农运动的发展，领导着贫民小资产阶级反对帝

国主义的斗争，领导着兵士群众以及一般劳动群众反对军阀混战的斗争，而日益前进。长沙十天的苏维埃，正表现着这些革命势力的高涨，已经要在一个工商业行政中心树立苏维埃的旗帜，来综合全国的革命运动，而促进新的革命爆发。这种英勇的企图，虽然暂时没有成功，可是很明显的，他预先警告着新的革命的将要来到，他是新的革命的“进兵战斗”，——他像战争之中的先锋队伍一样，有前哨的作用，就是革命方面刺探反革命统治的巩固程度，而企图建立稳定的革命阵地，以便于革命战争的向前进展。第三，长沙战争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对军阀混战的斗争更高阶段的表演；长沙战争之中明显的表现着“中国军阀混战开始局部的变成反对军阀的革命战争”。客观的政治形势的开展，那时候正是各地民众反对蒋阎战争日益剧烈起来，兵士群众拒绝开到前线上去，农民和一般劳动者开始反对拉夫拉车，拒绝交纳税捐，而城市工人和他们的斗争，正是这种反对战争的总运动之中的组织和领导力量。当时的长沙战争，就在两湖具体的集中所有这些各种方式的运动，形成“以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混战”的实际行动。——长沙战争之中，最初，何键^④的兵士整团整团的投到红军方面来；后来蒋介石的教导师的一团兵士实行革命的哗变，归到红军里去。至于这一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反对军阀混战的劳动民众所希望，——那更是不用说的。中国共产党主观的策略方面，一九二七年十月，就对于国民党和奉天军阀的战争，发出“变军阀战争为反对军阀的战争”的口号，这种原则上的决定，领导民众对于国民党军阀战争确定自己的革命的立场；所以中国反

革命危机的重新深入，经过一九二九年初的蒋桂战争^⑤，而爆发一九二九年九月的蒋冯战争^⑥，——国民党改组派^⑦参加战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能够实行把这一口号作为群众鼓动的紧急口号。长沙战争之中，我们看见这一个口号（“变军阀混战为反对军阀的革命战争”的口号）开始局部的变成事实。长沙战争的结果，虽然不是苏维埃政权在长沙巩固的存在，然而却是中国工农群众和帝国主义国民党之间开始规模扩大的用正式军队交战的革命战争。今年十月间，国民党政府在列强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开始大规模的进攻苏维埃区域和红军，这正是这一革命战争的继续和扩大。

因此，长沙战争的意义，是在全国革命高涨发展到“从工农群众部分的革命运动走向革命的总进攻的过渡时机”，那综合一切革命运动于苏维埃旗帜之下，去推翻国民党反革命统治的新的革命爆发，一天天的接近，他就是这种新的革命的“进兵战斗”，他开始把军阀的混战，局部的变成反对军阀的革命战争。

三

长沙战争之中，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情形怎么样？

这里，我们开始来研究长沙战争的教训。

长沙战争之中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是已经表显出来。一方面，我们已经看见长沙战争之前，中国重要城市

的工人斗争已经是在日益高涨，领导起各地种种方式的农民斗争，尤其是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发展。别方面，我们看见长沙战争之中的红军，已经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能够组织广大的几百万工农群众在自己的周围，能够有鲜明的政纲：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自己分配，能够坚决的打倒国民党的政权机关，而建立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政权。长沙战争之中的红军固然是三年来土地革命运动农民游击战斗里面产生出来的，这次规模扩大的正式战争，固然主要的还是农民战争，可是，的确已经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然而，这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否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呢？——这却还没有。当时，重要城市工人斗争的力量，还没有到可以起来袭击反革命的整个统治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城市的武装暴动胜利而领导起这个伟大的农民战争，以开始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局面。那时候的形势，正是开创更大规模的“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局面。当然，这明显的指示出“过渡时机”的特性，这种局面，可以并且应当创造开始全国胜利形势的前提和条件。部分的说来，也就可以并且应当帮助重要城市造成武装暴动形势的前提和条件，可是，就拿“过渡时机”的事实基础来说：长沙战争之中，无产阶级经过自己的政党和红军，去领导农民战争，是否完全实行了应当做到能够做到的任务呢？——亦还没有。这却是长沙战争教训的最重要的方面。

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战争，在中国的条件之下，可以分得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经过自己的政党和红军，

在城市之中还没有暴动形势的时候，就去领导农民战争的发展，创造“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基础而日益扩大红军的势力。第二阶段，就是无产阶级用自己在重要城市之中的胜利的暴动（同时，指挥着农民战争里面产生的红军来帮助自己），领导起农民战争，而“完成”革命的胜利，——就是不但巩固“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而且从局部的革命战争进到全国范围的革命战争，不但开始革命总进攻的局面，而且得到最后革命总进攻胜利的第一步。

长沙战争之中，当然还没有这个更高的第二阶段开始的形势，可是已经明显的是第一阶段形势充分发展的局面。现在我们所要研究的，正是在这种阶段里无产阶级领导的实际教训。

长沙战争没有能够得到重要城市无产阶级暴动的领导，这是客观形势的缘故。至于长沙战争之中，无产阶级领导红军战斗的缺点和错误，那就是主观策略的问题，所以这里的教训对于现时以及最近将来组织革命战争的任务，有非常重大的实际意义。

长沙战争的教训，第一是工农红军的许多部队没有很好互相配合的行动。

长沙战争的初期——第一次占领长沙的时候，只是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⑧部队）的行动。当时可以加入战争的红军部队，可以牵制敌人的其他武装势力，并没有统一的指挥机关，来调动和布置。后来，第三、四、五、八军，以及其他部队

(农民赤卫队等)虽然集中起来,统一指挥,再来进攻长沙,可是,鄂西的第二、六两军,鄂东北的第一军,赣东北的红军(方志敏^⑨部),仍旧不能归到统一的指挥机关之下,因此,他们的行动,也不能更适当的和进攻长沙的红军互相联系和配合。

长沙战争的教训,第二是工农红军没有巩固的后方和苏维埃根据地。

长沙战争之前,湘鄂赣边境的红军势力和群众斗争曾经有扩大的发展。但是,这里的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能够巩固的在后方一切县城建立起来,使进行大规模战争的红军,有稳定的大本营,有更有组织的供给、运输、探报的系统。只要看:五月六日,红军第五军攻下平江县城,农民群众有十万以上的人参加,但是,平江县城只占了两天;五月十五日,红军和农民群众八万人攻下修水县城,亦只占了两天就又退出;五月二十三日,红军第八军和农民九万人攻下万载县城,但是,因为要去打浏阳,又是只占了三天就放弃;六月七日,红军和十万农民攻下浏阳县城,虽然成立了县苏维埃,可是,仍旧只占了五天便退出。这样,直到七月二十七日第一次攻下长沙,这期间的详细情形虽然还没有知道,可是,一般的策略可以从上面所说的事实推想而知。就是没有坚定的完全肃清苏维埃区域里的反动势力,以至部分的反动政权的方针,以至于没有造成巩固的革命的[·]后方——苏维埃根据地。

长沙战争的教训,第三是红军进攻的行动,没有能够和长沙城内的群众斗争充分密切的联系起来。

长沙是湖南的省城,虽然还不是无产阶级的中心城市,但

是已经是很重要的行政中心，并且已经有不少的工人群众。红军进攻长沙的时候，工人自动的起来响应，而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太弱，没有能够充分的领导。尤其是第二次进攻长沙的时候，城内有十八个电汽工人因为响应红军并且破坏电网而被屠杀。而当时城里已经没有共产党的组织。这自然是非常之大的缺点。

长沙战争的教训，第四是仍旧暴露着许多游击战争的散乱性质，并且没有充分的布尔塞维克的领导。

长沙战争之中，红军虽然能够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的认清建立工农苏维埃的主要目标，可是农民群众之中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还是太不充分，以至于部分的表现“反对城市的意识”。这种游击战争的散乱状态，甚至于反映到红军的领导机关：第一次占领长沙之后，红军的作战计划是极不完备的，甚至于普通的探报系统都没有建立完全，因此，不但没有坚决实行进攻的战术，继续扩大敌人兵士里的革命鼓动，完全击溃敌人的力量，反而使敌人的军队能够很容易的夺回长沙。就是第二次进攻长沙的时候，也暴露红军里面布尔塞维克党的领导还不十分充分：陈独秀托洛茨基派^⑩的分子，居然能够违抗红军的总动员令，而破坏总进攻的局面。这里更明显的表示：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在红军里的最高威信的分必要。

因此种种错误，长沙战争的失败是有主观上的原因的，——自然，这次战争失败的客观原因，亦是很多。

总之，长沙战争的教训告诉我们：长沙战争虽然已经不是简单的游击行动，可是，他还带着许多游击战斗散乱性质的残

余；长沙战争虽然没有能够胜利，没有能够成为更有组织的胜利的革命战争，可是，他的确开始了规模扩大的正式的革命战争；他充分的表现出，“过渡时机”的现象；现在，他的教训是要求无产阶级经过自己的政党，去极大的加强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就是坚决的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巩固革命的后方，而认真的来组织已经开始的革命战争——有计划的、有系统的、集中的、巩固的向前发展——扩大“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基础。

四

长沙战争之后的形势怎样呢？

蒋介石和阎冯汪的战争，正在这个时候有了一个“结束”。然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却在中国又可以利用这个新的形势来进行：日本帝国主义不但没有损丧自己的势力，恰好是他的另外一只走狗——张学良^①代替了阎锡山^②占据北方的地盘；英国帝国主义更加帮助广东的军阀陈济棠^③，向亲近蒋介石的军阀陈铭枢^④压迫；所以，美国帝国主义，就不能不更加指挥南京政府，更加排斥南京政府里面的英日势力，而准备新的军阀混战。张学良占据了北方后，蒋介石自然需要好好准备力量，才能够继续战争。而长沙战争所开始的局部的革命战争和全国群众广大的苏维埃运动，又使一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派别，都开始感觉到反革命统治的危险。于是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在列强帝国主义指挥下，再宣言“统一和平”，并

且提出准备召集“国民会议”的问题，企图欺骗民众；事实上，这是他们一方面讲着军阀之间的假和平，准备自己内部的新的混战，别方面却又无耻的宣告“三个月内肃清共匪”的中心政策，调动二十师的军队，从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五省，来进攻红军和苏维埃区域，——对全国的劳动民众宣战。

反革命与革命之间的战争，在长沙之后，更加扩大了。无产阶级的政党，对于革命战争的组织 and 领导的任务，就更加重要而紧迫起来。

如果轻视反革命的武装力量和进攻势力，那就是很大的错误。国民党用“统一和平”、“国民会议”、“地方自治”的口号，企图和拥护苏维埃的运动对立起来，他们动员全国的地主资本家的政治势力，所谓“舆论”，所谓“铲共运动”来进攻。他们并且企图发动一切豪绅以至富农、工头等的反动力量，在进攻红军的前线，先组织“民团”、“守望队”等等，做援助的力量；并且苏维埃区域的内部，例如赣西南，还有地主豪绅的武装势力埋伏着，领导着富农反动分子，企图响应进攻红军。反革命的主要武装力量，就在这种布置之中，向着红军和苏维埃进攻，并且他们有精良的武器，飞机、毒气弹等，还有帝国主义的军舰和军队做后盾。同时，如果认为国民党这样大规模的进攻，就可以消灭红军，因此，散布恐慌情绪和失败主义，主张退守偏安的“上山政策”，或者简直承认军阀混战終了，反革命进攻红军是可以开始稳定他们统治的局面，——这就更是露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离开散布国民会议幻想的陈独秀托洛茨基派，只有一步了。事实上，部分的讲来，如果单单拿红

军进攻长沙的形势来比较，当然现在这一部分的红军，是从进攻转变到防御的战争了。然而，长沙战争之后，接着十月初旬，就是红军占领吉安、吉水、峡江，从湖北的通山、通城，经过湖南的平江、浏阳，江西的修水、铜鼓，联络上高、万载、安福，这样有经过赣西南，而连接闽西和广东东江的形势。十月下旬，赣东北的红军曾经占领彭泽，同时，鄂西的红军侵入湖南，占领了南县和华容。其他地方的红军苏维埃都有发展和扩大。而且最近上海纱厂（如统益、怡和等）、丝厂，以及其他工人，都有日益广大的群众斗争和罢工发展，青岛、香港有新的罢工和示威，天津双十的示威运动亦形成群众的武装冲突。汕头又有扩大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爆发。总之，长沙战争之后，我们看见反革命和革命两方面，都调动着全国的力量，更进一步的接近决定胜败的斗争，而红军的革命战争——反对国民党进攻的战争，就是这些斗争的枢纽。无产阶级必须调动自己的全部力量，农民兵士的广大群众，以及城市贫民的斗争，去拥护红军的革命战争，并且认真的去领导和组织这个战争。帝国主义国家里面，经济恐慌的深入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印度、安南^⑤、台湾等的群众斗争和暴动的生长，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冲突剧烈，中国各派军阀的矛盾发展，——这些情形，是中国现在革命战争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之下，中国无产阶级如果能够正确的领导农民战争，而且有计划有系统的去组织这个战争，如果能够发动并且领导全国极广大的群众斗争，坚决的实行争取群众而巩固的向前进攻的策略，——那么，一定可以扩大革命战争，促进革命总进攻的形势，使国民

党这次的进攻红军，不但要遇到严重的反抗力量，而且要转变到保守反革命统治都来不及的形势。至少，“革命首先在一省几省胜利”的前途，要在广大的范围之内实现出来。

这样，领导和组织革命战争的任务，很具体的很迫切的提到我们前面了。

领导和组织革命战争的任务，首先，就是要在重要城市之中，不脱离群众的日常斗争，而和工人群众部分斗争密切联系着，进行示威罢工、反抗运兵运械、拒绝制造兵器的反对进攻红军的运动，领导起全国兵士农民贫民群众的斗争，来拥护红军的革命战争。而且要把这些斗争，用准备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运动，去综合起来。这就是要实行独立领导群众斗争，实现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发展工厂委员会的运动，——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必要步骤。这就是要努力去领导农民抗租、抗税、抗债的斗争，运用农民委员会的组织方式，而进到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地方暴动），深入土地革命。这就是要领导贫民群众，和一切劳动群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以及兵士群众直接起来反对进攻红军，投到红军里去的运动。尤其是在进攻红军的前线，要组织起广大的群众斗争，阻挡军阀军队的通过和前进。这样，广大的全国群众，将要在自己的日常斗争之中，实行参加革命战争，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去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集中一切运动在苏维埃政权斗争的旗帜之下。“拥护苏维埃，反对国民会议”，将要成为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的广泛口号。

领导和组织革命战争的任务，尤其要求无产阶级努力去

建立并且巩固苏维埃的根据地。一切苏维埃区域，都要巩固的向外扩大，尤其要在最广大的最有保障的苏维埃区域，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根据地——全国苏维埃大会的召集，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选举苏维埃的临时中央政府。苏维埃根据地的中心问题是：（一）建立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政权——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二）改造和加强工农红军，使他成为政治上绝对坚定的，共产党有最高威信的军队。自然，为着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必须彻底实行适当的经济政策（容许自由贸易，实行劳工监督生产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深入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自己平均分配），发展工人的阶级斗争（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和劳动保护法），取消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权，“一直到把他们的企业收归国有，如果他们破坏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法律”。这就是要发动更广大的阶级斗争，开展反对富农的斗争，争取广大的贫农中农群众，独立组织雇农苦力；把一切投机分子和富农从政权机关里肃清出去。自然，为着要巩固红军，就必须改良红军的社会成份，加强工人干部的领导，提高党对于红军的威信。只有这样，真正群众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集中起来，肃清苏维埃的一切反动势力，造成坚强的红军，然后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之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组织作用，能够充分的扩大和巩固起来。

苏维埃根据地的建立，对于组织革命战争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为只有这样巩固的根据地，才能保障军事指挥的集中和统一，使工农红军的各部队，以及群众的武装力量，能够互相配合着行动起来，主要部队的进攻，有相当的别动部队的游

击来响应，有严密的完备的探报系统来辅助，有更有组织的巩固的革命后方，去供给粮饷军械，免除一切游击战斗的散乱状态；而且政治上的影响和指导，不但一般的可以引起全国劳动群众更加热烈的拥护，而且特别对于战线之中城市工人的斗争，可以互相联系和配合。这样，就可以免除长沙战争之中的错误和缺点，不至于仍旧是“无后方的作战”，而受到可能的暂时的部分失败。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够这样去组织革命战争，在广大的全国群众拥护之下，必定可以打破敌人的进攻，更加迅速的转变到革命总进攻的形势。

“现在，不彻底的去巩固苏维埃根据地，不认真的去加强和改造红军，……而使单纯扩大战斗的政策束缚了自己——这是很有害的”。这“决不是割据偏安的和平建设，恰恰相反，只有在斗争之中，才能够发展出坚强的政治上稳固的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这种巩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肃清苏维埃区域内部反动势力的方针，正是要用更加巩固革命阵地的方法，使胜利的进攻得到充分的保证，这样去真正扩大苏维埃区域”——实现更大规模的“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

“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他有他的过去和将来。这个前途是一个中国实际情形之中的具体的复杂过程。他的过去，是农民的游击行动，以至乡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扩大。他的将来，却是革命战争和城市无产阶级暴动所要开辟的全

国革命总进攻的形势。所以，他在实现的开始，不一定是占领大工业的政治中心城市，可是，他的发展，却必须有进而取得工业行政中心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一九二八年七月)，不但断定中国革命的新高涨不可避免的快要到来，而且指出新高涨的一种可能的具体形势，就是说：“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的巩固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涨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之内胜利。”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能够在长沙战争(一九三〇年七月)的两年以前，就切实的认清当时“苏维埃根据地及其少数的工农革命军，要成为这一新的高涨的重要成份”；并且就特别的注意到“城市领导作用的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高涨，将要表现决定胜负的力量”。两年以来中国形势的发展，完完全全证实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的路线，亦就是证明托洛茨基^⑩、陈独秀以及其他右派，轻视农民战争，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的盲动”，并且断定革命的新高涨是“遥遥无期”，“已经推迟”的路线，完全破产。

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九三〇年的七月，已经就特别指出现在“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根据地)……的任务，有第一等重要的意义”；并且说明：“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一定可以保证革命的强大的开展。”

这里，正是组织和领导革命战争的问题，亦就是在现阶段之上无产阶级怎样去适当的领导农民战争的问题。现在的农

民战争，是无产阶级所能够并且应当运用的一种力量，无产阶级对于这种力量的组织和领导是否充分，是否巩固，正是帮助无产阶级本身积极准备暴动的一个紧要问题。如果在中国现在形势之中，中国工人阶级深入着城市和乡村的劳动反对资本的阶级斗争，同时，就能够对于农民群众反对地主的农民战争，加以充分的领导和组织，那么，他就可以在适当的时机，调动广大的工农红军，来帮助自己在城市之中的群众发动。那个时候，胜利的无产阶级暴动，就有可能很容易的统率起农民战争和反帝国主义的一般斗争，而进到肃清国内军阀等的反革命，以及反抗帝国主义干涉的更广大的革命战争，以至能完成中国革命全国的胜利。

无产阶级和中心城市，是中国革命之中决定胜负的力量。一方面，如果农民战争得不到城市无产阶级胜利的暴动的领导，那末，他就可以长期的停顿在零星散乱的革命进攻，即使能够开辟革命总进攻的局面，也不能够最终的完成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整个统治的总袭击。别方面，现在农民战争的特别发展，不但已经是中国革命新高涨的重要成份，而且是这个高涨现在的特点；这固然是革命势力的一种弱点（工人斗争的力量还没有和他平衡，和他汇合），然而正因为如此，必须在革命总进攻之前，无产阶级对于这种农民战争，就经过自己的政党，去努力加强自己的领导作用和组织作用，这正是准备革命的总进攻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

所以，现在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和农民战争特别发展的特点，还表现着相当的联系。原因是在于：

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开始崩溃的地方，还只是他们阵地比较薄弱的区域——农民群众在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之下，就能够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同时，中国的工业中心城市——正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军事政治力量集中的地方——这些地方的革命势力，却还没有能够推翻反动政权的充分力量。可是这当然只是暂时的现象。农民战争之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组织作用的加强，将要使反动统治的崩溃更加扩大而深入，将要使帝国主义国民党丧失更多的更重要的阵地。那个时候“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就要更进一步而开辟革命总进攻的阵势。这种阵势的形成，就不能不同时依赖城市无产阶级自己组织力量的加强，武装准备的加紧，群众斗争的开展和扩大，一直到武装暴动的爆发。

原载《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1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蒋介石和阎冯汪的战争，即中原大战，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一场混战。1930年初，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各派军阀和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等联合反蒋。3月15日，冯玉祥国民军、阎锡山晋军、李宗仁桂军的将领57人发出通电，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军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4月1日，阎、冯、李宣布就职。4月5日，蒋介石下令讨伐，中原大战爆发。双方投入兵力一百多万，在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到长沙，北至河北的数千里战线上进行厮杀。大战历时7个月，以张学良派兵进关，蒋介石获胜告终。

② 红枪会、大刀会，见本卷第32页注⑳。

③ 高丽,今朝鲜。

④ 何键(1887—1956),湖南醴陵人。当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⑤ 蒋桂战争,即1929年3月发生的蒋介石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互为扩充势力进行的军阀战争。

⑥ 蒋冯战争,即1929年5月蒋介石同冯玉祥为争夺地盘进行的战争。

⑦ 国民党改组派,见本卷第33页注⑳。

⑧ 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成立红军第五军,任军长。

⑨ 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创建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1934年率领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1935年1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捕,同年7月在南昌牺牲。

⑩ 陈独秀托洛茨基派,见本卷第30、33页注⑥、㉑。

⑪ 张学良,见本卷第61页注④。

⑫ 阎锡山,见本卷第70页注③。

⑬ 陈济棠(1890—1954),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北伐时所部留守广东。1929年后任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八路军总指挥。1931年同桂系结成粤桂联合战线,通电反蒋。

⑭ 陈铭枢(1889—1965),广东合浦(今属广西浦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第十一军军长等职。1929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后,任代理行政院院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支持十九路军抗战,1933年参加组织福建人民政府,公开反蒋。

⑮ 安南,今越南。

⑯ 托洛茨基,见本卷第31页注⑩。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现在根据收集主要文件的材料来作一报告。

在总行委^①时，立三同志在八三会议^②的发言与对于实际工作的布置，确有路线的不同，值得严重的注意；这一严重错误在三全会^③已纠正其错误，并且在工作布置中亦已加以纠正，就是特别指出过去“左倾”的错误。不过在三全会时没有更深刻的揭露立三同志的错误路线，指出非列宁主义的路线，这确是很大的缺点。这样可以使不明了过去错误的根源在那里。在当时少山^④的报告与我的结论，仅指出策略上的与某部分的错误，因此，对原则上路线上的问题就隐蔽起来了。现在国际的来信^⑤，很深刻的指出，我们必须加以切实的讨论。为要更明了这一错误，必须根本指出其根源的所在。但同时必须指出，我们对这一问题讨论后的态度。现在党内

* 1930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即《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会上，瞿秋白作了这个报告。报告原件为会议记录，由中央档案馆提供。瞿秋白在纪录稿上作了如下批注：“记录极草率，无可再整理，这只能作为不完全的记录稿了。”收入本书时，由编者加了标题并作了个别的文字校订。

已有些分子^⑥，他们站在小资产阶级意识上，站在个人的问题上来反对过去路线，来指出错误，如果是这样，就不能巩固党、帮助党，反而使党对于错误的纠正发生障碍。因此，党必须在正确的态度上、立场上制止此等分子的活动；同时，我们决不能因此就把我们现在的中心问题移转到反对这些个别分子，或者更坏的是因为反对这些个别分子而模糊了认识过去错误和立三路线的实质。这是在我未报告前所要首先说明的。我的报告分为下列几部分：

1. 立三路线如何违反列宁主义？
2. 具体的错误部分在那里？指出三全会的缺点。
3. 具体的指出党内问题和两条战线的斗争。

1. 国际来信说，立三是反列宁主义的与违背国际路线的，我们不仅接受国际的指示，还应追求其为什么？在八一会议^⑦时作了成立总行委工作的决定，八三会议更指出总行委是为总同盟罢工的指挥机关，指导全国暴动的最高指挥部。但我们在三全会时指出，总行委仅是组织上的错误，没有深切去了解 and 指出八三会议总行委的精神，是布置全国武暴的最高指挥机关。八三会议中首先说武汉暴动后如何进行全国武暴，如广东、北方、满洲如何做，韩国^⑧如何做，西北如何做，云南、贵州亦如何做，在这一精神下布置暴动，接下说苏联应如何积极准备进攻，并说苏联如果不积极准备进攻，即不能掀动全世界革命，不能完成其伟大建设，而且说，须勇敢的向苏联建议，要在军事上、国际动员上来号召，在保护中国革命的口号上来动员全世界无产阶级，并且要内蒙如何发表宣言，出兵参

加中国革命战争。以下更指出如何加强南方局、北方局的工作。因为在这样精神下布置工作，所以对国际来电的纠正，很勇敢的当时竟说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的速度^⑧；同时归咎少山同志的右倾等等，为要充实其理论，更说中国工人与西欧工人不同，——中国特别例外：

第一，立三并说革命政权的成立，即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第二，中国革命的爆发而引起全世界最后阶级的决战。他的意思是中国革命只能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只能在社会主义革命之中去解决自己的任务。他虽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恐惧，但他实际上是自己也害怕帝国主义，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所以在他的文章中说，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也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这一结论，就是托氏主义^⑩的结论了。

这一理论可以说是发狂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预先估量着中国革命必然失败的拼命主义，国际指出其实质与其根源，是非常正确的。

在三全会时，确没有将他这“左倾”的路线深刻的揭露出来，我们虽都曾看过这许多文件，但对于立三的路线，在南京暴动、镇江暴动^⑪等等问题上都没有深刻的加以揭露，这确是很大的缺点和错误。现在我们必须指出和揭发出来，以便全党明了，以教育全党。我们应指出阶级对比的力量，如农民在土地革命中的力量，工人在领导上的力量如何，使明了在革命中阶级的对比力量，而不致如立三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立三固然在三全会时对各个问题承认了错误，但实际上并没有承

认在路线上的错误。因此使他不会真正充分了解他自己的错误，因为他只承认或了解对估量速度的不正确，甚至不是估量阶级力量对比的不正确。关于这一点，即国际代表在三全会发言时亦没有充分抓紧这一路线问题的重心。

总起来，在第一部分中，立三在他的理论系统上确走到了类似托派的理论，而违反了列宁主义。他不信任工人的力量，不信任中国革命力量而坚持争取首先的胜利。因此，结果是可以取消我们在革命领导的前途，表面上虽说是掀动全世界的革命胜利，但实际上反取消了中国的胜利。

第二，更明显的走到托洛茨基^⑫的道路上去的是革命转变问题，因此，在鄂代会的决议^⑬中、六月十一决议^⑭以及八月十五日的宣言^⑮中，都含有这一精神。其次在土地政纲中，亦有这不正确精神的存在。所以得到的结论，在不可能中去想出不可能的办法（如集体农场等），不在实际的力量中去求解答，而走到“左倾”的机会主义空谈的道路上去，过去托派以及从前的撤回派^⑯都是如此。所以，国际指出这一点非常的正确。但三全会不能完全将它揭露出来，确是非常的不足，而有调和态度的遗毒。

II. 具体的事实，在路线的内容说：

第一，不平衡问题。在八一会议上，表面上是承认不平衡，他指出特点说：因为（1）帝国主义的势力，（2）军阀的割据，（3）农民战争。但他的解释，并没有拿来做实际工作布置上的根据，没有在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下来保障其胜利，没有在现实中，在阶级力量对比下，了解不平衡而努力求得其平

衡，而是反而取消了不平衡；同时，我们对不平衡的问题更应在其他方面去揭露出来，如在七十号通告^①中，指出了不平衡的特点，但没有在不平衡中怎样在这特点中加强各种力量，在进攻的策略下去求得胜利，而反是空洞的指出很快的可以平衡。随后就走到指出不平衡是其表面，平衡是其实质，实际上是取消了不平衡。

其次，革命高潮问题，立三解释为就是直接革命形势，这一点在六次大会上已有争论，而且指出仅是高涨，不知在何时将“高涨”用成为“高潮”，如果说在全国革命形势下，才有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实际上就是取消这前途。因此在表面上之承认不平衡，但实际上是离开这立场。

第三，力量的现实的估计，无论在反革命方面和工农方面都没有深刻的去注意。对于反革命力量的估计，对于策略上是有很大的关系。（有人说上海是只可做做职工运动，不好做革命运动，这是当时的“西北学说”，在此地我们要说对于“西北学说”，一向没有明显的指出其机会主义的实质，这已经是错误。同时，立三却又因怕受“西北学说”的批评，而避免任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的任务，走到不要巩固阵地，绝对不要对帝国主义用应付手段，绝对不要准备自己的力量。立三对于反革命力量的估计，是非常轻视，对于革命力量却则有夸大的估计，在几个给国际的电中，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对于工人运动方面亦是如此，因此，在实际工作与事实上，虽然他迫得不能不承认工人斗争落在农民之后，但他说这仅是表面上的不平衡，只要白色恐怖一去，即可不成问题，因此他就不注意工

农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现实对比，而夸大了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就敢说只要一个大城市伟大斗争起来，即可以掀动全国革命的“高潮”。少山同志当初对他的批评，以为这仅是一个可能，这是把策略建筑在仅仅一个可能之上的错误，这一批评还是不对，因为实际上这完全是不可能（这我在三全会的政治委员会说的）。这由于立三没有在实际上、组织上的力量来估计，而只是企图和幻想在世界革命中“乘火打劫”的办法。

第四，对于组织力量问题，立三有一个极危险的倾向，他固然说要加强主观力量，但如何去加强，他就模糊了，因此，他就提出他的理论，说中国工人对武暴的认识与西欧工人不同；同时，他对于组织工人大多数的意见，他又说：中国组织大多数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在资产阶级统治稳定的时候，一个是在我们专政的时候，除此以外，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组织加强问题，在这观念下就放松了。立三对组织观念，自七十号通告中的发言中，以及各个会议中的发言，总是不大注意，同怡怡与少山同志每次都注意到组织上的问题相反。因为立三有这思想，所以事实上对团的组织的取消，而且对党的组织亦走向取消了。

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什么现象呢？到处都布置暴动，但忽视群众日常斗争，无疑的在实际上是取消真正的准备暴动，这一影响是很大的。例如四川来人的谈话（他是没有看见六月十一的决议，仅看见七十号的通告），他们的现象即使自己的同志很少，他们主要的精神，不在去发动群众斗争，而是同样的说暴动，一切都是用兵变打到武汉再说，什么土地问题等都

不谈。陕西的党亦以为革命“高潮”到来了，亦是到处布置暴动，此外，山西、河南都是如此，长江局甚至定出时间，顺直省委^⑧则甚至以为如果布置暴动是错误，则要求改组省委。南京暴动的经过我不十分知道，但决定镇江暴动时，亦是在不可能条件下估计。这许多事实，很明显的是放弃了现实，放弃了群众的冒险。在城市里的布置，亦是一步一步离开正确路线，放弃经济斗争，而空喊政治罢工。去年在六十号通告^⑨中是切实的注意经济斗争，在七十号通告中已有离开经济斗争的注意，因此，在工厂中的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党的发展、赤色群众发展等。因此，在任何群众斗争中，有可能领导到为苏维埃政权斗争的政治斗争，而在实际工作中是放弃了。在兵士中亦有这现象，而有以下两方面的错误：（1）放弃了斗争而等待大暴动，（2）在兵士中不及待的发动而受到破坏。至于集中武装问题，虽然在赤区内大半是没有看见六月十一日的决议，但对于机械的执行集中武装的决定已受到影响，如在湘东报告中，执行集中一切武装，结果，不保留群众中的武装，后因接到中央九月的指示才纠正。至于一切经济政策的混乱等等，虽然不是直接受立三路线的影响，但在苏代会^⑩中，因仅去注意扩大红军向外发展为中心，而没有注意到巩固根据地，因此，不能在一切问题上去充实这扩大的策略；同时，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不正确精神，始终得不到有力的纠正，以为只要打到武汉，社会主义革命就来了，一切土地反正快要没收的。所以在事实上还是受到他很多影响的。

因为立三路线的发展，所以在实际工作中确使党的正确

路线受其路线的侵入而遭受着很多的损失。

帝国主义问题，亦是如此，一方面以为绝不能妥协，但另一方面并没有注意在实力上来动员群众力量来反帝国主义，这一影响直到现在，还是得不到多少纠正的成效。主要的根源，亦是以为革命很快的就可成功，一切都可得到总的解决，小的问题不要紧，所以各地对反帝工作就因之放松，而等待革命成功时总的解决了。过去反帝策略上犯有很大的错误，亦就是没有注意现实斗争的广大发动，反而站在表面上的空喊“绝不妥协”，结果自然走到机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这部分的问题，同志们对事实上的了解，要比我多，当然有更多的事实可以揭露出来，三全会上对于这些虽然指出一些，但是没有指出路线问题，因此，对这些具体错误〔认识〕也不深刻。还须在每一事实上更加具体的来揭露，使在具体的事实上更加明了显著。

III. 党内斗争方法问题，对这问题，我回国后曾与特生^①、柏山^②诸同志谈过一些，自六次大会后，即指出党内斗争应在思想上作不调和、不妥协的无情斗争，这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执行的业绩很少，并且仍然有意无意的走到严厉的命令式的单纯组织上制裁上去，这一方式，是否与立三路线有联系？可以说与他的路线有联系的。因为立三是在“客观上自然发展中去争取领导”，不是争取群众的路线，因此，对于党内的问题，亦在这影响下而忽视了党内民主的执行，和真正政治上的巩固路线。在党的历史上，对于集体的系统的指导，命令主义、惩办制度是有较多的毒素。虽然在八七会议后，在国际的

指导下有了纠正，在六次大会后，更有成绩，但还是不能说已很充分，因此，客观上还有诸葛亮式的革命领导观念，在党的组织上还不能肃清许多非无产阶级的组织观念，这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

在六次大会后，将小集团的方式和观念打击了，但仍还有存在，因此，许多小组织倾向的分子遂在反对委派制度等等问题上来反对党；但另一方面，命令主义的残余亦尚有存在，这一点必须我们在党内斗争上应加注意的。

党对同志的处分如不适当，很易失去党的威信，如果适当，是很能帮助党的巩固，因此，处分不得其当，反可使小组织的分子运用之来作反党的机会，所以必须加以严重的注意。我以为党内斗争，应采取新的方针，在思想上坚决的不调和，再以组织上的斗争继之。对目前消沉的原因，我们固然要指出，主要的是建筑在右倾的基础上，但同时亦应指出另一来源，是由于过去“左倾”空谈的结果。因此，对于一贯右倾的分子，固然应加以制裁，我们要反对“退却”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要揭穿“左倾”空喊的帽子，揭去之后的这种消极基础，要对于“左倾”的空喊，亦同样的应给以打击。在此地，我们必须注意对一切机会主义右倾分子以及其他倾向的分子，党在思想上的坚决斗争与在组织上的制裁和处分、必须很适当的能使所有党的干部都了解，团结在党的周围来拥护党的主张和处置，使对于有不正确倾向的分子失去对他的同情。

IV. 具体的提议。

我的意思，我们今天有很简单的决议，使国际能很快的了

解政治局的态度，并加强我们的指导。我现在已草好了一个决议草案^③，加以说明，以供大家讨论（读一遍）；这一原则决定后，我们可以具体的讨论。第一，陈绍禹^④等有一提议，要求讨论立三的路线，并且要求将与立三争论经过公布于党，这一观点是算旧账的方式，而且他们在此前并没有指出过那时有立三路线，尤其他们的整个精神是站在成见方面出发，他们提出的问题亦是在很小的问题来批评，对三全会的文件，仅在某一语句上、文字上来吹求，以为还是立三路线。这与国际信中的意思没有相同之处；第二，沈泽民^⑤的方式与精神是离开政局^⑥的领导，而自由的在发展讨论，他们知有国际来信，但不公开说已知国际有来信，请求政局应如何办，反而突然的在工作会议中来提出，这可使一般同志很奇异与发生其他倾向，虽然对党观念比较正确的同志，表示应在中央领导下来讨论，但在事实上必然使同志惊异不明，甚至可使对之作放弃加紧的执行，而影响到目前在工作上的动员。

所以我们应：1. 根据决定的原则发一通告，2. 对于已在发展讨论的定出一个办法，对于各方工作人员应如何召集会议做报告。

我的报告完了，还有许多问题，候第二次发言中再提到。

我的结论因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所以可以很简单的说。

一、国际的来信和这次的讨论，确有很严重的意义，同意于特生同志的意见，因为这一对“左倾”路线的揭发，指出是非

马克思主义的而加以纠正，是使党更向前开步走的动力。

立三的错误，当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有许多的根源，一个问题分析的错误，而没有深刻的纠正，自然可以渐渐成为一个路线。

二、立三路线，正确的解释，可以说是盲动冒险主义的路线，实行了“左倾”掩盖下的机会主义。他不信任无产阶级的力量，农民斗争的力量，而走到小资产阶级的拼命主义。

对于立三路线以及个别“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是我们自己批评中应当坚决的提出的。这种调和态度，根源在于：
1. 害怕帝国主义而不去争取实际的胜利，反而走到幻想世界革命同时爆发。
2. 害怕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头衔，而走到半托洛茨基的道路上去。
3. 小资产阶级的害怕心理，只要听到一句激烈的话，就无条件的接受，而不在实际中去考察，切实的去争取群众。
4. 不了解工人希望暴动，一方固表现工人在目前革命危机中的斗争情绪，但另一方确表现工人无组织现状中没有自信力的弱点。
5. 怕变到国民党的割据名词，只单纯的扩大而不想去巩固，因此，不但对于革命根据地的忽视，而且在工人运动中亦放松组织工人的任务。
6. 怕丢脸子，因此在思想上的斗争就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的错误。

我在回国后在许多文件中，本看出很多的错误，但没有注意深刻的看这问题而提出，这是很疏忽的，并且仅去注意对外发表的文件，而没有注意这错误的严重内容，因此，对柏山的错误总是采取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原谅态度，这是极严重的政治错误。

三、对于“左倾”确采取调和态度，如：

1. 对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在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①中第一次草案中本已指出柏山理论的错误，但后来远局^②同志随便一勾将他勾去，我们也很随便的没有加以注意。

2. 转变问题写得非常不充分（只说柏山同志是机械的解释），这一问题我在莫^③时是很重视的，回国后只觉很严重，但因听到少山的解释，因此亦随便忽视过去。

3. 高潮问题，仅改做“高涨”，而没有去揭发立三“高涨”的“直接革命形势之解释只有在全国直接革命形势之下，才能有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的大错误。

这许多问题的忽视，因此遂在决议案中有的解释和注意的不充分，自然这是包含有对“左倾”的调和观念。

四、的确，如特生同志所说，我们应更深切的认识国际来信决不是要我们解释到退却，而是要在进攻的精神下有真正群众的争取，真正工作的建立，真正的武装暴动的准备，一切都是很积极的。现在的消沉现象，这才是完全退却的现象，我们必须严重注意这点。

五、三全会与国际路线的关系问题。对绍禹等的错误，除应指出正确的说他们正确外，应指出他们最大的毛病是：1. 将“左倾”掩盖右倾的一点模糊起来。而将三全会路线解释为混合物，并且解释为右倾，这完全不是真正站在国际路线上，国际精神上帮助中央的观点；2. 实行方面，放松右倾，他们只指出提到对于肃清后方一点可以减轻发动群众的反对进攻红军的意见，他们却根本没有提起消沉的现象；3. 组织方法，完全

是不正确的，他们的观点，完全不是如我们所指出的一样，在大的主要的方面去着眼，而在什么土地、工会、经济政策、工农方面等等某些小的地方来挑剔。这充分表现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依然表现无原则的斗争。

六、最后一部分最主要的，如何使党成为无产阶级集体的党，这在斗争方法上应注意，要使每个同志能积极的对党建议，能使每个同志深刻的了解在思想上作不妥协斗争，这样才能使党更巩固、更发展。

七、具体方面：

1. 我同意特生同志提议不发通告，发一告同志书。
2. 采取先开会议方式作报告。
3. 要在反对进攻红军的实际工作中如何去传达。
4. 关于绍禹等问题政局做一单独讨论，决定办法。
5. 关于CY^③一点可以加上决议去。

注 释

① 总行委，即中央行动委员会，见本卷第34页注^②。

② 八三会议，指1930年8月3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制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冒险计划。

③ 三全会，指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

④ 少山，即周恩来。

⑤ 国际的来信，指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又称“十月来信”。

⑥ 指王明、博古等人。在根据共产国际七月来信召开的中共六

届三中全会后，王明等曾写信给中央表示拥护。当 they 从国际代表米夫那里先于中央知道国际十月来信后，便于11月13日、17日连续写信给中央反对三中全会和中央。

⑦ 八一会议，即1930年8月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由李立三主持决定成立准备武装起义的中央行动委员会。

⑧ 韩国，今朝鲜。

⑨ 1930年6月11日，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形势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决议案，并电告共产国际要求批准。国际执委审议后复电停发。李立三等不顾国际意见，公布了这个决议。8月8日，由向忠发签署给斯大林的信，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不了解中国最近革命猛烈发展的实际情况”等。

⑩ 托氏主义，即托洛茨基主义，见本卷第62页注⑬。

⑪ 1930年8月1日和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在红军进攻以武汉为中心的大城市的同时，又命令武汉、南京、镇江、天津、广东等地的党组织发动武装暴动。遵照中央指示，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积极进行发动南京、镇江地区的兵暴工作。9月，中央政治局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才停止了这一工作。

⑫ 托洛茨基，见本卷第31页注⑩。

⑬ 鄂代会的决议，指1930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决议。

⑭ 6月11日决议，指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

⑮ 8月15日的宣言，指1930年8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

⑯ 撤回派，今译召回派，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出现于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时期，因要求从杜马（沙皇俄国的立法机关）中召回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而得名。

⑰ 七十号通告，即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

⑱ 顺直指北京(清时曾名顺天府)和河北(清时名直隶省)。中共顺直省委曾领导河北、山西、北平(今北京)、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陕西北部的党的工作。

⑲ 六十号通告,即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六十号——执行武装保护苏联的实际策略》。

⑳ 苏代会,指1930年5月20日至24日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㉑ 特生,即向忠发,见本卷第30页注①。

㉒ 柏生,即李立三,见本卷第30页注⑤。

㉓ 会议通过了这一草案,并决定以此作为同远东局讨论的根据。

㉔ 陈绍禹,又名王明(1904—1974)。安徽六安人。1925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等单位工作。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左”倾政治纲领;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又任政治局常委,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是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

㉕ 沈泽民(1902—1932),浙江桐乡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译著工作。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宣传部部长。

㉖ 政局,即政治局。

㉗ 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见本卷第35页:《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一九三〇年九月,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一九三〇年七月的中国问题议决案的决议》。

㉘ 远局,即共产国际远东局。

㉙ 莫,即莫斯科。

㉚ C. Y., 共产主义青年团(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英文缩写。

吉安取得的取得和丧失

——立三同志路线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影响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四日)

长沙战争^①之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三军在十月四日取得吉安。吉安是赣西南三十多县苏维埃区域里的大城市，吉安的取得，对于这一个苏维埃区域的巩固，有很大的意义的，因为苏维埃的吉安，应当成为这一区域的政治中心。不但如此，吉安的取得，虽然仍旧不是城内工人群众的斗争和红军的进攻互相联系配合的力量，可是，的确是极广大的农民群众自己的发动，同着红军共同作战的成功。这样，吉安周围早已有二三十县的苏维埃区域，吉安地方的农民群众已经坚决的起来斗争，吉安城内的工人和贫民群众，显然是站在红军方面……总之，苏维埃的吉安，有充分的群众基础。这里，很明显的，共产党应当领导赣西南的苏维埃：去组织团结革命的根据地，联合当地许多苏维埃区域（三十多县之中，还有二十县的县城是在反动统治之下，在中间隔离着），巩固已得的胜利，更彻底的实行真正贫农、中农的土地革命……这样去组织后方，引进后备军，有组织的运用适当的战术，指挥红军的作战，指挥农民赤卫队的游击战斗，打破敌人的“围剿”，而有阵

地的向外扩大，有后方的向前进攻。——这是共产国际所指示的路线。

但是，十一月十八日吉安就失掉了。

这难道是因为当地群众没有起来斗争，难道因为群众的力量不足以巩固吉安的胜利？不是的。这难道是因为红军的力量太小？亦不是的。——吉安在第四军之外，还有第三军、第十二军、第二十军，而在赣南还有第二十二军。这是因为当地的党部没有正确的路线去领导。恰恰相反，当地领导斗争的路线，恰好还是和共产国际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今年六月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议决案^②里的方针，就在立三同志路线的领导影响之下，离开了共产国际的路线。赣西南党部和第一集团军（红军第三、第四军）的党的领导机关，在这种违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指导之下，就没有去领导群众和红军切实执行真正进攻的现实的革命任务。这就引导到冒险和失败。

事实是这样：当地党的领导机关决定攻取吉安和此后的领导斗争的方针，是遵照着中央的六月议决案和七八月间的指示信的。因此，吉安取得之后，在十月七日他们经过江西省苏维埃大会通过了一个议决案，说：

“如果认为吉安暴动的完成，便是赣西南革命的完成，以为可以保持这一胜利，那么，必然会遭受敌人阶级残酷的进攻，结果，革命定会惨败下来；因此一刻不停的进攻南昌、九江，是全江西革命群众紧迫的实际任务。”“这是巩固苏维埃政权胜利的主要条件。”

这种方针之下，他们在十月十四日就把第三、第四、第十

二军全部开拔，离开吉安，党的领导机关（赣西南特委），以及极草率成立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亦都随着军队出发。吉安城内只留第二十军，并且十月十四日的决定，说第二十军也只留在吉安“工作一短时间，即行北上”。甚至于对于赣南的第二十二军，也是决定“在攻下赣州或对赣州‘暴动’（？）作一布置后，即行北上”。不但如此，他们在吉安取得之后，除掉实行“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之外，其他的组织群众、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重要任务，都没有注意，至少是注意力不能集中的，因为他们认为巩固的“主要条件”就是“一刻不停留的进攻南昌、九江”。他们决定“扩大红军到一百万……现在（十月半）军队出发后，继续征调新兵往前方送去”。这样，一则完全不顾到红军质量上的改造，而只是空想极端夸张的扩大，二则将后方群众工作的中心完完全全限于“征调新兵”。因此，——红军完全离开吉安，群众的斗争组织和地方武装完全忽视，红军在前方作战：又是一忽儿攻樟树，一忽儿又转到抚州，只想找一条路打到南昌去，……这种形势之下，敌人的军队自然很容易的把吉安夺去了。

不能有组织的进行革命战争，发动群众，巩固后方，坚强红军……而且放弃了后方，脱离了群众，完全不估计敌我力量的对比，只在努力于所谓“势如破竹”的进攻南昌、九江，这是盲动冒险；因为这种路线，就受到了吉安的失败。

这种路线的基础，正是完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立三同志的理论。只看江西省苏维埃大会的议决案说：

“全世界、全国、全省革命形势是整个的统治阶级日益走向崩溃死亡的末路……全国全世界的苏维埃的政权，无疑的要在这一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势）之中涌现出来。”“豪绅、资产阶级、军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完全不能支持。”

这正是立三同志的理论和三中全会以前中央六月议决案时期的立场。这种路线对于苏维埃区域实际斗争的影响，在吉安的例子，暴露得十分明显。因为有“全世界全国直接革命形势已经成熟”的理论，所以就有“一刻不停留”赣西南全部革命力量去进攻南昌、九江的实际政策。但是，是不是可以说：这只是简单的对于形势的过分估量呢？不能够的。实际上，这是完全不相信革命的力量，因此，不去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巩固得到的胜利，而进一步的实行真正的进攻。这种路线，是预先断定了没有取得南昌、九江的“主要条件”，就绝对不能巩固吉安，而且必定是“革命惨败下来”，因此，而实行拚命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出发点完全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显然是和共产国际路线互相矛盾互相对立而不能并存的。

事实上，不但巩固吉安并不需立刻取得南昌、九江的所谓“主要条件”，而且现在吉安的丧失，也决不就是“革命一定要惨败下来”。现在，只有在共产国际的路线之下，去执行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建设真正的红军，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府，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武装暴动的方针是定下了的了。建立苏维埃政府的意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向大城市以及最大城市的武装暴动。然而不估计具体环境，不分析现在大城市中力量的对比，而组织暴动，这

就不是列宁主义，而是盲动主义。必须用全力动员群众，为着部分要求而斗争，这样去准备群众选择最好的时机来暴动；这是对于阶级敌人的真正进攻。”“只有这样，才能够准备工业中心的大城市的发动，由暴动起来的工人和红军占领这些城市。”吉安丧失之后，江西的革命斗争只有在共产国际的路线之下，这样去组织群众和红军反对国民党进攻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而且一定可以取得胜利。为什么？因为共产国际的路线是真正进攻的路线。这种进攻路线之下的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的彻底执行，才是重新取得吉安，巩固扩大赣西南苏维埃区域的保证，而且也是将来真正取得南昌、九江的保证。如果想把共产国际的路线，解释成为退却的路线，就算说是暂时退却的路线，譬如说现在应当割据保守，分散红军等等，那就是最有害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企图。

原载1930年12月9日《实话》第2号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长沙战争，见本卷第32页注①。

② 六月议决案，即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

中央紧急通告*

(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

——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
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国际七月决议案^①明显的指示中国党以真正发动群众去进行革命斗争的进攻路线，最近国际来信^②又彻底的揭发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方针和危害党的实质，要全党的布尔塞维克像一个人一样，一致的团结起来实行国际的路线与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斗争。中央政治局在接受国际这一指示下，深刻的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认为立三路线之为害于党已成无可争辩的事实。立三路线之历史的根源是在六次大会前的盲动主义的残余并未肃清，而组织上陈独秀的家长制度又给立三路线的统治以组织上的保障，所以自中央七十号通告^③后，经过鄂代会^④、苏代会^⑤立三路线遂日益形成，到了六月十一日决议案^⑥在政治局通过，立三路

* 这是瞿秋白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紧急通告。

线遂成为中央的路线而统治着全党。从此直到三中全会，中央的工作是站在反国际路线之下进行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方针，掩盖着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引导党到消极和失败，而加强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的。三中全会本是为的接受国际路线而召集的，但因为站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来接受，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如说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是一般的正确，中央路线在六月十一日后还是与国际一致等等；因此，三中全会对国际路线的解释，在理论上策略上也同样发生了许多错误。这样，就使调和主义的中央所领导的全党工作仍然在重复与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直至国际来信后，中央政治局虽承认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但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九日两决议案^⑦中，在中央告同志书中还是保持着调和主义的态度，如首先肯定三中全会是一般的接受国际路线，后来又说根据三中全会决议，发展二十五日决议等等，这都是不能斩断调和主义尾巴之不可容许的错误。中央政治局现在公开的承认这些错误，并暴露这些错误于全党，要从错误的认识中来确定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与执行国际路线的总方针。

二、现在政治上与党内的情形是怎样呢？首先是红军苏维埃区域在立三路线的领导之下，不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去建立和巩固真正的工农红军，不去建立苏维埃政府与实行自己的政纲，不去发动广大群众有步骤的争取在湘鄂赣省区一省几省的革命首先胜利，反而执行无后方无阵地的脱离群众的冒进攻坚，结果造成目前苏维埃区域整个削弱与红军受了

严重打击的形势。立三路线的指导是在布置全国武装暴动，调和主义的三中全会虽将武装暴动的布置取消了，但实际工作中立三路线仍旧统治着，从中央以至各地仍在空喊同盟罢工、发动农民战争、组织革命兵变的口号，而并未实际去真正努力组织群众的政治经济战斗，去真正发动群众为反抗进攻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因此，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及发动群众的能力大大削弱了，赤色工会的组织退步了，党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大大削弱了，群众组织的独立系统受着障碍了，党渐渐脱离群众了，党的指导机关与党内群众也渐渐脱离了，青年团的转变也就成为不可能了，广暴纪念示威的失败，是一个最显明的例证与总结。在这样的政治基础上，党内情形也就呈现出非常状态，家长制度的统治，抑制了党的自我批评，打击了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同志，尤其是中央政治局几次反抗国际的决定和指斥，这就使最能保障正确路线执行的国际领导受到障碍，使布尔塞维克党的生活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官僚机关，使党的领导走上一错再错的覆辙；——这是目前党内最严重的危机！

三、中央政治局在了解了自己错误与党内危机之后，特通告全党执行下列的决定，以实现坚决的布尔塞维克的转变。

1. 三中全会的决议与最近两次补充决议及告同志书是不能领导全党执行国际路线进行反立三路线的斗争的。要坚定这一斗争战线来执行国际路线，只有采取非常紧急的办法，在适合秘密条件下，产生新的政治决议来代替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在这里，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与最近来信是党的目

前行动的根本方针。

2. 为要保障国际路线与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彻底的执行，党内应实行改造。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是根本的办法，改造各级指导机关是紧急的处置。在这里，必须发展布尔塞维克的自下的自我批评，而反对抑制与恐惧自我批评，必须坚决执行党内民主化而不妨碍秘密条件，必须引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必须坚决的反对以派别观念对抗反立三路线的分子，而造成掩护立三路线的小组织行动。这样，才能冲破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委派制度，而开展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斗争。

3. 为要使国际路线在中国党内得到根本的巩固，党现在就应开始准备七次大会，这不仅解决党内问题，且要更进一步去解决一切政治上的根本问题，如党纲问题等等。

4. 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是一长期艰苦的工作。立三路线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着右倾的消极，所以反立三路线的本身便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一切用各种形式来掩盖在立三路线之下的企图，党都须予以无情的打击，这不仅要有思想上的斗争，且要有组织上必要的制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必须在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上来真正实行实际工作中的转变，绝对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将国际路线解释成为退却的路线，尤其要反对托陈取消派^⑧利用这一时机来做破坏党的阴谋。

全党同志们！动员起来！要挽救目前革命进展中的部分失败与消极，要挽救目前党内的危机，全党同志只有团结一致的

站在这一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立场上，来执行国际路线，来实现上述决定，这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到新的伟大胜利。

中 央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汇集》1930年第3分册

注 释

① 国际七月决议案，见本卷第30页注④。

② 最近国际来信，指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③ 中央七十号通告，见本卷第109页注⑯。

④ 鄂代会，指1930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

⑤ 苏代会，即1930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⑥ 六月十一日决议案，见本卷第109页注⑭。

⑦ 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九日两决议案，指中共中央于1930年11月25日作出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和同年12月9日作出的《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九日的决议》，这两个决议又称三中全会补充决议。

⑧ 托陈取消派，见本卷第30、33页注⑥、⑳。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

(一九三一年一月)

我所应当说的是很多，可是会议所容许的发言时间是很少的，因此，我只能概括的说。

政治局所提出的草案^①，我是完全同意。忠发同志报告^②又详细的阐发草案里某些问题的意义。忠发同志指出我特别负责以及我的错误：——指出这些原则性质的错误和路线上的问题，指出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立场和对国际代表意见的不尊重，——我负有特别主要的责任。我郑重的向四中全会承认这种错误和责任。恩来同志的发言之中又指出我在莫斯科时候对于派别斗争的错误立场，以及这个和我最近错误的联系，我是完全承认的。对于这些，为着节省时间起见，我都不重复来说了。

立三路线的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已经有共产国际最近来信^③指示得很明白。三中全会以来的调和主义——正是对于这种立三路线的调和而混淆两条路线！发

* 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等部分党内干部的逼迫下，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举行六届四中全会，瞿秋白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这篇发言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记录稿，由编者加了标题并作了个别的文字订正。

□□□④和立三路线，三中全会固然改变去年六月到八月期间政治局实际工作上的某几种布置，例如，取消总行委⑤，停止武汉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等等——然而在路线上始终是同“传达”国际路线，“批判”立三调和错误——用这些应付手段来替立三路线辩护，造成一种幻想：仿佛立三路线改掉了这些“个别的部分的策略上、组织上、估量上的错误”之后，就已经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一致的了。三中全会决议案上还说：“六月十一日议决案有一般的正确路线。”恰好像国际来信所说：模糊混淆两条原则上绝对相反，不能并存的路线。国际来信之后，政治局仍旧没有一开始就深切认识到这种调和主义的差误，经过共产国际来信所领导起来的党员样子的热烈斗争——为国际路线斗争——以及国际代表的正确指导，方才彻底了解到这一点。

调和主义的立场和路线——就是三中全会的路线，当然事实上仍旧是立三路线。虽然三中全会向着国际路线方向走了一步，可是因为根本立场的没有改变，所以他——三中全会和此后的政治局，不能领导党实行路线上的大转变。自然，实际工作上立三路线仍旧能够继续着，甚至占着统治地位。立三路线——用“左”倾空谈和冒险盲动掩盖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掩盖右倾的消极，掩盖对于革命的现实任务完全放弃。这种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和党的损害非常之大：使党的组织受着许多破坏，使党脱离群众，而更加落后，使党对于工人斗争、罢工运动以及政治动员的领导能力大大削弱；使赤色职工运动向后倒退，赤色工会缩小而离开群众，直到丧失独立的组

织；使青年运动完全取消，使我们的农民运动同样受到大大打击，领导力量不但不能（扩）大反而缩小，兵士工作亦然这样；使反帝国主义运动之中党不能得到领导，——尤其是中国革命当前的第一等任务，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建设真正红军，完全放弃，以致于近来军阀进攻红军的时候，苏区和红军都已经是处于削弱的阵地上，而受到部分的失败和损失（吉安不能守，东固失去——这是赣西南，龙岩（闽西）、梅县（东江）、黄金洞（平江）、公安（鄂西）、横峰、弋阳（赣东北）——失去。红军的成份，工人领导、党的领导都没有改善和加强起来，却受到许多损失……富农路线在苏维埃区域不但没有肃清，反而被“左”倾的好些过早办法和宣传掩蔽着而可以继续发展，真正中农、贫农的土地革命没有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受到障碍，或者简直提都没有提起。苏区之中阶级工会没有，有了也不发展。甚至经济政策之中会有“抑平工价”——不准工人增加工资的事。……所有这些机会主义的错误，都被“一并(?)也集中到红军”、“立刻大举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的冒险政策所掩盖着。这样，工人群众的阶级组织和斗争没有发动和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和斗争也抛弃了，无产阶级和中农的联盟受到危害了。总之，这种损失数都数不清爽。这些损失是立三路线所给的——是调和主义所不能改变挽救的。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调和主义比立三路线更坏——因为他掩盖着立三路线的真面目，使党员群众认为这种口头上接受国际路线的调和主义，已经是国际路线了，因此，更不能清醒的看见立三政策上路线上的错误。

三中全会及其后的调和主义，和立三路线一样，还加强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便利了取消派（托陈派）^⑥的活动。同样，这种情形，客观上帮助了黄色工会等等改良主义扩大了对于工人群众的影响，帮助了反动的富农豪绅保持对于农民群众的欺骗和作用。

这种调和主义的错误责任，在政治局里面，我——秋白——是最主要的负责人。国际代表在三中全会前后勇于向我和政治局同志提出立三同志在冒险主义政策之下走向反共产国际的斗争的道路上去了，可是我们是反对这种意见、不尊重这种意见的，这是不可容许的对国际代表不尊重的态度。这使我们继续自己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到很长久的时间。

我这种错误是不是偶然的呢？决不是的。因为对于许多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例如第三时期^⑦问题，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关系的问题，中国统治阶级之中各派矛盾斗争的观察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的特殊性问题（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的富农问题、中国改良主义的作用和下层统一战线的问题、武装暴动和争取群众任务的问题，我从六次大会以前直到三中全会前后，都有好些和立三同志大致相同的观点。因此，三中全会的时候——虽然我是参加国际七月决议案^⑧的讨论的，虽然自以为是了解国际路线的，可是，看见了考察了立三的意见和当时政治局的路线，居然会以为这不过是个别错误，而不是路线上和国际不同。事实上，这证明我以前连六次大会所批评的盲动主义错误也是没有了解的。立三同志的许多观点，只是我在六次大会之前的错误观点的“发扬光大”。（我当初

看见立三的意见，就自然只觉得他在个别问题上，在估量时局上过分了，除去这些过分的地方，仿佛就正确了！)所以立三路线，亦可以叫他做秋白路线——以党的历史上的思想来源说，更正确更公平些，应当说是秋白路线。

中国革命在这一时期——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一九三一年一月，正是很紧要的困难时期。中国革命在世界经济危机正在日益深入，世界工人运动一般的高涨，各殖民地革命运动发展的形势之下，是到了新的高涨。中国革命斗争之前还摆着许多困难，帝国主义国民党还在动员一切力量压迫革命的苏维埃运动，自然，在工人之中的某些落后的阶层之中，还有些不了解革命运动发展的前途的，他们就会传染着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或者拚命的情绪（这亦是动摇呵！）。党正应当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战胜这些动摇，而吸引他们积极的加入斗争。如果这些种种式式的动摇侵入了党的领导机关，那就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危险。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在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不但侵入，并且可能起了一个时候的领导作用。这个危险就可想而知的了！

我现在既然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所以对着四中全会——对于全党和共产国际揭发这种错误——懦弱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党应当要把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完全肃清！每个共产党员，要清楚的认识共产国际的路线，要坚决的实行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所以也就要坚决的无情的反对机会主义的一切表现，反对离开共产国际路线的每一步，就算是很小的一步，反对一切种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因为每一步的离开，每一些

儿动摇，是要被敌人利用的！

党要肃清立三路线，就应当经常不断的实行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和对于右倾的调和主义，反对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和消极怠工，要实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和对于它的调和主义，反对“左”倾空谈和盲动冒险——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右倾危险是主要的危险，这种危险是从全中国全世界革命运动的现在环境而决定的——这一点应当记着，应当集中火力反对右倾。然而，右倾分子爱掩盖在“左”的假面具之下，必须要会揭发这种假面具。

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斗争开始了很不久，但是这一斗争的过程之中，已经发见有许多不正确倾向，已经要党看见右倾分子在假的反立三路线斗争的面具之下积极活动起来。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必定要坚决的打碎这种企图；同样，要加强斗争，反对陈托取消派的活动和他们的暗探破坏党的阴谋。

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斗争——是解除立三路线的一切武装，一切种种形式的调和、掩蔽和巧妙的手段，同样要解除其他一切离开国际路线的倾向，过去的现在的右倾、“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武装。立三路线以“左”倾掩盖机会主义的消极，决不是真正进攻的路线，而是要引导到失败的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者现在却企图曲解国际路线是退却的路线，这只是他们自己露出狐狸尾巴——他们自己的路线是退却的路线，是投降敌人的路线。只有国际的路线才是真正进攻的路线。只有在国际路线之下，党能够，而且一定能够发动全中国广大

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及其重返政治斗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为着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红军和苏区劳动群众，——在冲破敌人“围剿”的过程之中，实行布尔塞维克的组织群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和中央政府，建设真正的红军。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在经济斗争的浪潮之上，组织伟大的政治罢工和总同盟罢工，准备武装暴动，……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的道路上去。

注 释

- ① 政治局所提出的草案，指《中央政治局报告》草案。
- ② 忠发同志的报告，即向忠发代表政治局向四中全会所作的《中央政治局报告》。
- ③ 共产国际最近来信，见本卷第120页注②。
- ④ 原稿3字不清。
- ⑤ 总行委，又称统一行委，见本卷第34页注③。
- ⑥ 取消派（托陈派），见本卷第30、33页注⑥、②。
- ⑦ 第三时期，见本卷第31页注⑬。
- ⑧ 国际七月决议，见本卷第30页注④。

致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中央的信*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

国际执委和中央：

四中全会的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对于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采取调和主义的立场。恰好是模糊混淆两条原则上不同的互相对立不能并存的路线：共产国际的路线和立三同志的路线。共产国际的代表在三中全会的前后，屡次提出立三同志在冒险主义政策之下走向反共产国际斗争的道路上去。可是，我和当时政治局都不赞成他这种意见。这种对于国际代表意见的不尊重的态度，更使调和主义的错误加重，因为当时并没有清楚的提出不赞成的理由，而且含混的简单的不把国际代表的意见写入三中全会的政治议决案。这样使当时国际代表没有可能及时来纠正当时政治局的调和主义错误。四中全会指出：这种调和主义错误(三中全会及其后)，以及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态度的最主要的责任，是我应当负的。我对于这种指斥完完全全

* 这是瞿秋白被撤销中央政治局领导职务后，写给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中央的信。原文大部分曾在1931年2月15日《党的建设》第3期上发表。这里根据中央档案全文刊印。

的接受；我对于议决案的全部，也是完完全全的拥护。

我在四中全会的发言里面，曾经公开的对于全党承认我的错误。党在国际指导之下，经过四中全会纠正了自己的路线，解决了党内问题——更新了党的领导机关，将要在反对和肃清立三路线及其调和主义的斗争之中，在一般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之中，特别是反对现在右倾的主要危险，将要在这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部分的也就是反对我的过去错误的斗争之中，领导工农群众的伟大斗争。不但补偿过去错误所给的许多损失（四中全会所指出的），而且引导革命到新的胜利。我必定尽我的力量参加这个斗争，在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央的领导之下，坚决的纠正自己的错误，反对立三路线，反对其他一切形式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及其调和主义，反对假的反立三路线斗争掩盖之下的右倾及其他分子的不正确倾向和活动，这些分子是在企图把原则的斗争变成个人的派别的斗争，其结果也要走上反共产国际的道路的。

我的调和主义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有系统的。因为我对于革命的好些根本问题，例如“第三时期”^①的问题，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问题，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矛盾和战争的观察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的特殊性——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中国的富农问题，中国改良主义的作用和下层统一战线的问题，武装暴动和征取群众的问题——从六次大会之前直到三中全会前后，都有过好些和立三同志大同小异的观点。因此，三中全会的时候，虽然我是参加过共产国际一九三〇年七月的中国问题的议决案的讨论的，可是看见了

考察了立三同志和当时政治局的意见和路线（六月十一日议决案），居然会以为这不过是个别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和国国际不同。这证明我以前连六次大会所批评指斥的盲动主义错误，也是没有真正认识和了解的。立三同志的许多观点，只是我在六次大会前后的错误观点的“发扬光大”。我当初看见立三的意见就自然觉得他在个别问题，在估量时局上等等是过分了，除去这些过分的地方，仿佛就正确了！在这种基础之上就发生我在三中全会前后对于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和对于国际代表意见的不尊重态度。

我以前的这种非布尔塞维克的立场，既然使我事实上离开共产国际的路线，所以我对于党内派别问题的观点也是绝对错误的。我在莫^②当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领导者的时候，对于在俄中国同志之中的派别斗争问题，不但没有能够有正确的立场帮助联共党的领导去取消这种派别斗争，反而客观上卷入派别斗争的漩涡。关于这一点，共产国际执委的政治委员会已经有过决议^③。可是，我对于国内党里面存在着同样性质的派别观念，仍旧是没有能够实行坚决的正确的斗争。党内这些种种形式的小资产阶级的派别观念，都是布尔塞维克化的很大的障碍；这些派别观念之中，有些是以工人和知识分子对立，以“实行家”和“理论家”对立，以“老”的干部和新的干部对立，以国内工作者和国际留学者对立；这里包含着极坏的倾向，甚至于武断的煽动，说国际执委的某某工作人员故意到中国党内制造派别等等……这样企图把原则的斗争变成个人纠纷，把为着国际路线的斗争解释成为派别的斗争，攻击和

破坏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的信仰。对于这种派别观念，我以前是没有正确的和他斗争的。这种错误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是和我过去的整个的非布尔塞维克的立场联系着的。正因为政治立场的错误，所以对于这些派别观念，不去坚决的反对，不站在布尔塞维克的立场从政治上去打碎派别成见，却想去调和这些派别，使之互相谅解——这是市侩式的“和事老”的立场。

我现在公开对国际执委和中国全党揭发和承认自己的错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

* * *

中国革命的这一时期（一九三〇年五月到一九三一年一月）正是很紧要的时期；中国革命在世界经济危机正在日益深入扩大，世界工人运动一般的高涨，殖民地革命运动发展的条件之下，走到了新的高涨，而且往后更加要开展。同时，中国革命斗争之前摆着许多困难，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在动员一切反动力量压迫革命和苏维埃运动，自然在工人之中的某些阶层里面，还有不了解革命运动发展的前途的，他们就会体现着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或者拼命的情绪。立三路线的拼命主义和他对于中国革命绝望的实质，只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的一种方式，调和主义和派别观念，亦是这种动摇的表现——右倾机会主义公开的主张退却和妥协，正是这种动摇的态度发展去引导的托陈取消主义的。党的任务是克服困难，是要肃清这些小资产阶级性的动摇，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去吸引领导广大的劳动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来参加自觉的革命斗争，直

到最落后的工人阶层，都要这样去争取的。如果这些种种式式的动摇侵入了党的领导机关，是非常之大的危险。这一路线和调和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里面，不但侵入，并且有一个时期占着了统治的地位。

共产国际执委的指示，党员群众的积极斗争，得到正确的领导，方才克服这种危险。

四中全会的一切决定，保证党能够把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完全肃清。现在每个党员要清楚的认识共产国际的路线，要坚决的实行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所以也就要坚决的无情的反对机会主义的一切表现，反对离开共产国际路线的每一步——就算是最小的一步，反对一切种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因为每一步的离开，每一一些儿的动摇，都要被敌人利用的。

党要肃清立三路线，必须坚决的反对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同时亦要经常不断的实行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和消极怠工，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左倾”空谈和盲动冒险，反对对于一切“左”右倾的调和主义；就是要实行坚决的布尔塞维克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右倾危险是主要的危险，这是全中国全世界革命运动的现在环境所决定的，这一点应当时时记着，应当集中火力反对右倾。然而右倾分子爱掩盖在“左”的假面具之下，这是必须会去揭发他的。中国党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斗争，开始了很不久，但是这一斗争的过程之中，已经发现许多不正确的倾向，已经有右倾分子，以及以前的立三主义者在假的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掩盖之下积极活动起来，有时更是努力在把原则

的斗争变成个人的派别的纠纷。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必须坚决的打碎这些企图；同样，必须加强反对陈托取消派的斗争，反对他们的暗探破坏党的阴谋，他们正在利用党内的派别观念和一切动摇进行这种阴谋呢。

立三路线的破产，我的错误的揭发——一切离开共产国际路线，以至反对共产国际分子的“屈服”，是共产国际和党的胜利。这是四中全会成功的主要意义。此致
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瞿秋白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

注 释

① 第三时期，见本卷第31页注⑬。

② 莫，即莫斯科。

③ 指1930年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因中国劳动大学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决议指责中共代表团在实际上帮助了中国劳动大学学生中间的派别斗争。同年6月，共产国际撤销了瞿秋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职务。

声 明 书*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我完全抛弃自己的一切错误和离开国际路线的政治立场——三中至四中〔全会〕间之调和主义的立场，而站在共产国际路线的立场之上，拥护四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之下来为党为革命而斗争。

二、反对立三路线及其调和主义的斗争，反对罗章龙等右派小组织及其调和主义的斗争，揭破并打碎立三主义者和右倾小组织的联合企图，是现在为着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及真正执行国际路线所万分必须的。中央最近开除章龙①（他发布小册子②是反革命的行动）、开除王克全③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委员，开除王凤飞④中央委员，警告贺昌⑤，对于锡根、余飞、陈郁⑥同志的要求，以及对于江苏省委问题⑦的一切处置，我都是完完全全拥护，而且在以后党反对立三路线，反对右派小组织、调和主义以及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反对取消派⑧及其暗探的斗争之中，我必定尽我的能力参加。这个经常的有系统的斗争开始得还不久，此后正要更加加强起

* 这是瞿秋白遵照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写的声明书。全文曾在1931年2月15日《党的建设》第3期上发表，这里根据中央档案刊印。

来,更加深入到支部,深入到日常的实际工作之中去呢。

三、我的调和主义的错误,是和在莫斯科代表团对于“学生问题”的错误^①相联系的。当时对于莫斯科学生中反对中大支部局^②的李剑如等同志,对于这个小组织,我采取了保护态度,以至不但不能反对派别斗争,反而自己陷于派别斗争的泥坑,这是因为我当时有过对于富农问题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这些观点之中有些是他们所赞成的。这种错误是我的非布尔塞维克的整个立场之中的一部分。现在我公开揭露和承认我立场的全部错误,和这种派别斗争的错误,而和他奋斗。

中央政治局一月二十七日的决议,要我写声明书——我在病重中不能多写,所以只写这一些(以前我已经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和国际执委)。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注 释

①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当时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领导职务的罗章龙等公开反对四中全会,主张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临时中央;他还公开发表了《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的小册子,认为中央领导在政治上早已完全破产,主张立即停止中央行使职权。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27日作出了开除罗章龙党籍的决定。随后罗章龙即联合一些人成立了一个中央非常委员会。中央指责罗章龙进行右派小组织活动,非法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和“第二工会党团”,是分裂党的行动。罗章龙,参见本卷第33页注^②。

② 参见本文注^①。

③ 王克全,当时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因积极参与

罗章龙的反对四中全会的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1年2月3日在《红旗日报》上发出通知，撤销其党内职务并开除他的党籍。

④ 王凤飞，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领导成员，因参加罗章龙的小组织活动，中共江苏省委决定予以开除党籍。

⑤ 贺昌，参见本卷第32页注⑩。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他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

⑥ 锡根，即徐锡根，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江苏省委常委兼职工运动委员会党团书记等职。余飞，当时为全国总工会党团领导成员。陈郁（1901—1974），广东宝安人。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六届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担任全国总工会常委和海员工会委员长兼党团书记。徐锡根、余飞和陈郁都因为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等人的活动，分别受到撤销党内职务等处分。

⑦ 江苏省委问题，见本卷第31页注⑨。

⑧ 取消派，参见本卷第30、33页注⑥、⑩。

⑨ 所谓学生问题，是王明宗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挑起的一场纠纷。王明等在该校校长米夫的支持下，把持学校党的组织——中大支部局，排斥异己，诬陷一部分同学组织所谓“江浙同乡会”，弄得同学之间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影响极坏。后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布）监委和中共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查结果认为：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组织，推倒了这个假案。

⑩ 中大支部局，是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党的组织。支部局书记由俄国人担任，委员大多数是中国同志。学校里的中共党员都转为联共（布）候补党员归支部局领导。

国民会议上蒋介石说些什么？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

“天下乌乎定？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唯嗜杀人者，能一之”——改《孟子》

一

中国地主资本家的国民会议^①开会了。南京政府的主席蒋介石长篇大论的发表了一篇“训词”。你看他说些什么东西？

第一，他首先就说：他遵照总理遗嘱“毅然清共”。不错！因为孙文的遗嘱上面写着“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唤起民众……”，所以他，蒋介石不但要毅然决然的和苏联绝交，屠杀苏联外交人员^②，并且要大大屠杀共产党员、工人、农民、贫民群众。这表面上仿佛冲突，其实，一点也不，——那遗嘱是鲍罗庭^③假造的，当孙文画字的时候，口气正喘不上来，随手签着，一面用脚指头在床上画“不，不不”三个大“不”字。所以谁能够首先执行遗嘱文字的反面，谁便是孙文的真正忠实信徒。蒋介石特别在这点上首先来演一折“丑表功”，也是当然

的事。

第二，蒋介石及一切国民党杀戮工农民众之外，第二件功绩，便是屠杀兵士群众，实行混战。所以蒋介石接着说：“自国民革命军北伐迄于讨伐冯阎军事告终，就革命将士之死亡者，已达三十余万人，伤且倍于此。”总计死伤一百万人，这是他自己的供状。而且他说（请译成通俗的白话文吧）：“凡是这些空前重大的牺牲——死伤的一百万人，都是这次统一和平的代价，我们全国同胞……对于这一百万已经死伤的兵士，应当深刻的去认识他们，应当一致的去爱护他们，尽全力去保障他们！”哈哈，我们一百万死人和残废的兵士，都是军阀、地主、资本家自相争夺的牺牲品，承蒙蒋主席的大面子，等我们死了，伤了，再来“认识，爱护，保障”我们，我们毫不愿意留在阴间十八层地狱了，请蒋主席高抬贵手，把我们从棺材里拖出来再活几年，把我们断了的手脚再装上去多享享你的“认识，爱护，保障”的福气吧！

二

蒋介石屠杀了工农兵士三四年之后，又正在进攻红军和苏维埃区域。——这红军和苏维埃区域，以及全国的苏维埃运动，正是反抗屠杀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因此，正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以及汪精卫④、陈独秀、托洛斯基⑤），要号召国民会议，遵照所谓总理遗嘱，用国民会议来抵抗工农兵会议（苏维埃）。

蒋介石报告他这两大功绩——杀工农、杀兵士之后，就对

着这国民会议大谈其国民党的政治“理论”了。屠杀政策的军政时期，据说是过去了。其实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福建……到处正在进攻红军，屠城烧村呢。蒋介石当然“不管”这些小事，他说现在训政时期开始了。训政时期是什么？他说这和共产主义不同。当然大不同呵！他说共产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把国家据为己有，“以消灭其他阶级，待其他阶级消灭净尽，乃可同归于共产社会，国家亦将从此消灭。故一党当政的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消灭反对者之过程，虽列宁亦难为之预期，但断其必久。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哈哈，列宁倒比你们国民党的蒋作宾^⑥也不如了吗？蒋作宾最近经过俄国，报告说，“俄国商人已消灭尽净……。”而且五年计划的实行，集体农场的进行，不久要将大部分农民小资产阶级都转变成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确把大商人、资本家、富农，认为是无产阶级以及农民的敌人和“反对者”。但是共产党从不把农民群众认为自己的“反对者”的。俄国无产阶级够能领导一万万以上的农民群众，共同合作的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不到十五年，已经把地主、资本家、商人都消灭了，现在正在消灭富农阶级。当然，哼，俄国没有“中国的固有道德”——“仁爱的皇帝和孔夫子的道德”。所以苏联政府消灭反对者是“很残酷的”，譬如，最近反革命的实业党及孟塞维克的领袖被捕之后，还化了三四个月的侦查审判功夫，有些判决死刑之后（这在苏联是“非常的刑罚”），还给他们特赦，改为终身监禁。这是多么“残酷”呵！看“咱们”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三民主义的中国！这里“没有”

阶级斗争！而天天中外工厂主、巡捕、警察、包探、工头打、杀、压迫、剥削工人！这里“没有”阶级斗争！而天天地主、绅士、土豪打、杀、烧、宰割、压榨农民！地主资本家的政党——国民党，帝国主义走狗的政党——国民党，为着“消灭他的反对者”——革命的工农、贫民、共产党员起见，天天把他们任意逮捕，非刑敲打，枪毙，砍头腰斩，火烧，活剐，零割，挖奶，掘阴，斩成肉酱……，用大炮、机关枪、飞机、开花弹、毒瓦斯去屠杀他们。国民党除掉杀死“国民革命军”兵士一百万人以外，这样杀死的工农贫民以及红军兵士，至少也在二三百万以上了。这是多么“仁爱”呵，多么“不残酷”呵，这是文、武、周公^⑦、孔子、孙文、戴传贤^⑧、蒋中正一脉相传的道德呵，这是“中国的固有道德”呵！

自然哪！你们贵国——地主资本家的中国国民党的训政时期，是和共产主义不同的，绝对不同的，没有一丝一毫是相同的！！

三

据蒋介石说，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和“自由民治主义”的议会政治是不同的。真的不同么？他说：自然，“最后的目的在于民治”，那么，这样说来，原来国民党的政治“理论”不过暂时和“自由民治主义”不同罢了。将来的目的就只不过是这样的“自由民治”，所谓宪政时期，就只不过是这种“资产阶级据国家为己有”的议会政治的资本家专政罢了。现在呢？现在是所

谓训政时期，据蒋介石说，这和法西斯蒂也不相同。不见得罢？你听他自己说：“而所以致民治之道，则必经过训政之阶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青年政治经验之民族，是非借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况既明定为过渡之阶段，自与法西斯蒂理论有别……而以大同为鹄的可知矣！”啊哈！原来国民党和法西斯蒂的分别，只是规定了这种法西斯蒂式的较有效能的“统治权”是过渡阶段，此外还要比法西斯蒂多一个将来的“大同国”的鬼把戏。这样说来，现在这个过渡阶段是什么东西呢？岂不是明明白白是法西斯蒂的“过渡阶段”吗？这叫做不打自招。过渡？过渡到什么地方去？——过渡到民治——宪政时期，再过渡到“大同”——不但治国，还要平天下呢！哼！这平天下的大同把戏，大概就是孙文、戴传贤说的“多多的把中国人的血种传播到全世界”，把中国绅商的“奴才性”的血种去“同化异族”了。再请问这过渡时期，过渡到什么时候才完呢？只有鬼知道！只好去问孙文的死鬼，“孙文颇能为之预期”了罢。

总而言之，总而言之——蒋介石自己的供状是明明白白的说：

国民党的政治“理论”是：

第一个过渡阶段是军政时期——军阀主义——杀工农兵士！

第二个过渡阶段是训政时期——法西斯蒂主义——杀工农兵士！

第三个过渡阶段是宪政时期——资产阶级的民治主

义——杀工农兵士！

第四个过渡阶段是世界大同——帮帝国主义——杀天下的工农兵士！

第五个大概就是“中国的”三民主义平天下，同化一切异族，使归于孔、孙、蒋的道统了罢？！

四

蒋介石国民党的“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法西斯蒂的训政时期，把中国训成了个什么样子呢？再听他自己的供状：

(一)“建设”呢？——因为打仗，外国资本家不肯借钱；

(二)铲共呢？——“星星之火，逐渐燎原”，他是因为“前方大规模作战，无兵可调”；

(三)禁烟呢？——因为有租界，烟是禁不了的；

(四)银价跌落呢？——这是全世界的事情，没有办法；

(五)外交呢？——又因为“国内战争发动之日即外交机关清净无为之时”；

(六)吏治呢？——贪官污吏到处都是；

(七)赈灾呢？——灾区扩大，“政府竟无法施赈”。

这样不行，是国内战争不好，那样不行，又是租界不好。蒋介石自己，以至于一切国民党军阀剥削工农，互相打仗，勒种鸦片，吞没赈款，投降帝国主义，企图借款回扣，这些一切，难

道不是国民党负责的吗?!他还“太息痛恨”于没有痛快的调兵去打红军,没有舒舒畅畅的大借款大卖国哪!

最无耻的,他还吹着他的大牛屎:说(一)裁厘了——其实,厘金名目裁掉,添了种种色色的营业税什么税什么税,这两天报纸上就有不少,“抗议”、“请愿”、“哀求”的商会电报;(二)关税自主了——其实,和日本、英、美都订了“互惠的优先权”条约。而且他自己都说最近四个月内外资移植国内,外商的工厂多开了六百多所。他还要说到取消治外法权^⑨,这已经取消到了什么程度呢?日本、英、美要求个个法庭雇用外国顾问,租界周围五十里不取消治外法权。而且现在日本、英、美各帝国主义,已经“不损害中国主权”而派兵调舰队,深入中国内河去开炮打红军。这是蒋介石国民党欢迎之不暇的。还取消什么治外法权?!他还说到“红匪”主力,快要被他剿灭了。不错!最近两个月单是《申报》^⑩的电讯,宁都曾经被白匪攻陷了三次,现在据说又在围剿宁都了。我们不知道江西省内还有没有第五个第六个宁都城!

五

蒋介石居然还接着说国内国际的经济状况呢?

国际帝国主义的经济恐慌,据他说是分配制度的不平均。“此种分配制度一时既难变更,则帝国主义侵略亦决难中止。”中国的失业兵匪、工农贫民群众的痛苦,就不是分配制度不平均了吗?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和资本制度一天不打倒,你们

国民党军阀的压迫剥削，以及自相混战“亦难中止”呵！

苏联情形呢？他说：“以一万三千余万人之总动员，运用八万兆卢布之资本，将全俄农场工厂，作集产的科学生产化，其规模自有可观。”为什么苏联共产党（这是你说的红匪呵）能够动员一万三千余万群众，为什么苏联之八万兆卢布之中，一个外国金镑也没有，而能够实行这样伟大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你们国民党三民主义的中国，现在是这样“不能不令人怒愤悲伤”呢？为什么？因为苏联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是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政府，而中国——是地主资本家的帝国主义所支配的国家，是国民党的国民会议的政府！

他又说，苏俄这样兴盛起来，西土铁路^①环绕着新疆，中东铁路^②深入我国东北，使苏联生产力“突飞猛进之数量，势将以中国为厄阍”。哈哈！这是多么危险呵？譬如说美孚洋油、亚细亚洋油在中国要卖五元六角一听，苏联洋油来了，只卖四元一听罢，——这对于中国的贫民群众更是多么大的“痛苦”呵！！

至于他说中国国内情形，他自然免不了猫哭老鼠的假慈悲。他说：

（一）失业众多——是“社会安定亦为之摇动”；

（二）外国资本经济侵略——是“货弃于地供仰于人”；

（三）每年进入口税平均总二万万两以上——本国产业落后得不了；

（四）三千五百万儿童失学，百分之八十不识字——“虽有

圣智亦难谋国”。

这样“千孔百疮”情形怎么办呢？他却有一个“万应灵药”，就是“和平统一”，“统一和平”！

现在好容易“统一和平了”！——于是乎“不特政府可以表示建设上的成效，即私人经营之事业，所投之资本，亦将风起云涌，协力并进，利用外资更不待言”。这是蒋介石唯一的梦想呵。这利用外资——大借外债，大开外国工厂，这风起云涌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官办工商业交通业赚大批汗血钱，——原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唯一的所谓造产政策。这造产不用说是造不成功，即使成功了——又正是工农民众的汗血再受大大小小的榨取，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大大大大的发财，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从中取得些“肉骨头”吃吃。这是多么高尚的理想呵，这是大同呵！哈哈！

六

真正“和平统一”吗？这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风起云涌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梦想真能够实现么？

国民会议代表诸君子！谁要破坏这和平统一，谁就是国民公敌，谁要破坏我蒋介石辛辛苦苦争来的“统一于我蒋介石”的统一局面，谁要破坏我“蒋介石可以对人战争，人人对我蒋介石应该和平”的和平局面，谁便是国民公敌。既然是国民公敌，就要打他，既然要打他，就是要战争。这就是蒋介石所说的和平统一。

这种“和平统一的国民公敌”正在开国民会议的时期抬起头来了。蒋介石自己说：“约法所以立共守之信条，定安人心，——中正屡次坚持，致不谅于平日敬爱之友。”这当然是指胡汉民^⑩说的。那骗人的约法，有了是这样，没有也是这样，我们这里不说他。可是，胡汉民借着反对约法，代表广东小军阀反对蒋介石的大军阀。正在这几天，古应芬、邓泽如等弹劾蒋介石的通电^⑪发表了。所以在这里蒋介石是说：你们看——破坏和平统一的人来了，这是“国民公敌”！于是在这所谓“拥护和平统一”的国民会议，又在准备着再来一次的军阀混战了。

七

蒋介石的结论是这样：

“今日吾人所能托以集会之议场，亦仅系一工程师之设计，而由无数荷砖伐木之劳工日夜不息，依照预定图样设置，乃能按期完成，世间绝无工程师相聚而斗，工人袖手旁观，可以有完成任何建筑之理。建国之道，亦与此同。”

这本来是孙文主义的嫡传。孙文自比诸葛亮，把四万万工农民众当作昏蛋糊涂的阿斗。蒋介石自比独一无二的工程师，把民众当作苦力牛马，替他“荷砖伐木”……而且他对着“国民会议代表诸君子”说这个话，意思是：

你们不要来相聚而斗，好好的做我的走狗，替我摇旗呐喊，去打“破坏和平统一的国民公敌”！去打“红匪”工农共

产党！

原载1931年5月10日《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3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这是1931年5月5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国民会议，也叫国民大会。

② 1927年12月13日，广东军阀在广州杀害苏联驻广州副领事等十余名外交人员，14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撤销承认苏联驻各省领事，所有各省之苏联商务机关也被勒令停止活动。

③ 鲍罗廷(Михаил Маркович Бородин, 1884—1951)，苏联人。1923年9月来中国，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第三国际驻中国代表，曾积极促进国共两党合作。1925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最高顾问、苏联政府驻广州国民政府代表。1927年武汉七一五事变后回国。

④ 汪精卫，见本卷第61页注⑧。

⑤ 托洛茨基，见本卷31页注⑩。

⑥ 蒋作宾(1884—1942)，湖北应城人。曾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驻德、奥、日公使等职。

⑦ 文，即周文王；武，即周武王。周公，即周公旦；曾佐周武王、成王。

⑧ 戴传贤(1890—1949)，即戴季陶。浙江吴兴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逝世后，曾进行一系列活动，歪曲孙中山学说，反对三大政策，攻击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等职，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

⑨ 治外法权，指领事裁判权，即外国侨民在中国犯罪或成为诉讼被告，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而由各该国领事依照本国法律“裁决”。这是帝国主义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的一项特权。

⑩ 《申报》，1872年4月30日由英商美查(Ernest Major)在上海

创办,1913年由史量才接办,1949年5月停刊。是旧中国历史最久的著名大报。

⑪ 西土铁路,苏联土尔克斯坦连接西伯利亚的铁路。20世纪20年代中期修建。

⑫ 中东铁路,又称东清路,是从哈尔滨北至满洲里,与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相联,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的铁路线。全线于1897至1903年由俄国修建,以后由俄国经营。1924年中苏两国商定,由两国共同经营管理。

⑬ 胡汉民(1879—1936),字衍鸿,广东番禺人。中国同盟会筹建人之一,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省都督。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成为右派首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广州元帅府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省长职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曾帮助蒋介石反共。1931年因同蒋介石争权被囚禁。释放后联合两广军阀势力,同蒋介石南京政府对立。

⑭ 古应芬(1873—1931),广东番禺人。1924年起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等职。邓泽如(1869—1934),广东新会人。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31年4月31日,他们为胡汉民被囚禁事,发表通电,要求弹劾蒋介石。

陈独秀的“康庄大道”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陈独秀托洛斯基派^①，现在在满洲事变^②之中，又活动起来了。他们的领袖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大文，叫做《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陈独秀在这“康庄大道”上做着第二个五卅运动的梦——他说：“以革命的民众政权（这一政权将经过全国抗日救国会而实现……）代替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战；同时以长期的排货，——由工人和学生组织大规模的检查队，排货能收实效——给日本资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即今日帝国主义在军事上不曾失败，其国内经济的政治的危机，也会迫着它不得不向中国的民众让步。这便是我们此次抗日救国会的“康庄大道”。

国民党说，宁粤统一^③的大垃圾堆就可以救国；国家主义派^④、人权主义派^⑤说国防政府可以救国。而陈托取消派说“革命的民众政权”可以救国，——这总算是陈独秀“比较聪明”的地方，可也是陈独秀比较巧妙的欺骗劳动民众的地方。但是，这里露了些马脚。请问陈独秀：什么样的“革命民众政权”？他说可以由全国抗日救国会实现。这不是说工人劳动者的抗日救国会，而是陈托取消派的宣传大纲和传单里面主张

的“工农商学联合起来”的抗日救国会。这个工农商学大联合的迷梦，证明陈独秀先生等又在幻想第二个五卅的民族统一战线。现在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完全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商会之类的豪绅资产阶级都在顶着这个名义“爱国”。抗日救国的时髦的大礼帽，不但一般资本家愿意戴，就是国家主义派、新旧军阀吴佩孚⑥、曹汝霖⑦、国民党的党国要人都在抢着戴。陈独秀却“暗示”群众说：不用苏维埃，甚至于不用陈托派的“国民大会”，经过这些抗日救国会也可以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这种政权是谁的，是那一阶级的？又决不会是工农民权独裁罢？！——因为陈托派说这是“史太林⑧派机会主义的”口号。那么大概是工农商学联合会的“无产阶级独裁”了！这真是荒天下之大唐。陈托派反工农民权独裁，说是阶级妥协，但是自己却主张工农商学联合的“革命民众政权”！这里显然的可以看见陈托派的真面目，他们事实上是要和资产阶级妥协，要引诱工人去投降资产阶级，屈服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豪绅地主。

于是乎陈独秀自己也觉得有些害羞，他就在括弧里面添上：“或经过国民会议，或经过苏维埃而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这里充分的暴露他的百分之一百的机会主义。“或经过国民会议或经过苏维埃”！用这两个“或者”企图蒙蔽群众。他以为这样，大家就可以相信他没有抛弃自己的国民会议主张。其实，陈派的宣言上说：“工农商学联合起来举行总罢工，召集全权的革命的国民大会”（所谓《工人报》的第六期）。而且陈派通告和宣传大纲上的中心口号亦说明，只是“准备普选的全

权的国民会议之迅速召集”，而“眼前最具体的步骤，须要……工农商学兵自动很快而广大的组织全国反日大同盟”，“普选的”！可见陈托派主张中国豪绅资本家在国民会议之中也享有政权，而这种政权，居然会是“革命的民众政权”！何况准备国民会议的，又明明的写：目前是要工农商学兵组织“全国反日大同盟”——“抗日救国会”。所以这个“或者国民会议”的“或者”，只有更清楚的暴露陈托主张和资产阶级联合战线的真相。

尤其巧妙的是他的第二个“或者”——“或经过苏维埃”。他以为这样可以蒙蔽群众，使大家相信他们并不反对苏维埃。其实，他们自己的国民会议尚且要等待时机，目前紧急的是“抗日救国会”，那么，苏维埃在陈托派的眼光里，当然只是遥远的将来的事。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他绝对不承认中国现在的苏维埃区域里已经有苏维埃。对于他，首先是全国抗日救国会，这是国民会议的准备。说一句“苏维埃”出来，仅仅是想欺骗工人群众的。因为他们既然主张工农商学兵各阶级大联合的反日会和国民会议，那么，对于要求剥夺地主资本家政治权利的苏维埃，对于那些正在反对着地主资本家而战争的苏维埃，自然是不赞成的，——他们的会也是一直反对到现在的。

陈独秀讥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希望国民政府宣战和希望商人排货。可是，给自己主张由各阶级联合的所谓“革命民众政权”去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战，去实行他予日本资产阶级以致命打击的长期排货，这个样是极端有害的，反对革命

的幻想和空谈。

为什么？因为假定工人群众相信了他的话，那么，大家要以为现在不用苏维埃，现有的苏维埃没有多大用处，而只要各阶级联合的抗日救国会，现在更不要领导苏维埃运动，不要准备暴动，不要发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红军和游击战争，而只要工人、学生检查队大规模的检货排日，慢慢的从这抗日救国会里自然会产生“革命民众政权”，再去对日作久持战；而且，即使日本征服了中国，还会向中国革命民众让步！此外，“或者”将来也可以来个苏维埃。这对于群众，简直是比一切国民党、国家主义派、人权主义派、“社会与教育”派都更加高明巧妙的定心丸、迷魂汤、麻醉剂。

好个“康庄大道”！——这是陈独秀先生等在反革命营垒里踱方步的“康庄大道”！

原载 1931 年 10 月 30 日《红旗周报》第 22 期

署名：史铁儿

注 释

① 陈独秀托洛茨基派，见本卷第30、33页注⑥、⑦。

② 满洲事变，即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我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

③ 宁粤统一，宁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粤指以汪精卫为首的广东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派代表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商讨成立统一的国民政府问题。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通电下野，随后广州国民政府也自行撤销，宁粤遂成立统一的国民政府。当时被称为“国防政府”。

④ 20年代初,以曾琦、李璜为代表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政客及其知识分子,打着国家高于一切的旗号,鼓吹国家主义,宣传“全民革命”,实际上是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被称为国家主义派。1929年正式定名为青年党,依附国民党。

⑤ 人权主义派,见本卷第33页注⑩。

⑥ 吴佩孚,见本卷第34页注⑬。

⑦ 曹汝霖(1877—1966),上海人。袁世凯政权时曾任外交次长,1915年,在袁世凯授意下,参与同日本公使日置益谈判《二十一条》。1919年五四运动时,北洋政府被迫将他免职。抗日战争时期为华北汉奸政府顾问。

⑧ 史太林,今译斯大林。

托洛斯基派和国民党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

一 飞机炸弹枪炮大刀之外的又一武器

国民党对于中国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现在是用全力来压迫。所谓“剿赤”的大军在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福建，起码也有四五十万，从今年五月蒋介石亲自出马到现在，也已经有四个月了——以前的还不算在内。单这四个月里面各地方被屠杀的民众，真是数也数不清。国民党的报纸上天天说“捣毁匪巢之伪政府党部”、“杀死几千几万匪徒”、“俘虏几万几十万”等等，如果照他们的数目算起来，国民党杀人放火的结果，至少也有五六百万以上的人民是被杀掉了！可是红军却仍旧存在着，有些地方而且还在发展。国民党的这种屠杀政策，为的是什么呢？无非是保护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无非是保护中国豪绅地主的剥削和权力，无非是保护中国资本家的发财，无非是想用武力强迫工农民众做他们的奴隶牛马。然而红军和苏维埃区域始终存在着发展着，虽然当前碰着极大的障碍，极困难的情形，而始终不但不消灭，反而日益得到更广大的民众的同情和帮助，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正是因为他们有无

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指导，因此不但客观条件有利于农民战争的开展，而且这种农民战争的有组织性有计划性，能够日益进步。所以国民党的唯一政策就是竭力企图消灭共产党。大城市的租界政府，各省各地的军阀政府一天到晚是在捉共产党，一天到晚是在压迫工人运动，以及一切革命的民众运动。革命工人，为着阶级利益而斗争的工人，甚至于简单的只开始表示反对减少工资，反对苛刻待遇的工人，都被捉到监狱里面去，受着非刑拷打，以至于枪毙砍头。普通的革命分子所受到的也是同样的待遇，——只要他们敢于对工人农民表示一点同情，只要他们敢于说几句话，做几句文章来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残民的罪状，而主张工农劳动民众夺取政权，他们的脑袋就立刻会有脱离身体的危险。至于共产党员，那更不用说了。这样，国民党用来维持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的武器，是样样都有的了：攻打红军的飞机、炸弹、毒瓦斯、大炮、机关枪，枪毙革命工人和共产党员的枪弹，砍他们头的大刀、监狱、审判厅，一切希奇古怪残酷暴虐的刑具。……可是，所有这些武器，看起来都不能够保证中国革命的消灭，都不能够保障国民党的江山。共产党在民众之间的信仰反而一天天的扩大起来，巩固起来。

因此，国民党还企图用欺骗民众的反革命宣传来蒙蔽人民。蒋介石自己说过：他是一只手拿着国民党党义，一只手拿着枪炮去宣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什么？就是工农民众应该做奴隶牛马的理论。国民党宣传这种主义的时候，说句蒋介石自己的老实话，就是对民众说：你们不接受三民主

义，你们不安心做奴隶牛马——你们不实行劳资合作，不牺牲阶级利益而为着中国民族(豪绅、地主、资本家)做苦工，那末，我们就请你们吃枪炮，吃炸弹，吃大刀，吃鞭子，总而言之，就是要你们的命。事实上的确是这个样子，无论是中央党部、省党部、市党部，无论是张学良①，是汪精卫②，是蒋介石、戴季陶③，都是这个样子。但是，表面上，国民党总要讲几句体面话，总还想迷惑民众。

不过，因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太丑了，太无聊了，太血腥气了，广大的真正下层的劳动群众实在听不进他们的话。他们竭力要在民众之中破坏共产党的信仰。然而他们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民众却看见国民党自己才是真正大杀人大放火；他们说共产党卖国，民众却看见国民党自己真正是个帝国主义走狗……这怎么样办呢？

好了，救兵到了——出现了一个托洛斯基陈独秀派！托陈派冒充马克思主义者，冒充列宁主义者，出来骂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于是乎国民党在飞机、炸弹、枪炮、大刀、监狱、法庭、三民主义的宣传之外，又多一个武器——托陈派对于共产党的造谣。大家请看：最近自从蒋介石“御驾亲征”以来，一切国民党的报纸杂志都争先恐后的登载托洛斯基派陈独秀派的文章，例如《光明之路》杂志④上最近（第一卷第十期）就有一篇《托洛斯基派口中的共产党》，这简直是完全照抄陈独秀、刘仁静⑤等等的文章。

二 国民党和托洛斯基派眼光里的共产国际

中国劳苦群众革命的力量，在于他们能够得到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中国无产阶级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对于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是极其宝贵的，极其有力的领导。共产国际正是代表这种革命经验和组织力量的总机关，在他的领导之下，苏联共产党正在建设着社会主义，欧美一切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里面的城乡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正在日益团结日益增长，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劳动民众的解放运动，真正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和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都围绕着他的旗帜。

因此，做帝国主义走狗的国民党，自然对于共产国际非常之切齿痛恨。托洛斯基派在这里就给国民党一个“很好”的帮助。请看：

国民党说：共产国际在苏联实行的五年计划是资本主义的建设，是要对世界各国实行经济侵略，是要用屯并政策夺掉中国地主资本家的生意。托洛斯基派也说“斯大林派”的政策是十月革命胜利的消失，变成功富农的国家，进行着资本主义的复辟等等。

国民党说：共产国际是赤色帝国主义侵略东方民族。托洛斯基派也说苏联对于中东路问题^⑥的办法是侵略中国。在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时候，国民党做着帝国主义的爪牙，首先进攻苏联，企图挑拨起各国反对苏联的战争，而托洛斯基派

到处都宣传不要帮助苏联！

国民党说：共产国际曾经企图包办中国革命，等到“土地革命的政策行不通，煽动阶级斗争的阴谋失败之后，又说中国国民党反动。”（胡汉民^①的话）而托洛斯基派也说：共产国际“反右倾是强迫执行盲动主义的政策，反‘左’倾，是留作失败后之说话余地”（反对派告全党同志书）^②，——这就是“共产国际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之唯一的秘诀”。

这种谣言诬蔑，国民党立刻利用起来，在《光明之路》上就引用这些话来说：“像这样的国际领导机关，那里有一点资格配领导世界革命，实质上早已宣告破产了！”（《光明之路》第七期第三页）

国民党要放谣言，宣布“共产国际早已破产”，这是对于他们有利益的，他们要企图迷惑中国民众，使民众不相信共产国际的领导。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托陈派在这里就老老实实是国民党的走狗！本来，国民党的幻想是要中国民众根本反对共产国际，甘心做奴隶牛马，完全不认识阶级利益；然而最近几年革命的发展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了，——民众对于共产国际的信仰一天天的是在增高；于是国民党退一步想，指使一班走狗来冒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什么共产国际领导错了，说什么“在阶级利益立场上看来，中国工人正不可以相信共产国际，因为共产国际已经早已破产了。”——这班走狗就是托洛斯基陈独秀派。

三 托洛斯基陈独秀派的革命 消沉论和国民党的统治

托洛斯基、陈独秀的真面目，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都冒充着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派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时代自己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实行机会主义，等到那次革命失败，却来说什么“共产国际断送了中国革命”。这叫做死不要脸。当初陈独秀派为什么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呢？因为他们认为国民党能够完成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所以他们认为共产党用不着去领导无产阶级实行联合农民夺取政权的斗争，也用不着领导农民的土地革命。照他们的意思，共产党应当怎么办呢？他们说：应当让汪精卫实行分共政策，至后，中国可以有资产阶级式的民权自由，可以定定心心做些国会运动等等。这是要把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政党。陈独秀派的这种观念一直保存着，到一九二九年，陈独秀等就公开的出来说：“你看，从汪精卫直到张学良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了！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的革命完成了，封建势力已经只剩得余孽的余孽，国民党政权可以稳定、统一，而且将有长足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托洛斯基派以前在苏联用些“左”倾的空谈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直到现在还自称“左派反对派”。他们的“左”，“左”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的“左”原来就在于断定现在全世界都没有革命运动的高涨，全世界都是反动统治的日益

稳定。中国更因为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已经走进了两个革命之间的反动时期，中国国民党统治稳定而统一，应该做的不是团结无产阶级发展他们的经济日常斗争，领导他们的斗争到争取政权的斗争方面去，领导日益发展的农民战争，创造无产阶级领导的红军……，而是国民会议运动。这样，事实上是自称“左派”的托洛斯基自然而然的暴露自己真相，和一九二七年的中国机会主义的最右派的陈独秀走到一块去。他们事实上始终只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丝毫没有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气息。他们只在梦想着世界的以及中国的统治阶级快些稳定，给他们一点当议员做社会改良“事业”的机会。

这种机会主义，客观上不能够不很快的走到反革命营垒之中去。现在托洛斯基陈独秀派是已经走到了。恭喜恭喜！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一九二九年年底到现在一天天的深入，各国从德国一直到美国都在闹着恐慌，有些地方，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南美洲已经发现许多工人巷战，印度、非洲等处殖民地的革命运动都在开展、分化、深入。

这些情形是不是证明共产国际的观察呢？稍微顾一点事实的人，不能不说这是铁一样的事实。

中国呢？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是否统一了中国，完成了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呢？一九二九年年初开始的新的军阀混战——国民党的军阀混战，断断续续一直继续到现在，快要三年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剥削还在日益加重，国民党的统治是在动摇，一切种种资本家都赶紧依附投降

勾结各派各系的封建军阀，运用武力竞争的新式经营工商业的办法，方才能够勉强自存，而一般的中国工业就都在极深刻的危机之中，——这在没有出路的中国农业的根本危机的背景之上，在国际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的环境之中，是自然的现象。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继承着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伟大的革命经验，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肃清自己队伍里面的机会主义分子（如陈独秀之类），锻炼出新的领导，在这种客观条件之下自然不是去做什么国民会议运动，而是准备着自己的力量去争得工农民权独裁的建立——苏维埃中国的建立。极艰苦的大城市之中的工人运动，领导农民战争——红军的产生，苏维埃区域的扩张，都是这种准备的进行。这三年来的事实，是否是中国革命高涨的复兴呢？谁都不能有什么怀疑的，因为这是大家看得见的事实。

然而托洛斯基派陈独秀派却说：世界没有革命高潮，中国也没有革命高潮！“中国的革命是消沉”了！

这种事实连国民党都不能够否认了。国民党自己反对中国的工农劳动民众，“剿匪”哪，捉杀共产党哪，始终是越剿越多，越杀越旺。他们不能够不深刻的感觉到自己统治的动摇。国民党所最怕的正是无产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认识清楚这种客观环境，而团结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使他们自己的斗争很快的从自发的进到有组织的。因此，在这没有办法之中想出办法来了：这就是利用托陈派的宣传来淆乱工农群众的耳目。国民党的反共机关报居然也说：

“本来革命高潮是要一定的时期具备一定的条件才形成的，不是随时随地都发生的。但是共产党为要实行其不断的盲动政策，随时随地都瞎吹革命高潮已经到了，世界革命已经进入第三时期^①了。”……“尤其是信口胡吹，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了。”（《光明之路》第一卷第十期第二页）

国民党而说出这种话来，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不是不是，他们是照抄托陈派的文章的，在这些句子底下便引出了一大段托陈派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谣言。本来说起来是很可笑的：国民党忽然说“革命高潮”了。如果国民党自己承认是反革命的统治，那么，早就要请他们滚蛋；如果国民党仍旧是叫共产党是“反动的”，那么，这里所谓“革命高潮”应当是“反动高潮”了！这里的道理是：国民党自己的三民主义、训政时期、考试制度——造产建设等等的所谓“学说理论”，实在太说不通了，群众对于革命高涨的认识实在是一天天的清楚起来了，因此，国民党就用托陈派的话来说。这意思是讲：你们看——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托洛斯基、陈独秀，也说中国和世界没有革命高潮，你们快些不要暴动罢，不要干红军罢，不要闹苏维埃区域罢，快些来参加国民会议运动，劳资合作，提倡国货……！这倒要算是“聪明的”办法！这里，托陈派又是国民党的功臣。不过，还可以不算功臣，而算国民党的忠实信徒，因为：国民党说训政时期，托陈派也说统治阶级稳定，国民党召集国民会议，托陈派也在主张做国民会议运动……真正心心相应呵！所以说托陈派是国民党忠实信徒一点儿也没有错。既然是一家人，也就不便居功——他们的努力维持国民党统治——反对红军、反对示威……——正是三民主义

的忠实走狗应尽之义务了。

四 “盲动主义的过火”恰好是 国民党杀人放火的理由呀！

国民党的忠实走狗——托洛斯基陈独秀派怎么样替国民党尽义务呢？他们也来反对盲动主义了。然而我们要知道：盲动主义错误的一个来源，正是党内有些同志没有完全脱离托洛斯基主义^⑩的观点。托洛斯基主义的观点是：中国革命，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决不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一定要等待全世界大革命同时爆发。那么，如果某一地方的工农群众已经发动，斗争已经爆发，红军的战争已经开始，那时怎么办？——照托洛斯基主义的逻辑的结论，就只有二条路：一是放弃斗争完全投降，在工人罢工之中是妥协屈服，在农民战争之中是退守以至解散自己的队伍，这是右倾的机会主义；二是盲目的拚命，不顾群众的组织准备工作，用孤注一掷的办法，在工人运动之中就是儿戏的几个几十个几百个人的暴动尝试，在红军战争之中就是绝对不要根据地，不要准备从内地冲向大城市，从各省冲向武汉、上海，仿佛这样便会立刻引起全世界大革命的同时爆发来救中国革命，这是“左倾”的盲动主义。这种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机关曾经做过的——我们公开的承认，我们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已经纠正这种错误！——革命的先进的阶级决不隐讳自己的错误，他正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之中增加自己的力量，整齐自己的队伍，

向着胜利的前途走去。可是，托陈派所反对的盲动主义是什么呢？是不是这个盲动主义呢！当然不是，因为这种盲动主义部分的就是托洛斯基主义的变相。他们是不会反对自己主义的。他们所反对的盲动主义，却是他们造作出来的谣言：他们说共产党用强迫的方法和收买的方法逼迫群众去示威，他们说红军敲竹杠、强奸等等。这些完全是他们的造谣！

工人发动群众的示威，如何能够强迫，如何能够收买呢！？这很明显的——是这些托陈派当初在共产党内反对示威运动，结果多数同志不赞成他们的意见，他们就说：赞成示威的是得了钱了。这是何等卑鄙齷齪的政客手段！

红军的工作人员，红军的兵士如何会敲竹杠、强奸等等呢？各地的豪绅资本家和国民党要这样说，托洛斯基陈独秀也这样说！他们无非找着几百件几千件之中偶然的一件事实，偶然的一个个人的罪恶行为——苏维埃政府立刻要惩办或者已经惩办的行为，就说是整个红军的情形，好来证明他们的理论——不要游击战争，不要红军！这是何等明显的反革命！

果然，国民党把他们这些谣言引出来，立刻就下一个断语：

“以上所说，已经把共产党的罪恶，刻划得淋漓尽致，真如电影一般，一幕一幕的活现纸上，煞可观也。”（《光明之路》第一卷第十期第五页）

这意思是说：请看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托陈派也说共产党和红军的确是奸淫掳掠、收买匪徒、无由取闹的流氓，所以我们国民党用飞机、毒瓦斯炸死论千论万的这些工农是有理得很，所以我们国民党捉杀共产党工人，开枪轰杀示威民众

也是有理得很！大家想想，托陈派对于国民党的功劳是多么大呵！！

五 共产党组织力量“薄弱”，可是， 国民党和托陈党且慢高兴！

国民党在托陈派的赞助之下，拚命的摧残工农运动；他们的狗运气好的时候，破坏了些共产党的组织，他们勉强的表示高兴，引出托陈派的文章，来证明自己反革命的功绩。他们说：

“总上以观，可知共产党组织的薄弱，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之下，还有什么力量维持其存在！”（《光明之路》第一卷第十期第六页）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固然并不是大得了不得，好得了不得，——共产党自己绝对不吹这样牛皮，共产党天天是在切实的检阅自己的力量、缺点、弱点，艰苦的进行群众之中的各种组织工作。然而共产党的“薄弱”决没有像托陈派所说的那样无希望！

托陈派已经成了另外一个党——资产阶级走狗的党，他们和国民党一样，认为共产党是他们最主要的敌人，因此，他们竭力说得共产党丝毫也没有组织似的。他们梦想着用这种宣传动摇群众对于共产党的信仰，涣散无产阶级的力量，并且企图扩大自己的走狗党，替资本家尽力。他们企图用这种宣传散布悲观绝望的情绪，阻碍革命运动的发展。这种手段恰好对于国民党有点用处，国民党拿他们的话来“自欺欺人”。

“自欺”是安慰安慰国民党，说共产党快要消灭了；“欺人”是迷惑民众，说共产党已经不能维持其存在了，你们也死了心罢，不要革命了，安心做奴隶牛马好了。这里，托陈党的谣言又是好宝贝！

但是，你们这两个反革命的党，都慢些高兴！受托陈派欺骗的工人分子——极少数的人，现在已经了解陈独秀等的反革命的实质，而回到党里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正在日益进步的工作之下，日益密切的和群众联系之下，开始新的发展。国民党的欺骗，即使借用那些冒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托陈派的话，也是始终没有多大作用的！

六 国民党对于托陈党已经 钦赐“批评自由”了！

现在——我们看见国民党的特别专门反共杂志《光明之路》以及其他一切国民党刊物上面，时常很高兴很得意的转载托洛斯基陈独秀的大文章，——我们不能不回想起陈独秀等最早的态度了。一九二九年的上半年以后，直到那年年底，陈独秀说些什么？其余的托洛斯基派的口头禅又是什么？他们总是说：共产党里面是官僚主义的统治，没有自由讨论，没有自由批评。他们很要求“批评”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批评自由，他们反对所谓官僚主义。固然，共产党内有的时候有些地方可以发生官僚主义的错误，可是，这正是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竭力反对的。至于托陈派所反对的是什么呢？他们实际并不是反

对什么官僚主义，当他们能够执行他们的机会主义的时候，例如陈独秀当权的时候，都竭力企图实行完全十足的官僚主义，以保障其机会主义的顺利进行的。他们现在所反对的事实上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纪律！

无产阶级的政党的党员，本来是要团结得很紧，我们的道路是艰险的困难的，我们党员大家既然决定了走这革命的道路，自然就要有严格的纪律来团结我们，锻炼我们。我们的四周围都是仇敌，我们时时刻刻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我们联合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是极想自由的决定自己的道路的——决定要革命的，而加入党，这就是决定要和敌人斗争，而不是投降敌人，不是和敌人妥协。可是，党员之中有些人忽然跑出来，说：我们大家都去投降罢（解散红军，抛弃苏维埃的旗帜，参加蒋介石的国民会议，停止示威运动政治斗争）。党员的大多数反对他们，说他们几个人的主张是投降，是自己解除武装。而这班人却大叫起来：啊哈！你们是官僚主义者，你们禁止自由批评！自然哪，你们要妥协要投降有你们的自由！现在国民党已经钦赐你们这种自由了。国民党的报纸杂志转载你们的文章，引用你们的理论和谣言；总之，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随便你们怎样“批评”、造谣、谩骂、诅咒，你们已经得到国民党钦赐你们的极端充分的自由。你们的心愿达到了，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你们现在在国民党御用之下，帮着他们的大炮机关枪来进攻中国的工人阶级、中国农民群众、中国的共产党，运用你们的笔尖，信口造谣毒骂……大概比以前在共产党内“受着强逼”的做“违心之事”——赞助工农，为工农服务，

要来得舒服得多罢，因为现在这种地位，实际上的反革命地位，对于你们真是称心如意，一点儿不自由也不觉得了。

七 国民党口中的托陈派的立场

托洛斯基陈独秀派这样的帮助国民党，反对共产国际，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红军——和国民党异口同声的说红军是杀人放火的流氓土匪，反对工人——和国民党异口同声说工人示威是受共产党的收买，诅咒共产党的组织力量，说是“不能够维持其存在了”，骂共产党是官僚主义，禁止人家的批评……总之，托陈派在国民党的飞机、炸弹、枪炮、大刀、三民主义宣传之后，替国民党添一种反革命的工具，添一种进攻工农群众的武器。然而，国民党说：

“可知反对派——托陈派——和共产党是一个东西，……是分不开的，是二而一的东西。”（同上第一页）

这岂不是赏罚不明，恩将仇报吗？不然不然！如果国民党公开的称赞托陈派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说他们不是和共产党“二而一的东西”，那末，这些托陈派就丧失了他们的特殊作用了。国民党故意要说托陈派也是共产主义者，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然后才能欺骗群众，使群众相信他们的谣言。所以国民党故意说托陈派是和共产党“二而一的东西”，正是充分的运用这种进攻工农群众的特殊武器呀！

原载1931年11月10日《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6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张学良,见本卷第61页注④。

② 汪精卫,见本卷第61页注⑧。

③ 戴季陶,见本卷第147页注⑧。

④ 《光明之路》杂志,1931年3月创刊于南京。

⑤ 刘仁静(1902—1987),湖北应城人。1920年秋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作为北京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后成为托派,被开除党籍。

⑥ 1929年7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单方撕毁1924年的中苏协定,下令解除中东铁路苏联局长、副局长的职务,以武力手段占据中东铁路,驱逐在中东路任职的苏方人员,酿成中东路事件。7月14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取消关于中东铁路的一切命令,释放被捕苏方人员。1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中国政府绝交,撤回一切驻华外交、商务和铁路人员。10月,蒋介石下令东北军8万余人开赴绥芬河,进攻苏联,遭苏联回击而失败。12月,中苏互派代表,签订“伯力会议草约”(即“伯力协定”),中东路又恢复原状。

⑦ 胡汉民,见本卷第148页注⑬。

⑧ 反对派告全党同志书,指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等81人发表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⑨ 第三时期,见本卷第31页注⑬。

⑩ 托洛茨基主义,见本卷第62页注⑱。

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

一 中国人权派的“反对”国民党和政府

中国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之下，现在有一个所谓“人权派”^①。这些自称为“人权运动者”的大学教授胡适之^②、罗隆基^③等，在一九二九年写了好些篇文章，说了好些俏皮话，搭出了“反对政府派”的架子。那位罗隆基博士并且曾经被捕过一次——当然立刻就保释了，被捕而又保释之后，做了一篇“感想”，说了一大泡愤慨的话。最近，五月五日的国民会议开过了，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也颁布了——这本是一九二九年人权派的要求，那时胡适之说过：“我们的口号是：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论理，人权派可以满足。中国的人权运动大功告成了！然而不然，国民党的这种滑稽到万分的约法，太欺骗不了人民——人权派是知道的，因此，他们又发了一次传单表示反对那个约法。总之，他们的“反对政府派”(Opposition)的架子，还没有拆掉。

现在中国的政治是异乎寻常的黑暗，豪绅地主资产阶级

的统治是异乎寻常的露骨，民众一点儿自由也没有，一点儿“人权”也没有，有的只是挨打、挨杀的“权利”，和饿死、冻死、淹死、烧死……的“自由”。地主资本家自己，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自然而然的，必然的分成许多种式的集团派别互相竞争和抢夺，演成军阀混战。工人阶级、农民群众和一切劳动民众，正在不断的反抗和斗争；那不统一的散乱的中国地主资本家的阶级统治，正在肢肢节节瓦解，这里许多脆弱的地方就已经拆了台——豪绅地主资本家的统治推翻了，政权到了当地工农群众的代表会（苏维埃）手里。总之，目前的形势对于整个的帝国主义和中国统治阶级，实在是太没有乐观的根据。因此，不但民众方面，一般的反抗情绪天天在那里高涨，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分子正在走投无路的徘徊动摇，不满意，就是剥削阶级内部也就有很多的裂痕，互相的埋怨着，你说我是“赤祸”的罪魁，我说你是“造灾”的能手。一般的景象，是个剥削阶级手忙脚乱的样子。于是“人权派”的一些敲边鼓的议论和俏皮的文章，自然会有点儿的销路。甚至于情绪是革命的一些人，读了人权派骂政府的话，也觉得痛快，俏皮。

因此我们得问一问：“人权派为什么反对政府和国民党呢？”

二 “反革命大竞赛”之中 人权派的新鲜旗帜

中国人权派反对国民党和政府的原因，说起来很有

趣，——是为着国民党不会反共，是为着国民党反共还不彻底，是为着国民党快要不能够保障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了。中国的人权派表面上反对摧残人权，要求保障自由，实际上却并不是反对什么国民党，并不是反对什么压迫和剥削，而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压迫剥削的不得法——这是人权派的真面目。最近（《新月》杂志④ 第三卷第十期），罗隆基发表了一篇大文，叫做《论中国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这篇文章就把人权派的真面目完完全全的暴露出来了。

罗大人(Sir Lo Longki)不是被捕过么？人权派胡适之等等不是被国民党政府“警诫”过么？他这篇文章难道是为着要表明态度，刷洗自己的“共产嫌疑”而做的？不是！不是！假使我们这样说，未免太小看了罗大人们了。这有他们人权派的政治良心——阶级良心使他们做的。他们的反对共产并不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他们的反对工农民众是他们的阶级立场。

中国自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工农民众的革命运动不久又开始发展，到现在苏维埃区域的出现、扩大，红军的进展……共产党影响的日益增高，在一般的经济危机深入的背景之上，实在使整个的统治阶级感觉到死亡的危险一天天的接近。于是乎剥削阶级的内部出现日益紧张的“反革命竞赛”。

“反革命竞赛”是什么？就是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之中的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派别、每一批走狗，都争先恐后的表示只有他自己才是反对共产，消灭“赤祸”的能手，都在力竭声嘶拔

剑张弩的声讨其他各派“勾结”、“帮助”、“引起”共产的罪名。对付共产本领，早已成为谁应当统治的最主要的考试题目。一切种种反革命派在对付共产的问题上进行着极热闹的大竞赛：

孙传芳^⑤、吴佩孚^⑥、张作霖^⑦、张宗昌^⑧等却曾经声明他们是反赤最早。

西山会议派^⑨几乎要说他们“自始即反对国民党之改组”，“首揭国民党的反共旗帜”。

蒋介石戴季陶^⑩派说，没有我们的三月二十政变^⑪和四月十二上海的屠杀，国民党早已断送于共产党之手。

汪精卫^⑫张发奎^⑬派说，镇压广州暴动之功应归我有，而且现在再改组国民党，实行“民主主义势力”的大集中，方能根本消灭共产。

邓演达^⑭谭平山^⑮派说，我们反对第三国际干涉中国和束缚中国革命，同时抛弃已经不是欺人的国民党旗帜，而树立第三个“民众”的政党^⑯，共产自会消灭于无形。

托洛斯基陈独秀派^⑰实际也是说，列宁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已在深入民众，故必须假借“列宁马克思主义”之名，来反对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然后共产才会真正消灭。

这个热闹的反革命大竞赛里面，每一派都开出一张药方来，当做消灭共产的万应灵药。现在人权派的罗隆基大人，就把他们的药方整理起来清清楚楚的写了一篇文章。自然，人权派的这些药名早就已经说过，现在不过是综合起来罢了。因此人权派参加反革命大竞赛的旗帜也就格外鲜明了。

三 人权派替地主资本家想着的“出路”

中国人权派对于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和其他的剥削阶级的一切派别一样，抱着非常之悲观的态度。他们说：经济上……“兵事愈多，人民愈穷，人民愈穷，土匪愈起，土匪愈起，社会愈乱，社会愈乱，人民更穷……毕竟，穷乱，乱穷，……直到真正破产而止”，政治上……“已成的政府，不克维持，无形的政府，遍地林立，国家不求崩溃，亦必崩溃……稍有资望……的人民……杀戮逃亡，几已近尽。剩下一般市侩流氓，他们政见上朝秦暮楚，政绩上行险侥幸。……地方政治愈恶化，人民愈纷扰，毕竟政治上……立刻真正亡国而止。”“总之，国共相持的结果，在我们看来，亦有：（一）经济上的破产，（二）政治上的亡国”。这都是说“假使共产党继续蔓延下去，既不能完全成功，又不能立刻消灭”的话。如果假定共产党能够成功，“成为支配政局的势力”，那又怎么样呢？据他的意思，中国工农只能够打倒中国的资本家，而外国的资本家，可否动其毫末，是又成为大问题，他以为“英、美、法、日的共产革命未成功以前”，中国工农只能够在内地得到胜利，在大商埠上洋人要来共管。所以“结果，中国的内部，流氓共产；中国的商埠，洋人共管”。“洋人共管，流氓共产”这是共产党胜利后的局面，照他看来，自然这亦是破产亡国。再假定蒋介石讨共胜利，肃清了“红匪”，那时又怎么样？他说：“尽管讨共军得到胜利，湘、鄂、赣彻底肃清，然而余毒未尽，病根仍存，共

产党在中国，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样：（一）如果共产党的苏维埃运动继续蔓延，又不能成功，结果是“破产亡国”；（二）如果共产党的苏维埃运动“居然”成功，结果是“洋人共管，流氓共产”；（三）如果共产党的苏维埃运动“幸而”彻底肃清，结果，这仅仅是暂时的，始终又要有“共产”发生——仍旧是老套。可怜呵可怜！中国的绅士，中国的资本家，中国的一切大人老爷，竟这样的命苦吗？

罗大人说：——不要紧，不要紧，我有绝妙的方法。这个救命方法是什么？——就是第一，“在今日中国的状况下，为中国人求生路计，自然只有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古谚所谓‘两恶相权取其轻’即此意耳。然而国民党剿共工作的成败，有待于他们的策略。”因此，必须有第二个方法，就是：“（一）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二）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这两点做到了……共产党不剿自灭了。”

这里，罗大人自己说的清楚得很，不用代他再加说明：——人权派的所谓人权，其最主要的用处是在消灭共产。人权派的立场，整个儿就是忠告国民党说：要替帝国主义及中国地主资本家消灭共产，就必须采取我们人权派的主张；我们人权派主张的“自由”决不是要平民群众自己得到什么自由，我们人权派所主张的“自治”也决不是什么真正的平民群众的民权主义，这“自由”和“自治”都不过是豪绅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工农的更有效力的工具——比国民党的统治来得更加有效力！这就是人权派在反革命大竞赛之中的旗帜。

谢谢你，罗大人！谢谢你们，人权派！你把“自由”和“自

治”的真面目这样显露的标明出来，我们工农群众真是少吃几碗迷魂汤，不胜感激之至！

可是，中国国民党对于这些人权派，却不给他们以充分的发展可能。人权派这样忠心耿耿的替国民党上条陈，出计策，替地主资本家想出“剿灭共产”的办法，而国民党对他们，还是没有好脸色给他们看，所以人权派要大呼小叫，痛哭流涕长叹息的说经济上破产，政治上亡国……这真是“孤臣孽子”的“椎心泣血”。所以大家不要听见他们说什么“思想压迫，民情堵塞，走投无路的时候，发生与尔偕亡同归一尽之想”，就以为人权派怎么大胆的用革命来恐吓国民党。不是的，不是的。人权派是决不革命，誓死以反革命，而且是自命为最会反革命，真正能够消灭革命的专家呢！

四 人权派赞助屠杀的“聪明”方法

总之，中国人权派的立场，根本上是和国民党完全相同的。他们的所以反对国民党和政府，原来是只因为“国民党采用共产党的制度”。他们说：“如今国民党的组织，他的党治的策略，他的由党而产生出来的政府，那一项，不是师法共产党，抄袭共产党，整个的模仿共产党？”所以如果国民党放弃这些“师法”共产党的地方，人权派一定不但不反对他，而且要竭力拥护他。人权派的所以反对国民党，决不是因为国民党的政治是代表地主资本家的帝国主义走狗的政治，决不是因为国民党的政治是压迫和剥削工农民众的政治，而只是因为国民

党的“采用共产党制度”。

究竟国民党的党治是不是采用共产党制度，我们以下再说。

这里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人权派和国民党的分别，决不是根本的政治立场上的分别，而只是他们自己所说的策略上的分别。什么策略呢？他们自己也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就是“剿共工作……的策略”。

那么，这策略上的分别，是否是国民党主张用屠杀方法，人权派反对用屠杀方法呢？决不是的！国民党主张用屠杀方法，人权派亦馨香而祷祝屠杀的成功——罗大人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

“五十师大兵，五十万人马，主席出征，总长临敌，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国民党对剿共，总算慎重其事了。”

这几句文章，已经是对仗工整，声调铿锵，值得摇头晃尾的高声朗诵几遍，以表示人权派颂扬国民党的大杀人，大放火，大大摧残蹂躏真正的自由和民治的情调。何况罗大人还直说“只有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因此，我们断定人权派绝对不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绝对赞成国民党的枪炮、飞机、炸弹、瓦斯等等……的一切杀人方法，认为这些不但不违背“自由”和“民治”，而且还有所不及。人权派的反对国民党是反对他除屠杀政策之外，不会更精细的进行反革命的欺蒙人民的宣传政策。所以人权派和国民党的分别，所谓策略上的分别，只在于这一点。“分别”是有些“分别”，可是这个“分别”正是忠心耿耿的人权派，不辞劳怨，不避艰险的对于国民党的

直諫，这正是人权派努力帮助国民党屠杀民众的地方！

五 人权派所有的一些儿有限的常识

在有些问题上看来，中国人权派的确比中国国民党要聪明些，的确比国民党要有常识些，固然这点小聪明和小常识是有限的。比如，人权派对于共产党的力量和和群众之间的影响，就有点儿小识见。

国民党和一般肥头胖脑的豪绅，常常说“中国无产可共”，而人权派知道这是没有常识的蠢话。人权派知道“共产党所主张的是根本打破私有财产制，是生产工具公有制，中国虽穷，私有财产制存在一天，生产工具私有制存在一天，土地私有制一天……共产党之在中国就有发展的可能”！因此，人权派警告国民党和豪绅资产阶级，教他们不要自欺欺人，糊里糊涂的说什么“无产可共”的宽慰的话，教他们不要放心大胆，而要警醒起来，更聪明些更精细些进行更彻底的反共斗争。

国民党只知道造谣诬蔑说共产党杀人放火，说什么在苏维埃区域已经“实行共产”，人权派可知道这也是糊涂昏蛋自己给自己当上的蠢话。人权派知道：国民党“专制的中国，的确‘有权可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策略上很可利用的民众心理，这或者就是中国共产党可以成功的理由”！这里，人权派了解到现在的苏维埃运动，的确是中国统治阶级的很大的危险。苏维埃运动是工农群众自己起来拿到政权，这是工农民众要解除压迫和剥削的政治斗争，这是大多数“民众心

理”——政治觉悟上的领导方针。国民党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放任民众心理的“共产化”，懂得要为着苏维埃而斗争——为着工人、农民、兵士以及城市贫民自己选出代表来组织自己的政府而斗争，那么，这是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最大危险。无论你用多么怪诞的“共匪杀人放火，挖心肝，吃肚肠……”等等的笨宣传，也吓不退民众的“苏维埃化”。因此，人权派为国民党着想，为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着想，提醒这一点，劝他们早些实行所谓“自由”和“民治”，挽回这种“民众心理”的发展，还可以实际上更巩固的保障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保障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

六 人权派用“共产嫌疑”恐吓国民党

人权派反对国民党的党治，不过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过是因为要挽回中国地主资本家统治的崩溃，不过是因为要消灭工农革命。

所以人权派眼光里的国民党罪状，只是：“(1)国民党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孙文说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2)国民党采用共产党的制度(孙文的‘以党治国’);(3)国民党协助共产党实际工作(党衙门威权愈高，党主义威权愈低，党老爷声望愈大，党主义声望愈小。天怒人怨，众叛亲离，时日曷丧，及尔偕亡，在这之际，共产党利用人民心理，利用国民党弱点，乘机以进了)。”

这种议论，在豪绅地主资本家看来，或者也可以算人权派

在反革命大竞赛之中可以博得锦标的手段。可是，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值一笑。中国现在有好些地主资本家看见国民党不能够保障他们的利益和统治，看见国民党的反革命势力一天天的动摇，的确会这样抱怨国民党。这就是人权派的阶级背景。但是，在工农民众看来，罗大人的这种议论，不过是更加暴露人权派苦心孤诣的替国民党出计策保障国民党主义的威权和声望，更加暴露人权派苦心孤诣的替地主资本家出主意保障他们的统治罢了。

我们已经说过：人权派的小聪明和小常识也只有有限。这里就已经看得出来了。孙文说民生主义又名共产主义，这正是孙文的老奸巨猾。他想偷天换日的把共产主义换成一个不痛不痒的孔孟仁政的民生主义。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孙文的民生主义，就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罗大人说因为国民党的主义有这样的解释，所以播下现在“共祸”的种子。这真是罗大人老爷式的见解。事实上，工农民众只有了解一分国民党的主义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剥削主义，他们才有一分革命。凡是现在热烈参加革命斗争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这样。

再则，罗大人说，国民党的“以党治国”是学共产党的榜样，这尤其是天大的笑话。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冒充着模仿俄国，也是孙文、蒋介石的狡猾。民众的羡慕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真正得到解放，这种觉悟十年以来一天天的增长，使得国民党很早就抢着说：我们国民党也学俄国办法，他们想这样欺骗民众。其实，共产党绝对不主张以党治国！俄国的苏维埃政府是各级苏维埃选举出来，从市区和村镇一直到中央政

府，都是工人农民——总之，一切不剥削别人劳动的人民，真正普遍的参加选举而选出来的，绝对没有党的机关指定政府的事！

至于说国民党帮助共产党的实际工作，那么，这是罗大人们真正痛心疾首的事！国民党的政治是太不巧妙了，一天天的更加激起工农的革命。可是，这是历史的必然，没有办法，国民党的腐化政治，只有苏维埃革命能够推翻他。

共产党的党员，在俄国不但没有任何的特权，而且多负很多的义务，并且多加一重党所给他的责任。举一件极小的事来说：俄国一切非共产党员，不论是政府机关或其他社会团体的职员，可以拿到的薪水，是不受什么限制的；党员，就有一种“党员的最高限度。”——以前是二百五十卢布，现在是三百卢布。所以党员无论兼职有多少，至多只有这一点收入，即“升官”也无从发财的。这为什么可能呢？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每一个党员都是为着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工作，无产阶级是为着全人类的利益——创造将来的无阶级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而斗争。而国民党的党员，在中国却是老爷，是大人，可以是封建诸侯，也可以是市井流氓，可以是资本家，也可以是资本家的走狗。国民党的党员替天行道——替帝国主义和豪绅资本家执行政权，一方面压迫工农，别方面表演帝国主义豪绅资本家之间的互相争夺——互相争夺在工农身上榨出来的血汗。这些阶级，中国的豪绅地主资本家，在历史的道路上已经一天天的走近他们的死期，所以自然而然只有这些狼吞虎噬，奸淫掳掠，贪污卑鄙的代表——国民党

党员。所以国民党，为着要保证豪绅资本家之中的某一些集团榨取工农血汗的特权，只能够实行所谓“以党治国”。谁借假得着国民党机关和政府机关的名义，谁就可以多剥削一些；谁借假不着，谁就只能少剥削些。这是“以党治国”的真注。

罗大人：如果你愿意知道为什么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会发生在中国，我还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个理由。这就是你自己说的中国的“贫穷”。换句话说，就是中国豪绅资本家的“贫穷”。他们愈“穷”，就愈要互相争夺，愈要互相争夺，就愈要凭借所谓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他们没有英美资本主义初兴时代的余裕，“可以规规矩矩”的在“自由”的市场上实行“自由贸易”的竞争，可以在国会式的“老牌民治主义”的政治舞台上实行“自由政见”的竞争。

因此，你罗大人的苦心，永世也行不通。你罗大人罗博士，很迷信英美国的宪政学说——不流血的带着白手套的人权运动。可惜你罗博士投胎投晚了二三百年来，又投错了三四万里！你现在在中国来用“共产嫌疑”恐吓国民党，要他放弃党治，实行你的所谓“民治”，也不中用了。

七 人权派用“共产足以召共管”来吓人

中国现在的政治经济状况，很明显的表示着一种趋势，就是：如果苏维埃运动暂时不能够成功，那么，中国只有日益殖民地化——亡国破产，而只有苏维埃运动的胜利能够救中国，只有苏维埃运动战胜国民党，消灭国民党的统治，消灭一切种

种形式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独裁，而建立工农民权的独裁，才能够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压迫统治之下解放出来。苏维埃运动，就是把全国的政权交给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从市区和村镇起，由当地的工人、农民、红军，其他不剥削别人劳动的人，不论男女，一概绝对平等的参加选举，选举出来的代表会议就是当地的政府，这些市区、村镇、城市、省份的各级苏维埃，再选出代表来，召集全中国苏维埃的代表大会，就是全国最高的主权机关，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是中央政府。只有政权完全归在这种苏维埃手里，只有这种真正工农民众的政权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重新平均分配土地，没收外国资本家的一切企业，实行真正保护劳动的工厂法、劳动法——八小时工作制等等，并且严厉处置怠工破坏生产的中国资本家，一直到没收他们的企业……只有这样，方才能够把中国从经济危机和破产之中救出来。地主资本家在中国现在也闹“穷”，可是“穷”的只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日益破产的一些地主资本家。他们虽然“穷”，自然还有因为他们的“穷”而大大发财的少数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军阀、大官僚、大“党老爷”。他们虽然“穷”，他们还是要剥削工农，而且他们愈是“穷”，他们愈加要加重剥削工农。工农对于他们不能够比对于大地主大资本家有什么特别优待，所以他们的地位是十分“为难”。所以你们这班“穷”的地主资本家要想早些“脱离苦海”，只能够等着“永生西天极乐世界”！总之，只有消灭中国的封建余孽，消灭中国的土地私有，引导中国走上消灭资本主义的道路，才能够解决中国的经济危机。

罗大人怀疑着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能够“动摇外国在华资本家的毫末”。中国的工人阶级现在领导着农民战争，将来工人阶级在城市的大暴动，他的胜利的发展必然要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什么领事裁判权^⑨等等，必然要没收外国资本家的企业和银行。这是没有疑问的。罗大人毕竟是绅士，常识有也有限，他自然很怀疑中国工农有这样大的力量。他这种人根本也不会相信群众的力量。但是，我们只要举一件历史上的事实：汉口的英租界怎么收回的呢^⑩？这不是什么陈友仁^⑪的革命外交。这是武汉工人的群众力量，这是当时南部中国几千万农民革命斗争的力量。这还是在四不像的国民党左派政权时期。将来苏维埃的武汉、苏维埃的上海，那更不必说，帝国主义的力量固然是非常之雄厚，飞机大炮比现在国民党的军队自然还要强十倍百倍。但是，中国几万万劳动民众的真正动员一定可以战胜他们。中国的革命不用等待英、日、法、美国内无产阶级先行革命；中国的革命民众至少也可以直接在帝国主义到中国来的军队里面发生革命的影响。俄国苏维埃政府初初成立的几年，有过十八路的战线，抵挡过英、美、法、日、波兰等等几乎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国家。那时，英、美、法、日等国的革命也没有起来。可是，俄国苏维埃政府始终战胜了这些外国的反革命进攻，以及国内的白党。为什么？因为有真正群众的力量。何况中国最近的革命，正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欧战后的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已经大大的动摇的时候，各国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至少可以对于帝国主义的进攻中国革命加以牵制。

罗大人当然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这些，他这是以“共产适足以召共管”来吓人。前清时候的保皇党^②，如梁启超^③之流，早就用过“共和适足以召瓜分”的话吓过人。这些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的大人先生，企图预防革命消灭革命的手段，也只有这一点儿。罗大人始终没有在梁启超的技俩之外，想出什么多大的新鲜花样。

八 人权派原来也用“流氓土匪” 的口实反对真正的民权

再则，罗大人不但反对共产党的“党治”，而且以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才和干部人才根本不能掌握政权。共产党绝对反对所谓党治，这我们已经在上文说过。至于领袖人才和干部人才的问题，也不像罗大人所说的那么简单。苏维埃的制度之下，共产党将要是政治人才的学校，许多工人和劳动者能够得到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训练，在斗争的过程之中学习管理国家的能力。大人先生们自然是看轻工农，以为他们之中不能够有什么领袖人才和干部人才。可是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中国苏维埃区域现在已有的一些儿小小的经验，已经完全打破了大人先生们的成见。一九一四、一五年以前，俄国的绅士和资本家，梦里也没有想到现在俄国工人之中会产生这许多的人才。那时，除掉“地底下的”党人之外，很少有人知道列宁等等。就是到了一九一七——一八年，还有许多白党天天咒骂布尔什维克这些德国侦探、刑事犯、流氓、无赖……说

他们的政权至多只有六星期。但是事实是怎么样呢?!

自然，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就是罗大人的所谓人才，所谓领袖，所谓干部，另是一种解释。他自然只有绅士的眼光。他说：“目前共产党所谓的干部人才，大部分是中小学的青年男女学生……共产党的所谓下级人员，公开的说，大部分是市井的流氓，乡村的土匪。”罗大人自己首先向国民党提出警告说：“我们绝对不能这样轻视中国共产党，认一切相信共产的人，都是杀人放火的土匪。”这是他对国民党的忠心，教国民党不要轻敌。但是，他说了几句之后，仍旧是“流氓土匪”的滥调。在罗大人先生的眼光里面，下等人的工农兵士，究竟那一个不是流氓土匪呢?! 我们知道，罗大人是个西洋留学的博士，博学多能，不至于抄袭人家的文章。但是，有一件凑巧得很的事实：俄国二月革命^②之后有一军官说过一篇话，简直像罗大人这种议论的俄文译本，我现在也不必再把他“重新”译成中国文。我们很知道罗大人不致于抄袭成文，同时，我们也很知道罗大人的阶级立场使他自然而然的说出和俄国白党军官同样的词句。

总之，主张“民治”的罗大人，等到碰见真正大多数人的民权主义，劳动民众的民权主义，镇压豪绅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民权主义，他就自然而然的说：这是流氓土匪的“快刀砍头快枪杀人”。他不愿意知道：现在建设着社会主义的苏联，现在五年计划的业绩震惊着全世界的苏联，当初正是他所称谓“流氓土匪”的人才创立起来的。罗大人，请你看看苏联当初的“中小學生，流氓土匪”现在干的是什么样的建设事业，至少要比

你们这班博士教授们高明几千万倍呢?!

九 人权派的理想原来如此!

那么,罗大人的所谓“民治”究竟是什么样的民治呢?

这种“民治”是为着铲共的利益的一——这在上文已经说过。详细点来说明,就是:

(一)可以保持国民党的皇位——罗大人说,“英国的公园里,人民可以公开讲演打倒君主,直到如今,乔治第五^②依然是皇帝”,所以,照此推论下去,就是如果国民党准许所谓“思想自由”,这正可以使国民党经过二百年“依然还是皇帝”。

(二)可以使共产主义自行退落——罗大人说:“十九世纪中叶及末年,英国的共产运动,也确有端倪!后来费宾学会这班学者们出来……创造所谓费宾社会主义^③……共产主义自行退落。我们觉得这种剿共铲共的策略是最根本,最聪明,最敏捷的方法”。

(三)可以取消民众争取政权的“口实”——罗大人说,国民党一党专政,所以人民要求政权,所谓“有权可分”,如果说“民治”——取消一党专政,就可以说,一切民众都有政权了,不用争取苏维埃政权,这更加巩固了“国民党反共的立场”,消灭“共产党的口实”。

(四)可以增加“人民”积极加入铲共的机会——罗大人说,现在“一班党外的反共人民,热心的束手无策,悲观的坐以待毙”,如果说是“民治”,所谓“人民”——豪绅资本家一定

还要更加积极，组织团体，大大的参加铲共。

(五)可以团结“人民”拥护国民党的胜利——罗大人说：如今“人民不希望共产党的成功，他们却切望国民党的失败”。为什么？因为是党治。如果取消党治，“人民”不至于切望国民党的失败了，就不期待国民党以外的另外一个同是地主资本家的势力来铲共了，而能够团结在国民党的周围，切望并且帮国民党铲共成功了！

(六)可以巩固地主资本家的统治——罗大人说，“党治”独裁的结果，“自然是专政者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趋叛离，这就是如今共产党发展的机会”。如果取消党治，把现在的地主资本家统治改良改良，就可以使他稳定而巩固了！

请看，罗大人说得多么清楚：每一条都是替国民党打算，为国民党设想。罗大人的所谓“自由”和“民治”的目的是在保持国民党——帝国主义走狗地主资本家的统治。

这种“民治”和自由的内容也就可想而知的了。这不过是英美式的宪政，国会制度。照罗大人的口气，美国是一个理想的国家了：“美国是比较富足的国家，人民平均的财力，比任何国家的人民更高。共产党在美国发展机会，比任何国家更小。”人权派的大人先生们甚至于说美国差不多每家都有汽车（见《新月》杂志某期）。

这真是海外奇谈了。美国“人民”平均的财力，比任何国家更高；美国人民的自由比任何国家更大？政治上美国的“平等自由”，我们只要看一看辛克莱^②、哥尔德^③的小说就可以知道了：美国工人过的是何等惨酷的生活，何等的不自由，何

等的不平等！这些文学家是美国人，他们知道美国社会的深切，至少比中国人权派的几个美国留学生胜过一千倍。美国家家都有汽车的海外奇谈，只好去骗小孩子！

同时，我们知道目前的世界经济的事实：全世界经济恐慌日益发展，而苏联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有长足的进步。苏联不但没有一个失业工人，而且感觉到工人的缺少，而美国最近的官场报告，尚且说美国有七百万的失业工人，加上没有登记的失业工人，只做半工的失业工人，季候工人的失业工人，总数至少在一千万以上！这些失业工人的生活是困苦到极点。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所谓最理想的“民治自由”国家的成绩是怎样，而苏维埃国家的成绩又是怎样！

人权派的大人先生们，你们的“理想”不过如此！你们的理想，充其量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民治”——国会制度，带上一层民选的假面具的资产阶级独裁，更聪明更敏捷的剥削劳动者的政治制度。你们现在的实际作用，只是帮助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忠告国民党在屠杀之后还必须实行“民治”、“自由”的欺骗。你们还嫌国民党摧残工农的自由，剥夺工农民众的人权，太不彻底！你们说：“青年思想的左倾，红色刊物的增加，学校做共产领袖的训练所，书店做共产思想的媒介，这是政府的飞机、炸弹、手枪、大炮所不能摇动其毫末的。”言外之意，实在是不胜惋惜之至。所以要你们这些所谓“反共政府派”大呼小叫，鞠躬尽瘁的上这么一大套“剿共铲共最根本，最聪明，最敏捷的方法”的条陈！人权派的真面目实在暴露得清清楚楚的了。因此实行无情的反人权派的斗争，应该是中国工农革命民众

在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重要任务之一。

原载1931年11月10日《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9期

署名：秋白

注 释

① 人权派，又称民权派，见本卷第33页注①。

② 胡适之，见本卷第61页注⑨。

③ 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曾任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教授、《新月》杂志主编、北京《晨报》社长等职。1931年与张君勱等组织再生社，次年改组为中国国家社会党。抗战时期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从事抗日民主运动。

④ 《新月》杂志，1928年由胡适、罗隆基、徐志摩、梁实秋等在上海创办，1933年停刊。

⑤ 孙传芳(1844—1935)，字馨远，山东历城人。直系军阀后期首领。

⑥ 吴佩孚，见本卷第34页注③。

⑦ 张作霖，见本卷第34页注③。

⑧ 张宗昌(1881—1932)，山东掖县人。山东地方军阀，先后投靠直系、奉系军阀。

⑨ 1925年11月，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中的邹鲁、谢持、张继、林森、居正、叶楚伦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四次执监委联席会议，通过决议，反对共产党，反对苏联，反对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这批人当时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内一个极右派。

⑩ 戴季陶，见本卷第147页注⑧。

⑪ 三月二十政变，指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的打击和排斥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

⑫ 汪精卫，见本卷第61页注⑧。

⑬ 张发奎(1896—1980)，字向华，广东始兴人。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等职。1930年参加汪精卫的反蒋活动。1931年同李宗仁、陈济棠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宁粤统一后，随汪精卫到南京，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⑭ 邓演达，见本卷第34页注⑳。

⑮ 谭平山(1886—1956)，原名鸣谦，广东高明(今高鹤)人。早期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在中国共产党第三、四、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等职。曾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以后脱离中国共产党，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抗日战争时期，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策。1945年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8年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

⑯ 第三个“民众”的政党，指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见本卷第33、34页注㉑、㉒。

⑰ 托洛茨基陈独秀派，见本卷第30、33页注㉓、㉔。

⑱ 领事裁判权，见本卷第147页注㉕。

⑲ 1927年1月3日，武汉工人、学生集会庆祝北伐战争胜利，在英租界附近集会的群众遭英水兵袭击，死伤数十人。1月5日，武汉市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数十万人参加的大示威，示威群众驱逐英国巡捕，收回了英租界。1月6日，九江工人也收回了英租界。2月19日，英国被迫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定，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交还中国。

⑳ 陈友仁(1878—1944)，广东顺德人。1924年任孙中山秘书，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赴欧洲游历，1930年回国，任广州反蒋派国民政府的外交委员会主席，1932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因主张抗日，被迫辞职。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失败后赴法国。

⑲ 保皇党，即保皇会，全称为“保救大清皇帝会”，亦称中国维新会。1899年创立，康有为任会长，以保救光绪、反对慈禧和抵制革命为宗旨。1907年改名为宪政会。

⑳ 梁启超(1873—1929)，号任公，广东新会人。近代著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戊戌变法时的重要活动家。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先后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积极宣传西方思想文化，曾与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论战，反对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组织进步党，该党后改为研究系。

㉑ 二月革命，指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7年2月(俄历)，彼得格勒的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沙皇专制。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罢工很快转为起义，全国响应，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革命后，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资产阶级则在小资产阶级妥协支持下成立临时政府，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㉒ 乔治第五(George V, 1865—1936)，爱德华七世的次子，原在海军服役，1910年继父位为英国国王。

㉓ 费宾学会，即费边社(Fabian)，1884年在伦敦成立，以古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命名。所谓费边社会主义，原是英国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由费边社领导人韦伯夫妇、肖伯纳等人创立。

㉔ 辛克莱(Upton Beall Sinclair, 1878—1968)，美国作家。所写长篇小说《屠宰场》，描写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压榨工人的情景，并揭露了芝加哥屠宰场的不卫生情况，引起美国社会的极大关注。

㉕ 哥尔德(Michael Gold, 1894—1961)，美国共产党党员、工人作家，进步刊物《新群众》杂志主编。著有剧本《节日》、《战斗之歌》和自传体小说《没有钱的犹太人》。

巴黎会议和瓜分中国的阴谋

——进攻苏联的积极步骤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满洲事变^①发生之后，国际联盟^②在日内瓦的两次会议，已经大大的暴露了所谓国际正义公道的破产，事实上对于日本竭力偏袒。这对于无产阶级是丝毫没有什么奇怪的。最近，国联的巴黎会议更彻底的显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而且是联合进攻苏联的积极步骤。

当然，国联本来是一个国际帝国主义的联合会，他的一切裁兵、缩减军备、国际仲裁等类的把戏，都不过是用所谓正义和平的假面具企图掩饰列强自己准备战争，反对苏联，侵略殖民地的的事实。列强之间的冲突在这些假面具的掩盖之下剧烈的发展着；同时，他们共同准备进攻苏联的阴谋，更在一步一步的加紧。这次满洲事变，不过把这种内幕更加显露的表演出来罢了。日内瓦的两次会议，英法等国还装腔做势的要求日本撤兵，这其实已经是用国际公道的迷魂汤，来欺骗世界的劳动群众，替日本做个缓兵之计，替自己留个从容布置的地步。到了这次巴黎会议，大约这种必需的布置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于是英、美、法一致的绝口再不提起要求日本撤兵的

问题，反而表示要接受日本的提议：由国联派遣委员团来调查所谓中国问题。

这所谓国际调查委员团^③是个什么东西？……日本的提议，解释得很详细：一、委员团将要调查的，除满洲外，还要调查全中国的反日运动，抵制日货的运动，调查中国种种“匪徒”（“赤匪”当然在内），调查中国当局有没有力量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及引起目前危局的一般情势；二、调查中国之不履行中日条约下之义务，中国之排斥日人利益，及中日间其他千百种种之困难；三、委员团不得干涉中日直接谈判，且不得监视日军行动，要使日本有随意采行“防卫计划或酌量撤兵之完全自由”。这很明显的是个“筹备瓜分中国的调查委员会”！

所谓一般情势是什么？就是中国工农民众的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国联的调查委员团——英、法、美三国代表的任务，显然是要“研究”这一般情势：是否已经必须由英、法、美、日四国帝国主义直接来统治中国——瓜分中国。国民党的党国军阀虽然竭力屠杀民众，竭力用“镇静坚定”政策去讨好帝国主义，但是，他们的力量已经快要用尽，民众的游击战争，革命斗争以至于暴动反抗的力量已在天天生长。国际帝国主义想要跟着日本也来亲自动手了！日本还公开的声明：非中国承认二十一条^④“并另行订立新条约保障其满蒙特殊权益”，决不撤兵。而英、法、美同意日本提议的调查委员团，事实上就是同意这种原则，他们也各自都要来调查一下：是否可以叫中国和他们也是各自订立新条约，“保障”他们在华的新的权益。日本申明委员团不能妨碍日本军队行动的“完全自由”。

英、法、美同意这个申明，事实上也就是保留他们自己在远东方面军队行动的“完全自由”。

所有这些，都证明国际联盟所关心的完全只是“中国财宝的分配”，就是瓜分中国之中列强之间的分赃问题。这种分赃难得均匀所引起的冲突，并不像胡愈之^⑤等所想象的；因此，美国将要援引华盛顿九国公约^⑥出来干涉，英国、法国将要援引国际联盟会章程第十五、十六条来抵制日本。不是的！这种冲突，在现在的国际情形之下，只是催促列强加紧准备太平洋的大战。他们不要求日本撤兵，他们就是在准备自己也出兵。
满洲事变之后的两三星期之中，英、法、美的“军事界”偶然不谨慎的泄漏了些消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调动了，潜水艇队从青岛开到上海附近；法国驻在安南^⑦的军队大部分集中边境；英国的远东第二舰队将要集中华北……，自然，不久，各国的官场出来否认这些消息。那还用说么！自来是要否认的。军事秘密——是我们所不能知道的，这种调动武力的事实，现在一定更加紧张起来。此外，英国的某军官曾经亲自到上海军用飞机场测绘地图，因此“误会”而被中国军队捉住，随后又道歉释放。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列强在远东军备上的行动的万分之一的消息。现在，国联的调查委员团，正是积极预备太平洋大战瓜分中国的一步。

巴黎会议的另一方面的表现，就是列强积极准备进攻苏联的战争。美国对于满洲事变的态度，一直是十分暧昧；可是黑龙江省城失陷之后，屡次说到日俄冲突爆发的危险，这里的言外之意是很明显的，而且美国间接表示不放弃“门户公开”

政策^⑧之后，经过几次日美外交部的秘密换文，就不再做声，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也很容易猜得出来。不但如此，正在这个时候，美国代表提议不必限期令日本撤兵。国际联盟也正在日本军队进攻并且占据黑龙江的时候，正在日本向苏联挑衅的时候，议决不限期撤兵，国联会上对于黑龙江被占的事变，差不多一句话也不说。这种态度，当然很可以心领神会的了！总之，巴黎会议的态度，表示英、美、法、日正在积极的进行着进攻苏联的战争准备。

帝国主义的战争危险和进攻苏联的战争危险是在一天天的接近了！

原载 1931 年 12 月 3 日《红旗周报》第 25 期

署名：范亢

注 释

① 满洲事变，见本卷第152页注②。

②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它宣称以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国联于1920年1月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1946年4月解散。

③ 1931年12月，国联理事会会议决成立由英、美、法、德、意五国派员组成调查团，于次年3月来华调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件。这个调查团称为国际调查委员团，团长为英人李顿，故又称李顿调查团。

④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旨在独霸中国的秘密条款。全文共五号，二十一条。前四号

主要内容为：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以及日本在南满和东蒙的特权。第五号则要求控制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军事、财政等权益。袁世凯除第五号声明“容日后协商”外，其余都加以承认。由于中国人民一致反对，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

⑤ 胡愈之(1896—1986)，浙江上虞人。1914年入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工作，此后，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1928年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1931年归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中，团结进步文化人士，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建国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⑥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美、英、比、中、法、意、日、荷、葡九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共同签订了一项《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所谓华盛顿九国公约。公约提出“中国门户开放”、列强在华利益“机会均等”，主要反映了美、英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问题上的矛盾。

⑦ 安南，今越南。

⑧ “门户公开”政策，即美国国务卿海约翰1899年9月提出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美国要求列强开放在华租借地及“势力范围”，使其分沾侵略利益；还要求中国内地全部开放，使外国人享有投资权利。以后，美国一直推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政策，不断扩张其在华势力。

恭请列国联军！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国际联盟^①的巴黎会议和美国的华盛顿政府，对于日本占领东三省的事变，已经表明了充分袒护日本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在和日本共同商量瓜分中国的步骤。这对于中国小百姓是一点儿疑问也没有的了。而且这些国际帝国主义的匪徒，显然还要日本努力向苏联挑战，引起一些“反俄的借口”，好让日本长久占领着东三省，好好准备共同进攻苏联的战事。这也是很明白的了。

中国的当局难道不知道这种情形？当然他们也是很知道的。他们的政策，所谓宁粤^②一致的外交方针，正是适应列国帝国主义的这种阴谋的。

请看：日本占领黑龙江，——因为这是可以使中东路^③被四周围的日本军队包围起来，极便于进攻苏联的，所以当局曾经训令马占山^④“为保全实力起见，可以弃龙江而退守黑河”（中俄边境）。日本进攻锦州，捣乱天津，——因为这是违反日美密约的，这将要侵犯大英帝国的利益，所以当局提出在锦州一带设立“中立区域”^⑤，请列国联军驻守，而表示中国军队可以完全撤退到山海关以西。日本觉得美国的态度“硬化”，

于是声明撤退进攻锦州的军队——因为这或者是合于利益均沾、平均瓜分的密约的，所以当局立刻训令施肇基^⑥叫他“信任国联”，就是接受日本不限期撤兵而由国际调查委员团^⑦来调查中国情形的议决案。恭顺哉，中国之当局也！

庚子那年八国联军统治了中国北方大半年^⑧。那总算是昏聩糊涂的满清贵族闯的穷祸，那总还是八国联军打进来的。为什么要打才能进来？因为那时义和团的群众虽然是迷信，可是还在勇猛的反抗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联军，不打是不能够进来的。

现在呢，中国当局自己在恭请列国联军来统治所谓中立区域了。这是因为现在的当局比慈禧太后“更进步”了？因为他们有本事镇压住了民众，使他们镇静而不抵抗，合于“又忠又孝又仁又义”的党国主义？因为这样就可以等待“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无以存在于天下”的日本国自取灭亡？都不是的，都不是的！这还是因为现在的民众不迷信了，——这还是因为现在的民众，不管当局怎样压迫，不管宝山路上^⑨、永汉街前^⑩怎样流血，反帝国主义的抗日运动，反对信任国联的呼声，自动手逼得马占山抵抗的兵士群众，自己武装了起来铲除那些剥削民众，投降日本，卖身于国联的军阀，并且建立劳动民众自己的政府的运动——一天天的在扩大，一天天的在增多，一天天的更强盛起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局在恭请列国联军，来瓜分中国，来屠杀压迫民众，来好好筹备进攻赤匪，以及赤匪的祖国——苏俄。

日本军队进攻锦州，据说美国的态度硬化了。日本方面

的“舆论”就指斥美国不应当把美国驻日大使和幣原外相的秘密谈判泄漏出来，并援引这个谈判。可是，在这以前的三五天，正在日本占领齐齐哈尔的时候，美国首先在巴黎会议上提出不要限期叫日本撤兵，而且赞成日本的提议国际调查委员团的意思。齐齐哈尔和锦州，一样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那时候美国态度不硬化？这不是很明显的吗？那些已经泄漏了一些的日美秘密谈判的内容，就是：（一）日本应当做进攻苏俄的先锋队，向北满进展，包围中东路，——所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美国和列强可以帮助日本赞成日本不限期撤兵；（二）日本在中国应当和美国以及列强均分势力范围——所以要国际调查委员会来调查中国，以便协商瓜分的办法；（三）日本和列强应当协力扑灭中国的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所以国际调查委员会的任务，不限于调查满洲，而要调查全中国的抗日反帝运动以及“中国是否有能力保护外侨财产及生命”，调查所谓剿赤的能力。总之，这是瓜分共管的秘密谈判，整个巴黎会议也是瓜分中国、共管中国的帝国主义会议。

中国当局的外交方针正是欢迎瓜分，欢迎共管，欢迎列强来“镇静”民众，欢迎列强来假道讨伐赤匪祖国。因此，政府现在是在恭请国际调查委员会，恭请列国联军。

当局的真正方针是如此。

辛亥革命以前保皇党^⑩说“革命足以召瓜分”，这是混账王八蛋的话。现在的非混账王八蛋，就必须说：“不革命则必召瓜分！”而瓜分中国就是太平洋的大战。现在当局恭请的列国联军，现在当局不与抵抗的日本军队，不过是大战的前哨

罢了。

但是，这种事情是只能够做，不可以说的。所以嘴里说的总是一套“正义、公道、统一、和平、御侮、救国、效命党国，早具决心”等的把戏。

那些热心的青年，看不透西洋景的内幕的，自然还有许多幻想，许多希望，他们当免不了要失望，一次一次的失望。这原没有什么奇怪。本来只有真正的小百姓自己团结的力量，斗争的力量，才解决得了这个问题，才驱逐得了列国联军和中国军阀。至于那些青年，他们得自己决定：究竟站在那一方面？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怀疑的：就是“效命党国，早具决心”等话之下有一个“谕”字；这种字眼对于热心青年的侮辱，真可谓至高无上至大无外的了。居然受得了吗？

原载 1931 年 12 月 12 日《中国与世界》第 2 期

署名：樊梓生

注 释

① 国际联盟，见本卷第196页注②。

② 宁粤，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和以汪精卫为首的广东政府。参见本卷第152页注③。

③ 中东路，见本卷第148页注⑫。

④ 马占山(1885—1950)，字秀芳，吉林怀德人。“九一八”事变后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曾率部抗击日本侵略者。1932年2月，就任黑龙江省省长，不久在日军进攻下退出东北。

⑤ 1931年11月，日军进犯辽西锦州，国民党政府向国际联盟提

议,划锦州为“中立区”,由英、美、法、意派军驻扎。

⑥ 施肇基(1877—1958),字植之,江苏震泽人。曾任驻英、美公使。1931年7月任中国出席国联大会首席代表,“九一八”事变后,代表中国参加国联理事会。

⑦ 国际调查委员团,见本卷第196页注③。

⑧ 1900年6月,英、美、法、日、俄、意、德、奥八国为镇压义和团运动,联合组成侵略军,先后攻陷天津、北京,并继续北犯张家口,东进山海关,南侵保定,沙俄出兵侵占东三省。直到1901年9月,清政府与各国签订屈辱投降的《辛丑条约》后,八国联军除留一部常驻京津、津榆铁路线外,其余(除沙俄外)撤兵回国。

⑨ 1931年10月1日,驻上海北站的铁道炮队传令兵侯占元,因在宝山路上张贴反日标语,被警察殴打,激起群众抗议。上海市第五区公安局警察公然向群众开枪,造成宝山路血案。

⑩ 1931年10月10日,国民党广州市永汉路公安局局长杜煊泰,指使巡警枪杀在永汉路上销毁日货的群众,打死群众15人,伤80余人,造成流血事件。

⑪ 保皇党,见本卷第191页注②。

五年前是“到黄埔去”

——现在到哪里去？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

前两天《申报》^①上开了一个大天窗，底下是两个标题，说什么“中大学生闯入卫戍部，军警受伤若干人”等等。那一个所谓大天窗里空着一大块白纸，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好叫人猜想了大半天，几乎害了相思病。

前天的《申报》，在教育消息栏里，忽然泄露了一些天机：

“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三百余人抵南京……去卫戍部之学生代表已被当局扣留，该团学生当时异常愤激，当即由全体决议，出发示威，……各学生皆手执小旗，旗上皆写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口号。……

当时警察宪兵突然向前阻止……当时即有两三人被军警拘捕……双方正在交涉之际，示威大队之后方又到军警五六百名，当将全体包围，并将学生逮捕，一时秩序大乱，学生方面因前后受困，……军警人数太多，学生虽稍有抵抗，但在混乱之中被军警击伤者，不下七八十人，其中重伤者十余人，有一女生因一时慌乱坠入水沟中，因被两旁用石块掷击，受伤甚重……”

原来如此！

最近广州永汉路上枪杀民众^②，据汪精卫^③说是因为民众动手抢枪，并且发见反动传单。上海宝山路上枪杀民众^④，据游伯麓^⑤说是因为民众之中有反动分子，手持手枪击伤警士；一九二五年五卅南京路上枪杀民众，据工部局^⑥说是因为暴徒企图毆击巡捕。

现在，学生代表在南京被捕，据国民政府发出的消息，是因为口号反动，并且学生打伤了军警若干人。

这里真正是古今中外一律的老把戏，而且练习得非常纯熟的一套老把戏。

记得这些老把戏之中，还有五年前北京段祺瑞政府三月十八日一次大屠杀^⑦。

那次的请愿是为着日本对中国下了哀的美敦书，学生反对政府的卖国，反对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投降。可是，空着一双手的学生，究竟能够“打伤”几个全副武装的军警？“打伤”了又有什么用处？所以结果，还是学生被人打死了好几十个，打伤了不少。记得这样请愿之后，这样被屠杀，被毆辱，被诬蔑，被糟蹋，被玩弄，被讪笑，被……后，发出过一种呼声：

“到黄埔去！”^⑧

黄埔是去了。不久，上海武装暴动^⑨了。武汉打下了。汉口英租界也夺回了^⑩。

再不久，……

现在的黄埔还象征着什么？

它象征着的是：国际联盟^⑪的正义，无抵抗主义的光荣，臭汗和鲜血的腥气。

现在，无论诸葛亮的口才怎么好，无论诸葛亮的羽扇怎么大，无论诸葛亮怎么样舌战群儒，无论诸葛亮怎么样歃血宣誓，阿斗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一）提议划中立区^⑫，并请列强来驻扎军队的，是诸葛亮。

（二）提议天津交给国际列强共管的^⑬，是诸葛亮。

（三）承认日本不必限期撤兵并默认其有“剿匪权利”的，是诸葛亮。

——国际联盟的议决案，中国诸葛亮的代表已经表示接受，只就所谓“法理上”保留几点说明（见今日巴黎电讯）。

因为如此，所以又有请愿，又有示威。于是乎又有五年前的那样一套老把戏。当年还敢说：从今以后不干这种没出息的请愿了，当年还有这一点勇气。现在呢？现在把请愿两个字，改了示威了。当年还有黄埔可去。现在呢？

现在到国民革命军去？那是服从镇静无抵抗的总、副司令^⑭的。现在到马占山^⑮军队去？那是“遵照国府命令不得乘车”，要步行两个月再到黑龙江的，到了黑龙江还是要弹尽援绝，等于镇静无抵抗，一样的实行送命主义。现在到义勇军^⑯去？义勇军一样在镇静无抵抗主义的当局指挥之下，甚至于像某工厂义勇军，还要“以三民主义的精神宣誓不要求枪械”呢。现在到广东政府去？那是一丘之貉，也是诸葛亮化身。而且，这都和当年“到黄埔去”的精神根本不同。当年“到黄埔去”是为着要推翻北京政府。

现在呢？现在呢？！

现在只好“到黄埔去”！自杀、绝食，这是多么“勇敢”啊！

现在如果真有勇气回答“那里去”的问题，那就是真正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之下的道路了。大家想想罢，到那里去？

原载1931年12月19日《中国与世界》第3期

署名：樊梓生

注 释

① 《申报》，见本卷第147页注⑩。

② 广州永汉路上枪杀民众血案，见本卷第202页注⑩。

③ 汪精卫，见本卷第61页注⑧。

④ 上海宝山路上枪杀民众，见本卷第202页注⑨。

⑤ 游伯麓，当时任上海市第五区公安局局长。

⑥ 工部局，是帝国主义在公共租界设立的行政统治机构。

⑦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军舰掩护奉军军舰进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被国民军击退。16日，日本联合英、美、法等七国，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拆除大沽炮台设施等无理要求。18日，北京学生和市民集会游行，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政府下令卫队开枪，死47人，伤150余人，造成“三一八”惨案。

⑧ 1924年5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由此成为国民革命的摇篮地，全国革命青年纷纷投奔“黄埔”。

⑨ 上海武装暴动，指1927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的武装起义。

⑩ 收回汉口英租界，见本卷第191页注⑩。

⑪ 国际联盟，见本卷第196页注②。

⑫ 中立区，见本卷第201页注⑤。

⑬ 1931年11月8日，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组织汉奸便衣队向驻天津中国军队进行武装挑衅，并乘机提出撤退中国驻军、取缔抗日活动等无理要求。11月29日，国民党政府竟命令中国军队撤出天津，并提出由国际共管天津。

⑭ 总司令，指蒋介石；副司令，指张学良。张学良于1931年1月16日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职。

⑮ 马占山，见本卷第201页注④。

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武装抗日，东北各地人民和国民党一部分在东北的爱国官兵，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1932年发展到30万人，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1933年春，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抗日义勇军大部溃散。一小部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继续坚持战斗，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部分。

国民党的两个四全大会

——反革命的大竞赛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

中国国民党的两派，南京派和广东派，最近都开了所谓第四次的全国代表大会^①。国民党到了现在，至少已经死了一半，剩得个僵尸似的政党，内部分裂成了无数的小团体小派别，互相倾轧排挤。这表现着什么？这表现着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各派，各自附属于某一帝国主义，各自把持着某一个码头，某一块地盘，或者各自企图着夺取别派的码头和地盘——他们绝对的不能够统一，也绝对的不能够和平。南京派和广东派不过是两个大派别，每一大派之中还有许多小派别。南京的四全大会之下发现好些某某护党大同盟、某某护党救国联合会等。选举中央委员和监察委员的时候，某某省的主席，某某地方的大军阀，都拿出钱来大开宴席，包赁私娼，实行购买代表。简直和当初北洋军阀时代^②的猪仔国会^③，一般无二。广东的四全大会，更公然的分裂，汪精卫^④派，胡汉民^⑤派，西山会议派^⑥等，到现在还在纷争不已；退出会场的退出会场，宣布戒严的正在把持。这又像当初什么护法国会^⑦里的政友系^⑧、大孙系^⑨、小孙系^⑩的打架，所有这些，都充分表

现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的分崩离析。

自然，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工农运动发展，苏维埃革命的进展的反映。日本的进兵满洲，国际列强的加紧准备战争，——反对中国革命，进攻苏联的战争，使他们在中国的走狗——地主资产阶级的各派都格外忙乱起来。工人阶级所领导的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正在剧烈的开展出来。所以地主资产阶级的各派都抢着表现自己的“本领”，大家很起劲的比赛着，谁是帝国主义的最有用的走狗，谁是最有屠杀本领的刽子手，谁是最会欺骗民众的骗子，……目的都是在重新瓜分中国的形势之下多抢着些好地盘。总之，南京和广东的两个四中全会，是个走狗比赛的跑狗场！这真是“反革命大竞赛”的拿手好戏。

第一种竞赛，是卖国的竞赛。南京四中全会的时候，蒋介石、戴季陶^①、于右任^②等等领袖，对于“外交方针”是一句清清楚楚的话都说不出来。可是，内幕的秘密谈判一天天的显露出来；过不了几天，卖国老手的顾维钧^③就署理了外交部长，中国当局自己提议恭请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军驻扎到锦州一带，在中日之间设立所谓中立区域。广东的四中全会之下，就有陈友仁^④的外交方针的宣言，这宣言虽然说得隐隐约约，可是主要的意思是掩盖不了的；就是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权，答应满洲的一切铁路都由中日合办，答应日本享有满蒙土地的商租权……这样“立刻可以恢复中日亲善”。自然，这是南京和广东互相抢着表示“信任国联”^⑤，抢着投降日本。他们对于外交问题的一些空话是一钱不值的；南京和广东的四全大

会的对外政策，实际上只是卖国竞赛罢了。

第二种竞赛，是屠杀竞赛。南京的四全大会之前，蒋介石曾经调了三十万大军“御驾亲征”的去进攻红军。南京统治之下，天天屠杀革命的工农和共产党员，用尽了一切卑鄙龌龊的手段。可是，三十万大军不能够消灭红军。因此，四全大会上许多鄂、豫、赣、湘的豪绅地主代表，很起劲的商量着第四次、第五次进攻红军的计划。广东的四全大会呢？他们正为着蒋介石打不了红军，大声疾呼的申斥他的这个罪状。所以广东的四全大会特别提出“铲除赤匪”的议案。当然，广东统治之下的革命工农，也在天天的被屠杀。这两个大会上的“剿赤呼声”，无非是互相抢着表示自己的屠杀本领，压平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本领。这是国民党两大派的屠杀竞赛。

第三种竞赛，是欺骗竞赛。南京的四全大会，正碰着日本军队大举进攻黑龙江的时候，蒋介石居然声言“立刻北上”，仿佛真要“为国牺牲”，对日宣战似的。于是乎广东方面的张发奎^⑩也就大发宣言，说要赶到满洲去抵抗日本。这些装腔做势的丑态，居然可以欺骗中国的市侩，可是也不过三四天。至于工农群众实在看得太多了，杀掉他们的头，也是不容易相信的。至于蒋介石的什么和平统一，汪精卫的什么民主政治，南京的什么经济建设，广东的什么整理财政，……都是一派胡说，完全想欺骗民众的。南京和广东的国民党军阀政客，他们能够实现什么统一民治，能够“按照预算整理财政”，能够实行“交通经济之建设”么？！这完全只是双方抢着欺骗民众的欺骗竞赛。

南京和广东的这种反革命竞赛，就是两方面拚命的挣扎，抢着做帝国主义的走狗，请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看看我们这一派能够“讨平赤匪”，能够骗得民众镇静而无抵抗，能够适应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政策。他们两派互相竞争着，正因为他们双方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孙文的三民主义；按照这个孙文主义，应当依靠外国资本来发展中国，所以要请联军共管和英、美、法、日来瓜分中国；按照这个主义，民众是阿斗，党国要人是诸葛亮，所以一切政权要归党国要人，而要求政权的民众应该被屠杀；按照这个主义，“民族高于一切，工农阶级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所以应该严禁罢工怠工，杀戮工农群众，还要用刀搁在工农的颈项上，叫他们努力增加生产效率。这个共同的基础——孙文的三民主义，在两派的四全大会上，都同样的发扬光大了！

可是，南京和广东的两派国民党在反革命的共同基础上的这种竞赛，也正表现着反革命营垒的分崩离析。表面上，两个大会是为着所谓和平统一而开的。但是，事实上是在准备战争。蒋介石的四全大会闭会辞里，说什么岳飞出征，秦桧在后面掣肘，他对着请愿学生说，对日本要战要和都得“先安内然后攘外”，说广东政府不取消，无论和战在外交上都是没有办法。这明明是准备着打仗，明明是企图要人家赞成他进攻广东的一班“秦桧”。可是，广东方面也同样的聪明，广东的四全大会也说“必先安内然后可以攘外”，所以议决要讨伐独裁军阀的蒋介石。这都是军阀混战的先声。两派反革命的国民党，正在从“和平的”走狗竞赛，走向抢夺肉骨头的“走狗打

架”。这就是国民党的两个四全大会的“意义”。

原载1931年12月10日《红旗周报》第26期

署名：范亢

注 释

① 1931年11月12日至2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1月18日至12月5日，胡汉民和汪精卫也在广州、上海举行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就是国民党两派——南京派和广东派同时召开的两个四全大会。

② 自袁世凯取得大总统职位，北洋军阀集团控制中央政府和全国大多数地区，至1928年奉系军阀倒台为止，史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③ 猪仔国会，即曹锟国会，见本卷第66页注④。

④ 汪精卫，见本卷第61页注⑧。

⑤ 胡汉民，见本卷第148页注⑬。

⑥ 西山会议派，见本卷第190页注⑨。

⑦ 护法国会，即非常国会。1917年8月，150余名国会议员响应孙中山拥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的号召，在广州开会，组织护法军政府。因不足法定人数，故称“非常国会”。

⑧ 政友系，即政学系。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张耀曾、李根源、钮永健、谷钟秀等为代表的—一个官僚政客集团。1917年南下参加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同国民党右派联合，勾结西南军阀，掣肘孙中山。

⑨ 大孙系，即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派。

⑩ 小孙系，即以孙洪伊为首的一个派系。孙洪伊(1870—?)，天津人，字伯兰。曾任直隶咨议局议员，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众议院议员。1914年反对袁世凯解散国会图谋帝制。1916年11月在上海组织“宪法商榷会”。1920年直皖战争后在旧国会中被称为“小孙系”首领。

⑪ 戴季陶,又名戴传贤。见本卷第147页注⑧。

⑫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陕西三原人。早年参加同盟会,从事民主革命活动,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

⑬ 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江苏嘉定人。1919年和1921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曾担任国际联盟执行委员。1922年至1926年先后担任北洋政府的外交部长、财政部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李顿国联调查团。

⑭ 陈友仁,见本卷第191页注⑳。

⑮ 国联,见本卷第196页注②。

⑯ 张发奎,见本卷第190页注⑬。

注意巴黎会议的结果

——瓜分中国和进攻苏联的急进步骤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巴黎会议^①的结果，明明白白的是瓜分中国和进攻苏联的急进步骤。国民党的南北当局^②和各地党部，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竭力的尊重国联，还居然认为国联议决案是主持国际公道：“派调查团是为着就地考察日本无理侵略的实在情形，这就可以显得中国方面为着维持国际和平是何等忍辱负重，正义始终要战胜强权。”（国民政府某要人的纪念周演说）所以，国民党是参加瓜分中国的密谋，实行卖国的罪魁，并且也是努力帮助进攻苏联的罪魁。中国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自己的力量，调动极广大的劳动群众——农民、兵士、红军，为着完成苏维埃革命，真正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之下，而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的苏联实行决死的斗争。

当巴黎会议开会的时候：（一）国民党政府自己提议可以撤退锦州的驻军，而请国际列强驻扎兵队，成立所谓中立区；（二）国民党政府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捣乱，自己提议请国际列强共管天津；（三）国民党政府已经遵守美国的上谕和日本公使重光葵^③直接交涉，预备订立秘密协定，仿照济南惨

案④时候的办法(解决济南惨案的秘密协定至今没有公布)。这三件事情,暂时都还没有实现。然而,这是不是国民党改变了卖国政策呢?绝对不是。第一件事情的没有实现,是因为日本要独霸满洲,拒绝这种提议。第二件事情的没有实现,是因国际的列强连日本也在内,还没有协商妥当,彼此互相猜疑。第三件事情,是因为日本对于南京后台老板的美国所提出的解决满洲问题的秘密条件,还没有同意,所以直接交涉暂时搁浅。固然,国民党政府在全国民众示威潮流之下,有些慌乱和害怕——害怕卖国卖不成。他乐得借此掩盖事实的真相,否认这三件事实,企图用欺骗的手段缓和民众的愤激。其实,这三件事实,绝对掩盖不掉的,所以没有实现的缘故,还是因为国际列强以及日本之间正在发展事实上极端剧烈的冲突和矛盾。

巴黎会议的时候,以及巴黎会议之后,英国的态度显然是反对着日本的,英国的所谓舆论就非常注意远东英国资本利益的安全问题。巴黎会议之后,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⑤就发表演说,痛骂日本违反九国公约⑥等等。这很明显的是:美国资产阶级开始在政治上准备太平洋大战,虽然还是很谨慎的,然而却是很致细的准备。单是这两个例子,就可以证明列强因为日本的首先开始实行瓜分中国,都在积极调动自己的力量,来抢夺中国这块肥肉。列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正在加紧的发展着。

然而,现在尤其重要的是:国际帝国主义一致的侵略中国,一致的进攻苏联,而国民党就努力的在帮助他们进行这种

阴谋。

巴黎会议的结果，虽然没有设立锦州中立区，虽然没有决定共管天津，可是，明白的决定了：（一）日本的撤兵无期的延期；（二）中国应当与日本直接交涉以求得最后的解决；（三）国际调查团调查中国情形。国民党政府接受了这个决议案——施肇基^⑦虽然声明“保留”了某几点，可是完全是欺骗中国民众的“内交”手段，那种“保留”外交上是没有丝毫价值。

巴黎会议的这个“一致通过”的议决案的意义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列强承认日本的占据满洲，同时就是承认列强其他各国同样的权利来占据别的地方。果不其然！巴黎议决案通过了不上一礼拜，法国就增加了三千军队到广西、云南的边境。英、美当然也在同样准备着。例如美国最近在菲列宾大杀独立党^⑧，就是“巩固后方”的步骤。法国和英、美的占据领土，也和日本一样，可以援例“直接交涉”——就是和国民党政府订立秘密协定。列强的瓜分中国的步骤之中第一步就是国际调查团来“调查中国情形”。他们，甚至于德国，都抢着要求自己特派代表，而且都在拨还殖民地问题的专家。

巴黎会议的这个议决案，还包含着一条没有写出来的条文，就是要求日本在远东方面做进攻苏联的先锋队，因此，所以巴黎会议上一句也没有提起日本的占领黑龙江。而巴黎会议之后，日本在哈尔滨建筑飞机场的消息，使在中东路附近准备战争的步骤，一天天的紧张起来。而日本政友会新内阁^⑨成立，特别任命“留俄十四年的俄国通”荒木做陆军总长。这种进攻苏联的急进步骤，当然是国民党政府所积极参加的，因

此，他在列强一致的命令之下，极端恭顺的把满洲双手奉送给日本，让日本可以在进攻苏联必经之路的满洲从容布置。

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了。中国的劳动群众，农民、兵士、贫民——革命的学生群众，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坚决的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和进攻苏联，创造苏维埃的中国，然后才能够把中国从帝国主义之下真正的彻底的解放出来！

原载 1931 年 12 月 17 日《红旗周报》第 27 期

署名：范亢

注 释

① 巴黎会议，指1931年11至12月在巴黎召开的国联理事会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英、美、法、德、意五国组成国际调查委员团，调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件。

② 指汪精卫、胡汉民的广州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

③ 重光葵(1887—1957)，1929年任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兼公使馆参事官，1931年“九一八”和1932年“一二八”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1942年任驻汪伪政权“大使”。1945年以外务大臣资格代表日本政府签署对盟国投降书。1947年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判刑7年，监禁3年即被释放。

④ 济南惨案，见本卷第31页注⑧。

⑤ 指罗斯福，他在1932年美国大选中被推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⑥ 九国公约，见本卷第197页注⑥。

⑦ 施肇基, 见本卷第202页注⑥。

⑧ 菲列宾, 今译菲律宾。独立党, 即菲律宾国民党, 1907年3月成立, 公开主张脱离美国独立。

⑨ 政友会是立宪政友会的简称, 日本资产阶级政党, 1900年由伊藤博文领导成立。日本新内阁指犬养毅内阁, 即由政友会组成。

南京新政府的下马威

——十二月十五日枪伤三十多学生的大屠杀！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蒋介石下野^①了，据吴铁城^②说，这是“开万世太平之基业”。这所谓“太平”，大概是杀尽“不安分的”工、农、兵士、贫民，维持正在危险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了。可是，这显然是国民党的妄想！中国劳动群众和革命的学生，他们反对日本占据满洲、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瓜分，这种反帝国主义斗争正在高涨，中国苏维埃的革命运动，正在猛烈发展。代替蒋介石的无论那一派地主资产阶级，一定要和蒋介石一样，被红军打得“大败而逃”，他们绝对没有能力遏止正在爆发的各地革命斗争。

这所谓“太平”，大概也是说实现了“分治合作”，“均权共治”，由各派国民党政客军阀“和平的”割据，请列强帝国主义“和平的”瓜分中国——接受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零星拍卖。这当然是国民党无耻的欺骗。帝国主义的列强之中，日本已经首先用武力实行瓜分，法国已经进兵到中国的广西、云南，英、美也在积极准备太平洋的战争。日、英、法、美的中国走狗——国民党以及非国民党军阀、政客，各派各系的地主资产

阶级，正在新的形势之下互相抢夺地盘，互相争持着对于工农民众的剥削权。蒋介石下野的通电说得明白：“胡汉民同志的微日通电^③，且有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这里显而易见的是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④、张学良^⑤等争权夺利的把戏。

可是，汪精卫等等却大吹大擂的说什么实现民治，推倒个人独裁，还有许多“结束训政，实现宪政，召集国民救国会或国民代表会”的鬼话。国民党要把蒋介石下野这件事说得这样活龙活现——仿佛民权主义的新政府立刻涌现了，这是因为他们要欺骗民众，要遏止革命运动的发展。南京新政府的成立^⑥，仍旧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仍旧是在准备着新的军阀激战，仍旧是努力进行卖国外交，——赞助国际联盟瓜分中国的阴谋，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最近，民众反对宁粤各派的国民党，革命的潮流一天天的高涨。宁粤合作的新政府很清楚地感觉到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运动，所以要有汪精卫、邹鲁^⑦、孙科^⑧等等一派人，出来玩些立宪政策的把戏，他们以为号召什么国民代表会（国民救国会），就可以诱惑民众，阻碍民众的革命化，抵制苏维埃运动的影响的猛烈的扩大，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用国民代表会的“民意”，去诚意接受国际联盟瓜分中国的议决案，去和日本直接交涉，实际承认比二十一条^⑨更残酷的条件。他们——南京的新政府企图用立宪的幻想，来阻止革命的发展！这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现在必然要玩的一套把戏！

可是，这种立宪政策在现在的情形之下，比任何时候都更

加必然的是屠杀政策的装饰品。空谈民治正是为着要更加残酷的施行屠杀。

果然，蒋介石下野的当天——十二月十五日——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里就用机关枪扫射学生代表的群众，当场打伤三十多人。上海的各大报，在国民党各派的指挥和监督之下，自然掩蔽这种消息，不肯发表，反而说学生方面首先开枪，说学生打着红旗叫着反动口号。

然而事实总归是事实。上海的外国文报纸，以及中文报纸的字里行间，已经足够我们认识事实的真相，即使不完全，不清楚，也至少可以证明南京新政府的第一天的政绩，就是实行对于革命的学生大施屠杀。汪精卫、胡汉民、林森^⑩、陈铭枢^⑪……的政府，对于中国的民众，实在和蒋介石的政府，是一模一样的白色恐怖的法西斯蒂政府，而且还说些民治宪政的鬼话来欺骗民众。

沪宁的卫戍司令早已是陈铭枢了，而陈铭枢是宁粤之间的主要调人，是广东派的“实力”，开始屠杀的责任，直接就应当由陈铭枢负担，而一般的说，自然主要是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等宁粤合作的新政府负担，这就是孙文主义的一切种种派别的国民党负担。如果上海的民众法庭要求审判陈希曾^⑫、陶百川^⑬，那么，全中国的工农民众要求审判整个儿的南京新政府，连同四月十二上海屠杀以来的一切屠杀案，要求审判整个的孙文主义的国民党，中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必然接受工农民众的这种要求，而宣布国民党的首要干部，不受苏维埃法律的任何保障，全国民众得随时逮捕就地正法！

南京屠杀之中，上海各大报说蔡元培^⑭、陈铭枢受伤，说学生群众是暴徒乱党。中国的工人阶级和一切民众都知道：以前有曹、章、陆^⑮，最近有王正廷^⑯，都因为卖国而受着群众的这种小小惩罚。蔡元培、陈铭枢现在受着的惩罚，比起他们应当受的处置来还是极其微小的。可是，革命的民众更应当知道：日本的侵占满洲，帝国主义列强的进行瓜分中国，都是由整个的国民党和他一切中央地方政府赞助的，这里的问题不止于几个人；中国几万万的劳动民众现在过着牛马奴隶似的生活，剥夺了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天天受着屠杀、剥削、压迫，也是因为整个的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经过国民党而统治着——就算是经过国民代表会、国民大会、国民会议来统治，也是一样的。因此，工人、农民、兵士、贫民——革命的学生等等，都应当更进一步，——团结组织起来，为着自己在工厂、兵营、农村、学校里的切身利益而斗争，拥护中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⑰，各自在当地准备自己的武装，准备成立当地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努力斗争，去推翻整个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夺取政权，创造劳动民众自己的国家。只有这样，才能够抵抗得住日本和列强的瓜分，而真正完全的彻底的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之下。

南京的新政府现在说学生方面首先开枪，叫“反动”口号等等，这是：（一）国民党自己故意派遣包探奸细在群众之中来开枪，以造成屠杀日的“口实”；（二）国民党还利用有些学生怕戴所谓“反动”的帽子，所以抓住了几张共产党的传单，就大吹大擂的说应当严厉的惩办。全中国的群众都要了解：国民党

新政府现在的这种计划，是要造成极大的全国的屠杀，摧残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一切真正革命分子，以及大批的劳动群众，为的是要平平稳稳的遵照着国际帝国主义的任务来实现瓜分中国和进攻苏俄的阴谋。因此，一切革命的民众必须立刻起来反对南京的屠杀。必须指出：共产党绝对的有散发传单、演讲、召集会议……的权利和自由，而且一切革命的群众都绝对的有置备武装的自由和权利，——不承认政府借以“共产”、“反动”、“红匪”，就可以任屠杀，愿全中国的劳动群众都要提出这口号，立刻起来示威，用自己的团结力量，用自己的组织力量，来答复宁粤合作一致投降日本、一致赞助国联瓜分中国、一致压迫民众的南京新政府的屠杀！

原载 1931 年 12 月 17 日《红旗周报》第 27 期

署名：范亢

注 释

①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各界强烈不满。1931年12月15日，他被迫发表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职务，宣布下野。

② 吴铁城(1888—1953)，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当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曾作为南京政府代表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同广东政府的和平统一会谈。1932年1月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

③ 1931年12月5日(微日)，广东国民党四大会所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由胡汉民领衔发表了一个要求蒋介石下野的通电。

④ 汪精卫,见本卷第61页注⑧。

⑤ 张学良,见本卷第61页注④。

⑥ 南京新政府,即蒋介石下野后,国民政府经过改组成立的宁粤统一政府,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院长。

⑦ 邹鲁(1885—1954),字海滨,广东大埔人。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任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1925年成为西山会议派骨干。1932年后任中山大学校长。

⑧ 孙科(1891—1973),字哲生,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921年任广州市长,1925年任国民政府委员、代理广东省长;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1927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建设部部长、财政部部长、铁道部部长、行政院院长等职。

⑨ 二十一条,见本卷第196页注④。

⑩ 林森(1876—1943),字子超,福建闽侯人。1912年任南京临时参议院院长,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成为西山会议派骨干,1927年后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1932年起任国民政府主席。

⑪ 陈铭枢,见本卷第95页注⑬。

⑫ 陈希曾,当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⑬ 陶百川,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

⑭ 蔡元培(1868—1940),号子民,浙江绍兴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学术研究与学术民主,主张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192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著作编有《蔡元培全集》。

⑮ 曹章陆,指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曹汝霖,见本卷第153页注⑦。

章宗祥(1879—1962),字仲和,浙江吴兴人。1918年段祺瑞执政时,任中国驻日特命全权大使,在此期间,出卖山东主权,向日本签押借

款。五四运动时，北京政府被迫将其免职。

陆宗輿(1876—1941)，字闰生，浙江海宁人。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大使。后任币制局总裁。1919年五四运动时被免职。

⑯ 王正廷(1882—1961)，字儒堂，浙江奉化人。1928—1931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九一八”事变后，因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遭到公众舆论尤其是学生的反对，1931年9月辞职。

⑰ 中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举行的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又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全国工农兵政权的最高领导机关。

流氓政策和立宪政策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满洲以来，中国当局的真相一天天的露出来。民众的热血沸腾！虽然这四年来，血已经流得不少，可是，民众的血是流不尽的。民众的血终究要洗清地主资本家的狗窝，终究要冲掉日本帝国主义的枪炮和军舰，冲掉一切帝国主义的压迫。

当局的党国实在坍台坍得不堪了。党国的衙门，在上海，在杭州，在太原……最近都给民众捣毁了。请愿的恭顺游行，变成了全国的示威的风潮。

平常的拿手好戏——屠杀政策，一时竟有点儿难于奏效。固然天天还在搬演着这种老戏，可是，实在不大够用了。于是乎又做出些新鲜花样——流氓政策。指使流氓来硬打硬捉，玩出那种法西斯蒂的老手段，这仿佛是“进一步”，其实是退一步。本来有本事就要摆出尊严的党当局和国当局的面孔，正式的来维持卖国特权，用正当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来惩办违反无抵抗主义的“暴徒”，反抗屠杀政策的“匪类”。现在却暗中指使流氓出来殴打、绑票。这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事后可以推诿，说是出于“误会”、“私人冲突”、“激于义愤”，而实

际上达到杀人捉人的目的。假如有胆量杀这些人，捉这些人，那又何必要这一套把戏。所以流氓政策，正是最卑鄙、最龌龊、最懦怯、最无耻的手段。上海当局用了这些手段，这是没有疑问的事实。上海学生群众在市政府设立的临时民众法庭审判的结果，已经完全证明这个事实。上海当局的所以要用这种手段，就足见当局卑鄙懦怯。也正因为事前用的是这种流氓手段，所以事后（看见民众革命的愤激还有相当的组织 and 实在的行动力量），上海市长张群^①还有可能否认，说他“虽为一市之长，而竟未参预密谋”。如果捉拿学生代表是由公安局长正式拘提的话，那么，市长能够否认，能够转圜，能够趁势暂时收篷得如此之容易吗？当然不能够。所以流氓政策，正是当局退一步的表示，已经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公然拘捕屠杀了。但是，这同时也是“统治技术”的更加进步更加巧妙的表现。

革命民众要了解这种“巧妙”，要防备着这种“巧妙”，而且要预防着还有“更加巧妙”、“更加新鲜”的把戏搬演出来。

本来，流氓政策的手段在党国能够算得新鲜么？当然不能够。因为大家都知道：上海就曾经有过一个所谓“狼虎成群的时期”。从那时候起，全国各地地方，尤其是每个工厂的门口……除机关枪、手枪大队、站岗、巡捕、警察之外——还天天发生着这种流氓政策的事实。对于学生，这也许是新鲜的，可是对于另外的许多中国人，这早就不是新鲜的了。因此，从流氓政策大规模应用的时期算起，再看种种事实发展的趋势，我们似乎可以说：“流氓政策与党国同其终始”了罢。

而尤其重要的是：当局——南北东西的一切种种当局，前

前后后的一切派别的当局——正在想法实行一种更加巧妙更加新鲜的把戏。首先只要看看“成群的狼虎”忽然在上海发起改进党务了。后大椿^②的贿案还没有下落，他已经同了許多人出来改进党务，要求彻查吴开先^③派主持的反日会账目等。这里当然暴露出：“这一伙儿里面没有一个清白的”，好像《红楼梦》上说的：“宁国府里除出石狮子，没有一个干净的”，所以互相揭发，臭毛坑越淘越臭！可是，只要想想：连这一类臭气冲天的人物现在都出来“改进”、“革新”、“扩大民治”，那就可以知道另外一套更新鲜更巧妙的把戏是什么？

这把戏就是立宪政策。当年还有决心去刺摄政王的汪精卫^④先生，曾经说过清朝的筹备立宪，目的是在于扑灭革命，巩固专制，更巧妙更新鲜的实行“宁赠友邦，勿与家奴”^⑤的政策。因此，现在的汪精卫大人“深明此种大义”，自然是“当仁不让”，来耍一套似是而非的立宪政策，做了立宪运动的领袖。哈哈！

一切绅商人等，看着党国坍塌得如此糟糕，自然都想赶紧想法救党国的命。救命的方法，就是在屠杀政策、流氓政策之外，外加立宪政策一枚。请看，上海学生被打和十二月十三日四五万民众的大示威^⑥之后，绅商虞洽卿^⑦等招待学界谈话，绅商王汉良、后大椿等发起改进党务会，而南京政府的所谓“国难会议”^⑧的筹备，汪精卫先生等的所谓“国民救国会议”的号召^⑨，都特别加紧的摇旗呐喊。蒋介石的下野^⑩，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的准备等等宣传得特别起劲。目的都是一个：请民众不要性急，现在所谓个人独裁要取消了，卖国外交仿佛

就没有了，一切都要好了，大家安心等待着：“训政快要结束，宪政就要实现”，不用革命罢！

即使退一千步来说：宪政居然实现，那么，卖国条约还可以由所谓“代表民意”的猪仔国会^①来订立，屠杀政策和流氓政策还可以用“全国民意”的名义来执行。这定不是真正新鲜巧妙吗？至于所谓“国难会议”、“国民救国会议”，其实还不过是摄政王诸葛亮之下的咨询机关，好比前清的资政院^②，——现在的当局，却想用这些东西来欺骗，来维持地主资本家的卖国统治。

但是，立宪政策也只是绅商大人的一厢情愿的欺骗手段，民众会相信吗？不会的。民众要团结，要斗争，要达到建立真正自己的政府的目的！

原载 1931 年 12 月 26 日《中国与世界》第 4 期

署名：樊梓

注 释

① 张群（1889—1990），字岳军，四川华阳人。1930 年任上海市市长，1931 年冬因上海学生发生学潮，被迫辞职。

② 后大椿，当时任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抗日战争时期投靠汪精卫政权。

③ 吴开先，江苏青浦人。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第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投靠汪精卫政权。

④ 指 1910 年汪精卫等在北京谋刺清摄政王载沣。

⑤ 此语最早见于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卷三所引清军机大臣刚

毅的话,原文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常语人曰:‘改革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也,吾有产业,吾宁赠之于朋友,而必不使奴隶分其润也。’”后演化为“宁赠友邦,勿与家奴”。

⑥ 1931年12月9日,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代表许秀岑、中央大学学生江学乾,在上海向各界报告南京当局镇压北大请愿学生真相时遭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武装便衣绑架,引起公愤。12月13日,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召开全市市民示威抗议大会。

⑦ 虞洽卿(1867—1945),名和德,浙江镇海人。买办资本家。1924年起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一贯支持蒋介石的政治活动。

⑧ 国难会议,1932年4月7日至12日在洛阳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会议议决“对日交涉”、“全力剿共”等方针,否决了爱国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提出的民主宪政的要求。

⑨ 1931年12月10日,汪精卫曾通电发起组织国民救国会议。

⑩ 蒋介石下野,见本卷第223页注①。

⑪ 猪仔国会,见本卷第66页注④。

⑫ 资政院,1910年10月清政府预备立宪期间设立的中央咨议机关。它名义上可以有议定预算、决算、税法,制定法规和弹劾大臣等权,实际上是清政府的御用机关,议决事项都必须奏请皇帝批准。

苏维埃的文化革命*

(一九三一年秋)

一、文委^①的任务是在文化战线上,动员广大民众来参加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苏维埃革命。这就必须发动和领导苏维埃的文化革命,这种革命的文化运动,必须是劳动民众自己的文化革命,必须和一般的政治经济斗争密切联系着。因此,革命的文化运动的_··_·大众化,就是目前最重要的中心问题,因为大众化的路线,虽然中央早已指示出来,而文委和各联^②党团还没有切实的执行,甚至于根本不了解而对于这个路线怠工。

二、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文化运动和一般革命斗争的联系。这里,一切革命的文化团体,必须用文化运动的方式去发动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全部斗争: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的瓜分和进攻中国革命,反对进攻红军、苏维埃,发展和巩固苏维埃区域,发动和参加革命的民族战争,革命的红军战争;同时,也就要赞助劳动民众的一切部分的政治经济斗争,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出卖民族利益和一切种种压迫,为着

* 本篇是瞿秋白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起草的文件,根据中央档案刊印。写作时间估计在1931年秋。

推翻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而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真正民众政权而斗争；同样，要动员群众来实行反对进攻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而且文化团体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成为文化战线上的强有力的群众斗争的队伍，必须能够动员极广大的党外的劳动民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来进行革命的文化运动。

三、苏维埃的文化革命，是在文化战线上彻底完成民权革命的任务，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在现在是必须反对着中国资产阶级而进行的——资产阶级就在文化问题上也是投降封建残余，帮着帝国主义军阀实行愚民政策和一切种种的欺骗。反对封建意识的斗争，应当同时就联系到反对一切买办的以及资产阶级的意识的斗争。这种文化革命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广大群众的斗争。现在一些社会民主派和托洛茨基派，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主张什么“知识阶级的特殊的文化革命”，甚至冒充马列主义——这无非是资产阶级的一种企图，要想用巧妙的欺骗方法，来影响无产阶级和群众，阻碍苏维埃革命的迅速的发展。一切革命的文化团体必须坚决的反对这种企图，为着文化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斗争。

四、中国的反封建的文化革命，所谓“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没有完成它的任务的。这个任务，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苏维埃革命，能够彻底的完成。然而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反动的三民主义、国家主义，直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托洛茨基派，都在一致的反对苏维埃革命。可是，中国的文化生

活里，也已经显然的树立了新的革命营垒：就是苏维埃区域里的几千万群众所开始的文化革命。那里的土地革命，最坚决的最彻底的肃清着中国式的中世纪的毛坑，开始了真正群众的文化运动——打倒孔教、佛教、道教等等的迷信和一切宗法社会的思想上的束缚，反对着资产阶级和富农等等的思想上的影响。革命的文化团体，首先就要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一切必要的工作，去帮助和发展苏区的一切文化事业，尤其是关系到几千万群众的教育事业：儿童教育和成年教育。而在白色区域，也要开展革命的普洛^③的教育运动，去赞助苏区的教育文化事业。为着在全国进行苏维埃文化革命起见，就在白色区域，也要利用和争取一切公开的可能，发动“平民教育运动”和识字运动。

五、苏维埃的文化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和文化生活，要使广大的群众能够接受人类历史上的一切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工具和知识，同时肃清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意识上的影响，对于一切，都要反对着五四式的自由主义，而“重新估定价值”，要发动新的文字革命，主张绝对的白话文，肃清一切文言的余孽以及五四式的假白话，直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罗马化。要发展工人报纸和劳动民众的报纸（普洛新闻学运动）；要建立广大的工农兵通信运动。要在大众之中，发展普洛的革命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的运动。要在大众之中，反对一切宗教迷信以及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理论，而进行马列主义的科学大众化的运动。革命的普洛的文艺运动和科学运动，必须和大众的斗争以及日常生

活联系起来。

六、苏维埃的文化革命必须要坚决的无产阶级立场。一切文化问题上的斗争，思想上意识上的斗争，必须拿大众做对象。要反对反动的大众文艺，而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要反对广大群众之中的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意识，而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通俗的科学丛书。为着这些工作，必须有系统的去研究群众的现有的读物，抓住一切迷惑大众的“理论”，而实行要使政治口号大众化，要为着这个目的，而实行理论的思想的斗争，去反对一切反动派，直到托派。这种思想斗争，这种深刻的哲学、科学、文艺的理论的研究，必须完全和群众工作以及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必须和研究现实的社会现象联系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该宣传到广大的群众之怀，所有这些，都需要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艰苦的工作，需要一切革命的文化团体在群众之中建立巩固的组织上的基础，从工人群众之中锻炼出文化运动的干部。

七、文化委员会，直到现在对于这些任务都还没有切实的执行，动员群众示威罢工的很少；文化工作上所有的一些成绩，比较起来客观上群众斗争的发展和可能的范围，实在是很小很小的。而且文委和各联党团之中，还做了一些严重的错误，消极怠工，甚至投降第三党^④和托洛茨基主义^⑤。必须发展坚决的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发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派”机会主义和对于机会主义者的调和态度，反对对于大众化路线的怠工，反对学究主义和小团体主义，纠正指导方式上的官僚主义的错误，这样，才能够开展文化战线上的真正

的群众工作和革命斗争。

〔社会〕 一、政治参加，二、政治口号大众化，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大众化，四、现实的社会现象的研究和社联的指导，五、理论斗争的开展（翻译的规划包括在内）。

〔文学〕 一、政治参加，二、创作批评（理论的斗争），三、大众文艺新作家的养成，四、文艺理论的宣传（翻译），五、文研的指导（文新）

{	1. 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斗争	}
	2. 大众文艺——新作家	
	3. 文艺理论的宣传	
	4. 文研的指导——新作家	

↓

〔教育〕 一、政治参加，二、反教育界的反动势力，三、反对反动的教育理论，四、赞助苏区教育事业（教科书），五、宣传教育理论和研究。

〔新闻〕 一、政治参加，二、反对新闻界反动势力，三、反对反动新闻学方法和理论，四、群众报纸的创办，五、通信运动。

〔剧〕 一、左联，……

注 释

① 文委，即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1929年10月中央宣传部根据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成立。潘汉年任书记。

② 各联，指由中央文委直接领导下的各个左翼文化团体，包括中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中国左翼电影家联盟及世界语联盟等。

③ 普洛，普洛列塔利亚 (proletariat) 一词的缩写，意即无产阶级。

④ 第三党，见本卷第33—34页注⑳、㉑。

⑤ 托洛茨基主义，见本卷第62页注㉒。

文件处置办法*

(一九三一年)

一、中央文件应当分下列四大类，均按时日编，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下同)。

I、最高机关决议及指示(以及材料)。

此类包含：(一)国际对中国问题议案、致中央或全党信；(二)中国党的全国大会、中央全会之议案以及记录(材料如到会人数，所代表之区域，代表之分类表格等)。

II、对外的宣言、告民众书等

此类须努力收集，只印在报上的必须剪贴归入，一次都不要遗失。

III、政治局记录及常委重要问题记录(政治及组织问题记录)。

附注：常委所决议的事务问题的记录可全毁，秘书处的来往字条大概都可毁去。

IV、中央议决案及通告、宣传大纲(党员个人致中央的重要政治信件附)。

* 这是瞿秋白起草的党内文件，据中央档案手稿刊印，上面有周恩来的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写作时间估计在1931年。

以上都须注明日期，每次中央全会做一个段落（每件给他一个题目，切勿单记通告第几号）。

二、所有上述四类条目编一总号数（例如 I. 1、II. 1等），同时在每一件上另行注明小类的号数，小类可分为政治、苏维埃、组织、宣传、妇女、军事、农民（土地）、职工、青年、党内问题（包括反倾向的议决、通告、指示以及国际处罚党员问题、个人申明书等）等（例如 I1.，政1.——六大政治议决案。或 IV6，农7——四中后中央的土地法草案）。

这样，除总号数下的目录外，另外依据分类号数，再编钞一本分类目录，例如：

农民问题

第一号 六大农民议决案（总号数）

第二号 六大土地议决案（总号数）

第三号 国际一九二九年六月致中央谈农运信（同上）

第四号 中央第某号通告——接受国际谈农运的信（同上）

第五号 题目（总号数）

第六号 题目（总号数）

其他小类可以类推。

三、各省区材料，中央所接到的，亦照此办法。先分省、分区，各编总号数，时日以中央收到的时日为标准，按次排编。尽可能注以〔一〕定分类号数。例如广东省某年、月、日的省委扩大会议的政治议决案，一件文件上须注以下几种号数，则注明：

(一)粵第○号，(二)粵政第○号，(三)总政第○号(此号数与中央总的分类号数编，并以此号数排〔入〕中央总的分类目录之中)。各省区(苏区)报告，不能分类者，照他的性质而定，例如大半讲当地组织状况者，归组织类，少〔部〕分不能分类者，都归入政治类。

四、凡是事务性质的来往函件，以及绝无内容报告等等，都可以销毁。

五、中央及地方及各团体的机关报(如临时的《沪潮》、《直支生活》等亦须保存)，必须尽力保存一全份，并须另置一适当的地方(即亦只有至多两人知道的地方，同时当然要是不甚费钱的地方)。须交宣传部的一人把历年来的机关报上之论文，编一本分类目录(并在每篇注明写作的日期)。此项材料，对于反倾向及一般党员教育有很大的用处。

六、中央所取得的全总、苏维埃政府文件、C.Y.中央、互济会等的文件，按同样方法，如同另一本目录，而亦加分类号数之后，分别编到中央总的分类目录之中。

七、以后秘书处应注意：事务性质及小信，只须将内容简要的记入一本流水账，可随时毁去，勿使积存。油印、铅印品只须有一份保存，其余另设办法“推销”出去。

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种地的乡下人怎么样过活呢？*

(中国农民的生活)

中国种地的乡下人，中国的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做活，还是吃也不够，穿也不够，住的屋子里冷得要命，弄得不好还要卖男鬻女。这是怎么一回事呵！？

原来“种地的是农民，吃饭的是地主。”田地都是地主的，乡里的大先生二先生有的是田地，城里的做官人家有的是田地。他们是不种地的，可是白米饭是他们吃的。赤脚爬地下田耕种的，从犁田、插秧、拔草、收割、打麦……一直到磨谷、舂米，这些事却都是农民做的。农民吃的是什么呢？白米饭吃不到两个月，要是年成不好，连一天也吃不着，要饱肚子，什么都得吃，小米稀饭、红蕃薯、土豆子，有吃就算是好的。为什么这个样子：不种地的有得吃，种地的反而没得吃？就是因为田地都给地主霸占去了。即使不是地主，也是乡里的大人物，绅董，保卫团、民团的团练，勾结他们的和尚老爷，教堂里的牧

* 本篇至《苏联是工人的祖国》共 11 篇通俗讲话，由作者编为《茂声集》(二)，迄未出版，这里根据中央档案手稿刊印。从内容看，写作时间估计在 1931 年。《茂声集》(一) 内容包括两篇翻译文章，《第十四个年头——苏联革命十三周年纪念时候的世界形势》和《布尔什维克的进攻和机会主义的新活动》，这里未收入。

师。这些人，管着所谓官田、祠田、庙田，和地主是一模一样。他们要收租。农民辛苦一年，比如说收得一担谷，倒要交上五斗、六斗租。此外，还要交纳种种苛捐杂税；官府派下来一亩田要附加什么捐什么税，地主就到佃户头上再来剥削，也许自己还得赚几个。这些地主、豪绅、和尚、牧师，都是国民党。

就算自己有几亩田的农民，少只有三、四担，多也不过十几担田；一年两季，完粮纳税，正项田赋，外加附税陋规，银两折算洋钱，洋钱折算铜元，新米上市，谷价格外低落，差不多卖了一大半谷子，农民还交纳不起！而且大多数地方，官府差人下乡“催租”，还要押着乡下人整担整担的谷子挑去，三钱不值两文的合算过称。有些地方，又是完粮要收谷米，杂捐要收洋钱。总之，层层剥削，弄得自己有着田地亦算不得自己的。田里的出产，至少也有一半要交给县长军阀。这些官僚军阀，当然更是国民党，不用说了。

这样，有田的也要卖田，有屋的也要卖屋，乡下的佃户一天天的多，租人家的田，仿佛就是做人家的奴隶。耕自己田的自耕农，耕人家田的佃农，统统是穷苦得不了。自然，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饿着肚皮是下不了田的，没有种籽是动不了工的，非得当当头，借本钱。谁肯借钱呢？还不是那些地主豪绅，当铺钱庄和大店老班，再则还有乡里的土财主。他们借钱，总要四分五分、甚至十分二十分的利钱，利上滚利。重利盘剥还不算，还要田单契纸做抵押，或是写好借据，拖欠一下，就要把田地卖绝给他，没有田地，就得卖儿女。

地主豪绅自己在乡里管着种田的，还雇着长工、短工，一

年到头替地主下田做工，工钱只有十几块洋钱，多也不过四五十块。本来现在这种世界，农民之中，不论有田没田，大多数是一年穷似一年。弄到自己没有丝毫田产的地步，就得去当长工，受人雇用，叫做雇农，这里乡里的真正无产阶级，就是只靠卖气力吃饭过活的人。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却多是自己耕着一些田地（不管是自己的，还是租人家的），同时，必得出去帮人家做短工，不然自己田里出的就万万不够吃，这种人是贫穷得很，一半卖气力，一半靠自己耕种，叫做贫农，亦可以说是乡里的半无产阶级。其他农民，勉强够吃够用，可是一到荒年一定要闹饥荒，三年两头，要积蓄也积蓄不起什么。这种人是农民里的中等人家，叫做中农。可是，也有些农民出身，居然赚起了家当，添置了田产，于是也学着地主的樣子，雇用人工帮他种田，种不了的还要出租，他有的是锄头、犁耙，还有耕牛、水车，这亦可以租给没有这些家伙的邻舍用，他有的是多余的钱，又可以放出去收利钱。这种人就一定帮助地主豪绅，因为他亦是剥削别人的，他是富有的土财主，叫做富农。

可见种地的乡下人，也不是人人都是一样的过活的。富农就和地主一同剥削着雇农，富农是乡里的资本家。雇农就是乡里的工人，其他的短工，也同他们一样受种种雇主的剥削。他们替地主、富农插秧、赶地，或者替大店老班、绅士、官僚挑东西，抬轿子，推车子，工钱总是很少的。而且做这种苦工的，还有不少是女人小孩子呢，比如看牛的小孩，连觉都没地方睡。

这样，地主、豪绅、官僚、军阀剥削着种地的劳动农民，地

主、富农、老班剥削着长工、短工。劳动的农民，中农、贫民、雇农的生活，自然是痛苦得不了！极大多数农民的血汗，都给他们榨去了。

这些汗血到什么人手里去了呢？大部分还是到外国资本家手里去了。外国人里面，也是大多数是工人、农民，少数才是资本家。这里外国资本家，在他们本国剥削工人和农民，用大机器制造许多货物，洋油、洋布、洋火……销到中国来。中国的土布，中国农民以前自己做着用的东西，现在都快要看不见了。有了洋货，有了大机器做的东西，手里做得又慢又不好的土货就没有用了。这是没有法子的。可是，中国农民现在逼得不能不用洋货，样样东西都贵起来。中国农民种的豆子、麦子、茶叶，出的丝，都用极便宜的价钱，卖给豪绅、富农、中国资本家；中国资本家又去卖给外国资本家，所以外国资本家赚着不少钱。中国农民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田里的出产，还换不着一身粗洋布裤褂穿。所以外国资本家也是剥削中国农民的。这种外国资本家叫做帝国主义者。中国地主收去的租，军阀收去的税，富农店老班收去的利钱，倒有一半要渐渐归到帝国主义者们的荷包里去呢。

因此，中国的地主、豪绅、资本家，更加要来剥削中国的农民。农民要是抵抗一下，就要杀头，说是“过激”，甚至整个村庄都烧掉。而且中国的地主、资本家，还因为大家抢着剥削工人和农民，抢着替各国的资本家霸占中国的地盘，所以互相打仗，一年打到头，打个不了。国民党的军阀，蒋介石、张学良①、阎锡山②、冯玉祥③、陈铭枢④、陈济棠⑤、汪精卫⑥、张发

奎^⑦……今天开仗，明天讲和，后天说讨伐，大后天又说统一，你倒我，我打你，——就是玩的这一套把戏。

中国的农民可更加吃他们的苦头了！军阀打起仗来，要拉夫、拉车、封船、押牲口；他们准备打仗的时候，又要添上种种名目的杂捐苛税，预征钱粮。

中国农民生在这种世界，真正是进了活地狱。极大多数的农民，就是这么过活。与其说是过活，还不如说是等死！

如果大家只怨命苦，真是永世没有出头之日。其实，这都是因为田地归地主私有，这都是因为政府在地主资本家手里。

大家想想看：极大多数的农民，要是不跟着城里工人的领导，团结起来，把国民党的军阀政府推翻，也就是推翻地主资本家的政府，推翻帝国主义走狗的政府，把国家大事的权柄，拿到劳动群众自己的手里，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大家平均分配中国的田地——还有别的办法吗？

注 释

- ① 张学良，见本卷第61页注④。
- ② 阎锡山，见本卷第70页注③。
- ③ 冯玉祥，见本卷第34页注④。
- ④ 陈铭枢，见本卷第95页注⑭。
- ⑤ 陈济棠，见本卷第95页注⑬。
- ⑥ 汪精卫，见本卷第61页注⑧。
- ⑦ 张发奎，见本卷第190页注⑬。

农民要的是什么？

(中国农民的要求)

极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是这样痛苦！我们怎么办呢？人家哄骗我们，说什么天皇菩萨，说什么祖宗，说什么耶稣，会保佑我们。这都是叫我们等死。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我们要结团体，齐心协力。如果能够这样，就有办法提出要求。

抗捐抗税抗债抗租加工资改良待遇

如果我们是有团体的，那么，县长军阀要加捐加税，我们就齐心一致的要求减税。对于地主，要求减租。对于债主，要求减少利钱。一个人这样，大家都是这样，力量就大了。官府、地主、债主就要害怕。雇农对于雇主，更可以这样要求，要求一律加增多少工钱，要求冬天添置衣服，夏天添置席子、扇子，……要求每天只做八点钟，要多做就得加倍给工钱。

如果我们的团体是坚固的，我们大家可以齐心抗税抗捐，一个钱也不出。可以抗租，一粒谷也不交。可以抗债，一块洋钱也不还。要求结团体的自由，要求武装的自由。大家要是真正齐心，就能够不准官府绅士禁止我们开会，禁止我们自己办枪械。

苏维埃是什么？红军是什么？

问 苏维埃是什么？

答 苏维埃是工农兵代表会议，就是真正劳动民众自己的政府。

工农兵代表会议，基本上就和国民会议不同。国民会议是国民党召集的，是国民政府包办的。“国民”是什么？“国民”就是除出工人、农民、兵士、贫民之外，一些中国地主、资本家、绅士、高利贷者。这些人选举代表举行会议，就叫国民会议。事实上，国民会议里面没有真正工人、农民、兵士、贫民的代表。表面上，国民党说工人等等也要选举代表到国民会议去，这是因为国民党现在已经不敢说工人、农民不准干预国家大事了，——两年以前国民党还是说“训政时期”不要国民会议，不要约法等等的，现在他们不敢了，因为中国大多数的工人，许多农民、兵士等，都觉悟了，都要苏维埃，都要干预国家大事了。因此，国民党要想欺骗工农民众，就说现在要国民会议，要约法了。国民党并且说，工农民众可以选举代表到国民会议去。可是，国民党只准民众经过所谓合法团体选举代表。什么叫合法团体？就是黄色工会等等。你们想，黄色工会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公安局巡捕房的走狗，经过他们选举代表，哪里会真正选出工人代表？！农民也是一样！至于兵士，国民

党根本就没有给他们选举权。

工农兵代表会议就根本不同。工农兵代表会议，是工人、农民、兵士、贫民直接选举代表，来举行的会议，这个会议，就来管理国家大事，决定国家的政策、法律、命令；决定之后就去实行。所以工农兵代表会议，是劳动民众自己的政府。

问 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的制度之下谁是有选举权的，谁是没有选举权的？

答 凡是劳动者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凡是剥削别人的人，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工农兵代表会议之下，工人、手工工人、农民、兵士、贫民，——专靠自己劳动的手工业主和小贩，暂时失业的穷人，专靠自己劳动的医生、画师、教员等等，都一律平等的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劳动妇女、女工、农妇以及劳动者的老婆，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上面所说那些有选举权的人的老婆，也是一样。劳动青年、劳动者的子弟，只要满了十八岁，亦都一律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凡是住在中国的劳动者，不论是中国人、外国人，是汉人、高丽人^①、蒙古人，都一样。地主豪绅、资本家、店东和富农——雇用长期的雇工而剥削他们的劳动以谋利的人，专靠银行钱庄存款生利的人，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问 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之下，谁是有政治自由的，谁是没有政治自由的？

答 劳动者，不剥削别人的人，都有政治自由；剥削别人劳动的人，就都没有政治自由。

劳动者可以自由集会，结团体，组织工会等等，组织革命的文学团体、学术艺术团体等等，可以自由出版书报，自由言论、演讲等等。

地主资本家等，就没有这些自由。他们不准组织商会、钱业公会、银行公会、农业会等；他们不准出版书报。这样，工农兵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民权主义，真正劳动民众的民权主义制度，因为地主资本家没有了选举权和自由权，然后中国极大多数的三万万九千几百万人的选举权和自由权，才有保障。所以工农兵代表会议，同时也是革命的独裁制度，就是说，只有革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自来制裁国家大事，而不准地主资本家等干预政治，并且严厉禁止和镇压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问 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要怎么样组织呢？

答 各地方的工、农、兵士、贫民的群众，各自选举代表，组织当地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这就是当地的地方政府。各地方的工农兵代表会议，再各自举出代表来开全中国的工农兵代表会议的代表大会，这就是全中国的苏维埃中央政府。

问 各地方的乡村工农兵代表会议怎样组织的呢？

答 现在中国有好几省，比如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已经有乡村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有些地方并且有了县工农兵代

表会议。但是，他们的组织还是很不完备。

怎样才是完备的组织呢？

首先应当是真正选举出来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才是完备的。比方有一个某某乡，这个乡里面有十个村庄，每个村庄里的农民和手工工人，要先开一个全村人民大会。自然，首先要把这村里的富农、高利贷者等等除开。把他们的名单贴在村庄上，说明不准他们到会，叫大家不要选举他们，因为他们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然后村民大会就可以选举了。怎样选举呢？这村的共产党支部、共青团支部、贫农团，会按照应该选出的人数正式提出候选名单出来，请大家发表意见。这种名单也可以贴出来。大家可以发表意见，比如说某某人不配当选，某人某人还应当增加上去。这样，等到大会开会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投票或者举手，由多数来决定。选举出什么来呢？第一，是要选出这一村的政府机关；村小的只要选一个书记，村大的可以选三个人的常务委员会。第二，是要选出一个代表团，去出席这个某某乡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每一村代表团人数的多少，要看这一乡的工农兵代表会议的代表总数，再按照各村人口的多少来决定。这样，这十个村庄的代表团都选出来之后，这些代表举行会议，就是这某某乡的工农兵代表会议开会了。这个乡工农兵代表会议，照样要选出这一乡的政府机关，就是这一乡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又选出自己的常务委员会来，做经常的办事机关；此外，再选出这一乡的代表团，去出席区的或者县的工农兵会议的代表大会。县的工农兵会议代表大会里面，就要有驻在这

县的红军，按照一营一营选出来的代表参加。如果这个县里面有小小的工厂，那么，工人是要按照每个工厂选出代表来参加的。这样，往上推上去，一直到省的工农兵会议（苏维埃）代表大会。

问 城市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怎么样组织呢？

答 城市的工农兵代表会议也是这样选举出来的。第一，就是工人的选举。工人的选举要按照工厂，每个工厂的工人开全体大会，选出代表来；代表的人数，按照几千人或者一万人选出一个。第二，城市的手工工人和其他贫民，可以按照区域和职业，选出代表。第三，城市四郊的农民，按照村庄选出代表。第四，驻在这城里的红军，按照营盘选出代表。这些代表选出之后集合在一起开会，就是这一城市的工农兵代表会议开会了。城市工农兵代表会议，再选出这一城市的代表团，去出席全中国的工农兵会议（苏维埃）代表大会。此外，自然还要选出城市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又选出自己的常务委员会，做经常办事机关，这就是苏维埃的市政府了。

问 工农兵会议的中央政府怎么样组织的？

答 各省的省工农兵会议（苏维埃）代表大会，各大城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的市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各省选出代表团，这些代表集合在一起，就是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这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全国代表大会，就是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最高机关。中国工农

兵会议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一方面选出自己的主席团，另一方面委任政府的各部部长——亦叫做平民常务委员，例如外交部长，就是外交平民常务委员，内务部长，就是内务平民常务委员，军事部长，就是军事平民常务委员等等，这些平民常务委员组成平民常务会议，就是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经常办事机关，比仿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国务院，平民常务会议的平民常务委员长，仿佛就是以前的国务总理。平民常务会议遵照着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或其主席团议决的法律、命令，执行政务。

问 工农兵会议的各级代表和执行委员，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和中央平民常务委员(部长)，有什么特权没有呢？

答 他们一点特权也没有的。他们是工人、农民等等劳动群众推选出来担负国家大事的，担负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事务的。他们办事，都应当遵照群众大多数的意见。

劳动民众却有几种权利，可以实际上监督这些政府职员，第一种叫做撤换代表权。这就是说：如果工农兵会议或者工农兵会议代表大会的某一个代表不好——他的行动不称职，那么，选举他出来的某工厂的工人，或者某村庄的农民，就可以开会议决撤消他的代表资格，另外选出一个代表去替换他。第二种叫做要求报告权。这就是说，代表和委员应当定期的对着选举人做报告，说明政府办事的成绩，政府政策上的方针等等。第三种叫做参加行政权。就是说，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

埃)政府办事的时候,要在常务委员会或其各部之下设立临时性质的各种小委员会。这种小委员会里面要多多吸引男女劳动民众参加办事,使他们练习管理国家政务的才能。此外,我们应当知道:只有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平民常务委员,地方政府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方才留在政府里经常办事,拿一定的薪水(工资),和普通工厂里面熟练工人的工资相差不多的。至于出席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那么,那一次代表大会开完会之后,他们仍旧和其他的工农一样,没有么什特别权利了。各级执行委员,没有担任经常办事的职务的,也回去仍旧做他们的工人或者农民,不过他们却要特别担负一种任务,就是受政府的委托去办理临时性质的种种事件,参加各种小委员会等;而且他这一级的执行委员会开全体会议的时候,他一定要来到会。

问 工农兵会议由政府规定些什么样的法令呢?

答 工农兵会议开会的时候,各代表以及一般工农群众,都可以提议各种保护工农利益的法令,由大多数代表去议决执行。最重要的,当然要首先决定国家根本法,就是宪法,规定明白苏维埃国家政府的组织方法、选举方法等等。首先要决定劳动法和土地法。

问 劳动法是什么样的法律?

答 劳动法是保护一切种种工人,例如工厂工人、手工工人、农村工人(雇农)等利益的法律。

首先是规定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每年应当放几天假，每年每一个工人可以休息多少时候，同时工资照给。规定增加工资，每半个月一定要发工资一次，不准拖欠。规定工厂、矿坑等等一定要有什么样的卫生设备。规定国家和厂主一定要怎样储蓄经费，替工人、职员保险，——工人、职员生病失业的时候就经过这一笔经费里面支出补助费给他们，等等（请参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红旗周报》第一期——一九三一年三月九日公布的《劳动法草案》②）。

这种劳动法决定之后，就要中国境内的一切厂主资本家服从。如果有一个厂主，不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违背了这劳动法的某一条，比方说，他叫工人做八小时半的工作，那么，工农兵会议的政府，立刻要把这个资本家逮捕起来，给他吃官司，叫他受一种刑罚，还要他遵照劳动法去实行；如果他还实行，那么，再罚他……一直到没收他的工厂。

问 土地法是什么样的法律？

答 土地法是保护农民的法律。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没收军阀、豪绅、反革命者等等一切大私有主的土地。规定经过苏维埃——就是工农兵会议，由中农、贫农群众自己去实行分配土地。雇农、苦力、劳动农民都不分男女，同样有分得土地权。中国富农的特性是兼半地主高利贷者，他们的土地亦须同样没收和分配。富农自己如果用劳动力去耕种，那么，仍旧再分配土地给他。至于旧时的地主豪绅等等以及反革命者，就没有权利分得土地。土地法还规定没收地主、

军阀等的一切动产、不动产，就是房屋、牲畜、农具等等，拿来给贫农、中农群众使用。土地法规定取消一切田租契约，高利贷的债务（参看《土地法草案》⑨）。

问 工农兵会议政府还要规定什么样的法令？

答 还要规定经济政策的种种命令。譬如说，规定普通的商业自由，规定合作社的组织方法，规定商人怠工、经济封锁或者军事上必须的时候，工农兵会议政府可以发出临时的紧急命令，限制提高物价等等。规定收税的办法——工人以及红军兵士、最穷的贫民完全免税，对于中农定出统一的累进税则，对于富农规定特别多的税率，对于商人征收统一的收入累进税等等。规定减轻房租的办法，设法供给工人和贫农，使他们能够住到更好的房屋。规定统一的货币制度，统一的度量衡制度。

此外，工农兵会议政府，还要规定文化政策，就是实行普及教育，成年人的补习教育，使大家都识得字，都懂得政治；使工人、农民都能够进大学，研究高深的学问。提倡并且实行职业教育，提倡科学智识和职业教育。提倡革命的文学艺术、电影、戏剧等等。

工农兵会议政府一定还要改良司法制度。每县每省直到全国的审判厅，都由工农兵会议代表大会选出审判员来组织。苏维埃的平民审判厅，审判工人、农民等劳动民众自己之间的争议案件，比如几块钱的小债务，两个人相打，杀了人，伤了人，强抢了东西等等的案件。同时，也可以设立特别的革命

审判厅，处理反革命罪犯。苏维埃的审判厅真正的废除打屁股等等一切野蛮的肉刑制度。对于反革命罪犯，只是严格的监禁，不得已的时候方才枪毙他们。对于普通罪犯，总要去教化他们。并且要改良监狱。

问 工农兵会议对于妇女的政策是怎样的？

答 完全废除旧礼教，实行解放妇女。规定新的婚姻法和家庭法。男女双方同意，只要到当地工农兵会议政府里去登记一下，就是正式结婚。不登记的男女生了小孩，仍旧不算私生子的。苏维埃制度之下没有所谓私生子的。男女两方面有一方面坚决表示要离婚，就可以到政府里去登记，实行离婚。但是，如果有一方面没有工作不能维持生活，别一方面的丈夫或者老婆，就应当维持另一方面一年的生活。对于强奸妇女，规定严厉的处罚。企图对于所生子女不负责任的丈夫，由平民审判厅强迫他负担。总之，对于妇女的利益，工农兵会议政府，是要特别保护的。

工农兵会议政府的劳动法，特别规定保护女工的办法。女工和男工做同一种的工作，就应当得到同样多的工资。禁止雇用女工做特别繁重的工作。禁止雇用十八岁以下的女工、怀孕的女工、或者喂奶的女工去做夜工。产前产后八个星期，女工应当得到休息，工资照发。……（详细请参看《劳动法草案》）。

问 工农兵会议政府对于青年的政策怎样？

答 也是极力保护的。劳动法上规定十四岁以下的小孩，禁止雇用去做工。工人工资增加了之后，家里不用小孩子去赚钱就可以够用了。至于十四岁到十六岁的童工，一天只做四小时工作，十六到十八岁的青年工人，一天只做六小时工作。工厂方面应当拿出钱来开办工厂学校，以便提高青年、童工的技术程度，并且给他们普通教育。废除中国旧式的各种学徒制度和所谓养成工制度（详细请参看《劳动法草案》）。

问 工农兵会议政府对于弱小民族政策怎么样？

答 中国境内的小民族，例如蒙古人、回回人、高丽人，云南、贵州、琼崖、川边等等的苗、黎、僮，一切小民族，在中国工农兵会议政府之下，和汉族一律平等；他们有完完全全的民族自决权，他们自己去决定：组织自治的苏维埃共和国之后再来加入中国苏维埃的联邦，还是完全和中国分离。

问 中国工农兵会议政府的对外政策怎样？

答 完全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首先，帝国主义列强驻在中国境内的一切海陆军和巡捕队伍要完完全全撤退。中国境内帝国主义者所组织的政府，例如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法租界的工部局和一切这类的政府机关要完全取消。海关、盐税、铁路等的管理权要完全交还中国苏维埃政府。凡是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外国人，都应当遵守中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律和命令，受中国苏维埃的审判厅审判——完全取消领事裁判权④。中国苏维埃政府将要把外国资本家的银行、工厂、

矿山、铁路、航业完全收归国有。目前，可以允许外国企业家重新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来订立租借契约，继续生产。但是，如果这些外国企业家违背苏维埃的劳动法以及其他法令，或者实行怠工、关闭企业，甚至干涉中国内政，帮助反革命，那么，就要没收这些企业收归国有。至于外交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及外债，中国苏维埃政府将要完全宣布无效，因为这些是中国地主、资本家的满清、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去和外国订立的，并不是我们工农民众订立的；这些条约宣布废除之后，中国苏维埃政府愿意和外国重新来订立绝对平等的条约。中国苏维埃政府对外是采取和平政策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开兵来干涉中国革命，来攻打中国，那么，中国苏维埃政府一定可以得到全体劳动民众的赞助，起来抵抗帝国主义的压迫的。

中国苏维埃政府将要和苏联缔结最亲密的联盟，将要竭力赞助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殖民地，和他们结合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盟。

问 红军是什么？

答 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武装起来的军队。是完全受工农兵会议政府的指挥的。

红军是拥护工农兵会议政府的军队。一切劳动者、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城市贫民都可以武装起来加入红军；一切剥削者、军阀、官僚、豪绅、地主、资本家、富农及其家属都不准加入红军。

红军和军阀军队不同的，他帮助工农群众去打地主、资本

家，他的兵士要个个人都很有觉悟，知道为什么去打仗，知道守纪律。红军里面有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他们给兵士政治教育，使不好的军官不能够利用军队实行叛变，指挥兵士去打工农。

现在中国已经有许多红军，其中也有组织得很好的，可是亦有组织很不完备的。最初，就是暴动起来武装了的农民，自己编成游击队，随后改成红军。后来，也有许多军阀军队里的兵士觉悟了，拖了枪到红军里来。

以后，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巩固起来，就要请打过好几年仗的红军兵士休息，他们家里已经有好些分到了土地。同时可以经过工会、贫农团等，征调年轻的工人、农民到红军去，每人只要当两年或者三年的兵，又可以回家，再换一批新的工人、农民去，这样，大家都学会打仗。

问 中国怎样就能够完全实现工农兵会议的政府呢？

答 要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贫民都团结起来，齐心一致的斗争，不听国民党、黄色工会、改组派（汪精卫派）^⑤、取消派（陈独秀派）^⑥等的欺骗。要大家一致起来反对国民政府和帝国主义派兵去打现在的红军和工农兵会议已经拿到政权的区域——苏维埃区域。

城市的工人，要努力组织赤色工会，拿赤色工会做中心，在每一厂都号召全厂工人，设法开会选出委员来，组织工厂委员会，这种工厂委员会就要代表全厂工人反对资本家，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要求发给经常的失业工人补助费，女

工生育期间的休假和工资，改良青年学徒待遇等等。这些斗争使工人群众一天天的团结齐心起来，罢工可以有真正的准备和好的领导。而且这种选举工厂委员会的习惯，有很大的用处：一到相当时机，就可以照样选举出各厂的代表来，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做准备和指挥暴动的机关。每个工人都要去联络军阀军队里的兵士。兵士也是穷人，他们是穷得没饭吃才替军阀当兵的呵。每个工人都要去和兵士交朋友，宣传他们。每个工人都要设法和农民联络，寄信到自己家乡的乡村里去宣传他们，和近郊农民交朋友，鼓励他们革命。

乡村的农民，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也要这样结团体斗争起来。每个村庄选出委员来，组织农民委员会。这种农民委员会要代表群众反对地主军阀，实行反对预征钱粮、加税加捐，反对加租调佃，实行抗租、抗税、抗捐、抗债。乡村中的雇农苦力要组织自己的工会，反对地主、富农等的雇主，要求增加工资等等，并且做农民委员会运动的主干。要反对红枪会^⑦等首领的欺骗和迷信。农民自己选出来的农民委员会，到相当时机，就可以发动游击战争，指挥暴动。农民委员会打败了地主豪绅，就可以变成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

兵士群众在兵营里面，也要秘密团结起来，组织兵士委员会，反对军阀长官的虐待，要求发饷加饷，发衣服、鞋袜等等。有了相当时机，兵士委员会可以指挥起兵变来，拖着枪到红军里去，到那里就可以举出自己的代表，去参加当地的工农兵会议政府。或者离着红军太远了，也可以拖着枪到自己的老家乡，或者附近农村里去，鼓动农民群众起来革命。

城市贫民，也都要这样结团体，斗争，和兵士、农民都去受工人领导。这样，工人、农民、兵士、贫民斗争的力量大了，红军一天天的扩充了，革命的力量就可以打胜反革命的力量，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政府，就可以在全中国得到胜利了。

注 释

① 高丽人，即朝鲜族人。

② 劳动法草案，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931年2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11月由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12月颁布执行。

③ 土地法草案，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31年2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11月由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12月颁布执行。

④ 领事裁判权，见本卷第147页注⑩。

⑤ 改组派，见本卷第33页注⑳。

⑥ 取消派，即托陈取消派，见本卷第30、33页注⑧、㉑。

⑦ 红枪会，见本卷第32页注㉒。

组织女工代表会的根本原则

一

共产党和广大的女工群众联系，传布党的影响到这些群众里面去，这是有好些种的组织方式的，女工代表会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女工代表会应当是共产主义的最初步的学校，应当成为实际上准备妇女干部去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战斗的一种方式。女工代表会在政治上教育女工的先进阶层，在实际工作上去锻炼她们，这就可以造成一种基础，在这种基础上面就可以吸收妇女无产阶级的新的力量到共产党里面来。同时，女工代表会的工作的性质，能够吸引全部的工厂妇女群众的注意，使她们留心观察这些工作，而听从女工代表会的决定。女工代表会工作的成功，要有好些最必要的条件，而女工代表会本身在女工群众之中的威信，就是这些条件之中的一种。

二

女工代表会是共产党在女工群众之中直接工作的方式，这些女工代表会是由党来组织，由党来进行的。

要组织女工代表会，就必须要有：（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之中要有妇女部，各级党部，首先是工业区域的党部之下，也要有妇女部；（二）工厂支部之中有自己推选出来的女工组织员，尤其是在多数女工集中的工厂里面；（三）要和女工有预先的联络，例如召集她们的集会、会议，以至于大会。现在反对共产党的斗争很激烈，一般的讲起来，要用党的名义公开去组织女工代表会，往往是不可能的；因此，共产党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先组织女工代表会的发起人的筹备会，这种筹备会可以由女工会议选举出来，亦可以由工厂支部的女工组织员去组织起来。至于女工代表会已经成立之后，在筹备会里面工作的女工，就可以加入这个女工代表会，——她们可以作为第一批选出来的代表。

共产党既然要用仿佛是独立的“筹备会”的方法来组织女工代表会，而女工代表会表面上又不能够用共产党的名义去组织和进行，因此，共产党必须特别注意这种筹备会的形成，特别注意去指导这些筹备会组织女工代表会的预先工作。同样，要特别注意女工代表会成立之后的全部工作的趋势，要预防这些筹备会以及女工代表会不要弄成了听其自然的状态，不要被敌视共产主义的党派所利用。

三

第一，女工代表会首先要到工业区域里面组织起来。大工厂，有很多女工集中在里面的，并且有共产党支部的，——

应当每一个工厂组织一个女工代表会，代表由这一工厂的各车间选举出来。日夜班轮流工作的工厂里面，就要日班有一批代表，夜班另外有一批。代表会开会，一定要在工厂里面。这是要每一工厂支部都独立的去教育这些女代表，使共产党能够深入这个工厂，并且巩固自己的影响。

第二，小些的工厂，可以几个厂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代表会，当然，这些工厂都要相离很近的。这种女工代表会的基础，应当是共产党支部最强的一个工厂。

第三，只有小工厂的区域，或者女工不多的区域，可以一区成立一个女工代表会，这里没有自己单独的女工代表会的工厂，都要选出代表去参加，参加的工厂愈多愈好。

第四，可以时，召集各个工厂单独的女工代表会，以及几个工厂联合的女工代表会的联席会议，尤其是在政治经济斗争紧张的时候，这种联席会议一定要郑重的准备，一定要实行一个宣传运动。

四

第一，女工代表会的成份，应当是党外女工的干部，就是工会的会员，以及无组织的女工，尤其要注意吸收无组织的女工来加入代表会。同时，要设法吸引几个社会民主党党员的女工，虽然不用多。

第二，女工代表会里面，亦要选举工人的老婆，主要的是要这一个工厂的男工的老婆；还要选举手工的女工，主要的是

要和这一个工厂生产有联系的手工女工(例如,上海商务印书馆所用的订书女工)。然而,工人老婆和手工女工总共不要超过女工代表会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

第三,有些区域的工厂里面,极大多数是用的男工,或者完全是用的男工,那么,这种地方的代表会自然就不同了——最主要的是工人老婆的代表会了。

但是,这些区域里面,只要有女工的小工厂,即使对于这种区域是没有重大意义的,代表会里面也一定要她们的代表参加。

第四,每一个女工代表会里面,必须有一个小集团的共产党员,她们应当是主要的组织力量,她们应当在相当党部的妇女部的直接指导和指示之下去工作。妇女部应当特别注意,无论如何不要使这些共产党员妨碍无党的女代表的积极,不要她们代替了无党的女代表。

五

第一,代表会的选举:(一)在工厂全体女工集会上选举,或者由各车间女工的集会选举;(二)在工人老婆和手工女工的特别集会上选举(按照住宅的区域,住宅的弄堂(胡同),或者按照各个工厂)。如果有严重的情形,不能够由工厂全体女工集会公开的来选举,那么,选举的单位可以缩小,按照各车间,按照各小组。因为极端的白色恐怖,因为要多有几个工厂参加,代表会的女代表亦可以由党从他所知道的某些工厂女工

之中挑选出来。

第二，女工代表会要尽可能的代表全会各工厂的女工，所以选举人数的名额越少越好（注：一千人选一个代表，不如五百人选一个，五百人不如一百人，一百人不如五十人，这里选举人数的名额越少，选出来的人就要越多的）。

每一工厂的女工代表会的代表总数，不要比十个人到十五个人再少；而每一区域的女代表，不要比五十人到七十人再少。

六

第一，女代表的任期，要长期的，并且要有一定的期限（每六个月、八个月、十个月改选一次，但是不要过一年）。女工代表会再定期召集（每月召集两次以上，至少也要一次）。

第二，期限过了之后，女工代表会要改选，最好要有少数第一届的代表被选进第二届的代表会里面去。

第三，女工代表会（男工家族代表会）在工作过程之中，必须留心使每一个代表都经常的到会，这是共产党在组织上巩固女代表的同情的中心工作。如果有些女代表始终还有缺席的情形，那么，要立刻去设法劝告她们到会，或者改选别几个女代表来代替她们。

第四，女工代表会（男工家族代表会）应当尽可能的使女代表和共产党密切联系起来。必须设法在代表会工作的一定期限之中，使女代表里面最积极的革命女工能够加入党，其余

的，也要加入党所影响的团体——不要使经过女工代表会的女工，有一个不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

七

女工代表会(男工家族代表会)要定出每一期限的工作计划。工作计划之中规定要研究若干问题，这些问题是关于当前日常经济政治斗争的，是关于女工参加无产阶级的这些斗争的，这些问题要联系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任务，要解释明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一切问题的研究方式，应当是简单明了的，具体的，不要有丝毫抽象的空谈。

八

同时，女工代表会分配给女代表一定的实际工作，使她们去了解共产党提出来的原则是的确正确的，使她们在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之中的行动革命化起来。因此，代表会的实际工作计划，要密切的和代表会开会时候研究的问题联系起来。为着这个目的，可以在代表会之下成立各种各式的小委员会，这种小委员会里面还可以吸引非代表的女工参加。如果一个工厂里面有工厂委员会，并且是共产党占优势的，那么，必须经过工厂委员会里的共产党党团，分配女代表去替工厂委员会执行各种日常工作，使她们和工厂委员会密切联系起来。同样，可以利用共产党影响之下的各种团体(互济会、合作社、赤色

工会、出版机关、工人救济会、市议会等等)，来做女工代表会的实际工作。这些团体的共产党党团，是按照着这种工作的性质而规定工作计划的。所以，女工代表会要组织自己的实际工作，是会有相当的困难的，同时，这种实际工作对于女工代表会却有极重大的意义，所以妇女部应当致细研究这个问题，去适应自己工作的条件。

九

第一，女代表应当积极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经济政治斗争，共产党所领导的宣传运动、示威运动、罢工、抗议等等。

第二，女代表在广大的女工群众之中应当进行共产党思想的宣传；她们应当对着选举她们的群众报告，应当竭力去吸引群众来赞助自己负责进行的工作和斗争。

第三，每一个女代表，一定要出席自己的会议，一定要担任某一种或者两种的社会工作，不过同一个时候不要担任到两种以上。

第四，女代表应当推销共产党的各种报纸和刊物，应当鼓励群众来订阅这些报纸和杂志，应当投稿到这些刊物里面——叙说自己的劳动条件、家庭生活和工厂里的日常斗争。

十

女工代表会(男工家族代表会)组织的准备工作，以及进

行这些代表会的日常工作，都应当由全党负责有系统的监督着——从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起直到每个工厂支部为止。各级党部为着要很好的准备代表会，研究问题并且在女工代表会上进行这些问题的讨论，所以要定期的召集：

(一)各工厂推选出来的女工组织员的会议。

(二)党部所派的负责指导者的会议——就是预备按照代表会工作计划去进行谈话、报告等的指导者会议。

(三)参加代表会的共产党党员会议。

凡是有代表会的工厂支部，都应当定期的审查自己的代表会的报告；工厂支部关于代表会的工作，又应当对着相当的党部做报告；整个的下级党部对于上级党部负着报告这种工作的责任。妇女部定期的对着所属党部报告这种工作，并且在这种组织和进行代表会工作方面，是受所属党部的指导的。

中国无产阶级要做什么？

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真是痛苦极了。工人卖气力，靠工钱养活，是无产阶级。资本家自己不要劳动，专靠剥削工人赚铜钱，是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是生成的死对头，你死我活，你胜我败，工人工钱拿得多，资本家赚钱就赚得少，这叫做利害冲突，所以天天要斗争，就是阶级斗争。

中国工人，在中国厂做工也好，在外国厂做工也好，都受资本家的剥削。第一，就是工钱少，现在中国工人少的一天只拿两角三角钱，多的也不过一块八角。柴米油盐样样贵，房租还在天天加。这几个钱那里够用？家婆男女养不活，自己还要饿肚皮。女的也做工，小的也做工——六七岁九十岁就进工厂，工钱是来得特别低。第二是工作_时_间_长，纱厂丝厂总是六进六出，一天要做十二个钟头，有些吃饭时间也没有休息。一个月里只放两天假。别的工厂也好不了许多。碰着国民党的什么总理死日，什么节气，国民党党部叫“放假”，还要捉着工人去替他们捧场热闹，仿佛和尚道士鼓乐队，替人家吹吹打打去做“大出棺材”，临了，资本家是一定扣工钱。这样一天做到晚，一晚做到大天亮，一年做到头，冬天赶早喝西风，夏天没得乘风凉。第三是劳动_条_件_坏，工厂里面不讲卫生，工人十个

倒有八个得肺病。危险的机器动不动就要轧断手，压断脚。火烧起来逃命也逃不了。譬如去年上海闸北，南市的军衣厂，一烧就烧死好几百条性命。矿坑里面更是活地狱。日本人的抚顺煤矿一压压死三千多人，英国人的唐山煤矿也是常常出毛病。工人死了给几块钱“抚恤”，至多也不过一百到八十。真正是“人命还不及驴命，一只驴子也要卖一百五十块白花花的大洋。”第四是工作来得繁重。近来工厂里面特别精明，以前一个人管一部机器，现在要管两三部；罚工钱是越罚越多，工厂管理是越管越紧。有些地方用着新机器，特别开快车，一个不留神，手指头轧断还要罚工钱。第五是待遇十分恶，打骂是常事，调戏女工不算什么希奇。简直是把工人当牛马当奴隶。包工头，流氓包探，常常要请你“吃生活”。第六是开除工人失业苦。现在中外各国闹恐慌，工人农民穷得要没有裤子穿，工厂里面的出产却又没有销场。你说奇怪！真是不奇怪！资本主义底下，生来就是这个样。工厂出产销不完，自然就要做三班，要开除大批工人。工人做得少，工资也发得少。工人被开除，一个钱也上不了腰包。真正要活活的饿死！第七是没有自由。工人开会就要吃官司，工人自己组织工会就要提去坐牢监，不准看革命的报，不准发张把传单，要罢工那简直就要枪毙！第八是资本家的走狗凶。黄色工会是国民党官办的。汪精卫派又来讲阶级调和。陈独秀派专门来造谣反对共产党。这些都是种种式的资本家走狗。他们天天来欺骗工人，弄得你团体结不紧，斗争做不成。你提出条件，他就拉你去请愿。“先上工再谈判”，弄到临了总是受了骗，黄色工会还要抽你的头

钱，要你出会费，要在工钱里面扣算……

中国工人的生活呀，就是这样的活地狱。

中国的工友啊，我们要怎么办呢？

首先就要结团体。工人有团体，就是大力量；没有团体，你有几千百万人也没有用场。第一个团体就是共产党。第二个团体就是自己的赤色工会。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里面顶顶明白的人组织的政党，大家商量对付地主、资本家、国民党，一个工厂总有几个明白人，就要组织起共产党的支部，来领导整个的工厂。

工厂里面要组织赤色工会，会员个个人都要抱义气。大家商量好了，就会齐心一致对付资本家。想法子开大会，大会开不成，各车间里面也好开小会。这样选举几个首领出来当代表，组织起工厂委员会，代表全厂工人去和资本家办交涉。赤色工会会员特别要活动，去劝工友们大家一致赞成工厂委员会。工厂里面相信黄色工会的人，只要真正是工友，说明白了，也会回心转意的，这样，就好赶走那些甘心当走狗的黄色工会领袖和工贼。

工人要结团体，就要会斗争。你去问问你工厂里的工友看：谁不愿意加工钱，谁不愿意减少工作时间，谁不愿意工厂里面讲卫生，谁不愿意工作减轻，谁不愿意待遇好，谁不愿意失业时候要政府资本家月月发给补助费，谁不愿意要自由，谁不愿意要真正自己的工会？！没有人不愿意的。那么，时时刻刻都要提出大家一致的要求，叫赤色工会去宣传，领导斗争起来反对资本家，要自己选举出来的工厂委员会做代表，去向资

本家交涉。大家一致关车、摇班、罢工！工厂一致了，还要联络各工厂，纱厂和纱厂一致，邮政和邮政一致，铁路和铁路一致……工人阶级人人都一致，结成大团体。反对开除工人，反对捉拿工人，反对压迫罢工，反对减少工钱，反对取消休息，要求加工钱，要求减时间，要求赤色工会的自由，要求革命书报的自由，要求失业工人不要付房钱，要求女工生育期间放假给工钱，要求青年工人少做工作、读书不出钱……这样斗争起来，不怕牺牲，不怕压迫，几千万人一条心，不分男女，不分老少，不问同乡不同乡，不问同帮不同帮，自然团体会巩固，力量会高强！

中国的工友们呵！这是我们解放的第一步。不要说我们生活痛苦是命里注定的。自己不反抗，自己不齐心，自己不结团体提要求，那是没有出头之日的。结团体，提要求，还只算得第一步。有了这个，才能够革命哩！

反对国民党的鬼法律

国民党现在定出了反对工人的鬼法律，叫做工会法和工厂法。国民党的工会法讲些什么！第一是不准工人自由组织工会，不准一个工厂里面一切被雇的人都联合成一个工会，工会都要受官厅管，个个工会职员都得当走狗做工贼，并且不许工人和外国工会联合，还有政府办的工厂、铁路、军服厂、兵工厂等等以及一切电车、汽车、自来水、电灯厂工人，一概不准有工会！第二是不准工会领导罢工，只许担任调解，调解就是欺骗，哄着工人讲条件，等过几天就什么也不提了。第三是不承认工人和资本家订的条件，因为就算你订了条件，照法律资本家可以不依这些条件另外去雇用别人，工会没有资格过问。这是完全压迫工人、禁止工人自由的法律！

国民党的工厂法讲些什么？第一是手工工人、小工厂工人，完全不适用工厂法，资本家把他们剥削死了也是合法的。第二是大工厂的工作时间，照法律也可以延长到十小时，甚至十二小时。第三是照法律礼拜可以不放工，休息的时间和日子非常少；工人要在一个工厂做满二十五年的苦工，然后一年才准请一个月假；要一年里的能够请七天假，也要做满整整的一个年头！第四是资本家“官厅可以随便规定最低工资率”，由

他们说顶少几角钱一天，就不准再要加。第五是女工生育期间准你请假，可不准你要工钱。第六是十四岁的小孩子也要你整整的一天做八个钟头。第七是失业工人工厂可以完全不管，工厂不讲卫生是不要紧的；这样，工人失业了就只有饿死，工人残废了受伤了，生病了，也只好领几个小钱，而且资本家不给也不算犯法。第八是工厂要有什么“工厂会议”，可以决定劳资合作的延长工作时间，加重工人工作等等，这完全是保护资本家的法律。这些鬼法律，我们大家一致的反对！

工农兵会议的劳动法

工农兵会议(苏维埃),要开全中国的代表大会,劳动法由工农兵代表自己来定。现在已经有工农兵会议政府的地方(苏维埃区域),并且已经实行自己定出来的劳动法,压制资本家的劳动法。苏维埃的劳动法说什么?第一、个个工人完全自由结工会,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还要监督资本家。工人罢工、怠工完完全全有自由。第二、一律只做八点钟工,每做两点钟就可以歇一歇;一礼拜一定要放四十二点钟的假,并且要给工钱;做六个月就可以请两礼拜假,工钱也是照领。第三、十四岁到十六岁的工人,一天只做四点钟,十六到十八岁只做六点;还有许多优待童工、青年的办法。第四、女工生育期间要放她十六个礼拜的假,工钱要照给,女工特别优待的办法还有好许多。第五、工厂一定要讲卫生,要资本家拿出钱月月津贴失业工人,病痛、残废、死伤要有经常的医药和津贴,这叫做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等等,(详细的请看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劳动法草案》)。犯法的中外资本家重重处罚,一直到没收工厂。

这才是真正保护工人的法律,我们大家要拥护的。

谁要国民会议!

国民政府现在召集国民会议^①。谁要国民会议? 陈独秀要国民会议。他说革命一定革勿成,只好请开国民会议,来实行改良主义。汪精卫要国民会议。他说老牌国民党,改组国民党,老早就要国民会议,都是蒋介石不好,弄到如今还不肯开议。蒋介石也不客气,他居然召集国民会议。这是他们地主资本家勾结帝国主义的鬼计。地主资本家有好几十派,各自的军阀霸占着大大小小的地皮。自己内部要争权夺利,所以要开这个分赃会议。分赃不均自然要打架,现在四川又在大打。打不了要会议,这样的会议不知来过几十次,现在不过换了个名义,叫做什么国民会议。可是,顶要紧的,还是要想欺骗工农兵群众。

原来,农民不交租,红军闹得凶,兵士要兵变,工人常罢工,工农兵会议的运动,轰动了中国好几千万的群众。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自己来开全国会议,就要把政府的权柄握在手当中。你说国民党吓得凶不凶。所以赶紧来欺哄。说,开起国民会议来,工农商会各自把代表来派。可是,资本家、地主至多也不过十万八万,工农兵贫民要有几万万,派起代表来倒是各自团体一般派:工会派一个,商会也要派一个,工会派两个,商会也要派

两个。这已经是天大的不平等,何况,工会要派,也只有黄色工会才准。结果,真正工人代表是一个也没有份!

反对! 反对! 决不要参加这种会议才对! 打倒国民会议才对!

注 释

① 1931年5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国民会议。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以便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固定下来。

工农兵会议大革命!

工农兵会议叫做苏维埃。工厂代表、农村代表、兵营代表，一街一巷一区的贫民代表，都要群众自己来选举。选举出来的代表开会议，议决的事情，发布的命令，规定的法律，就要大家立刻动手来实行。所以工农兵会议就是劳动民众自己的顶顶民权主义的政府。不准地主、资本家选举，不准他们有反革命的自由。这是真正工农自己的政府。现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福建，有好几百县，已经推翻了帝国主义走狗的政府，推翻了地主资本家的国民党政府，建立起了这种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政府。实行了劳动法。没收了地主土地，农民大家平均分配土地。红军就是苏维埃的军队，工农兵自己的军队，兵士和官长绝对平等。男女也完全平等。这种苏维埃政府，正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正是工人联合农民、兵士、贫民的。我们工人要推广他，领导起全国劳动群众，来统一中国，建立全中国的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政府。所以要召集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①。

国民党却在攻打苏维埃区域，攻打红军。我们工人一定要起来大反对。罢工，发宣言，开会，报告，捐款，派代表。大家都来帮助红军苏维埃! 兵工厂工人停工，不替国民党造子弹

去打红军。轮船、铁路工人，不替国民党运兵！拥护苏维埃，拥护苏维埃！好好准备暴动组织大红军，打倒国民政府！成立全国苏维埃！

注 释

① 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的叶坪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及经济政策等。大会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

中国革命要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外国资本家。外国的工人也要打倒外国资本家。有人说，外国工人舒服，家家人家有汽车。这是放屁胡说。譬如蒋介石、胡适之^①，就替美国吹这样的牛屁。美国现在就有一千万的失业工人，没有吃，没有穿，没有住，就是有工做的人，工钱也是不够过活，美国样样东西贵得吓杀人，一件布衫，起码要五元、五元半中国钱，一顿饭，起码也要一元、一元二角五分中国大洋。那里有舒服。美国这样，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都是这样。天下的工人都是一家人，是一个整个的阶级。大家都受资本家的剥削。至于印度、安南^②、高丽^③、台湾、菲列滨^④，这些殖民地的劳动民众，更和中国一样，苦得不了。他们要民族解放。所以中国工人要联合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殖民地劳动民众！

各国工人所以这样苦，是因为他们那里的政府，也在资本家手里。殖民地上，还有外国帝国主义，封建地主的压迫。他们也在天天斗争，反对资本家，反对政府。所以真正明白的外国工人，一定同时反对他们政府派兵到中国，反对给中国南京政府大借款，来杀中国的工农和红军。他们都要知道，中国革

命成功，他们资本家的政府就要大吃亏，他们趁此可以容易革命起来。各国工人都和中国一样，都要革命，建立苏维埃，然后才有真正的解放。中国的工人呵，五月一号一定要大示威，和全世界工友表示大联合！

注 释

① 胡适之，见本卷第61页注⑨。

② 安南，今越南。

③ 高丽，今朝鲜。

④ 菲列滨，今译菲律宾。

苏联是工人的祖国

现在世界上，只有苏联是工人拿着了政权的国家。苏联就是以前的俄国。俄国工人领导农民，领导住在俄国的弱小民族，鞑靼人^①、乌克兰人、波兰人、哥什哈人等等，革命成功了，已经有十三年，工厂归了工人的国家，土地归了国有。政府就是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现在俄国的一切工人都至多只做八点钟，而且大半已经做七小时工了，他们的劳动法对于工人是保护得非常之好。农民群众，就是中农、贫农和雇农，有许多已经把自己分到的土地，几十家几百家的合并在一起，政府发给他们机器，用来耕种这种几千几万几十万亩的大农场。所以工业农业都在建设社会主义。劳动民众人人都是真正享福，真正自由。这真正是工人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

苏联工人这样享福，不是靠什么命运好，是靠自己的斗争，流血，牺牲，受苦，反对俄国的外国的资本家，打了好几年仗，才得到的。并且是靠有顶顶好的共产党领导着。现在各国帝国主义，大家都是更加反对苏联，要想开兵去打，要想封锁苏联，不准苏联输出货物。为什么？因为怕苏联工人的成功，引起各国工人都要革命。帝国主义还指挥着国民党也去

反对苏联。

中国的工人呵，苏联是我们工人的祖国。我们一定要齐心起来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是我们的领导，是我们的榜样。

注 释

① 鞑靼人，即蒙古人，苏联少数民族之一，聚居在俄罗斯联邦鞑靼自治共和国，在西西伯利亚、中亚细亚和乌克兰也有散居的鞑靼人。

德国革命的失败和苏联建设 社会主义的可能问题*

——从苏联共产党第十三次大会
到第十四次党务会议

俄国的十月革命开始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他紧接着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欧洲帝国主义战争之后，事实上把帝国主义的战争，变成了阶级的国内战争。前次帝国主义战争，本来就表现世界资本主义的根本危机；战争之后十月革命的成功，更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的开始。可是欧战之后，世界虽然已经走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虽然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然而社会主义的革命却暂时只在俄国胜利，在其他各国，例如德国、匈奥^①、布加利亚^②等却没有胜利。世界的资本主义，紧接着十月革命之后，除俄国外，只受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的袭击，却还没有被推翻。这个革命袭击的时期——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三年，就是所

* 本文和下面的《苏联发展的总路线和新经济政策的重新估计》，曾由作者编为《英雄死后》(一)，迄未出版。这里根据中央档案手稿刊印。手稿未注明写作时间。

谓“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时期”。这个时期的终了，就要开始资本主义暂时局部稳定的“第二时期”；而“第一时期”的终了，却和一九二三年十月德国革命的失败^③有密切的关系。

一九二三年的世界形势。 德国因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果，因为凡尔赛和约^④的束缚（赔款、鲁尔等区域被法国军队占领），整个国家机体和国民经济受着极大的损害，工业衰落……所以德国当时正在极严重的经济政治的危机之中。当时德国不但工人有革命的情绪，就是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因为马克跌价而破产的，也有革命的情绪；社会民主党^⑤的影响低落下来；德国共产党的影响却有极大的发展。可是，当时德国共产党的右倾分子（白朗德尔^⑥等）占住了领导的地位，他们有极厉害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俄国共产党里面的反对派（托洛茨基、腊狄客^⑦等）却赞助他们。德国——客观上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当时革命的情绪是有了，革命的形势也有了；然而德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右派却做了不少错误；统一战线是没有能够正确的去应用的，汉堡暴动^⑧等的发动是零星散乱的，而且萨克森^⑨地方德国共产党领导者的政策完全是妥协的；因此，德国这一时期的革命没有胜利。

这些错误，使德国工人阶级受着失败；这不但反映到德国工人的情绪，并且反映到俄国共产党一部分党员的情绪。再则：同时布加利亚的革命亦失败了^⑩。布加利亚的共产党员不了解对于农民运动的统一战线策略，因此，自己固然受着极大的打击，农民的革命运动也受着了摧残。德国和布加利亚革命的失败，使俄国共产党里面动摇的情绪，也发露出来。

不久，**列宁的死**（一九二四年一月），更加给了托洛茨基派活动的机会；于是**苏联共产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反对这种机会主义动摇的斗争，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托洛茨基主义的活动，不仅仅反映着世界形势，而且更密切的反映着苏联国内的形势。现在，我们要来说列宁死后，一九二四年的苏联国内的问题。

苏联的劳动和工资的问题。 列宁死后，一九二四年八月的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Plenum of Central Committee）提出了调节工资的问题来讨论。当时发见了工资的增加比劳动生产量的增加快得多，譬如说：一个工人每一天能够生产的纱的数目（所谓：“劳动的生产量”），从去年到今年，只增加了百分之十，而工人每天的工资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在以前（一九二二到二三年），这种情形是自然的，当时俄国共产党的议决案曾经说过：“这种工资增加得比较快的过程，在以前是不可免的，而且是合于规律的。这不但是不可免，而且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就有了后来迅速坚决的提高劳动生产量的可能。”但是，如果一直这样继续下去，那就这种工资的增加和劳动生产量的增加的不相称的情形，可以发生很大的危险——苏维埃国立的工业就要大大的亏本……因此，当时的中央全体会议决定一个口号：“增加劳动的生产量，扩大生产，减低工业品的价钱。全党一切力量和注意都要放到这方面来。”并且发出了这样的指令，说：“各种工业，各个工厂的工资的**增加**，应当严格的和劳动生产量相称，而且要和该种工业，该一托辣斯的来源相称，而且要和全部工业的来源及状况相称，要

和全部工业的需要相称,要和工资的一般水平线相称,尤其是在重工业和交通事业之中。”因此,俄国共产党当时实行了许多办法:至少减低价格百分之十;轻工业之中有几种工业工资已经特别高的,停止工资的增加,使其他工资较低的工业——交通事业、铁矿,能够赶得上;实行正确的劳动合理化;改良技术上的设备;尽可能的完全运用整个的企业;工业的一般支出和原料、燃料等的化费,要最大限度的节省。……

赤色职工国际加入亚摩斯德丹国际^⑩的问题。 这次中央全体会议并且讨论赤色职工国际可不可以加入亚摩斯德丹的黄色职工国际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那年(1924)夏天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大会上,已经研究过。所以当时在俄国共产党中央全体会议之上,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就是季诺维叶夫^⑪做的。

对于“我们要不要加入亚摩斯德丹国际”的问题,季诺维叶夫直接回答说:“我们要加入。”他把这种策略,认为是革命战场上的一种战术。他用俄国红军打仗时候的战术来做比仿。俄国革命的国内战争之中,曾经有过一种马赫诺夫^⑫军队,起初是仿佛站在红军和白军之间的(后来当然变成公开的反革命)。俄国红军有一个时期和这种马赫诺夫军队联合,去打白军。季诺维叶夫就拿这一件事来比仿,解释加入亚摩斯德丹国际的问题,他说:“这亦是一种应付手段。我们联合马赫诺夫军队,当然不是为着我们自己要去做法赫诺夫派,而是为着等到相当的时机,要做这么一回事——这一回事是什么呢?你们大家都知道的,用不着说了。”

共产国际之中，当时不但有右派，并且有“左”倾的幼稚病。共产国际的右派，是俄国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腊狄客、皮亚塔夸夫^④）所赞助的，他们反对共产国际的这种政策。季诺维叶夫回答这些反对派说：

“这班人把我们要渗入亚摩斯德丹炮台的政策，企图解释成为投降的政策。照他们说来，这是我们要和亚摩斯德丹结婚，仿佛是要放弃我们的根本立场了。”

这些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当然是完全不了解布尔塞维克的争取群众的策略。然而季诺维叶夫自己（那时他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不久也跑到反对派方面去了，竟把自己骂这些反对派的话完全“忘记”了！——这是以后的话，现在暂时不提。

乔治亚^⑤的暴动。一九二四年秋天，乔治亚（高加索的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发生武装暴动。这次暴动，是乔治亚的孟塞维克和民族主义者所组织的，他们有一个所谓乔治亚“独立委员会”，就是这次暴动的指挥机关。这次暴动，没有疑问的，是受了欧洲帝国主义的指挥和财政上的接济的。第二国际也是帮助了这次反苏维埃的暴动的，因为一九二〇年的时候，乔治亚的孟塞维克党组织了政府，叫做“若尔唐尼亚^⑥政府”；后来，乔治亚苏维埃革命成功之后，这个政府逃在国外，一直和第二国际有密切的联系。

至于暴动的规模，却不能算小，他包括了整个的两县地方：古里^⑦（就是沃袒尔葛德县）和谢纳克县，此外，还有几县有部分的暴动；总之，暴动爆发的地方，正是贵族王公遗族比

较多的地方。

但是，譬如在古里地方，暴动竟有了农民群众的性质。

然而一般的讲来，这次暴动的经过，正足以证明：苏维埃的乔治亚国和当地少数民族的国家（亚杂里斯坦^⑱，亚白哈齐亚^⑲，南沃斯第亚^⑳）之间，后高加索的许多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确有完全一致的精神。这些自治共和国，不但能够防止自己内部反革命的发动，而且派出自己的军队来帮助邻近的乔治亚镇压反革命的暴动。这次暴动，固然暴露后高加索的苏维埃政权和党部，尤其是乔治亚的，政策上有许多缺点；然而这次暴动事件里面的许多事实，一般的指示出来：“俄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合于后高加索和乔治亚一切民族的利益的。”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那次全体会议开会的时候，正接到乔治亚暴动的消息，因此，通过了好些决议：加紧苏维埃的社会工作，审查下级机关的工作，改良供给商品的机关，实行反对乔治亚贵族影响的残余，而对于乔治亚的农民公社，给以驱逐贵族出境，没收贵族财产的权力，把没收来的财产交给农民，使最大多数的贫农得到真正的利益。

苏维埃的积极化。 一九二四年秋天，发见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互相关系之中，有许多不好的现象。从“战时共产主义”的时期以来，在好些地方，余留下来对于农民施行命令主义的习惯，滥用强迫的办法，而事实上，现在正要用说服的办法去领导农民呢。农民的不满意，因为许多缘故而表现出来：饥荒时期（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的结果，一九二四年的收成

不好，俄国工业发展的迟缓，因而不能够完全吸收农民之中多余的劳动力。工业品价钱太高，合作社办得不好。下级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此外，有许多苏维埃的下级机关，不受群众的监督，任意的胡闹，不遵守革命的法律，——所有这些，都足以引起农民的政治上的不满意。

农民不满意的这些缘因之外，还要加上苏维埃选举事务的极端不好。地方上办理选举的时候，只顾着尽可能的多选共产党员，而不会推选社会上有信仰的农民来做苏维埃工作，不会吸引贫农、中农的全部群众来参加选举，而且积极的参加苏维埃机关的工作。这种情形之下，所以一九二四年秋天，农民参加选举的很少很少，大多数人民是没有参加的。

自然，俄国共产党应当很快的很坚决的来纠正农村政策的这些缺点。

一九二四年十月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开全体会议，这次十月的中央全会，就特别注意农村苏维埃积极化的问题。当时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区域委员会、省委员会、州委员会之下的农村工作委员会，要有系统的整顿自己的工作。随后就实行检查农村党部的工作，一切党报上面，加紧的讨论农村工作问题。后来，在一九二五到二六年，曾经为着执行这个决定，而检查了一批最不全最薄弱的农村支部，为的是要消灭农村之中下级的苏维埃机关和党部机关的缺点；并且从农民之中推选了几万新的工作人员；特别办了许多种训练班和短期学校，训练乡区的党部书记、合作社人员、青年团、农务运动的工作人员、小学教员；党员和非党员都有参加这种训练的。

并且从县党部以上，都设立农村巡视员，由农民和农妇担任，而尤其注意农村通信员的工作；此外，还派了许多最负责的人员，其中有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省政府主席、中央政府各部部长等等，到乡区和外县去工作两三个月。

所有这些办法，当然有极大意义，俄国共产党的农村工作因此有了一定的转变。自然，此外还有其他的办法：加紧的注意出版许多廉价的农民书报；更加谨慎的去做反宗教的宣传，禁止用行政的方法去干涉宗教的迷信；改良共产青年团的成份，吸引中农青年，尤其是贫农雇农的青年。这样，下级的苏维埃机关加强起来。后来，第十四次党务会议和第十四次党的全国大会，就更进一步规定好些经济办法，来更加巩固共产党在农村之中的影响。

托洛茨基的《十月教训》。 正在这种时候——列宁死后，西欧革命运动低落，俄国工业发展迟缓，工人政府和农民的关系需要改良的时候——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开始攻击俄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

一九二四年秋天，托洛茨基收集他的旧作——论十月革命的好几篇论文，出了一本文集，并且加了一篇序言，题目叫作《**十月教训**》。这篇《**十月教训**》是特别为反对当时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而做的。这篇序言是一篇辩论性质的文章，曲解十月革命的意义，捏造十月革命的经过，而对于工人阶级、共产党和他的领导者列宁在十月革命之中的作用，加以无耻的诬蔑。照托洛茨基的这篇序言看来：仿佛十月革命之中主要的作用是托洛茨基的，共产党却没有起什么作用；列宁呢，

也要托洛茨基去劝他——仿佛是托洛茨基对列宁说了“可以暴动了”，然后列宁再有这样的决心。这篇文章完全曲解一九一七年斗争的经过，曲解那年四月示威之中和七月事变^②之中列宁的作用。

托洛茨基在这一篇《十月教训》里面企图复活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而要拿他来代替列宁主义。照托洛茨基说起来，仿佛不是他承认了自己政治路线的破产而归到布尔塞维克党方面来，却是列宁归到他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了。因为托洛茨基有了这样的出发点，所以他就说：二月革命^③之后，布尔塞维克主义实行了思想上的“改换武装”。托洛茨基在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没有了解布尔塞维克的主义；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仍旧留在孟塞维克的营垒里面；他自然不了解列宁的“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因此，竭力想用他的“不断革命论”来代替列宁对于十月革命的观念。很自然的，托洛茨基的这本文集，大受一切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仇敌的欢迎。这本文集，各国都翻译了出来，重版了好几次；而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称赞托洛茨基的这本书，说这是“大家早就期望的书”。德文翻译本上，还有著名的共产国际叛徒莱维(Paul Levi)^④做了一篇序——请一切和工人运动有关系的人，都要读一读这本书。为什么？——因为照《前进报》的意见：托洛茨基在这本书里面，“叙述他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和季诺维叶夫以及他的学生不相同的，并且用批评的态度，打碎俄国现在统治者的手段。”俄国共产党，自然不能够不对付托洛茨基

的这种行动，因为那篇《十月教训》的文章，引起了严重的问题，就是：俄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否正确？托洛茨基说德国革命和布加利亚革命的失败，是因为共产国际领导得不正确。托洛茨基对于怎样才是各国共产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就是要教育他们——选择领导人材，使他们在自己的‘十月’之中不要动摇。”他这句话，是暗指着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④等在十月革命时候反对暴动的动摇，而说他们这班人不配领导共产国际和共产党。

当时，布哈林^⑤回答他的话是很正确的，布哈林说：如果十月革命时候不应当“动摇”，那末，一九一七年以前的革命之前的准备时期也不应当“动摇”，十月革命之后一样的不应当“动摇”，——而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前跑到取消派方面去；十月革命之后，托洛茨基一派的人在货币改革问题上，在经济政策上……都“动摇”过的。当时，俄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大家都写了很多文章，做了很多报告和演说，反驳托洛茨基，尤其是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因为托洛茨基那本书特别攻击他们两个人。可是，过了一年，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跑到了托洛茨基那边去，完全“忘记”了自己反对托洛茨基，指出托洛茨基的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文章和演说了。

最有系统的分析托洛茨基《十月教训》里面的错误，是史太林^⑥，史太林说：以前托洛茨基主张所谓“左”的“不断革命论”，对于农民的革命作用估量不足，对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历史任务完全不了解；现在托洛茨基派曲解列宁主义，说列宁主义的理论在一九一七年实行了“改换武装”，采取了托洛

茨基主义的精神，——这都是错误的。托洛茨基把俄国共产党的历史，描写得仿佛十月革命之后才开始的。托洛茨基竭力证明主要的布尔塞维克干部已经没有用了，必须根本变更党的领导，——这是他造谣诬蔑。

一九二五年一月，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特别为了托洛茨基的问题通过了一个议决案，指出托洛茨基这样不断的攻击布尔塞维克主义，使俄国共产党必须决定：或者抛弃铁的纪律，抛弃根据于列宁主义的完全一致的观点，或者就要永久禁止这样的攻击。

这次一九二五年一月的中央全会，特别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举动，对于国内一切反苏维埃分子和动摇分子，等于是团结起来反对俄国共产党政策的信号”，“这是对于布尔塞维克主义的修正主义，这是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这次一月的中央全会，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等是参加的，他们对于托洛茨基问题的决定，是赞成的！当时对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估量就是：“托洛茨基主义是假造共产主义去接近所谓‘欧洲式的’伪马克思主义，就是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

当时托洛茨基的行为，的确是破坏工人阶级的纪律，挑拨农民的感情，动摇苏维埃海陆军的军心——因为他是苏联政府军事部的部长和苏联革命军事评议会的主席；他并且还提倡一种说法，说革命的老前辈，“老布尔塞维克”已经腐化，只有青年的后辈，才有革命的进取精神，——他这样引诱青年去做“老辈和后辈之间的斗争”，这当然是反列宁主义的。一月的

中央全会把这几点都规定在议决案里面，并且说：俄国共产党全党都要求托洛茨基停止反对党内极大多数的斗争；共产国际全体亦已经觉察俄国共产党里面一个极著名的党员，正在妨碍共产国际各国分部的布尔塞维克化。可是，一九二五年一月的俄国党中央全会对于托洛茨基只给了最严重的警告，说“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员，就一定要不但口头上服从纪律，而且真正的遵守纪律，完全无条件的抛弃反对列宁主义思想的斗争。”那次会只决定撤消托洛茨基的革命军事评议会主席的职务，当然也就撤消军事部长的职务。

可是，正在这个时候，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里面，又发生新的不同意见：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主张只要撤消托洛茨基的军事工作，而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等主张立刻撤消托洛茨基的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少数人，因为自己的主张通不过，所以就用许多手段想取得多数。共产青年团里面赞成季诺维叶夫主张的人，就在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里提出他们的意见，想经过青年团中央通过之后，再向党的中央提出，要求重新讨论。可是，在青年团中央，这种意见仍旧没有通过；于是季诺维叶夫就在列宁城企图组织第二个共产青年团的中央。当时，列宁城青年团正在开列宁城区域的青年团会议，季诺维叶夫等便设法请了许多其他地方省委、区委的代表到会——青年团中央是并没有知道的；自然，季诺维叶夫请这些人到会，是运动他们继续反对史太林等——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那时候，已经在各地，地方党部，市区区委等里面，准备着反对党中央的多数派，

说他们宽容托洛茨基派。后来，很快的就发见季诺维叶夫派和苏联党中央之间日益深入的思想上的不同意见。

这样，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党务会议之前，已经开始季诺维叶夫派的活动。所以一九二五年，可以说是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离开党的路线的开始时期，也就是所谓“新反对派”开始形成的时期。

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党务会议。 第十四次党务会议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开的，极致细的讨论了党内组织问题、合作社问题、农业税问题、五金工业问题、革命法律问题、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扩大会议问题。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就已经是“一个国家里面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了。

这次会议的议决案说：“我们党现在的中心问题，是要注意实行无产阶级对于农村的正确指导的任务。”为什么这是中心的任务呢？因为好些“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有害的残余，还在妨碍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正确指导；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领导，那么，无产阶级国家的两个主要的社会力量：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联盟，就不能够保存；而没有这种联盟，社会主义的建设，就要成为不可能的。

俄国当时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有好些矛盾。那次党务会议的议决案说：“这些矛盾在无产阶级国家里面，并不是不能够克服的，只要能够正确的实行国家对于物价的经济上的调节办法，只要国家尽量去赞助基本农民群众的恢复农业经济。”“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使农村之中的这些矛盾，在经济上，以及在政治行政上，都更加剧烈起来。所以必须消灭“战时

共产主义”的残余，必须“吸引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如果不能使工人同着农民来实行伟大的建设，那么，决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无产阶级国家对于农村的方法是什么呢？第十四次党务会议所规定的是：“苏维埃的积极化（以及合作社农民委员会的积极化），真正广泛的推选无党的农民农妇到各级苏维埃、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执行委员会、合作社，以及其他机关里来，担任负责的工作；当然，同时改良农村之中的党的工作，加强苏维埃国家各种机关里面的共产党的影响。这次会议，并且指出许多具体的工作方法：关于苏维埃之中的、关于工会之中的、关于青年团的、关于合作社的、关于农妇代表会议的等等。专门创办了一种《农村共产主义者》的杂志，训练农村之中的党部工作人员，并且设法改良农村之中党部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决定要吸引雇农、贫农、中农到农村之中的党部里来工作，以便革新并且充实农村之中的党部机关。因此，决定雇农、自耕农和工农出身的红军兵士进党的时候，介绍人只要两个两年以上的党员。以前有许多地方的雇农和农民愿意进党，可是不知道怎样才可以进，因为他们那里没有党部。这次决定派出许多有资格介绍农民入党的党员，到这些地方去，去调查愿意加入党的农民雇农的情形。

第十四次党务会议上的合作社问题。 列宁的合作社计画——本来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农民所懂得的方法，去引进小农经济来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这个计画对于现在的俄国，一年一年的更加有起实际的意义来了。俄国的合作社，日益包

括更广泛的农民群众；各种各式的合作社从各方面去联络农民的经济行为，而一天天的几乎成为个个农民都加入的团体了，所以他不但造成农村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并且使农民的积极性得着了出路。

第十四次的党务会议，特别着重的说明：“必须使农业人民的一切阶层都有权利参加合作社。”后来季诺维叶夫、加美尼夫的“新反对派”就说这是对富农让步。其实，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当时就预先防止到了这种危险：因为富农分子经济能力比较大，又有一些行政上的经验（以前的村长、乡区的班头、商人等），可以在合作社机关之中取得领导的地位，所以那次会议同时就决定：——“为着保障大多数农民在合作社里面的指导影响，各种合作社必须在自己的章程上，规定限制明显的富农分子加入合作社干事会的条文。”固然不错，就是有了这种限制，中农之中的富裕分子仍旧可以在许多合作社机关里面发生决定一切的作用。然而，苏联共产党是明白的：如果把中农从合作社方面推开，那在政治上是很有害的。这反而可以使中农去亲近富农。苏联共产党的政策是：使中农不和富农联盟，而在农村的贫苦人民方面来和无产阶级联盟。苏联共产党对于各种合作社的政策和办法是：发展农业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根据农村商品的发展，而巩固一切合作社，把多余的农产品加以制造，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农业，就是各种集体农场、农业公社，广泛的供给农民群众以生产资料（机器、化学肥料等等），——所有这些办法，都加强了苏维埃对于“个别的散漫的农民经济的生产过程”的影响。

当时苏联共产党已经决定：必须比以前更加注意农业的集体化。然而必须先改变以前的组织方法：以前各种集体农场、共耕公司、劳动公社、农业公社，很久都去当做消费组织去办的，现在特别着重的说明：这些组织应当发展自己的商品，亦用“经济计算”的原则，——所谓“经济计算”的原则，就是要计算收入支出的相抵，并且要竭力去增加收入，整顿支出，日益改良。

同时，认为必须提高农业的技术；而在田地经营的工程方面，应当首先满足实行集体农业的农民的需要。

中央和地方的农业银行，以及农业信用协会的一般信用事业，加了一番整顿。并且实行了好些办法，使国家在乡村之中的采办机关，有了更加正确的工作方法。

而且这次党务会议又整顿了手工艺合作社（农民副业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的工作。极广大的手工业者的群众，被吸引到了合作社运动里面来，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自然，应当知道：就是在副业合作社的名义之下，亦仍旧有时候有些私人资本家和企业家暗藏着。然而并不能够因此就变更无产阶级国家对于手工业的政策——手工业和农民的各种副业正应当用合作社的方法去发展，俄国农民副业和手工业的出产品，对于国内的城市和农村市场，都很重要，而且最近几年来，已经成为国外贸易的出口品（例如皮货、手工艺制品等等）。所以第十四次党务会议的这个决议，经济上的意义是很大的。

农业统一税的问题。 第十四次党务会议，对于农业统一税，有一个新的决议——农业统一税的总额大大的减少了。

国家对于某几种纳税人，竭力设法减轻他们的负担：首先就是贫农和一部分中农。这个目的，是在于使贫农、中农的群众愿意去改良农业，并且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线，增高农家的技术程度，更加多用机器，多种“原料植物”（棉花等等），而且使农业之中的资本积累，更加容易些。因此，农业统一税的全国总额，减少到 280,000,000 卢布。不但如此，苏联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从农业统一税的收入之中拨出 100,000,000 卢布，归作各乡区的经费，为的是加强乡区，帮助乡区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发展。而第十四次党务会议，对于政府的这种决定，表示完全的赞成。

这里，我们特别着重的说明，因为这个政策的意义，的确在于使私人资本的积累更加容易些。第十四次党务会议决议的意思，本来是认为当时必须使农民容易发展他们的经济，就是要有充分的工具、机器、播种的牲畜和各种种籽等等。这就是资本积累，这就是农民的发财；没有这个条件，农业商品化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自然，当时俄国共产党的政策，是要发展合作社，发展私人经济的集体化，并且把私人经济的资本积累也引导到农业的合作社化和集体化的轨道上去。

布哈林却提出一个“大家发财罢”的口号，想出一种“富农生长到社会主义里面去的”的理论。当时布哈林派的史列普夸夫，在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杂志上，说到“新经济政策^②的扩大”。俄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这种对于党的路线的解释，是错误的。所以发出这种言论的人曾经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后来（1929—30年），俄国共产党的右派（布哈

林等)重新又提起这种错误的观点,这是和俄国共产党“农村集体化”的政策及路线互相矛盾的。所以我们应当知道:一九二九年前后右派的立场,是和布哈林在第十四次党务会议之后所想出的“富农可以生长到社会主义里面去”的理论,有密切的联系的,——当初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是后来右派整个机会主义立场的根源。可是很明显的是:布哈林曲解第十四次党务会议的政策,是他个人的错误,是他一派人的错误;至于第十四次党务会议政策的本质却并没有错误的。第十四次党务会议的决议是说:“奖励并且保障农民积累内部的健全积累的过程,同时,改良农村税收的制度,以阻滞富农分子的生长。”这种决议,是当时一致通过的,季诺维叶夫、加美尼夫和托洛茨基,在那次党务会议上并没有起来反对。

当然,在俄国共产党的许多论文书籍里面,对于这个路线的解释,也有些不正确的措辞。

一九二五年初,托洛茨基主张:“扩大农村之中商品资本主义关系的范围。”托洛茨基当时竭力主张必须发展“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以便发展农村之中的生产力”。托洛茨基说不必把“富农”的名称去称呼富农。可是过了没有多久,托洛茨基忽然出来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是在“农村之中扩大新经济政策”。这真是“张冠李戴”了。并且托洛茨基就在骂苏联共产党的那次演说里面,自己还说:“我们或者实行战时共产主义而阻止农村之中生产力的发展,或者在现在阶段放任农村之中生产力的发展,就算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去发展也是好的。”(托洛茨基:《论我们的新任务——一九二五

年九月一日在札波洛齐党部全城会议上的报告》。国家印刷局出版，一九二六年，第十九页)

一个国家里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党务会议另外有一个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议决案，这是非常重要的议决案，这个议决案说明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任务。为什么这个议决案非常重要呢？——因为国际革命的速度表现迟缓的现象的缘故，所以就讨论到资本主义稳定和苏联命运的问题。这是第一次郑重讨论“资本主义稳定问题”的议决案，也是第一次郑重讨论“一个国家里面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议决案。这个议决案的草案，是季诺维叶夫提出的，当时他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关于“一个国家里面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是在第十四次党务会议上就通过的（一九二五年四月），是季诺维叶夫自己所提出的草案里面就说到的。这个决定通过之后，就成为全党的主张，后来俄国共产党全党一直没有放弃这种意见。这个理论，可见是在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五年九月）之前，就正式决定的。但是，到了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大会的时候，发见了季诺维叶夫等的“新反对派”，他们说这个“一个国家里面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理论是狭隘的民族成见，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的。这真正是明明白白的东西：并不是俄国共产党的大多数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季诺维叶夫等反对派自己违背了第十四次党务会议的决定。

第十四次党务会议的议决案里面，首先特别着重的说明：

当时欧洲没有“直接革命形势”，然而一般讲来，“革命形势”无条件是仍旧保持着。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问题，说：“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的欧洲，有部分的资本主义稳定，别方面在苏联，国民经济里面的社会主义成份却正在加强，国家工业正在发达，这是没有疑问的。”这种情形，造成一种相当的形势。因此可以希望：“苏联就是用自己的力量……也能够继续发展自己的经济，继续做世界革命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而帮助别国工人准备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国际根据列宁所说明的“政治经济之发展的不平衡”公律，特别着重的指出：列宁说的社会主义可以先在几国，甚至于先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面胜利——是正确的。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党务会议的议决案说：

“俄国革命的经验证明：这种先在一个国家里面胜利，不但可能，而且在极有利的环境里面（在国际无产阶级相当的赞助之下），这种先在一个国家里面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能够保持，能够长久的巩固下来——就算国际无产阶级的赞助没有表现在别国之中，直接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也是能够持久的。”

这种说法正是直接针对着托洛茨基理论的答复。托洛茨基的理论是没有别国革命的爆发，先在一个国家里面胜利的革命不可避免的要失败，而且照他的意思，必须先进的资本主义强国里面爆发革命，然后再有用处。第十四次党务会议的议决案还说明白：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就是绝对保障不会有资产阶级关系的复活，这是一个问题，而建设社会主义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必须分开。那个议决案说，社会主义

的最终胜利就是绝对保障不会有资产阶级关系的复活，——这的确只有在国际范围之内才有可能（或者在几个决定一切的国家里面革命成功之后，才有可能）。

可是，同时，第十四次党务会议提到列宁对于上面所说的意思曾经有修改和补充的地方。所以党务会议的议决案，就接下去说，照列宁一九二一年说的话：

“十年二十年有正确的对于农民的关系，那就可以保障全世界范围的胜利（现在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在发展，可是，就算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受到了阻碍，这种保障还是有的）；不然呢，就要受着二十年四十年的白党恐怖屠杀政策的磨难。”

党务会议的议决案接着就说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意思就是并不因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里面才有可能，就可以说：“在俄国这种国家，没有经济上、技术上比较先进的国家的帮助，就没有可能去建设完全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是反驳托洛茨基的说的。托洛茨基的意见，认为“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发达，只有在欧洲最重要国家里面无产阶级胜利之后，才有可能”（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说的话），——这种说法，第十四次党务会议认为是“要使苏联无产阶级在现在时期采取宿命主义的消极态度”。再则，第十四次党务会议就发展列宁的“合作社计画”，说明在苏联一个国家里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这里，我们只要注意列宁“合作社计画”的主要意思：是认定俄国这种国家已经有建设完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必要的前提。

关于共产国际政策的问题，第十四次党务会议那个议决

案里面，特别有一条，专门指出俄国党和托洛茨基主义不相同的意见：

“党和托洛茨基的争论，是策略的问题——就是现在世界革命发展迟缓的时期，共产国际的策略应当是怎么样的？”

托洛茨基同志过分估量英国和美国的接近，因此他就不得不认为，必须重新审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他的意见引起“超帝国主义”问题的讨论）。同时，托洛茨基和腊狄客同志，以及他们最接近的同一意见的人，完全赞助德国白朗德尔一派在一九二三年的策略，——这一派人，企图把统一战线的策略解释成为联合社会民主党的策略。”

这就是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路线和托洛茨基主义不相同的地方。

这样，在一九二五年秋天的时候，俄国共产党已经很精确的说明和托洛茨基派不相同的意见。所以后来季诺维叶夫、加美尼夫和他们一派的人，跑到托洛茨基派方面去，反而来攻击俄国党中央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的时候，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权利责问他们：第十四次党务会议的那些议决案是大家一致通过的，季诺维叶夫等等也是赞助的，也是站在中央大多数一方面反对托洛茨基的反对派的，现在究竟是谁违背了党的议决案，究竟是谁变更列宁主义的策略，究竟是谁修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究竟是谁不正确的解释统一战线的策略，——解释成为应当和社会民主党去组织联合政府的策略呢？这是很明显的事情：——是季诺维叶夫等投降了托洛茨基主义。

自然，俄国共产党在那个时候已经看见另外一种危险，就

是有一部分同志可以认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里面也是可能的，那么，就可以不必顾到国际革命的命运。再则，俄国共产党的个别党员，也许真正会有狭隘的民族成见；或者有些同志简直认为最近期间国际革命的发展是没有希望的了，因此就消极起来。俄国共产党对于这一类的倾向，时常给以极坚决的打击。俄国共产党是决不会有这种观点的。

注 释

① 匈奥，即奥匈帝国，1867年由奥地利和匈牙利统治阶级在奥地利帝国基础上建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散。

② 布加利亚，今译保加利亚。

③ 指汉堡起义。1923年1月，法、比军队占领鲁尔，德国出现革命形势。10月23日，在恩斯特·台尔曼的领导下，汉堡工人响应德共中央号召，发动起义，占领警察局，构筑街垒，与反动军警激战。但由于当时操纵德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分子布兰德勒又通知各地取消起义，使汉堡工人孤立无援，被迫于25日退出战斗。

④ 凡尔赛和约，全称《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英、法、美、日、意等战胜国为一方，和以战败国德国为一方，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凡尔赛宫签订。

⑤ 社会民主党，原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2年12月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该党早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怀下，对德国工人运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在帝国议会中投票赞成政府的军事预算，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发动侵略战争，以致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战争工具。

⑥ 白朗德尔，今译布兰德勒。见本卷第61页注⑪。

⑦ 托洛茨基，见本卷第31页注⑩。腊狄客，今译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1885—1939）。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后成

为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1937年被控叛国罪,判刑10年。

⑧ 汉堡暴动,见本文注③。

⑨ 萨克森,德国的一个州。

⑩ 1923年6月,保加利亚国内建立法西斯政府,大肆镇压革命活动。9月14日,在保共中央号召下爆发了全国大罢工。9月22—23日,保共中央进而决定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法西斯政府,建立工农政权。9月30日,起义失败。

⑪ 亚摩斯德丹国际,即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又称国际工会联合会,1919年7、8月间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成立。该组织为各国右翼工会领袖所把持,长期同赤色工会国际相对抗。1945年10月世界工会联合会成立后宣告解散。

⑫ 季诺维叶夫,今译季诺维也夫。见本卷第33页注⑭。

⑬ 马赫诺夫(Mahnov, 1889—1934),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乌克兰反革命匪帮头子。

⑭ 皮亚塔夸夫,今译皮达可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 1890—1937),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3年后成为托洛茨基反对派分子,1927年,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1988年平反。

⑮ 乔治亚,今译格鲁吉亚。

⑯ 若尔唐尼亚,今译普洛列塔利亚,俄文пролетариат的译音,意为无产阶级。

⑰ 古里,今译哥里,为格鲁吉亚共和国的一个市。

⑱ 亚杂里斯坦,今译阿札尔。

⑲ 亚白哈齐亚,今译亚美尼亚。

⑳ 南沃斯第亚,今译南奥塞梯。

㉑ 七月事变,指1917年7月3日(公历7月16日)俄国资产阶级政府镇压工人群众游行示威的事件。

㉒ 二月革命,见本卷第192页注㉓。

㉓ 莱维,今译列维(Paul Levi, 1883—1930)。早年德国共产党领

领导人之一，曾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0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合并，他被选为两主席之一。1921年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⑳ 加美尼夫，今译加米涅夫。见本卷第33页注㉔。

㉑ 布哈林，见本卷第32页注⑩。

㉒ 史太林，今译斯大林。

㉓ 新经济政策，苏联在1921—1925年实行的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为了区别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旧政策而得名。它的主要措施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大力发展商业，在一定限度内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并以租让、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农业和商业中完全占了统治地位，新经济政策于1925年结束。

苏联发展的总路线和新经济政策的“重新估量”

——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大会

新反对派。 一九二三年秋天托洛茨基^①就起来反对俄国党的中央，自己提出所谓“新方针”；一九二四年秋天，托洛茨基又发表《十月教训》那篇文章，——总之，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使俄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在一九二五年一月撤消托洛茨基的军事部长，这是列宁死后俄国政治上第一次的大变动，上面已经说过。可是到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大会的时候，党内又发生“新的反对派”——就是季诺维叶夫^②派，亦叫做“列宁城派”。

俄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党务会议上（一九二五年四月），虽然大家一致的通过了好些议决案，可是，俄国党中央和政治局里面，仍旧没有统一的意见。本来一九二五年一月的时候，季诺维叶夫为着主张撤消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和大多数中央委员发生争论。后来这种争论之中，添上了许多原则上的问题。那年秋天，国家采办粮食和草料的时候，计算上发生很大的错误；因此，分配粮食和草料给全国工厂和机关的时候，收入和支出就不能够相抵。为着这个缘故，于是工人国家

和农民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就特别紧张起来。加美尼夫^③说，全国“剩余粮食”的百分之六十一，是在百分之十四的农民手里，就是在富农手里，——富农是农村之中的“中心”人物，却并不是中农。照加美尼夫的意见，调节市场的人也是富农，而不是国家。加美尼夫和季诺维叶夫从这种不正确的意见里面，又做出许多其他的结论，因此他们就准备和中央斗争。他们调动列宁城党部的干部，列宁城党部的书记札鲁茨基^④完全是他们一派的人。他们“发明”一种“理论”，说俄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和法国大革命时候右派推翻了罗倍士比埃尔^⑤实行山岳党^⑥革命独裁的领袖之后的情形一样，就是已经走向“开倒车”的道路；罗倍士比埃尔被杀的那一天，是法国革命新历“热月”九日——“热月”，法文 Thermideur（德尔米它——注）——所以季诺维叶夫派说俄国党已经发现“德尔米它式的腐化”、“热月政变的腐化”。季诺维叶夫派在列宁城地方党报《列宁城实话报》上，发表许多反对党和中央决议的文章。在列宁城省区党务会议上，季诺维叶夫就去准备反对中央的斗争。他做报告的时候说：莫斯科省区党务会议的议决案的意思，是提倡一个“打击列宁城的人”的口号，——其实没有这么一回事。第十四次全国大会之前，各地进行选举代表的时候，列宁城省区的党部，为着要保障列宁城省区代表团内部的“一

注：法国大革命初期，废除基督教的历法，另外施行一种革命新历，月份的名字都改过；这个“热月”——“德尔米它月”约当普通日历（基督教历法）的七月十九到八月十九，在新历的排法是第十一个月份。

致”，把赞成中央委员会的人，都从候选名单上勾掉——其中有史太林、资尔仁斯基^⑦、郭万洛夫、洛白夫等。这样，在第十四次大会上，发现了“新反对派”。这件事情，在俄国党内引起非常之奇怪感想。当初的确有许多党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几十年来，季诺维叶夫一班人，一直说托洛茨基主义是孟塞维克主义的一种，说让托洛茨基来领导是非常之危险的，尤其是在需要剧烈转变的关头，这班人许多年以来一直说中央的路线是完全对的，可是，现在忽然间出来说，中央的路线不对，说他们和中央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开始的时候，仿佛只有列宁城代表团一派人攻击中央。可是，在季诺维叶夫做副报告的时候，已经可以听得出他的意思：是要拉拢一切反对中央的分子，不管这些分子的政治立场是怎样，只要能够加强对于中央的攻击。季诺维叶夫在他的副报告结束的时候说：“我们对于党内派别的问题，仍旧是站在以前的立场上，可是，现在应当委托中央委员会吸引党内以前的一切派别，并且给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之下工作的可能。”他并且要求出版一种经常讨论的周刊。这种意思是很明显的，他想借此拉拢一切不满意中央路线的分子。讲到“给以工作可能”的问题，那么，俄国共产党向来有一个标准，就是要看这个同志是否赞成，是否真正有能力执行党的总路线，如果是的，那么，必定给他相当的工作——这是以前季诺维叶夫、加美尼夫等亦是这样主张的。而且俄国共产党的惯例：即使这个人不完全同意中央的路线，可是能够尊重党的决议而去执行，亦给他苏维埃国家的很负责的领导位置。事实上也一直是这样的。并用不着季诺

维叶夫来替他们要求！所以季诺维叶夫的“新反对派”，一开始就存着结合无原则的反对派联盟的居心。他那些说话，不过是拉拢不满意分子的手段。果然，在一九二六年之中，这个“新反对派”变成了各种反对派的大联合——他的领袖就是托洛茨基——俄国党第十四次大会到第十五次大会之间党内反对派思想上的大首领。

经济建设的成绩。 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大会之前，国内的经济情形怎样呢？**新经济政策**^⑧实行之后，到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五年，这五年的成绩实在可以算是很大的；现在已经可以更加广大的来计画社会主义的建设，增加社会主义发展的速度——国立工业方面是这样，合作社运动方面也是这样。农业经济的恢复，比较起欧战之前的程度来，已经有百分之七十一，当时预算一九二五——二六年度，可以恢复到百分之八十八。工业方面，在当时——一九二四——二五年度，亦已经有百分之七十一；后来到了一九二五——二六年度，就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五。再则，苏联经济的特点，是在新经济政策之下有两种工商业：一种是国立的或者各种合作社办的，这是各社会主义的部分；一种是私人企业家承租的或者外国资本家来承租的，这是资本主义的部分；苏联国民经济之中这两种部分的互相比较，是最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当时这两种部分的比较：

工业	国立工业和合作社的工业	一九二三——二四年度	96%
	私人的资本主义工业	一九二三——二四年度	24%
	国立工业和合作社的工业	一九二四——二五年度	80%
	私人的资本主义工业	一九二四——二五年度	20%

商业	国立商业和合作社的商业	一九二三——二四年度	65%
	私人的资本主义商业	一九二三——二四年度	35%
	国立商业和合作社的商业	一九二四——二五年度	75%
	私人的资本主义商业	一九二四——二五年度	25%

同时，无产阶级的数量也增加了，各种工业以及农业之中的工人都增加了。照劳动部的统计：

1924年 全国工人——5,500,000人

1925年10月 全国工人——7,000,000人

工人的工资也增加了：一九二五年四月，工资比较欧战以前的程度是百分之六十二；到一九二五年九月就已经到了百分之九十五（每个工人的平均生产量比欧战以前的程度是百分之八十五）。社会保险费的基金亦相当的增多了。其他满足工人阶级和贫农需要的国家预算，都相当的增多了。

这些统计表里的数目字，很明显的表现当时社会主义经济发达的程度。所以第十四次大会，必须郑重讨论好些极重要的经济问题。总起来说，就是要讨论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俄国共产党已经应当规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也就是苏联整个国家发展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的决定，是第十四次大会的历史任务；他决定的主要意思是：俄国共产党的工作，应当抱着一个目的——就是把俄国这种“农业工业的国家”变成“工业农业的国家”，换句话说，是要把只有少许工业的农业国家，变成农业亦用工业方法经营的工业国家。所以第十四次大会对于俄国共产党有极重大的意义，他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方向应当是更坚定的“工业化”的道路。这和“一个国家里面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一个国家里面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重新讨论。“一个国家里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党务会议上（一九二五年四月），已经讨论过；当时，季诺维叶夫、加美尼夫等亦是一致赞成而通过了相当的议决案，甚至于托洛茨基亦没有起来反对。那么，为什么到了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大会的时候，这个问题又“旧事重提”起来呢？因为第十四次党务会议的议决案通过之后，不久，季托维叶夫等“新反对派”忽然又反对起来，当时出版的季诺维叶夫的《列宁主义》，还有萨法洛夫^⑧、札鲁茨基等的文章，对于“一个国家里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大大的攻击讪笑起来，他们亦不管确定这个理论的俄国共产党党务会议议决案，还只是刚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批准（国际执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一九二五年四、五月）。后来，季诺维叶夫等，同着一切反对派，例如萨普洛诺夫^⑩派等等，都来讥笑这个理论是“狭隘的民族成见，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责备俄国共产党有“狭隘的民族成见”！这句话是从那里来的呢？

这句话的来源却远得很呢！

还是在一九一五年，托洛茨基在他个人的机关报《我们的话》上面就说出这样的话的。当时托洛茨基责备列宁有“**狭隘的民族成见**”。因为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八月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无条件的公律。因此，**社会主义先在几个甚至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面胜利是可能**

的。这个国家里面的无产阶级胜利之后，没收了资本家，组织起自己的社会主义生产，去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全世界，吸引其他各国被压迫的阶级来赞助自己，引起他们反对资本家的暴动，有必要的时候，甚至于自己用军事的力量去反对压迫阶级和他们的国家。”（《列宁文集》第二版第十八卷，第二三二到二三三页）

托洛茨基就说这是狭隘的民族成见的理论，他说：

“如果在民族范围之内去考察社会革命的前途，那就要成为狭隘的民族成见的牺牲，——这种狭隘的民族成见正是社会爱国主义的实质。”

托洛茨基并且抓住了这个题目，大做其文章，证明社会爱国主义之中，除出最庸俗的改良主义之外，还包含着一种民族的“革命使命”的理论，就是以为只有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或者说按照工业发达的情形，或者说按照民权主义的制度，或者说按照革命的历史传统，因而正是负着引导全人类到社会主义去的使命的民族。

这样说来，托洛茨基是骂列宁做狭隘的民族成见的牺牲，是社会爱国主义派，是“俄国负着引导人类到社会主义去的使命”的夸大狂！这是十月革命以前的话，是托洛茨基反对列宁主义的话，而“新反对派”却又拿来反对俄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所以“新反对派”思想上完全投降托洛茨基。

俄国共产党是反对这种意见的。这不但是理论上的问题——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俄国这种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绝对可能的。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无产阶级独裁制的政权建立起来了，全国

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都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有着合作社的组织——联系农民群众的小农经济而指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的轨道，有着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正确政策；所有这些情形综合起来，就能保障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

“新反对派”和托洛茨基派的意见是怎样的呢？自然，反对派始终不能够否认：俄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不过反对派不顾列宁的说话，竭力要想证明俄国现在的国立企业并不是完全社会主义式的企业。反对派只承认俄国开始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可以去建设社会主义，然而据他们说：这是建设不成功的，所以反对派说：——一个国家里面可以去建设社会主义，可是不能够建设成社会主义的。

有一次，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开会的时候，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说：因为俄国技术上经济上的落后，所以俄国共产党没有能力克服国内的困难——如果是国际革命不来救命的话；这简直是孟塞维克的机会主义理论，孟塞维克才向来认为俄国技术上经济上落后不能够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呢。当时史太林就说，必须有一个建设工作的前途，没有前途是不能够认真的工作的，他的话是：

“不知道为着什么而建设，那是不能够建设的。不知道走路的方向，自然一步也走不动的。前途的问题对于我们的党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党向来总有一个清楚的目的在前面的。究竟是预先计算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去为着社会主义而建设呢——还是马马虎虎盲目的去建设，‘以致于等待着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实际上替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栽培基础’呢？这是现在的根本问题之中的一个。对于这个很清楚的问题没有根本的回答，是不

能够认真工作的。”(史太林:《列宁主义的问题》第三一六页)

然而,也许因为俄国现在的社会结构——国内有两个阶级存在(工人和农民),所以就妨碍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功罢?列宁也预先见到这里的困难而有过指示的:

“如果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不同意见,那么,分裂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的社会制度之中并没有包含着这种分裂的必然的根据。”(《列宁文集》第二版第二十七卷,文章的题目是:《我们怎么样去组织工农检举委员会》)

所以问题是在于:确定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正确政策,预防分裂的危险,使这种分裂不致于发生。

列宁认为:这种矛盾是我们自己所能够解除的,能够预防的,这种分裂是能够避免的。而托洛茨基的主张就不同。他说:“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的赞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够握得住政权,而把自己的暂时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的独裁制。”(托洛茨基著:《我们的革命》,一九〇五年出版)列宁的理论和俄国革命的全部经验很明白清楚的指示出来:社会主义在俄国是能够建设成功的;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如果俄国共产党没有做严重的政治错误,那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生产是可能的。所以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是完全不相同的。而“新反对派”却在这种根本问题上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因此,俄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全国大会责备“新反对派”的没有信仰和悲观主义,同时,特别着重的说明:

“关于经济建设的问题,本次大会认为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国家,的确有‘建设完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必要的前提

(列宁)。大会认为为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斗争，是本党的根本任务。最近报告的这一年度很明显的证明了这些意见的正确。在别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可是，有别国无产阶级的赞助，不用外国资本的所谓‘帮助’，和我们国内的私人资本不断的斗争着，——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基本群众联合着，已经在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得着了初期的巨大成绩。”(第十四次大会的议决案)

苏联发展的总路线。 苏联既然是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的，那么，这个建设在最近期间的方向怎么样呢？苏维埃联邦整个国家发展的总路线是什么样的呢？

列宁认为俄国的希望在于：“能够从俄国乡下人用的马背上走下来，骑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勒霍夫电站^⑩等等的马背上去。”这句话就已经给了苏联最近几年发展的总路线。当时俄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大会就特别把这种意思说得更详细精确，因为直到那个时候，还是有人尽在争论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问题。

第十四次大会之前《经济生活》报以及其他报纸上，有些人的主张是很不对的，如果照他们那种主张，就可以停顿苏联当时的经济计划。这些主张是：苏联还有很久应当是农业国家，一天天的更加多运农产品出口，去换工业设备品（以及其他货物）进来。如果照这种主张，那就要缩小苏联自己的工业发展计划。这种主张是一个名字叫做沙宁的人发表的，而中央委员莎郭里尼夸夫^⑪一部分是赞成他的。如果苏联照这种主张发展下去，那就可以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莎郭里尼夸夫认为国外贸易的独占可以放松些；农村里面的合作社可

以用“官办商铺”去代替。还是在一九二二年，关于组织国立托辣斯的问题，他就主张这种托辣斯“应当从纯粹的国立机关变成私人资本的企业，由外国资本来参加。”这种路线，俄国共产党是不能够赞成的。第十四次大会反对莎郭里尼夸夫等的主张，反对他所提议的前途，决定：

“（一）首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用一切方法来保障社会主义式的经济对于私人资本的胜利，巩固国外贸易的独占，发达社会主义的国有工业，在国有工业的领导之下，利用合作社的帮助，把群众的农民经济一天天的更加引导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上去。（二）保障苏联的经济独立，使苏联不会变成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的附属，因此要定下国家工业化的方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并且造成经济上应付手段的准备金。”

关于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第十四次大会认为：

“农村之中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道路是——要在国有工业的社会主义企业，国立信用机关以及其他国家经济命脉，（这些都在无产阶级的手里）——要在这方面经济上的指导日益增高的情形之下，把农民的基本群众吸收到合作社的组织里面去，而保障合作社组织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利用，同时克服，以至于排斥合作社组织的资本主义成份。”

新经济政策的“重新估量”，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 俄国共产党在列宁领导之下就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期间所采取的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进攻的步骤。这难道需要“重新估量”吗？本来是不需要的。然而季诺维叶夫等“新反对派”却要求重新估量一下！因此，第十四次大会就要讨论到这个问

题。列宁自己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是怎样说的呢？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社会实质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广泛的农民田地联络。”当时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工具之一——商业是：

“无产阶级先进部队和农民之间唯一可能的联络方法，这是唯一可能的一个枢纽，从这个枢纽上可以有共同的战线，去振兴经济。”（《列宁文集》第二版，第二十七卷，《俄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列宁想出新的粮食政策的时候（就是决定不用粮食征收法而改用粮食收税法的时候），列宁说过：“只有这个政策，能够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而使社会主义得到胜利。”

然而第十四次大会之前，季诺维叶夫却说出了这样的话来了：——他说当时俄国无产阶级政府对于农民的让步是对于农村的上层阶级的让步，他说整个的新经济政策本来就是对于资本家的让步。为什么列宁没有说这个话？！而季诺维叶夫甚至于说：“如果一九二一年我们不直接对工人说新经济政策是对于资本主义的让步，那么，这是我们的虚伪。”这样说起来，列宁说的：我们退却几步，以使用广泛的战线去进攻，新经济政策是和农民联络，——这些话是列宁对工人用虚伪的欺骗手段吗！加美尼夫在第十四次大会上，也发表这样的观点，他说第十四次党务会议的政策是对富农让步的政策。史太林对于这些人指示出来：你们不要以为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你们要知道列宁说过的——“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要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呢。”列宁从没有把一九二二——

二三年的俄国当做资本主义的国家。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一定说：现在的“资本主义的俄国要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呢”。

第十四次大会反对有些党员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或者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新反对派”的代表，在好些著作里面，企图证明“现在我们所有的经济，暂时还只是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札鲁茨基著：《干部的组织者和他们的任务》）莎郭里尼夸夫在第十四次大会上说：俄国的铁路、国家银行、对外贸易机关，都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俄国的货币制度也是完全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制度。

列宁的意思是和这班修正派完全反对的，他早就说过：“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忘记：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工人对于那些属于国家的工厂，他们的态度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态度。这就是社会主义。”列宁曾经证明过：俄国的农民是和社会主义的工厂实行着商品交易，国家工厂的生产品是社会主义工厂的生产品。史太林、布哈林^⑬等在大会上指出“新反对派”关于国有工业的观点是和列宁的观点互相矛盾的。布哈林说的：如果说国有工业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性质，那么，难道苏联国内还有资本主义的剥削吗！

“新反对派”对于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主义的工业，对于国家资本主义，都有极不正确的了解，所以第十四次大会坚决的反对他们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上看，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发展的观点上看，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什么呢？照季诺维叶夫和萨法洛夫的意见，这是两个进攻之间的休战。照

列宁的意见，这新经济政策是为着社会主义建设而需要的。

第十四次大会论农民、中农、贫农和富农的危险。第十四次大会之前，“新反对派”到处说俄国共产党里面有富农的危险。他们特别收集了好些布哈林、史铁茨基、波古塞夫斯基、康托尔等人的文章，旁边加着注解，汇集了一大夹子，拿到各处去研究“富农倾向”；他们做了不少文章，以及演说报告，都是说“富农倾向”，都是要证明中央委员会里面有“富农倾向”。

在第十四次大会上，这种叫骂更加厉害。然而实际上这不过是“新反对派”的一种企图，要想推翻第十四次党务会议的**决定**，以及第十三次大会的**决定**，要想推翻党的许多决议——这些决议的主要意思是保存无产阶级和农民基本群众的**联盟**。反对派的主要错误，就是他们忘记了：必须不但和**贫农**有巩固的联盟，并且要和**中农**有巩固的联盟。还是在俄国共产党第八次大会（一九一九年三月）的时候，列宁就证明必须从旧的口号“无产阶级和贫农联盟，使中农中立”，进到新的政策“和中农结合巩固的联盟”。列宁说：“我们已经走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这样一个时期，在这种时期里面，应当在农村工作的经验之中具体的详细的规定出根本的规律和指示，用来指导我们，以便对于中农，能够站在和他结合巩固联盟的基础之上。”（《列宁文集》第二版，第二十四卷：《俄国共产党第八次大会上的演说》）。所以俄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为着中农而斗争，争取中农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为着这个目的，自然要改良下层的政府机关，正确的经营合作社和国有商业，减低工业品的价钱，各级苏维埃的积极化，以及其他的政治上经济上

的办法(第十四次党务会议决定的那些办法)。而“新反对派”却说中央委员会的这种路线是富农路线。

史太林回答反对派的时候，指出：党内有两种倾向存在，一种是对富农的危险估量不足；一种是由于中农的作用估量不足，史太林说：

“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好的，如果这两种倾向发展起来，那么，他们可以使党腐化，可以亡党。我认为我们党里面，有力量足以打击这两种倾向。然而比较起来，党准备得更加好些的一方面，却是去运用‘打富农’、‘没收富农’的口号，而不是另一方面，就是去实行反对对于农民估量不足而斗争，就是去运用经过联合中农而孤立富农的更复杂的政策。”

第十四次大会认为贫农，首先是雇农，是无产阶级在农村之中的支柱，而中农是无产阶级在农村之中的同盟者，他应当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如果没有中农群众做巩固的同盟者，如果仅仅只能够中立中农，那就不能够在无产阶级的独裁制巩固之后进一步去建设社会主义。同时，第十四次大会也责备对于农村之中的阶级分化估量得不足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不看见国内富农的发展而发生的危险，以及各种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危险；这种倾向不愿意了解必须打击富农，限制富农的剥削趋势；这种倾向是不看见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应当去组织团结贫农和雇农来反对富农。所以“新反对派”说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甚至于大会的大多数有富农倾向和富农路线，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大会对于他们给以坚决的打击，因为他们借口反对富农路线，企图混淆农村之中共产主义政策的根本问

题——这个问题是争取中农的问题，因为中农是农业之中的中心人物，这个问题也就是合作社的问题，因为合作社是农村进到社会主义的根本组织方式。大会对于“新反对派”的“左倾”倾向，是特别着重的反对的。

第十四次大会上的组织问题，当时党的组织状况，党的发展的调节，党和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新反对派”的亚克谢尔洛德^⑭主义。 反对派对于组织问题也有许多不正确的意见。当时关于党的组织状况，是莫洛托夫^⑮做的报告。——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为止，俄国共产党有一百二十五万党员。俄国共产党的党员超过一百万人，这是第一次。党的成份，一年比一年的都是工人增加，小资产阶级分子减少：

时期	1924年4月1日止	1924年7月1日止
总数	441,000	911,000
工人	196,000	534,000
百分	44%	85%
农民	129,000	216,000
百分	18%	23.5%
其他	121,000	161,000
百分	27%	33.6%

“我们的党真正是工人阶级选举出来的党”——这是史太林说的话；然而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不是随便什么工人都可以算共产党员的，所以一定要明确的了解所谓“选举出来”的意思。而季诺维叶夫等的“新反对派”就不了解这一点。第十四次大会上，列宁城代表团说：列宁城的党部认

为在第十五次大会之前，要使党里面工业工人——真正在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占到百分之九十。列宁城的代表之一萨尔吉斯还加以解释，说要在一年之中发展工人党员百分之九十的地步。照这样算起来：全党党员应当增加到六百万人，而且要在一年之中做到，这就是要一年之中拚命招收五百万党员！这些“列宁城派”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们把应当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和工人阶级本身混淆起来了。还是在一九〇二年，孟塞维克的老祖宗亚克谢尔洛德就有过这样主张。所以季诺维叶夫、萨尔吉斯等就变成了亚克谢尔洛德主义者了。——亚克谢尔洛德曾经提议过要组织一个所谓“无党的工党”——不问党派的广泛的“工人大会”。关于工人进党的问题，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就和季诺维叶夫有不同的意见，当时他曾经写了一封信给莫洛托夫说到这个问题。这封信是列宁对于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提议：

“我认为很重要的是要延长进党的候补期间。季诺维叶夫的意见，是工人候补期半年，其余的一年。我提议：只有大工业工厂之中做了真正工人十年以上的人，可以用半年的候补期。其余的工人——一年半；农民和红军兵士——两年，其他的人——三年……”

现在到处都可以碰到老老实实是小资产者，而偶然的做了极短时期的工人——也算是工人了。”

这封信是列宁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写的；那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了这个问题（工人的候

补期一年)；可是二十六日列宁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他还是反对，他说：“帝国主义战争以来，俄国工厂工人的成份比以前是更加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了，因为战争的时候，有好些人进工厂去，为的是要逃避军役。”列宁还说当时俄国的党的政治教育，比起那种困难时机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导所需要的程度来，一般的讲，平均起来还是不充分的。他说党现在已经是政府党了，大家都会有企图进党的念头。所以他认为一年的候补期，还是不够。他提议：

“（一）延长一切候补期间。（二）特别详细的规定：某种出身应当有什么样候补期，怎样才算真正是某种出身，什么是具体而实际的条件——能够使候补期的确起作用，而不成为形式上的手续。（三）必须使决定新党员进党的机关之中有大多数人是熟练的党务职员。（四）必须使进党的批准不但经过省委而且经过监察委员会。（五）还要想出某些办法，来肃清那些完全不是共产主义的分子，完全不能够实行真正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政策的分子。”

列宁对于“党和阶级”的问题，他的意见是这样。所以第十四次大会反对萨尔吉斯的意见——萨尔吉斯和列宁城代表团的提议，是要乱七八糟的扩大党，是要吸收动摇的实际上不是无产阶级的分子，这是亚克谢尔洛德主义。

第十四次大会和俄国共产党的统一及派别问题。 第十四次大会上，“新反对派”发明了一个希奇古怪的理论：——他们说，并不是他们自己组织什么派别，而是中央委员会里面有派别，说得更清楚些，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是一个派别。后来反对派总是叫中央委员会是“史太林派”。季诺维叶夫和加美

尼夫等做了好些文章、报告、演说，说所谓“七人团”怎样怎样造派别。这所谓“七人团”是什么呢？原来不过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不过有的时候开会不通知托洛茨基罢了。这是因为有了不同意见，引起了许多问题，要预先交换意见，为的是要消灭这些不同意见，为的是要决定党的总路线。有些反对派的人说，一切问题都是背后商量好了，到政治局正式开会的时候，不过形式上投投票罢了。而实际上，在政治局会场上常常通过托洛茨基所提议的说法，或者简单的因为中央委员会大多数自己详细讨论之后，通过新的说法。——决不是什么“一切问题预先商量好了，政治局会议不过是形式上的投票”！而且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怎么会是一个派别呢？！所谓派别，一定和中央委员会有不同的派别政纲。现在中央委员会多数的决定，自然就是中央委员会的政纲、意见、决议，而决不能够说是什么“派别的”。第十四次大会上，列宁夫人——克普鲁斯嘉^⑩居然也赞成季诺维叶夫派，她说：以前史托克荷尔摩大会^⑪（第四次大会——一九〇六年）的时候，也有过多数和少数，可是，当时的多数是孟塞维克派，可见，“多数”不见得就是对的。这句话引起了大会上极激烈的冲突和争论。要知道第四次大会的时候还不是共产党，而是社会民主党，其中有明显的两派；那次大会，也本来是两派的联合会议。如今列宁夫人把十四次大会来比四次大会，那就是承认一九二五年的共产党，仿佛也是两派联合的团体，这是和列宁关于共产党必须统一的概念，完全相反的。季诺维叶夫、加美尼夫等在十个月以前，还为着托洛茨基有派别行动，而提议立刻开除他

的政治局委员；他们曾经几十次讲过党的统一的重要，讲过党内不能容许小团体小派别的存在等等。而现在，他们的意见通不过，站到了少数的地位，自己马上就实行派别行动！真正是自相矛盾到极点！季诺维叶夫等在第十四次大会上，居然提议：党内以前的各种派别，都应当有他们自己的代表在中央领导机关之内。他们提出的要求很多。其中的一个就是：“大会上的少数派，应当得到一种可能，使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意见到底，自然，他们一定自己对共产党和政治局负起责任来。”“新反对派”还要求：对于他“不能够用一切组织上的压迫、撤职等等”的办法。列宁曾经说过：“谁要是稍微削弱一下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他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这句话，“新反对派”却完全忘记了！加美尼夫并且提出反对派的组织问题上的政纲，他说：“我们认为必须把上层机关的组织，弄到政治局有全权的地步，政治局应当综合政治上的全权；技术上执行政治局决议的秘书处，应当服从政治局。我们认为现在的情形是一种异常状态——现在秘书处综合了一切政治和组织问题，实际上总是预先把政策决定了的。”史太林的答复说得很清楚：在经济政策问题里面，反对派内部的意见是很杂乱的，然而他们大家有一个共同之点——“他们大家要想改组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处。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是一致的。这很奇怪很可笑，可是却是事实。”“新反对派”的要求，是要使秘书处变成简单的技术机关。然而这种要求是不对的。至于服从政治局的问题，那么，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之中选出的政治局本来是最高机关，中央委员会还有一

个组织局和一个秘书处，这两个机关本来是服从政治局的。再则，“新反对派”提出撤换史太林的总书记问题。俄国共产党里面，本来并不是总书记领导的制度，而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集体领导。总书记的所以有信仰，仅仅因为他能够正确的反映全党的路线，能够反映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正因为史太林在列宁死后一直是俄国党的布尔塞维克路线的正确的表示者，所以他在党内有极大的信仰。俄国共产党对于史太林是经过二十年的审查，是非常之看重他的。可是，亦正因为这个原故，从第十四次大会起，一切反对派都特别反对史太林，都是要求撤换史太林；这种要求，实际上是要求撤换党的领导，要想推翻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的领导，而换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领导！

俄国共产党的新章程，党的名称的改换。 俄国共产党在第十四次大会上通过了新的章程，对于旧章程有些修改。第一个最主要的修改，还是一九二二年就实行的——这是关于党的社会成份的问题。所以关于正式党员和候补党员的分别，规定得非常清楚明白。“因为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名义上有正式和候补的分别，而事实上在支部之中候补的也参加表决。所以新的章程要规定候补党员没有表决权。”（大会上起草章程委员会的代表安得列夫的报告）

再则，新章程上有一个补充，就是中央政治局有权利批准重大地方党部的党报主笔。这个问题直到第十四次大会之上才发生的。当大会将要开完的时候，大会对于中央报告的议决案公布之后，列宁城《实话报》立刻就起来反对，说大会的议

决案是不正确的。很明显的，季诺维叶夫派是在列宁城里面事实上组织了自己的中央机关报，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因此，第十四次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要保障列宁城《实话报》尊重大会的决议。于是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委员会召集紧急的全体会议，讨论列宁城《实话报》的问题。大多数中央委员主张撤换列宁城《实话报》的主笔札克斯葛拉德尼夫，而另外派史克沃洛磋夫^⑩去当主笔。在这次会议上，托洛茨基派已经公开的赞成季诺维叶夫派，投票反对撤换札克斯葛拉德尼夫。

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大会，正式决定改名苏联共产党。——这当然是因为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后高加索等的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正式决定联盟，建立了新式的“联盟国家”，定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简称苏联 (U.S.S.R.)，所以俄国的党也改名叫苏联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U.S.S.R.)。

第十四次大会上的青年团问题。第十四次大会上布哈林做了一个关于青年团问题的报告，大会对于这个问题有很详细的讨论。当时俄国国内阶级矛盾有新的发展，城市和乡村之中新的资产阶级发生出来；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要争取青年群众。反革命的政党，如孟塞维克党、社会革命党^⑪的残余，正在活动。他们的秘密宣传，大致是说：俄国的国立企业，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企业，只不过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工厂，或者说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就是资本家，一样的是在剥削工人阶级等等。他们否认无产阶级独裁，否认俄国的

生产资料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国家的；他们利用俄国共产党的一些缺点极力的在破坏俄国共产党的信仰。所有这些，都是要工人群众和青年学生不相信自己无产阶级的力量，而散布悲观主义的空气。这样的准备思想上的基础，以便于公开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运动。这样情形之下，加紧争取青年的斗争，是有极重要的意义的。第十四次大会指出这样情形之下可以有各种可能的倾向。大会指出来：“要反对这些倾向，就要能够把青年个人的和小团体的利益，联系到整个阶级的利益，要说明日常建设工作是为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任务的。”第十四次大会特别指出俄国共产党应当提出好些新的任务：整顿青年的社会生活习惯、整顿青年团的工作、更清楚的解决领导的问题。

平权论的问题。第十四次大会说：共产青年团并不因为要注意风俗习惯的问题，因此就可以是一个“中立的”团体——对于共产党所管理的问题采取中立态度，——这是不对的，这就要根本破坏共产党和青年团之间的关系。同时，第十四次大会反对所谓“平权论”——就是说青年团和共产党有平等的权利：共产党管理全国的政策问题，青年团也要管理全国的政策问题。——在第十四次大会上，有几个乌克兰的青年团员提出这种理论。再则，季诺维叶夫在他所著的《列宁主义》上面，提议除出青年团团部之外，还要组织所谓农民青年代表会议，第十四次大会对于这种提议，亦是反对的：因为这样是要分裂青年团之中的工人和农民，这种“农民青年代表会议”单独的组织起来，势必致成为和共产青年团对立的团体。

共产青年团的无产阶级领导问题。 当时俄国共产青年团里面，无产阶级的领导，成了很紧张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年团的农民团员一天天的多起来。共产青年团的成份是工人和农民的，而他的领导，应当是无产阶级的。青年团的组织状况，是向来工人和农民各占一半的光景，所以领导机关里面要坚固的保障无产阶级的影响，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俄国工人青年固然很多，雇农、贫农以及中农的青年尤其多，至少总有好几千万；所以必须有艰苦的工作，必须有共产党方面的坚强指导。

而反对派的意见，却认为共产党对于青年团的指导是不能够保障无产阶级的影响的。列宁城青年团团部的委员塔尔汉诺夫说：“不能够以为有了党的领导，就可以保障无产阶级干部的领导作用。”因此，关于青年团问题，第十四次大会的议决案说：“然而，青年团里面的无产阶级领导，如果没有党方面的坚强领导，那是不能够得到的。仍旧要照以前一样，极力注意青年团里面党员的增多。所以把党的领导问题和青年团内部无产阶级干部的领导作用问题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行上在政治上是有害处的。”

第十四次大会之后，列宁城的青年团反对第十四次大会的决议案。关于党的第十四次大会，当然在各地方都做报告；而青年团列宁城省区青年团委员会居然以十六票对八票，认为党的第十四次大会议决案是不正确的。幸而这种反对派的列宁城青年团团部的上层机关，是“没有兵队的将军”，不久就取消了，——因为列宁城省区的青年团团员群众，都不赞成他

们省委的这种态度，所以这个省委不久就改选了。可是这一次列宁城青年团团部和共产党全党大会对立的情形，在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要避免这种非常状态的发生，必须注意：使党平日对于青年团的领导坚固起来。

第十四次大会上的工会问题。 第十四次大会上，托摩斯基^② 做了一个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大会对于工会问题也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因为当时工会已经非常发达，人数很多，政治上也很积极，所以第十四次大会决定要更加加强工会运动的发展，工会机关的负责人员都要是选举出来的，被选的委员要定期的对着选举人做清楚明了的报告，工会机关对于群众方面的批评，要极端的注意，要发展工会会员的自动能力，要最大限度的使工会机关简单化，接近群众，要使工会对于会员的帮助事业更加发展。尤其因为当时发见了有些工会下层机关里面有浪费公款的事情，所以特别着重的说明：“要整顿工会机关的庶务部，要改良工会机关的财政报告。加强对于下层工会机关的财政上的监督。”这个议决案，还特别着重的说明“生产会议”的重要；指出有些工会机关的职员，并不注意经济机关（国立企业的管理处）的行动和办法，往往例行公事似的赞成这些办法，其实这些办法之中有不正确的，已经引起了工人的不满意，而工会机关却不会代表工人起来说话，不会发见这些不正确的地方而起来纠正。第十四次大会指出必须加强工会机关对于解决“冲突”的作用，明确的规定了工会对于罢工的态度。同时，指出必须加强工会的文化运动，尤其是引起工人群众的自动精神来办理俱乐部的工作。并且对

于工会在农村之中的工作，在青年之中、妇女之中的工作，都给了相当的指示。再则，第十四次大会特别指出当时各国工人的代表团到俄国去，和俄国工会所发生的国际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要竭力的扩大和发展。

*

*

*

第十四次大会之上，虽然有“新反对派”的攻击中央委员会，虽然的确因此而损害了俄国共产党的统一，然而第十四次大会做了极巨大的工作。俄国共产党从第十四次党务会议之后，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讨论得非常深刻而广泛，而且这种全国党务会议，全国大会，中央委员的全体会议等的议案，都一直拿到最下层的党部里去讨论，每个党员都研究过，——这比较以前是做得更加深切了，一般党员的政治教育是更加提高了。自从一九二三年托洛茨基派的活动，季诺维叶夫等“新反对派”的发现……列宁死后党内争论的开展，表面上仿佛是“纷争日多”的现象，实际上却是党员群众的了解布尔塞维克路线更加深入，俄国共产党的力量更加伟大了。自然，第十四次大会时候，“新反对派”抓住了列宁城党部委员会来反对中央，在大会上列宁城党部代表团几乎是清一色的反对派，这种情形对于俄国共产党给了一个暂时的严重打击。中央委员会调动好几个中央委员到列宁城去做报告。列宁城的各工厂支部，各市区里面，争论了好几个星期。有些大工厂支部（例如“三角”铁厂——以前的普体洛夫铁厂等等），并不是一下子就了解季诺维叶夫派的错误的。可是，不久，中央委员会在列宁城的各支部里面，一个一个的争取到自

己的胜利；结果，出于反对派意料之外，他们的地位在列宁城里面也被打倒了。因此，当时召集的列宁城省区的紧急党务会议上，极大多数的党员代表都已经起来反对“列宁城的反对派”了。于是“坐镇”列宁城的季诺维叶夫变成了“没有兵队的将军”。

可是，俄国共产党里面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在第十四次大会的前后，还不过是刚刚开始；列宁城的问题虽然解决，然而不久，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叶夫派又联合的起来反攻。——于是俄国共产党反对这种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联合的反对派”的斗争，就充满了从第十四次大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到第十五次大会（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之间的时期，我们另外再来论述罢。

注 释

① 托洛茨基，见本卷第31页注⑩。

② 季诺维叶夫，今译季诺维也夫。见本卷第33页注⑭。

③ 加美尼夫，今译加米涅夫。见本卷第33页注⑮。

④ 札鲁茨基（Петр Антонович Залуцкий，1887—1937），当时是列宁格勒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因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活动，1927年被开除出党。

⑤ 罗倍士比埃尔，今译罗伯斯比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1758—179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首领。1793年5月领导人民武装起义，推翻吉伦特政权，建立雅各宾派专政，成为实际的政府领导人。1794年7月热月政变中被处死。

⑥ 山岳党，又称山岳派，即雅各宾派。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以罗伯斯比尔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

⑦ 资尔仁斯基,今译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 1877—1926)。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十月革命后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并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

⑧ 新经济政策,见本卷第308页注⑳。

⑨ 萨法洛夫(Георгий Иванович Сафаров, 1891—1942), 190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因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活动,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

⑩ 萨普洛诺夫,今译萨普龙诺夫(Тимоф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апронов, 1887—1937)。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当选俄共(布)中央委员。因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活动,1927年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

⑪ 沃勒霍夫电站,今译沃尔霍夫电站,位于列宁格勒州沃尔霍夫市。1926年建成发电。

⑫ 莎郭里尼夸夫,今译索柯里尼柯夫(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Сокольников, 1888—1939)。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因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活动,1936年被开除出党。1988年平反。

⑬ 布哈林,见本卷第32页注㉑。

⑭ 亚克谢尔洛德,今译阿克雪里罗德(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 1850—1928),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1900年加入《火星报》编辑部。1917年流亡国外,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

⑮ 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 1890—1986),苏联党和国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历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委员。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决议,1957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1962年被开除出党,1984年恢复党籍。

⑯ 克鲁普斯嘉,今译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ская, 1869—1939),苏联教育家,列宁的夫人和战友。十月革命后,

任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7年起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1年后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列宁回忆录》等。

⑰ 史托克荷尔摩,今译斯德哥尔摩,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大会,即1906年4月23日至5月8日在瑞典首都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

⑱ 史克沃洛磋夫,今译斯克沃尔佐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Сквордов-Степанов,1870—1928)。苏联政治活动家,曾任联共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全俄工人合作社委员会副主席、国家出版局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⑲ 社会革命党,1902年初由俄国几个仇视马克思主义的民粹派小组织和集团组成。十月革命后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被取缔。

⑳ 托摩斯基,今译托姆斯基(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 Томский,1880—1936),曾任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事工会工作。因参与布哈林、李可夫的党内派别活动,1929年被撤销职务,1936年自杀,1988年平反。

列宁主义克服托洛茨基主义*

——苏联共产党反对社会民主
主义倾向的斗争

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联盟”^①。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大会的时候，托洛茨基一句话亦没有说，他这样沉默，实在是一种策略，叫做“向远处瞄准”的策略。第十四次大会上季诺维叶夫的“列宁城派”闹得乌烟瘴气，而他——托洛茨基却在那里“旁观”，其实，他是正在观察：等待时机，“时机”一到，他自然出来参加斗争，把不同的意见极力扩大，造出许多新的争论，找出许多反对中央委员会的理由，这样，他就可以领导反党的斗争，把“新反对派”拖着走——做他的捧场角色。他那时候就不但希望和“新反对派”合作，而且早就料定“新反对派”可以受他的领导，而他自己就可以成为一切反对派眼光之中最有威信的领导。

自然，在最初一个时期，譬如列宁城里赞成“新反对派”的普通党员，听见有人说“新反对派”和托洛茨基派联合，还非常

* 本篇和下面的《从恢复时期到建设时代》，曾由作者编为《英雄死后》(二)，迄未出版。这里根据中央档案手稿刊印。手稿未注明写作时间。

之生气，认为是中央故意冤枉“新反对派”呢。然而，等到一九二六年四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个“反对派联盟”已经很确定的表现出来。固然不错，当时对于中央委员会大多数所提出的议决案草案，托洛茨基派单独的提出自己的修改条文，季诺维叶夫派亦是单独的提出自己的修改条文，他们之间已经有联合的形势，同时过去的所谓“工人反对派”^②对于这个联合是表示同情的。当时托洛茨基出来说，他赞成加美尼夫(季诺维叶夫派)的修改；而加美尼夫亦出来说，他赞成托洛茨基的修改。到了那年七月的中央全会，这个反对派联盟就正式形成，当时季诺维叶夫的话是：“认真的长期的”联合起来。而且这个联盟，还不仅只是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叶夫派之间的联盟，这个联盟并且包含其他的一切反对派。这个“联盟”一开始就替后来被开除的沃莎夫斯基的反党观念辩护，间接的还拥护史列亚普尼夸夫^③和美德维狄夫^④的所谓“左派”政纲。

很明白的，要成立这样没有原则的各派大联盟，那就必须先有两个条件：(一)各派之间互相大赦，就是互相不提各人的错处；(二)各派之间实行互相的理论上的让步。果不其然！当初反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非常激烈的季诺维叶夫派，在七月中央全会上，却出来申明：他们认为一九二三年的反对派(所谓“老反对派”——托洛茨基派)对于党内情形的批评，一般的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托洛茨基派的“新方针”，托洛茨基反对中央的一切发疯似的攻击，不但是一九二三年的，甚至于以前的，以及一切种种反对派对于中央委员会多数的

攻击，都是对的。同时，托洛茨基方面，也饶赦了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他亦申明——他在《十月教训》那篇文章里面，特别批评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是不对的。仿佛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在十月革命时候反对暴动，亦是对的了！！

自然，列宁城派竭力的要想证明——不是他们投到了托洛茨基方面去，而是托洛茨基走到了他们方面来，放弃自己的《十月教训》那篇文章以及“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呢？他说：中央委员会方面的人，“企图利用旧时的文章和提纲，来离间新反对派之中两派的代表，尽着提起旧时思想斗争里面的回忆……这是没有用的阴谋。”他说：在一九二六年十月，联合的反对派可以证明，他们观念上的一致是巩固的。

然而，对于大家都是很明显的：列宁城派（季诺维叶夫的“新反对派”），是“到托洛茨基那里去吃口粮呢”。托洛茨基的确有本事，他能够使“新反对派”做出这样的申明——简直把季诺维叶夫、加美尼夫等的一点点布尔塞维克主义，完全葬送。例如关于一个国家里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加美尼夫拚命的帮着托洛茨基曲解列宁的很明显的指示。

事实上固然是托洛茨基做了反对派大联盟的领导者，可是，每一派的代表，都自欺欺人的以为是托洛茨基听从了他的主张了，比如“工人反对派”也是这样的。正因为反对派联盟之中有着这许多不同的派别，所以他的内部各派互相不信任。然而各派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反对列宁主义，各派都用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和列宁主义对立起来；这个联盟之中，“左”的右的种种小团体，极没有原则的互相勾结起来反对中

央。这种无原则的大联盟的组织者，就是托洛茨基。我们要知道，在十月革命和欧战之前，托洛茨基已经来过一次这样的联盟，就是所谓“八月联盟”^⑤！当时，他团结了孟塞维克、取消派……种种小团体来反对列宁，他还自称“无派别的”人，要来消灭当时的党内一切派别呢。现在，他又来这一套“八月联盟”的把戏了。以前在秘密条件之中，俄国的布尔塞维克党曾经打破托洛茨基的这种捣乱，现在俄国的共产党，在无产阶级独裁的条件之下，自然更加可以争取极端广大的群众，而克服托洛茨基的反党活动。

此外，还有一件事要说一说。“新反对派”反对中央的时候，就发生了另外一派，叫做“缓冲派”，首領是史美尔加^⑥。到了托洛茨基公开联合季诺维叶夫派的时候，这个“缓冲派”的真面目也暴露出来了。这个缓冲派实际上本来就是“新反对派”的化身，不过表面上说要站在中央和“新反对派”之间做“缓冲”罢了。而现在，史美尔加、腊夸夫斯基^⑦等等完全走到了托洛茨基派的营垒里面去。后来史美尔加是最鲜明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甚至于“比托洛茨基自己还要更加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呢”。

总之，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的全体会议的时候，联合的反对派已经正式形成一个党内的派别，有自己的特别的政纲，有自己派别内部的纪律，有自己的中央，并且已经有自己的秘密组织的雏形。

沃莎夫斯基主义。 七月中央全会之前，有一个党员叫沃莎夫斯基的，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极明显的表显

着孟塞维克的反党的倾向；这种倾向其实在反对派联盟之中也已经包含着了。他的一篇文章，在中央理论机关报《布尔塞维克》上登载出来，并且附加了按语和反驳的文章。他的意见怎样呢？他说：苏维埃国家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组成的国家；苏联共产党不是拥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他实际上“拥护各阶级的利益，就是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利益，他也拥护的”；沃莎夫斯基要求苏联共产党里面应当容许一切“合法的不同意见”的存在，甚至于“小资产阶级的小团体和派别”。沃莎夫斯基鼓吹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他把农民完全当做资本主义的企业家。苏联共产党当然不能容许自己的党员拥护沃莎夫斯基这一类的意见。因此，七月中央全会上，莫洛托夫^⑧发言，指出沃莎夫斯基的文章之中，实际上包含这些危险倾向。然而托洛茨基却出来说：“我对于莫洛托夫的这样责备沃莎夫斯基，是永久要反对的”，因为照他的意见，在“极蠢的沃莎夫斯基的错误说法之中，表现着阶级运动的某些需要。”所以加美尼夫和托洛茨基都投票反对开除沃莎夫斯基；同时，他们也并没有企图说明自己的立场是和沃莎夫斯基不同的。这可见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联盟，已经走到了什么地步。

美德维狄夫的一封信。 同样，反对派联盟也没有申明自己和美德维狄夫立场的差别。美德维狄夫是什么人呢？他是以前的“工人反对派”，他简直是右倾取消主义的观点。他在一九二三到二四年的□□^⑨讨论终结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巴古^⑩的工人。这封信里面，简直是提出了“工人反对派”整个

的取消主义政纲。这个政纲的内容是：因为照他的意见，苏联用课税、储蓄、国立企业的利润等等，始终是不能够积聚起资本来实行工业化的，所以应当对国际资本大大的让步——他的主张简直是等于投降国际帝国主义；而国际资本，照他的意见，“是准备来振兴已经衰落的工业区域的”；对于农民，“工人反对派”的主张完全是反对列宁主义的；照他们的意见，“在国内新经济政策^①的环境之中，在国际市场的控制之下，小农和最小农的命运，只有在最野蛮的条件里面萎缩下去，而不可避免的灭亡。”因此，照美德维狄夫和“工人反对派”的意见，一切帮助农民经济维持现状，就算照现在的形式发展下去的企图，都是幻想的·反·动·的。列宁的“合作社计画”，“工人反对派”是完全不管的。“工人反对派”在自己的政纲之中，把“富农或者农民之中多少是富裕些的中农群众”归并在一类里面。对于这种中农，照他们的意见，共产党“除出实行残酷的政治斗争之外，不能够有别的政策的。”

然而“工人反对派”这个政纲之中，尤其反党的，尤其可耻的取消主义，还要算他们的“国际政策”。照他们的意思，共产国际的工作，只是“造成物质上没有能力的所谓共产国际的各国分部，而且是勉强去造成的，还要用钱去养活他们；这钱却是俄国工人的血肉去换来的，可是俄国工人自己在现在条件之下却不能够享用；事实上只造成了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捧场清客，用俄国金卢布养着，却装出无产阶级的样子，在共产国际里面冒充代表世界的最革命的工人呢。”同样，“工人反对派”认为赤色职工国际是分散工人队伍的机关，“他是各国和

国际工人阶级真正统一战线的障碍，实际上一点也没有用处。”“工人反对派”的这个政纲，对于社会民主党的估量，和苏联共产党也是绝对不同的。这样，美德维狄夫实际上是要取消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而且称赞孟塞维克、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完全否认苏联共产党的路线。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间反对派联盟（托洛茨基、季诺维叶夫等等）：他们是不是和美德维狄夫的意见一样？托洛茨基等却说——他们不愿意反对“左的”意见！原来反对派联盟所认为的“左”，是这个样子！！

反对派的秘密活动。 当时反对派早已发明了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新方法——就是秘密活动，到树林里面去召集会议等等。然而发觉的只有一次：就是白仑基^⑫、腊塞维赤^⑬等召集的秘密会议，腊塞维赤还做了关于党内情形的报告。等到党部责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因为党部现在“统治”的高压手段，逼得反对派不能够不秘密开会。以前“工人反对派”的领袖美亚斯尼夸夫^⑭写了一封信给季诺维叶夫，说季诺维叶夫以前“当权的”时候，会骂反对中央的人，现在自己处到“受压迫的地位”，就知道始终还是美亚斯尼夸夫的观点是对的。反对派既然做得出秘密开会等类的行动，也就难怪美亚斯尼夸夫要说这样的话了。

这些事情，还都在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前。

七月的中央全会，指斥反对派路线的错误，开除了腊塞维赤的中央委员，并且警告反对派：党部将要对于他们采取坚决

的手段。然而反对派的派别活动仍旧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厉害起来。

而且七月的中央全会已经指出：“反对派有国际范围之内的大联合的趋势，苏联反对派要和德国的‘极左’派郭尔史^⑮等、法国的极右派苏华梭^⑯等去联合，这些分子都是共产国际已经开除的，他们还在竭力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仿佛苏联共产党已经腐化，变成了农民党和富农党了。”

七月中央全会开会的结果，反对派领袖申明他们服从党的决议。然而实际上他们的派别活动，正在七月中央全会之后大大的开展起来。反对派广泛的传播自己反对党的文件和宣传品，并且散发到党外去。他们不但散发自己的文章，而且还散发乌斯德烈亚洛夫^⑰教授的一本《二十世纪的圣教大会》（骂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大会的），散发美国共产党叛徒伊思德曼^⑱著的《列宁死后》等类的东西，完全是造谣谩骂苏联共产党的。（按：伊思德曼著的那本书，中国也已经有译本）。反对派联盟内部的各派，互相传递自己的反党宣传品；各派都秘密的办训练班，训练自己的干部，准备那年十月要开的全国党务会议上应当怎么样做宣传，怎么样反对中央委员会。甚至于在列宁城企图组织反对派的秘密的军事委员会，准备到红军里面去活动。有许多地方，反对派收集自己的党费，用来帮助被开除的反对派分子，印刷宣传品，建立秘密机关等等。反对派内部还规定了好些秘密活动的规则；甚至于早就约好了怎么样对付监察委员会的审问；如果有人对监察委员会说出反对派秘密活动的真相，那人就算是“告密”、“叛徒”！

反对派的公开辩论运动。 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党务会议(十月)之前,反对派联盟觉得“时候到了”。譬如说在共产主义学院的演讲会上,孙逸仙大学^⑩校长腊狄克^⑪,去对着许多非党员说,仿佛苏联共产党有在“一县之内建设社会主义”的意见。腊狄克是一个很俏皮刻薄的新闻记者,他说这句话,是应用俄国文学上的一个古典——俄国文学家史来德林(萨尔特夸夫^⑫)曾经有篇小说,讥笑当时俄国的自由主义派,描写一个绅士想在自己一县里面实行自由主义。

托洛茨基经过萨普洛诺夫^⑬的作弊手段,居然非法的召集了略赞乌拉尔铁路的支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托洛茨基派通过一个决议案,赞成反对派的意见。反对派联盟后来还想利用这个议决案,来证明工人是赞成反对派的。可是,过了不多几天,这个铁路支部正式开会的时候,多数推翻了那个议决案。反对派的领袖,到处跑到许多支部里去讲演,然而,在工人的会议上,普通的工人党员都起来反对反对派的主张。差不多在莫斯科的各支部里,托洛茨基派都失败了。季诺维叶夫、叶夫独克莫夫等在列宁城里面,也是同样失败。差不多全国都是如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当时是不要辩论的,而反对派反而说:现在非要辩论不可——或者是党内民主主义的实行,这是反对派所要求的,亦就是开始辩论的理由;或者是讲党的纪律。总之,照反对派的意见,有纪律就没有党内的民主主义,有党内的民主主义,就可以不要纪律。这种观点,真正是托洛茨基的孟塞维克主义的表现;列宁主义是:党内纪律和党内民主决不是互相对立的!

反对派这样非法的自由的开始辩论，结果怎样呢？托洛茨基、季诺维叶夫、加美尼夫等等，都是十月革命以来的著名人物，向来在群众之中是有些信仰的；然而他们只管鼓吹，说什么照他们的政纲实行起来，立刻可以大大的增加工资，并且可以筹出十万万卢布出来，增多工业化的经费等等——而党员群众不要听他们的话，不愿意辩论。

反对派的十月十六声明书。 那年十月四日，托洛茨基、季诺维叶夫、加美尼夫、莎郭里尼夸夫^⑳、皮亚塔夸夫^㉑、叶夫独克莫夫六个人签名，送了一张声明书给中央委员会，说要停止党内的纷争，要开始亲密的共同的工作。中央知道他们仍旧是想保存反对派的联盟，保障继续派别活动的可能，所以对于他们提出好些要求：反对派应当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决议，公开的责备自己的派别活动；承认自己不得到党的应许而开始辩论的企图是破坏纪律的；立刻解散自己的派别而停止派别活动；公开的说明自己是反对苏联党内沃莎夫斯基及“工人反对派”的孟塞维克观点的，是反对共产国际内部德国的郭尔史、马斯洛夫^㉒、路德菲塞尔^㉓、乌尔旁斯^㉔等小团体的；公开的责备列宁夫人在第十四次大会上说的共产党内的多数不一定对；公开的承认赞助各国共产党内部的任何派别斗争是不应当容许的。

于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反对派发出一个声明书，号召反对派分子立刻解散自己的派别；承认他们自己开始全国的辩论是违背了党的决定的；承认说“共产党会议上多数不一定是对，或者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大会时候一样，多

数代表的意见，恰好是孟塞维克主义”是不正确的；反对派坚决的责备德国的郭尔史等类叛徒对于共产国际的批评。反对派的六大领袖又申明：不能够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赞助各国共产党内部的小派别来反对共产国际的路线。他们申明：认为党的第十四次大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是无条件的应当执行的。然而事实上，反对派对于自己的十月十六日申明书，并没有真正去实行，他们所答应的许多条要求，都没有实践。

再则，中央监察委员会解决了美德维狄夫的一封给巴古工人的信的问题。史列亚普尼夸夫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曾经发表不赞成这封信的意见，而反对派联盟直到十月十六日以前亦一直没有说明自己是反对“工人反对派”的这种政纲的。反对派在十月十六日的申明书里面，才表示责备这种政纲的意思。后来，在第十五次党务会议的时候，又讨论了这个问题。美德维狄夫和史列亚普尼夸夫始终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第十五次党务会议和反对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党务会议（一九二六年十月），已经有了总结反对派联盟的言论行动的可能，所以就对于反对派的党纲上、策略上、组织上的观点，对于他的政纲，给了一个总的估量。第十五次党务会议的议决案，指出反对派对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的根本问题，走到了托洛茨基主义——季诺维叶夫等的列宁城反对派，所谓“新反对派”在思想上完全投降了“老反对派”——一九二三年的反对派。这次党务会议并且

说明：托洛茨基等的观点很接近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当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奥国的鲍威尔（Otto Bauer）^⑧，他亦早就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只是人民之中的极少数，他的统治只能够是暂时的。”“俄国无产阶级不可避免的要重新失掉自己的统治，只要俄国农民群众，文化上发展到了成熟的时候，能够起来拿到政权，无产阶级就要丧失政权的。”“工业的社会主义，在俄国暂时的统治农业国家，这不过是一个火焰，号召工业的西欧无产阶级起来斗争的。”“只有工业的西欧无产阶级夺到政权之后，然后才能够保障工业社会主义在俄国的长期统治。”（见鲍威尔著的《布尔塞维克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

再则，第十五次党务会议说明，反对派联盟对于国际革命的实行政纲，走到了盲动主义。所以反对派赞助共产国际之中的“左”倾空谈家的机会主义。关于苏联国内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反对派联盟完全反对列宁主义的观点，列宁是说：“无产阶级独裁的最高原则——是保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的作用和国家的政权。”第十五次党务会议指出：反对派“借口反对党内官僚主义而实行破坏党的纪律，这是违背列宁主义的；党正在真正反对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努力实行国家机关的真正改造，而巩固无产阶级独裁制。至于反对派的所谓反对官僚主义，只不过是使党解体罢了。”而且所谓“争取党内民主主义……也只足以破坏党的统一，削弱无产阶级独裁制，放纵一切反对无产阶级的力量。”第十五次党务会议指出反对派只是口头上革命，事实上却是机会主义。这些机会主义的事实，就是提议重新审定统一战

线的策略，主张提高国内工业品的价格，提高批发的价格，要求抽取国家的流通资本来发展工业等等。第十五次党务会议决定：监督反对派六大领袖的行动，要他们真正实行自己的申明书——解散自己的派别，停止派别斗争；全党之内实行坚决的思想上的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斗争；要求反对派联盟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准恢复派别斗争。

从十月会议到四月全会。 从一九二六年十月的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党党务会议到一九二七年四月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间的情形怎样呢？十月会议之后，反对派的派别活动仿佛的确收敛了些，至少是比较消沉了，然而反对派的有些小团体仍旧继续自己的“工作”，秘密的散发传单，鼓吹反对派的主张，批评所谓“史太林派”的不好。等到一九二七年年初，反对派的大活动又恢复起来了。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央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反对派对于自己的好些主张，已经不能不退步，尤其是对于苏联国内的经济政策，例如对于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他们不敢不投票赞成；到四月的中央全会，他们尤其表示退缩。总之，在国内问题方面，反对派的气焰，已经是受了挫折的状态；他们反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借口，大半偏重到国际问题上面来：首先就是中国问题和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的问题。那年苏联的工农兵会议（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党党团开会的时候，反对派提出好些经济政策上的不同意见，可是，同时他们也提出中国革命问题之中苏联共产党路线不正确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第八次扩

大的全体会议，托洛茨基和吴伊沃维赤极激烈的攻击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说了许多极端反党的话。当时，苏联的外交关系恶化，很有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危险，然而托洛茨基说，这不算什么危险，“一切危险之中的最大危险，只是党内统治的现状。”托洛茨基说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和苏维埃的国家机关，都已经陷于“热月政变式”的腐化——德尔米它的腐化（注见前）。反对派发出了许多的提纲和文章，责备苏联共产党的一切种种机会主义和民族改良主义。总之，托洛茨基的这种攻击，真正是所谓空前的，他们反对派所造的谣言，也是无奇不有的。而且这些文件，差不多都是同时发现在国外反对派的机关报上，尤其是德国。

情形是非常之严重的。很明显的，反对派自己正造成国际的中心，德国是已经有了乌尔旁斯、马斯诺夫、路德菲塞尔一派，自己有机关报，自己有国会里的党团，正在不断的反对德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他们并且还在进行着法国、美国等等反对派的组织，——俄国的反对派就是实际上的中心。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对于这种情形自然是不能够不坚决反对的。当时全场一致的投票反对托洛茨基和吴伊沃维赤，责备反对派的政治立场，附条件的暂时保留托洛茨基和吴伊沃维赤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并且特别决定：请苏联共产党执行坚决的办法，禁止俄国反对派的派别斗争和反党活动。

这时候，反对派内部发生分化。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的反对派申明书就引起了反对派联盟之内的所谓“左派”和“最

左派”的不满意。他们认为这是六大领袖和“工人反对派”领袖的叛变。不久，反对派联盟之中分出了一个“最左派”（萨普洛诺夫、闵夸夫、史美尔诺夫^②—V. Smirnoff），自己提出特别的政纲。这个政纲是完完全全反对共产主义的了，有些地方简直是公开的反革命的言论。

别一方面，反对派联盟之中，有许多分子感觉到托洛茨基派的反党，实在彰明较著得不堪了，所以坚决的脱离反对派，回到中央委员会方面来：例如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嘉^③、塞腊文、巴达叶夫、尼古拉叶华、莎郭里尼夸夫、左夫等等。

当时，苏联驻英公使馆被搜查，英俄绝交，托洛茨基派却趁这个“时机”对于中央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哀的美敦书”——八十三人签名的申明书，并且开始所谓请愿运动，到处去请人签名：这个申明书，实际上是完全和中央委员会路线相反的特殊政纲，对于一切组织上、策略上、国内政策上、国际政策上的问题，反对派都提出自己的特别主张。反对派收集签名的结果怎样呢？第一，证明反对派人数是很少的（三四个月奔走呼号的结果，只得了三千多党员的签名，而当时苏联共产党的党员总数有一百二十五万呢）；第二，反对派的人数，比以前减少了，反对派之中半数以上是职员等等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第三，右派分子，例如乔治亚^④的民族主义者，也赞成反对派；第四，后来发见收集签名的方法，有些时候简直是作弊，所以随后有许多签名的人自己声明不知道，而撤消了自己的签名。

同时，反对派又到各种大会和群众会议上去演讲，企图发

动党内的辩论。他们提出召集紧急的中央全会的要求，他们并且要求在第十五次全国大会开会之前的三个月就要开始党内辩论。

组织第二党的企图。 反对派联盟的托洛茨基派，赞助共产国际所开除的德国共产党党员乌尔旁斯等，利用他们的机关报公布反对派的政见，给一般党外群众看，在西欧资产阶级政府之下，做反对苏联共产党中央的宣传，这事实上是组织第二个“共产党”的企图，并且是组织第二个“共产国际”的企图。

在苏联国内，反对派的文件同样是不但散发到党员之中和被开除的党员之中去，而且发到党外去。季诺维叶夫在《实话报》第十五周年开会的那天（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对着广泛的群众会议，攻击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反对派甚至于组织反对中央的示威运动。事情是这样的——反对派的史美尔加，被派到伯力去工作，他不肯去，反而说中央是要排挤他，不让他到七月的中央全会——其实通常中央委员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回去参加中央全会的，就是派到国外去也没有什么要紧。他自己虽然不肯去，可是，他在中央的指示之下不能不动身；于是反对派就到车站上去“欢送”他，调动好些反对派分子来参加这个示威，自然，普通看热闹的人也有不少。于是国外的孟塞维克报纸和白党的报纸都替反对派大大的鼓吹；这是很自然的事，他们都认识这是反对无产独裁的表示。

一九二七年七月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体会议。 这种情形之下，七月的中央监察联席全

会，不能不坚决的解决反对派的问题，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团讨论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叶夫的行为之后，向中央和监察委员会联席的全体会议提议开除他们两个人的中央委员。这种办法，还是列宁在俄国共产党第十次大会上提议的：凡是破坏党的纪律和统一的中央委员，就应当开除中央委员的职务。当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审查他们两人的问题的时候，托洛茨基和季诺维叶夫又提出许多责备中央的话。托洛茨基说：中央委员会大多数现在对付反对派的政策，是俄国革命陷入“德尔米它”——“热月政变式的腐化”。托洛茨基对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沃尔总尼吉兹^②，回答了一封信，他说：“反对派要做克罗孟梭^③！”他这种话是用的法国的“古典”。克罗孟梭曾经说过，就是敌人的军队到了离巴黎几十里的地方，他还是要主张更换政府的领袖。所以托洛茨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有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战争，他们反对派仍旧要推翻中央委员会的领导的。

然而中央监察联席全会，为着要证明中央仍旧要给反对派“改过自新”的机会，所以对于十三个反对派的中央委员，提出好些要求（这十三个委员是：托洛茨基、季诺维叶夫、加美尼夫、皮亚塔夸夫、腊夸夫斯基、叶夫独吉莫夫、史美尔加、巴加叶夫、摩腊洛夫^④、亚夫狄叶夫、彼德松、李子定、莎洛维叶夫）。这些要求，就是要他们放弃自己的反党行动和观点。反对派只肯部分的同意，结果总算是承认了三个要求。所以八月八日反对派又申明了一次，可是承认错误却是承认的非常不痛快，非常之没有诚意的。八月八日的申明书写过之后没有

几天，反对派已经表现仍旧没有放弃派别斗争。虽然如此，中央和监察委员会的全会，仍旧只给了反对派一个严重的最后警告，而暂时保留托洛茨基和季诺维叶夫在中央委员会之内。

八十三人的申明书。 八十三人的申明书的问题，还要再说一说。在这个申明书上面，反对派的签名，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列宁主义的左翼”。其实，反对派在苏联共产党之中，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左”，也算不得“无产阶级的”，更算不得“列宁主义”的。这个八十三人的申明书说：（一）英国保守党的对俄政策，是因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己的政策不好，所以弄到这样决绝的；（二）中国革命暂时的失败，主要的原因，亦是因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不对；（三）苏联国内的政策，应当是“民主主义化”，就是反对工资增加得太慢，反对国家机关的合理化和生产的合理化，说是“许多”工人都因此失业了，“许多”职员都因此受着排挤了；（四）苏联党内的情形是“一味的高压政策”——这一点是反对派最着重的；（五）苏联的无产阶级独裁制的阶级基础正在削弱等等。总之，反对派是说苏维埃的国家已经在所谓“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腐化着。这样，可见反对派的政纲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纲是绝对相反的东西，是绝对不能互相调和的。而且这个政纲上面，反对派已经自称是党内的特殊的“一翼”；承认共产党可以由“两翼”联合组成——这种理论就是要容许党内存在许多派别许多小团体的理论。

而且这种理论发展下去，就是党应当分裂。所以苏联共产党不能不用全力来克服这种派别，战胜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

主主义倾向的反对派。

十五人的申明书，所谓“最左派”的政纲。 此外，当时还有一个十五人的申明书，就是反对派里面分出来的所谓“最左派”的政纲。据现在发见的许多文件看来，以前大概有过好几次反对派联盟之中各派的代表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所谓“最左派”的代表表示不同意于托洛茨基的路线，而要求应当采取“更左”的政策。“最左派”认为反对派十月十六的申明是错误的。“最左派”在一九二七年二月里面，就发出了一个提纲说：“党内斗争已经带着阶级的色彩……斗争开始起来，一切官僚都到史太林一方面去，而工人党员在反对派一方面……斗争是不能够限于党的内部范围之内了。”他们认为：“要克服小资产阶级所赞助的‘史太林派’，一定要反对派得到工人阶级的积极赞助和同情，所以现在就要组织干部，以准备将来为着保持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一方面暴露史太林及其政策的罪恶，别方面亦要暴露反对派领袖的动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锻炼出干部来，领导斗争到底。”这就是所谓“十五人派”的政纲。反对派分裂出这个“最左派”的运动，不但在莫斯科有，并且在全国都有的。

“最左派”政纲的根本，就是说因为俄国技术的落后和劳动生产力的低微，所以俄国是不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这是纯粹孟塞维克的理论。实际上，照这种理论说起来，十月革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十月革命决不是进到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这种过渡，照“十五人派”的意见，是不可能的。关于经济政策的问题，“十五人派”的立场，就是反对派以前的路线。

他们认为最主要的危险是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关于国家制度的问题，“最左派”认为，现在已经是“农民富农的民权主义制度”，“一九二三年取消党内民主主义，亦就是取消工人的民主主义，结果，却是开展农民富农的民权主义制度。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不但束缚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并且开展非无产阶级的积极性。”他们甚至于说：苏联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压制工人，不准他们表示合法的不满意，甚至于对于党内的反对派，亦用这种压制手段——而工人的不满意，却就是官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式的腐化所引起来的。”红军亦有可能变成拿破仑主义的冒险政策的牺牲品。”总之，所谓“最左派”——萨普洛诺夫派十五个领袖签名的申明书，简直是完全把苏联共产党看做仇敌的一种政纲。俄国工人阶级的胜利和成绩，他们一句也没有提起。这当然已经完全是反对共产党的另外一个政党的党纲了。

一九二七年的缓冲派。 八十三人申明书（反对派的“正统派”）、十五人申明书（反对派的“最左派”）之外，同时，发现所谓“缓冲派”的一封信，签名的是史克洛夫斯基^③、沃夫相尼夸夫、加斯帕洛华等（总共有五十个人签名，有些人马上就撤消了自己的签名）。这封“缓冲”的信，实际上是把反对派骂党的许多话，重复了一次，说什么压迫、消极、堕落等等；仅仅因为当时党内的重新登记，结果是党员人数有一些减少，他们就说出极端悲观的话；他们并不去分辨中央委员会和反对派之间的不同意见，而简单的说要有“党内的和平”，所以要开始关于这些不同意见的党内辩论，仿佛辩论就可以得到和平了！很

明显的，如果再要开始辩论，只会更加动摇党内的现状，对于党一定有非常之大的害处。而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却很正确的看着这个缓冲派是他们的“候补”党员的学校；托洛茨基派替“缓冲派”散发他们的政纲，经过他们而吸引动摇的党员。“缓冲派”的这种作用，在七月的中央全会上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后来不久这个“缓冲派”就解体了，其中一部分（加斯帕洛华、铁普洛夫）完全加入了托洛茨基派。

注 释

① 反对派联盟，指1926年夏由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的反对派联盟。1927年11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12月，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又将托季联盟的主要成员加米涅夫等开除出党，该联盟遂告瓦解。

② 工人反对派，1920年下半年在俄国共产党（布）内形成的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派别集团。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工会，主张把经济管理交给工会负责。1921年3月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判。

③ 史列亚普尼夸夫，今译施略普尼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аврилович Шляпников，1885—1937），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0—1922年成为“工人反对派”的组织者和首领。1933年被开除出党。1988年平反。

④ 美德维狄夫，今译梅德维捷夫（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Медведев，1885—1937），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人反对派”的首领之一，后为“新反对派”骨干分子。

⑤ 八月联盟，托洛茨基于1912年8月在维也纳组成的反党联盟。该联盟采取取消主义立场，1914年瓦解。

⑥ 史美尔加，今译斯米尔加（Иван Тенисович Смилга，1892—1938），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追随托洛茨基。1927年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骨干分子被开除出党。1988年平反。

⑦ 腊夸夫斯基，今译拉柯夫斯基（Х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Раковский，1873—1941），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反对派骨干分子，1927年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1988年平反。

⑧ 莫洛托夫，见本卷第336页注⑮。

⑨ 原稿两字不清。

⑩ 巴古，今译巴库。

⑪ 新经济政策，见本卷第308页注⑳。

⑫ 白仑基，今译别连基（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Беленький，1885—1938），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5—1927年追随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

⑬ 腊塞维赤，今译拉舍维奇（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ашевич，1884—1928），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在苏维埃和军事部门工作。1925—1926年成为“新反对派”分子，1927年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指控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后恢复党籍。

⑭ 美亚斯尼夸夫，今译米亚斯尼柯夫（Г. И. Мясников，1899—1946），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工人反对派”分子，1922年被开除出党，后成为“工人团”的组织者，移居国外。

⑮ 郭尔史，今译科尔施（Karl Korsch，1886—1961），德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因犯“极左”错误受到批评，翌年被开除出党。以后从事哲学研究工作。

⑯ 苏华梭，今译苏瓦林（Boris Souvarine，1895—？），法国共产党党员，1921年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被选为法共政治局委员。后被指责为托洛茨基辩护，被共产国际和

法共开除。

⑰ 乌斯德烈亚洛夫，今译乌斯特里亚洛夫(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Устрялов, 1890—?)，苏联法家学、政论家，立宪民主党人。曾任莫斯科大学讲师。1918年在西伯利亚领导高尔察克政府的出版局。高尔察克匪帮被粉碎后逃往哈尔滨，任中东铁路中心图书馆馆长。

⑱ 伊斯德曼，今译伊斯特曼(Max Eastmun)，美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以个人身份参加共产国际“四大”，会议期间，他安排美共代表团会见了托洛茨基。

⑲ 孙逸仙大学，即中山大学，全称为“孙中山中国劳动大学”。1925成立于莫斯科，1929年改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30年秋停办。

⑳ 腊狄克，今译拉狄克，1925—27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见本卷第306页注⑦。

㉑ 史来德林，今译谢德林(Н. Щедрин, 1826—1889)，俄国伟大的讽刺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萨尔特夸夫是他的笔名。

㉒ 萨普洛诺夫，今译萨普龙诺夫，见本卷第336页注⑩。

㉓ 莎郭里尼夸夫，今译索柯里尼柯夫，见本卷第336页注⑫。

㉔ 皮亚塔夸夫，今译皮达可夫，见本卷第307页注⑭。

㉕ 马斯洛夫(Arkadi Maslow, 1891—1941)，原名伊萨克·切美林斯基，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德国共产党中的“左”派领袖之一。因进行派别活动，1925年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和德共。

㉖ 路德菲塞尔，今译路特·费舍(Ruth Fischer, 1895—1961)，原名为艾尔弗雷德·埃斯勒，奥地利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921年她又参加柏林共产党的组建工作，1924年率德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五大”，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后被指控进行派别活动，同马斯洛夫一起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和德共。

㉗ 乌尔旁斯，今译乌尔班斯(Hugo Urbahns, 1890—1946)，德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9月，被指控进行派别活动开除出党。1928年建立“列宁同盟”，成为德共的左翼反对派首领。

㉘ 鲍威尔(Otto Bauer, 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

国际的首领之一。

②⑨ 史美尔诺夫，今译斯米尔诺夫（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мирнов，1887—1937），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成为“左派共产主义者”，1920—1921年成为“民主集中派”分子，1923年加入托洛茨基反对派，1926年被开除出党。

③⑩ 克鲁普斯嘉，今译克鲁普斯卡娅。见本卷第336页注①⑥。

③⑪ 乔治亚，今译格鲁吉亚。

③⑫ 沃尔总尼吉兹，今译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1937），苏联共产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1903年入党。1921年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6年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30年起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③⑬ 克罗孟梭，今译克列孟梭（Georges Benjamin 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曾两度出任法国总理。

③⑭ 摩腊洛夫，今译穆拉洛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Муралов，1877—19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7年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反对派骨干分子，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

③⑮ 史克洛夫斯基，今译什克洛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Львович Шкловский，1875—1937），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5年起任布尔什维克国外组织委员会委员。1917年回国，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因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1927年被撤销监察委员职务。

从恢复时期到建设时代

——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

苏联的经济政治状况

第十四次大会到第十五次大会之间的苏联共产党。 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苏联的经济，可以算是结束了恢复时期——工业和农业，都已经恢复到了欧战以前的程度（一九一三年的程度）；而且如果单独的看某几种产业，那么，甚至于已经超过了欧战以前的程度：新建设的工厂都已经采取最新式的技术设备；旧的工厂也有许多新添了新式的机器；有几种重要的产业，主要是铁、煤和煤油，已经比以前扩大；水炭事业，苏联不但在数量上是世界第一，就是在采取的技术上，也是世界第一；发见了极多的钾酸盐，因此农业上，以及化学工业上简直得到了极大的改革。电气化的计划实行了，工业之中应用电力的增加了不少。而好些农村和家庭手工业都应用电气，这更是社会主义工业和小农经济联络的第一步。农业上开始采用多种植物按年轮流耕种的办法，采用耕种机器，各种合作社大大发达，这些都使农村之中实行集体式的经营的道路，更加扩大了。苏联的货币制度完全稳定了，国家预算没有亏空，国外贸易总是“出超”的。虽然那两年有好几件事

实，证明帝国主义准备武装干涉苏联（英俄绝交，伦敦、北京、上海、柏林的苏联使馆或者商务代表署被搜查），然而苏联国家的势力已经完全巩固，可以往前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不但依据国内的武装力量，而且依据工农巩固的联盟以及自己的经济力量。所有这些，都证明一个国家里面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可以有更广大的计划来建设。于是从以前单是各产业的简单建设计划，进一步提出全国经济总建设的五年计划。所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要素之一——有计划的原则，就已经有了巩固的基础。

苏联共产党的反对派，只看见个别的缺点，就来批评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经济政策，企图提出自己的经济政纲，可是他们的政纲是自相矛盾的，常常动摇的。

现在，我们把这重要的过渡关头——从恢复进到建设的过渡关头，苏联共产党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来简明的叙说一下：

工业化的速度和道路问题。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是要使苏联工业化，反对派对于这一点是并不反对的。问题是在工业化的速度和道路。反对派总是说：苏联工业的发展比农业慢，而反对派所引用的统计却是不正确的（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中央全会上智尔仁斯基^①证明给反对派听了的）。反对派的理由是：农村是在发财，农村之中是在积聚资本。七月全会的时候，统计上可以看得出的是：一九二四——二五年度苏联农村总共买了 2,500,000,000 卢布的货物，到一九二五——二六年度，就买了 2,600,000,000 卢布。而且俄国农

民就算多买了四万万卢布，也不过一个人多买了四个卢布。而自命为代表工商业的反对派，居然因此大发其恐慌呢！

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大会上，本来很明显的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是中央委员会的，就是要使苏联的经济发展，脱离技术程度比较高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束缚——自己增加生产工具、机器等等的制造；别一条路线是反对派的（沙享、莎郭里尼夸夫^②的提案），就是要苏联的经济发展，更加受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束缚，——阻碍苏联自己工业的发达，使苏联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可是，第十四次大会之后，反对派联盟在自己的经济政策里面，仿佛加了些“新的”意见，他们看见“工业化”的口号很能够得到大众的信仰，因此，自己申明是主张用更快的速度发展工业的。他们认为中央委员会发展工业的速度是不够的，他们要求增加发展新工业的大批投资。表面上看来，反对派联盟的这种要求，仿佛是很“左”的主张。然而，他们要增加大批的投资，请问这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去弄来？照他们的办法，不但要使大多数农民，甚至于要使大多数工人都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原来反对派的提议，是要提高一切工业品的价格，从涨价的办法之中来筹出大批的资本来。反对派并且提议，对于中农加税，以为“暂时”和中农争论一下是不要紧的。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同样认为必须逐渐投入大批的资本去发展工业；然而反对派认为当时的投资是太不够了，因此有种种涨价、加税等的提议；其实如果照着反对派的提议实行起来，一定连当时那些做到的成绩都会没有，而且一定破裂工农的联盟。

价格政策的问题。 反对派政策尤其错误的地方就是对于工业品和农业品价格的主张。苏联在俄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大会(一九二四年春天)之前,因为工业品和农业品的价格相差太远(所谓剪刀状态),所以就发生经济危机。要解决这个“剪刀问题”,只有两方面进行的办法,就是一方面维持农业品的价格,一方面减低工业品的价格。于是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党内便发生了争论——反对派的开始便是为着反对减低工业品的价格。然而经济政策上却必须实行这个办法,因为只有减低工业品的价格,才能够真正提高工人的现实工资,同时,也是提高农业劳动的代价——工业品是大多数人民日常的必需品,如果价钱很贵,那么,工人的工资只管增加,他们能够买的东西仍旧很少,同样,农民的收成只管很好,他们能够换得到的日用品一定仍旧是不多的。当然,要工业品的价格减低,同时必须真正减低工业品的成本,就是实行生产的合理化,提高劳动的生产率。这些办法,对于苏联的工人和农民,是同样都有利益的。一九二七年的夏天,就实行减低工业品价格百分之十。一九二七年七月的中央全会决定再继续的实行减低价格。

托洛茨基的反对派联盟,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和四月的中央全会的时候,却居然投票赞成减低价格;可是,这并不是因为反对派承认这种办法是正确的了;他们投票赞成减价,只不过是因为恐怕工农群众要更加离开反对派,——这只是一种应付手段。这个价格问题,因此亦就是反对派内部分化的一个原因。萨普洛诺夫^③等的“最左派”(十五人派),就因此

分裂出来，他们公开说出托洛茨基的赞成减价是“无原则的应付手段”。原来，整个反对派联盟对于经济政策的原则，是不管农民经济的死活，更不管要引导中农群众亦走上集体农场化的道路等等问题，一味的只要“发展”工业，因此而放弃国外贸易的国家独占亦可以，因此而提高工业品价格亦可以，对于中农加税亦可以……这种所谓原则，事实上是只要工业发展，而不要工业一定有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要工业去领导农业的社会主义发展。

工资政策和生产合理化的问题。 苏联共产党认定自己的任务是经常不断的竭力改良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改良社会保险，消灭失业，改良住宅，增多卫生设备等等。然而必须工业发达，全国经济建设进步，经费增加起来，这些办法才可以逐步进展。关于工资的政策，是首先提高原来很落后的区域，平均全国各业的工资，然后一般的提高工资的水平线。这些问题里面，实际工作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然而反对派却说，苏联工资的增加比劳动生产率的增加，来得落后。这里，反对派忘记了一件“小事”——就是苏联的国立工业里面，必须有“社会主义的资本积累”，必须经常的扩大生产，因此，工人阶级所生产的价值之中，必须留出相当的一部分；如果工人生产的价值，全部都归工人自己享用（就是工资的极大高度的增加），那么，哪里来的经费去建设新的工业、开辟新的事业呢！“社会主义的资本积累”大半是靠国立工业和国立商业的利润，以及国家的税捐。所以亦可以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费，是出在农民和新资产阶级的身上，同时，亦有很不少的

部分是出在工人阶级自己的身上。因此，要增加工资，同时必须增加工人劳动的生产率，就是要工人的劳动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国立工业的经费才能够有更多的增加。而工人生活状况的改良，社会保险费的增多等等，也就靠这种“社会主义的资本积累”的日益增多。

生产合理化的问题亦是同样的道理。苏联共产党认定自己的任务是实行广泛的生产合理化。生产合理化是增加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法。社会主义的苏联是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资本家要增多工人的生产量，他们所实行的合理化，主要的是加紧对工人的剥削。苏联的生产合理化，主要的是改良机器，改换工厂的设备，装置新式器械。可是，有的地方，也要靠更好的利用旧式机器，利用原有的设备，把旧式机器重新装置过，把运输原料和搬出产品的方法改换得更加敏捷，节省燃料、原料和其他应用品等，改用“孔威恩制度”（就是一件生产产品，从原料直到完全制造成功，都用机器继续不断的做成；减少管理员的人数，支配主要工人和辅助工人的人数，使经费能够更加节省等等）。苏联共产党所实行的生产合理化，是特别注重工人自己的参加，能够使工人自己设法想出工厂里的许多新办法出来。为着这个目的，苏联的共产党和工会，想出组织“生产会议”，创办奖赏品的办法，提倡新发明等等。而反对派却武断的说：这是剥削工人，这是造成失业等等的合理化！

失业问题。 当时（一九二六——二七年）苏联的确有失业的工人，而且失业的人数亦不算少。可是苏联的失业在原

则是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不相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面，工人失业，大半是因为“多余”的亏本的工厂倒闭了的缘故，是因为新发明的技术只需要更少的工人了；资本主义国家里面，工人的总数往往要因此而减少（例如，一九二六——二七年英国的煤矿工人）。至于苏联的各种工业，虽然也有困难的时候，可是工人每年都在增加起来，工人的总数正在一年比一年的多起来，所以苏联的失业，主要的是乡村之中出来的农民，农业之中多余出来的劳动力。苏联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办理社会保险，倡办社会工程，扩大农业生产，发展重新制练农产品的工作，垦殖新式农产品，扩大水利工程，发展移民运动，实行沿海州等处的殖民，训练熟练工人（工厂职业学校、技术学院等），组织失业工人的劳动（劳动社）等等；还有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后来一九二九年又实行“不断星期制”（注）。

而当时反对派却认为这种政策是太迟缓了，他们武断的提议最短期间消灭失业的要求。皮亚塔夸夫^④在一九二七年七月的中央全会上说，苏联现在的失业，是中央委员会的错误政策引起的危机，反对派却能够在最近一年之中完全消灭失业。其实，这都是空想，要消灭失业，必须还要根本上的经济进步，至少还要工业以至农业有好几年的发达。

（注） 不断星期制是每一企业或机关把工人和职员分成好几班，每班有自己的休息日，这班休息的时候，其他各班仍旧做工，所以工人有休息，而企业可以不必停顿。同时，需要的工人却比普通星期制度之下要多；现在所实行的是五日的不断星期制，每人做四天歇一天；将来还可以改成“四日星期制”、“三日星期制”呢。

社会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反对私人资本的斗争。 新经济政策制度之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发生反对私人资本的斗争问题。新经济政策的制度之下，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竞争着，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国立商业要去和私人资本的工商业竞争，所以“谁打败谁”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要紧问题。苏联共产党的政策是：使私人资本工商业的发达，只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就是有利于苏维埃国家的限度之内。无产阶级独裁制调剂着监督着私人资本的发达。如果为着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利益，需要完全消灭工商业之中的私人资本，那么，苏联共产党当然应当这样决定，并且可以实行这种办法。可是，当时谁都没有提起这个问题。一九二七年，反对派还申明过：他们连新经济政策都并不主张取消的。那么，对于私人资本的问题，反对派的政策和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有什么分别呢？分别是在于反对派对于私人资本只有一个糊涂政策。一方面反对派否认苏联经济之中私人资本的成份一年比一年的减少，而夸大的说私人资本怎样怎样的巨大，因此，提议对于私人资本的税捐要大大的增加。别方面，反对派又提议提高国立工业出产品价格等类的政策，恰好是可以帮助私人资本的作用更加扩大起来的。反对派还提议从国立商业和合作社之中抽出一大批资本来放到工业里面去，这种政策又是帮助私人资本在商业方面扩大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却是限制私人资本的生长，逐渐完全排斥私人资本，设立起更多的国立企业和合作社企业来。这种政策的实行，的确见了极大的成效。

税捐政策。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税捐政策，是：对于贫农完全免除税捐，对于中农减轻税捐；对于富裕的农民经济和富农，就相当的加重税捐的负担，然而亦不使他们这种农民经济弄到不能存在的地步。苏联共产党的反对派，当时对于税捐政策，亦有特别的和中央相对立的主张。他们提议：“要从农民身上多拿一些。”皮亚塔夸夫④在一九二七年七月的中央全会上，代表反对派要求从农民的多余粮食之中再征收一万五千万到二万万铺德的粮食（一铺德约合中国三十斤）。这种征收，在当时简直是要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然而这种提议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上的根据的。普莱沃白腊仁斯基⑤是反对派的理论大家、经济学大家，他发明一个“社会主义的资本积累的特别公律”，仿佛农民小生产者是无产阶级工业的殖民地，社会主义的资本积累完全只靠剥削这些小生产者。很明显的，如果苏联共产党采取了这种学说和“公律”，那么，一定就要破坏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关系，使无产阶级独裁制丧失自己的保障。列宁主义的政策，决不是去剥削小农业生产者，决不是去企图简单的消灭小生产者，而是要经过合作社化，把小农经济改造成集体的大经济——经过农民群众在无产阶级的国家领导之下的合作式的联合。

总之，反对派以前对于工业品价格的问题，是主张“越贵越好”，而现在对于农产品税捐的问题，又是主张“越多越好”；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要受到怎样的影响，他们却是不管的！

反对派和无产阶级独裁制的问题。 关于政治制度的问题，反对派也提出许多责备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话：什么“脱离阶级的轨道”，什么“腐化”，什么“热月政变主义”^⑥，什么“苏维埃国家阶级基础的腐化”，“国家政权的性质已经不是完全无产阶级的性质”，——所有这种一切的责备，仿佛是“左”的方针，仿佛从“左”边来批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反对派竭力的证明：“苏维埃已经被官僚主义所腐化了。”萨普洛诺夫和史美尔诺夫^⑦在一九二七年甚至于提出“恢复苏维埃”的口号。一九二六年的时候，反对派就提出一种说法，说苏维埃被小资产阶级所蹂躏了。事实上怎么样呢？事实上，无产阶级独裁制必须工人阶级对于农民有适当的政策，使工人阶级的确能够领导农民。农民的积极性，尤其是贫农，以及中农的积极性正在增长，所以苏联共产党必须实行“苏维埃积极化”的政策，引进农民干部参加社会工作，实行改良下层苏维埃机关的办法，改良农村之中的信用制度；总而言之，就是实行苏联共产党当时的口号：“向着农村。”苏联共产党所应当实行的政策，不是去扰害农民，不是去惹起农民的反感，而是保障无产阶级及贫农和中农的巩固联盟，使中农的确能够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当时反对派的活动一天天的厉害起来，简直是要分裂苏联的共产党，这当然有极大的危险，可以使无产阶级独裁制之下存在着两个政党，或者好几个政党，这些政党的互相斗争，会使苏维埃真正变成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而且这就要根本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无产阶级独裁制之下，是不能

够容许两个政党的存在的，或者一个政党之内有两个派别的存在的。列宁说过：“无产阶级独裁制之下没有资产阶级国会制度的基础，没有资产阶级式的政党制度的基础。”“共产党一定要是统一的，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唯一的领袖和领导者，然后才能够保障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反对派却以为无产阶级独裁制的意义，是无产阶级压迫农民，苏维埃的意义是无产阶级控制农民的政治制度，因为他们总是把工人阶级和农民互相对立起来，因此，引导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破裂！

国际政策的问题。 反对派对于国际政策的问题，亦有种奇怪的主张。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要竭力去维持，这样来延长“休息时间”，就是延长和平、坚决的保持和平政策，这样来巩固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而反对派的主张，却是要苏联和共产党去实行危险的冒险政策，可以破坏外交上的和平关系。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认为只要不放弃无产阶级独裁制的根本原则和经济命脉（国外贸易独占，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国有，工厂和土地国有），那么，假使实行某几种让步是保存外交上和平关系所必要的，假使必须实行几种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有利益的经济办法，——无产阶级的政党和国家是应当去实行的。反对派却说这种政策是“非列宁主义的”。他们要求苏联共产党全党都要承认：一九二七年的夏天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苏联方面的一切保存和平的企图和努力都是丝毫没有用处的。这种主张，其实是遇见国际政策上的困难问题，而发恐慌，弄得手忙脚乱，表现“无所措手足”的状态。事实上，苏

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保障了十多年的和平，加强了苏联工人阶级和各国劳动群众的联络。而苏联共产党从没有放弃丝毫的国家经济的命脉。这个政策的根本原则是——力求和平，力求“休息时间”的延长，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达来更加巩固这个和平和资本主义国家所给的“休息时间”，更加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巩固苏联国内各民族之间的联盟，以及苏联工人劳动民众和各国劳动民众之间的联盟。这种政策的成效，可以使苏联深信：在战争来到的时候，他一定能够抵抗得住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而且，甚至于把这种武装侵略，变成欧洲资本主义制度自己的破产的出发点。

注 释

① 智尔仁斯基，今译捷尔任斯基。见本卷第336页注⑦。

② 莎郭里尼夸夫，今译索柯里尼柯夫，见本卷第336页注⑫。

③ 萨普洛诺夫，今译萨普龙诺夫。见本卷第336页注⑩。

④ 皮亚塔夸夫，今译皮达可夫。见本卷第307页注⑭。

⑤ 普莱沃白腊仁斯基，今译普列奥布拉仁斯基(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1886—1937)，苏联经济学家。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为“左派共产主义者”，1920—1921年工会问题的争论中是托洛茨基纲领的支持者，1923年起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骨干分子，1927年被开除出党。

⑥ 1794年7月(热月)法国大资产阶级发动政变，推翻了雅各宾专政，建立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史称热月政变。反对派所谓“热月政变主义”，是攻击苏共中央实行专制。

⑦ 史美尔诺夫，今译斯米尔诺夫。见本卷第361页注⑳。

三民主义的清算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

“党之基础果已动摇，党之威信实已扫地，而痛究其过去失败之原，果不在乎三民主义之本身，实归咎乎大多数无耻之徒，借党营私，妄为作恶，驯至国可破，主义可亡，而个人利害则必争……所谓权则属于他人，过则归咎于党，我党先进果已痛乎言之。”

这是上海《申报》十二月十二日登载的。标题虽然是《上海市各工会的联合宣言》，可是，看这种半通不通的梁启超式的四六奏章的体裁，大概一定不是工人说的话。问题是在乎说这些话的人居然敢说现在的国民党违背了自己的三民主义，居然还认过去失败之原因不在乎三民主义之本身。

果然是这样吗？咱们倒要来清算一下。

第一，民族主义

孙总理的民族主义的精粹，就在于一个竹杠论。怎么叫做竹杠论呢？总理说：

“从前有一个苦力，天天在轮船码头拿一枝竹杠和两条绳子……后来买了一张吕宋彩票，就把所买的彩票收藏在竹杠之内。到了开彩那一日，他一见号单知道自己中了头彩，可以发十万元的财……便把手中的竹杠和绳子一齐投入海中。用这个比喻说，吕宋彩票好比是世界主义，是可以发财的；竹杠好比是民族主义，

是个谋生的工具。”①（《三民主义》讲演集）

因此，照孙总理的学说：中国人民应当老死拿住一枝竹杠，替帝国主义当苦力，不应当讲世界主义，去联合各国被压迫的民众。替帝国主义当苦力，就守住了自己的“民族主义”，依靠外国资本来开办买办式的实业。如果联合各国被压迫的民众，那就是要打倒外国资本了！

最近，北大学生到南京示威②的时候，打着联合世界被压迫的民族的标语。国民政府说：这可见他们是反动，该打该杀。邵力子③还对新闻记者说：为什么他们不说联合世界上的压迫者民族呢？（见上海《小日报》）。从此所得的结论是：现在国民党的誓不打倒外国资本的政策，完完全全合于孙总理的民族主义，逮捕、枪杀反对这种政策的青年，也是完完全全合于孙总理的民族主义的。

第二，民权主义

孙总理的民权主义的精粹，就在于一个阿斗论。总理说：人民是一国之主，是有“权”的（？）但是他们譬如阿斗，是无“能”的（？）政府是一国的公仆，是有“能”的（？），譬如诸葛亮。“阿斗知道自己无能，把国家全权托到诸葛亮，要诸葛亮替他去治理。”④（同上）。这样的说法还并不是说的所谓训政时期，而是说的宪政时期！读者可以去查一查总理讲演的民权主义。那么，在所谓训政时期，民众的自由权利完全剥夺，这照孙总理的民权主义讲起来，更是当然的道理了！

蒋介石的国民会议和约法⑤，汪精卫的所谓“民权在地域上一天天的扩大，在程度上一天天的加深”，或是，胡汉民的反

对国民会议和约法——总之，无论什么样国民党式的民权，都跳不出这个阿斗论。痛快的说一句：就是民众不应当有自由，不应当有权力，民众是阿斗，应当把全权交给诸葛亮式的政府或者党部。

“国家有自由，人民不应当有自由”，这也是孙总理的话。现在所谓国家既然就是政府，政府自然可以自由的零毫拍卖民众的利益，自由的枪毙民众，自由的绑票，自由的开机关枪，而对于帝国主义，可以自由的无抵抗，自由的把整个国家交给国际联盟会中：这都是百分之一百的孙总理的民权主义。

第三，民生主义

孙总理的民生主义的精粹，在于所谓大贫小贫论。总理说：“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中国止是患贫，不是患不均……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专政使用不着”。(同上)⑥因此，现在的政府和党部禁止阶级战争，用大炮、机关枪对付反抗小贫的大贫阶级，强迫的增加生产效率……以及一切种种软的硬的对付工农小百姓的政策，没有一件不是遵照十分道理的孙总理的民生主义。

结论

结论是什么？结论是很清楚的。孙总理的三民主义老老实实已经实行。中国现在的外交、内政、以及所谓社会政策，都可以找到孙总理自己亲口讲的话来做根据。

最近宋庆龄发表了一个宣言⑦，说：“宁粤对峙，自炫其

长，互暴其短……而究其实，两者皆依赖军阀，献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同为革命罪人。”又说：“党不能救国利民，自取覆亡，何所顾惜。”宋庆龄对于国民党都没有任何顾惜的了，何况别人？！但是，她有一点倒也没有想着：她说：“美其名曰党治，使党蒙不白之冤，遭全国人民之厌恶唾骂，其实三民主义，何尝一日见诸实行。”这可是太冤枉了国民党了。国民党把国家、把人民、把自己的党，弄到现在这个地步，正因为切实实行了孙总理自己亲口说的三民主义。

所以我们可不能够不说！问题的确在于三民主义之本身。

原载1932年1月2日《中国与世界》第5期

署名：樊梓

注 释

① 参见《孙中山选集》第653—65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引文同原文稍有出入。

② 1931年12月初，因国民党政府代表向国联提出将锦州划为中立区，北京大学学生组成示威团赴南京示威。12月5日北大示威团在南京遭到军警镇压。

③ 邵力子（1881—1967），字仲辉，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甘肃省政府主席等职。

④ 参见《孙中山选集》第771页。

⑤ 指1931年5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通过的所谓《训政时期约法》。

⑥ 参见《孙中山选集》第830、842页。

⑦ 指1931年12月19日发表的《宋庆龄之宣言》。

有国大家卖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五日)

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东三省，实际上已经完全占据了满洲：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省城都在日本军队手里。最近中国国民党党员、前东北政分会委员、副司令部参谋长臧式毅^①，“受此间有产者之督促，为维持民生福利地方秩序起见”，居然“由当地法定人民团体之推举”，而正式就任日本驻满司令委任的辽宁省省长了。满洲所剩的只有锦州一角，现在日本军队——似乎是奉臧省长的命令——又大举“剿匪”进攻锦州了。

满洲，不但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张学良^②张大人的无抵抗主义断送了给日本，而且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前东北政分会委员臧式毅臧大人接办，公开卖国事宜。并且，所有这些交割手续，都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之下，逐步完成的。从镇静到镇压，从镇压到绑票，从绑票到屠杀，屠杀不了再行捆送车站递解回籍，——对内的内政方面，的确用尽了一切力量来镇压反抗卖国的民众了。从缴械到退却，从退却到提议列国联军驻防锦州中立区^③，从恭请列国联军到敦请国际共管天津^④，从敦请共管到

举手赞成日本撤兵无限期(国联会上)，从赞成日本不撤兵到欢迎国际瓜分中国的调查团⑤，——对外的外交方面，也是想尽了一切方法实行了卖国的各个步骤了。这些事情，请问：那·一·件·不·是·国·民·党·做·的·？

所以上海宝山路上的血⑥，广州永汉路上的血⑦，南京珍珠桥边宁粤合流的血⑧，已经同着上述的一切把戏证明了卖国的责任是谁的。

但是，卖国不比做一个“蹩脚”洋行的买办。卖国的利益是非常之大的，全中国的一切种种“贤能才智”大家都看得眼红。这个“大买办”不能够一个人去做，不能够归一帮人包办。因此，汪精卫⑨汪大人等等要大叫反对个人独裁。而罗隆基⑩、胡适之⑪博士等等要大叫反对一党专政。于是乎大呼小叫，一递一声的喊着：民主、民权、人权……等等。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有·国·大·家·卖·的·主·义·！所以所谓民权人权，都不过是卖国权罢了。

宁粤合作的所谓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个“均·权·共·卖”的问题。

然而，要讨论以·后·的·“均·权·共·卖”，难免要算算旧账，算算以·前·的·“分·权·各·卖”的旧账。这种旧账，一算起来，自然就要相骂。将来的新账一定又算不好，那时当然又要相打。

关于旧账的问题，现在已经相骂了。南京派的吴稚晖⑫在一中全会上说：广东派的人“赴日勾结日本来祸中国之卖国者，不能不科以相当之责任”。广东派的孙科⑬等等说：张学良应当“负丧师失地责，即南京政府亦当负重要责任”。两

方面互相揭穿卖国的责任，互相推诿卖国的责任，这是多么好看的滑稽戏。

对于平民百姓，不成问题的**事实**，是整个国民党的卖国责任。广东派的陈友仁^⑭到日本去，日本通讯社已经早已发表：他是去和日本商量“取消满洲之军国主义”，而实行“总理对日之新政策的”。陈友仁关于这一点，始终没有声明否认。足见吴稚晖说的丝毫不错。他错在于不服从神圣的孙总理的对日新政策。广东派要“惩办”张学良，表面上是要张大人负起不抵抗主义的责任。其实，他们是根据于陈友仁和日本谈判，——所谓“取消军国主义”，就是撤换张学良。今天广东的柏文蔚^⑮的提案，把这一点说得很明白：

“东北事变^⑯由一二人感情恶劣所致，日方目标与用意颇为明显，若因一二人致殃及多数之生命财产，牵一发而动全身，后患将无底止，当此危急存亡之秋，若能稍事变通，可免许多祸乱”（十二月二十八《申报》）。

至于南京派的责任，那是更加明显。解决济南惨案^⑰的中日协定，到了三年之后的今天，还没有发表！蒋介石派和日本订立了密约，承认了某些条件，看他们直到现在的行径，的确有许多说不出口的苦衷。而且大家看得见的是：九一八以来一切不抵抗、镇静……政策，自然是南京派员大部分的责任。所以吴稚晖大人给张学良的电报里，还替无抵抗政策辩护，他说张学良以前是“抵抗适以召祸”。这句话还是反俄专家冯庸^⑱说出来的。足见南京派方面，的的确确预先有个不抵抗的政策。他们在美国帝国主义支配之下，准备好了把满

洲送给日本，绝不抵抗，而且还要冯庸^⑧等类的反俄专家，帮同日本一块儿去打苏联。

这样说来，政策上的问题，根本主张上的问题，——广东派和南京派难道有什么不同么？丝毫也没有。问题只在于卖国佣金分配上的争执。因此，吴稚晖说：“但望会中不专攻击京方，则彼也不要求科粤方卖国者以责任。”这就是个互相赦免，合作卖国的转圜办法。有国大家卖的主张，这样公然的说出来，真不愧为中华党国全国第一超等丑角！脸皮的厚赛过万里长城了。然而全靠这样的厚脸皮，一场胡骂，暂时收篷。

暂时，这种合作卖国的好戏还要做一阵。而且他们还在企图扩大卖国团的范围：东北政分会的新名单发表了——胡适之、罗文干^⑩、吴鼎昌^⑪、熊希龄^⑫、汤尔和^⑬、张伯苓^⑭、人权派^⑮与研究系^⑯都参加了。

等着看罢——有国大家卖的主义，实行到几个月再来相打？

起来干罢——看平民小百姓的力量什么时候推翻这个有国大家卖的扩大卖国团？

原载1932年1月15日《中国与世界》第6期

署名：樊梓

注 释

① 臧式毅(1884—1956)，辽宁辽阳人。“九一八”事变时任辽宁省政府主席，日本占领沈阳后，叛变投敌，任伪满洲国民政部总长。

② 张学良，见本卷第61页注④。

⑧ 锦州中立区,见本卷第201页注⑤。

④ 国际共管天津,见本卷第207页注⑬。

⑤ 国际瓜分中国的调查团,即国际调查委员团。见本卷第196页注③。

⑥ 上海宝山路上的血,见本卷第202页注⑨。

⑦ 广州永汉路上的血,见本卷第202页注⑩。

⑧ 1931年12月初,因国民党政府代表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各地学生纷纷赴南京示威。12月17日,汇集南京的3万余名学生举行游行,当队伍走到珍珠桥边中央日报馆附近时,遭到宁粤合流的国民党政府军警的镇压,30多名学生被杀害,造成流血惨案。

⑨ 汪精卫,见本卷第61页注⑧。

⑩ 罗隆基,见本卷第190页注③。

⑪ 胡适之,见本卷第61页注⑨。

⑫ 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江苏武进人。1907年在法国编辑《新世纪》,鼓吹无政府主义。1927年后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评议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国际最高委员会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职。

⑬ 孙科,见本卷第224页注⑧。

⑭ 陈友仁,见本卷第191页注⑳。

⑮ 柏文蔚(1875—1947),字烈武,安徽寿州(今寿县)人。1912年任安徽都督兼财政部长,1913年起兵讨伐袁世凯。1924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时,上书南京政府,主张抗日。

⑯ 东北事变,即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我国东北的事件。

⑰ 济南惨案,见本卷第31页注⑧。

⑱ 冯庸(1901—1981),字镇雄,辽宁海城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后在东北军中任职。1927年在沈阳创办冯庸大学。1929年冬,中东路事件中,组织学生义勇军参加反苏作战。九一八

事变后，拒绝留沈阳主持东北政务，被日军软禁。后辗转到北平，继续主办冯庸大学。

⑲ 罗文干(1888—?)，字钧任，广东番禺人。早年留学英国，研究法律。1912年任广东都督府司法部长、总检察厅检察长。以后历任北京政府司法部次长、财政总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外交总长等职。1931年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司法行政部部长兼外交部长。

⑳ 吴鼎昌(1884—1950)，字达铨，浙江吴兴人。安福系骨干，北方主要财阀。1926年同张季鸾等接办《大公报》，任社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支持蒋介石，后任实业部长。九一八事变后，组织赴日经济考察团，与张群、黄郛勾结，成为新政学系骨干。

㉑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1913年同梁启超、张謇等组阁，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1928年任蒋介石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一二八事变后，代表上海各团体救国会奉劝张学良出兵收复东北。

㉒ 汤尔和(1878—1940)，名鼎，浙江杭州人。1930年后历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任行政院驻平政务委员会委员、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委员。七七事变后，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㉓ 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天津人。当时任天津南开大学校长。

㉔ 人权派，见本书第33页注⑳。

㉕ 研究系，即宪法研究会。1916年原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等标榜研究宪法，组织“宪法研究会”。研究系在政治上依附段祺瑞，并勾结西南军阀，进行投机活动。

国民党各派的一致和矛盾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七日)

满洲事变^①之中，日本和列强的帝国主义的进攻苏联和进攻中国民众的苏维埃革命，显然是一致的。中国各派的国民党军阀，中国各派的地主资本家，对于这两个问题，也完全是一致的。

但是，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各派地主资产阶级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抢夺中国的势力范围，抢夺各省区的地盘，抢夺对于中国工农、兵士、贫民的剥削权的矛盾和冲突——也在剧烈起来。这些矛盾和冲突自然削弱着他们的力量，分化他们的势力。可是，同时这些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还在造成种种奇形怪状的幻想，来蒙蔽群众。譬如说，美国帝国主义可以出来“帮助中国领土之完整”，日本帝国主义会在满洲宣传“消灭军阀制度，发扬中国固有的民治精神”；蒋介石、吴稚晖^②会骂陈友仁^③和日本订密约，胡汉民^④、陈济棠^⑤又会骂蒋介石、顾维钧^⑥卖国……以及一切种种地主资本家的走狗，都会高叫“民治”，“取消一党专政”，“召集国民会议”。这些投机的欺骗的把戏是必须经常的揭穿的。一定要深刻的了解：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压迫，必须由工农民众

自己的积极的斗争,才能够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满洲和热河,必须由工农民众自己的武装才能够收回,中国的解放和统一,几万万民众的脱离压迫和剥削,必须要有民众自己的革命政权,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政权,才能够达到。中国民众要解放,要避免瓜分,要创造自己的祖国,还必须和国际的无产阶级联合,必须和苏联的无产阶级联合,必须反对进攻苏联!

这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宰割满蒙,反对列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唯一的道路。不革命就一定要瓜分!请看:

现在的南京政府干些什么呢?现在的胡汉民、陈济棠派,蒋介石、张学良派又在干些什么呢?他们大家是在抢着卖国,是在准备着军阀混战,是在积极的压迫反帝运动,是在积极的进攻红军和苏维埃区域!就是企图用一切种种力量,一切种种手段,来消灭解放中国的真正的革命势力。

锦州丧失了,山海关以东已经完全在日本手里了,日本军队又向热河进攻了。而国民党的各派完全没有办法,完全听凭帝国主义的宰割。他们只在各自运用自己的军阀力量,组织什么长江五省联防、西北联防、华北联防、西南联防,各自运用自己的绅商和银行的帮口,闹什么停付内债本息,截留关余、盐余,“商人组织内债基金委员会”等等,互相抵制,互相争夺,互相牵制妥协,互相攻击排挤——分割中国,出卖中国,剥削中国的民众。至于外交方面,这些国民党、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各派也在耍着手段,互相“斗法”。请看:

美国在蒋介石、顾维钧下台之后,在锦州丧失之后,在日本公使、领事几次拜访陈友仁之后,就忽然改变了模棱的滑头

态度，对日本发出通牒说：“不能承认任何事实上之情势为合法，凡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表所订立之任何条约或协定，足以损及美国或其人民在华条约上之权利，或领土及行政之完整，或违反国际间关于中国之政策，即通常所谓门户开放政策^⑦者，美国政府均无意承认。”跟着，主张设立中立区域，敦请国际共管天津^⑧的顾维钧就大大的“爱国”起来，马上出来申明美国通牒是“中国外交形势上之一大进步”。

英国立刻表明态度，说：“英国为国联之一分子，地位与美国不同，认为无须根据九国公约^⑨致通牒于日本，只须日本再声明并不破坏满洲之门户公开政策，就可以继续由国联来解决中日的争执，而英国决不干涉。”跟着，陈友仁就发表他的答复美国通牒的照会，说：“来照所称之条约或协定，中国政府本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之原则，绝无订立之意。”并且陈友仁立刻再申明“中国必须依赖国联，用外交手腕解决满洲问题”，赶紧催促颜惠庆^⑩从美国动身到巴黎去出席一月二十五日的国联会议。这种情形很明显的表现着英国和美国的冲突，陈友仁和顾维钧的冲突。而尤其明显的是在美国通牒之前，陈友仁的确开始了和日本订立密约的谈判，所以东京的电报说：“中日直接交涉因美国通牒而延缓！”

法国当然更明显的申明反对美国的干涉满洲交涉，主张由“国联解决”。法国自己开动了两万大兵到滇桂边境。而党国要人的宣言说：“法国调动军队是追剿共匪，并无侵略之意。”

至于现在“当局以高唱绝交作为缓和民气，以便从中发现

交涉新途径，则又当别论矣。”（南京德顾问的谈话）。

所有这些，都极明显的表现：国民党各派的对内对外一切政策，都是帮着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步骤，都是在帮着自己的外国主人布置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美国从今年二月起，要在夏威夷到菲律宾，操演十万九千人的海军；这种大规模的调动军队，是和日本的占领满蒙一样的，都还只是大战争的序幕！法国在安南^①和云南的军队调动，英国在西藏和新加坡的军事布置，都是一样的。至于国民党各派对于日本指使白俄捣乱哈尔滨，破坏中东路的交通……都沉默而恭敬的表示赞成，绝不抗议，又是明显的帮着国际帝国主义，企图把自己之间混战先转变到进攻苏联之战争！

原载 1932 年 1 月 21 日《斗争》第 1 期

署名：狄康

注 释

① 满洲事变，指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

② 吴稚晖，见本卷第 382 页注⑫。

③ 陈友仁，见本卷第 191 页注⑳。

④ 胡汉民，见本卷第 148 页注⑬。

⑤ 陈济棠，见本卷第 95 页注⑬。

⑥ 顾维钧，见本卷第 213 页注⑬。

⑦ 门户开放政策，见本卷第 197 页注⑧。

⑧ 国际共管天津，见本卷第 207 页注⑬。

⑨ 九国公约，见本卷第197页注⑧。

⑩ 颜惠庆(1877—1950)，字骏人，江苏上海人。1912年后，历任北洋军阀政府外交总长、内务总长等职，1926年曾任国务总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任驻英、苏大使和出席国际联盟大会首席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1949年2月，经北平(今北京)、石家庄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商谈和平。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⑪ 安南，今称越南。

当前的重要问题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

三民主义已经次第实现，欢迎瓜分和共管！

中国究竟是民众的，还是地主资产阶级的？！

日本占据了东三省，指使白俄在哈尔滨暴动，几次破坏中东路①的运输，现在还在叫熙洽②的吉林政府去打宾县的张学良派的吉林政府，竭力要想完全占领中东路区域，准备着大规模的反对苏联的战争。同时，日本自己的军队早已打下了锦州，直到山海关，还在积极的进攻热河、蒙古，——瓜分中国已经实实在在的开始了。美国和国际联盟，同样的要进攻苏联，同样的调兵遣将，同样的要瓜分中国。不过瓜分的时候，如果暂时分不均匀，那就申明“顾全中国领土之完整”，主张共管。

这种情形之下，三民主义当然次第实现而快要完成了。固然，三民主义实行了已经很久，不过完全的实现和完成，却要谢谢日本和列强帝国主义的这次进攻，却要谢谢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最近的积极欢迎。

宋庆龄的宣言③说，中国国民党并未实现三民主义，这是显然的当面说谎。请把现在的事实和孙总理的理论对照着

来看：

日本现在在满洲，准备着建立所谓满蒙新国家，据北平的专电，这种新国家的建国方略是：“（一）日、满、蒙、汉、韩五族共和，同化而为亚东大民族；（二）采用中国所特有之人民自治主义。”这种政治，已经在沈阳附近，例如四平街等县完全实现：就是由“当地各姓大族，经过族长绅董会议选出自治会，不分日、韩、满、蒙、汉，凡属有能力置备土地不动产或生产资本者，皆属公民，”（见去年十一月初的各大报专电）这是事实。

“中国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结实的……每一姓中，用其原来宗族的组织（日本人译作‘中国所特有之人民自治主义’），拿同宗的名义先从一乡一县联络起，再扩充到一省一国……都结合起来，便可成为一极大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民族主义第五讲）^④至于汉、满、蒙、回、藏应当同化于汉族，混合成为一个国族，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应当互相联合，——这更是孙总理早年的主张。这是孙总理的理论。

民族主义的理论，不是靠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努力而变成了事实了吗？！

当然，努力的不仅是日本资本家，还有中国的地主和资本家。东三省现在的“自治政府”，不都是当地“法定人民团体”的绅商推举出来的吗？日本攻打锦州的时候，锦州的商会——法定人民团体的领袖，正式请求中国军队退出，不必守城。这更是千真万确各报登载的事实。

再则，现在的南京新政府，据说是“民治的政府”，是要“均权共治”的。这个政府已经规定了：（一）立法院、监察院委员之半数由民选分子充当，（二）由法定人民团体选举代表，组织国民救国会的国民代表机关。这些法定人民团体，首先自然是银行公会，现在的财政总长已经完全是银行界的人。其次是商会、同业公会，这些商会等，最近在上海公然反对反帝国主义的罢市罢工。再则就是法定的所谓工会，这些工会——资本家的走狗，也公然反对罢工。至于各地方的官办抗日会收贿作弊，破坏抵制日货，各地方商会等类的法定团体公然示威反对抵制日货，反对拍卖现存日货救济失业工人，反对筹措款项举行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大罢工，那更是天天可以听见的事情。这些法定团体的民治主义，真正是十足的卖国的“民治主义”。这是事实。

而孙总理说：“提出民权主义来建设共和国家，就是想免此争皇帝的战争”（而叫各派军阀“均权共治”），“中国学生得到了自由思想……便拿到学校内去用，于是生出学潮，美其名，说是争自由”；“而我们国民党向来主张以三民主义去革命，而不主张以革命去争自由”（所以不许学生、工人、农民、兵士争自由，不许罢课、罢市、罢工……）。这是孙总理的理论。

三则现在的外交部长陈友仁^⑤的亲信鲍明铃早已声明：中国应当应许日本：不在南满铁路之旁建筑平行路线，一切铁路可以中日合办，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满洲的“纷争”，而且可以“发达民生”。实业部长陈公博^⑥宣言要来一个什么“五年计画”，“大大吸收外国资本”，开发实业，使“民生问题得以解

决”。而上海的全国绅商领袖，更在主张请列强派人加入内债基金委员会，以“维持内外债信用，稳固金融，即所以安定民生，防御阶级战争之蔓延”。这些都是事实。

而孙总理说过：“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使用不着”，“中国无产可共，中国只是要造产”。而大借外债来“造产”，又是孙总理的“建国方略”^⑦，这是有孙总理自己著的一大部书做根据的。这也就是中国地主资本家恭请国际共管中国财政的理论上的基本。

总之，三民主义已经在次第实现了！

中国广大的革命民众，也许大家已经知道，美国及国联是和日本一样要瓜分中国的了，也许大家已经知道，党国衙门是理应捣毁无所顾惜的了。可是，三民主义的真相，尤其是法定人民团体（地主资本家及其走狗）的决心卖国，——大家却未必见得已经充分明了。所以我特别来指出这一个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民众要救国，一定同时还要反对他们——反对地主资本家，而自己动手把中国夺回来！！

原载1932年1月《中国与世界》第8期

署名：樊梓

注 释

① 中东路，见本卷第148页注②。

② 熙洽（1883—1950），满族，姓爱新觉罗，191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九一八事变后，组织伪吉林省长官公署，任公署长官。伪满洲国成立任财政部部长兼吉林省省长。

③ 宋庆龄的宣言,即1931年12月19日发表的《宋庆龄之宣言》。

④ 见《孙中山选集》第675—67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⑤ 陈友仁,见本卷第191页注②。

⑥ 陈公博(1892—1946),广东南海人。中共“一大”代表,1923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加入国民党,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七一五”随汪精卫叛变革命。因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同汪精卫、顾孟馀等人于1928年底在上海成立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为改组派首领之一。1931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汪精卫投敌。

⑦ 《建国方略》,孙中山著,1917—1919年写成。内容分三部分:1、心理建设,即孙文学说,论述“知难行易”的哲学思想;2、物质建设,即实业计划,提出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设计;3、社会建设,即民权初步,解释为实行民权而举行会议的手续和方法。

太平洋战争中的上海问题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日)

日本最近提议在中国五大口岸(上海、广州、汉口、青岛、天津)设立所谓“不驻兵区域”，就是要把中国的最大几个都市——工商业的中心城市，完全交给帝国主义管理，完全由帝国主义军队驻防。美国对于这个提议表示“毫无考虑之余地”，美国帝国主义者说：“此项提议，……性质等于瓜分中国”，而“美国将恪遵华府会议^①商定之原则：(一)不干涉中国之内政，(二)有关系各国应尽力协助中国修明政治，(三)同时又应尊重中国主权及领土之完整”。中国的外交部长罗文干^②也就跟着美国提出抗议。所以这些“争论”仿佛都是所谓“国际正义的呼声”，其实，这里正表演着太平洋战争的危险一天天的接近。

日本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固然公开的要瓜分中国，美国帝国主义实际上也是要剥削中国民众，中国外交部更不过是出卖中国给帝国主义的经纪人。日本、美国和英国，以及法国、意大利，都是为着剥削中国而互相抢夺着，准备着太平洋上的大战争——瓜分中国的大战争。中国的各派军阀政客，也在起劲的帮助着自己的主人制造这种战争——准备这种

瓜分。

上海最近的事变^⑧，中国兵士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之中，国际资产阶级——日本、英、美、法、意等的帝国主义，以及中国各派各帮的军阀政客和绅商，都非常积极的利用这个机会，从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各方面来准备瓜分中国。

现在的世界形势之中，英国和美国互相争夺全世界的霸权，各国帝国主义争先恐后的抢夺市场和殖民地，大家都在准备着战争。太平洋上的中国就是这种战争的一个主要目标。这里，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英美之间的强大的冲突，利用自己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用武力占领满洲，再进一步就想占领上海及沪宁铁路的区域。

日本、英国、法国以及美国，最近的一切行动，无论是外交上的或者军事上的，都同时看准了三个目的：一是进攻苏联，二是压迫中国民众的革命，三是准备自己之间的战争。每一个行动，只要可能，必然的兼顾到这三个目的。

最近的上海事变更明显的表示出来：日本进兵上海，不但是要强迫中国立刻承认一切条件，尤其是完全“扑灭”中国民众的反帝运动，同时，就在满洲占领哈尔滨——更加巩固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而且企图封锁吴淞口——由日本海军占领这个远东最重要的港口。上海事变之后，欧洲发表了中国领海之中日、英、美三国海军力量的比较：英国有六只巡洋舰，日本有五只巡洋舰，美国只有一只巡洋舰。假定日本一月二十八日的进攻闸北，能致有占领辽吉两省那么容易，假定吴淞口内外已经完全被日本海军所垄断，那么，美国在中国领海里

的**海军力量**就不能够很容易的增加起来，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之中就不但不能够用上海做一个**海军根据地**，而且要受到日本海军的很大的威吓，因为日本那时就有了从满洲直到长江的广大的“后方”。英国的**海军根据地**主要的是在新加坡和香港。如果日本能够实现上述的计划，那么，它对于英国就成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同盟军，即使它只保持“善意的中立态度”，也已经可以帮助英国大大的打击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力量。这是军事上的问题。至于外交上，那么，日本和英国在中国都有固定的势力范围，而美国还没有。美国要扩张自己的势力，必须打击英日的割据政策，迟早必须要用武力克服日本或者英国，然后太平洋问题方才可以“解决”，方才可以“告一个段落”。因此，美国一定反对目前就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本部，划分势力范围，划出所谓五大城市的“不驻兵区域”。如果目前就划分，那么，英日就它们原有的势力范围布置起来，一定比美国要多占不少便宜。这是美国反对“不驻兵区域”的真正的原因。甚么“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甚么“不干涉中国内政”等等，都是一篇天大的谎话。不用多说，只要提起一九二七年三月底美国军舰炮打南京城④的事实，就可以完全揭穿美国的假面具。中国民众听见日本和美国以及美国走狗之间的争论，应当知道这是美国准备瓜分中国的外交上的准备：美国不久以前警告日本，说“美国不能够承认九一八事变所造成的一切事实为合法”，最近，更加用拥护“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拥护“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为主义向日本抗议。这些假仁假义的行径，都是想找一个“光明正大”的名目来制造对

日战争的空气。

上海事变之中，英国的态度是非常之“奇特”的。英国政府甚至于在国会之中禁止议员骂日本是“海上强盗”。英国利用日本抵制美国的形势也许一天天的要更加明显出来，虽然表面上现在是英美“一致调停中日纷争”。

总之，上海事变之中，我们已经看见帝国主义列强真正一致的镇压中国的革命民众和反帝国主义运动——一致同意日本占领上海华界和禁绝反日运动等等，尤其一致的是奖励日本加紧准备反苏联的战争，——美国领事出来调停哈尔滨的丁超^⑤和日本的冲突，使得日本的军队得以无抵抗的进占哈尔滨。同时，我们必须看清上海事变之中，美国趁日本增兵上海的机会，必立刻调动大批的军舰和很多的军队到上海来，英法等国也都派兵，——这同时是在准备太平洋战争。而且列强之间的“争论”问题，居然是“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与否”的问题。这里，再明显不过的是：美国要经过它在中国的种种走狗，来欺骗中国的兵士和民众，要拿中国的兵士民众做炮灰，替美国去打日本或者其他的帝国主义。

中国的绅商、中国的地主、中国的资本家之中，有些正在希望日本、美国赶紧去打苏联，或者希望日本和美国打起来，希望美国资本家来救他们的命，来镇压革命的中国民众。中国民众对于太平洋战争的态度，应当是联合日本、美国的劳动群众，反对这种瓜分中国的战争。中国民众应当赶快自己团结起来，和兵士共同组织自己的武装势力，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并且打退美国、英国……的帝国主义军队。

“用战争反对战争”！

原载 1932 年 2 月 26 日《中国与世界》第 10 期

署名：樊梓

注 释

① 华府会议，即华盛顿会议，1921 年 11 月 12 日至 1922 年 2 月 6 日在华盛顿举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远东及太平洋势力范围的会议。参见本卷第 197 页注⑥。

② 罗文干，见本卷第 383 页注⑯。

③ 上海最近的事变，指 1932 年 1 月 28 日夜，驻上海的日本侵略军由日租界向闸北发动的武装进攻，又称一二八事变。

④ 1927 年 3 月 24 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军占领南京。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纠集日、法、意等国炮击南京城。中国军民死伤 2000 余人。

⑤ 丁超（1880—？），辽宁新滨人。奉系，曾任东北第八混成旅旅长、吉长镇守使、东铁护路总司令等职。九一八事变后，率部与冯占海、李杜等联合成立吉林自卫军，开展抗日斗争。1932 年 5 月叛国投敌。

谈谈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

(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

工厂小报是宣传最广泛的群众工具。虽然这一定只是一个工厂的报纸，而且现在还大半只能够用墙报的形式，可是，这是最能够接近到最广泛的工厂里的每一个工人的报纸。所以工厂小报实是党和工会的很重要的工作。

第一，工厂小报用什么话来写呢？用群众日常口头上讲的普通话来写呢，还是用知识分子的新式“白话”——不成其为白话的白话来写呢？答案是很清楚的。可是，现在一般同志差不多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简直没有想到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纠正这种错误。一定要用口头读出来普通工人可以懂得的话来写。工人之中有很多是不识字的，识字的也很不容易懂得那种封建余孽的半文不白的白话。而且，他们大半不能够懂得比较复杂的真正白话的句头和字眼。因此，如果用那种新式白话写工厂小报，那就等于用英文写了工厂小报去贴在法国巴黎的工厂里的。必须用真正的白话，而且是浅近的白话，每一次用到新名词一定要顺便的解释；句法要简单、明了、短俏，代名词要确切、清楚，如果不能够，那么，宁可多用几次名词；缩短语越少用越好等等……这虽然不是

最重要的问题，却是第一个问题，是先决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工厂小报的内容即使好到万分，仍旧和极广大的群众不相干。

第二，工厂小报必须着重在具体的、切实的、绝对不夸大不吹牛的消息。工厂小报首先要能够领导起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因此，单有口号的宣传，尤其是一般口号的宣传是不够的，必须把这一工厂里的“新闻”，关于每个工人的“事件”，例如扣工钱，罚金，挨打，挨骂……关于工厂的消息，例如减少工钱，增加夜班时间，扣除工房的房钱，总之工厂管理处的每一个举动，都要正确的迅速的记载到工厂小报上去。不但如此，关于政治的消息，也要简明清楚的叙述。首先要注意的是：工厂小报要提出关于本工厂最切身的政治问题。直到现在，我们在工厂里常常只宣传一些关于全国的政治问题，这是不够的，要经过工厂小报，领导群众去注意当地的市政问题（例如上海的市政府，租界的西董、华董，纳税会等等），去注意这一区域的政治问题（例如上海浦东的什么保卫团，什么自来水，什么房捐等等……）。这里，有许多直接关涉到读者本身的日常生活的。这里，应当准备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认识和力量。将来的区苏维埃、市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假使没有这种准备，是不能够切实组织起来的。总之，工厂小报要会经过正确的记载客观的具体事实，去鼓动群众起来斗争。

第三，工厂小报要根据党的政策，运用这些具体的事实，去动员群众。这就是要登载简单明了的论文。有了具体的事实记载之后，这些论文的力量将要增加十倍二十倍。这些论

文应当是最通俗的，根据工厂里工人读者所知道的事实，去解释党的口号，具体的指出这一工厂的工人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去实行这些口号，所有这些，都是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里面所必须的宣传方法。而且工厂小报要想能够执行自己的组织群众的责任，还必须迅速的反映这一工厂的每一件事变。这是要支部干事会负责的，不能够等待区委、省委，而自己消极的做旁观者。譬如说，昨天晚上某一个工人或者女工受着了打骂或者侮辱，那么，今天就要有这个消息揭露，今天就要有评论的文章，具体的而不是笼统的指示全厂工人应当干些什么，应当怎样保护自己的权利，这样去动员群众的斗争。

第四，工厂小报必须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首先，工厂小报要组织自己的访员，自己的通信员。最好要在工厂的每一个部门（例如细纱间、粗纱间），在这一工厂的工人住宅的每一个区域（例如一个弄堂，一个胡同），都有自己的访员，要他们能够按时的报告当地的“新闻”。工厂里的通信员就要能够学习着自己写消息，写简短的文章。工厂小报的编辑委员会要在自己的访员、通信员之中做有系统的教育工作，逐渐的扩大他们的组织。工厂小报的编辑委员会要吸收非党的工人参加，要讨论而共同决定对于每次事变的态度和政策，而写成功指导群众的社论。然后指导自己的访员和通信员根据这篇社论，到工厂的各部门去，到工人住宅的各区域去，发展群众之中的讨论，反映群众的意见，对于群众的意见，要会正确的批评，给他们相当的教育。单纯的咒骂落后群众的“消极”，甚至于“工贼”等等，是不容许的。对于工贼走狗的暴露和攻击，也

必须有正确的策略，必须要使最落后的群众也看得见工贼的真面目。

第五，讲到群众的报纸。上面所说的话都可以应用到一般的群众报纸，只要把范围扩大到整个城市，以至于全国。暂时，全国性质的群众报纸是很难发行。群众报纸是甚么？不是上海流行的小报，而要是真正劳动群众读得懂，听得懂的报纸。暂时，这种报纸在白色恐怖之下，要求公开的存在，必须有一种所谓“灰色性质”。但是，这不应当遮盖住我们的政治立场。固然公开发行的铅印的群众报纸，比工厂小报更加要留心警察的检查和注意。而实际上这种报纸发行的可能决不是没有的。可惜的是：九一八以来许多革命的公开发行的刊物（杂志或者小报），都是给知识分子看的。我们必须来创办给群众看的报纸，至少，首先在上海要开始这个工作。不久以前，有一种革命报纸，准备给群众看的，而且是每天出版的“号外”，可是，这个报上，居然会发现“某某借途灭虢”^①的标题。这种《左传》^②古典，现在连年轻的一辈知识分子都不懂得的了，但是，出现在群众的报纸上——这不客气的说，实在是对于革命的一种罪恶。这里，可见文字问题的重要。群众报纸关于政治、经济、革命运动、国际新闻等等都要有确切的事实，完全用白话简单明了的“翻译”出来；然后群众报纸的论文，指导性质的社论，方才能够有力量去通俗的解释和传播正确的行动口号。这种群众报纸，还可以吸收大众文艺的作品，使现在大半还只有读武侠等类的旧式白话小说习惯的劳动民众，能够更加容易的迎受革命的宣传，经过革命的大众文艺（演义

式的小说、短篇纪事，以及唱本、小调等等)而肃清他们人生观宇宙观之中的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意识的毒汁。

第六，群众报纸和工厂小报都需要发展工人通信员运动。这种工作，应当是党的、工会的一种重要工作。这不能够交给无产作家联盟或者革命文化运动总联盟之类的机关去做的。这些团体自己有自己的特殊任务，而对于这种任务显然是不能够胜任的。必须党经过赤色工会去大规模的发动这个运动，而且必须有公开的真正群众的报纸的存在。这些通信员应当是赤色工会在每个工厂小报的周围去组织，使他们逐渐的和公开的群众发生直接的公开的联系。

第七，群众报纸和工厂小报都应当组织读者的读报会。这种组织应当和报纸发生密切的联系。报纸的访员，尤其是通信员是开始组织读报会的最方便的枢纽。随后，应当领导群众自己发展下去。中国识字的劳动者这样少，读报会的作用更加大。而且，这些组织都是党和工会的外围，他们可以把党的口号政策广泛的传播到不识字的劳动群众之中去。

总之，党的宣传，首先是要“脸向着群众”。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是在真正广泛的群众之中的宣传武器，这不是给少数革命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之中千分之一的知识程度较高的人看的，这是给真正广大的工人劳动者读的，甚至于不识字的人听的。所以一般同志都要切实的注意这个问题。

原载1932年3月11日《红旗周报》第31期

署名：范亢

注 释

① 原文为“假途灭虢”，见《左传·僖公五年（前655）》。晋国向虞国（今山西平陆东北）借路伐虢国（北虢，在平陆县）。大夫宫之奇劝告虞君拒绝晋国要求，说虢是虞的屏藩，“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虞君不听，结果晋灭虢后，回师灭虞。

② 《左传》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作，是一部依据《春秋》记述当时各国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叙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64），比《春秋》多出27年。

国民党出卖上海的无耻勾当

(一九三二年三月六日)

上海战争^①发生之后，我们早就指出国民党的失败主义。上海兵士群众和劳动民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现在果然已经被国民党出卖了。

上海闸北、南市和吴淞的中国军队已经完全撤退了。兵士群众一个月的英勇的战斗，一万多人的性命，一百万民众的失业遭难……都只算是国民党军阀的牺牲品，这是他们玩弄民众和兵士的牺牲品，这是他们博得日本帝国主义称赞一声“新英雄”的牺牲品，这是他们“激动”列强出来干涉的苦肉计的牺牲品！

上海的反日战争，如果劳动民众和兵士群众取得了自己来领导的可能，本来是一定可以胜利的。现在，因为国民党军阀霸占着军队的指挥权而失败了，——国民党原本是抱定了失败主义而来“指挥作战”的，原本是用假意的“抵抗”欺骗着群众，而来达到他们的不抵抗主义的目的的！关于上海战争失败的原因，请看《大陆报》^②描写的事实：

“日军可借租界为保障，其战败后退回租界整理者不止一次，即日本当道亦承认海军陆战队曾迭遭歼灭之危，幸及时退入租界

得免溃覆。反之，中国军队则因须保持租界之中立，作战须极谨慎，追逐日陆战队时，未尝有一次追入租界。中国司令深知有时以攻为守，最为上策，当日军猛攻江湾庙行时，乘虚袭攻虹口日军根据地为最优之战略，但以此击将违犯租界之中立，卒未实行。”

中国军队的总司令明明知道有这个“最优之战略……而卒未实行”，——这难道还不是故意制造自己的失败么？！

因为中国国民党军阀的假意抵抗，所以他们能够部分的维持自己对于兵士群众的指挥权，他们因此就可以这样无耻的出卖上海，——借用虹口日军的炮火逼迫自己的兵士同意退却的命令。可是，国民党的无耻还不止此。

兵士群众的革命战斗，不能够容许他们充分自由的投降退却。于是乎他们又想出一条妙计。这就是三月一日浏河方面日本兵二万余人登陆的假消息。二月二十九日的上海报纸，一致的说日本兵将要有一千多人在浏河上岸，抄袭中国军队的后路。而三月二日《时事新报》^③发表的“军报”说：“昨夜（三月一日）日军有两万余人（外传千余人不确）于黑夜中偷渡登陆”。这明明是恐吓前线兵士，故意制造恐慌的空气，然后下令退却。第一、浏河方面的江岸，根本没有一夜之间给两万多地理生疏的日军在乌黑大暗之中登陆的可能。第二、日军袭击浏河的消息，中国军部方面早就接到，如果派兵堵截，那就可以不怕日军登陆来抄袭后路。这是蒋光鼐^④、蔡廷锴^⑤等等故意放任敌军，以便逼着自己的兵士退却。所谓“爱国将军”的无耻还有有限度吗！

然而，国民党的造谣欺骗自相矛盾还不止此。上海退兵之后，蒋光鼐等等宣言，说什么这是战略上的退却，说什么这

只是退到第二道防线，说还要立即反攻等等，可是，这些宣言发表的那一天，同时发现了中央政府外交部的一个声明，那声明说：“查中日代表因英海军提督克莱爵士之斡旋，曾在甘特军舰会商立即停止敌对之基本条件，当经获得谅解如下：……中国军队先退至真茹，日本军队退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段，俟双方上述撤退完竣后，中国军队退至南翔……二月二十九日，中国代表通知克莱提督，谓中国政府业经赞同。”这就很明白的了：中国方面的退兵，并不是什么战略上的退却，而是和日本“谅解”了自动的单方面执行退兵的条件。而且三月四日又发见了一个蔡廷锴等等的通电，说明是“东夕（三月一日）奉命将前线阵地放弃”。据以前的消息是因为三月一日晚浏河有二万多日兵，所以退却的，而照这个通电，却是奉着三月一日晚的中央政府命令。这是同一晚上的事，难道已经是上海军部报告那个消息之后而得到了中央政府答复的命令吗！？足见得退兵的命令并不是根据军部的消息，而是根据于外交上的“谅解”！上海兵士群众在前线作战，屡次得到英勇的胜利，——在这种情形之下，汪蒋政府居然主张双方退兵，这已经是该杀的了，而现在事实上竟做到了中国单方面自动退兵的地步，还要说什么“长期抵抗”、“立谋反攻”，这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这真是罪该千刀万剐！

不但如此，以前汪蒋政府屡次说已经增加援兵，只因为“军事上的秘密，不能宣布”。而上海退兵之后，事实就大大的明了了。原来除出原来驻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之外，只有原来驻在江苏的第五军。而且第五军也并没有在苏州浏河方面

布防。第十九路军前线的兵士在前几天只听见说后方有救兵来了；这些欺骗的所谓“军部消息”，目的是在使群众不去注意监督“爱国将军”的战略。结果是由他们放任日军在浏河登陆了。然后，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下命令退守所谓第二道防线。其实，这就是颜惠庆^⑥在国际联盟宣言的“中国军队已经实行退却了二十公里”，这就是自动的执行日本天皇和帝国主义的上谕！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到现在已经完全揭穿了，他们是故意不派军队来援助上海的兵士群众和劳动民众，故意制造中国的失败，而表面上说些欺骗群众的鬼话，什么“长期抵抗”，什么“全国整个计划”，——目的只在于巧妙的精细的实行卖国卖民！

国民党出卖上海的无耻勾当，已经完全暴露在民众的前面。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刘芦隐^⑦（胡汉民^⑧、孙科^⑨一派的），在上海退兵之后，发表一篇谈话，请大家看他的卖国供状：

“所以在上海开始军事行动者，无非欲转移国际间之舆论，而使世界得一公平之真理而已。现在国际空气既在我军作战后已转移，则我之目的已达(!)”

原来国民党在上海和日本打仗，根本就发咒不要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而只要打给英美列强看看，只要借这个苦肉计“激励世界的公平真理”，就是请英美列强来和日本共同瓜分。现在“目的已达”，可以退兵，可以让日本和列强来管理上海，设立所谓中立区域等等了！而且，国民党在上海和日本打仗，根本就不是他们自己愿意打的，这是被兵士民众的革命情绪逼出来的。他们的“打仗”还是打给群众看看的，为的是

要欺骗群众，维持自己对于军队的指挥权，以便指挥兵士退却；现在这个目的也一部分达到了，所以想继续这种无耻勾当，进一步的卖国了。关于这一点，国民党自然不肯公开说出来。但是，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一定要揭穿他们的这个假面具！

中国的劳动民众和兵士群众呵！你们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起来斗争，建立自己的政权，自己的军队，推翻这种无耻的卖国的国民党，然后才能够解放中国，解放自己，驱逐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的势力！

原载 1932 年 3 月 16 日《红旗周报》第 32 期

署名：范亢

注 释

① 上海战争，即一二八事变。

② 《大陆报》，美国人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日报。

③ 《时事新报》，研究系机关报。1911年5月在上海创刊。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停刊。

④ 蒋光鼐(1887—1967)，字憬然，广东东莞人。一二八事变时，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后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主任。1933年11月同李济深等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反蒋抗日。

⑤ 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广东罗定人。一二八事变时，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军长，后随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参加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反蒋抗日。

⑥ 颜惠庆，见本卷第388页注⑩。

⑦ 刘芦隐，江西永丰人。历任全美国民党支部总干事，国民党中

央党部宣传部秘书、副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兼代
考试院副院长等职。

⑧ 胡汉民，见本卷第 148 页注⑬。

⑨ 孙科，见本卷第 224 页注⑧。

从马占山到蔡廷锴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

不久以前马占山^①曾经出过一阵风头,据说他是个“爱国将军”。但是,现在马占山怎么样呢?

“马占山、张景惠^②、熙洽^③、汤玉麟^④、臧式毅^⑤与蒙古二王公署名发出布告,以东北四省连哈尔滨区独立。”(《申报》二月十八日)

所谓满蒙独立国^⑥成立了,朝鲜第二的满蒙国成立了!而马占山将军也是“发起”满蒙国的日本奴才之一。当初,为着要大家迷信马占山的原故,一切反动派:从国民党到研究系^⑦,从国家主义派^⑧到第三党^⑨……,都借着马占山的名义,宣传迷惑群众的英雄主义,那时候,我们已经指出马占山的真面目。马占山的通电里自己曾经说过:“奴耕婢织,各尽其责,御侮杀敌,职在军人。”他早已明白表示他是地主绅商的代表,他的宗旨是维持“奴婢制度”。中国的工农兵士群众不但不能够靠他这一类人去求得什么解放,去打退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只有群众自己的斗争,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会议的政权,只有推翻马占山等类的地主资本家的军阀,然后才能够得到解放,然后才能够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驱逐一切帝国主义的势力。

马占山当初的所谓“御侮杀敌”，本来就只是和张海鹏^⑩抢夺黑龙江省长的打架。日本帝国主义看见他打退了张海鹏，立刻就答应派他做省长，供给他军火等等。这时候，他本来可以不必再打了；可是，日本帝国主义为着要找一些借口来调动军队到北满洲去，故意叫马占山再“抵抗”几下。果然，等到日本军队进了齐齐哈尔之后，马占山就退却了，就不再“御侮”了。过不了几天，不但日本军队截断中东路^⑪，布满了北满洲，而且马占山也加入“独立运动”，宣布所谓满蒙独立国了！所有这些都很明显的同时是积极进攻苏联的步骤。中国民众的利益和苏联的利益是一致的。日本帝国主义拿满蒙做进攻苏联的战场，同时，正是侵占中国民众……的满蒙，屠杀满蒙的中国民众、蒙古民众、高丽^⑫民众！民众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严重的教训。

最近，上海劳动民众热烈的反帝斗争，军队里的兵士群众英勇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逼得蔡廷锴^⑬、蒋光鼐^⑭等不能够不打仗。于是乎一般地主资产阶级的宣传大家，又把蔡廷锴等等捧上天去，这又是一批所谓“爱国将军”了。其实，第一、蔡廷锴等曾经两次传令停战，而兵士不肯服从，他们为着勉强维持自己的指挥地位，只有表面上装出许多“爱国”的姿势，企图蒙蔽民众，阻止兵士和劳动民众的革命化；第二、蔡廷锴等等为着保存自己在上海的地盘，抵制蒋派顾祝同^⑮的军队，使他们不能够来换防，因此，落得借这顶“爱国”的大帽子来做挡箭牌。只要有一点儿可能，譬如说：一方面日本的或者英美的帝国主义允许蔡廷锴等维持他们在上海的地盘，别

方面蔡廷锴等等能够用狡猾的手段欺骗过兵士群众,那么,蔡廷锴等“爱国将军”立刻可以不再“御侮”!甚至于现在,他们已经努力阻止兵士冲到租界去消灭日军的大本营。他们已经两次接受英美领事的“调解”的条件。他们正在准备着出卖兵士,出卖民众,出卖中国!问题只在他们军阀自己的地盘!

劳动民众和兵士们,千万不要再相信地主资本家的军阀之中有什么“爱国英雄”,千万不要相信国民党的将军之中有什么能够真心反抗帝国主义的人。解决一切问题的力量——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驱逐一切帝国主义势力的力量,推翻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的力量,解放工人、兵士、农民、贫民的力量——在我们自己。只有劳动民众和兵士群众密切的联合起来,自己选举出指挥作战的领导机关,自己选举出工农兵代表会议来做政府,自己英勇的坚决的斗争……方才能够解放自己,方才能够解放中国!

原载1932年3月11日《红旗周报》第31期

署名:范亢

注 释

① 马占山,见本卷第201页注④。

② 张景惠(1871—1959),字叙五,辽宁台安人。奉系元老。曾任奉军副司令、察哈尔都统等职。九一八事变后,叛国投敌,参与组织伪满洲国,任伪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长。

③ 熙洽,伪满洲国财政部总长。见本卷第392页注②。

④ 汤玉麟(1871—1937),字阁臣,直隶(今河北)阜城人,奉系,曾任东三省陆军步兵第七旅旅长、东边镇守使等职。1932年3月,

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副参议长。

⑤ 臧式毅，伪满洲国民政部总长。见本卷第381页注①。

⑥ 满蒙独立国，即伪满洲国，1932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扶植的傀儡组织。1934年3月1日改称“满洲帝国”。

⑦ 研究系，见本卷第383页注②。

⑧ 国家主义派，见本卷第152页注④。

⑨ 第三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见本卷第33—34页注③①、③②。

⑩ 张海鹏(1867—?)，辽宁海城人。曾任中东路总司令、奉天骑兵第一游击队统领、洮南镇守使等职。1932年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副议长。

⑪ 中东路，见本卷第148页注⑫。

⑫ 高丽，今朝鲜。

⑬ 蔡廷锴，见本卷第409页注⑤。

⑭ 蒋光鼐，见本卷第409页注④。

⑮ 顾祝同(1893—1987)，字墨三，江苏涟水人。1931年任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同年12月被任命为江苏省政府主席。

国民党还配谈领导权吗？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

汪精卫^①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说：“我们并不注重在一时军事的成败，或国民愤慨的意识，或与共产党争什么领导权”，这真正是国民党卖国的老实口供！

国民党的任何一派，三民主义的任何一派，以及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派别，一切反对苏维埃革命的派别，本来就早已没有资格谈什么领导权。国民党现在干些什么？

一 当上海兵士群众和劳苦民众英勇的进行反日战争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政府和上海军阀（蒋光鼐^②、蔡廷锴^③），用种种手段禁止进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大本营（虹口租界），并且赶紧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强迫兵士退却二十公里。

二 立刻遵照国联三月四日命令中国停战的决议，由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通令全体将士：“倘日军不向我攻击，吾军亦不向彼攻击”，这就是把闸北、吴淞直到昆山一带完全奉送给日本帝国主义。

三 国民党中央政府还通令全国禁止“非法的”军事团体，这是对付各地民众的义勇军的，自然，连满洲方面正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而攻打沈阳的义勇军，都包括在内。国民党禁

止着正式军队的兵士群众的反日，还要禁止民众自动组织的义勇军④。

四 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溥仪⑤组织了所谓满洲独立国⑥，国民党却绝对也没有真心去讨伐，——从去年九一八到现在差不多半年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张学良⑦奉送了东三省给日本，而国民党整个中央委员会没有丝毫行动是去反抗日本占领满洲的！

五 但是，同在这个期间，国民党却继续着进攻苏维埃区域和红军，最近广东的军阀更得到了帝国主义的大批军械的接济去进攻红军（见前几天的广东电）。二中全会还特别议决要加紧的“剿匪”，说是“巩固后方”。国民党不打满洲，停止夺回上海……请问有什么“后方”！事实上，如果没有国民党的残酷围剿，那么，真正劳苦民众自己的军队的红军，早已打到了上海、满洲的前线，而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了；而且苏维埃的红军，一定能够动员着广大的几万万的群众，打退日本帝国主义，驱逐一切帝国主义的势力。所以国民党的“围剿”红军，是替日本帝国主义做挡箭牌，是替一切帝国主义“巩固后方”！

六 国民党现在又完全接受了国联会议三月十日的议决案，而国联的议决案——和前几次的一样，除出几句承认中国领土的完整的空话以外，正是决定“停战调停”，请有特殊关系之各国襄助上海中立区之警务”等等。这明明是国民党又公开的出卖了一次上海，请求列强来和日本共同瓜分中国！

汪精卫的确有自知之明：国民党是故意造成上海战争的失败；国民党是绝对不顾“国民愤慨的意识”而在专心卖国；

国民党是在用飞机大炮屠杀共产党所领导的真正反帝国主义的民众革命!

但是,同时,汪精卫、蒋介石等等一切国民党军阀政客,还在说着许多空话,玩着许多把戏,企图欺骗劳苦民众和兵士群众。国民党的二中全会,一方面决定了对外实行“经济上竭诚之合作,对内实行残酷的进攻红军和禁止一切义勇军,别方面还在企图欺骗、召集地主、资产阶级、官僚、政客、流氓、买办的所谓国难会议,并且又在说什么澄清贪污,设置民意机关,完成民权主义等等。劳苦民众不但要发动广大的斗争反对“剿匪”和压迫,自动发展反帝国主义的战争,而且必须认识这些欺骗的作用,是在维持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制度,是要便利国民党的完成卖国事业!

不但如此,国民党之中,以及国民党之外,现在有些狡猾的地主资产阶级的走狗,他们感觉到广大的劳动民众正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起来实行革命了,他们感觉到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力量一天天的扩大了,他们感觉到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真正革命斗争,要走到建立全国的革命的民众政权(苏维埃)的阶段了。这对于他们是很危险的,对于日本和列强帝国主义的势力是很危险的。因此,他们还想出许多新鲜的救命办法。例如,国民党二中全会听说决议了“赦免悔过的共产青年的条例”,这样想来缓和革命!上海的豪绅资产阶级的《晶报》,还提议要准许共产党和德国、法国、英国一样的参加国会。上海反动的《申报》说“造匪”的是政府自己,说共产党和红军是和明末的流寇土匪不同的。孙文式的“马克思主义者”陶希圣^⑧,

也格外努力的主张召集国民大会，成立普选的所谓反帝国主义的政权。托洛斯差陈独秀派^①，同样格外努力的主张要召集地主资产阶级参加的普遍选举的国民会议，成立所谓民众政权！……所有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的“新鲜花样”，都是欺骗民众，破坏真正民众革命的阴谋！同时，这些提议的发现，正是共产党领导民众的力量一天天扩大的证据。

真正的民众革命，只有苏维埃革命。真正的民众政权，只有工农兵以及一切劳动民众的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这是绝对禁止地主资产阶级参加的政权。中国的劳动民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来为着这个政权而斗争，完全推翻国民党的，以及非国民党的（例如溥仪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然后才能够解放中国，才能够解放自己。

原载1932年3月25日《红旗周报》第33期

署名：范亢

注 释

① 汪精卫，见本卷第61页注⑧。

② 蒋光鼐，见本卷第409页注④。

③ 蔡廷锴，见本卷第409页注⑤。

④ 义勇军，即东北抗日义勇军。见本卷第207页注⑩。

⑤ 溥仪（1906—1967），宣统皇帝，姓爱新觉罗。1912年2月退位，1924年废除皇帝称号。1932年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改称伪“满洲国皇帝”。

⑥ 满洲独立国，见本卷第414页注⑥。

⑦ 张学良，见本卷第61页注④。

⑧ 陶希圣(1899—1988)，湖北黄冈人，社会经济史学家，汪精卫改组派成员。1931年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主编《独立评论》。1946—1947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主编《中央日报》，同时任蒋介石的私人秘书。

⑨ 托洛茨基陈独秀派，见本卷第30、33页注⑥、⑨。

工人阶级和上海和平会议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上海的英勇的兵士群众，已经被国民党军阀强迫着退却了二十公里，已经被国民党军阀强迫着停止打仗。国民党军阀蒋光鼐、蔡廷锴等等曾经假装着“爱国将军”似的神气，说什么：“日本一日不罢兵，外交一日不胜利，则中国一日不停止武力抗拒。”现在呢，他们自己都已经招供了出来。原来退兵并不是什么“战略上的退却”，而是遵照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通牒“退出上海二十公里”；原来日本军队占领了闸北、真茹、黄渡，中国军阀就立刻停止了“武力抗拒”，而且说明这是尊重国际联盟的议决案（蒋光鼐的通令），可见得以前的那些鬼话，完全是欺骗民众和兵士的——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以前也说了许多骗人的鬼话。现在事实都证明出来了：他们故意不派救兵到上海来，而且很早就秘密进行停战的谈判，自然，所有这些卖国的勾当，也是“尊重国际联盟的议决案”的。

中国国民党是国际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用欺骗和压迫的手段，故意把上海和吴淞送给日本，出卖英勇作战的兵士群众，——这还用得多说吗！这是实行不抵抗主义，奉送满洲给帝国主义……的一贯的卖国政策。同时，中国地主资本家的

国民党，正在调动大批军队，去打红军和苏维埃区域。他们和帝国主义就讲“和平”——投降卖国；他们对付工农民众，就讲打仗——压迫屠杀！

现在，中国国民党政府，已经在和日本帝国主义开停战会议，他们首先就答应了“从上海退出的中国军队驻在现在的地点，不得开回上海，以待日后解决。”这一条条件，就足够卖国的了。上海的兵士群众牺牲了成千成万的性命，打了一个多月的仗，而结果是被政府强迫调开，是被政府遵照着国联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命令，而禁止开回上海！上海的，尤其是杨树浦、闸北的工人，牺牲了几千几万的性命，二十几万的工人失业，两个月的饥饿和遭难，没有吃，没有住，丧失最后一点的衣服被铺，他们英勇的不顾一切，自动的组织武装游击队，自动的加入军队，去打日本资本家派来的军队。而结果，他们的反帝国主义的团体，被政府遵照着国际帝国主义的命令和日本的要求，而完全禁止，强迫解散；他们的生活完全没有保障。……总之，上海的所谓停战会议或者和平会议，以及国联派来的什么调查团，就是国际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指挥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来屠杀、压迫、剥削中国工农兵群众的机关！这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机关。

中国工人阶级对于这种和平会议和国联调查团应该怎么样？没有什么疑问：我们应当反对！我们工人应当领导中国的一般劳动民众和兵士起来斗争：——我们反对停战，所以我们自己要武装起来，我们要和兵士群众联络起来，我们自动的去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以至英、美、法、意等国的军队。

兵士群众应当自己选举出指挥的人来，而把命令停战的长官捉起来，枪毙示众；兵士自己有了组织，就可以继续打仗，就可以帮助工人武装起来。上海的工人，真茹、嘉定等地的农民，以及各地方的一切劳动民众，应当组织武装的力量，开始进攻日本军队的游击战争……这些真正民众的武装力量，将要受工农兵士和劳动民众自己选出来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统一的指挥。这样，自然要推翻当地的国民党政权，而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做临时的政府，以便召集当地的工农兵劳动民众的代表会议（苏维埃）。这样，中国的兵士群众，中国的武装的工农，方才能够自由的保护中国的利益，也就是中国劳动民众的利益，而去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一直要打到上海吴淞一个日本兵也没有，一只日本军舰也没有，一直要打到满洲，以至于青岛、天津、汉口……总之，全中国一点儿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也没有。并且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真正民众的政权，还要向英、美、法、意各国帝国主义提出要求：叫他们的军队也立刻撤退，不然，就一样的要打退他们。这样，中国劳动民众自己的政权和自己的军队，调动着中国几万万的群众，就一定能够打胜仗，就一定能够解放中国，就一定能够打倒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

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对于停战和平会议的主张。

上海一些资本家的走狗，冒充工人的名义，组织了所谓“上海总工会”，这个国民党的黄色上海总工会说些什么？他们派了代表去见国联调查团的洋大人，恭恭敬敬的送了一封意见书，说：“目下中国军队已退至日本所提停战条件内要求

之二十公里距离以外，而日本兵犹前进不已，此种行动唯有战之一字，可以代表，实有立予制止之必要。……我人祝望和平已久，仰企国联以求伸正义者亦已久，深信和平正义，终必未止，更信必由贵团斡旋而能历久勿渝也。”这些鬼话，完全是帝国主义资本家走狗的口气！上海的工人应当坚决的反对，揭穿他们冒充工人的真相。只有中国的地主资本家，才需要这种瓜分中国，压迫工农兵士的“和平”！

原载1932年4月8日《红旗周报》第35期

署名：范元

中国的假革命党和中俄复交问题

(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

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主要的目的是在加紧压迫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府，要他更严厉的更残酷的压迫中国劳动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和斗争。现在，中国国民党政府和上海军阀(蒋光鼐^①、蔡廷锴^②等)，用着假抵抗的手段，更进一步的实行了——不抵抗主义——欺骗着民众和兵士，强迫着兵士群众，而撤退了上海吴淞的军队，加紧的实行着镇压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白色恐怖，开始了第四次大规模围剿红军的计划。自然，这都是在英美列强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进行的。要知道：首先出来提议“调解”的就是华盛顿政府，而现在国联的议决案也是叫中国实行“停战”。南京洛阳政府^③的撤兵命令，以及蒋光鼐、蔡廷锴的“不再向日军攻击”的通令，都是明明白白的说明是“尊重国联决议”的。

上海的停战议和，已经使日本帝国主义部分的达到了他的目的，他进一步就是更积极的实际布置进攻苏联的战争了。现在特别要提醒一般民众的是：日本进攻上海的第一天(一月二十八日晚)，同时也就是日本军队在美国领事的调停之下无抵抗的占领了哈尔滨的一天。现在，满洲的所谓“独立国”^④

已经成立，中东路的护路军总司令已经是纯粹的日本御用走狗——所谓满洲“独立国”的政府所委派的了。满洲的白俄游击队已经组织了成万的队伍，上海法租界内都到处贴着招收满洲游击队的俄文广告。“满洲国”已经禁止食粮的输入苏联。……这种进攻苏联的计划，当然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共同阴谋。进攻中国革命和进攻苏联，本来是列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一致的最主要目的。

正在这种时候，洛阳方面放出了恢复中俄邦交的消息。这没有疑问的是国民党欺骗民众的一种手段，——催促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暗示。国民党一方面感觉到民众的急遽的革命化，民众对于苏联的同情和拥护正在一天天的增加。所以，他要用这种手段来蒙蔽群众。别方面，他要实际上进行勾结日本和列强帝国主义而进攻苏联，企图移转事变的重心，以便他们偷偷摸摸的解决中日问题，而且可以整齐列强帝国主义的步骤，缓和其中的矛盾冲突，维持瓜分共管同时并进的“均势”。所以，他们故意要放出这个烟幕弹，来遮蔽民众的眼光。

可是，国民党的卖国和反动实在是太露骨了，要遮盖也是太困难了。于是，出现了一些假革命党，来帮着国民党欺骗民众，实行巧妙的反对苏联和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宣传。

例如上海新出了一种《国际评论》(王礼锡^⑤、胡秋原^⑥等等办的)。这种刊物的主持人物，大家都知道是“AB团社会民主党”^⑦的首领。他们表面上假装着“革命的”神气，甚至于冒充“马克思主义派”。他们表面上称赞苏联，主张中俄复交。而

实际上呢？请看罢：

（一）胡秋原说：“中国的统一，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南京政权之强化，是苏联最可怕的；再明白些说，它是需要中国的俄国化（原文写的是英文），而不是美国化（原文也是英文）。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统一，是俄国革命运动最大的障壁。在这一点上，俄国的态度与日本是共同的”（？）！（以上见《国际评论》第一期）他说南京政权之强化，仿佛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统一，这已经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妄想。至于说苏联要阻止中国的统一，那简直是造谣中伤。——事实上，不用任何一种力量的阻止，中国在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永世也不会统一。——而尤其露骨的是：他说苏联要使中国“俄国化”。这岂不是最反动的宣传，最恶毒的反对苏联的阴谋？！，这是故意挑拨“民族主义”的恶感，掀动法西斯蒂的反俄情绪！

（二）胡秋原说：“苏俄多少懈怠了像从前广东政府时代、武汉政府时代，发动全世界民众，声援中国民众的反日斗争，也是事实。但是，我们不能以这一点来责难苏俄，正如需要我们自身反省一样。”（见《国际评论》第二期）他这种论调，很巧妙的隐藏着责备苏联的意思。事实上，就在那一本《国际评论》的第二期上，也登着“反帝大同盟号召欧美工人在柏林、伦敦、纽约等大都市举行反日运动”的消息。这就足以证明他造谣。而他说的“需要我们自身反省”，更明显的暴露他的真面目——原来他和国民党是一家人，居然通称“我们自身”。至少，这是表明他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他完全站在所谓“民族”的立场上，去推论苏联的外交政策，去埋怨苏联

政府不积极的帮助中国政府；然后，再说一句“我们不应当要求苏联为中国而牺牲，正如不应当为苏联而牺牲中国一样”，——这样巧妙的来掩饰自己的反动，而同时也很巧妙的鼓动反对苏联的民族感情，仿佛有人在要“为着苏联而牺牲中国”似的！

(三)区克宣说：“中俄复交，必须要在各方面和政府方面有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确定中俄的亲善政策；我们希望政府改正内政的路线，至少希望政府仿效英、美、德、法诸国将一切与苏联有关的无产阶级政党，看作一种政治集团，只能在必要时相当的限制破坏民族利益的武装暴动。”（《国际评论》第二期）这是他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内政的条陈。外交上，他居然希望正在进行反俄的政府实行中俄亲善政策；内政上，他主张要对无产阶级政党给一些立宪式的改良。这是他维护地主资产阶级政府的苦心。事实上，正在崩溃的帝国主义走狗的政府，根本就没有独立的外交政策的可能，也没有对内立宪的能力了。到现在还想用这种改良政策来救反革命的命，恐怕已经太迟了！尤其明显的是，他露骨的主张：“为着民族利益限制武装暴动。”这不是帮着国民党政府进攻苏维埃区域和红军是什么，这不是忠实的拥护白色恐怖的现政府是什么！他还故意在“无产阶级政党”之上加上“与苏联有关的”（！）六个字，而且还要加上了“一切”两个字。他的意思，是要代替陈独秀托洛斯基派^⑧请求政府承认他们也是所谓“无产阶级的政党”（！），允许陈托派的自由，正因为陈托派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而且正是反对红军苏维埃运动的，反对武装暴

动的。

社会民主党法西斯蒂的真面目，都暴露出来了！

此外，还有所谓“中国农工平民革命党”（就是第三党^⑨）办的《自卫周刊》，也在主张着中俄复交。这种要想复活反动的孙文主义的假革命党，说些什么呢？请看罢：

《自卫周刊》第二期上的独放说：“我平民大众要团结组织起来，推翻反动政府，更要与保护我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友邦，平等地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承认共产党存在，要像欧洲各国，使共产党同立政党之林，一切暴动行为当然禁止……现在我们要苏俄中止中国共产党的暴动行为，保全我民族利益，然后复交才发生意义”。此外，他还跟着国民党大骂了一顿江西、湖北等处的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行动”。这里，很明显的是：第三党自己要推翻政府，要冒充什么“平民大众”，而实际上狠毒到万分的痛骂真正劳动民众政权的苏维埃；同时，他们诬蔑苏俄政府操纵中国民众的暴动。他们这样进攻着苏联，还要求苏联来保护“我民族利益”！还要主张着中俄复交来欺骗民众！

假革命党比公开的反革命党还要恶毒，这在中俄复交问题上又证明了一次。假革命党原来本是反革命的别动队，现在他们在进攻苏联的战线上，巧妙而忠实的替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了！

原载1932年4月1日《红旗周报》第34期

署名：范亢

注 释

① 蒋光鼐,见本卷第409页注④。

② 蔡廷锴,见本卷第409页注⑤。

③ 1932年1月30日国民党政府发表宣言,迁洛阳办公。5月30日迁回南京。

④ 满洲“独立国”,见本卷第414页注⑥。

⑤ 王礼锡(1901—1939),江西安福人。作家、诗人。早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31年在上海任神州国光社编辑部主编,编辑《读书杂志》。1933年冬,参加建立福建人民政府的革命活动。著有《海外杂笔》、《李长吉评传》,诗集《去国草》、《市声集》等。

⑥ 胡秋原,生于1910年,湖北黄陂人。30年代初自称是无党派的“自由人”,在《文化评论》上发表文章,鼓吹超阶级的“文艺自由论”,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⑦ AB团是当时国民党潜伏在革命根据地内的反动特务组织。AB即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社会民主党”当时在革命根据地,也被当作潜伏的反革命组织进行清查。

⑧ 陈独秀托洛茨基派,见本卷第30、33页注⑥、⑨。

⑨ 中国工农平民革命党,即第三党,见本卷第33—34页注⑩、⑪。

国难会议和民宪协进会的丑态

——地主买办军阀资产阶级进攻工农的两种策略

(一九三二年四月九日)

国民党召集的国难会议^①，很明显的是团结一切反动势力，进攻工农兵苏维埃革命的一种策略。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尤其是国民政府和蒋光鼐，蔡廷锴，听着国际帝国主义的命令，服从日本天皇的上谕，强迫上海的兵士退却二十公里，而停战议和出卖淞沪之后，国民党的卖国罪状完完全全暴露在几万万中国劳动民众的面前。虽然国民党还用着一切方法，企图欺骗民众，可是，他们的假面具上，已经戳了几百几千个漏洞，实在很难掩饰的了。地主、买办、军阀、资产阶级的种种集团，一切派别，都觉得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一天天的危险，都觉得国民党快要完全没有能力维持这种统治——也就是帝国主义的统治。于是乎七张八嘴的咒骂国民党的反革命本领太小了，欺骗民众的方法太笨了，压迫民众的力量太薄弱了。他们都手忙脚乱的“积极起来”，居然算是“反对国民党”。其实，他们一致责备国民党的，只是说国民党“制造共匪”，“纵容共匪”。他们是为着维持反革命统治而反对国民党的。他们表面上说许多反对不抵抗主义的鬼话，发许多反对日本侵略的议论，其实，他们责备日本的，也只是埋怨日本用

武力强抢满洲，足以激起东亚“一发不可收拾的赤化”（罗隆基^②在去年九月底发表的文章，就是这样说的）。他们主张只要日本用外交手段“和平的”要求中国，或者提出国联请求公断，那么，“中日的争端，没有不可以解决的”，这就是说，中国可以完全答应日本的要求。

国家主义派^③、北洋军阀^④、研究系^⑤、政学会^⑥、老官僚，一切种种绅商耆老，——这些善意的批评国民党的派别，他们的主张都是这个样子，半年以来的通电、宣言、谈话、社论、文章、演说、对于国联调查团的欢迎辞，以至太太小姐的鱼翅酒席上的慰劳词，都是同样的内容。总之，不论那一派，他们的主张——主要的是：对于日本样样可以答应，只请他不要做出这样穷凶极恶的行径，以致于激起民众的赤化和革命浪潮的高涨，而国民党应当容纳“全国贤能”，共同一致努力的“剿灭”苏维埃红军和反帝国主义的工农民众革命运动。

国民党就对着这些地主资产阶级的“在野名流”，表示非常之抱歉，承认自己的反革命力量和卖国本领还没有十分到家，因此，很致细的搜罗了全国的“名人”（上自吴佩孚^⑦下至陶希圣^⑧、王礼锡^⑨）——只没有请陈独秀、彭述之^⑩、刘仁静^⑪，这是留着有特别用处的，其余的都聘请去做国难会议的议员。最近（四月七日），在洛阳宣布国难会议开幕，请这些绅商名流共同设法，来加紧压迫革命，进攻红军。

国难会议的议事日程，据说只有三项：（一）御侮，（二）剿匪，（三）救灾，其他不准讨论。其实，救灾是“没有问题”：去年的水灾已经过了一年，饿死的民众已经超过好几十万，幸而没

有饿死的正在地主资本家剥削之下做着最廉价的牛马，而水灾、公债和赈灾的款项，美国帝国主义的麦粮等等，至少已经有四分之三进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荷包。至于御侮，那么，政府现在说：“御侮必先剿匪，剿匪即是御侮。”这样，除出“救灾”是点缀点缀的题目以外，事实上只剩得“剿匪”一项。——就是屠杀工农兵士的进攻红军的问题！本来，对于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信徒和假抵抗的巧妙的卖国贼，早就没有什么所谓“御侮”。问题只在于怎么样帮助英国或者美国来和日本瓜分中国。现在，上海已经退兵停战，正在听着英国帝国主义的调停，而恭请日本军队驻扎闸北、江湾、吴淞、南翔，那还有什么“御侮”的问题！！或者，将来听从美国帝国主义的“劝告”，而邀请一切太平洋上的列强，参加中日圆桌会议，共同来“解决中日的满洲、上海一切争执问题”，那还有什么“御侮不御侮”！！

这样，国民党和现在出席国难会议的绅商名流，——他们都是要想就这样团结起来，借着所谓“御侮”的招牌，实际上完全是商议进攻苏维埃红军，屠杀工农，压迫反帝国主义的民众革命运动。这是一种策略。

但是，地主、官僚、军阀、买办和资产阶级还有另外一种策略。这就是觉得国难会议这样简单的“御侮”招牌欺骗不了民众，认为必须提出所谓“实现宪政”的问题——也就是第三党^⑫、陶希圣派直到托陈取消派^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来欺骗民众，才更加能够和真正民众政权的工农兵会议运动对立起来，一方面诱惑群众，使他们不那样急进的革命化，别方面可以大大的加强进攻苏维埃红军的力量，“要求宪政，

取消党治”的真正意义是在这里。国难会议的一部分议员，就在这种要求宪政的招牌底下，拒绝参加国难会议，而组织了所谓“民宪协进会”。这民宪协进会的宗旨，和国民党国难会议是没有丝毫的不同的，问题只在于他们想用另外一种策略！这个民宪协进会里面，什么人都有：北洋军阀和官僚、买办、地主、资本家，一直到上海的流氓黄金荣^⑭（参看四月七日《申报》广告），他们的政治主张，每一派每一个人的，都早已“领教”过了。我们工农群众，必须明了这些狡猾的凶恶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策略。

中国的无产阶级，要领导一般劳动民众，打倒国民党国难会议以及民宪协进会的一切派别的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走狗的统治！

原载1932年4月25日《红旗周报》第37、38期合刊
署名：范亢

注 释

① 国难会议，见本卷第230页注⑧。

② 罗隆基，见本卷第190页注③。

③ 国家主义派，见本卷第153页注④。

④ 北洋军阀，见本卷第66页注③。

⑤ 研究系，见本卷第383页注②⑤。

⑥ 政学会，即政学系。见本卷第212页注⑧。

⑦ 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直系军阀首领之一。

⑧ 陶希圣，见本卷第419页注⑧。

⑨ 王礼锡，见本卷第 429 页注⑤。

⑩ 彭述之(1896—1983)，湖南宝庆人。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推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后成为托派。

⑪ 刘仁静，见本卷第 169 页注⑤。

⑫ 第三党，见本卷第33—34页注⑳、㉑。

⑬ 托陈取消派，见本卷第30、33页注⑥、㉒。

⑭ 黄金荣(1868—1953)，浙江余姚人。旧上海黄浦滩的大流氓。

日本对于苏联的不断挑衅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八日)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设立所谓满洲“独立国”^①——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进攻苏联。中国的满洲，就要做日本和列强帝国主义攻打苏联的军事根据地；中国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因此不但是甘心出卖中国，并且也是帮助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存心把满洲奉送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促进反苏联战争的进行。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上海吴淞，继续筹备着占领汉口……主要的目的是亲自来进攻中国革命，督促国民党军阀的攻打苏维埃红军；这同时也因为中国工农民众的革命运动，尤其是苏维埃运动，不但是真正抵抗日本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唯一力量，而且是妨碍进攻苏联的巨大的力量。英、美、法、德等列强帝国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和日本一致；他们自己之间无论怎样冲突，而对于苏联是一致的进攻的，对于中国的劳动民众，对于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是一致的进攻的。

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进攻苏联的政策一步步的有系统的进行着。最初，当然表面上有时候要玩耍一些外交手段，企图欺骗世界的劳动民众。只有帝国主义的走狗，才会说“日俄有联合对美的可能”（《国际评论》，梅龚彬^②）——这是

日本帝国主义的义务外交官的言论！同样，一些地主资本家走狗还在说什么日本帝国主义夺取满洲，没有进攻苏联的意思。现在的事实，完全把这些“理论”打得粉碎！

请看日本政府的进攻苏联的军事计划：

“关于对俄宣战问题，我以为有迫切的必要，按日本对俄已决的策略，准备随时可以宣战，而此次战争的真目的，并不仅在于防止日本的共产主义化，这里的真实而主要的意义，还在于统治远东，并吞东部西伯利亚……日俄战争的爆发问题上，要顾到苏俄事前的防御，和其他列强的态度。开战愈早愈好。我们要明了，情势是利于他们的。我们相信：帝国政府已经采定了一种策略：就是要使苏俄于最近的将来迫着我们和他宣战。”“我们将要攻击的是贝加尔湖以东的沿西伯利亚铁路一带的地段，要把苏俄远东的一切领土，完全归划日本，这些地方，必须由日本驻扎军队，以便作为军事中心，换句话说，就是日本军队必须长期驻扎，随时防备着占领以后的反抗运动。再则，因为日本在远东方面攻打苏俄，还是不可能把他置之死地，所以必须利用军事宣传，引起西方临近苏俄的列强也和苏俄宣战。我们再进一步利用白俄军造成苏俄内部的不稳。用这种计划去对付现在情形之下的苏俄，可以说正是时候了。”

当然，日本政府很狡猾的说：这是个人的意见，参谋部里的某某中将的意见，“这并非日本政府的政策”！这种骗人的话，自然也只有一些帝国主义的小走狗会“相信”；他们还要跟着日本帝国主义用这样的话来“安慰”中国的和世界的工农民众。

事实上，这个计划的实现，正在一步步的准备着：

第一步，日本假意声明只占领南满，不向北满“进取”，同

时就派张海鹏^③去打黑龙江,又暗中接济马占山^④的军火,叫他假意抵抗,造成北满的战争状态,以便日本借口北进(这些事情,已经有文件可以证明)。第二步,日本反过来说苏联接济马占山,造出许多稀奇古怪的谣言;接着就进攻齐齐哈尔,包围并且截断中东路。第三步,在进攻上海的同天,日本军队就开进哈尔滨——这是美国领事调停的结果;当然,他们进攻哈尔滨的借口,就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白俄人和中国人的“民族冲突”。第四步,成立满洲“独立国”,撤换中东路的护路司令,撤换中东路的中国董事和理事。第五步,就是在满洲组织“白俄军”——谢米诺夫^⑤等公开的在东京接洽谈判,满洲当地——中东路一带以及苏联边境已经发现了许多白俄的武装匪徒。

最近日本对于苏联的挑衅更加紧进行了!

日本帝国主义的新的步骤是:(一)用飞机侦察苏联边境,同时反而制造许多谣言,说苏联的“无声飞机”飞到了日本的主要军港,在黑夜之中窥探日本的军事秘密。(二)投降日本的马占山将军忽然在这个时候“反正”了,而且日本人又放出马占山到苏联去的谣言,说李杜^⑥、丁超^⑦和马占山联络苏俄,受苏俄的指使。事实上这都是日本自己的阴谋。(三)正在这个期间,中东路上发生许多炸弹案,尤其显著的是所谓松花江桥炸弹案。日本帝国主义指使着白俄匪徒,故意干了这些捣乱的行为,然后,说是苏联的指使,这是赤党的行为。(四)于是乎中东路上许多工人职员被捕,苏联的公民无故被捕了好几十个。(五)日本帝国主义借口这些“案件”,居然公开要求搜查哈尔

滨的苏联领事馆。所有这些手段，都是明白的向苏联挑衅。而且这正在国联调查团将要到满洲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用意，无非是要“表示满洲的不安状态，以造成日本军队继续增加的借口……对国联调查团说：占据满洲的日本军队和当地的白俄队伍是‘文明的守卫’……”（四月十五日苏联政府《新闻报》^⑧社论）。这是进一步促进帝国主义的列强准备开始反苏联斗争的手段！

“日本帝国主义者如果以为苏联的和平政策是一种怯弱表示，是不能够保卫自己边界的表示，那他就大错而特错了……苏联绝对不许任何国家侵略他的领土，也不能够容许任何人在他的领土以内成立什么缓冲国。为着保卫领土的完整，苏联的劳动者曾经战胜过一切武装侵犯的力量。如果有新来的危险，他们也将要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真理报》十六日社论）

苏联的无产阶级有充分的力量打击一切进攻苏联的企图，国际无产阶级也将要有充分的力量，充分的信心，用自己的群众的斗争，打破日本和列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阴谋。尤其是日本和中国的工农群众，要动员自己的力量，为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也就是为着反对进攻苏联的战争而斗争！只有机会主义者，才会把苏联的和平政策，解释成为苏联无产阶级的怯弱，说什么如果发生反苏联的战争，那就“十四年来成立着的世界革命的大本营，便会立时消灭！”（《研究》^⑨第一期之三十九页）中国无产阶级和工农民众，必须打破这种机会主义的胡说八道，必须坚定的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发动伟大的斗争，克服一切帝国主义进攻

苏联的阴谋!

原载1932年4月20日《斗争》(油印)第10期

署名: 狄康

注 释

① 满洲“独立国”，见本卷第414页注⑥。

② 梅龚彬(1900—1975)，湖北黄梅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中共党团书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通缉，1929年在日本东京被捕，1931年回国，1933年参与组织福建人民政府的活动。长期从事统战工作。

③ 张海鹏，见本卷第414页注⑩。

④ 马占山，见本卷第201页注④。

⑤ 谢米诺夫。今译谢苗诺夫(Г.М.Семенов, 1890—1946)。十月革命后远东白卫军头目，盘踞西伯利亚东部进行反革命活动。1945年被苏军俘获，后被处决。

⑥ 李杜(1880—1956)，辽宁义县人。九一八事变后，率部抗日救国。1932年联合丁超成立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被推为总司令。1933年1月率部退入苏联，7月回国，曾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在上海倡议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⑦ 丁超，见本卷第398页注⑤。

⑧ 新闻报，即《消息报》，苏联政府机关报。

⑨ 《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机关刊。柯柏年、沈志远等主编，1932年4月1日创刊，出一期即被查禁。

《申报》的武断宣传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上海的《申报》^①，算是招牌最老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报纸了。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它也“左”起来了。这所谓“左”显然是想替中国地主资产阶级“趁早收买一部分人心”，——换一个花样来欺骗民众。原因是很明显的：国民党的官场机关报和一切言论，已经太不堪了，太露骨了，很难欺骗群众的了。所以，要有《申报》时评之类的“后备军”，假装着不满意国民党的态度，从另一方面来宣传所谓三民主义，所谓民生主义的社会主义。这是复活孙文主义的反动的企图，中国的工农民众一定要揭穿它的假面具。

《申报》时评说些什么？

最早的《申报》上做了批评中国经济学会的论文，这里面就讲起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时期恐慌”（它其实根本不懂什么是“第三时期^②”），还问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是什么”的问题。它的答复呢？它说：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想把中国领导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而同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想把中国领导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而《申报》的主张是：这两方面都是想要绝灭中国的民族精神的，照它的

意思，中国应当走上三民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种论调已经够明显的了，这是极狡猾的反苏联的宣传，这是反社会主义的孙文主义的宣传。

但是，这还不够。最近《申报》上登了几篇讨论“绥靖”的文章，它先说：中国遍地盗匪的现象，是国民党应当负责的，这是国民党制造出来的盗匪。又说共产党红军，和明朝的李自成^③、张献忠^④不同。最后的结论是恭恭敬敬向国民党上条陈：要消灭共匪，单是剿杀是不会成功的，必须实现民治，必须实行民生主义的“社会主义”。这就是《申报》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作用！原来所谓“三民主义的非资本主义”，所谓“民生主义的社会主义”，都只是屠杀工农红军的旗帜！其实，这些“民生主义”等等的口头禅，这些压迫阶级斗争的大理论，早就给孙文、蒋介石、汪精卫^⑤、胡汉民^⑥、戴季陶^⑦……说滥了。《申报》的“左倾”，事实上不过是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别动队。

《申报》的时评，最近还喜欢谈谈苏联，它不能够不承认苏联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国家，它还称赞着苏联的儿童教育，苏联的教育制度等等。它更不能够不承认列强帝国主义一致进攻苏联的事实。但是，它对于这个问题采取什么态度？它表面上暗示着对于苏联的崇拜和同情。这同样是收买人心的手段：现在几万万中国的工农和革命民众对于苏联的同情和拥护一天天增长，《申报》要维持它对于民众的欺骗，就不能够掩饰自己对于苏联的真实态度。而实际上，《申报》关于苏联的消息，和其他的反动报纸一样，差不多不断的登载着各种各式的谣言。

不但如此,《申报》时评对于苏联的态度,无论他自己怎么样掩饰,始终暴露了根本敌视的立场。它认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是苏联指使的,它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的真正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是苏联“赤化中国”的企图。这是它的根本立场,所以它要提出所谓中国的民族精神,提出中国“国货”的“民生主义的发展前途”,来和工农群众的苏维埃革命对抗。

今天,《申报》又登了一篇时评,说列强进攻苏联的问题了。它又承认一次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它说日本对俄宣战的形势日益接近成熟时期了。但是,它的结论是:苏联的和平政策“已经失败”,苏联因此正在准备着战争;它丝毫不表示自己的主张,绝对是旁观的态度,反而暗示着读者:苏联也应当担负战争的责任!假使再深刻些研究它的态度,假使把它关于“绥靖”的文章和关于苏联的文章联系起来,那么,我们更可以看出它的用心的险毒。它曾经说过:要真正“绥靖”,就要实行“民生主义”。它现在又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准备着战争。这两篇意思联系起来的结论应当是什么?显然是:要消除世界的战争,就要请孙文复活,到俄国去推翻苏维埃政府,而进行“民生主义的建设”!!

总之,《申报》时评的“左倾”,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别有作用的宣传,它正在很细腻的很调皮的准备着“舆论”,混淆着革命民众的视线,企图新翻花样的挽救反革命的统治。

原载1932年5月2日《红旗周报》第39期

署名:范亢

注 释

① 《申报》，见本卷第 147 页注⑩。

② 第三时期，见本卷第 31 页注⑬。

③ 李自成(1606—1645)，明末农民起义领袖。陕西米脂人。崇祯二年(1629年)起义，为闯王高迎祥部下，高迎祥牺牲后，他继称闯王。十三年进兵河南，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十七年(1644年)率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明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迎战失利，次年在湖北通山被地主武装杀害。

④ 张献忠(1606—1646)，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延安柳树(在今陕西定边东)人。崇祯三年(1630年)在米脂起义，转战豫、陕、鄂、皖各地。十六年取武昌，称大西王。次年取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年号大顺。大顺三年(1646年)，在西充与清兵作战中牺牲。

⑤ 汪精卫，见本卷第 61 页注⑧。

⑥ 胡汉民，见本卷第 148 页注⑬。

⑦ 戴季陶，见本卷第 147 页注⑧。

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么？

——对于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的批评

(一九三二年五月八日)

一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的历史，不但对于中国的劳动民众有极伟大的意义，而且对于全世界的劳动民众，尤其是殖民地的劳动民众，例如印度、高丽^①、南洋群岛等等的民众，也有极重要的教训。中国革命的历史，不但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是最重要的斗争的经验，而且对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正是布尔塞维克主义克服一切种种“中国式”的及非中国式的机会主义的斗争的纪录。华岗^②的《中国大革命史》^③，正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之后的四中全会的时候写好，并且付印；很自然的，——他应当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来总结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经验，揭露一切种种错误的机会主义的“理论”，严格的审查和分析中国革命的事实，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的过去的错误。首先，这里要有坚决的无产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阶级立场。但是，事实上呢？华岗

同志在这部《革命史》里竟没有这样的立场，竟犯了腐化的自由主义的错误，甚至于偷运机会主义的私货。

华岗同志编辑《革命史》的方法，根本就是不对的。它没有根据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一贯的正确路线，来有系统的整理和分析中国革命的事变，阶级力量的变动，共产党的政策和口号的意义。他却是根据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各种时期的论调，——这些论调之中常常有许多是错误的，有许多是只能够代表当时个别的领导同志的意见的，——他却根据了这些论调，七拼八凑的汇集了许多材料，就算编好了一部《大革命史》。自然，他所根据的材料之中，也有好些共产国际的文件，可是，他并不能够根据这些材料，正确的去分析中国的事实；他只是机械的把这些正确的论断，混合在一些模糊的错误的意见里面。这样，他这部《大革命史》——本身就包含着许多矛盾，没有统一的，一贯的见解。与其说是《大革命史》，还不如说是“中国革命史材料汇录”；假使真是这样编法，那他也应当在每一段每一篇的材料底下，注明白：某人某年某月的论文，或者某一个机关某年某月的决议等等。而他不是这样做的；他把一切错误，都自己担负了起来，同时，他又想把一切正确的意见，也包含进去。结果，就表现了对于一切种种“左”右机会主义的腐化的自由主义。这正足以暴露他的立场根本也是机会主义的，他的不一贯，正是他的一贯的机会主义的表现。

二

首先，他的方法论上，根本就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他在《大革命史》的第二版序言里说：

“老实说，历史的记述，是没有所谓‘纯客观的’。……但是我们始终以工农阶级的解放利益为前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与革命的教训为立场，能够正确的去把握并理解社会发展的本质，也就始终要比国民党、第三党④及取消派更客观些，根本些，彻底些。”〔注〕

这里，他简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和所谓客观事实对立起来，照他的意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并不是唯一正确的，唯一合于客观事实的历史，而只不过是比国民党、第三党、托陈派“更客观些”罢了。这种口气，仿佛是要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并存起来，只要求自己的一些自由，而并不要求完全打倒国民党等等造谣诬骗的历史，并不指出国民党等等的历史根本是违反客观事实的，——反而承认他们也有一些“客观”，只不过比较我们更不客观些罢了。列宁说的：

“真正相信自己是在推动科学前进的人，并不要求新的观点和旧的观点有并存的自由，而要求用新的观点去代替旧的。”⑤（《列宁文集》卷五，一二二页——《怎么干》）

斯达林在反对腐化的自由主义的信里面也说：

〔注〕 这里的旁点是我加上去的。《大革命史》的第二版没有付印，我所引的是华岗同志的原稿。

任务是在于“把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历史问题提到应当有的高度，把我们党史的研究放在科学的布尔塞维克的轨道上，使大家着重的注意去反对托洛斯基主义的，以及其他对于我们党史的造谣的人，有系统的去揭穿他们的假面具。”^⑥

可见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不是什么“比国民党、第三党、托陈派更客观些”的问题，而且要完全打倒他们的造谣历史，而建立唯一正确的历史。所谓布尔塞维克的，也就是科学的。反布尔塞维克的，一定也就是反科学的，违背客观事实的。苏联耶洛斯拉夫斯基^⑦总编辑的四卷头的党史里面，曾经有了偷运托洛斯基主义的错误。直接对于这些错误负责的敏茨等等，企图辩护自己的错误，他们说：这是“因为太客观了，所以忘记了政治上的不适当”。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就特别指出这种辩护的荒谬：“问题正在于敏茨编的‘党史’不是客观的历史……敏茨同志和他的一些好朋友，自己以为做了一本‘客观的’历史，其实是一本非常之主观的历史，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替那些最恶意的对于党史造谣诬蔑的人帮了忙。”（卡岗诺维支^⑧）

华岗同志的《中国大革命史》，事实也犯着同样的错误，他并且在自己的第二版序言里，很直爽的说：他的这一部历史不过比国民党等等“更客观些”！其实，一定要有真正布尔塞维克的、真正阶级的、也就是真正科学的、真正客观的立场，方才能够正确的分析革命的历史；这种布尔塞维克的历史的目的，应当是完全打倒国民党、第三党、托陈派的造谣、诳骗、伪造的历史，而用自己去代替地主资产阶级的一切种种主观的历史。

三

华岗同志对于中国大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是模糊的杂乱的，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多元论的观点。他把发动中国革命危机的经济基础，机械的分割成为三大矛盾，几乎是互相没有联系的并列起来。这所谓三大矛盾是什么呢？一、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脱离帝国主义的钳制和束缚，要求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争取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中国大革命的第一个经济基础”。二、是“封建势力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冲突，这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生活之中的第二个大矛盾，也就是中国大革命的第二个经济基础”。三、是土地革命的斗争，“客观上是在力争农村经济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条件，这种斗争是反映农民经济与封建势力的冲突，这是中国大革命第三个经济基础”。而无产阶级呢？工人和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呢？工人和本国的外国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呢？华岗并没有把这个重要的矛盾放在中国大革命的“经济基础”里面。固然，他描写了许多中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但是，他的结论只是“中国无产阶级也很有利于推翻帝国主义、地主、买办、军阀、豪绅的反动统治，以保障发展工人运动的德谟克拉西①的条件”。

这样，如果微细的研究华岗同志的意见，那就不能够不说：华岗同志偷运了陈独秀主义的私货。照他的意思：中国大革命的经济基础，差不多完全是在“民族资本主义”，——反对

帝国主义的是民族资本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是民族资本主义，甚至于要求土地革命的也只是民族资本主义。他特别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加上了一个注解，说是：“读者要注意：不可以把这里所说的民族资本主义，完全看成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意思自然是说，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也是为着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也是为着民族资本主义。而无产阶级在这个“民族资本主义的革命”之中，只不过要求一些“德谟克拉西的条件”。（华岗同志，忘记了加上一个形容词：应当是“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的条件。）结论是什么？自然应当和当初陈独秀的结论一样：推动资产阶级去领导革命和取得政权，而工人自己只要得到一些自由和德谟克拉西的条件好了！固然，中国大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是广大的劳动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的统治，固然，这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革命，这还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的范围；——但是，第一，最主要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是工人和广大的劳动民众，而不是什么民族资本主义；第二，最主要的真正彻底反对封建势力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群众——小资产阶级的基本群众，而不是什么民族资本主义；第三，这种反帝国主义的反封建的革命之中，开展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用自己的阶级斗争争取着革命之中的领导权，——争取着工农民权独裁的实现，——这个革命的开展将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促进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中国革命史的叙述和分析，必须着重在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争取，着重在工人的阶级斗争对于反帝国主义革命和

农民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的领导，着重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的必然性和经济上的根源。而华岗同志的写法，却是相反的，他十二分的着重在“民族资本主义”的作用，几十次的证明中国革命不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的范围，他事实上忽视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忽视了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中的劳资矛盾的发展和作用。他也许自以为这是反对托洛斯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方法，殊不知：他自己陷落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同时，也就帮助了托洛斯基主义，他曲解了列宁的“争取工人运动充分发展阶级斗争的自由条件”的方针，而替托陈派想出了一种“理论上的基础”，可以去辩护所谓国民会议的民权要求，——就是不要参加当时的革命政权，而只要一些“德谟克拉西的条件”，并且他根本没有分析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封建地主以及帝国主义的联系。华岗同志的这种错误和瞿秋白同志以前的错误是很相像的，他的全部《大革命史》之中有许多地方简直是直抄秋白同志以前的文章，完全没有经过坚决的清楚的批判。

四

关于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经济基础和革命任务、革命的前途，共产国际有明显的唯一的正确的分析和政治上的路线：

“共产国际的路线 封建残余，以及依据在封建残余之上的官僚军阀的上层建筑，被各国帝国主义所竭力维持的，——这是中国

现在实际状况之中的主要事实。中国现在发展着的土地革命，反对着封建残余，同样也反对着帝国主义。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武汉的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运动的中心。南京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是反革命的中心。“赞助武汉”的政策，同时就是开展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政策，因此，就有其他许多必要的办法。因此，共产党参加武汉的国民党和武汉政府；这种参加不但不使共产党员要停止对于国民党的批评，而且要共产党员对于国民党里的同盟者的不彻底和动摇，加以努力的批评。共产党员的参加国民党和政府，是要赞助无产阶级在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中的领导作用的，是要促进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的。等到那个时候，——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将要接近完全胜利的时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之中将要发现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的时候，——到那种时候，就要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作为两重政权的动力，作为争取新政权的斗争机关，作为新政权——苏埃维政权的机关。”⑩（斯达林：《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演说。）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共产国际的分析，是清清楚楚的认定中国革命之中的主要事实是：国际帝国主义所竭力维持的封建残余的官僚军阀的统治，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基础和内容，这是反对封建残余的，同时也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可是，这个革命之中最主要的力量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无产阶级要争取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争取自己在革命政权之中的参加，——决不仅是什么“德谟克拉西的条件”；——而且这种参加，是为着要促进革命的转变的，为着要开辟民权革命——资

产阶级革命过程之中的革命转变的道路的。而华岗的分析，虽然也提起“领导权”，也提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前途”，可是，他主要的结论只是：这个革命正在“争取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条件”！

五

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中国，封建残余的经济固然是在崩溃，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固然是在它的内心发展出来；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却是地主资产阶级和工农群众之间的斗争的中心问题。中国的地主阶级企图“逐渐的适应资本主义的条件”，而同时保存着地主阶级独占土地的地位，保存着地主阶级的政权。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一个短时间内，曾经赞助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是它和地主阶级的联系特别密切，它在土地革命的问题上是绝对站在地主阶级方面的，这也是它背叛民族解放革命的一个原因。这样，起先是地主阶级，随后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竭力的企图适应着帝国主义的统治，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保存着封建残余的优势，而向着殖民地化的道路前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争取对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尤其是农民基本群众的领导权，要用革命的手段，肃清封建残余，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解放几万万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群众，而开辟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中国革命史，——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政变、辛亥

革命、五四运动、直到五卅的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以至于广州公社^①所开辟的现时的苏维埃阶段，——就应当在分析上面所说的中心问题的过程里，来加以详细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正确的发见每一时期的阶级力量的对比，阶级力量的转变，真正坚定的站在阶级立场上面去分析群众和剥削阶级的斗争，真正明显的着重的指出历史发展之中的群众的作用。而华岗同志却没有抓住这个中心问题。

因此，他对于戊戌政变和义和团暴动的论断，完全没有阶级的立场，除出一般新闻记者式的描写一些帝国主义军队的残暴，描写一些康梁派^②和李鸿章^③、张之洞^④等等的所谓“文人派”、“实力派”的互相勾结，互相斗争之外，简直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分析，更没有去发露阶级斗争的背景。列宁对于俄国“农奴解放”之后直到二月革命^⑤的历史的分析，可以做我们分析中国历史的最好的模范，他说：

“农奴主和自由派之间的著名的斗争，——我们的自由派历史家和自由主义的民粹派^⑥历史家所铺张修饰得这样有劲的斗争，——其实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大半还只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完完全全只是为着让步的方法和形式的斗争。自由派和农奴主是一样的，也是站在承认地主的政权和财产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很气忿的批驳一切要想消灭这个财产，要想完全推翻这个政权的革命思想”。这是一派。这些“自由派要想‘从上面’来‘解放’俄国，既然不毁坏俄皇的帝制制度，也不毁坏地主独占土地的制度和地主的政权，而不过警告他们要对于‘时代精神’让些步”。……“地主的实行一八六一年的所谓‘解放农奴的大改良’，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力量，把俄国拉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别

方面是恐惧农民的革命。那次农民改良，是农奴主所实行的资产阶级式的改良。这是把俄国变成资产阶级的帝制制度的一步。”但是，当时就另外有一派。这就是“赤尔纳塞夫斯基^⑮，他是革命的民权主义者，他曾对于当时的一切政治事变，表现革命精神的影响。表现群众要求推翻一切旧政权的斗争的思想”。

“这两个历史上的倾向，从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之后^⑯，一直发展了半世纪，一天天的清楚的分开来，一天天的确定下来，一天天的坚决起来。自由派帝制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是在生长，他们宣传只要有“文化”工作就可以满意的了，他们反对秘密的革命运动。而民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也在生长，起先是混合在一个乌托邦思想里的，混合在智识分子的民意党^⑰和革命的民粹派的斗争里的，而从前一世纪的九十年代起，就跟着革命斗争从恐怖主义和个人宣传进到几个革命阶级自己的斗争的过程，而分化起来。”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里，这两个一八六一年还只不过刚刚发现的倾向，刚刚表现在文学里的倾向，——就发展了出来，生长了出来，表现在群众的运动里面，表现在许多政党的斗争里面，表现在一切种种的方面：机关报上，群众大会上，群众团体里，罢工，暴动以及国会里面。”

“一八六一年产生了一九〇五年。那第一次的‘伟大的’资产阶级式改良的农奴主的性质，使发展受着困难，使农民受着几千几万种的磨难，可是，并没有改变发展的方向，并没有能够预防一九〇五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八六一年的改良使爆发的日期延迟了一些，放开了一个相当的出气洞给了资本主义相当的生长；然而它并没有取消不可避免的爆发，这个爆发到了一九〇五年就出现了，这是非常之广大的战场，这是群众的袭击，这是对于俄皇的专制和农

奴主地主的袭击。……”^②（以上见《列宁文集》第二版，第十五卷一四二——一四六页。）

“第三届国会，从新的方面，在新的环境里，更加证实了俄国政治力量和俄国政党的主要的分化状态，这样分化，从十九世纪中叶就完全确定的发现了的，而从一八六一年到一九〇五年，一天天的更加形成起来；一九〇五——〇七年，这种分化爆发了出来，在群众的公开战斗的舞台上固定了下来，一九〇八——一二年仍旧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种分化到现在仍旧是这样呢？因为俄国历史发展的客观任务没有解决，——这些客观的任务是民权主义的改革和民权主义的革命的内容，到处都是一样的，从一七八九年的法国直到一九一一年的中国。”^②（《列宁文集》，同上，第四〇七页。）

我在这里引了这样长的列宁的话，目的是在指出整个中国历史的方法——列宁主义的方法。华岗同志，根本就没有了解这种抓住历史的中心问题的方法。他在戊戌政变之中，没有发见“社会群众的基础”，他反而说这是“因为当时所谓士大夫（官僚与智识阶级！）受战败的刺激”。这当然是唯心论的观点。因此，他也没有暴露康梁党的根本目的是在预防革命。

同样，他也没有发见满清贵族和地主阶级的利用义和团运动，目的是在把农民群众反对剥削制度的刀锋移到所谓“洋鬼子”身上去，而自己避开革命的袭击。他只说：这是当时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而“打着扶清灭洋的尊皇旗号，不免有保护旧制度的反动意味”。他不知道戊戌政变和慈禧太后的利用义和团，原本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康梁的维新主义和慈禧的利用义和团；手段虽然不同，而主要的目的却都在于“保

存地主制度和地主的政权”，他们内部的争论只在于怎样去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方法。

辛亥革命之中，从袁世凯^②等等直到各省的督军和绅士，一方面闹着所谓“铁路民有”^③和“收回权利”的运动，别方面，“非常之迅速的”从君主立宪以及绝对专制的立场转变到“光复共和”的政纲。这些真的同假的自由派的转变——怎样去说明呢？也是当时的地主贵族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预防”农民革命，“预防”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手段。华岗同志对辛亥革命的论断，却完全着重在所谓“资产阶级力争铁路商办”，说这“实在是一种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他虽然提起了几句关于“各处乡民反抗官吏苛敛运动”的话，但是，他并没有把这种群众运动看做农民的革命运动的浪潮，看做客观上反对绅土地主的一种运动，看做和绅商阶级的倾向绝对相反的，互相斗争着的一种运动。这和以前彭述之^④的议论有相同的错误。

六

因此，华岗同志对于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中心问题，也就不能够抓住它的枢纽。一切革命的中心问题，是阶级的政权问题。中国辛亥革命的失败，在于政权仍旧保持在封建残余的地主官僚手里。所谓军阀制度就是这种封建残余的统治和商人资本结合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斯达林说：

“这种最初积累式的商业资本，很特别的在中国乡村之中和封建主的统治结合着，而且商业资本继承着封建主对于农民的中世

纪式的剥削和压迫方法。同志们，问题是在这里。拉狄克^{②⑤}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了解这个特点，没有了解这种结合——封建残余的统治和中国乡村之中商人资本的存在结合着，而且保存着对于农民的封建中世纪式的剥削和压迫方法。军阀制度、督军省长，一切种种现在的强盗式的，魔王似的军事官僚和非军事官僚，正就是中国这种特点之上的上层建筑。而帝国主义，是在维持并且巩固这整个的封建官僚的机器。至于说军阀占着土地，同时又是工业企业的主人——这种情形并没有根本改变军阀的实质。许多俄国的地主当时也管过工厂，以及其他的工业企业，可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仍旧做封建残余的代表。如果在许多区域里面，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要归绅士和地主；如果地主在经济上、行政上、司法上都有实际的政权；如果直到现在，在许多省份里面，还有贩卖妇女和儿童的事实，——那么，就要承认这种中世纪的环境里面：统治的力量是封建残余的力量，是地主的力量，是地主性的官僚的力量，是军事官僚和非军事官僚的力量，他们很特别的商业资本的力量结合着。”^{②⑥}（斯大林：《和孙中山大学的学生的谈话》——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但是，华岗同志怎么说呢？他说：因为辛亥革命的领袖“尊重外人在华的条约权利；因此（！），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清帝退位，而政权依旧移入另一个反革命势力——封建军阀袁世凯手里。”固然，放弃反帝国主义的任务，是辛亥革命的领袖的最严重的罪恶，但是，问题还在于为什么这些“革命领袖”这样妥协和不彻底！这就因为大多数的辛亥革命“元勋”，本来就不要革命，他们的出现，根本是为着要挽救地主阶级的政权的，根本的为着挽救帝国主义的统治的。辛亥革命时候的

平均地权的口号和农民群众的暴动，却表现着另外一种力量，另外一种社会阶级。这种力量在当时是被反动势力镇压着，出卖着，蒙蔽着。这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的分析，应当是辛亥革命历史的中心。

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政权仍旧保持在地主阶级手里，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些稍稍改头换面的地主性的官僚军阀，必然的尊重“外人在华的条约权利”。而当时的资产阶级，主要的土著的商人资本，完全不要反对地主的封建势力，却正在这个时候，进一步的和封建残余结合，形成割据的军阀制度的经济基础。

五四运动和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上发展出来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新的浪潮。这时候，工业无产阶级逐渐的表现自己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一直到争取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无产阶级要联合农民群众去推翻帝国主义所维持的一切南北军阀的政权，而建立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权。工业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最初一期是赞助这个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的，是想利用群众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但是，许多小军阀，尤其是南方的军阀，跟着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发展，也在混进革命的营垒。从杨希闵^{②⑦}直到冯玉祥^{②⑧}、唐生智^{②⑨}，都又成了“革命军人”了！这是辛亥革命时候的老调，这又是企图用欺骗的手段，来预防农民的土地革命，想改换一些形式而实际上保存买办地主的政权。华岗同志对于这种现象怎么解释呢？他说：“固然这种军阀地主为吃醋争风而‘参加’革命……但在客观上，这种资产阶级南方军阀地主

对北洋军阀反抗之中，必定要叫出些革命口号，客观上在一个相当情形之下，是有利于革命之发展的。”这和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同志主张“西南团结，暂时不必北伐，而要在南方做出革命政府的模范”的理由，是非常之相像的。这明明白白是机会主义的观点。这些南方军阀为着反革命的目的而混进革命的营垒，他们被群众斗争威迫着逐渐混进来，以便从容布置抵制和压迫土地革命的步骤；而华岗同志不暴露他们的阶级的实质，不指出对于这些军阀的容忍妥协和不敢批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过去机会主义的根源之一；他反而跟着过去的错误，再来说明一次这些军阀怎样“有利于革命之发展”！

七

华岗同志对于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本身的叙述，因为上面所说的阶级观点的模糊，也就重复着过去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各种错误。关于五四运动，关于海员罢工和二七屠杀，关于国民党改组，关于商团事变^②，关于国民会议运动^③，他都只收集了每一个时期的当时流行的意见，用一种庸俗的新闻记者的笔调，随随便便的描写过去。这里，我们看不见阶级的立场，看不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对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的变动和革命口号的转变，都没有抓住中心问题做分析的枢纽。

至于五卅前夜的罢工浪潮，一直到广州暴动的革命事变的经过，在华岗同志的叙述里面，也同样没有清楚明了的阶

段。而最主要的，是他的叙述没有把中国革命里阶级关系的变动来做中心。我们简直没有可能每一段的详细的来批评。举例来说，他简直完全忘记了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南京屠杀^②——而那次英、日、美帝国主义在上海暴动^③之后，联合进攻中国革命而炮轰南京的事实，是中国大革命之中的一个主要关键。同样，像廖仲恺被刺的事变^④——关系到整个所谓“广州时期”的事变，他也会完全忘记的。他的叙述，有些只是抄袭当时新闻记者的“生动的文章”——例如说到国民党第一次东江之战的时候，他随随便便的写了几句：“香港政府至此态度为之一变，报纸都骂陈军^⑤‘抢了就跑’，并盛称‘国民政府’是受过教育的人。”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而“广州时期”的南方“革命军阀”怎样一批一批的反叛，农民群众怎样一天天的起来斗争，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怎样影响到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国革命怎样从这个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他都没有分析的。同样，他对于“武汉时期”和苏维埃时期的转变过程，也是没有辩证法的论断和叙述的。

关于中国大革命的阶段，必须要根据中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过程，来做整个许多丰富的事实材料的方针，这样，才能够写出真正布尔塞维克的中国大革命史。斯达林说：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时期，当时的革命是全民的联合战线的革命（广州时期），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中的一个，正是这些阶级的代表和共产党员共同工作，都包含在一个资产阶级

革命的组织里面，这个组织就叫做国民党。这些同盟者不是同样靠得住的，也不会是同样靠得住的。他们之中，有些是多少总是靠得住的（农民、城市贫民），有些是不大靠得住的，而且是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第三种是简直靠不住的（民族资产阶级）。当时的国民党，多少总是一个群众的组织，这是没有什么争论的事实。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是：使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右派）孤立，为着革命的利益而利用他们，推动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左派），使他们左倾，而使农民和城市贫民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当时的广州是不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呢？无条件是的。……

革命第二阶段的时期，当时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转变到了反革命营垒里去了，而革命运动的中心从广州移到了武汉，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民族资产阶级走到反革命营垒里去呢？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害怕工人革命运动的规模——这是第一，上海方面帝国主义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压迫——这是第二（斯达林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国革命的问题》里说：“南京的炮火，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中国互相斗争的力量的新的转变的信号。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并且提出哀的美敦书，他们是要说明：他们正在找寻民族资产阶级的赞助，为的要共同来反对革命。蒋介石屠杀工人而实行政变，这就是答复帝国主义说——他愿意民族资产阶级也勾结着帝国主义去反对工人和农民”。^②）这样，革命失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是革命的部分的损伤。然而正因为这个缘故，革命进到了更高的阶段，进到了土地革命的阶段，更加接近的吸收了广大的农民群众。这是对于革命的优点。当时，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国民党是不是群众的组织呢？无条件是的。它比广州时期的国民党更加是群众的组织了，这是没有什么争论的。当时，武汉是不是革命的中心呢？无条件是的。

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如果不是，那么，在武汉的区域里（湖北、湖南），就不会是共产党所领导的最大限度发展的土地革命的根据地。共产党员对于国民党的政策是：推动它使它左倾，使它变成工农革命民权独裁的干部。当时有没有这种转变的可能呢？有的。至少，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可能是不存在的。我们当时简直就说得明明白白的——为着要使武汉国民党变成工农革命民权独裁的干部，至少必须有两个条件：国民党的极端民主化和国民党的直接赞助土地革命。假使共产党员放弃这种转变的企图，那才是蠢呢。

现在的时期的特点，是武汉国民党的领导机关走到了反革命营垒里去，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离开了革命。这种分离的原因，第一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害怕正在生长的土地革命，以及封建势力对于武汉领袖的威迫，第二是帝国主义在天津方面的压迫，帝国主义要求国民党和共产党员分裂，作为放任国民党往北发展的代价。反对派（托洛斯基——齐诺维耶夫派^⑤）怀疑中国有封建残余。但是，现在人人都明白了：封建残余不但在中国存在着，而且在现在时候还比革命袭击的力量强些呢。革命在这一次暂时失败了。革命失掉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正是革命暂时失败的征象。然而正因为这个缘故，革命更加密切的把农民和城市贫民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因此而造成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这是对于革命的优点。^⑥”（斯达林：《对于时局问题的杂记》——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真理报》。）

大家读过了斯达林的这一段话，一定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中国大革命的过程，看出中国革命之中各种阶级力量转变的关键，帝国主义压迫革命的力量，封建残余维持自己的统治的企图，以及无产阶级团结自己的同盟者，进攻反革命，进攻背

叛革命的靠不住的革命同盟者……等等的路线。而华岗同志的《大革命史》，写了二百五十页的“中国大革命的经过”，还是不能够给读者一个清楚明了的印象。

八

最后，要说到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之中的作用的估量。固然，他说了一句：“中国共产党显然都演着极重要的作用”。固然，他时时提到共产国际路线的正确，提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但是，照他的全部叙述来看，中国共产党只有消极的作用，没有积极的作用，或者，共产国际的路线虽然正确，可是完全因为共产党对于共产国际路线的怠工，所以并没有实现。对于整个共产党的作用，没有正确的估量。这种叙述是不正确的——他的题目是《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而他的文章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错误路线。

中国共产党的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就在国际执委的领导之下，指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独秀、述之、秋白、国涛、和森等等）的极严重的机会主义路线，但是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整个共产党是革命的战士，是为着无产阶级的利益，为着革命的前途而斗争的。共产国际的路线，在一九二三——二七年之间，是经过中国共产党，而领导着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的。斯达林说：

“共产党在这第一时期的成绩是什么？革命地域的推广，广州

军队达到了长江；无产阶级公开组织（工会、罢工委员会）的可能，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形成了党；开始建立农民组织的支部（农民协会）；共产党员参加军队。”

“可见，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

“共产党在这第二时期的成绩是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这时期从五六千党员发展到五六万党员。工人的工会组织了全国的总会，总共将近有三百万的会员。最初的农民组织也发展成了极大的团体，包含到几千万的农民。农民的土地革命运动发展到了极伟大的规模，在中国的革命运动里占了中心地位。中国共产党争取了公开组织革命的可能。共产党成为土地革命的指导者。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已经从一种愿望开始变成事实。固然，中国共产党没有会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固然，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一时期做了极大的错误。然而想要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就一下子成为真正布尔塞维克的党，那可笑呢……真正布尔塞维克的党不是一下子就生出来的。”

“这样，可见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领导完全是正确的。……”

“无产阶级在这期间能够把广大的农民群众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里夺过来，使他们围绕着自己的旗帜。共产党，经过广州的第一阶段的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扩大了革命的地域，变成了群众的党，创造了公开组织无产阶级的可能，开辟了接近农民的道路。共产党，经过联合武汉国民党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增加了自己的力量，扩大了无产阶级的组织，从国民党领导方面夺取了广大的农民群众，而创造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条件。民族资产阶级，丧失了和广大民众的联系，而走到了反革命营垒里去了。武汉国民党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土地革命吓坏了，在成千万农民群众的眼光里完全丧

失了自己的信用，而跟着民族资产阶级去了。然而正因为如此，几千万农民群众看见了无产阶级是他们的唯一的靠得住的领袖和领导者，所以更密切的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⑳”（见同上）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方面共产党领导机关过去错误的严重，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之中的真正的作用，它在斗争的过程之中，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改造着自己，锻炼着自己，肃清一切机会主义的分子，提高自己的斗争的力量。可是在华岗的《大革命史》里，我们只看见零零碎碎的没有系统的关于共产党领导机关的错误。而且华岗同志对于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不充分的。因此，他在许多地方偷运了机会主义的私货：

第一，他说：“当时广东的党一方面反映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别方面在广东的国际代表鲍罗廷㉑在那时还能相当执行国际的指示。”这是机会主义者企图把所谓广东路线和上海路线对立起来，说当时上海的中央虽然是一贯的孟塞维克的路线，而广东的党部却有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其实，广东党部虽然在当时（一九二五——二六年）做了很多的群众工作，而政治路线上却也是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斗争，想要请左派国民党去做“唯一的领导”的。

第二，他说：“上海三次暴动是中国革命史上伟大的一页，是暴动的艺术上伟大的成功，可以垂为历史的教训。”这也是错误的估量。固然，上海暴动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的一页”，然而上海暴动之中错误很多，决不能够说是“艺术上的成功”。这是机会主义者彼彼尔（现在已经被共产国际开除了

的，以前是美国共产党右派洛夫斯敦^④一派的一个领袖。），他企图说广州暴动是盲动，所以故意把上海暴动的“艺术上的成功”描写出来，去和广州暴动对立起来。

第三，他说到瞿秋白的《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的错误，但是，他所指出的错误仅仅是秋白同志自己在六次大会之前承认的错误，还没有根本发露秋白的盲动机会主义的根源。因此，他不但没有指出六次大会上秋白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之中的错误，并且差不多完全继承秋白当时的错误：对于中国经济的分析，完全只着重在民族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之间的种种矛盾，而不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做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固然，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当前的阶级对抗——主要的还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矛盾——列宁所谓封建社会里阶级对抗，——然而如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还没有了相当的发展，那末，这个革命的动力之中怎么会有无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还会是革命的领袖阶级呢！？那末，这个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怎么会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呢？！华岗同志继承着这种错误的分析，这就难怪他一方面引着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的议决案说：“中国革命如果不超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范围，决不能够推翻帝国主义的”，而同时，他在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经济和阶级的全部分析里，却几十次的说明：中国革命“所要直接与可能完成的任务并没有超过资本主义存在的范围，反之，在客观上他正是争取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样，华岗同志事实上偷运了“广东路线”、“彼彼尔理

论”、“秋白主义”……的机会主义的私货。

总之，华岗这部《革命史》，因为上面所说的许多原因，所以包含着无数的大大小的错误，——简直没有办法详细的批驳，因为这样一来，可以写出一部比他的原书还要大的“大作”。我们这里所指出来的，只是一些例子罢了。而综合起来，应当肯定说：这是非布尔塞维克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史》。

原载1932年7月《布尔什维克》第5卷第1期

署名：范元

注 释

① 高丽，今朝鲜。

② 华岗(1903—1972)，又名华少峰，浙江衢县人。大革命时期先后担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等职。大革命失败后，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长。1928年出席中共“六大”，以后长期从事党的文教工作。

③ 《中国大革命史》，华岗于1930年末写成。在1931年《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3期上发表了该书的第六章。

④ 第三党，见本卷第33—34页注⑳、㉑。

⑤ 今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321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⑥ 今译文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⑦ 耶洛斯拉夫斯基，今译雅罗斯拉夫斯基(Емелья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Ярославский, 1878—1943)，苏联共产党著名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

政论家。写有俄国共产党党史和俄国革命运动史方面的著作。

⑧ 卡岗诺维支，今译卡冈诺维奇（Лазарь Моисеевич Каганович，1893年生），苏联国务活动家。历任苏共中央书记、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等职。

⑨ 德谟克拉西，英文 Democracy 的译音，意为民主。

⑩ 今译文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⑪ 广州公社，指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武装起义后建立起来的广州苏维埃政府。

⑫ 康梁派，指康有为、梁启超所领导的以拥护光绪皇帝载湉进行维新变法为宗旨的政治派别。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始，广东南海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领袖。1888年第一次上书清帝，建议变法。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余名上书要求拒绝签约，主张变法图强，即所谓“公车上书”。1898年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受到光绪帝召见，促成戊戌变法。变法失败，逃往日本。后同梁启超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

梁启超，参见本卷第192页注⑫。

⑬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先后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两广总督，长期掌握清政府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大权，曾代表清政府多次签订卖国条约。他从19世纪60年代起开办军事工业，70年代开始编练北洋海军，逐渐扩大其所谓“求富自强”的洋务活动，是洋务派的首领。

⑭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今河北）南皮人。1889年署湖广总督，创办汉阳铁工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厂等，为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1898年发表《劝学篇》，反对维新变法。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搞“东南互保”，镇压两湖地区的反洋教斗争和拥护光绪帝当政的自立军起事。

⑮ 二月革命，见本卷第192页注⑮。

⑯ 民粹派，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产生于19世纪60—70年代。他们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主张发动农民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主张采取暗杀恐怖手段加快社会改革。

⑰ 赤尔纳塞夫斯基，今译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作家，著有《资本与劳动》、《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则》及长篇小说《怎么办？》等。

⑱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迫实行改革，于1861年2月19日颁布了废除农奴制度的特别文告和安置农奴的《法令》。

⑲ 民意党，俄国19世纪末的革命组织，主张对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和以恐怖手段进行颠覆活动。

⑳ 今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4—10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㉑ 今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473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㉒ 袁世凯，见本卷第66页注①。

㉓ 铁路民有指民间自筹资金修筑铁路。1903年开始，一批爱国绅商为抵制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在十几个省发起准备自办铁路。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将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旋将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激起“保路风潮”。

㉔ 彭述之，见本卷第434页注⑩。

㉕ 拉狄克，见本卷第306页注⑦。

㉖ 今译文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8—219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㉗ 杨希闵（1886—1967），云南宾川人。滇军将领。1922年末经孙中山联络，曾率滇军会同桂军、粤军将陈炯明赶出广州。1925年在广州发动军事叛乱，被国民革命军平定。

㉘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原直系将领。

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贿选政府。1926年9月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1927年“四一二”后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反对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赞成抗日。1933年5月同共产党合作，在察哈尔省（现在分属山西、河北和内蒙）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后继续采取和共产党合作的立场。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解除军职，以水利考察专使的名义出访美国。1948年初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选为常务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1948年7月由美乘轮回国，9月1日于途中遇难。

⑳ 唐生智（1889—1970），字孟潇，湖南东安人。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等职。大革命失败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第五路军总指挥等职。曾一度参与反蒋活动。

㉑ 商团事变，指1924年10月由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广州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

㉒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与段祺瑞政府共商国是。为支持孙中山，抵制段祺瑞御用的“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其他进步力量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在上海、南京、广州、北京、天津等全国各地成立了国民会议促进会，并于1925年3月1日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在全国掀起了国民会议运动。

㉓ 南京屠杀，见本卷第398页注④。

㉔ 上海暴动，见本卷第206页注⑨。

㉕ 廖仲恺（1877—1925），名夷白，广东惠阳人。国民党左派领袖。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先后兼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财政部长、广东省长和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1925年8月20日，遭国民党右派指使暴徒暗杀。

㉖ 陈军，指陈炯明的军队。

㉗ 今译文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2—20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⑳ 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见本卷第358页注①。

㉑ 今译文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05—306、306—307、308—30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㉒ 今译文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06、307—308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㉓ 鲍罗廷，见本卷第147页注③。

㉔ 洛夫斯敦，今译罗夫斯通。见本卷第32页注⑰。

中国的经济和阶级关系*

——对于方亦如的批评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中国经济性质的问题，已经是四五年来的辩论的对象。国际革命家的领导机关以及中国最革命的先进阶级的政党，对于这个问题早就有了原则上的明显而清楚的答案。这个理论上的斗争，现在已经是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延长和开展。革命阶级的政治代表之中，谁也没有这样的闲情别致再去和阶级敌人讨论的了，现在已经不是讨论什么没有解释清楚的问题，而是理论上的阶级战争。

自然，这并不是说中国革命的一切问题，经济问题也在其内，都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根本用不着研究，也不是说实行着理论上的斗争，反对着社会民主主义，——而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形式在现在正是托洛茨基主义，——就不需要对于这个问题及时加以深刻的研究。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能够有革命的行动。”^① 列宁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

* 本篇收入作者编的《战鼓集》(一)，曾在1932年7月《布尔什维克》5卷1期上发表，署名何史文。这里根据中央档案手稿刊印。

义者的区别，正在于列宁特别着重理论的作用，反对一切轻视理论的机会主义倾向。然而理论的重要正在于它是行动的方针，脱离行动的理论只是学究主义——也是机会主义的表现，这是和列宁主义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的。

中国经济性质的辩论之中，最近又发现了方亦如的一篇文章《中国经济问题》（《研究》^②杂志第一期）。方亦如，据我们所知道的，并不属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他并且在自己的文章里面表示愿意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但是，他的文章暴露了他是个学究主义的“英雄”。他似乎埋怨反托洛茨基者的“忽视”理论，这当然是他这个学究主义者的成见，是完全不合于事实的。而且正因为这个缘故，他自己走到了投降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

“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思想上的代表，在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斗争之中去反对那些阻碍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道路的真正的现实的敌人。在这个条件之下，理论和实际的工作合并起来成为一个工作，这种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领袖李白克纳希德〔注〕^③说得清楚：Studieren Propagandieren, Organisieren（研究，宣传；组织）。”^④（《列宁文集》第一卷，二三六页）

可见理论和实际的联系应当怎样的密切！而且最主要的条件，正是反对阻碍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道路的真正现实的敌人。而方亦如呢？他的着重理论，恰好是放过敌人而去干那学究主义式的“研究”。他的注意只在于找着一个公

〔注〕 这里说的社会民主党还是欧战以前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这个李白克纳希德是加尔·李白克纳希德^⑤的父亲。

律，去适用于一切社会：要适用于有阶级的社会，也要适用于无阶级的社会。他甚至于认为用阶级关系去考察社会的经济性质是庸俗的办法！照他的意思，这仿佛是太不科学了！

* * *

方亦如说：

“用商品的存在及普及来决定经济制度，等于拿有机细胞的存在来决定动物的种类一样滑稽。

反对他们这种意见的人，也曾发表过另一种主张，……他们认为剥削关系是决定经济形式的。……最近还有人主张直截了当用阶级关系来决定经济制度的，这自然是登峰造极了。用剥削关系来决定经济制度，第一不妥当的地方，就是它不能适用于无产阶级社会。而最重要的，还是剥削关系是一种分配关系，生产品中剩余劳动生产品的分配形式。……生产关系之中的一种——剥削关系，绝不能够作为决定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素。决定社会经济形式的，不是分配关系，也不是生产什么，而是怎样生产！生产方法是决定经济制度的东西。……人与生产工具结合的形式，就是生产方法。”（《研究》杂志第一期一五、一六页）

这里，我们可以发见方亦如的许多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糊涂“学说”。第一，他把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隔离起来。固然，他也知道：“人们根据一定的生产方法，就互相结成具体的生产关系”；然而，他根本忘记了生产方法的决定社会的经济制度，是要经过生产关系的。请看马克思说的话：

“生产的社会关系是同着生产的物质资料的发展，同着生产力的变更而变更的。生产的许多关系的总和形成所谓社会关系，形成所谓社会，而且这是形成一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之上的社会，带

着一定的只有这一种社会所特有的性质。”（马克思：《雇佣劳动和资本》）⑥

而方亦如却只说：“经济性质的判定，就以生产方法为指针。”仿佛问题只在于追究到最后的决定社会基础的是什么，而完全不管这里的所谓“决定”是要表现在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科学不同的地方。方亦如的学究主义，使他只看见所谓“科学的定义”的词句上的重要，而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的生产关系的作用是不关重要的。这是根本不了解唯物辩证法。因此——

第二，他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割开来，切断了这两种关系之间的辩证法的联系。他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的许多关系”，正是指着这些关系说的。他说人与生产工具结合的形式，这是人经过技术而和自然界发生一定的关系，这就是生产方法；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以及其中的一种剥削关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照他这种说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和生产方法没有联系似的，至多也不过是被生产方法所规定的一种社会关系，是消极的原素，而决不是“决定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素”。而马克思说：

“纺织机器不过是织布用的一种机器罢了，只有在某些条件之下它才成为资本。没有这些条件，它就并不是资本，这仿佛单有黄金还并不就是钱，单有糖还并不就是糖的价钱。

人在生产的时候不但对于自然界发生一定的关系，而且互相之间发生一定的关系，他们只有在这些社会关系的范围之内，方

才有对于自然界的互相行动——就是他们的生产。”(同上)⑦

第三，方亦如同样机械的把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分割开来。他仅仅只认为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之中的一种，而不了解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另一方面，而且对于阶级社会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因为它密切的和阶级关系联结着，它最明显的表现着阶级关系，最直接的决定着革命的任务。不但如此，方亦如还只了解分配关系是剩余的劳动生产品的分配形式，而不知道分配关系包含着生产工具的分配，而且包含在生产过程的本身之中。所以方亦如对于分配关系的错误的观念，足以使他的理论斗争完全和实际的阶级斗争脱离关系。马克思对于分配关系的说明是：

“分配的最表面的意义是生产品的分配，这样，分配和生产的
关系是很疏远的，仿佛对于生产是独立的。然而分配成为生产品的
分配之前，第一，它是生产工具的分配，第二，它更进一步的决定
这种关系——把社会之中的各分子分配于各种不同的生产（把各
个人归到一定的生产关系方面）。可见生产品的分配正是这种分
配的结果，——这种分配是包含在生产过程的本身之中的，而且是
规定这生产的组织的。……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
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
分配和那些从别种生产方法发生出来的分配方式是不同的，每一
种分配方式同着它所根据的，它所适合的生产方式而消灭。”(马克
思：《资本论》卷三)⑧

马克思主义对于生产和分配的联系是看得极重要的，只有根据辩证法去了解这些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作用，方才

能够认清社会的经济性质。像方亦如那种布哈林^⑨式的机械主义的了解，自然不能够不走到极大的错误。他事实上是投降了“反革命的先锋队”。

但是，他的态度仿佛是个严厉的审判官，他的判决辞是：——原告方面（托洛茨基主义）“用商品的存在和普及来决定经济制度”，固然不对，而被告方面（列宁主义）的反驳，说“要用剥削方式和阶级关系来决定经济性质”，也是不对；应当说：“人与生产工具结合的方式——就是生产方法，是直接决定经济性质的范畴。”其实，原告方面的任曙^⑩本来也是说：“只能用经济性质去说明剥削方式，不能用剥削方式来说明经济性质。”方亦如不过是遵照任曙的指示，说明生产方法决定经济性质，经济性质又决定剥削方式。方亦如究竟是站在被告方面呢，还是站在原告方面？！

* * *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极明显的说明：

“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的过程，它的简单的要素在社会发展的一切方式之中都是一样的。然而，这种过程的每一个历史上的一定方式，都在使它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方式向前发展。这种历史方式达到了某种的成熟程度之后，就要消灭，而让给更高级的方式。这种危机时期的到来，暴露于分配方式——也就是同这些分配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历史上的一定方式——与生产力，生产能力，生产能力的动力的发展，这两方面的矛盾和对立特别来得广泛和深刻。那时候，就要爆发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方式之间的冲突。”（《资本论》卷三）^⑪

这里，可以明显的看见马克思学说的焦点并不在于简单

的指出什么是决定经济性质的范畴，而在于发见物质的生产力的发展怎样经过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而表现出来，并且发见生产过程的本身之中怎样发展着内部的矛盾和对立，怎样发展到社会方式的变更——革命的爆发。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之中，最主要的正是阶级关系。每一个社会里面，都有某种的劳动过程的历史方式，就是方亦如所谓人和生产工具结合的方式；但是，这种劳动过程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必然要产生相当的社会方式，就是生产工具的分配，照着生产工具的分配而形成的阶级关系——马克思所谓“把各个人归到一定的生产关系”。凡是阶级社会的阶级关系，都是和剥削方式联系着的。剥削关系决不是仅仅表现于“剩余劳动产品的分配”的，它还表现于生产工具的分配，生产资料的分配。封建关系的表现难道仅仅在于地主占有农民的“剩余劳动产品”？难道不是表现于地主阶级的占有土地——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难道只表现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而不是主要的还在于资本家阶级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吗？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正在于说明了这种阶级关系的变更的过程，指导阶级斗争的“真正的口号”。封建制度之下的生产关系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的桎梏，那就要爆发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的桎梏，那就要爆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革命的任务正在于消灭旧的生产关系。中国经济性质的问题的中心，也就在于解决对于革命任务的争论，争论的真正内容是：中国封建的生产关系是不是

还占着优势？封建势力是不是仍旧占着统治地位？革命的当前的任务是不是土地革命——消灭地主占有土地的制度，建立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权，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方亦如对于中国经济的争论，却没有明白的回答这些问题，而实际上始终暴露了他否认封建势力的统治。

自然，中国经济性质的争论之中，托洛茨基派以及自命为非托派的孙倬章等等，往往有意无意的夹七夹八的胡缠：有些人说列宁主义者完全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些人甚至于说列宁主义者“站在封建经济方面”！问题当然不在这里，问题是在于：帝国主义支配之下的中国经济里面，是封建关系占着优势，还是资本主义关系占着优势？

列宁主义说：“这种中世纪式的情形之中，统治的力量是封建残余的势力，是地主的势力，是地主性的官僚、军事的以及非军事的官僚的势力，他们很特别的和商业资本结合了起来。”②（史太林）封建的地主和商业资本的结合还保存着中国的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关系，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维持着封建残余，虽然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已经相当的发展，但是这种阶级关系比较起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来，还并没有取得优势。

而托洛茨基主义说：中国的地主也是资产阶级，中国的统治力量是资产阶级；中国已经没有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差不多没有封建残余，即使有，也是无关重要的了，所以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占着绝对的优势。

方亦如怎么说呢？他仿佛也是审判官，他说两边都不对：

“主张中国资本主义统治论者，如任曙、严灵峰^⑬、孙倬章诸先生，总是费尽全力，想证明现在中国已是十足的资本主义，而封建关系只是一点遗影；而主张中国封建制度统治论者，却定要证明到乡村领导城市，十足的封建黄金时代。据我看来，要正确的把握住封建势力在现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却用不着夸大其‘统治’地位的。”

固然不错——“乡村领导城市”的说法完全是立三主义^⑭的机会主义，没有丝毫列宁主义的气味。但是，方亦如自己又怎么“把握住封建势力的作用”呢？他说：

“遗留的封建经济只在临死挣扎……单说封建经济支配中国经济，也失于太重视它的作用。幼稚的民族资本是不能支配中国经济的……单说资本主义支配中国经济，——这是忽略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化的重大要质。……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早已因它伟大的力量，‘内在地’支配了中国经济。”

这样，方亦如以为既然不是封建残余的势力，也不是中国资本主义，而是帝国主义的“在华经济”占着优势。这算得什么答案！这不是回答问题，而是回避问题。问题本来在于中国在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支配之下，经济上是封建残余占优势还是资本主义？而他的“回答”是：——帝国主义！不但如此，他还说帝国主义“内在地”支配中国经济，虽然他申明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应当和中国的民族工业资本分别看待，然而他在这里完全忽略了阶级关系的问题。在阶级关系方面来说，他的答案其实是和托派一样！托派说中国几乎没有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但也说不应当重视封建势力的“统治”作用。他至

多不过和孙倬章一样，企图对于托洛茨基主义提出一点儿“修正”罢了。他在这里企图做“审判官”，而事实上又是投降托洛茨基主义。

* * *

方亦如和托洛茨基派一样，在阶级关系上完全不了解中国现实生活里的辩证法。中国现实生活里，存在着两种的阶级关系：一种是地主对农民的阶级关系，一种是城乡资产阶级对城乡工人阶级的阶级关系，这两种阶级关系极复杂的互相错综着。而且因为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经过军阀的政治借款和控制税务机关的手段，经过买办和商业高利贷资本，在经济上也维持着中国的封建势力；又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半封建式的土地关系密切的联系着，——所以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更加表显它的优势。这并不妨碍中国社会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化和对抗一天天的剧烈起来。而且因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因为广大的半无产阶级的极端穷困化，而农民基本群众和地主官僚阶级的对抗更加尖锐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民权革命之中也更加容易实现，更加有保障，更加成为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个有利的条件。对于民权革命之中农民群众的革命作用的轻视，甚至于否认，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中国经济性质的争论之中，对于托洛茨基派的立场，最主要的就在于抓住这个问题的中心，去问他们，而且一定要逼住了他们盘问：究竟你们承认不承认中国有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对抗？这正是必须用阶级关系来做中心的理由。而方亦如却以为这是“庸俗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难怪方亦

如要投降托洛茨基主义了。

列宁说：

“农民，——反对着农奴制度，反对着农奴主的地主以及替他们服务的国家，——仍旧是一个阶级，这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而正是农奴制度社会的阶级，就是等级式的阶级〔注〕。我们的乡村里面还有多少保存着这种农奴制度社会所特有的“农民”和特权的地主之间的阶级对抗，那么，工人阶级的政党，没有疑问的就应当有多少站在‘农民’方面，赞助他们的斗争，推动他们去斗争——去反对一切农奴制度的残余。

我们把‘农民’这个字眼放在括弧里面，为的是要表明这里存在着毫无疑问的矛盾：在现代社会里，农民自然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然而谁要觉得这个矛盾来得奇怪，那他就忘记了这个矛盾并不是捏造出来的，并不是教条上的，而是俄国实际生活本身的矛盾。这不是空想出来的，而是活的辩证法的矛盾。……”^⑮（《列宁文集》卷九，二七五——二七六页）

中国现在的实际生活里有没有这种矛盾呢？当然有的。中国有阶级的对抗，而且不止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对抗。中国一方面已经发生了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就是“农民”之中也已经有了阶级的分化；别方面，封建社会的阶级对抗，“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对抗还是处于主要的地位。“农民”是下等人，而地主是“上等人”，是绅士。这种对抗是根据于土地关系的半封建性。同时，就是在城市之中，工人也还披着这种“等级”地位的表面形式，——一般的说来，工人也算是“下等

〔注〕 这是列宁自己注明农奴制度和封建制度之下的等级是有相同的意义的。

人”，也没有做绅士的资格的。但是，所谓“下等人”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阶级，而正是封建社会的阶级。“下等人”之中的工人是无产阶级，而“农民”却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还包含着富农（资产阶级的富农，以及半地主的富农），还包含着雇农（无产阶级）。农民群众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是要由无产阶级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斗争去领导的。无产阶级必须清楚的了解小农群众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要求，推翻封建关系的土地革命的要求，这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对抗的具体内容。而方亦如却认为中国自耕农、佃农等的经济“是封建制度的遗物”！小农经济也是封建制度，这事实上也是否认封建关系内部的矛盾和阶级对抗。他表面上虽然反对托派，实际上是从另一个极端来否认“农民”的作用。至于托洛茨基派，那么，托洛茨基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早就表现在他对于俄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态度。列宁说：

“托洛茨基认为‘农民分化了，分成许多阶层了，因此，他们的革命的可能性日益减少了……’

这整个的十年——伟大的十年，——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五年，证明了俄国革命是有两种阶级路线，也只有两种阶级路线。农民的分化加强了他们内部的阶级斗争，唤醒了许多政治上睡觉的分子，使乡村的无产阶级接近了城市的无产阶级（……）。然而‘农民’和马卡洛夫、罗曼诺夫、赫沃斯托夫〔注〕之间的对抗加强了，生长了，剧烈了。这样明显的真理，就是托洛茨基在巴黎写的几十篇文章的几千句话，也是不能够推翻它的了。托洛茨基事实上是在

〔注〕 马卡洛夫等、是指着地主阶级说的。

帮助俄国的自由主义的工人政治家，这些政治家是在‘否认’农民的作用的名义之下表现不愿意引导农民起来革命！

而这正是现在的问题的焦点。无产阶级斗争着，并且将要彻底的斗争着——争取政权，争取共和，争取没收土地，就是要吸引农民，要尽量发挥他们的革命力量，要使‘非无产阶级的’群众来参加斗争——为着从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俄皇制度）之下解放资产阶级的俄国。而这种资产阶级俄国的脱离俄皇制度，脱离地主的土地权力而解放，无产阶级立刻就要利用起来，——并不是为着帮助富裕的农民反对农村工人的斗争，而是为着同欧洲无产阶级联盟而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⑩（《列宁文集》第十三卷，二一〇——二一四页）

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对于自己的领袖和主义，是很忠实的。他们努力的要想“证明”中国的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像孙倬章那样甚至于说中国的佃农也都是资本家（见《读书杂志》^⑪，第二卷第一期）。他们说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他们说中国“将来的”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他们主张托氏的“不断革命论”。所有这些“左倾”空谈的目的，完全是在于掩饰他们的孟塞维克主义和反革命的实质：取消土地革命，取消民权革命，反对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彻底的民权革命的胜利，反对工农民权独裁，否认现在的革命高涨，——来辩护他们的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在现在的条件之下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他们事实上成了反革命的力量。因为他们否认中国“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对抗，所以对于推翻地主的农民群众，对于这些工人阶级所领导的“非无产阶级的”群众，自然要竭

力的反对，甚至于跟着统治阶级骂他们是匪徒流寇。因为这样，他们也就反对工人的革命斗争！自然，他们将来也一定是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的敌人。

* * *

方亦如的立场怎么样呢？他站在否认阶级关系是决定经济性质的范畴的立场上，势必至于投降托洛茨基主义。他说：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论是中资或外资，当然是促使封建经济的崩坏的。它们是成反比例的。资本主义发展一步，封建经济就破坏一步。可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这样机械。资本主义，不论是‘从外铄’或‘从内在’的原因而发生，总之是在封建社会内渐渐的发展起来的。……”

原来方亦如和托派的分别，只在“渐渐的”这一个字眼！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地位，根本不了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半封建的土地关系的联系。照他的意见，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一步，中国的封建经济就破坏一步。这样，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竟是反封建的极伟大的进步的力量了。同样，中国的资本主义更是革命的力量了。托派说，中外资本主义已经推翻了封建制度，而方亦如说，不要心急，中外资本主义是要这样渐渐的一步一步的推翻封建制度呢。

因此，中国社会的经济性质，照他说来，是——“半殖民地上的衰落时期的封建社会”。这等于没有回答问题。中国的封建制度当然是在衰落，而且不止是在衰落，而是已经开始崩溃，已经有许多省份里面被农民的土地革命所推翻。问题是在于推翻封建关系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群众，还是“中国

的资本主义”?! 中国当然是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当然要开展中国的商品经济，等等……问题是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维持中国的封建关系的，还是“推翻封建关系”的?!

中国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不但在政治上完全反动，就是在经济上也更加适应着帝国主义的殖民化的政策，适应着军阀官僚的货币资本的垄断政策。虽然，中国的小工业资本家继续着种种发展的企图，——这是在一般情形之下自然的现象，然而总的发展倾向是：中国工业的大破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非民族化——买办化。而且，中国民族工业受着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压迫，受着帝国主义军阀的钳制和捣乱，受着广大的几千万几万万群众穷困化的影响而找不着市场——受着购买力降低的巨大的限制，所以一天天的移出自己的资本，放到田地上去，放到都市的地皮上去，放到包捐包税的公债上去，这种民族工业资产阶级的非工业化——投机化、封建地主化的过程，是可以用铁一般的统计数字来证明的。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固然发展着资本主义的关系，然而这些资本的积累，极大部分是加强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投机式资本的。这并没有改变对于农民的封建式的剥削，反而更加加重这种剥削。资产阶级的收买田地，并不是拿来经营资本主义的农场，而极大多数是继续封建式的租佃关系。这样，中国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是密切联系的，他们又能够成为什么“推翻封建制度”的力量!“农民”和地主的封建式的阶级对抗仍旧保存着、加强着；在封建势力和商业资本的结合之下，这种阶级对抗而且特别的尖锐化。

“中国乡村里，这种最初积累式的商业资本很特别的和封建的统治结合起来，和地主的统治结合起来，并且还从地主方面采取对于农民的中世纪式的剥削和压迫方法。……军阀制度、督军省长，现在的恶魔强盗似的一切种种军事官僚和非军事官僚，——就是中国这种特别情形的上层建筑。而帝国主义赞助并且巩固这种封建官僚的整部机器。”^⑱（史大林：《和中大学生的谈话——一九二七年五月》）

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表现于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银行、铁路、轮船、矿山、工厂，……这是早就指出的重要问题，并用不着方亦如来发见什么“新大陆”，说什么不应当“把帝国主义的在华经济排斥于中国经济结构之外”。问题就在于帝国主义经过这些经济命脉，主要的是开展着中国的商业高利贷资本，而阻碍着中国的工业化；而且，还在竭力的维持着、巩固着中国的封建官僚。怎么能够说“外资的资本主义”是在“推翻封建制度”，是在“渐渐的”消灭封建制度呢！

关于商业资本和工业化的关系，最好看一看马克思说的话以及列宁的解释：

“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却成为反比例”^⑲（《资本论》，卷三），“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发展得越厉害，工业资本（=资本主义生产）就发展越薄弱，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⑳（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既然赞助着封建地主和商业资本结合的中国军阀制度，也就阻碍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托洛茨基派用商品经济来决定中国封建残余已经不是统治的力量，——这并不是

偶然的。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上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把帝国主义和民族工业资本主义“一视同仁”，把商业资本认为是和封建残余不能并存的东西。而方亦如也根本不了解商业资本和工业化的关系，因此，事实上跟着托派反对“封建统治论”！

* * *

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临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竭力的在殖民地地上找寻自己的“出路”——商品的销场、原料的供给、“多余资本”的容纳，尤其是“多余资本”的输出，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可是，这个“出路”对于帝国主义同时也是死路。因为帝国主义扩大着中国的商品经济，极端剧烈的加强了几万万小农和手工业的破产过程，就造成了广大的出卖劳动力的后备军；同时，商业资本发展的结果，一小部分的最初积累的资本（官僚的，买办的，商人的，地主的……）不会不投入小小的工业里去，而且帝国主义自己所需要的交通事业（铁路、轮船等等）、原料采取的工业（矿业）以及原料改装的工业，随后，还有一些消费品的轻工业也因为利用廉价劳动而发生出来。这样，中国就发生了无产阶级，以及极其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还有很多的脱离生产工具而又卖不出自己的劳动力的贫民群众。这是帝国主义自己造出来掘它坟墓的中国无产阶级。而帝国主义“照着自己的奴才的模型”所造出来的中国资产阶级，却是非常之微弱的，——工业资产阶级不但很少，而且和封建关系密切的联系着。中国的工人和资

本家的阶级对抗有一个特殊的情形：就是一切被雇用的人，从严格的工厂无产阶级一直到苦力雇农，以至于部分的依赖工资生活的半无产阶级，形成了中国的工人阶级；而同时，雇用工人的人之中，却只有最小部分可以算作严格的工业的民族资产阶级。外国帝国主义官厅，军阀，以及临时雇用劳力的商人等等……要占着雇用工人的人的极大部分。劳动和资本的阶级对抗是在极端的剧烈起来，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受着了巨大的束缚，尤其是民族工业的独立发展被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化的政策严厉的阻碍着。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工业资本）发展的矛盾。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化的政策，客观上也不能不一方面把中国一部分一部分的抓进自己的经济机体里去，做它的附庸，别方面正就因此而造成推翻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

中国的社会，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只能够保存着封建式的土地关系，维持着封建势力结合商业资本的中世纪式的剥削关系，适应着帝国主义的需要而开展资本主义的关系，虽然因此而引起了一些工业资本的发展，可是，封建残余的势力仍旧占着优势。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前途，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就只有殖民地化的道路：就是列强帝国主义互相抢夺着，分割着中国，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附庸，主要的是保持封建势力，只在形式上改换一些，使它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而工业的发展是只能够在帝国主义所容忍的范围之内的。这种前途，必然的引起极剧烈的经济恐慌，直到现在的全国国民经济崩溃的情形，几万万群众的饥饿、死亡，是帝国主义、地主、资产

阶级保持自己的收入的代价。

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的基本群众的土地革命，彻底的完成民权革命的任务——解放中国，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建立工农民权独裁，这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而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地位，他的领导权，一般的国际和国内的条件，都足以保障“革命转变”的斗争的胜利，而开辟中国经济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托洛茨基派反对列宁的“工农民权独裁”的口号和“革命转变”的学说。这是因为他们不但否认中国有“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对抗，并且否认无产阶级的力量和领导权。方亦如的论调只是偷运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货。

至于中国农民群众和地主阶级的斗争之中，现在半地主的富农和一般富农已经在反革命方面，无产阶级就要坚决的领导农民群众去反对富农。那么，这正是保障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有利的条件，而并没有“取消”什么民权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取消”农民群众和地主的阶级对抗，而且这正可以有利的影响到革命转变的速度。

注 释

① 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研究》，见本卷第439页注①。

③ 李白克纳希德，今译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 1826—1900)，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参加1848年德

国革命以及第二国际的创建工作，积极反对德国军国主义。

④ 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⑤ 加尔·李白克纳希德，今译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August Ferdinand Liebknecht, 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国会议员。1916年同其他左派领袖一起组织斯巴达克同盟。1919年1月同卢森堡等一同被害。

⑥ 今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⑦ 今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⑧ 今译文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994、998—99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⑨ 布哈林，见本卷第32页注⑩。

⑩ 任曙，又名任旭、任昭明，四川南充人。1927年曾任中共中央农民部秘书、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托洛茨基主义派代表人物之一。

⑪ 今译文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99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⑫ 今译文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9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⑬ 严灵峰，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托洛茨基主义派代表人物之一。1930年7月在上海创办《动力》杂志，同任曙、孙倬章等又被称为动力派。

⑭ 立三主义，即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主持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标志着立三主义的形成。这年9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其在党中央的统治。

⑮ 今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8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⑯ 今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8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⑰ 《读书杂志》，王礼锡、陆晶清等主编，1931年4月在上海创刊。

⑱ 今译文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8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⑲ 今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7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⑳ 今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第15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孙倬章先生的土地问题*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日)

孙倬章先生是中国的“唯一的布尔塞维克”，他说：“真正布尔塞维克的经济学，对于只抓着特殊而抛弃普遍的经济研究法，背于布尔塞维克的经济学，固应坚决的不遗余力的加以反对。而对于只抓着普遍而抛弃特殊的经济研究法，仍背于布尔塞维克的经济学，我们仍应不遗余力的加以反对。”他所谓背于布尔塞维克的这两派是谁呢？原来是“中国现在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分化为两派，此两派的经济理论，分成极端相反的两派。托洛茨基派的取消派根据于普遍的抽象的资本主义的方法，以研究中国的经济……反之，新思潮派^①，只根据中国特殊的具体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以研究中国的经济……。”这样，中国的布尔塞维克就只剩得孙倬章先生一个人。他左右开弓的反对中国共产党，也反对中国的托洛茨基派。他曾经在《读书杂志》^②上发表过一篇《中国经济的分析》（《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最近又在《读书杂志》（第二卷一期）发表他的《中国土地问题》。

* 本篇及下面的《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均收入作者编的《战鼓集》（一），迄未发表。这里根据中央档案手稿刊印。

孙倬章先生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事实。但是，他是不是真正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呢！

—

他的根本立场是：“凡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不独城市的一切经济关系，受资本主义法则的支配，即农村中的一切经济关系，也应受资本主义的支配。我们既已证明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土地问题，当然也要受资本主义法则的支配。”这种立场，显然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他不承认中国还有封建性的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对抗。因此，他的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自然只是些枝叶问题上的争执。他至多不过是托洛茨基派之中的一种见解，而决不是什么布尔塞维克。

他说他已经“证明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怎么证明的呢？嘿，妙得很！他说：

“我们农村中见着，差不多每家农人都有雇农，至少十分之九都有雇农，即算农村之中十之九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以他们的产品来说，不独供给国内市场的不少，而做帝国主义的原料，中国每年输出品的价值十余万万元，农产品还占十之七八。……由这样看来，农村资本主义的生产的数量，比城市工业资本主义生产，还要大几倍，由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数量来看，已算是世界上巍然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了！”……“中国的经济，无论由数量说，或质量说，都是资本主义占优势，无论由工业说或由农业说，也无不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然则中国现在，所谓封建制度的生产，真算是已成了不足重轻的残余。”……“以前的土地买卖

是受商业资本主义的支配，现在的土地买卖，则受工业资本主义的支配……故农业的平均利润，必受工业的平均利润的支配。”

这种理论真是武断、糊涂、瞎缠的混合物！第一，他根据什么而说中国农村之中每家农人都有雇农呢？没有什么根据，完全是他主观的武断。第二，他把小农经济，以及必要雇用短工的中农经济，都当做资本主义的生产，居然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荒天下之大唐吗！第三，他说中国的土地买卖已经受工业资本主义的平均利润的支配。但是，他自己的结论又说：“中国大多数的地租，不是资本主义的地租，乃是封建关系的地租。”这是他自相矛盾。孙倬章先生的自相矛盾，还不止此，他的自相矛盾简直到了神奇古怪的程度。

二

他引用了许多马扎亚尔^③的话，引用了中共“六大”的议决案，自己指出许多封建的剥削关系，说明中国租佃制度之下的地租，“不但包含绝对地租，和各种形式的等差地租，不但包括着资本的利润，或者更确切些说，佃农生产工具的利息，而且还包括着佃农及其家属之极大部分”；这种地租，马克思认为不是资本主义的地租，而是封建剥削的地租。但是，孙倬章先生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土地问题中是三个阶级，即地主、佃农——资产阶级、雇农——劳动阶级”；他说：“中国现在已有三千万的佃农……这就是农村中阶级分化的表现，一方表现有剥削剩余价值的资本家阶级，一方表现有生产剩余价值

的劳动者阶级”。这不是神奇古怪的自相矛盾吗？照他抄录马扎亚尔的说法，中国这三千万户的佃农是小农经济——小资产阶级的商品生产者，可是，还处在农奴式的封建式的地主剥削之下，他们的生产工具的利息和自己的工资的极大部分，以及自己的资本的剩余，都被地主剥削去了。可是，照他孙倬章先生自己杜撰的理论，这三千万户的佃农又都变成了“剥削剩余价值的资本家阶级”了！中国居然有了三千万户的资本家，难怪孙先生要断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了！

这是他曲解、瞎缠马克思主义的结果。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根本阶级是：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工人；土地所有者把土地租给资本家的承租人（孙先生把这个“承租人”译做佃农，因此，和中国的农奴式的佃农瞎缠一顿），这种种资本家的承租人的目的是“剥削土地，以生产商品。”现在中国的佃农呢？他们只能够靠着租来的田地，勉强维持自己家属的生活，甚至于自己的生产工具上的利息，自己资本的利润，自己工资的极大部分，都要交给地主。固然，他们的生产品也大半变成商品，但是，他们这是为着维持自己的牛马似的生活，而务必出卖自己所需要的生产品，或者用物产地租的形式交给地主，以致于连“简单的——不亏本的——重复生产”都不可能。他们这样受着封建式的地主和商业资本结合着的剥削。而孙先生把他们当做资本家的承租人一样看待！这样，孙先生自然只看见中国经济上有资本家和工人的阶级对抗，不论工业和农业都是一样。他不看见中国经济上因为封建性的土地使用关系还占着绝对的优势，所以还有地主和“农

民”的阶级对抗——封建性的阶级对抗。照他的意思，中国的地主和军阀制度却只是空中楼阁的上层建筑，因为“经济基础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了，上层建筑只保存着无关重要的封建残余。”（参看孙倬章的《中国经济的分析》）

三

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孙倬章先生认为中国的富农完全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他说：

“中国现在一般人，一面谓中国农业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一面又异常紧张地反对富农，我不知道他们的脑中，怎样发生了如此的矛盾现象。”

他不知道！他自然不会知道，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最浅显的原理。列宁主义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通的原理来分析中国的具体的特殊的经济现象，就可以知道中国富农的特性，而规定自己的策略。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够在工业方面充分的发展，因为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控制，因为帝国主义的工业品的竞争，所以工业之中的利润比高利贷、比买办商业、比剥削田租等等，一般的说来，都低得多。中国内地的地主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结合着，竭力的保持地方市场的半独立性（维持着封建军阀的割据），正是为着要排斥“工业资本的平均利润”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土地投资之中，没有工业的平均利润。极大多数的土地投资的目的，并不在于实行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而在于购买封建剥削

的权利——实行封建式的租佃制度。不论是谁，是官僚、军阀，或者是商人、资本家，他买了田地去，大半仍旧是出租给农民的。有些工业资本家正因为工业之中亏了本，所以把资本提出来，去购买田地，自己变成封建式的地主。这种工业资本逃到封建剥削方面去的现象，正是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受着极大的阻碍的结果。而列宁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只有工业资本”（《文集》新版三卷，一三六页）。农业方面，必须应用工业式的生产方法：生产工具的改变，至少也要有生产组织的改变，方才说得上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现在中国的富农怎么样呢？

中国乡村之中的阶级分化——资本主义性的阶级对抗，当然早已开始的了。“农民之中分出贫农、中农、富农和雇农、苦力，形成乡村之中劳动和资本的对抗。但是，这种分化过程的进行，并没有削弱封建性的阶级对抗——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对抗。“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对抗（包含着小农群众和军阀制度的阶级对抗）仍旧处于主要的地位。封建性的租佃制度一天不推翻，那么，这种封建性的阶级对抗就保存着一天。正因为帝国主义的统治，封建势力在乡村之中占着优势，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够独立发展，而且开展着长期的经济危机；所以这种“农民”的分化，首先是一方面广大的农民群众贫穷化、乞丐化，他们不能够在工业方面找到出路，而变成无产阶级，而大半只能去当兵，当匪，或者大批的冻死、饿死，而地主等，也就更加容易利用这种机会去贱价收买田地，抬高租额款，加强封建式的剥削；另一方面，乡村之中因为分化而产生出来的富

农，在这种环境里面，如果把自己积聚起来的资本用来改变生产工具，扩大自己的资本主义的生产，那么，所能够得到的利益，比出租收买来的田地，或者做高利贷和投资的商业，都要吃亏些。因此，中国的富农之中极大多数是半地主的富农，甚至于有些变成小地主。

这样，中国的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开展出去，要消灭地主阶级，要自己平分土地的时候，就不能够不加紧的反对富农。

四

自然，中国不但在城市之中，就是在乡村之中，也发展着劳动和资本的资本主义性的阶级对抗，乡村之中雇用雇农和苦力的不但是富农，而且有地主、商人等等。一切军阀、官僚、绅士、地主、小作坊的店东、商人等等都雇用苦力或者雇农（长工或者季工，或者短工）。这里，劳动者反对雇主的斗争是当然要反对到富农的。不管他是兼做半地主的富农，还是不兼做半地主的。这种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是农民群众争取土地的斗争中的唯一彻底的领导力量。但是，必须分别清楚：无产阶级的斗争的目的，是和农民群众争取土地的斗争不同的。无产阶级斗争的目的是社会主义，而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商品生产者的群众，是在争取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这是小私有者的斗争——“小东家”的斗争。

无产阶级是不是赞助和领导这种小私有者的斗争呢？在民权革命的阶段，这是当然的。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之中有

两方面：一方面是反对雇主的富农；别方面是反对半地主的富农。这里的第二方面的斗争，具体的表现就是贫农、中农群众要分配富农的土地，这也是小私有者的斗争，这还只是农民群众一般的土地斗争之中的一部分。中国无产阶级不但要有土地国有的政纲，而且要在目前就赞助农民群众平分土地的实际行动，这正是分配无代价没收下来的地主的土地，也是要分配半地主富农的土地。

孙倬章先生却只笼统的承认土地国有的政纲，而且把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权革命之中的土地问题，混乱的胡缠在一起。他始终没有答复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中国好几百县之中，农民群众已经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起来没收地主的土地，自己决定着怎样分配这些土地，怎样分配富农的土地，怎样保障中农的利益，怎样取得雇农在这种斗争之中的领导权，怎样发展贫农群众的革命力量；孙先生对于这种现实的土地革命，是反对还是赞助？换句话说：就是孙先生对于现在的农民小私有者的土地斗争，是反对还是赞助？没有疑问，中国现在的土地革命的前途是土地国有，而且这可以成为将来革命转变的一个主要条件，虽然土地国有的本身还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范围。然而目前的事实，还只有农民群众——小私有者——反对着军阀、地主、富农……而争取土地的斗争。孙先生是不是赞成呢？！照他的根本立场——认为中国农村之中已经没有经济上的封建残余，——他是应当反对的。他不过不好意思说出来罢了。他的思想上的祖宗，马尔托夫^④和托洛茨基等等，也是这样的；——

“马尔托夫把农民暴动时代的俄国去比西欧，而西欧是早已结束了封建制度的。这是异乎寻常的曲解历史的前途。在整个的西欧，有没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政纲上写着：‘赞助农民的革命暴动，一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这种要求的呢？没有。在整个的西欧，社会主义者并不赞助小东家为着争取土地占有而反对大东家的斗争。分别在什么地方？在于整个的西欧之中，早就形成了，而且完全确定了资产阶级的制度，部分的说来，也就早已形成了，而且完全确定了资产阶级的土地关系；而在俄国，正在为着怎么样形成这个资产阶级的制度而发生着革命。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把好些不同的历史时期混在一堆，把完成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俄国，和早已完结了这些革命的欧洲去对比起来。”⑤（《列宁文集》新版第十五卷，十二、三页）

五

不但如此，孙倬章先生还认为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是枝叶问题。他就根本没有了解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维持中国的封建残余的具体内容。正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所以一方面剧烈的发展着资本主义性的阶级对抗；别方面封建性的阶级对抗不但不逐渐削弱，反而更加尖锐化。正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所以土地所有制度虽然变成了资产阶级性的，而土地使用制度的封建性反而继续成为土地关系的中心问题，而不能跟着土地所有制度的变化而变化。这些，都是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是在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的，是受着帝国主义的限制的，是适应着帝国主义的需要的。帝国主义统治

之下的中国，半殖民地的中国，不能够独立的发展工业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只会维持着封建性的土地关系，发展商业高利贷资本，这种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单独发展，恰好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成反比例的。”（见《资本论》卷三，德文版上册，第三百十二页。）这是中国的封建性的土地关系和商业高利贷结合得特别厉害的主要原因。这是帝国主义统治对于中国土地关系的影响的经济上的内容〔注〕。孙倬章先生对于这一点是绝对不了解的。因此，他才会说出这样无意识的话：

“半殖民地的关系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关系，资本主义发展之后，才发生半殖民地的关系，资本主义是根本的，半殖民地只是枝叶的，抛弃根本的资本主义，只抓着枝叶的半殖民地，以研究中国经济，只能够把握一部分的中国经济关系……只算是抹杀无产阶级，抛弃无产阶级，甚至于背叛无产阶级！”

这种话的糊涂瞎缠，真算是达到了顶点。请问这里说的“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还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发展到一定阶段，当然世界上不会有什么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可是，争论的问题是在于帝国主义经济支配之下的中国经济。问题的焦点是在于：独立国家和半殖民地的现代中国，它们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土地关系的发展是不是同样的？照孙先生的意思，这差不多是同样的，用不着提出半殖民地地位的特点，而且认为这

〔注〕 决不像孙先生说的那么简单：什么“帝国主义商品源源而来……城市工业发展又太缓慢，不能吸收农村的过剩人口……封建的剥削乃愈趋愈烈。”

是枝叶问题！其实，对于中国，这半殖民地地位绝对不是枝叶问题。只有社会民主党，才会假装着“纯粹无产阶级的清高”，来否认无产阶级领导民族解放的任务，否认领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农民战争的任务，否认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维持中国的封建残余——列宁说：

“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之中，应当首先提出并非抽象的形式上的原则，就是：第一、精确的估计具体的历史环境，首先是经济的环境；第二、清楚的分别被压迫阶级、劳动者阶级、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和所谓一般人民的利益，——这所谓一般的人民利益事实上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第三、同样清楚的分别被压迫被支配而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和压迫者支配者而有全部权利的民族，去反对那种资产阶级的诳话，——就是把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时代所特有的殖民地的财政上的奴隶化，蒙蔽起来，而这种奴隶化正是地球上极少数最富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极大多数的人民所实行的。”^⑥（《民族殖民地问题议决案》的最初草案）

孙倬章先生的否认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关系的重要，正是这种“资产阶级的诳话”之中的一种。

六

孙倬章先生表面上批评托洛茨基派，说他们“只作抽象的普遍的观察，而忽略具体的特殊的方面”。其实，孙先生否认中国是半殖民地的特点，他自己也就犯着同样的错误。

“考察，研究，寻找，猜测，抓紧每一个国家民族特点、民族特

性,为着要具体的去解决那个统一的国际任务,去克服工人运动之中的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去推翻资产阶级,去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独裁,——这是一切先进国家(并且不单是先进国家)在现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列宁:《左倾幼稚病》)⑦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的要求,是要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然后,如果问题是关于个国家的,那么,还要估计到具体的特点,使这个国家和别个国家在同一个历史时代之中仍旧是各不相同的那种特点”。⑧
(《列宁文集》新版第十七卷,四三一页)

而孙倬章先生,恰好在土地问题的许多解释之中,也完全违背了这个原则。他把中国的土地私有制度之下租佃关系的封建剥削等等,完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关系混淆了起来,他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度的理由,完全是抄袭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土地关系的分析。他根本不承认中国的具体的历史的和经济的事实:封建的土地关系和小私有者的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对抗,农民群众要求没收地主土地的观实的斗争。

至于他说所谓新思潮派“站在封建经济方面,留恋于封建经济”,那简直是笑话!《新思潮》杂志上的一些错误,我们早已批评过。可是,孙倬章先生说:凡是主张封建残余仍旧是统治的力量,就是“留恋封建经济”,这未免太糊模了!俗话说:宁可和聪明人相骂,不要和糊涂人讲话。然而我们现在一定要和糊涂到万分的孙先生“相骂”,这倒是件别致的事情。就是因为孙先生的糊涂理论,有它的阶级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和他“相骂”。他的客观上的阶级目的,是在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

在中国破产之后,另外披上一件外套,表面上反对着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继续托洛茨基主义的任务:帮着地主资产阶级用最巧妙的最细腻的手段,来反对现实的土地革命的具体行动。这是我们不能够不揭穿的。

A. T. T.

注 释

① 新思潮派,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派, 他们主要在朱镜我主编的《新思潮》杂志上发表言论, 故名。

② 《读书杂志》, 见本卷第491页注⑰。

③ 马扎亚尔, 今译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英国经济学家, 庸俗政治经济学者。主要著作有《经济学原理》、《产业与贸易》、《货币、信用与商业》等。

④ 马尔托夫(Л. Мартов, 1873—1923), 原名尤里·奥西波维奇·采捷尔巴姆, 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1895年参加组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1900年加入《火星报》编辑部。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反对列宁的建党原则, 以后成立孟什维克派别组织。著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等。

⑤ 今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16卷第377页, 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⑥ 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71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⑦ 《左倾幼稚病》, 今译《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引文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46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⑧ 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上的理论上的武器。马克思主义运用这种武器，不但要去认识世界，并且要去改造世界。可是，“世界”并不像中国的绅商阶级那样抱着不抵抗主义，“它”自然要用一切手段一直到理论上的斗争，来抵抗无产阶级的改造。这所谓世界，就是绅商阶级的世界，中国的地主资本家的世界。帝国主义要照着自己的奴才的模型来改造中国，这是中国绅商所不抵抗的。无产阶级要领导着农民群众来改造中国，这就使中国绅商拼命的抵抗起来了，而且对于帝国主义的不抵抗主义，正是中国绅商对于工农群众的抵抗政策。

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反对工农革命的理论斗争的别动队之一，就是新出现的合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和这种合法的“马列主义”结合了攻守同盟。大概还是一九三一年的一二月间，王礼锡^①、胡秋原^②等等就开办《读书杂志》，征求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文章。表面上，《读书杂志》是没有党派的，但是，请看《社会史论战》第一辑上王礼锡做的《序幕》：

“世界的资本主义正在依照它的模型制造中国，而与资本主义恰恰相反的一个国家，也正在按照它的模型制造中国的革命”，“制造中国”。

这里，隐藏着根本上的三民主义的立场。但是，这些“合法主义者”竭力企图掩饰自己的真相，他们的目的，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来“证明”中国不需要苏维埃革命和土地革命，中国现实的工农革命斗争都“不合于理论”。因此，他们故意要说：“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各方都是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而自己居然也拿着“唯物辩证法的武器”出场了。

很自然的，王礼锡等的这种所谓“唯物辩证法”，实际上是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折衷主义的诡辩法。

一

《读书杂志》上最近发表了王礼锡的一篇思想方法论（二卷一期），叙述唯物的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一个绝对新的整个的宇宙观，是无产阶级的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王礼锡的叙述是不是正确的说明了这种新的高级思想方法呢？没有。首先，要说到唯物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相互关系。

王礼锡先生先说明形式逻辑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公式的不能够解释“更复杂的问题”。然后，他只说“我们不是要完全打破形式逻辑，而是要限制形式逻辑的绝对功用”。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形式逻辑的“相对功用”在什么地方，形

式逻辑和辩证法的相互关系是怎么样的？关于这一点，王礼锡先生是没有了解的。

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区别，固然在于辩证法认为“一切都是流动的”，而形式逻辑认为一切都是固定的。形式逻辑的公式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而辩证法说：“也是，也不是”。然而，辩证法并不因此就否认一切现象发展之中的各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之内，“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公式，仍旧保存它的效用的。譬如说，青年小伙子的嘴唇上正在生长着一丛毫毛，渐渐的生出胡须来，没有疑问的，他已经开始有胡子；然而，这还并没有给他自称“胡子伯伯”的权利。嘴唇上有一簇毫毛，这还并不是胡子，虽然它正在变成胡子。流动，发展，变更，是辩证法的根本观点，然而“变更要成为质量上的变更，还必须这个变更达到一定的数量上的限度。”

“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在变更。……我们所认为事物的东西，只是各种结合，永久在变更之中，或者快些，或者慢些，可是都在变更。当某种结合仍旧保留着这种结合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照着：‘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公式去判断它。而当这些结合停止它原有状态的存在的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应用矛盾的逻辑，我们应当说……：‘也是，也不是；也存在，也不存在。’

静是动的一部分，同样，照着形式逻辑的规律的思索(……)是辩证法的思索的一部分。”(普列汉诺夫③)

希腊古代的哲学家克腊替尔④(柏拉图⑤的一个学生)，他就想比赫腊克利图斯⑥更进一步。赫腊克利图斯说：“我们不能够两次走进同样的一条河”，因为河水是在不断的流动；而

克腊替尔说：不但两次不能够，就是一次也不能够，因为正当我们走进那条河的时候，河水也正在流着，河正在变更着，已经成为另外一条河了。这样的说法，就仿佛“转变”根本取消了“存在”。这是滥用辩证法，而不是正确的应用辩证法。黑格尔^⑦早就说过这是什么第一次的否定的否定——“Das Etwas ist die erste Negation der Negation”。这就是说，没有肯定的“否定”！

因此，关于辩证法的认识，首先应当注意：一切都在流动和变更，“没有无运动的物质，也没有无物质的运动”，但是，物质的运动和变更，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上的限度，然后才能够发生质量上的改变。辩证法因此并不取消形式逻辑，而只是包含形式逻辑；而且只有辩证法，才能够驾驭形式逻辑，把形式逻辑的相对的功用正确的运用起来。

二

“对于辩证法的哲学，没有任何固定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辩证法的哲学看得见一切之中的不可避免的崩溃的痕迹，任何东西不能够在它之前维持住的，除非是发生和消灭的不断的过程，无穷无尽的从低级向着高级的上升。……世界并不是什么现成的完结的东西所组成的，而是许多过程的综合，在这些过程之中表面上看来是不变的东西，以及头脑里面思想上反映这些东西的影子，都是一样的——都在不断的变更之中，有的发生着，有的消灭着。”^⑧

（恩格斯）

但是，这和庸俗的进化论是不同的。辩证法认为自然界和社会之中的发展，是照着数量上的渐进转变到质量上的突变的。“突变要先有不断的变更，而不断的变更不可避免的引导到突变”。这种现象，在自然界之中，在社会之中，到处都可以发见。譬如水渐渐的冷下去，冷到零度就突然的结成冰，或者渐渐的热上去，热到一百度就突然的变成蒸汽。小孩子怀在母亲的胎里渐渐的长大起来，就要从母体的一部分，突然的脱离母体，而变成独立的生物。社会现象之中的突变就是革命。资本主义在封建制度之下发展着，渐渐的生长起来，经过革命而突然的变更社会的性质，从封建制度变成资本主义的制度。同样，社会主义的成分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渐渐的发展着，经过革命突然的推翻资本的统治，而变成社会主义的国家。

王礼锡先生似乎了解了这个渐进和突变的原理。王先生批驳胡适之的实验主义^⑨的方法论，说他不了解突变，所以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但是王先生自己呢？

王先生举出美国的例子说：“矛盾的对立已经尖锐到快要由量到质的突变发生。”他竟没有解释这所谓“矛盾的对立”是“矛盾的，相反的，互相排斥的之间的斗争”。突变是由于运动之中的渐进的斗争发生的。“发展就是斗争”。没有“统一”的内部矛盾的斗争，没有这种斗争的不断发展，就不会有突变。单是矛盾的、静止的对立，是不会有突变的，一切事物和现象之中也不会有静止的对立。王先生也许否认他的“静止的对立”观念。然而他的确把“流动”的原理和“矛盾”的原理分割

了开来。当他叙述“流动”的时候，他不说明矛盾的互相斗争是一切“流动”、“运动”的基础。因此，等到他说“矛盾的对立”的时候，这所谓“矛盾”就和向着突变前进的发展脱离了关系。

因此，对于辩证法的认识——必须不但认清一切事物的数量上变更必然要引导到质量上的突变，而且要知道变更，流动，发展——总之所谓“自我运动”，正是这个统一的“自我”之中的相反的矛盾的互相斗争。

三

“认识相反者的相同”，就是承认（发见）自然界（以及精神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之中的矛盾的（互相排斥的）不相容的相反的倾向。在它们的“自我运动”之中，在它们的自发的生活之中，在活的生活之中，去认识世界上的一切过程的条件是要把它们当做相反者的“统一”来认识。发展是相反者的“斗争”。“……相反者的统一（相合，相同，相持）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相对的。而不相容（互相排斥）的相反者的斗争却是绝对的，像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列宁）

实验主义是所谓相对主义——否认绝对的真理。王礼锡（彭述之^⑩、李季^⑪）等，知道实验主义的反对革命的改良论，或者更进一步，知道它的否认客观主义的经验论，事实上就是变相的怕羞的唯心论。但是，他们都没有认识实验主义的否认绝对的真理。辩证法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决不就是相对主义。“马克思、昂格思的唯物辩证法绝对的包含着相对主义，

但是决不就是相对主义。唯物辩证法承认所有我们的知识是相对的，这并不是否认客观的真理，而是说明我们知识的接近客观真理是受着历史条件的限制的”。⑫“对于客观的辩证法，就在相对的之中也还有绝对的。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法，相对的就是相对的，相对的排斥绝对的。”（列宁）。因此，如果不认定发展和运动的绝对性，如果不认定发展是相反者的斗争，那么，势必至于要走到诡辩法方面去。

所谓相反者的斗争，就是一个现象之中不能够不包含着相反的倾向，这种矛盾的倾向之间的斗争正是“自我运动”的来源。假使不认识这种斗争，那么空洞的承认突变就是诡辩法。假使只认识一切都是流动的，而不认识流动之中的矛盾的斗争，同时，空洞的提出“矛盾”的概念，而不把“矛盾相斗”认做流动的内容，那更是诡辩法。王礼锡先生的说法正是这个样子。

因此，辩证法的基础正在于：一切发展都是矛盾的斗争，而且矛盾的统·一·不·过·是·相·对·的·现·象·，·只·有·斗·争·是·绝·对·的·。

四

辩证法的考察事物，还要考察它们的联系，它们的错综的相互关系，因为只有在事物的各·方·面·的·联·系·之·中·，·才·能·够·看·得·见·这·一·个·或·者·那·一·个·事·物·的·最·完·全·的·实·质·。世界上没有绝对孤立的现象。一切事物、现象、过程，多多少少总是别一些事物、现象、过程的一部分。所谓“局·部·的·，·除·非·联·系·到·全·体·的·，·”

方才存在。”而“全体的也只存在于局部的之中，也只经过局部的而存在。”这是全体和局部的关系。所以忽视“各方面的联系”固然是违背辩证法，而忽视个别的现象，忽视个别的特点和特性，不会把这种个别现象正确的联系到全体方面去，那也是违背辩证法。

所以说：“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必须要“在应用辩证法到某种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的特点的时候，会提出这个问题的各种要点，各种方面，特别着重的放到第一位。”一切笼统的空谈，都是违背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是考察一切宇宙、社会、思想的统一的科学方法，是唯物哲学的认识论；而它的统一，正在于它能够在一事物、现象、过程的关系之中，在它们的错综的关系之中，在它们的运动、发生和消灭之中，在它们内部矛盾的斗争，从数量上的渐变进到质量上的突变之中，——去发见各个现象的特点，发见各个阶段的特性。请看马克思自己的话：

“……‘有些读者会发出这样的问题：要知道经济生活的一般公律是一样的，——不管是应用到现代生活，或者是应用到过去的生活，——公律反正都是一样的？然而，马克思正不承认这一点。对于他，这种一般的公律是没有的。照他的意见，每一个历史时期有自己的公律……可是，等到实际生活过完这一个发展时期，走出了这一个阶段，而进到了别一个阶段，它就已经受另外一种公律的支配了。……’作者这样好的叙述了他所认为是我的真正方法……他也就叙述了辩证法的方法。”^⑬（《资本论》卷一，第二版自序。这里，马克思引的是一八七二年五月号的圣彼得堡的《欧洲消息》杂

志。⑭)

五

最后，辩证法的要求是实践和理论的联系。人的行动是自然界的变动和社会的变动之中的一部分，因为人自己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意识是物质的产物，同样，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意识不能够不是社会的实质的一部分。而且“人的行动影响自然界而改变着自然界，也就改变着人自己的天性。”辩证法反映着客观的自然界和社会的实质；辩证法可以帮助人的行动，使人能够正确的知道现实而能够去解决问题，这就是所谓“必然之中的自由”。所以辩证法不但是认识社会，而且是在改造社会。改造社会的实际行动必须运用全部的辩证法，而不能把辩证法的各方面——各个要素割裂开来，譬如像王礼锡先生似的：他把突变的发展和矛盾斗争割裂开来，把全体和局部割裂开来，把行动和理论割裂开来。他说：“思想不能离开实践，所以深思不能离开苦学。”原来他所谓行动就只是苦学！他接着说：“应当从自己行动的实践上去苦学”。原来革命的行动不是客观社会现象之中的一部分，而只是苦学的材料！他埋怨一些人的“盲动”，而说一方面要理论，一方面要行动；一方面要深思，一方面要苦学。这是折衷主义的诡辩。

辩证法的全部运用，就是：

“要会在每一个时机，找着铁链条上的特别的一个铁环——要用一切力量抓紧这个铁环，然后才抓得住整个链条的这样一个铁

环，——而稳固的准备着，以便进到再往前的一个铁环；而且，在事变的历史的链条上，许多铁环的次序、形式，它们的连接，它们互相之间的区别，都不是那么简单，那么蠢笨，像铁匠打出来的普通链条似的。”^⑮（列宁）

这是必须要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在现实的阶级斗争里面，去运用辩证法到实际行动方面来。王礼锡先生的实际行动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见《读书杂志》上说：

“礼锡、晶清^⑯此次参加国难会议^⑰，最重要的目的是争取言论、组织自由。”

参加国难会议，这是什么阶级立场呢？这是什么理论和什么行动的联系呢？大概是革命消沉，所以要找立宪主义的理论和……的行動的联系了。

六

唯物辩证法应用到社会现象方面，这“是社会学之中的科学方法，把社会认为一种活的经常发展着的有机体（而不是什么机械式的拼凑起来的東西，因此可以容忍各种社会元素的随便什么样的结合的），为着研究社会起见，必须要客观的分析那些组成这一个社会形式的生产关系，考察这种社会形式的功能和发展。”^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是要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里面，然后，假使这是关于一个国家的问题（……），那就要估计具体的特点——使这个国家和别个国家在同一个历史时代之中仍旧

是各不相同的那种特点。”^{①⑨}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只说明某一个历史过程的必然，而“唯物论者却确实的断定这种社会经济形式，以及它所产生的对抗的关系。……客观主义者只说‘不可克服的历史倾向’；而唯物论者说明那一个阶级——是‘管理’这一个经济秩序的阶级，它在造成别一些阶级的反对行动的某种某种形式。”唯物辩证法不限于指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又要说明：究竟是那一种社会经济形式给了这个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容，究竟是那一个阶级决定这个必然。这就是认清“发展是相反者的斗争”这个基本原则。这样，才是真正应用列宁所指出的辩证法的四个规律：第一，从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作用”上去研究；第二，从发展，“自我运动”，变更之中去研究；第三，把人的实践当做真理的范畴，也当做决定人所需要的联系的实际标准；第四，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②⑩}（《列宁文集》旧版第十八卷，上册，五四页。）这里，很清楚的包含着“找着每一个时机”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具体的去解决问题，同时，实际的和人的行动联系起来。总之，唯物辩证法不但要认识一切是变动的，而且要认识变动是从数量上的渐变进到质量上的突变的，不但这样，还要认识变动（发展）的基础是“统一”的内部矛盾，它的“自我”的相反倾向之间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的发展，是在各方面和一切联系之中的；可是，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区域（国家）、每一个时机，这种斗争的发展，都有它的最重要最特殊的具体问题，必须用实践的行动去找着这种特点，然后是用“阶级的力量去决定历史发展的必然”的行动的方针。

七

王礼锡先生也引了列宁的四个规律；然而他的举例之中，怎样应用辩证法的规律呢？他只“应用”各方面和一切联系的规律来断定中国经济的性质是“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社会”。这里，中国的封建残余突然的没有了，——这个“突变”什么时候发生的，怎样发生的呢？中国现在有没有“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呢？中国的农民和地主的斗争，以及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这两种性质不同的阶级斗争，怎么样具体的联系着，怎么样工人的斗争领导着农民的斗争？……所有这些问题，王先生都不管的，他只管“资产阶级照着自己的模型改造中国”。但是，他忘记了：资本主义的初期固然资产阶级的发展否定封建的生产关系，然而帝国主义财政资本侵略殖民地的时期，却产生了“新的规律”，财政资本维持着封建关系，照着自己的奴才的模型来改造中国了。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是要由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产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去领导封建剥削的束缚之下的小农群众的阶级斗争，是要这些斗争的发展引导到革命胜利的突变，方才能够改变中国的经济性质，把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变成脱离帝国主义而解放的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社会。

王礼锡也许以为：一、既然一切都是变动的，那么，中国已经早就从封建残余统治的社会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了；二、既

然变动的过程之中是有突变的，那么，中国的资本主义关系的数量上的发展，——不问它的发展程度怎么样，——自然而然的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突变”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了；三、既然“封建社会中孕育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意义仅仅只限于这一点，——资本主义逐渐壮大，终至于脱胎而出，”那么，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然也已经脱胎而出的了。至于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怎样结合着商业高利贷资本，怎样受着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支配和维持，怎样阻碍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以致于民族工业资本也始终暴露了和帝国主义资本混合生长的趋势，这样，封建地主阶级正是“管理”这个具体的经济社会形式的阶级，资产阶级成为它的附庸，而无产阶级取得对于反抗地主阶级的农民的领导权，而成为决定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必然”的力量。——至于这种中国经济在现在的具体的环境之中的性质，王礼锡先生是不问的。他只说“不可克服的历史倾向”是“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出”。这样，王礼锡先生的“应用”联系的规律也是违背辩证法的诡辩法和折衷主义，他把上面所说的一切具体的实际的问题，阶级斗争的问题撇开，而简单化的讲“联系”：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所以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中国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又因为中国既然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所以中国是半殖民地；这样两面“联系”（拼凑）起来，就得出一个“中国是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社会”！

* * *

王礼锡先生喜欢引列宁的话，我也不能够不再引一段列

宁的话来做结论：

“史德鲁威主义^①不仅是一种俄国的倾向，最近的事变尤其明显的表示出来：这是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一种国际的倾向，要想‘用软化手段’来杀死马克思主义，用拥抱来挤死它，就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真正科学’的方面，而除出它的仿佛是‘鼓动的’，‘武断的’，‘白朗吉主义’^②的乌托邦的方面〔注〕，换句话说来说，就是从马克思主义之中采取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所能够接受的一切，一直到为着改良的斗争，一直到阶级斗争（除出无产阶级专政），一直到‘一般的’承认社会主义的理想，要用‘新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而‘只’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心灵，‘只’抛弃它的革命性。”^③

王礼锡先生的“辩证法”，使人更加相信“史德鲁威主义”不仅是俄国的倾向，而且是国际的倾向了。

A. T. T.

注 释

① 王礼锡，见本卷第429页注⑤。

② 胡秋原，见本卷第429页注⑥。

③ 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1856—1918），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在政治上日益右倾，后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著有《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论艺术》（又名《没有地址的信》）等。

④ 克腊替尔，今译克拉底鲁（Kratylos，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

〔注〕 白朗吉主义在中国的通行名称是盲动主义。

⑤ 柏拉图(Platon, 公元前427—前347),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著有《辩诉篇》、《普罗塔戈拉篇》和《共和国》(即《理想国》)等。

⑥ 赫拉克利图斯, 今译赫拉克利特(Herakletos, 公元前五世纪), 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著有《论自然》, 今存留片断。

⑦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哲学全书》、《逻辑学》、《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讲演录》、《美学讲演录》等。

⑧ 今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⑨ 实验主义, 即实用主义, 一种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潮, 以美国詹姆士·杜威为代表。20年代末, 通过他的学生胡适等人在中国传播, 在当时知识界有较大的影响。

⑩ 彭述之, 见本卷第434页注⑩。

⑪ 李季, 托派, 长期从事翻译工作。

⑫ 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136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⑬ 今译文参见《资本论》《第二版的跋》, 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⑭ 《欧洲消息》杂志, 今译《欧洲通讯》, 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月刊。1866—1908年由斯塔修列维奇在彼得堡编辑出版。

⑮ 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526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⑯ 礼锡、晶清, 即王礼锡、陆晶清。

⑰ 国难会议, 见本卷第230页注⑧。

⑱ 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2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⑲ 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⑳ 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㉑ 史德鲁威主义, 今译司徒卢威主义, 又称合法马克思主义。它

的主要代表为司徒卢威 (Пётр Беригардович Струве, 1870—1944)。司徒卢威主义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竭力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再生产理论,否认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它是19世纪末俄国知识分子中流行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潮。

② 白朗吉主义,以路易·布朗基 (Louis Auguste Blanqui, 1805—1881)为代表的一种革命冒险主义思想流派。

③ 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62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

(一九三二年五月)

一

五四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但是，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早已投降了封建残余，做了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背叛了革命，实行着最残酷的反动政策。光荣的五四的革命精神，已经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仇敌。中国资产阶级在文化运动方面，也已经是绝对的反革命力量。它绝对没有能力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的任务——反帝国主义的反封建的文化革命的任务。新的文化革命已经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发动起来，这是几万万劳动民众自己的文化革命，它的前途是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似乎也已经感觉到这种危险。因此，他们现在要出来说什么“文化运动消沉”，说什么“智识阶级的使命”，说什么“继续五四的精神”。……这种呼声发现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并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因为资本主义的虚伪的民族主义，到这时期已经差不多破产得干干净净；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意识上的武器——所谓诸葛亮主义的买办性，已经暴露得没有丝毫余地。所以他们要想出来玩一套另外的把戏，企图用一些时髦的摩登化的空谈，欺骗

广大的民众。其实，所谓“智识阶级的特殊使命”，难道不又是一种变相的诸葛亮吗？资产阶级——地主帝国主义的奴才，绝对不能够领导什么文化革命，而只在进行着野蛮的愚民政策。现在一些自称“继续五四精神”的新式诸葛亮，也不过是实行愚民政策的别动队。

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能够继续伟大的五四精神的社会力量！

二

无产阶级决不放弃五四的宝贵的遗产。五四的遗产是什么？是对于封建残余的极端的痛恨，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是主张科学和民权。虽然所有这些抵抗的革命的倾向，都还是模糊的和笼统的，都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一切种种资产阶级性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但是，这种反抗精神已经是现在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不能够有的了。而无产阶级，却不放弃这种遗产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的彻底反抗封建残余和帝国资本主义的阶级，只有它能够反对着资产阶级，批判一切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类的腐化的意识，而继承那种极端的深刻的对于封建残余的痛恨，——用自己的斗争，领导起几万万群众，来肃清这种齷齪到万分的中国式的中世纪的毛坑！

俄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也有过相像的新文化运动。列宁说：六十年代派的宝贵的遗产，是他们的新文化运动（启蒙

运动)；第一“六十年代思想的大多数代表，也和西欧的新文化运动家一样……都极端的痛恨农奴制度及其经济社会法律上的一切副产物。……第二，当时俄国的新文化运动家，都竭力主张文化，自治，自由，一切欧洲式的生活，主张俄国的各方面的欧化。第三……他们能够主张平民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能够深信废除农奴制度及其一切残余，的确可以改良一般的状况；他们并且真心要想赞助农民的解放”……“这种宝贵的遗产我们是不放弃的！”①

中国五四时期的思想的代表，至少有一部分是当时的真心的民权主义者——自然是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者。中国的文化生活在五四之后，的确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五四式的新文艺总算多少克服了所谓林琴南主义②。当时最初发现的一篇鲁迅的《狂人日记》，——不管它是多么幼稚，多么情感主义，——可的确充满着痛恨封建残余的火焰。从此之后的三四年，虽然很快就发现了咒骂“丘九”(学生)的易家钺③，发现了鼓吹东方文明的梁漱溟④等等，然而新文艺的革命反抗的精神，还在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群众之中发展着。跟着，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自己的斗争爆发起来，所谓文化运动之中自然反映着阶级分化的过程，而表现着许多方面的斗争……直到“科学”、“民权”之类的旗帜完全落到了无产阶级的手里。

三

.....

现在，谁还需要文化革命呢？谁？

中国的绅商——地主资产阶级，再也不需要什么文化革命。“够了，算了罢！”如果真正几万万群众要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化生活，那么，一定要……一定要出清中世纪的毛坑。那还了得么！所以他们就放出各种各式的走狗。有些，自以为很巧妙的戴起马鹿民族主义^⑤的帽子，鼓吹屠杀政策，唱着像煞有介事的诗歌。可惜，这种纸老虎一戳就穿。有些，正在披起粉红色的外套，企图用更加巧妙的手段欺骗民众，要叫人家相信他们是负着特殊的文化使命的诸葛亮，仿佛他们是几万万“愚民”的教师，这些狗简直是急得发了疯了。它们正在拚命的叫喊，拚命的咬，为的是要咬死新兴的真正巨大的文化革命。它们的发疯，并不是因为痛恨吃人的礼教，而是因为痛恨“下流的流氓地痞”和“二十世纪的张献忠”。不用说别人了；就是五四时候最初主张推翻礼教的人，都听见乡下人劈掉神主牌位，打掉泥塑菩萨，就急得发疯，就拚命的反对，而且反对真正的民权主义，而要恭请绅商买办“一律平等”的来参加普遍选举的国民会议。对于他们——“科学”和“民权”的旗帜，已经早就丢在中世纪的毛坑里去了。从狂人到疯狗——这就是退回中世纪毛坑的人的一条道路。

固然，中国的绅商在这条路上，也学会了许多时髦。五四时候的绅士，还禁止自己的老婆和女儿剪头发等等。而现在，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地主绅士，中国的官僚军阀，至少也要姘几个披头散发的姘头——所谓摩登女郎。华贵的富丽的公馆里，居然也会陈设些未来派的直线主义的新式木器。至于

“黄金少年”，那更用不着说了。他们都很愿意做“被消遣的男子”——太太小姐的面首。这又有什么稀奇呢？非洲^⑥土人的酋长也会到巴黎去受法国资产阶级的荣华，印度的王侯也会学习最新式的英国跳舞。他们可并不因此就不是封建残余的代表，而完成了民权主义的革命任务！这正是殖民地的中世纪的毛坑，和帝国主义的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化，混合生长的腐化的现象。中国新文艺的礼·拜·六·派^⑦化，正是这种现象的必然的结果。现在买办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新文艺，自然不会再产生痛恨吃人的礼教的狂人，而只会产生些“被当做消遣品的男子”。从狂人到面首——这又是一条奇妙的道路。

这些疯狗和面首，还需要什么文化革命么？当然不要的了。他们自以为“文化”得很。他们或者是“民族意识”的代表；他们或者是艺术至上主义的神仙，他们或者是反对马路文学——礼拜六主义的健将，其实，他们自己就是“高级趣味的礼拜六派”。

四

五四已经过去了十三年了。这十三年中间，黄河、扬子江里的水也已经流过了不少了。中国的一切经过了……中国的劳动群众已经不是十三年前的劳动群众了，尤其是工人阶级之中——已经有了觉悟的先锋队。十年来的政治经济的斗争，锻炼出了绝对新式的“下等社会”里的“英雄”，这就是真正的群众的领导者。他们领导着群众的斗争，而群众里面也就不

断的产生着他们。这是中国社会里的绝对新的文化革命的力量。中国现在也只有反对着一切绅商的几万万劳动群众，才需要新的文化革命；也只有他们自己的斗争，才能够完成这种文化革命。他们的思想意识上的斗争——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和一般的政治经济斗争密切的联系着的。

中国的绅商和所谓“智识阶级”，——举例来说——难道还需要新的文学革命么？当然不需要。他们“接受了”五四的文学革命，“接受了”所谓白话文学的运动，而事实上，在这十三年来他们造成了一种新式的文言。这种新文言（现在的新文艺大半是用的这种新文言），仍旧是和活人口头上的白话不相同的，读出来是懂不得的。这对于绅商的“智识阶级”有什么妨碍呢？自然没有。他们正可以借此继续垄断着文学，把几万万群众仍旧和文化生活隔离起来。这可以巩固地主资产阶级的特权。然而劳动民众，可需要发展五四的白话革命，彻底的肃清文言的余孽，一直到完全废除混蛋糊涂十恶不赦的汉文。劳动民众自己口头上说的普通话，以至于各地方的方言，绝对的有造成中国真正的文学的言语的可能，绝对的不必依赖汉字，依赖文言。这是新的文化革命之中的新的文学革命。这虽然是一个部分的问题，却是极端重要的问题。

绅商的“智识阶级”既然自命为“智识阶级”，那自然是比平民高出一等的人物了。所以他们除诗、古文、词、四六电报^⑧之外，造出了一种新文言的“深奥而高妙”的新文艺。什么表现主义，后期印象主义，……一直到“魔道主义”，样样都有；他们是要“找寻刺激”，他们是要模仿没落颓废的或者发狂的

吃人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艺术。这是他们“自己的消遣”。而同时，煽动着乌烟瘴气的武侯主义、岳飞主义……的反动的大众文艺，从说书小唱直到电影；这是“为民众”的艺术！这是他们摆下的迷魂阵。他们会在“大众文艺”之中来反对礼拜六派吗，来反对大众文艺之中的林琴南吗？当然不会。当然不需要。他们也许认为这是艺术上的最适当的分工呢。但是，劳动民众可需要反对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劳动民众要自己创造革命的普洛的大众文艺，要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伟大的艺术，要同着群众去运用国际的无产阶级的经验，取得理论上的武器。这种新的文艺运动是开始了。这是五四之后的一个真正新的文化革命的浪潮。

五

劳动民众的文化革命，是一个巨大的一切战线上的战斗。这里所说着的，只是文学方面的大致的阵势。然而最主要的是：这种文化上的战斗，是和一般政治经济的斗争联系着的，是总的革命斗争之中的一个队伍。

五四之后的现在，正是革命进到了新的阶段的形势。世界的和中国的一切力量，正在巨大的剧烈的战斗之中。

记得五四时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里，最初发生了国际主义的呼声。于是乎中国的“民族圣人”就发急起来，他打起号筒大声疾呼的说：民族主义是吃饭的家伙，而国际主义只是靠不住的发财彩票。但是，现在的事实呢？国际主义的国

家，却已经走到了经济兴盛的时期，而且是真正劳动民众的经济的繁荣，真正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真正能够打击一切帝国主义的进攻的企图。而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实质——不抵抗的奴才主义，假抵抗的投降主义，就算是吃饭家伙了罢。因此，一切帝国主义联合着积极的进攻那个“国际主义的国家”的时候，中国的民族主义也赶紧奉送满洲给他们做战场。中国的劳动民众不能够容忍这种卖国的民族主义，不能容忍那种屠杀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的战争。中国的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反对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军阀的战争，——他们偏偏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之下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他们知道这是解放自己的唯一的道路。

五四时候，最初发现了阶级斗争的口号。自然，“民族圣人”更加发急，他号召着民族主义，他说中国民族之中只有大贫和小贫而没有什么阶级，他说阶级斗争是社会的病。现在呢，圣人的信徒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了飞机绿气炮，得到了大炮机关枪，——这些杀人家伙，自然不能够用去打帝国主义，他们就用来医治中国民众的阶级斗争的病！这也是为着民族主义，为着维持诸葛亮的政权，为着维持岳飞式的不抵抗主义。但是，劳动民众只有发动更广大的斗争，一直到赶掉一切种种的诸葛亮，剥夺一切绅商地主资本家的政权而实现真正的民权。只有这样，中国民众才打得退帝国主义的军队，才解放得了中国民族。解放中国民族的，恰好只有阶级斗争。

五四时候，最初发动了白话文学运动，要想废除文言，要想废除汉字。中国的“民族圣人”自然也反对这种运动，他说

中国文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精华。许多绅商阶级的文人，其中还有最初白话运动的健将，现在还模仿着诸葛亮的《出师表》，大做其通电、宣言、训辞……至少也要用不文不白的新文言写几百首半通不通的新诗。这未始不是圣人的功劳。但是，中国的劳动民众，都需要根据自己口头上的说话，造出绝对白话的新中国文。只有这样，——完成民权革命的“创造民众的文字”的任务，——才能够开展新的文化革命的斗争，几万万民众将要运用这种文化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工具，而建立新社会的文化。这又是反对着“民族圣人”的。

总之，五四是反对中国圣人的运动，现在的文化革命是在新的基础之上反对新的中国圣人的运动。

六

新的文化革命之中，革命的文艺运动将要是一般革命斗争的强有力的队伍。它应当反对一切封建残余的文化上的束缚，肃清封建残余对于群众的意识上的影响，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奴才思想，这样去彻底的完成五四所开始的伟大的斗争。新的文学革命——绝对的白话文和用罗马字母写的中国文的实现，不过是这个任务的一部分最低限度的一部分，必须积极的有系统的为着这个去斗争。它还要开展自己的斗争，不但反对封建残余、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思想上的压迫，而且要反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它要创造广大群众的革命文艺，要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批判一切反动意识，

而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要使这种革命文艺成为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当前的文艺创作的方针，一定要能够表现革命战斗的英雄，——革命的民族战争里的群众，反军阀的战争里的群众，一切阶级战斗里的英雄；一定要能够揭穿一切种种假面具；——地主买办和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要揭穿他们的真相，要暴露他们自欺欺人的意识。这是文化革命之中的锐利的武器，这也是赞助一般革命斗争的任务。

五四是过去的了。文化革命的领导已经落到了新的阶级手里。今年这种剧烈战斗的年头，文化战线上的战斗正在开展着许多新的方面。中国式的中世纪的毛坑，以及中国买办和资产阶级的奴才性的“精神文化”，应当同着绅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扫除得干干净净！

原载1932年5月20日《北斗》第2卷第2期

署名：易嘉

注 释

① 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12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林琴南(1852—1924)，名林纾，福建福州人。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翻译家。五四运动时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人物之一。

③ 易家铨(1898—1972)，字君左，湖南汉寿人。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五四”时期，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6年参加北伐。以后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任职。

④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广西桂林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为鼓吹东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1927年从事乡村建设运动。1937年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1940年参与组织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称民主同盟)。建国后任全国政协委员。

⑤ 马鹿,日语中的汉字,愚蠢的意思。1930年6月,上海一批反动文人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标榜“文艺的最高意志”就是所谓“民族主义”,反对文学的“阶级意识”,被称为马鹿民族主义。

⑥ 非洲,今译非洲。

⑦ 礼拜六派,辛亥革命后出现的一种文学流派,因出版《礼拜六》杂志而得名。他们大量发表描写才子佳人的小说,又称鸳鸯蝴蝶派。

⑧ 近代人拍电报,有采用四六文体的,称作四六电报。四六文是骈文的一体。骈文全篇以双句为主,讲究对仗和声律,其以四六字相间定句者,称四六文。

马克思和昂格思

(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

马克思和昂格思^①都是德国莱因省^②人。莱因省在当时是德国工业最早发达的区域，因此，也是受着法国大革命影响最大的区域。马克思、昂格思的前辈，他们的父亲和伯叔，都是和法国大革命同时代的人，多少都已经在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影响之下生长的了。那时正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封建的宗教的思想和资产阶级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斗争正在剧烈的开展着。可是，马克思和昂格思两个人儿童时代的命运却有很大的不同。

马克思的父亲很受着些法国十八世纪唯物论哲学家的影响，他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宗教，可是他抛弃了犹太教，改信了耶稣教。而且他的改教，目的是在于避免犹太旧教的繁重的仪式，而借着新教的简单轻便的形式，遮盖自己的无神论的倾向。马克思幼年就受着这种无神论的唯物论的教养。他的不信宗教，并没有和家庭发生什么冲突。马克思在中学里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有一次，先生出了一个题目：《青年人怎样选择自己的职业？》叫马克思做文章，马克思的文章里，说明一般人不能够自由的选择职业，因为每一个人生

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在客观环境的影响之下，这种影响可以预先决定青年选择职业的方向。这里，就已经有了唯物史观的萌芽。

昂格思的父亲就不同了。他是个很忠实的耶稣教的信徒，他反对法国革命的哲学思想，而且强迫他的儿子信教。可是，这位老头子的真正的信仰却是经营工商业，积聚资本。因此，昂格思和他父亲之间就常常发生冲突。昂格思在十七岁的时候，就被他父亲送到一个商铺里去“学生意”。他当时写信给自己的同学和朋友，常常提起这个问题，说起他怎样奋斗，怎样反对那些市俗的影响。不久，他就脱离了宗教，开始做文章，主张革命的科学和哲学的观点。

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就受着了黑格尔^③哲学的教育，成为当时所谓“少年黑格尔派”^④。他们从黑格尔哲学之中，得出一切方面的革命的激进的结论，对于政治、宗教、法律都加以重新估定。一八四一年，他二十六岁的时候，在大学里毕业，得到了博士的学位，就开始著作家——新闻记者的生活。

昂格思比马克思小两岁。他在十八岁的时候已经是著名的著作家，常常投稿到各种杂志上去。他二十岁到柏林，加入炮兵禁卫军。这里，他也成为“少年黑格尔派”。他们两个人的认识，大概也在这个时期。

马克思在大学毕业之后，来本预备研究哲学和科学，做大学教授。但是，因为德国当时的教育当局非常的反动，凡是自由思想的，尤其是唯物论派的教授，都被禁止讲授，所以他就抛弃了这个志愿。恰好，这时期莱因省的资产阶级办了一个

《莱茵新闻》^⑤，是反对政府的；这个报请马克思去当主笔。一八四二年之后，马克思就住在柯恩^⑥编辑《莱茵新闻》，昂格思也在这报上常常投稿。这个报可以算是当时激进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报纸。马克思和昂格思等等的革命思想，就在这报上开始和德国的反动思想宣战。当然，那时他们都还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不久，德国政府下命令禁止马克思当主笔，随后就封闭了这个报馆。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开始建立他的新学说；一八四四年他同一个朋友，名字叫鲁格^⑦的，同到巴黎，出版《德法年鉴》——这是他最早说明他的学说的著作，他就从一个激进的民权主义者变成共产主义者。

当时德国的知识阶级的青年正在“两个时代的过渡之间”，大家都在寻找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都在企图改造德国，要求思想的自由。马克思就指示出来：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解放德国的民众，他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但是受苦的阶级，而且是积极斗争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他和昂格思著的《神圣家庭》^⑧（一八四四年），就是反驳当时德国知识阶级青年的各派思想的著作，指出那些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浅薄，而提出无产阶级的问题。马克思和昂格思开始在哲学方面和社会科学（经济学）方面，建立无产阶级的学说辩证法的唯物论、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他们反对乌托邦的社会主义^⑨（反对普鲁东^⑩、反对韦德林^⑪……），而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非常注意群众的生活，还是《莱茵新闻》的时期，他就详细的描写和研究他家乡的农民群众。到了

这个时候，自然一开始自己的社会主义的运动，就竭力的和工人群众发生关系。昂格思也是这样。

他们两个人决不是单单在书房里研究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是实际的社会运动家，他们——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一八四四——四五年）就开始组织工人的团体，领导他们的斗争。同时，他们和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别开始理论的斗争，锻炼出无产阶级的理论的武器——整个的新宇宙观，科学的社会学说。

马克思和昂格思先在比利时京城组织了“工人文化会”，宣传社会主义。那时，因为法国政府驱逐马克思，他在巴黎也不能够住了。渐渐的，马克思和昂格思在巴黎、伦敦、比利时京城都组织了共产主义的团体，叫做“通信委员会”^②。一八四七年夏天，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没有出席，昂格思代表巴黎的委员会出席的；这次大会之后就成立了统一的国际的“共产主义联合会”^③，通过了章程，这章程的第一条就说：

“本会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消灭那种根据于阶级对抗的资产阶级的旧社会，而创造没有阶级和私有财产的新社会。”

这个会里出版了一种《共产》杂志——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工人阶级的机关报。这杂志只出了一期，现在在地球上还保存着三本，一本在莫斯科，还有两本大概在德国。

这个会的第二次大会，是在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底在伦敦召集的。这次大会决定委托马克思和昂格思起草《共产党宣

言书》。宣言书在一八四八年三月写成，马克思和昂格思的青年时代的结晶正是这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书》。昂格思关于这宣言书的主要思想，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宣言书的主要思想是说——经济生产以及经济生产所决定社会结构是每一历史时期的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基础；因此，自从原始共产式的土地占有制度分解之后，整个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在社会发展的各种阶段上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受治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历史；现在这种斗争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阶段，在这阶段上，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假使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久脱离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那么，它自己也不能够脱离剥削它压迫它的阶级，——这个主要思想本来是完全属于马克思的。”^①

马克思主义现在已使地球的六分之一的地方脱离了资本的统治；那里是无产阶级解放着自己，同时，解放了广大的农民基本群众，解放了一百多种被压迫的民族，解放了妇女，解放了人的头脑——脱离种种宗教迷信和伪科学的束缚。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在集体农场运动之中，脱离私有财产制度和私有者的利己主义思想的束缚；无产阶级领导着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向着“没有阶级的新社会”前进。

原载 1932 年 6 月 1 日《中学生》第 25 期

署名：范易嘉

注 释

① 昂格思，今译恩格斯。

② 莱茵省,今译莱茵省。

③ 黑格尔,见本卷第 520 页注⑦。

④ 少年黑格尔派,即青年黑格尔派,是代表资产阶级激进要求的哲学派别。

⑤ 《莱茵新闻》,即《莱茵报》,即《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由莱茵省的一些工业家和商人集资创办。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任该报主编,1843年3月退出编辑部。

⑥ 柯恩,今译科隆。

⑦ 鲁格,今译卢格(Arnold Ruge,1802—1880),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属于青年黑格尔派。著有《文集》十卷。

⑧ 《神圣家庭》,即《神圣家族》,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1844年9—11月写成,1845年2月在法兰克福出版。

⑨ 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即19世纪初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

⑩ 普鲁东,今译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著有《什么是财产?》、《贫困的哲学》等。

⑪ 韦德林,今译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1808—1871),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主要著作有《和谐与自由的保障》。

⑫ 通讯委员会,即1846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创建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其任务是同各国社会主义团体和个人建立经常联系,交换意见,宣传科学的共产主义观点。

⑬ 共产主义联合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6月在伦敦创立的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秘密革命组织。

⑭ 今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列 宁

(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

列宁是二十世纪的伟大的人物。可是列宁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青年时代也和普通人的青年时代一样，是决定他一生事业的时期。当时社会运动科学发展的一般程度，劳动民众的斗争——世界的和俄国的阶级斗争的形势，社会经济的关系，都影响到他，影响到“列宁主义”形成的途径。列宁是同着时代、阶级、群众而发展的。他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社会革命的领袖，就是因为他没有故意制造自己的领袖地位，从没有觉得自己应当和普通人特别不同些；他只是群众中的一分子，只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他努力的工作、组织、研究、战斗，只是为着团结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发见社会关系发展的公律和每一个时期的特点，而决定大家行动的方针，勇猛的，坚定的，刻苦的，精细的，热烈的领导着群众去斗争。

列宁从没有自己要做领袖的那种英雄主义，他从没有像一些可笑的伟人似的，自以为是站在群众之上的先知先觉，或者是什么圣人，是道统的继承者等等。可是，他也决不是庸俗的无聊的市侩，他的眼界当然超出于个人的饭碗问题，超出于个人的幸福问题以外几千万万里。他的青年时代，不会是

“烦闷”，找寻“激刺”，或者“学习钻研”的时代。

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伊里茨·乌梁诺夫^①也是个革命党人，他在圣彼得堡^②读书的时候，参加复活“民意党”^③的运动，加入了秘密的学生革命团体。一八八七年，他和许多同志准备那年三月一日暗杀俄皇亚历山大第三^④。可是，这个计划在当天被警察破获了，捉了好些人去。列宁的哥哥也被捉去，就在那年五月八日处了死刑，被绞死了。

那时候，列宁正是十七岁的青年。他哥哥从小就很聪明，喜欢研究自然科学，后来又开始研究社会经济学。他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还是所谓民意党的暗杀主义者，可是，已经开始研究马克思。列宁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受到他哥哥的影响，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很努力的研究。列宁最早读的那一本《资本论》第一卷（手钞的）还是他哥哥留下来给他的。他哥哥的被绞死，当然对于他有很大的影响。俄皇政府对于革命斗争的残酷的压迫，不能够不震动十七岁的列宁的强烈的革命情绪。

他哥哥死了之后不久，他就在中学毕业了，进了卡赞大学^⑤的法科，可是，几个月之后，就因为“闹风潮”被开除了。列宁因此只能够自修，一面准备去考律师，一面开始刻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到一八九一年，圣彼得堡大学举行国家律师考试的时候，列宁考取了。一八九二——九三年，他就在萨马腊^⑥当了一年多的律师。后来，秘密的革命工作一天天的紧张起来，他就没有可能再兼做律师了。

他二十三岁的时候（一八九三年秋天），就搬到了圣彼得

堡(现在的列宁城)加入当地的工人团体,开始组织工人。这些工人团体——社会主义的研究会,不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组织群众的实际斗争。列宁虽然在那时候已经是一个真正有科学训练的学者(他那时就著了《什么是平民的朋友》^⑦一部批驳民粹派^⑧的乌托邦主义的书),但是,他决不是那种学究主义书呆子,他立刻就能够注意到最切实的社会现象,注意到群众日常生活的实际斗争。譬如他在这个时候做的《论罚金》^⑨,就是分析工厂里扣罚工资的“小”问题。他具体的指出某某工厂某某企业的罚金制度的剥削,指出这种剥削的特点。这种具体的研究和实际的对于斗争的指示,是非常之可以宝贵的精神。

不久,列宁就到瑞士去,和普列汗诺夫^⑩等的劳动解放社^⑪接头。劳动解放社是俄国最早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团体。可是,当时工人的组织还没有形成。列宁的提议,是要在全国组织工人的政党,统一的互相联络的一致行动的工人先锋队的组织。这是俄国共产党的开始。列宁从瑞士回国之后,就实行这个计划。首先在圣彼得堡成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联合会^⑫。

但是,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列宁就被警察“发现”了。从那时候起直到他充军期满(一八九六——一九〇〇年),列宁的青年时代的最后一个时期,——是他的最大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的时期。

列宁写这部著作的时候,正是他在监狱里在充军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

列宁在监狱里的时候，就开始收集材料，托朋友到处借书借统计报告，很刻苦的研究、摘录，当时俄国监狱里虽然野蛮得很，可是书还是可以拿进去的。因此列宁的房间里常常堆着许多书籍和统计图表。照例，宪兵队的检查官每礼拜总要搜查政治犯的房间一次。在列宁房间里，这些军警官僚常常要发见许多统计表，他们自然都要翻一翻，看有没有“违禁物品”和“秘密夹带的文书”。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自己捧着的俄皇政府财政部、农业部、工商部等的统计报告册里面，会发生一种最巨大的力量——终于把俄皇政府和资本主义推翻了。真没有料到！自然，现在的东西洋各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包探军警有了最近三十年的经验，比当时的俄国宪兵要聪明得多了。然而在当时，那些俄皇的宪兵官僚却很大意的说笑话呢。有一次，列宁和他妹妹在监狱会客处会面的时候，他对他妹妹说：

“前天宪兵军官来查房间，看见壁角落里堆着一大堆的统计报告册，还有我自己摘录的图表、数目字等等。他就拿在手里乱翻一顿，还说：今天天气太热了，弄这些统计真是干不了……”

哈哈，现在白俄大概都在后悔了——当初若是把列宁关在赤道的监狱里，叫他热得简直没有办法，也许俄国资本主义不至于推翻了罢。（？）

可是，在彼得堡的监狱里，还可以到图书馆里去借书，等到充军到了西伯利亚，收集材料就更加困难了。所以列宁当时赶紧的整理材料，要想在审判厅判决以前完成这第一部分

的工作。同志通知他，说他的案件快要结束了的时候，他还大叫起来：

“啊呀，太早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把材料整理好。”“可惜，放我放得太早了，我还要稍微整理一下，研究一下，到西伯利亚去了，要找书籍就难了。”

列宁在监狱里还写许多传单、小册子，鼓动的文章，第一次大会的党纲草案。这些是不能够给“牢头禁卒”看见的。因此他用面包心做了小小的墨水瓶，里面装着牛奶，用来写字。房门口一有响声，他就把“墨水瓶”向嘴里一塞，吃到肚里去。有一次，他从监狱里写信给同志说：

“今天太饱了，一天吃了六个墨水瓶！”

到了西伯利亚之后，大部分的材料已经收集好了。他就开始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用普通的学生练习簿，写得密密层层的小字。一本写完之后，就送给同在西伯利亚的同志去读（例如克尔日让诺夫斯基^⑬等。）他们读了就提出疑问和意见。列宁对于这些意见都注意的考虑过，有必要的时候就修改。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原稿，据说比出版的要多一倍。因为列宁自己竭力的要紧凑，要严密，所以删掉了许多次要的部分。

列宁在西伯利亚的时候，他桌子上总放着一个普通的算盘，统计数目字的表格、百分数、比较表等等，他大半都要用这个算盘算过一次。这种精细的工作方法，是列宁的特点。中国现在一些“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自命为马克思主

义者,甚至于列宁主义者的,他们发表自己的“大理论”,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却是乱抄统计表。列宁当时就笑民粹派的著作家,例如卡雷塞夫^④之类的“研究工作”,他说:

“卡雷塞夫先生不是用笔写字的,他的文章是用剪刀写的。”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概是一八九八年末写完的,第一版是在一八九九年四月初出版的。此后不久,列宁的充军期限就满了(一九〇〇年)。他从西伯利亚回到彼得堡附近的普史珂夫^⑤。从此,他继续着以前的反对民粹派的斗争,反对党内的“经济主义”^⑥的斗争(那还是在西伯利亚开始的),进到反对孟塞维克的斗争,准备着党的力量,整理着阶级的队伍,迎着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往前进了。

列宁的青年时代是这样的决定了他一生的事业。

原载 1932 年 6 月 1 日《中学生》第 25 期

署名: 范易嘉

注 释

① 亚历山大·伊里茨·乌梁诺夫,今译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 1866—1887)。

② 圣彼得堡,即彼得格勒,旧俄首都。1924 年列宁逝世后,改称列宁格勒。

③ 民意党,见本卷第 469 页注^⑨。

④ 亚历山大第三(Александр III, 1845—1894),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次子,1881 年 3 月继承皇位。

⑤ 卡赞大学,今译喀山大学。

⑥ 萨马腊，今译萨马拉，1935年改称古比雪夫市。

⑦ 《什么是平民的朋友》，即《什么是“人民之友”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写成，是列宁批判俄国民粹派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纲领的一部重要著作。

⑧ 民粹派，见本卷第469页注⑩。

⑨ 《论罚金》，今译《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

⑩ 普列汗诺夫，今译普列汉诺夫，见本卷第519页注③。

⑪ 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于1883年在瑞士日内瓦创立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

⑫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联合会，即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于1895年联合彼得堡二十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织创立起来的革命组织。

⑬ 克尔日让诺夫斯基，今译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 1872—1959)，苏联老一辈共产党活动家、著名学者。1893年参加革命运动，曾与列宁一起组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5年12月被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1901年回到萨马拉，积极参加1905—1907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工作。

⑭ 卡雷塞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арышев, 1855—1905)，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地方自治活动家。赞同自由主义民粹派观点。

⑮ 普史珂夫，今译普斯科夫。

⑯ 经济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

托洛茨基

(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

托洛茨基^①是世界闻名的伟人。他只不过是伟人，他曾经参加过一二十年的革命运动，十月革命前不久加入俄国真正工人的政党。他参加了十月革命，而且他的参加是像煞一个领袖的参加，他和群众是少有联系的。他自己承认他的“超出”于群众之外，站在群众之上的态度，是他青年时代就有的“伟人”的性格。

“我第一次陷入了十字歧途，那时代连我这样一个十七岁的孩子都稍微纠缠着政治问题了。……就是到后来，我的革命思想初初形成的时候，我自己还坚持着不相信群众行动的态度，对于革命还是书本上的空洞的了解，在实质上是怀疑的观点。……每一件有害的事实，也有小利的地方。我自觉的在内心里克服这种八十年代的反映，但是，大致这事实使我对于群众行动问题有了更慎重的，更具体的，更深刻的了解。”（托洛茨基的自传《我的生活》——德文版。）

凡是不相信群众的人都是很相信自己的，甚至于过分的崇拜自己，恋爱自己。难怪托洛茨基要以为“不相信群众”的态度对于他还是有利的，因为他可以这样站在群众之上去“更

慎重的更深刻的更具体的”教训群众。

当托洛茨基还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他曾经替一个不相干的同学抱不平，哄动了全班学生反对一个法文教员。他的自传里说：

“在众人中间，我的地位不算小，或者是第一位……一致行动起来，就是当教员离开教室的时候，配合着教员的脚步的音节，发出一种哼哼声，这种声音是闭着嘴哼出来的，因为这样就谁也不晓得究竟是谁干的把戏。”

这样的把戏闹了之后，教员自然惩罚了一些平素淘气的孩子，却没有猜着是托洛茨基领导的，因为托洛茨基是品行学问很好的学生。但是，过了一天有一个同学自首了，把托洛茨基领导的事实招供了出来。于是乎托洛茨基就被“打倒”了。他现在的自传里写着：

“昨天，我还是一个和第二名离得很远的第一名的学生……而今天我却被打倒了，……开除了，不过还保留重新回到学校去的权利。……我过了一个不安静的夏天，时常吵闹，回到奥地萨^②的时候，离开恢复学籍的考试只有两个礼拜了……我被录取到第三年级。这一班里，我遇见的大部分的学生仍旧是那些出卖过我的，或者拥护过我的，或者袖手旁观的。……”

这也可以说是我第一次的政治经验。在这件小事情的周围，形成了三个派别：诽谤者和猜忌者站在一边；光明磊落的小孩子站在另外的一边；中立的，动摇而不坚决的群众站在中间，这三个派别完全没有消灭，……我在日后的生活中间，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之

下时常遇到他们。”

托洛茨基在自传里写这一段话——关于他的所谓第一次政治经验的话，真正不胜感慨之至。他是伟人，他对于一切派别的分析，并不用科学的方法，而只要用他的“伟人的自我”做中心，来决定派别的界限：出卖“我”的是一派，拥护“我”的是一派，旁观的中立的群众又是一派。

这种青年时代的英雄伟人主义，蔑视群众的态度，——托洛茨基拿来解释他的一生事业。据他说，他一生的斗争处处都碰到这三个派别。

托洛茨基自己说：他在“早年生活之中反对革命，后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以及曾经有几年反对列宁”（见他的《我的生活》）。其实，他的反对革命不只在早年。他的反对列宁也不只“曾经有几年”。他后来的参加革命，又反对真正革命的策略，之后，又来参加革命，出力赞助十月革命，接着，又反对十月革命的前进，——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可是，主要的是他拿他自己做中心：革命和群众对于他有用处，可以“证明”他的学理，那么，他是和革命同路的；革命和群众反对他，“违背”他的理论，那么，他自然是要反对革命的。

托洛茨基是一八九六年开始参加革命运动的，那时他十七岁。他开始接触学生的秘密革命团体，认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以及“民粹主义的”青年。最初他赞成民粹派^③，写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派”争论。后来他才渐渐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因为他受了当时工人运动的影响。他经过监狱、充军，那时俄国革命青年的命运，差不多极大多数

的人都是这样的。他的政治生活之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一九〇三年参加列宁办的《火星》杂志④的编辑。

列宁曾经觉得托洛茨基是一个有些才能的青年（托洛茨基比列宁小十岁），可以希望他受着正确的革命教育和训练，能够对于革命有些用处。因此，列宁提议叫他正式参加《火星》的编辑委员会。可是，列宁当时就发见托洛茨基的性格，他写给普列汗诺夫⑤的信上说：“拒绝推举托洛茨基我以为是不应该的，最笨的方法，因为托洛茨基很不满意，他已经向我表示（自然并不是直接说出的），他在这一般的环境里，所有的人都还轻视他（他是这样想），还当他青年看待。”结果，普列汗诺夫反对，所以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以前没有正式加入委员会。第二次大会上，他是不赞成列宁的主张的。为什么呢？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里说：

“这时候（还在大会之前），在我的眼光里看来，他（列宁）是在图谋着编辑委员会，而编辑委员会对于我是一个整个的，是有了光荣的《火星》的名字的。所以关于分裂委员会的意思，对于我是渎犯神圣的，……列宁的结论是：要取消他们（萨苏里茨⑥、亚克雪洛德⑦等孟塞维克）的领导地位。我对于这个意思是不能够同意的。我的意思就是反对这种铲除老领袖的办法……我这种抱不平的意见就使我和列宁在党的大会分裂。”

这样，当布尔塞维克和孟塞维克最初分化的时候，托洛茨基是站在孟塞维克一边的，而且据他自己说：他的动机并不在于政纲章程的原则问题上，而至要的是在于反对铲除“老领袖”。他觉得当时列宁的行动是“不许可的，可怕的，叛逆的”。

是对于什么的叛逆呢？对于机会主义！

此后，不久就是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托洛茨基二十五六岁，他做了当时彼得堡苏维埃的主席。但是他发明了一个理论，叫做不断革命论，说俄国革命不会是民权主义的革命，要一下子就进到社会主义革命；说农民已经分化，不会整个群众的起来推翻地主和封建残余，而农民小资产阶级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不能和工人联盟的。这个理论的确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基础。他因此就说革命成功之后，农民群众都要反对工人阶级，俄国工人阶级仍旧要失败，不能够建设什么社会主义，除非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都革命起来，用“欧洲先进的文明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力量来帮助”。

他的自传里说到这个一九〇五年时期，说他自己发明了不断革命论之后，就：

“直觉的觉到我的学习时期已经过去……以后的学习，不是学生的学习，而是先生的学习了。”

从此之后，托洛茨基主义成熟了，托洛茨基当了先生了，他企图拿他自己的主义来教训群众，教训列宁。这个主义当然是托洛茨基的，不是列宁的。现在托洛茨基否认有什么“托洛茨基主义”，他自称是“列宁主义”。但是，这是他的客气、谦虚。伟人有的时候总是格外过分的谦虚的。像中国的道学家似的，他们总要说，“自惭德行浅薄，不足以感化愚蒙，”其实，这种人总是所谓“圣贤”。

总之，托洛茨基的青年时代——他所谓“学习时期”的结

果,是形成了他的“托洛茨基主义”。

原载1932年6月1日《中学生》第25期

署名:范易嘉

注 释

① 托洛茨基,见本卷第31页注⑩。

② 奥地萨,今译敖德萨。

③ 民粹派,见本卷第469页注⑯。

④ 《火星》杂志,即《火星》报,俄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1900年12月创刊于德国。该报在列宁领导下出版51期。从第52期起至112期成为孟什维克机关报。

⑤ 普列汉诺夫,见本卷第519页注③。

⑥ 萨苏里茨,今译查苏利奇(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Засулич, 1849—1919),俄国著名女革命家。1883年与普列汉诺夫共同创立劳动解放社,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成为孟什维克首领之一。

⑦ 亚克雪洛德,今译阿克雪里罗德。见本卷第336页注⑭。

当前的问题*

(一九三二年)

(一)

一,满洲事变^①之中,列强帝国主义准备瓜分中国和进攻苏联的战争的形势,非常之明显的表演出来。上海的和哈尔滨的“战斗”^②不过是这种大规模战争的整个准备工作里的两幕显著的事实。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的世界就已经陷于根本的危机之中——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力量的生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建立,都是国际帝国主义的致命伤。现在资本主义的根本危机已经发展到了第三时期^③。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深入一天天的厉害,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却有极大的成绩,五年计划在四年之内可以成功,这六分之一的地球已经进到了社会主义的时期。帝国主义的旧世界对于社会主义的新社会自然积极的准备战争,企图用战争的手段挽救自己的危机。同时,为着征服“叛变”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

* 本篇论文没有发表过,这里根据杨之华所存抄件刊印。从内容看,写作时间当在1932年。

劳动民众，列强帝国主义用尽一切手段，直到大规模的直接的屠杀政策。在这整个问题上，英、美、法、日……列强帝国主义是一致的。可是，列强资产阶级之间正因为经济恐慌的剧烈而更加要互相抢夺市场，重新瓜分世界——太平洋上的中国正是这种瓜分对象之一——帝国主义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要从这种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爆发出来。无论是进攻中国的革命势力，无论是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列强在远东方面必然互相竞争着，互相防备着，因为每一帝国主义国家都要在这里预先尽可能的取得多份的胜利的保证。这就是一致进攻中国革命和苏联之中的冲突。同时，无论英、美、法、日之间的矛盾有多么大，冲突有多么厉害，他们对于进攻苏联和中国革命，总是共同努力的。这是矛盾之中的一致。满洲事变到上海事变的时局完全证明这种形势。

二，满洲事变的意义首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解除满洲的中国民众的武装，使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军阀手里的武装，不致于像湘、鄂、赣那么容易的落到苏维埃化的劳动民众手里去；其次，才是日本帝国主义首先瓜分中国——实行并吞满蒙的政策。满洲事变之后，中国民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广大的开展起来；从江西、湖北等处红军的反攻，从满洲兵士群众压迫军官而实行抵抗的小战争，从贫农群众督促起来的所谓义勇军的游击战斗，发展到大城市无产阶级群众的示威和罢工，铁路工人、矿山工人的斗争……推动着广大的贫苦小资产阶级、学生群众以及一般贫民的斗争，而对于所谓绅商加以极大的威胁——这样开展着抵制日货的运动。这种反帝国主义运

动的发展形势，虽然还没有具体的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而形成大城市之中立刻可以组织苏维埃的局面，可是，事实上，已经由无产阶级把组织真正民众自己的革命政权问题提出在广大的劳动群众面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的“威信”真正是一落千丈，各地方的党部和衙门常常被群众捣毁。虽然地主资产阶级的各种走狗在朝的在野的，有党的无党的，还用尽种种欺骗压迫手段，企图消灭真正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然而，党国军阀和绅商阶级的没有能力阻挡这个运动的前进，没有本领替帝国主义维持统治的日期，眼见得是一天天的接近了，所以日本帝国主义毅然决然的要亲自动手——弄出最近的上海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是要占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大的中心城市，反帝国主义斗争之中“最可怕的”中心城市。英国、美国都正式申明：日本要进兵上海的华界，他们是不反对的；法国也是同样的态度。美国、英国、法国现在都赶紧调兵到上海来；而且这些兵队的名称都叫做“援兵”，这是援助谁？援助中国民众？援助中国政府？援助日本？——不，都不是！他们是援助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三，国际帝国主义在远东最近半年以来的事变之中，受着苏联革命影响扩大的威吓，他们都一致的积极准备进攻苏联的战争，日本的占领满洲是积极进攻苏联的步骤，这是没有疑问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本占领沈阳和吉林之后，接着就占领齐齐哈尔，使中东铁路④在日本军队的包围之中，丧失它的军事作用。最近日本又在哈尔滨组织白俄暴动，跟着就利用熙洽⑤等的军队帮助他直接占领中东路的长春支线，直

接进攻哈尔滨。而且日本攻下锦州之后，除中东路以外，关外的铁路管理权已经完全落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它还在赶造吉会路——截断海参崴与赤塔之间的军事行动上最敏捷的一条铁路。这样，日本想在满洲和热河造成一个整个的直接隶属日本的区域——所谓满蒙独立国，军事上、政治上、交通上、经济上完全由日本指挥。最近，日本更公开的声明不愿意和苏联订立互相不侵犯的条约。所有这些都是明显的具体的进攻苏联的步骤。国际联盟^⑥和美国政府，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对于日本这些对俄进攻的事实，没有一次不表现“欣慰的沉默”，甚至于连最虚伪的抗议或者声明都不曾有过，至于英国、美国、法国……罗马尼亚、波兰，各方面的准备也是很明显的事实。

因此，满洲事变和上海事变之中，最主要的认识应当是：国际帝国主义共同一致的进攻中国革命和苏联之中，中国劳动民众的利益和苏联的利益是一致的，两方面的敌人是共同的。

四，同时，反苏联战争和瓜分中国这两件事情究竟那一件先开始，这对于国际帝国主义是一个难于一致的问题。日本利于首先瓜分中国，扩大和巩固现成的势力范围，布置必需的军事力量。法国在中国的利益比较小，而在满洲方面又有经过日本而取得新的部分利益（中东路旧股票等）的可能。因此，法国在满洲事变之中首先最清楚的表示不干涉，并且在安南^⑦边境进兵，预备在相当时机同样的割据云南、广西。英国一方面有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主要的是在南部中国（香港）和

中部中国(上海),别方面,它还勉强维持着传统的经过中国海关而支配中央政府的地位。可是,在一定的环境之下,它宁可暂时和日本互相承认,割据中国的势力范围,而抵制美国对于中国中央政府的势力的增长。最终的瓜分中国,必须要由太平洋上的大规模的战争来决定。日本取得满洲,固然同时是为着将来的太平洋战争扩大自己的后方,而英国申明不干涉满洲事变,也是借重日本抵制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军事设备。美国可不同。美国在中国至今还没有势力范围,它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国没有雄厚的海军力量,在中国领海里,它的势力比英日小得多〔注〕。美国利于日本先和苏联开始战争,使日本的力量极大一部分被对俄战争所牵制,然后它自己的军事力量,在帮助日本反对苏联的战争之中,可以集中一部分到远东来。今年二月到五月的美国海军大会操的路线,正是从檀香山到菲列滨^⑧。英美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之中,日本究竟站在那一方面,是很有重要关系的。可是,美国和日本以及美国影响之下的英属自治领地(坎拿大^⑨、澳大利^⑩)和日本的冲突,使美国和日本联合去反对英国的形势非常之难于实现。只有英国和日本“分工合作”而抵抗美国的倾向。满洲事变以来,英、日、法的国际联盟和美国之间的许多外交手段,错综离合的杂乱形势只有在这一个观点上去观察,才能够分析清楚。至于英

〔注〕 最近的军事消息:日本在中国领海可以立刻调动巡洋舰五艘,灭鱼雷舰二十艘,航空母舰二艘,装置飞机六十架和水上飞机二十六架。英国在中国的领海,现在已经有巡洋舰六艘,灭鱼雷舰八艘,航空母舰一艘,潜水艇十一艘,炮舰十九艘。而美国只有巡洋舰一艘,灭鱼雷舰二艘,炮舰十二艘。

美联合抑制日本，这至多只能够是外交上暂时的应付手段或者对于一些零碎的具体问题上的主张，例如上海公共租界的“中立”等类的问题。太平洋战争的根本趋势，始终是英、美、日本三角斗争的瓜分中国的战争，法国自然参加瓜分，可是已经是远东方面的第二等角色。日本现在正是利用自己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全中国进展它的军事势力，尤其是满蒙的完全并吞。日本现在没有固定的联英或者联美的必要。

可是，我们必须认清的是：无论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它们各自为着瓜分中国，准备太平洋战争的一切步骤，同时，都是镇压中国革命势力和进攻苏联的步骤。它们自己之间的矛盾冲突无论如何厉害，而最主要的共同目的总在打击世界的和中国的革命势力，挽救资本主义的恐慌。它们在任何时间，只要有必要，都会一致行动起来屠杀中国民众或者进攻苏联的。

五，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之中，许多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事实上受着地主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和支配，只在幻想着列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只在依赖着帝国主义内部的破裂，以为这可以代替中国民众自己的斗争。“社会与教育”派和“文化评论”派虽然互相辩论着，其实是犯着同样的错误。“社会与教育”固然发明了“日美妥协”的形势，主张用绝交政策去促起列强的干涉（陈友仁^①已经采用），而“文化评论”也认为日本进兵中国的由来，只在于反对美国影响之下的蒋介石、张学良^②。这些“理论家”都不看见日本和列强的进攻中国的革命民众，都故意把进攻苏联的步骤说得无关紧要，甚至于说一致

反俄战线“永难建立”，“且有日俄联合之可能”！这是企图削弱民众的注意力，紊乱革命的队伍，这事实上是帮助帝国主义。

中国民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要得到胜利，只有利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冲突，而完全依靠群众自己的团结力量，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一般劳动民众的阶级斗争，首先就要拥护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只有这样，方才能够一刻也不迟缓的组织自己的队伍，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创造真正民众自己的政权（苏维埃），实行真正革命的民族战争——反帝国主义的战争，而解放中国，统一中国。

（二）

一，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内部分着许多种派别，许多种帮口，所以，所谓党国，也就是四分五裂，互相排挤、倾轧、混战的党国。这种混战的各派都是国际帝国主义的走狗，都是事实上赞助瓜分中国的“功臣”，自然，也是一致赞助进攻苏联的。这些各派各帮的走狗，为着自己的主人而争夺地盘，争夺中央政府的支配权。他们还互相竞争着，每一派都在竭力表示自己镇压中国民众的革命运动的本领，表示自己是最出力的最有能力的进攻苏联的急先锋，这样去求得主人的宠爱，而可以多得些赏钱。

满洲事变发生之后，所谓党国的各派更加暴露它们的走

狗面目。最公开的日本走狗——臧式毅^⑬、熙洽、张景惠^⑭等等(至少也曾经宣读过总理遗嘱的),都在努力进行满蒙的“自治独立运动”,东三省地方的“维持治安事务”。蒋介石、张学良等等,立刻实行无抵抗主义,缴械,投降,退却,使日本帝国主义得“如入无人之境”。但是劳动民众以及兵士群众的愤激和斗争一天天的增长起来,转变到了反对党国的运动。于是乎,国民党的各派都想法子来欺骗民众,维持自己的统治。什么和平会议^⑮,什么统一政府^⑯,什么国难会议^⑰,什么国民救国会议^⑱,什么迅速实现宪政等等。这里孙科^⑲、陈友仁、胡汉民^⑳等等党国要人,也说什么反对镇静无抵抗主义。孙科内阁成立之后,实际上已经和日本秘密谈判,企图用撤消张学良的官职的条件请求日本答应议和,而订立承认二十一条^㉑之类的密约,把东三省的铁路、矿山等等完全卖给日本。可是,民众反抗斗争正在发展,这种阴谋很难进行。孙科、陈友仁等就用巧妙的绝交政策来欺骗民众;事实上孙科的绝交政策,目的是要引起日本方面更大的进攻,然后在“无可如何”的局面之下实现直接交涉而订立同样的卖国条约。而且,这同时还是镇压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一条计策;因为各派党国的屠杀政策(宝山路^㉒、永汉路^㉓、珍珠桥^㉔……)已经压不下去,所以不如用“绝交”引起日本的大规模的进兵,由日本军队亲自来镇压。这条计策虽然没有实现,可是,汪精卫^㉕、冯玉祥^㉖等和蒋介石合作而组织了汪精卫内阁^㉗之后,蒋介石派的“请求美国主持公道,绝对信赖国联”的政策,以及民众反抗运动的更广大的发展,引起了日本的进兵上海,结果仍旧是一样,蒋汪合

作的新政府，在上海兵士群众已经开始自动的抵抗之后，方才宣言“正当防卫”，这种党国军阀的所谓“防卫”，事实上不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防卫。因为它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禁止抗日运动的条件，这是对于兵士民众的防卫，上海军队的作战，完全只是守住自己的防线，而同时借着战时戒严的名义，严禁一切集会、结社、罢工、暴动。政府迁都洛阳^⑧，更表示当局故意放任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预先存着把长江一带放弃的念头。汪蒋新政府的对内政策当然和孙陈^⑨政府（以及张学良、陈济棠^⑩等等的地方政府）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只要能够镇压民众，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只要能够压低反帝国主义运动，维持国际财政资本的剥削，什么哄吓、诈骗、卑鄙齷齪、鞭打屠杀的手段都用得出来，正面的，反面的，公开的，秘密的请求日本或者英、美、法国帝国主义的军队来镇压的手段也会用出来。至于汪蒋新政府的对外政策，固然和胡汉民、孙科、陈友仁不相同：孙陈的真正政策是在英国“协助”之下和日本直接交涉（直接交涉的主张两次出于胡汉民的谈话），而汪蒋的政策是暂时拒绝交涉，故意弄成僵局，替美国制造干涉中日谈判的机会（上海事变之后，美国已经提出“中日两方应即按照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⑪开会议，由各国参加以解决争端的要求），现在这种机会已经来了。

总之，中国政府的政策，不论是屠杀，是“立宪”，是包办“民众团体”，目的只是一个：镇压、缓和以至于消灭民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和革命斗争，抵制真正民众政权的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也就是努力维持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统治；对外

的政策，不论是无抵抗，是绝交，是正当防卫，前途只有一个：赞助日本和英国、美国、法国瓜分中国，问题只在列强之间谁沾光些，谁吃亏，结果迟早是要转变到大规模的太平洋战争或者反苏联的战争。

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府存在一天，中国就一天不免于瓜分，就一天不免于做太平洋战争的目标，就一天不免于做进攻苏联的阵地。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各种帮口，各种阶层，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利用帝国主义的“威权”和炮火来镇压反抗的劳动民众，就是引诱，劝告日本向北进攻，去攻打苏联，而自己用静候国际正义解决的无抵抗主义恭送满洲给日本做战场。日本的威胁中东路，组织白俄匪徒进攻哈尔滨……不但没有引起中国外交部的假装门面的抗议，甚至于没有引起一般地主资产阶级的所谓舆论方面的反抗。地主资产阶级之中，有些阶层简直欢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自己甘心做奴才，只要日本军队来维持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营口的商会请求日军维持治安，锦州的商会请求中国兵士不必抵御，满洲许多所谓法定团体，公推臧式毅等类的自治政府……）。至于和英美等国联系着的地主资产阶级，那么他们不是完全依赖国际联盟或者华盛顿政府，就是企图用“绝交”甚至于“宣战”的口号，一方面缓和劳动民众的革命化，别方面激动列强出来干涉，因为他们知道列强干涉之下的对日交涉，无论如何吃亏，英美等国总可以同时“利益均沾”，满洲事变总可以告一个段落，而“赶紧结束”的希望，正是恐惧真正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斗争和革命的自然心理。上海战斗爆发的前夜，形势

已经不能够再支持，甚至于官办的抗日会和抵制日货运动的领导都已经有被革命民众夺取的危险。因此，当时日本提出封闭抗日团体和禁止抵货运动的时候，不但官厅方面立刻奉命执行，而且上海商会和同业公会以及资本家走狗的假工会，都发表宣言表示赞成。中国绅商正在“私心忧幸”——总算找着了出路：如果自动的取消抵制日货而帮着镇压民众，那么，未免太明显的卖国，太爽直的叛变，太露骨的启发群众的阶级意识；如今日本的飞机、军舰威迫着，那就可以装出“不得已”的丑态，实现“正中下怀”的心愿。上海一百余同业公会的呈文说，“所有封存及登记之日货，为数颇巨，至今迄无处置办法，现总结账之期瞬届，若不速予救济，影响商业安危，实非浅鲜。”这是明白的表示：国可以亡，奴才可以做，但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商业安危”）却一定得维持。同时，正是这些绅商——地主资产阶级现在利用一切种种机会（马占山^②、小白龙^③、上海战事等等），竭力宣传马鹿^④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英雄主义的意识来蒙蔽劳动民众的阶级觉悟，削弱群众自己的团结和行动的力量，而且在实际上竭力镇压罢工，竭力包办“民众团体”，竭力破坏革命的团结，运用着一切武断的卑劣的手段。

中国的劳动民众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发动广大的斗争；抵制日货的运动应当由革命的工人民众来指导，全国各地要举行总同盟罢工，组织民众的武装队伍——游击队、义勇军以至于红军，号召兵士群众离开并且反对无抵抗主义的以及虚伪的“自卫的”军官，而加入民众的武装，由工人、兵士、农民以及一般革命的贫民群众，自己组织代表会议，推翻帝国

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府，而建立民众的革命政权，指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并且反对一切国际帝国主义的干涉。这样才能够解放中国，解放真正广大的中国民众，不但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并且脱离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

三，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努力维持自己的统治，以及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他们的各派赞助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赞助进攻苏联的战争。他们对付中国民众的不仅是屠杀、监狱、警察、包探……而且还有“意识上的武器”，一切种种武断的欺骗的宣传。例如反动的大众文艺（小唱、说书、礼拜六式的小说^⑤等等），虽然只是第四、五等的文艺，但是他的对象是极广泛的普通市侩，以及劳动群众。这种大众文艺，现在很广泛的宣传着无抵抗主义和英雄主义，“教育”他们，迷惑他们，要使他们“静候公理解决”，等待“英雄武侠”和“贤能才智”，牺牲阶级利益。民族主义派^⑥、国家主义派^⑦、人权主义派^⑧……不过是这种“马路文学”^⑨的欧化样本，专门供给学生青年的知识阶级的。但是，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已经渐渐丧失自己的力量。民众的左倾，使马克思主义的威信一天天的增高起来。于是乎发现陶希圣^⑩等类的人物（社会与教育），口头上说些“左倾的”空话，主张绝交，主张督促政府实行民权，同时趁势提出“民族高于一切”的口号。还有王礼锡^⑪等类的人物（《文化评论》、《读书杂志》^⑫）甚至于急急乎申明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主张要人道主义的文学，所有这一类的人物，连陈独秀、刘仁静^⑬等也在其内，都想多多少少冒充着马克思，甚至列宁主义的名义，来反对阶级斗争，否认革命

高潮，抵制苏维埃运动，事实上都是在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维持帝国主义的统治，这些人物虽然代表着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绝望、夹攻之中的为难……的情绪，可是，事实上只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更巧妙的传话机器。

四，中国民众的革命和反帝国主义斗争之中，必须开展思想上意识上的斗争。不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不但要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中国国民党军阀的政府和党部；尤其要深刻认识的是不但要反对党政机关，而且要反对“法定团体”的绅商——地主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走狗。不但要反对屠杀和镇压，还要会反对一切种种狡猾的欺骗手段，不但要反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人权主义，而且要会反对冒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种种工贼，以及所谓第三党^④，反对一切种种保护地主资产阶级的表面上站在“中间”而实际上是抵制革命发展的缓冲的企图。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⑤是中国苏维埃革命之中的文艺斗争的团体，现在必须发动自己的一切力量积极的斗争；脸向着广大的群众，用自己的特殊的武器——文艺的鼓动和宣传参加进攻一切反动意识的战斗。上面所分析的国内的，思想上意识上的情形，应当做左联创作的题材和宣传的纲要。现在左联创作方法上的中心口号——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这就是列宁所说的：“揭穿一切种种假面具”，并且鼓励集体的群众的斗争行动——为着真正民众的政权（苏维埃）而斗争的行动。

注 释

① 满洲事变，即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

② 指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发动的侵略战争和同年4月16日日本在哈尔滨组织的白俄匪徒的暴动。

③ 第三时期，见本卷第31页注⑬。

④ 中东铁路，见本卷第148页注⑫。

⑤ 熙洽，见本卷第392页注②。

⑥ 国际联盟，见本卷第196页注②。

⑦ 安南，今越南。

⑧ 菲列滨，即菲律宾。

⑨ 坎拿大，即加拿大。

⑩ 澳大利，即澳大利亚。

⑪ 陈友仁，见本卷第191页注⑳。

⑫ 张学良，见本卷第61页注④。

⑬ 臧式毅，见本卷第381页注①。

⑭ 张景惠，见本卷第413页注②。

⑮ 1931年10月22日至11月7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广东派在上海举行会议，商讨成立统一的国民政府问题。

⑯ 统一政府，指1932年1月1日国民党南京派和广东派联合建立的新政府。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

⑰ 国难会议，见本卷第230页注⑧。

⑱ 国民救国会议，见本卷第230页注⑨。

⑲ 孙科，见本卷第224页注⑧。

⑳ 胡汉民，见本卷第148页注⑬。

㉑ 二十一条，见本卷第196页注④。

㉒ 宝山路，指上海宝山路血案，见本卷第202页注⑨。

㉓ 永汉路，指广州永汉路血案，见本卷第202页注⑩。

- ②4 珍珠桥,指南京珍珠桥血案,见本卷第 382 页注⑧。
- ②5 汪精卫,见本卷第 61 页注⑧。
- ②6 冯玉祥,见本卷第 470 页注②。
- ②7 1932 年 1 月 25 日孙科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由汪精卫继任,组成汪精卫内阁。
- ②8 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自 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南京国民政府一度迁洛阳办公。
- ②9 孙陈政府,即宁粤统一前由孙科、陈友仁组织的广东政府。
- ③0 陈济棠,见本卷第 95 页注⑬。
- ③1 非战公约是 1928 年 8 月由法、美、英、日等 9 国在巴黎签订的,主张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美国当时打着非战公约的旗号,以图插手中日谈判。
- ③2 马占山,见本卷第 201 页注④。
- ③3 小白龙,活跃在东北地方的土匪头子。
- ③4 马鹿,日语中的汉字,“愚蠢”的意思。
- ③5 礼拜六式的小说,见本卷第 532 页注⑦。
- ③6 1930 年 6 月,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联合一批反动文人,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创办《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鼓吹“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所谓“民族主义”,攻击文学的“阶级意识”。这一批人被称为民族主义派。
- ③7 国家主义派,参见本卷第 153 页注④。
- ③8 人权主义派,参见本卷第 33 页注⑩。
- ③9 “马路文学”,19 世纪中叶流行于法国的一种文学倾向。
- ④0 陶希圣,见本卷第 419 页注⑧。
- ④1 王礼锡,见本卷第 429 页注⑤。
- ④2 《读书杂志》,见本卷第 491 页注⑰。
- ④3 刘仁静,见本卷第 169 页注⑤。
- ④4 第三党,见本卷第 33—34 页注⑩、⑫。
- ④5 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1930 年 3 月在上海成立,1936 年初解散。

帮助团赶上党超过党

(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

“赶上党，超过党”这一口号^①，不但是团在进行“一二八”入团号召的战斗口号，同时也是党在进行“一二八”入党号召时的任务。^②

团并不是一个政党的组织，它是共产主义的青年群众组织，因此，它不能以吸收先进的青工为满足，它应当吸收更广泛的青工群众来参加团的组织，学习共产主义团的组织应当比党的要广大的多。它不但要赶上党，并且要超过党。

但是直到现在，这一口号就是在中国青年群众最先进的队伍——上海的团部，依然是没有实现的。党的组织比较团要大，更要比工会来得大，这正好像一个金字塔颠倒过来了。

青工在生产中的地位，是大大的增高了，目前上海的主要工业部门如纺织、烟叶，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青工，青工在革命斗争上的作用是大大的提高了，这在全国，特别是上海目前的反帝斗争、年关斗争与失业斗争中充分证明了。因此，在我们坚决执行国际十二次全会给予我们的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的任务时，我们应当首先经过党的第一个助手——共产青年团，争取青工的大多数，围绕在党的周围，在这样的意义

下,团在组织上赶上党,超过党,更有它伟大的意义。

这一光荣任务的完成,是同样的放在各级党部和每个党员的身上。

必须在进行“一二八”入党号召的时候,经常的讨论与检查“一二八”入团号召的工作,给予工作上的具体帮助。

必须真正执行一个同志发展一个团员的口号,在团没有支部的地方建立团的支部。

在支部内与区委内讨论如何帮助当地团赶上党,超过党,订立具体的帮法,立刻在各方面来准备号召的最后一个星期的介绍团员的运动周。

各级的团部应当讨论党省委的一二八入党号召,解释党的政纲及列宁的党领导的胜利,发动最好的团员自动写请求书到党,要求入党,在党的一二八号召中没有支部的地方,帮助党发展党的支部,介绍成年工人给党,在党的一二八号召中,我们要听到团的光荣回答。

原载 1933 年 2 月 5 日《列宁生活》第 18 期

署名:铁儿

注 释

① 1933 年 2 月,中共江苏省委提出党组织要帮助共青团“赶上党、超过党”,号召全体党员完成“一个党员发展一个团员”的任务。

② 1933 年 1 月 28 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一二八”征收党员运动告工人书,号召用革命竞赛的方法发展党员。同日,共青团江苏省委响应党的号召,发出关于“一二八”发展团员的号召。

我们帮助了团些什么？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因为许多列宁青年团员们的努力，团的组织在“一二八”号召中获得了将近一倍的发展，但是这个成绩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团在这一号召中的主要目标是“赶上党，超过党”，只有完成这一目标，才能证明团业已开始的克服团内关门主义的倾向，使团成为群众的团。然而，这一目标是远远的没有完成的。

为着帮助团、领导团克服团内关门主义的倾向，使团成为群众的团，使团在“一二八”号召中来完成赶上党，超过党的任务，党的省委布尔什维克的决定了帮助团在组织上赶上党、超过党的运动周^①，号召全体的党员，在光荣的完成了伟大的“一二八”入党号召之后的一星期，用号召的速度，用冲锋的速度来领导团，帮助团完成无论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以及在国际青年运动史上光荣的任务。

然而，这一运动的政治意义，似乎还没有为全体党员所充分认识。运动周开始后两天，我们依然看到几个区委还没有讨论这一运动，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支部讨论这个运动，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一个区为着这一运动动员一张宣传品到群众中

去,总之,运动尚没有很好的动员。好像“一二八”号召那种活跃的精神,在这一运动的前面变为异常冷淡了似的。

我们拿什么来说明这一现象呢?

运动只有七天,现在已过去两天了,我们应当不失掉一刻钟的时间紧急的动员起来,动员每个支部,动员一切的宣传武器,定出支部的发展数量与发展目标,经常的加以检查与督促,如号召时所作的一样,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工作上真正的完成省委给予每个党员的一个党员发展一个团员的口号。这是第一个工作,但这却还不是最主要的工作。

最主要的是党应当领导并帮助团来开展团内反关门主义的斗争。党与团的区委和支部书记,应当经常的互相参加会议,取听团“一二八”号召的报告,向每个青年团员指出,目前国内外情势的空前尖锐,争取青工群众大多数的的重要与迫切;应当向青年团员指出共产青年团不是一个政党的组织,它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群众组织,应当吸收最广大的青工参加团的组织,应当比党要广泛,应当把党在号召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告诉他们,帮助他们,鼓励他们来完成这一转变。应当拿着号召的精神来完成这一运动!

原载 1933 年 2 月 25 日《列宁生活》第 21 期

署名:铁儿

注 释

① 中共江苏省委规定 1933 年 2 月 19 日至 25 日, 为上海党组织帮助共青团“赶上党、超过党”的发展团员周。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被革命工人底全世界丰富的新的经验的鲜明光线照耀着，帮助了我们了解事变的规律性。这个理论还要帮助全世界底无产者，使他们实行着推翻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度的斗争，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斗争底目的，更加坚定地走上已经决定的道路，更加准确而牢靠地去取得胜利，并且巩固这种胜利。”

——乌梁诺夫①

最近这三十年，中国一直在革命震荡中间。这是中国——这所谓五千年的古文化国底新生命产生的过程。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同时却在栽培着它自己的掘坟的人——无产阶级，领导得起几万万的中国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国际无产阶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底致命的敌人——从此又在“远东大国”里添了一支生力军，而且动员着几千年来被剥削被压迫被蒙蔽被愚弄的千百万的民众。自然，国际无产阶级底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要跟着资本主义的侵略来到中国，深入到愚昧昏沉黑暗的中国苦力群众里面去。这将要成为非

* 本文迄未发表。这里根据杨之华所存抄件刊印。

常危险的力量。“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在欧洲徘徊着”^②，尚且把神圣同盟^③吓得发抖。这“幽灵”现在要徘徊到非洲^④、亚洲，以至于整个地球，那还了得！封建士绅、地主贵族的中国，资本家、银行老板、殖民专家的黄金世界，都要闹得“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了。然而在三十年前，这似乎还是过虑。那时候在中国还只有极少极少的工业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死的时候——五十年前——中国根本就不知道马克思；等到中国的“现代式的”革命运动开始底时候——三十年前——马克思主义也还在没有人怎么提起，当时的革命党人，当时的欧化知识分子尚且只有些风，群众是更不用说了。可是中国的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已经带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子。一九〇五年前后，革命同盟会^⑤成立的时候，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底传说已经在革命党人中流行着。而且最足以使我们注意的就是同盟会底“第一次流血”^⑥，正是中国的最早的无产阶级底自动战斗：

“自庚子以后，中国内外人心思想日开，革命风潮日涨。忽而萍乡之事起，人心大为欢迎。……此事不过乘一时矿工之变而起，初未谋定而动。”（一九一〇年孙文自巴黎致吴稚晖书）^⑦

这就是所谓“丙午萍醴之役”——一九〇六年萍乡矿工之革命军起事。中国工人最早就是革命的先锋队，虽然在那时候他们还只是“自在的阶级”（Class in it-self），他们还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武器。然而帝国主义和中国地主贵族的剥削和压迫，已经把中国农民群众的汗血快要榨干了，广大的“灾民”、“难民”、“流氓”、“地痞”在全中国骚动着。中国最初积

累式的商人资本正在搜括着这些贫民的皮肉，吸着他们的骨髓；“苦力”、“短工”以及“矿工”，洋场里的工人，也一天天的集中到大小城市和他们的周围，或者形成新的工人区域，例如萍乡、大冶，铁路的沿线各站。中国的广大群众，在那时候就是贫困化的农民和“半无产阶级”、“前无产阶级”(Pre-Proletariat)。他们不会不是辛亥革命的最积极的队伍。他们的存在也不会不产生一些笼统的社会主义的想望——马克思主义的影子。只要看一九〇六年的革命党的机关报怎样反映这种群众情绪，就可知道当时这个“影子”已经把革命党人弄得怎样难于应付的情形：

“闻得有人说，民生主义是要杀四万万人之半，夺富人之田为己有，那是未知其中的道理。社会革命在外国难，在中国易……中国行社会主义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一九〇六年《民报》⑧)

当时中国的初出娘胎的资产阶级之中，一些激进的所谓候补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还是革命，还想挣扎着打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他们要革命，他们势必不能够不要那些“会党”、“土匪”底群众。然而这些群众同时又是可怕的。“夺富人之田为己有”——那还了得！不行，不行，这是不懂道理的话，那么，懂道理的话是什么？是亨利乔治⑨底“社会主义”——所谓划一税的社会主义，这个中国化的亨利乔治主义(平均地权)是对于中国贫民群众的预约支票，这种无定期的预约一方面可以安慰群众，别方面可以联想富国强兵。总算是一种应付的办法。

中国革命开始了，预约的支票，把革命的目标尽可能移转到无所谓的满洲人问题。满清末年在太平天国之后，所谓满人压迫汉人的民族问题，其实已经若有若无的了，因为曾左李^⑩等类的汉人地主贵族，已经证明了还是自己的力量足以维持地主的统治和剥削制度，满清政府其实在这方面已宣告破产，满清贵族的统治已经差不多完全依赖汉人贵族的支持，辛亥革命当前任务，单就政治方面说，甚至于单就所谓排满问题说，也应当是彻底推翻维持满清皇帝制度的汉人贵族和地主阶级。何况，当时的群众的最迫切的要求，就是“夺富人之田为己有”，铲除封建残余的物质基础。不但官僚地主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刻为着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而赞成“光复”，以便有资格出来不准穷人革命，就是“假洋鬼子”等类的革命党人，有许多也慌忙退却，掉过枪头来镇压“蠢动”的贫民，当时湖南、四川，以至于江浙的事变，现在还有许多“身历其境”的人可以证明的。辛亥革命之前，各地方的抗粮抗税已经是常见的事，单是同盟会的十次“革命”^⑪之中，就有三次是直接依靠在广东钦廉两府的抗粮运动的。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不用完粮纳税了”的呼声几乎普遍的传播在中国，甚至于陕西、山西一带也有这样的回声。谁能够说辛亥革命的旗帜只是排满！这不是革命的旗帜，而是抵制革命前进的旗帜。农民群众——许多人只看见他们的“愚昧”而不看见他们的聪明——他们固然有些“真命天子”的希望，但是他们的“真命天子”是土地问题解决的原始的象征。他们希望真命天子，其实是要“豁免十年钱粮”之类；而辛亥革命不要皇帝

了，那末，照农民的逻辑说起来，自然是从此不必完粮纳税了，因为田地是皇帝的，不要皇帝就是收回田地，从此田地是农民自己的，富人的田地太多，农民群众自然还要“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这才是辛亥革命的民众的旗帜。而当时的革命党人怎么说呢？

“农人野老不明大义，以为革命之后，从此自由，可以不纳税，不完粮。殊不知中央财政从何支出？”（民国元年在杭州特别欢迎大会席上的演说辞）^⑭

这种说话虽然还不是掉过枪头来打民众，然而已经是帮助当时的中央政府——袁世凯政府^⑮的了。中国革命的反封建任务——解决土地问题的任务，甚至于当时最革命的革命党人都不能够担任。本来，中国的资产阶级的发展途径就是“畸形的”，他们自己始终是拖泥带水地联系着中国式的封建的土地关系。而这种“畸形”途径，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完全在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中国的资产阶级，可以在某一时期——例如欧战前后几年，比较地想反抗一下帝国主义的压迫，但是，他们一碰到真正要铲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支柱——封建残余的土地制度的群众斗争，他们立刻就退却，一直到完全反动，自然在辛亥革命头几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还想绕着圈子替中国的资本主义找一条出路。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少，他们的斗争——罢工等等固然已经开始，然而还在原始的形态，马克思主义自觉的革命工人运动还只在胚胎之中；就是农民群众的斗争，也还没有鲜明的清楚的目的，没有世界的和中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阶级

分化的形势还比较的模糊。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以及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似乎还应当有些勇气。不错，这种勇气是有的。不过，看是怎么样的勇气吧？

“厥后有德国麦克斯(马克思)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麦克斯之《资本论》，主张资本公有。将来之资本为机器，遂有机器公有之说。……一般工人莫不赞同社会主义……工人者，不特为发展资本之功臣，亦即人类世界之功臣也。以世界人类之功臣，而受强有力者之蹂躏虐待，我人已为不平，况有功于资本家而反受资本家之戕贼乎。工人受资本家之苛遇而思反抗，此不能为工人咎也。”

“各国社会主义学者鉴于将来社会革命之祸，岌岌提倡麦克斯之学说，主张分配平均，求根本和平之解决，以免激烈派之实行均产主义，而肇攘夺变乱之祸，故收回土地、公有资本之二说，为谋国是者所赞许，而劳动应得相当报酬之说，又为全世界学者所赞同也。”“我国社会主义流行伊始，尤望党人持和平之态度，与政府联络，共图进行。……与其至于已成之势而思社会革命，何如防微杜渐而弭此贫富战争之祸于未然乎？……将来大地主必为大资本家，三十年后，又将酿成欧洲革命流血之惨剧。故今日之主张社会主义，实为子孙造福计也。”（《民国元年对中国社会党演讲词》，参看全文）④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最早比较详细的介绍马克思学说到中国来的，就是辛亥革命的领袖；（二）当时对于《资本论》的了解，实在“天真”得厉害。这里的“勇气”就在于对着将来

的社会革命发抖。这“勇气”的作用，是要用马克思的学说去求根本的和平解决——预防社会革命，而替后世子孙造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和平化”的第一次尝试。

马克思主义的影子——笼统的社会主义的想望，同现代式的革命运动一块儿开始走进中国的万里长城；而马克思主义的胚胎——工人群众的原始斗争以及贫农的骚动和“不明大义”，同着辛亥革命一块儿出现在这古旧的中国。影子已经使得革命党人发慌，因此，他们找了一张平均地权的预约券，想把它遮住；胚胎自然更加可怕，所以他们要想用打胎来使他们流产。

* * *

然而无产阶级既然在生长起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始终是不会流产的。辛亥革命失败之后，群众的斗争之中渐渐地产生新的成份，城市无产阶级的反抗剥削的自发运动已经一天天的多起来。到了五四，就爆发了上海的第一次政治的同盟罢工。虽然当时这种新的革命浪潮还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然而立刻就发生了广大的社会主义“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很快的“征服”了许多最优秀的革命青年。此后马克思主义深入群众，就跟着革命的实际斗争的开展，跟着阶级分化的深刻和剧烈，而成为伟大的力量，以至于地主资产阶级不能够不经常地“一只手拿着可兰经，一只手拿着宝剑”来对付他。

从五四到现在，差不多十三、四年了，这十三、四年抵得上中国古代历史的几百年，甚至于整部的二十四史^⑤。这期间经过好些阶段——原则上不同的，阶级关系变化得很剧烈的阶

段。这里限于篇幅，不能够来分析。

然而五四的开始就已经影射了这十几年的远景。最早的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中，现在还剩得几个呢？其中有一个，现在已经皈依了我佛如来，而当时却曾经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过中国的乱源，他的目的在什么地方？

“就上海地方说，工人的人数有三四十万，而且罢工的事件也常常发生。前几天罢市风潮的时候，同时就引起了大罢工的事实。幸而北京政府免曹、陆、章的命令下来了，如果再迟一两天，恐怕会变全市总同盟罢工的景象。当时上海有智识的人，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焦心。大家想法子劝告工界的人不要罢工”，“因为智识程度太低的原故，一般的人对于世界上思想的系统，不能够明白，那些做煽动工夫的人，就拿一知半解、系统不清的社会共产主义，传布在无智识的兵士中和工人里面。这几天报上登载说军队里面发现题名《兵士须知》的小册子，就是这种事实了。如果因为这种无意识的煽动发生出动乱来，真是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了”。“如果有智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智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的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受到罢工风潮的感动，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要紧的事。”（民国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在上海莫利爱路的谈话）⑩

这还用说，当然是很要紧的事哪！当时所谓“有智识有学问”的人开始研究社会劳动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大半要使得“社会思想温和化”，为的要“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他们认为“并非一知半解而系统清楚的”社会共产主义，才是合理而又合时的。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上海——中国工人阶级的

基本队伍，首先跳上了政治舞台。虽然这还在商人罢市的实际领导之下，但是这已经够“危险”的了。到这样时候，说马克思主义是主张“和平解决”的去“指导”群众，就是很“合时的”了。问题就是在于中国工人不记得中国民族的固有文化，而他们说孔夫子，或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他们未必很相信，有时候还会绝对的反对；然而向他们说社会主义，说马克思主义，他们就会“莫不赞成”。因此，“合理的”办法是用马克思的名义去警告他们不要闹得“一塌糊涂，没有办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和平化”的第二次尝试。

自然，这次尝试还是没有用的。五四到五卅，五卅到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七年到现在，事实是明明白白了。总而言之，只是一句话；五四之后，这些老爷们必须“自己”来说马克思主义，自然必须是要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说着这种“马克思主义”是要“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但是，这多数人逐渐的不受指导，他们有了他们的真正马克思主义，于是乎“没有办法”，闹得“一塌糊涂”，成了“革命的发狂”。随后，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犹太秽种”的主义，变成了“恶化”、“反动”。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绅士和市侩起先是想借用，随后是想反驳，临了就想一棍子打出去。

这些，都还是曾经革命的市侩呢！这些革命市侩，不但对于帝国主义最早就是吞吞吐吐，又想反对，又去请求合作——所谓国际共同发展中国的计划；不但对于土地问题永远也不能够解决，始终是变着许多花样来维持地主的剥削制度，就是对于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也不敢提倡，他们原本不是领导民

众起来革命，而只是想“军政革命”之后来教训民众。结果，他们必然的投降帝国主义，投降军阀地主，而形成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联盟。帝国主义的国际资产阶级，于是乎在中国得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别动队。

中国底资产阶级，最早是采取了些现代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例如亨利乔治的学说之类，拿来安慰群众，欺骗群众，随后，恐惧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子和胚胎，企图使它和平化或者温和化；最后，仗着枪炮飞机的威力，抄写一些劳资妥协的“理论”，强迫群众接受。这种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真正国货”的理论，同时还搀杂着许多封建思想，例如在三权分立之外加上些科举制度和御史制度之类，它根本否认群众的自由平等的要求，它很早就规定了军阀包办“革命”的办法，直到最后的宪政理想里面，也还要国民大会的代表由考试院去决定他有没有代表国民的资格！这种“革命理论”在它的“最革命的”时期已经埋伏了后来对付民众的飞机或大炮机关枪，这是显然的阶级理论，但是，它偏偏要否认中国阶级的存在，说是只有大贫小贫，它偏偏要说阶级斗争是“社会病态”，说马克思主义至多不过是社会病理学，说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是不合国情的革命理论。

然而，国货的“革命理论”事实上始终变成了白色恐怖的旗帜；而马克思主义却成了中国几万万群众的解放的唯一正确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本身，现在已经是群众化的实力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无产阶级的理论，是唯一适合于各国国情的学理，中国革命也只有真正的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之下,才能够得到胜利。

* * *

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解放运动,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没有理论是不可能的。这种理论不是可以空想出来的,它是从全世界一切国家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经验的总和之中生长出来的。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这样一个理论就生长了出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就在于它不是什么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导,不是什么空想的乌托邦,而是社会现象的科学规律,是认识了社会的现实而指示出改造这个现实的道路。这种理论是严格地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的和党派的立场上的,因为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根本要彻底推翻一切剥削制度的阶级立场,才是真正客观的科学立场,只有这种阶级——无产阶级——的党派立场,才能够保证不受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自私的偏见所迷惑。所以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这社会主义的基础在于唯物辩证法的阶级斗争学说,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克思说:

在现代社会里发见阶级以及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功绩,都并不属于我。资产阶级的历史家在我以前很久就叙述了这种斗争的历史发展,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阶级的经济上的解剖。我所做的新的事情,就证明了下列的几点:(一)阶级的存在只不过联系着发展的生产的历史上的一定的斗争形式;(二)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个专政的本身只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的过渡,只是达到不会有阶级分裂的那种制度的建立的

过渡。(马克思给威德海尔的信——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⑯

马克思主义指示出来：现在社会的整个发展，趋向于大生产排斥小生产，造成那些使得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建设成为可能和必要的条件。这个理论教会我们在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政治上的勾结排挤，奥妙的法律，狡滑的纠缠的学说，风雅和庸俗的文艺的掩饰之下，去看见阶级的斗争——一切种种有产的阶级与无产的群众之间的斗争，有产阶级与普洛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普洛阶级正是一切无产群众的首领。这个理论说明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真正任务：不是杜撰什么组织“新社会”的乌托邦，不是向资本家 and 他们的走狗去宣传或者劝告改良工人的状况，不是干什么阴谋式的政变，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个斗争，这斗争的最终目的，是要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去组织社会主义的社会。

中国革命——到一九二五年五卅底前后，就已经走到了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阶段，这时候，中国底青年的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受着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而客观的形势也发展到了广大的革命战斗爆发的时期。中国革命——辛亥革命失败之后的第二次真正群众的革命——在当时固然还没有直接的社会主义的任务，然而已经同辛亥革命大不相同的了，这个革命中间，领导已经必须由无产阶级夺得，才能够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当时，一九二五到二七年，中国无产阶级自觉的跳上了革命的政治舞台，率领起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的斗争。这革命的前途已经显现着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当时的最小限度的政纲，反对帝国

主义和反对军阀官僚——实行土地革命，也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所提出来的，虽然这些任务，这些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政纲，只不过是失败了辛亥革命所留下来的，然而这些任务，正是辛亥革命党和革命领袖所不肯执行不能执行的，他们这些“老革命党”底妥协、幻想、机会主义和恐惧群众、迷惑群众的策略，也就是辛亥革命失败原因之中的一部分。

这样，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这个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的阶级斗争，应当怎样组织，怎样领导呢？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说明了中国革命的社会性质。这个革命，绝对不是什么先知先觉率领了一班后知后觉，用“军政”去教训不知不觉，而建设一个资本主义乌托邦，为着要以国际帝国主义次等殖民地升任头等殖民地——所谓“举国洞辟以利通商，铁路亦必建筑，天然物产亦必发达，人民渐富，生计渐高，于是购求外邦货物亦必增加，万国之贸易亦必较今骤涨百倍，此种种者，岂为黄祸乎？——将一变而为黄福矣！”（见《中国问题之真解决》）^⑩这是“国货的”革命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所见到的中国革命性质，是绝对不同。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这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阶段，但是，必然地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要把中国从国际帝国主义的经济支配之中完全解放出来；把中国的一切封建残余完全肃清，消灭军阀官僚的基础——地主阶级；把中国的城市乡村的资产阶级放在工农民权专政的统治之下；继续开展最彻底最自由的阶级斗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实行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同着国际的无产阶级共同走向世界社会主义的社会。

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这里当然包含着所谓民族问题。在欧洲大战——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大爆发之前，在十月革命之前，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不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那时候马克思主义所提出来的民族自决的基本要求，还没有当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只当作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一部分。而现在，我国已经进到新的历史环境——新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民族问题也就变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所以中国革命在国内任务说来，虽然暂时还只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但是在世界范围来说，它已经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国际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队伍，自然，中国资产阶级“抵抗”外国资产阶级底侵略，或者，向外国资产阶级哀求多给一些赏钱等等底“斗争”，在这种民族解放运动之中也能够起相当作用（这作用也跟着革命之中阶级关系底变化而不同的，——以下再说）。然而现在民族问题的实质，是在于殖民地与附属国反抗统治民族底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于他们的财政剥削，政治压迫，以及文化侵略的斗争。很明显的，这里主要的并不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在“竞争”之中胜过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问题（一九二七之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绝对反动，而且分别地和英、美、日本等等金融资产阶级混合生长，更谈不到真正的竞争问题），这里的问题是在于占着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底基本群众（首先是农民群众），而这种剥削和压迫，引起这些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底同盟军。固然，民族问题不能和农民问题

混为一谈，因为除开农民问题之外，民族问题还包括民族文化、民族的国家等等问题，这是不错的。“不过民族问题底基础，它的内部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农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是民族运动底基本军队，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强大的民族运动。”

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这正是几万万农民的问题。中国底原始积累式的商业资本，在乡村之中和封建统治的地主有一种特别形式的结合，商业资本也借用封建制度剥削农民、压迫农民的中世纪的方法。中国乡村里商业资本和封建残余统治之间的这种结合，同样保留着中世纪封建式的剥削农民底方法和压迫农民的方法。中国底军阀和一切残酷无情抢劫平民的文武官僚，都是中国这种特别形式的结合底上层建筑。地主和豪绅夺取农民底百分之七十收入，地主在经济上、行政上、司法上握有实际的政权，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区域实行着公开秘密的贩卖人口，这种中世纪局面之中的统治力量，就当然是那种用特别的形式和商业资本结合的封建残余——是地主，是地主的文武官僚。中国革命底当前任务之一，就必然是推翻这种封建残余底统治，而尤其要肃清这种统治底物质基础，就是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而分给农民的群众。而“帝国主义和他们所有的一切财政上军事上的力量，就在中国维持并且推动这些封建残余以及他们的全部军阀官僚的上层建筑，使他们欧化，又使他们守旧”。中国要消灭封建残余，同时也必须和帝国主义实行坚决的革命斗争。

总之，中国底封建残余是主要的压迫形式，帝国主义通过

这些封建残余以及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而统治着中国，所以，中国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有左右全局的意义，中国无产阶级必须领导这个广大的农民群众自己的土地革命以及民族的解放运动，这个革命在当前的阶段正是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

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主要事实是：（一）中国底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在财政上经济上的统治；（二）封建残余的压迫，因为军阀官僚制度的恶化而更加加重；（三）几万万群众反对官僚封建的压迫，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天天的深入和扩大；（四）民族资产阶级经济政治上的薄弱，它对于帝国主义的依赖，对于封建残余的勾结，从利用群众，畏惧群众而走到了屠杀群众；（五）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它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的威信和领导权一天天的增长和巩固；（六）中国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胜利而且走进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处于临近的地域。这些情形也就决定着中国革命底前途——无产阶级要争取和巩固自己的领导权，统率着城市和乡村的几万万劳动群众，战胜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而达到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完全胜利；然后在继续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和新的形式之中的阶级斗争里面，把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革命是非常之复杂和痛苦的过程，这是旧的社会制度死灭而新的社会制度产生底过程，这是几千百万人底旧的生活方式死灭而新的生活方式产生过程。而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政权的问题。政权集中在那一个阶级或那一些阶级手里；

那一个阶级或者那一些阶级应当推翻；那一阶级或者那一些阶级应当取得政权——这是“一切革命之中的最主要的问题”。中国以前的“老革命党”从来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也不会提这个问题。对于他们，革命只是先知先觉或者后知后觉的问题，只不过是圣贤才智应当取得政权去统治平庸愚劣的问题。他们客观上代表着中国的“畸形的”资产阶级，因此他们连“天真的”西欧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人民”政权的口号都不敢提起。这些十八世纪式的民权主义口号固然是一种欺骗；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却连这样的欺骗也不敢。他们竭力地证明“人民”是愚劣的，是不知不觉的，“人民”是不配享有民权的。他们另外想出一种欺骗方法，说人民固然有权，但是人民自己知道无能，所以又把主权“自愿的”交给了政府！在这个公式之下建立着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帝国主义走狗的政权。现在中国革命的政权问题，就是要推翻这种政权而建立无产阶级农民的革命民权专政，这才是真正的民众政权。这种政权现在已经在许多区域里，经过艰苦的英勇的战斗而建立起来。这种政权是真正在所谓“不知不觉的愚劣的”中国民众手里。一些资产阶级的“学者”，尤其是特殊的低能儿式的中国绅士和市侩——国货“革命理论”的崇拜者，不但赞成对于民众实行屠杀，而且要想在理论上证明：不经过教训的民众，不经过考试的代表没有执行民权的可能。请看看吧，这些没有教养的民众，工人、农民和兵士等等，——除开地主和资本家——居然选举了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并不等考试院的核准，而居然把当时的立法、司法、行政的政权机关统

一在自己的会议手里。怎么一回事？这些“愚劣的”民众那里会管理国事！？哼！他们比你们其实高明得多！马克思说：

“革命底所以必要，不但因为没有任何别的方法可以推翻统治阶级，而且也因为推翻者底阶级只有革命之中才能够肃清自己身上的一切旧社会底污点，而有能力去建设新的社会。”（马克思和昂格思论费尔巴赫）^⑨

而且现在，除开这种工农民主政权在全中国范围之内得胜以外，没有任何第二条道路可以挽救中国底殖民地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武力瓜分中国的政策，国联^⑩根据中国伟人的学说而企图实行的国际管理政策，美国多余的金融资本暗中控制中国的政策，不都是殖民地化的事实吗？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主专政，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阀统治，才能够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彻底铲除国际帝国主义底对华统治，这就必须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扫除一切种种封建残余和中世纪的垃圾堆。这才是中国的真正解放，这才是中国几万万民众走上光明文化的道路的开始。现在大都市里的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底直接监视之下，在集中的军阀势力底镇压屠杀之下，进行着艰苦的英勇的斗争，他们正在领导着广大的劳动民众，尤其是农民基本群众斗争，以及流血的战场上的战斗。这种斗争和战斗的目的就在于建立全中国的真正民众政权——工农民主专政，而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

这工农民主专政，同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一样，有过去也有将来。它的过去是帝国主义的统治，是军阀官僚制度，是地主

私有土地的制度。反对着这个过去，反对反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是有“一致的意志”，因为有“一致的利益”。它的将来——是反对私有财产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东家的斗争，为着社会主义的斗争。“工农民主专政无条件的只是社会主义者的过渡的暂时的任务，然而在民权革命时期否认这个任务简直是否认的^②”。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和落后民族，只要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得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是可以转变到工农民主专政，经过相当的发展阶段就过渡到共产主义——跳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这是中国革命的前途；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是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的。所有这些，都要以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为基础。

中国的几万万名民众，不但在现在民权革命的时期，和无产阶级结合工农联盟，而推翻现在的统治阶级，就是在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也将要在另外一种形式里实现工农联盟的新的任务，而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劳动群众的先锋队——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小资产阶级、小私有者、农民、知识分子等等）的阶级联合的特殊形式。”（乌）^②同时，“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的形式之继续。”（乌）^③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不同，就在于这里：小资产阶级，甚至于最急进的小资产阶级，在民权革命之后所希望的，所预先想象的并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一般的幸福和安宁”（例如衣食住行样样齐全，或者“预防贫富战争”而空想一些一劳永逸的计划）；而无产阶级的方法是绝对的肃清一切中世纪的封建残余，并

且并不是为什么和平安乐的天堂，而是为着廓清阶级斗争的道路；使阶级斗争能得到最广泛最自由的发展。小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想望——如果革命始终是不可避免的了——那就更加是一些阶级和平的梦想，他们本是只想尽可能的用和平手段达到所谓高尚理想的目的。而无产阶级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阶级斗争变更了自己的形式，这种斗争——镇压和消灭一切种种资本主义阶级的残余和根源，还要继续一定的时间，一直到一切阶级分别的完全消灭。

这种革命斗争——长期的艰苦的战斗，几千万万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蜕变，不能够不由广大的群众自己来积极的自觉的参加。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在于物质上、精神上提高自己一切的以及其余的劳动民众的革命积极性。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尤其是中国，往往极端的怀疑“愚昧和守旧”的群众，而只相信杰出的个人，进步的光明的英雄或者圣贤，以为只有他们能够教育群众，能够超越凡俗，把这世界领导到天堂里去。天堂——地上的天堂，对于无产阶级的确不是空想，他们的自觉的斗争将要征服一切可能而实现这个天堂。然而这必须从广大的群众的革命战争之中产生出来。一切革命历史都告诉我们：几十年几百年成熟起来的社会矛盾爆发了出来：社会生活在这种时期是特别的非常的丰富。平常浮光掠影的观察者所轻视的，或者不当一回事的群众，在这时候跳上了政治舞台，成为积极的斗争者。这种群众在实践中学习着，尝试着，探索着，提出自己的任务，校正着

“资本主义是进步的，因为它消灭旧的生产方法而发展生产力，同时，在发展的一定阶段，资本主义就阻碍生产力的生长。资本主义发展着，组织着，训练着工人，——它也在榨取着，压迫着，引导到死亡，穷困等等。资本主义自己栽培自己的掘坟人，自己创造着新制度的一些成份，而同时，如果没有‘突变’，那么这个别的成份一点儿也不会变更一般的情形，并不会妨害到资本的统治。这些活的现实生活里的矛盾，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现实的历史里的矛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论的理论——能够把握住它们。可是，自然是很明白的：群众的学习是从生活得来的，他们并不是在书本上学习的，因此，各个人或者各个团体，经常的夸大资本主义发展这一个特点或者那一个特点，夸大这种发展里的这一个教训或者那一个教训，而形成片面的理论，片面的策略系统”（乌梁诺夫）②

中国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途径又来得格外复杂和畸形，严重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占着统治地位的封建残余，维持着许多混杂的纠缠的传统思想。无产阶级同它周围的小资产阶级的多种阶层（农民也在其内），本来是经常的接触着的，这中间并没有一座万里长城，也决不会有。自然，各个人，各个集团和阶层，从小资产阶级转变到无产阶级方面，就不会不从自己方面带着些动摇到无产阶级策略里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之中，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过程之中，也是因此而发生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布朗吉主义③、孟塞维克主义④等等的倾向。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在实验的具体问题上，帮助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实质的说明，帮助新进的国家——中国，更清楚的分辩那些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的阶级意义，而且更加

有效的和这些倾向斗争。

这种斗争在现在是特别需要，特别的紧张了。为什么？不但因为中国革命进到更新的阶段，中国革命负担非常复杂的任务。而且因为工人运动之中一切种种左倾右倾的机会主义，在这阶级斗争紧张的时候，往往很快的和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敌人勾结着，有意地或无意地变成反革命的武器。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群众之中已经取得了无上的权威，所以反革命派往往很愿意冒充马克思主义来捣乱革命的队伍，“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地喂养一些喜欢自称为超阶级的政治家，以及那种喜欢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者——这些先生们故意地有系统地用最好听的最左的话欺骗群众”。例如中国的取消派，为着要反对中国革命的前进，他们故意说什么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封建残余，或者只有“残余之残余”，中国的政权已经完全在资产阶级的手里，因此无所谓民权主义的革命，无所谓土地革命，那些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简直是土匪……这是和统治者一鼻孔出气。但是，他们偏要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再者还有些“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难会议议员的马克思主义”（例如王礼锡^②等等），居然想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反对中国工农对于地主阶级的狡猾的，投降帝国主义的反抗，居然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提议中国无产阶级应当和军阀资产阶级合作抗日”，而其实那些军阀“抗日”，不过是欺骗民众的把戏，事实是借用着打过一次败仗的机会，好去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而“忍痛退却”！

乌梁诺夫说：

“马克思学说现在所碰到的这一类事情，在历史上也有过不止一次了，就是其他的革命思想家和被压迫阶级领袖的学说，在他们为着解放斗争之中，也遇到过的。压迫者阶级在伟大的革命家活着的时候，对于他们总是经常的压迫，对于他们的学说，只有极端的恶意，极端疯狂的痛恨，极端无耻的造谣诬蔑来进攻他们。等到他们死了之后，却企图把他们变成没有害处的神像，所谓把他们登录到徒传里去，给他们的姓名一些光荣，为的是‘安慰’一下被压迫阶级而麻醉他们，同时，把革命学说的内容抽掉，磨灭这种学说的革命的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的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加工制造’，大家都是同意的。忘记，消灭，曲解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和它的革命心灵。而把资产阶级所合用的，或者似乎是合用的东西，抬到第一等的地位，赞赏得特别起劲。”^②

中国革命界纪念马克思逝世的五十周年的时候，特别应当记起这句话！中国这社会的环境，本来最容易发展冒名顶替的“生产”手段！——假冒招牌是一种“小”市场上的自由竞争的方式，同样也用来做阶级斗争的方式了，这自然不但是中国资产阶级用，其实倒是从外国的什么考茨基^③、托洛茨基^④等等那里学来的。中国的特点，只在于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敢于自称是伯恩斯坦^⑤的信徒！这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何等的懦怯，很像他们的主人——无赖式的中国资产阶级。十年前，鲁迅就说过：“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臆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这种反科学的“策略”现在也应用到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了。

注 释

① 乌梁诺夫,今译乌里扬诺夫,即列宁。

② 今译文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③ 神圣同盟,拿破仑帝国瓦解后欧洲各国君主组成的反动同盟。1815年9月在巴黎签订,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正式解散。

④ 非洲,今译非洲。

⑤ 革命同盟会,即中国同盟会,中国资产阶级最早的政党。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同盟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政治纲领。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

⑥ 指1906年12月由同盟会发动的萍浏醴起义,即“丙午萍浏之役”,参加者除农民外,还有手工业工人和萍乡煤矿工人。

⑦ 此函写作时间应为1909年10月下旬。全文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19页,中华书局1985年3月版。

⑧ 《民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1905年11月在东京创办,初为月刊,后改为不定期出版。1910年停刊,共出26期。

⑨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主张取消其他捐税,实行征收经济地租的单一税制。认为这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主要著作有《进步与贫困》、《什么是单一税和我们为什么实行单一税?》等。

⑩ 曾左李,指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湖南湘乡人。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等职。1853年起编练湘军,领兵进攻太平军。1864年7月攻破天京(今南京),封为侯爵。随后同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有《曾文正公全集》。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1860年为四品京堂

襄办军务，招募“楚军”，同太平军作战。后任江浙巡抚、闽浙总督。1866年起同沈葆楨在福州创办马尾造船厂。随后在督办陕甘军务期间，创办兰州机器制呢局等新式企业。1875年督办新疆军务，平定新疆。1881年任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有《左文襄公全集》。

李鸿章，见本卷第468页注⑬。

⑪ 指同盟会领导的自1906年12月萍浏起义至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期间的十次武装起义。

⑫ 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52页，中华书局1985年3月版。

⑬ 即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所建立的北洋军阀政权。

⑭ 全文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6—524页，中华书局1985年3月版。

⑮ 二十四史，清乾隆时规定从《史记》至《明史》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即“钦定二十四史”。

⑯ 全文见《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8—71页，中华书局1985年3月版。

⑰ 今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⑱ 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3—254页，中华书局1985年3月版。

⑲ 今译文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⑳ 国联，见本卷第196页注②。

㉑ 原文如此，有误。

㉒ 乌，即乌里扬诺夫，即列宁。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9卷第343—34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㉓ 今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②④ 今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16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②⑤ 布朗吉主义,见本卷第521页注②。

②⑥ 孟塞维克主义,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他们在党内是少数派。

②⑦ 王礼锡,见本卷第429页注⑤。

②⑧ 今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

②⑨ 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曾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中派立场,提出掩饰垄断资本主义本质的“超帝国主义”理论,并组织中派国际(维也纳国际)。

③⑩ 托洛茨基,见本卷第31页注⑩。

③⑪ 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翼领袖之一,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理论家。他于1896—1898年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上连续发表一组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文章,全面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经济学和政治的原理。

国民党棉麦大借款的目的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

国民党政府在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华北停战协定^①之后，不久就向美帝国主义借到了五千万美金（二万万元）的大借款^②。美国方面拿出来的并非现金，而是四分之三的棉花和四分之一的小麦。这些美国市场上“多余的，没地方安顿的棉花和小麦”，要由中国民众拿出钱来去买，而买出来的钱暂时供给国民党的浪费，将来，仍旧要在中国民众身上搜刮出钱来，去偿还这一笔大借款的本利。

而且这大借款的用途，又显然是大部分是用来进攻中国民众的革命运动的。总之，中国民众在国民党这些借款的手段和戏法里面，将要自己出钱去供给国民党来屠杀自己，镇压自己的解放运动。同时，当然也是出了利钱给帝国主义，而替帝国主义维持他们对于我们的统治，对于我们的剥削。

国民党大借款的目的，首先是在进攻中国的工农红军和苏维埃运动。中国的工农红军和苏维埃运动，是能够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之下的唯一力量，是能够赶出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军队的唯一力量，国民党政府——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府、帝国主义走狗政府，因此，在“严厉取缔杂牌

义勇军”签字于“绝对禁止一切抗日运动”的密约，勒令北方一切抗日士兵“不得向日挑衅”之后，赶紧动员着更多的力量，实行八省“围剿”红军的计划。最近还有调动以前在北方“抗日”的宋哲元^③部队，来江西“剿共”的消息。二万万的大借款，主要的就要用在屠杀工农民众的“剿匪事业”上！国民党的帝国主义走狗的作用，实在暴露到极点了。正因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的进展，正因为国民党三四年来的“围剿”没有一次不是大大的失败，所以这次他们这样露骨的一面更公开的投降日本而奉送热河和河北的“不驻兵区域”，一面就奉行大借款，动员地主资产阶级的全部力量，来屠杀民众的红军苏维埃运动。他们亟亟乎的要实行这所谓“安内”政策的原因是极明显的：中国大多数的工农民众正在觉醒起来，围绕着苏维埃的旗帜，为着自己的解放而斗争，这种斗争的胜利的前途是要消灭中国的地主封建剥削制度，剥夺一切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开辟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那时候，一切反动派，一切地主资本家不能够再来“自由的”剥削民众；那时候，帝国主义的势力，不论那一国的，都要被驱逐出去。因此，帝国主义的列强要一致的指挥着国民党“安内”，供给这样的大借款给他们，而国民党和地主资产阶级也早就决定做各帝国主义的走狗、奴才。他们知道无论日本占据满洲、内蒙，以至整个蒙古和中国的北部，无论美国或是英国再进一步的支配中国的中部和南部，无论国民党所谓“次等殖民地”的中国，都像现在东北四省一样，升任了“头等殖民地”，他们——当做地主资产阶级的整个阶级来看，仍旧可以“安宁的”剥削中国的工农民众。

但是，这是他们的梦想！现在不但苏维埃运动一天天的进展，红军打破“围剿”的胜利，连国民党的报纸也掩盖不住，就是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巨大武力直接镇压之下的大城市里，革命运动、反帝斗争、罢工、怠工、反对停闭工厂和减少工资的斗争，也在扩大起来，团结着新的队伍，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下，一天天的发展。因此，国民党政府更加加紧的向工人进攻。他们从帝国主义主人方面讨来的借款，也就是要用来增加警察，增多那些最无耻的奸细制度的秘密侦探，大批的暗杀，捣毁一切革命团体……他们企图用收买政策，制造革命队伍之中的叛徒，他们企图雇用一些化装侦探坐守在每一个工厂，或是每一个工人区域。他们以为这样可以消灭革命，这样就可以用民众身上括来的钱来完全镇压民众的解放运动。然而要知道，以前袁世凯^④对于当时的革命团体，也同样的用过“征讨”、“围剿”、“收买”、“暗杀”、“坐探”等……一切卑鄙齷齪的手段，虽然在无耻的程度上，他还比现在的国民党差得多，然而这些手段和方法，都是帝国主义走狗的老戏法。这些手段决不能够镇压革命！何况现在的革命已经到了一个完全新的阶段，中国无产阶级有了坚强的先锋队，中国革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的工人、农民群众，有了明确的清楚的革命目标——苏维埃政权，真正民众政权的建立！

中国民众早已不是袁世凯时代的民众。他们的大多数很快就会知道，怎样来“偿还”这二万万的借款！他们都要用枪炮、用梭标来“偿还”的。南京国民党政府这次的借款，是用棉花和小麦借进来的。而我们知道，现在正在闹着全中国的纱厂减

工的风潮，有成千成万的男工、女工和童工，因为减工而失业，而挨饿，而变成十足的叫化子。美国棉花的大批进口，必然要使得棉花的价钱大跌特跌，纱厂的生产更加要“过剩”，中外资本家会因此而更加加重对于工人的剥削，制造更广大的失业。最近，中国棉业和面粉厂的资本家联合会，也已经承认了：大批原料的借贷，虽然可以暂时活动一下生产，然而，人民购买力的绝对低落过程，必然要使更多的生产过剩，引起巨大的恐慌。同时，棉花，还有小麦的大批进口，要引起中国农村里更大的恐慌。棉麦市场上，骤然增加这大批的货物，棉麦的价钱跌落下来，可以使得大批的农民群众，不能够不用最低价格出卖自己的棉花和小麦，为的要去做高利贷的利钱，去交纳苛捐和田赋，去付田租。甚至于因为这个缘故，国内的资本家根本就不需要收买一部分中国农民的产品，他们节省着运费，用更便宜的价钱可以买到政府所借来的棉麦。这样，农民群众就只能“三钱不值两文”的把自己的产品去向地主、债主抵偿租钱，抵偿债务。他们将要弄得吃树皮草叶的日子都没有得过。而另一方面，这些小麦，这些棉花的代价，仍旧是从民众身上搜括去的，吃面粉的，买粗布的小百姓，是负担这等费用的主要部分。一般的说来，棉麦借款的影响，将要使得中国的长期经济恐慌，尤其是根本上的无可救药的农业恐慌，更加深入，更加迅速的走到“天崩地陷”的绝路。工人、农民以及一般民众的生活，要因此更加恶化，他们在国民党的屠杀和搜括政策之下，要成千成万的死亡、流离……他们唯一的出路，只有团结自己的队伍，起来坚决的革命，为着建立真正的民主政

权——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政府要人现在申明这借款只用来“从事生产事业”，或者说，要用借来的小麦“赈济灾民”。这是无耻的谎骗！“赈济灾民”在这三四年来的经验已经太丰富了，每一次的结果，只是一部分投机的商人借此发财，一些名为赈济的绅士借此填满自己的腰包。像去年，在所谓“谷贱伤农”的情形之下，一方面许多民众活活的饿死，他们连最贱的米麦也买不起，另一方面大城市里的商人把谷价压低到最低限度，去收买粮食屯积起来，使得还有谷子可以出卖的农民，比荒年的收入还要减少，而城市的民众却并不能吃到十分便宜的米麦，商人的行会和大资本家的联合仍旧尽可能的抬高着零卖的价格。而在这种状况之下，无耻的国民党报纸，得意洋洋的宣传着：“匪区米价高涨，饿殍载道！”至于“生产事业”，则更是笑话。最近五六年以来，国民党的十二万万公债何曾有百分之三、四是用于所谓“生产事业”的？“九一八”之后，宋子文^⑤吹着牛皮，说一年半载没有再发公债，政府收支相抵。既然这样，为什么又要借二万万的大借款？！这种借款，不是实际上直接或间接的用来做“剿匪”的军政费，又用来做什么？！

此外，美国借款的秘密条件，例如抵押品之类，是没有宣布的。这里，一定有“惊人的”内容。英国伦敦《泰晤士报》的社论已经揭穿这种内幕的一角，它说：中国借新债而把旧债搁着不付利息，甚至事实上还把旧债的抵押品移转到这笔新债底下。英帝国主义因此提议要清查京沪铁路等项的旧债。这里，可见南京政府的出卖中国正在“惊人的”秘密进行。而同

时，这次大借款，使得英、日、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暗斗更加深入，更加剧烈。日本帝国主义的机关报，在“北平议和”的时候，就预言“北方的对日和平，将为中国内部战争重新发动的开始”。而美国大借款成立之后，西南方面胡汉民^⑥等就通电责问，说是“抗日战争既停，政军费收支又适相抵，则此借款之用途显有从事内争之可能”。这些都暗示着列强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各种走狗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开展。无论国内的军阀混战会不会又爆发起来，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都是要更加加重对于民众的压迫、剥削、搜括的。何况他们在镇压民众，进攻苏维埃革命，屠杀反抗的工农……维持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这方面，大家都是一致的，大家正在比赛着谁的杀人本领——反革命手段高强些。

美国大借款的事实只是更加说明了：中国民众——工人、农民、兵士、贫民等等，和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走狗国民党之间没有丝毫妥协调和的可能！容忍国民党的统治一天，我们就要一天受着更大的剥削、压迫，我们就要在死亡、屠杀、饥饿之中成千成万的灭亡，我们就只会在国民党的掌握之中，一天天走到奴隶和“亡国奴”的地位上去，从所谓“次殖民地”升到“全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军阀的枪炮炸弹之下做炮灰！所以中国民众必须坚决的团结，发动一切种种的抗议反对国民党的大借款，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民众——“围剿共匪”，拥护苏维埃运动和红军。中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必定代表几万万工农民众的意志，绝对的否认美国大借款的负担，我们中国的工农民众要一致的起来斗争，要发动反对一切种种剥削压迫的斗

争，要赞助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赞助红军的发展，取得我们的最后胜利，而取消国民党的一切卖国的、屠杀民众的借款！

原载1933年6月20日《斗争》(油印)第45、46期合刊

署名：狄康

注 释

① 华北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占领热河后，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当地驻军二十九军等曾进行抵抗。5月31日，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一线以西以南地区，并划上述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域，使绥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察北(今属河北省)、冀东成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

② 1933年6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签订借款5000万美元的合同，购买美国的棉、麦，即美国向中国推销大宗剩余农产品的棉麦“借款”。

③ 宋哲元(1885—1940)，山东乐陵人。冯玉祥部西北军将领，当时任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曾率部在长城抗击过日军的进攻。后被委任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在七七事变中，所部曾奋起抗战。

④ 袁世凯，见本卷第66页注①。

⑤ 宋子文(1894—1971)，广东文昌人，生于上海。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财政部长。

⑥ 胡汉民，见本卷第148页注⑬。

临死的呼号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

最近国民党的反动报纸时常有这样的论调：

“零星股匪的骚扰，有时虽流窜数省，或者发展到大股的割据，但是这种‘各阶级的垃圾堆’，因为缺乏社会意识，它往往变形变质，禁不起剿抚兼施的鞭撻，便瓦解冰消！可是，今日共产党活动的轮廓却开历史的先例，决不是简单的土匪所可比拟。我们看，从一九二七年共产党的八七会议决定所谓暴动政策以来，纵延六年，横贯数省，□□①虽大军云集，屡次围剿，但其结果仍是此剿彼窜，而未能彻底消灭，甚至在某些地方还表现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情态！”（上海《大晚报》②七月十五日）

国民党的军阀政客，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帝国主义的奴才，也不能够再继续自己的造谣诬蔑了，他们不能够不申明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运动“决不是简单的土匪所可比拟”。他们都在埋怨着“社会缺憾”、“经济破产”、“农村人口过剩”，他们还在埋怨着自己的道德沦亡——“贪污暴政是替共产党制造机会”。他们呼号奔走，互相劝告着说单纯的军事讨伐是不够的了，必须有“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他们不能够不承认自己的统治和剥削制度正在急剧的崩溃下去，他们也就不能够不承认苏维埃运动的土地革命和反帝国主义革命是历史

的必然。自然，他们要说“第三国际的奥援与共产党之加油添酱”使得“这里叛乱”有“如此之蔓延”。

然而中国广大的农民和贫苦群众，正因为得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所以能够打开这一条解放自己的道路。漫天的“野火”正在燃烧开来，要烧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几年来工农红军的胜利的冲破“围剿”，就是铁一般的证据。

于是蒋介石说过几次“六个月剿灭共匪”而屡次丢脸之后，就只得说这次“围剿要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了。于是蔡廷锴^③之类就说在福建“收复的匪区”之内，要实行“平均地权”了。这种逼出来的“民生主义”和一切种种“收复匪区”之后的所谓改革，目的只在于欺骗民众，不但是欺骗那些被杀剩的“匪区”民众，而且是欺骗白区里的一般民众，企图缓和他们的革命反抗，而相信国民党仿佛也在想到什么“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改革”了。不用说这些口头的欺骗以及在“改革”的名义之下进行的那些“新政”，不过是更加残酷的屠杀和轰炸的辅助方法。这些“改革”恰好是箝制和压榨民众的新式手段。只要看极有限的几处所谓“收复了的匪区”里的事实，就可以知道的了。而且为什么只有“收复的匪区”里才实行“改革”呢。原因很明白：群众自觉的实行了革命的地方，国民党的枪炮和大刀的力量其实是微小得很，他们只能用一些狡猾和奸诈的手段来“缓和人”，期待着更好的机会，再进一步的实行完全恢复地主和豪绅资本家的十足的旧式剥削。然而“人心”还是不安的“人心”，是同情于苏维埃革命的，那些现在还“缺乏社会意识”的民众正在一天天的取得这种意识。国民党的一切

“改革”的空谈，也和他们的轰炸政策一样，始终是没有效用的，他们自己也知道。

于是我们到处都听见国民党和一切反动派别的埋怨、劝告，这些埋怨和劝告之中，充满着临死的恐惧和惊慌。他们对于自己的前途已经没有多大的希望，他们只能够在绝望之中，诅咒民众的革命，祷告帝国主义的上帝。看罢：

不久以前，新闻记者公开的问吴稚晖^④：“共匪颇能得人心，你的意见怎样呢？”吴稚晖的回答是：“被压迫时，多能得人同情，及其成功，即如整衣冠读圣谕广训，索然寡味，先前的宣言颇多不能实现，而人心也随之而失矣。”是的，他们只能够这样梦想了，他们已经在预言苏维埃革命胜利之后——就是他们完全失败之后——新的真正民众政权也不久要坍台的。他们只剩得这一点诅咒和“预言”可以安慰自己了！然而，苏维埃革命的领导者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不像骗人的三民主义，那样会“变形变质”。以前世界的资产阶级和一切社会民主党，也曾经“预言”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即使胜利，也只会维持六个星期的政权，而现在怎样呢？！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是真正的民众自己的革命，工农民众自己的“宣言”是一定要实现的，现在已经在苏区实现着，这正是苏维埃革命的最伟大的政治力量！

所以国民党的那样的“预言”，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安慰的效能了。倒是《大晚报》的社论来得直爽得多：它说：“叛乱的火焰势必至于酿成燎原的惨剧！而我中华民族的命运不土崩于两败俱伤的斗争，便鱼烂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炮火！”哼！

“两败俱伤”，“民族的命运”？这表面上仿佛是“革命足以瓜分”的老调，其实是说：国民党的枪炮没有用，“改革”，也没有多大用处，希望“共产党自行崩溃”也是幻想；所以唯一的办法，只有恭请帝国主义直接实行“武装干涉”了！事实上国民党已经在进行着恭请帝国主义的一切步骤。《大晚报》的感叹民族命运的口气，不过是虚伪的无耻的掩饰自己阴谋的武断宣传罢了。

你们这些帝国主义的奴才们现在似乎聪明了些，懂得了许多事情，但是你们还应当懂得：——中国的工农不但要消灭你们，而且还能够连你们的主子——一切帝国主义——都统统赶走，而建立劳动者自己的国家，从破产、失业、饥饿、死亡的命运里，打出一条生路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而你们这些埋怨、劝告、诅咒、祷告、感叹……不过是临死的呼号罢了。

原载1933年7月20日《斗争》(油印)第48期

署名：康

注 释

- ① 原稿两字不清。
- ② 大晚报，1932年2月在上海创刊，解放前夕停刊。
- ③ 蔡廷锴，见本卷第409页注⑤。
- ④ 吴稚晖，见本卷第382页注⑫。

从公债到外债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

国民党在“华北停战”之后，立刻就借了二万万元的美国棉麦借款①。但是在这大借款成立之前的两个月光景，报上曾经隐隐约约的透露一个消息，说已经借到了八千万德国借款，是用来建设钢铁厂，制造“近代武器”的。最近，美国借款之后，宋子文②又赶到伦敦，秘密进行着英国借款。英国国会里曾经提起几次责问，当然并非反对借款给中国，而是提议从新整理扣还旧债（铁路旧欠）。这英国借款现在还要守秘密——英国的外务大臣一口否认。然而宋子文一到意大利之后，立刻就有中国订购意大利大批飞机的消息传出来。此外，四川的刘湘③已经在借英国的二千万外债；而铁道部长顾孟馀④正在向法国进行二千万元的沧石铁路借款……。这些“零碎的”、偶然透露出来的消息，暗示着国民党是在进行着反对中国民众的绝大阴谋。

南京政府成立以来，已经发行了十二万万以上的国内公债。中国地主买办和资产阶级拼命的榨取了工农的汗水，经营着“公债生意”——这是利润最大的“企业”，把大批的金钱供给军阀混战，特别是供给军阀三次四次的“围剿”革命的工农民众和红军。现在，南京政府不能够不转变到外债政策

了——这并不是说地主资本家不再继续榨取工农的汗血。不是的。外债的利息，外债上的一切损失，和国内公债一样，仍旧是工农民众负担的，——这只是证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已经剧烈的崩溃，中国的市面已经周转不过来，所以不能够不立刻在三四个月之中，借进大批的、三四万万元之外债。这些外债的意义很明白，请听听汪精卫^⑤的谈话：

“每年都要拿三万万元到外国去买棉麦，而今年则不必拿现款去买，先借一批回来，然后慢慢来还。”

很明显的，这是今年已经拿不出这三万万元去买了！这是帝国主义故意要中国“慢慢来死”，而快快拿这些钱去制造枪炮，购买飞机——当然不是为着什么“国防”，也不是为着什么“建设农业”，连年的“不抵抗”，“战略上退却”，“停战协定”以及水灾、江河决口等等，早已铁一般的证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借口，都只是天大的谎骗——这些大借款的最主要的目的，却是屠杀中国的革命民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是企图用这种屠杀政策征服革命的苏维埃运动，然后再叫杀剩的民众拿出血汗来“慢慢的还”！而同时，这些帝国主义的借款也就在准备着更进一步的瓜分中国！

原载1933年7月20日《斗争》（油印）第48期

署名：康

注 释

① 美国棉麦借款，见本卷第605页注②。

② 宋子文，当时担任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见本卷第605页注⑤。

③ 刘湘(1889—1938)，四川大邑人。四川地方军阀。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

④ 顾孟馀(1889—1972)，河北宛平(今北京)人。曾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武汉国民政府教育部长。1928年底和汪精卫等人组织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即改组派。1932年3月起，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

⑤ 汪精卫，见本卷第61页注⑧。

“自动的”卖国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

国民党的各派军阀时常把卖国的责任互相推卸，但是，他们又要把卖国的本领，互相夸口。最近，胡汉民^①坐在香港发表了几次谈话，据说是“集中攻击华北停战协定^②，集中攻击蒋委员长”，并且说汪精卫“曾因为反对停战协定而辞职，后来蒋委员长挽留，才把辞意打消”。而汪精卫就赶紧出来声明，说“华北停战系兄弟自动的主张！”这种露骨的无耻真是无以复加。

胡汉民以前在南京的时候，参加过多少次卖国的勾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现在，假使他那一派的人物也能够坐在中央政府里分得一些卖国的地位，那不用说，他也会“自动的”主张停战的。汪精卫的申明，却正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表明自己是卖国的主动者，暗示日本帝国主义不要把蒋介石当做唯一的掎客。

这种卖国的竞赛普遍于一切各派的大小军阀。帝国主义走狗的职位有限，而愿意做走狗的人物却很多。例如北平政治分会竭力的表示对于帝国主义的驯服，希望日本承认他们的“接收”战区，然而日本亲手提拔出来的李际春^③却不肯让步，结果，所谓接收战区而编遣“伪军”的委员长，却仍旧是

“伪军”首领李际春自己。李际春开进山海关之后，立刻就恭读“总理遗嘱”，现在真任了中国南京政府委任的编遣委员长，当然更是国民党的忠实同志而并非“伪同志”了。

再则，冯玉祥扛了“抗日”的大旗，企图联络东北张学良派军阀的残余，夺取河北的地盘做尽一切“左倾”的把戏，准备着出卖民众的更悲残的滑稽剧。但是，河北的何应钦^④和黄郛^⑤等却一步也不肯放松；坐在北平做准满洲国的忠臣是一件好差使。于是冯玉祥“收回多伦”之后就不再抗日了^⑥，又在商量分割比较小些的走狗地盘了，大概不久也要“自动的”停战，“自动的”在察哈尔“卧薪尝胆”了。

总之，国民党的各派军阀，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各种集团，各种帮口，一致的只要屠杀民众，维持对于工农的剥削制度，他们之间的互相攻讦，责备……只不过是抢做走狗罢了。这当然是各国帝国主义的操纵指使进行瓜分中国的步骤和布置。而每个军阀和政客却都要表明自己的卖身是“自动的”，为的要填写自己的走狗身分。

原载1933年7月20日《斗争》(油印)第48期

署名：康

注 释

① 胡汉民，见本卷第148页注⑬。

② 华北停战协定，见本卷第605页注①。

③ 李际春，华北伪军头目。1933年5月率部随日军进关，被国民党华北当局改编为战区保安队。同年6月，同石友三、郝鹏举等组成华北民众自治联军。

④ 何应钦(1890—1987)，贵州兴义人。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担任黄埔军校总教官、教育长，国民政府国防部长、行政院长等职。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

⑤ 黄郛(1880—1936)，字膺白，浙江绍兴人。1922年任北洋政府外交部长和教育总长，1924年北京政变后一度代理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务。1927年后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⑥ 1933年5月，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在张家口同原国民党将领吉鸿昌、方振武等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实行抗日。同盟军迅速将日伪军全部赶出察哈尔境，收回多伦等地。部队发展到10余万人。南京政府对冯玉祥多方施加压力。8月中旬，冯被迫卸去总司令职务离开同盟军赴泰山，吉鸿昌、方振武则坚持战斗直到当年10月在日伪和国民党军队围攻下失败。

庐山会议的大阴谋

——“有组织的饥饿政策”

(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

国民党的报纸，不久以前还说苏联的政策是“有组织的饥饿政策”，说苏联农民的困苦还“过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这当然是抄袭帝国主义的谣言来诬蔑苏联。

然而国民党自己却的确确在实行着“有组织的饥饿政策”。最近庐山会议^①的结果最重要的就是议决严密的封锁苏维埃区域——其余的决议，甚么察哈尔问题，甚么新疆问题等等，都只是军阀混战的“准备”，消息也都是模模糊糊的，只有“川赣剿匪”问题的决议说得清清楚楚：

“实行对于匪区的严密封锁，一切药材、煤油、电料、盐等等都严禁输入匪区，并在匪区附近实行这些东西的公卖，凡是没有‘良民证’的人都不准购买。”

这不是“有组织的饥饿政策”是什么！其实，这不但是饥饿，而简直是造成活地狱的政策。这是要使江西、福建、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的几千百万的民众没有盐吃，没有煤油用……受了伤和生了病没有药可以医，总之，是在用极残酷的手段弄死这几千百万民众。然而这封锁政策的别一

方面，却也表示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国民党的白军比红军多四五倍，国民党的武器——最新式的飞机、坦克车等等——比红军的胜过几十倍，然而国民党的白军不敢开到前线去打。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然而不！他们不敢叫大队的兵士去打，却只敢“封锁”、“包围”、“步步为营”。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的兵士群众不大靠得住了，因为当地的民众极大多数是“非良民”了，因为苏区的广大民众都是红军的“暗探”和“眼线”。

因此，庐山会议就决定了这个大阴谋，要靠饥饿政策去逼迫红军。他们党的报纸和通信社还欣欣然的说：“匪因封锁，大感苦痛”。这些无耻的孙文信徒——“仁爱主义者”，这就算他们的“仁爱性”的表现了！为着自己的解放的中国工农，为着最高的社会理想而斗争的无产阶级，一定要用更坚强的更广大的斗争来答复他们，推翻这些帝国主义走狗和刽子手的统治！

原载1933年7月30日《斗争》(油印)第49期

署名：康

注 释

① 庐山会议，是1933年7月蒋介石、汪精卫及国民党各军事将领在庐山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会议主要议程是筹划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战争。决定将华北大部军队南调江西，并确定了对苏区在军事上实行堡垒政策和经济上实行封锁的政策。

又是一笔卖国账

(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

英、美、日、法帝国主义都在加紧的掠夺中国，但是，它们之间的互相竞争和抢夺，也就越来越凶猛。中国国民党的秘密卖买，往往因为列强之间的互相攻讦而透露出一些消息来。前些时候，美国人的《密勒氏评论》^①公布了英法瓜分中国西部的阴谋（见《斗争》第48期）。最近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国际技术合作赞助中国的建设”，就对于国际委员会和美国棉麦借款^②大吃其醋。于是它也揭穿国民党向英美卖身投靠的秘密：

“此次宋子文^③游外，成立巨额借款，……与国联^④之技术合作，亦为进一步导中国于国际共管。”

而且这里开着一笔英国借款的清账：

“宋子文氏对英接洽借款，其分配用途为：

- | | |
|-----------------|------------|
| (一)铁道部完成粤汉铁路之公债 | 1,200,000磅 |
| 材料费 | 1,600,000磅 |
| 其他 | 4,620,000磅 |
| (二)交通部电信器之增加等 | 48,000磅 |
| (三)招商局购置轮船六只 | 400,000磅 |
| 共计 | 7,868,000磅 |

这只是将近一万万元中国钱的外债。

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还揭露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

“美国军舰富尔顿号，且有将机枪、航空附属品在厦门起岸之事实，且于漳州、龙岩间百二十三基罗米突^⑤建筑铁路计划应募一千万元之一般社债，与以多大之援助，更于年内将潜艇两艘、飞机六架、高射炮六门、炮弹五千发交福建海军，其代价为美国计划在山东湾确保美国海军根据地及蓄煤场之设置权益。”

总之，英美等帝国主义的直接“剿杀”中国红军的设备，以及作为太平洋上进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备——使得日本资产阶级不但吃醋，并且也在加紧准备。日本帝国主义“忘掉了”提起它自己和蒋氏国民党政府的“华北密约”——横贯华北直到新疆的铁路建筑权，以及东北“满洲国”^⑥的承认等等。这是它当然不肯提起的！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同时也是挑拨世界大战的政策，尤其是恭请列强来屠杀工农的政策。

而国民党呢，对于这些消息一概否认，说是“日本神经过敏”，“造作无稽谣言”。然而像蒋介石派的《晨报》，却间接的证实了这些消息：《晨报》的评论说，正因为日本反对“国际技术合作”，妒忌中国的建设和繁荣，可见得“国际合作”对于中国很有益处呢！

原载1933年7月30日《斗争》（油印）第49期

署名：康

注 释

① 《密勒氏评论》，美国人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1917年创办，1953年停刊。

② 棉麦借款，见本卷第605页注②。

- ③ 宋子文, 见本卷第 605 页注⑤。
- ④ 国联, 即国际联盟, 见本卷第 196 页注②。
- ⑤ 基罗米突, 英文 Kilometer 的译音, 意为千米、公里。
- ⑥ 满洲国, 见本卷第 414 页注⑥。

国民党的“理论斗争”

(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

国民党久已用不着什么理论了。他们的理论就是枪炮、炸弹、飞机，就是监狱、皮鞭、电刑，以及腰斩等等的“文明待遇”。他们所用的屠杀政策，固然也毁灭了许多宝贵的工农的生命，烧掉了许多列宁小学、图书馆和工农的房屋，然而并不能够使几千万的苏区民众“重新”相信三民主义。他们的严刑政策，固然也杀死许多革命干部，固然也逼出了几篇自首者的宣言，说是从此“改过自新……为三民主义服务”，然而这些无耻的叛徒的“自首”，其实并不是严刑敲打出来的，而是嫖赌吃喝的猪猡生活所引诱出来。三民主义的“理论”不能够一刻离开猪猡生活，只有猪猡生活的人，他才相信“三民主义是救国的唯一主义”。三民主义理论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不要说国民党就根本没有什么理论。他们还是有的，而且不止一个。最近，国民党内部就在发展着“理论的斗争”。一方面是蒋介石派，他们主张用武力“统一”中国，就是打平一切小军阀；别方面是汪精卫派，他们主张“分治合作”——“以建设求统一”。这两方面的辩论，在上海《晨报》和

《中华日报》^①上曾经热闹了好多天。很明显的，蒋介石派代表着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之中的领导阶层，要想造成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唯一走狗”的资格，要想压倒一些霸占地方市场的豪绅资产阶级和地主买办的小帮口。而汪精卫派的主张，就相当的反映着这些小帮口——极端复杂的、互相冲突的、许许多多的小帮口，他们觉得自己也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走狗，他们不愿意蒋介石派包办卖国事宜。这两派在一致“剿共”的政策之中，也在互相竞争着，互相表示“剿匪”的手段更加高妙，例如蔡廷锴^②等讥笑蒋介石“剿匪五年，而一无所成”，而自己以为能够“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使“共匪无由煽惑”。这个“理论斗争”，包含着军阀混战的种子。

这样，我们可以看见国民党内部的理论斗争的基础是什么。最近的庐山会议^③，决定了察哈尔问题^④等待国民党的五中全会解决，理由是冯玉祥^⑤、方振武^⑥也都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解决他们的争论问题，“最适宜的机关当然是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同时就在庐山会议的时候，上海《晨报》的论文说：

“察哈尔问题乃统一与割据两势力决胜之分歧点……吾人认为：政府倘为不姑息养奸之政府则应予老奸巨滑之辈以严厉之制裁。”

然而庐山会议的决议，却显然是“姑息养奸”的决议，这里，可见得蒋汪两派“合作”的政府里面“理论的斗争”，暂时还只是“理论的”，原因是他们两方面，都在苏维埃运动和民众反帝斗争的威胁之下，着重在共同对付“匪共”的任务——这却

是枪炮的斗争了！

原载 1933 年 7 月 30 日《斗争》(油印)第 49 期

署名：康

注 释

① 《中华日报》，1932 年，汪精卫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委派林柏生在上海创办，1945 年 8 月停刊。

② 蔡廷锴，见本卷第 409 页注⑤。

③ 庐山会议，见本卷第 617 页注①。

④ 察哈尔问题，参见本卷第 615 页注⑥。

⑤ 冯玉祥，见本卷第 470 页注②。

⑥ 方振武(1885—1941)，字叔平，安徽寿县人。安庆武备学堂毕业。1926 年 1 月率部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五军军长、第五军团总司令等职。后改隶蒋介石指挥，任国民党第四军团总指挥。1933 年 5 月，同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8 月，冯玉祥下野后，同吉鸿昌在长城内外继续进行抗日活动。10 月抗日同盟军失败，出走香港。

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新鲜把戏

(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

最近有一个“新鲜”而奇特的消息：在满洲据说成立了“华东共和国”，这共和国的宣言和告民众书，避开了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等等的名义，而申明在国联报告书①的基础上建设“反日”的新国家。“新国家”的地域是：

- (一) 吉林省的东宁县(定名中京)、虎林等为中央区；
- (二) 黑龙江东部为黑东区；
- (三) 辽宁省的东部为辽东区，还包括韩国②的西北六郡；
- (四) 苏联之远东省“暂借”为远东区。

这里很清楚的是“新国家”要割取日本统治之下的韩国一部分，同时，还“暂借”苏联领土的远东省(海参崴、伯力)。而且它的宣言上说：“近复遣使苏联，得其口头之援助。”(告民众书)这个用意是明显的，它要挑拨日本发动进攻苏联的帝国主义战争。它的告各国书上虽然说着“为消弥白色帝国主义及赤色共产主义之斗争，设立此缓冲地区”，而其实是造谣挑拨，想激起反苏联的战争，——这是彰明较著的。苏联对于这种“新国家”决不会给什么“口头之援助”！这个华东共和国的申明，不过是想暗示“苏联有赞助割取日本领土的阴谋”，然后

日本可为借口捣乱。

况且据报上的消息，这“新国家”的政府人员：陆军部长、外交部长、理财部长都是外国人，其中的陆军部长据说还是苏联籍(!)而这消息的来源，就是“满洲国”政府机关报的《大同日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把戏——挑拨、造谣、诬蔑……真是无奇不有!

这共和国虽然说“义不帝秦”——就是仍旧“实行民主共和”，然而它的“民主”是“华东共和党”的一党专政——“立法委员……由党部票选”。这很像中国国民党的化身。所以它虽然不提起什么三民主义等等，却不能够不使人□□^③而且它宣言“将来倘祖国收复东北有日，即将率众来归，同隶版图。”所以它虽然不提起什么三民主义等等，却不能够不使人怀疑：国民党是参加这种帝国主义阴谋的。宣言上和告各国书上，特别没有提起国民党，原因大概就是“华北停战协定”^④，因为停战已经有了协定，所以这华东共和国不肯牵涉国民党。这或者是国民党自己在“华东”里起的作用，或者是“华东”体谅国民党的苦衷，省得引起外交上违背“秘密”的纠纷。总之，国民党和华东共和党，都很愿意帮助帝国主义发动反苏联的战争——这倒是没有疑问的。东北义勇军^⑤的群众应当懂得帝国主义的阴谋，懂得一些“爱国”绅士的鬼计，不会上他们的当的。

原载1933年7月30日《斗争》(油印)第49期

署名：康

注 释

① 国联报告书，即《中日纷争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又称《李顿报告书》。李顿调查团在中国东北实地调查后，于1932年10月在日内瓦、东京和南京同时发表报告书。承认“东北属于中国领土”，但又“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利益”，主张在东北设立“自治政府”，进行国际共管。因而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② 韩国，即朝鲜。

③ 原稿缺两字。

④ 华北停战协定，见本卷第605页注①。

⑤ 东北义勇军，见本卷第207页注⑩。

四川的军阀混战和上海废战同盟

(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

四川刘湘和刘文辉等等的混战^①，明显的表演着军阀的抢夺帝国主义走狗的饭碗和地盘。这些互相混战的军阀都是真心诚意的要“剿灭共匪”的，因此，他们又互相责备着“内战妨碍剿匪”。他们各自代表着当地绅商之中的小帮口，互相抢夺着霸占地方市场的特权。他们不仅只是“军人”而已，他们都还有经济的、商业的、金融的利益。

然而刘湘现在占着上风了，他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他“负起了统一四川军权”^②的责任。同时，上海的“废战同盟”^③也就通电指斥刘文辉的罪状——其中第一条当然是“妨碍剿匪，挑拨内战”。这所谓“内战”是军阀内部、地主资产阶级内部的战争。上海的废战同盟是谁？——就是虞洽卿^④、钱新之^⑤等等大资本家和新式“巨绅”，这是一帮买办和大商人，还有“国货工业家”，历来指仗蒋介石派的国民党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的政变^⑥，是他们借了一千二百万元“反共特别经费”给蒋介石的；五六年来的十二万万公债，是他们替宋子文^⑦包销的，……屠杀上海的工人，屡次都是他们在帝国主义的驱使和支配之下来主持的。现在，最热心的“请求”和“帮

助”国民党“剿匪”的是他们；最出力的压迫和欺骗罢工工人的，也是他们（例如虞洽卿的宁波同乡会和黄色海员工会的关系）。这次的“干涉”四川军阀混战，不过是再表示一次他们的“坚决和忠实”于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任务罢了。

刘文辉在上海废战同盟的通电里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军阀。其实，刘湘的十恶不赦何尝不是一样？只不过因为刘文辉的帮口“太薄弱”了，负担不起屠杀四川几万红军和几千百万工农的责任，所以他就受到上海绅商的严厉的指斥。刘文辉等也曾经出力屠杀过，现在正在屠杀，将来也还要尽力屠杀；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刘湘那么大的“能力”，因此，英国帝国主义的借款只落在刘湘手里，因此，上海绅商的颂扬也只落在刘湘头上。刘文辉等对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是“不能够把全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过于早的只顾自己一帮的“私利”。所以，这所谓“废战同盟”就把开始战祸的罪名都加到他们身上。他们自然要努力杀“匪”来赎罪了。

对于我们，这里最明显的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在它们临死挣扎的时候，正在“生长着”，正在团结着一切反动势力来进攻工农兵民众的革命。假使有人还只觉得国民党政府、党部和军阀是民众的敌人，而不知道各地商会领袖，以及一切种种“绅商”、“闻人”是同样凶恶的敌人，那就是一个大错误。这是需要极广大的民众知道的。

原载1933年7月30日《斗争》(油印)第49期

署名：康

注 释

① 1933年8月初,四川军阀刘湘同刘文辉在岷江开战,刘文辉失败,退入西康。刘湘,见本卷第624页注③。刘文辉(1895—1976),四川大邑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四川省主席和川康边防总指挥、西康省主席、川康绥署副主任等职。1949年12月在四川省彭县起义,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② 1933年8月初,南京政府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

③ 上海“废战同盟”,即上海“废止内战大同盟”,九一八事变后,由上海商会联合会、银行公会等发起组织。

④ 虞洽卿,见本卷第230页注⑦。

⑤ 钱新之(1885—1958),浙江吴兴人。金融资本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财政部次长、浙江省政府财政厅长、中央银行理事等职。1929年后辞去政界职务,专营实业。九一八事变后曾参加上海地方维持会,任副会长。

⑥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的政变,即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

⑦ 宋子文,见本卷第605页注⑤。

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

(一九三三年八月七日)

《红色中华》^①报（从第一号起到七十二号——中间缺少十四号到三十几号）的确能够反映中央苏区的各方面的生活，并且产生政治上的领导作用。这里，我们看见苏维埃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虽然还是非常不够），我们看见工农群众的热烈斗争的各种运动，看见土地分配问题、司法和肃反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反富农和反投机商的斗争的开展和种种进步。最主要的是：《红色中华》一般的说来，的确是一个斗争的机关报。在赞助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方面，这个报虽然还不能够充分的执行自己的任务，然而总路线是没有错误的。这里，我们只说一说《红色中华》的几点缺点：

第一，《红色中华》在最后二十几期已经声明改组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苏区党的中央局和全国总工会的中央局的联合机关报，但是，报上所反映的党部在一切政策和群众之中的领导作用是非常之模糊的。“党的建设”——各级党部的情形、各级党部在苏维埃地方政府之中的作用、各级党部的发展、各级党部的优点和错误等等，必须反映在这个报纸上。照现在的几期看来，却只有“苏维埃建设”，而没有“党的建设”。

同样，工会的作用更看不见。

第二，“自我批评”在这报上也已经有相当的发展，但是，还不够。而且有这样一点缺点：就是一些坏的现象倒是具体的指出来的（这当然很好），而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的运动，总之，苏区一般的社会改革，从政治经济的大问题直到种种人情风俗、日常生活上的问题，却只有笼统的叙述。往往可以读到这样的通信，说某某乡、区春耕运动“胜利了”，“田野都是一片绿色”，而没有具体的描写，没有“有名有姓的”叙述。这是应当改正的。关于优点和胜利的记载要更具体些。再则，“铁锤”栏暴露一切坏现象和缺点的时候，往往不提党的纠正政策；例如读到“乡苏维埃主席剥削民众”的标题之后，找不到当地党部对于这个主席怎样处置的消息。

第三，消息的编辑方面也有很大的缺点。这报虽然还只是三日刊，而照性质说，应当担任日报的任务。因此，必须使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不论是战线上的新闻，还是春耕或秋耕运动的进展，或是退还公债的运动等等），都有明晰的叙述，一期一期的继续下去，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而现在的《红色中华》报，却偏重于鼓动性的报告胜利的标题（这当然也是必要的）。自然，在军事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有些消息是应当秘密的，但是，这不过为着作战的利益。同样为着作战的利益，应当使红军和工农群众每天明了战斗的总阵势——军事方面是这样（常登载地图等），其他方面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以为消息和新闻的编辑方法是应当改良的。

第四，社论和一般论文的指导作用还应当加强，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红色中华》报上对于有些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机械的，至少，说服性质太缺乏些。例如对于婚姻问题，对于红军士兵和家属通信的问题，以上的答复就太机械，不能够对着群众之中一些人的怀疑，而作有力的解释。再则，我想对于好些新的问题，例如帮助本籍红军士兵家属耕田的问题，调动耕田队耕种红军公田的问题，扩大红军的问题……还需要时常有指导性的解释论文。单是指出某某地方用强迫手段的错误是不够的，还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党部怎样去解释，这就是说用这中央机关报的名义直接对一般民众说明某种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恶习。

第五，我们以为工农兵通信运动对于这中央机关报以及一切军营、城市、作坊的小报，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可以使苏维埃的新闻事业发展到更高的一个阶段。第一是特约通信（现在已经有一点，然而看来是偶然的外来的投稿，不是《红色中华》自己去组织的），这可以用报馆特派记者到各个重要战线、各个重要的区域，但是这还不是工农兵通信运动的本身。第二是要组织每个地方、每个战线的工农兵通信协会，帮助能够开始写些通信（关于当地的事实和批评的通信）的士兵、贫农、工人组织起来，有系统的“发稿”给各种小报、壁报，而《红色中华》报可以利用这些稿子，加以编纂而使得自己的新闻栏更加丰富起来。

第六，除《红色中华》之外，还应当由中央局出版一种《工

农报》(像联共中央的《工人报》和《贫农报》),就是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这在苏区,尤其是中央区,现在特别需要,而且也许是可能的了。

因为没有可能致细的研究这许多期的《红色中华》报,所以我只能够写出这一些感想,希望这对于《红色中华》能够有点帮助。

原载 1933 年 8 月 7 日《斗争》(油印)第 50 期

署名:狄康

注 释

① 《红色中华》报,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1934年的一段时间,曾任该报主编。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红色中华》曾出油印版。1937年1月29日改名《新中华报》,在延安出版。

这回不“自动”了!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

汪精卫的报告说：“至于国联技术合作委员会，据宋部长① 来电郑重声明以下两事：其一，绝对不涉政治；其二，由我国自动绝不自行提议。如此，则亦何致损及主权，更与共管云云毫不关涉。”上次华北停战协定②，据汪精卫自己说，是他“自动”主张的，并非出于蒋介石的强迫。而这次实行国际共管，却决不由中国“自动”提议了；而且不由中国自行提议，那就不致于损及主权!

这意思是：国联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事情，只要不是中国自己去提议的，那就不会变成国际共管，也不会损及主权。照这样说法，国民党还可以说：——满洲、热河也并非中国国民党“自动的自行提议”去请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因此也没有“损及主权”。

而事实上，国联是英法等列强帝国主义政府的联合办事处，它本身就是百分之百的政治机关。如果说，一个国家可以请任何的外国专家和工程师私人来做事情而并不涉及政治，那么，请国联派委员来，就绝对不会不涉及政治。所以“不涉政治”的说法，已经可笑极了！而还要说“由我国自动绝不

行提议”就会不损及主权，那更是荒唐之至的鬼话。这等于说，由国联方面来发动“共管”，国民党就会接受，而且还会解释说：这并非国民党政府自动的自行提议卖国，而是国联方面要买国，因此，国虽卖了而主权却并不损害。

原载 1933 年 8 月 14 日《斗争》(油印)第 51 期

署名：康

注 释

- ① 宋部长，即宋子文，当时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
- ② 华北停战协定，见本卷第 605 页注①。

宁可送热河，不可失南昌！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

“本年三月间，中央抽调一部精锐赴长城作战，南昌几乎失守，及蒋委员长回镇南昌，始保无虞。”（汪精卫报告）

今年三月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十天之内攫取了热河全省的时候。那时候，据汪精卫的口供，“蒋委员长”还抽调了一部分精锐的军队“赴长城作战”，这是当面造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几乎没有打什么仗就占领了热河，热河明明是国民党双手奉送的，因为开到热河来的日本军队和满洲军队，同样是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的，同样是帝国主义走狗的军队，所以，国民党虽然未必十分愿意缩小自己的走狗地盘，而让一部分给李际春^①、溥仪^②之类的走狗，然而也可以签订出卖华北的密约，做定日本帝国主义的次等走狗。因此，恭恭敬敬的奉送了热河。

至于南昌的几于失守，那要开到南昌来的新的军队，却是中国工农民众的军队，却要在南昌建立真正的民众政权，却要号召起更广大的工农兵士群众去打退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因此，为着保障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为着保障帝国主义的统治，为着不准工农红军和广大民众去打帝国主义、去打满洲走

狗，所以国民党的一切军阀：蒋介石、何键^③、陈济棠^④等等，赶紧加调几十师军队去轰炸苏区的民众和红军。

他们的“中心任务”是“宁赠友邦，勿与家奴”^⑤——这是孙文的三民主义的“最后的真谛”！

原载 1933 年 8 月 14 日《斗争》(油印)第 51 期

署名：康

注 释

① 李际春，见本卷第 614 页注③。

② 溥仪，见本卷第 418 页注⑤。

③ 何键，当时任五省“剿匪”联军西路总司令，参与对湘赣苏区的“围剿”。

④ 陈济棠，见本卷第 95 页注⑬。

⑤ “宁赠友邦，勿与家奴”，见本卷第 229 页注⑤。

狗抢骨头吃!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

美国棉麦借款的五千万黄金，是美国财政资本抛下桌子来的一块肉骨头。于是中国的军阀、官僚和资本家，就像一群哈叭狗，大家起来你抢我夺：

浙江省政府说，为提高浙省工商业等等起见，要三千万元（中国钱）。

安徽的什么建设计划里，说要一千万。

广东方面的西南要人，说建筑黄埔商港，也要分一大笔款项，否则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会用这借款去做打西南的军费。

.....

最后，上海报上突然透露了一个惊人消息说：“福家洋行已经抛出万包美棉，仅售与东棉纱厂、日新纱厂与江花商行，以上三厂，尽为外商。”……于是“华商纱业界方面，对于政府将美棉转售外商之举，一致表示愤慨，谓政府此举将使已濒破产的华纱业界已陷于万劫不复。”

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屡次指天发誓：对日本说这决不是“以夷制夷”；对西南说决不以此款移于增加军费；对资本家说，此次借款用途限于农业、工业之建设。所以政府方面的通信社，

就否认福家洋行经手转卖美棉给外国商行的消息。然而否认尽管否认，而四五年来的国民党的所谓建设，都是奖励资本家做公债生意，做“改良的”买办生意，搜括钱财，供给军阀混战，供给屠杀民众的“剿匪”战争。任何真正发展农业、工业的建设也不会有。

有的只是：军阀、官僚、华商资本家，一群群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走狗，在“建设”的名义之下，大抢其骨头吃！只要看看：各方面怎样各自“一致表示愤慨”。哗啦哗啦，争多嫌少，就可以知道这些分赃的狗崽仔是多么“勇敢”！

原载 1933 年 8 月 14 日《斗争》(油印)第 51 期

署名：康

国民党的“仁爱”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

武汉的“剿匪”司令最近发出了一道命令，说“匪区”的老人和儿童不应当杀，而且是说的“不宜多所杀戮”。这算是孙中山的“仁爱”的“民族固有道德”！

第一，这命令证明以前已经“多所杀戮”了，而且连老人儿童都杀了不少了。第二，这命令只说“不宜多所杀戮”，而“少少的”杀戮些老人儿童还是适宜的、必须的。第三，这命令其实只是骗骗白区的读报的群众，事实上，六年来的“剿匪”期间，不知道下过几十次这一类的命令；同时，也不知道杀掉了几千几万的老人和儿童。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些中国地主资产阶级不推翻，国民党的“仁爱政策”是没有终了的日子！

原载 1933 年 8 月 14 日《斗争》(油印)第 51 期

署名：康

最大的奸商——国民党政府!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汪精卫前次对于棉麦借款的解释，就说：“每年棉麦入口总额价值达三万万万余元，此次棉麦借款，不过由现款买进来兼为由信用赊进来，如此办法，……可以说是有利无害。”但是只过了十天光景，汪精卫就不能不承认“津浦沿线所有产麦确有停滞产区之情事”。而且这并不是因为运输的车辆缺乏，或是交通梗塞，而是因为市价不好，不能够销售。贫苦农民每一家所收获的麦子都是很少的，他们要靠着麦价还租、交税、还债，……他们一年的生活费以及经营田地的肥料、种子，修理房屋、耕具等等的需用，大半都要靠这一笔麦价。然而今年是麦子没有销路！原因很明白，市场上一下子拥到了美国借来的麦子，全国的麦价多多少少都要受着这个影响而大跌特跌，中国商人资本家于是乎又多了一个借口，趁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大的压低收买麦子的市价，他们故意不向小农去收买，甚至于拒绝收买。这是强迫小农用再低的价钱出卖，以便他们赚着一大笔利钱。至少，他们是想把美国麦子拥进市场的损失，尽可能的转嫁给农民群众。美国财政资本的压迫他们，决不足以引起他们的抵抗，而只足以使他们加重对于中国工农群众

的压迫。农民群众因为这次棉麦借款而更加要破产，这已经有了铁一般的事实！

汪精卫还有什么可以说呢？！他这个无耻的狐狸精说：“据详细调查的结果，才知道国内产麦所以滞销，乃由奸商之操纵，他们以为政府既借到大批美麦，更希望能够以廉价买得，或暂时赊用，于是对于国内产麦，便拒而不销。同时，产棉各地亦接有相类的报告。”好，他想把罪过都推到奸商身上去！

然而他对奸商怎样处置呢？请听吧：“但奸商之所以出此，亦有其不得已之原因，……我们一方固要保护农民、工人，一方尤其保护工商业者，如此才是全民之利益！”汪精卫到现在还来说什么“保护农工”！其实他在这里已经明显的承认了他的保护奸商的政策，而且借进美国棉麦的是国民党的汪蒋政府，希望用这批棉麦大做生意，赚一笔大钱去屠杀苏区也是国民党汪蒋政府。所以汪蒋的国民党政府不过是最大的奸商！

原载1933年8月27日《斗争》(油印)第52期

署名：康

国民党的所谓统制经济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以中国之大，道路之少，都市对农村发展之日趋畸形，遂使一方面有谷贱伤农之区，一方面有秕糠充饥之地，甚至有些地方，米麦堆积，竟要火烧，有些地方，只有树皮草根，虽欲求秕糠而不可得。此皆需供不均所致，如谋救济必求调剂，欲求调剂，必先行统制。”(汪精卫，八月二十一日纪念周报告)

这种经济上的矛盾现象，都是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结果，也就是国民党统治的结果。现在国民党也来讲什么“统制粮食”了。但是，他们“统制”的政策是明显的：(一)在谷贱伤农之区，再多借些美国的麦子进来，使得谷价更贱，农民更加破产；(二)在秕糠充饥之地，再加些苛捐杂税：讨赤捐、剿匪捐、航空捐……使得你连秕糠也吃不成；(三)一方面在米麦堆积的地方实行火烧政策，别方面禁止这些米麦运进苏维埃区域，严密的封锁苏区，实行饿死几千百万人的政策！(四)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在“与各方面的人民团体合作”(和绅商的商会等等合作)，“收买食粮，规定食粮价格”，目的是要使大多数人民只吃树皮草根，是在于防止食粮等等“流入匪域”！

这所谓“统制经济”，所谓“食粮统制”政策，完全是加深空前的经济恐慌的政策，完全是搜括中国民众的汗血去供给帝国主义——偿付外债利息，完全是要镇压革命运动而想用饥饿来摧残真正反帝国主义的苏维埃革命。他们的这种企图，一定要在广大的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打击之下打得粉碎的！

原载 1933 年 8 月 27 日《斗争》(油印)第 52 期

署名：康

国际反帝大会—— 反对国民党的外债政策！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调查团到了中国！在上海将要举行国际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代表大会^①。中国的工人、中国的一切革命团体，除开其他的准备大会工作之外，必须着重地注意反对国民党的外债政策的问题。每一个工厂的工人、每一个革命团体……都要经过反帝大会，经过国际反帝调查团，经过各国劳动者和革命者的代表，表示我们对于国民党外债政策的抗议，我们要请世界各国的工人和革命者，一致的起来反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等借给国民党政府巨大的外债，因为：

(一)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借款都是用来屠杀反帝革命运动的民众的，都是用来进攻中国的苏区红军的。

(二)国民党政府运用这些借款，组成封锁苏区的政策，企图禁绝食粮、药料、食盐、电气材料等等的输入，这是谋害数千万人生命的残酷的政策。

(三)国民党政府运用这些借款，制造军器、购买飞机……——便利他们扩大轰炸苏区的残暴手段。

(四)真正反帝的、代表劳动民众的中国苏维埃政府已经宣言否认所有这些外债,一切帝国主义的政府,应当知道他们借款给中国国民党政府,是要负着屠杀中国民众的直接责任的,他们应当受着自己国内革命民众的最后的惩罚!

原载1933年8月27日《斗争》(油印)第52期

署名:康

注 释

① 国际反帝大同盟代表团为调查国联调查团在中国的活动,于1933年8月18日到达上海,9月30日,参加了在上海沪东区秘密举行的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由宋庆龄出面组织,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上海反帝大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负责筹备。

我对于错误的认识*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最近两三个月,我在《斗争》上发表了一些短评。这些短评里——自然不只在这些短评里——暴露了我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经过中央的指示,经过《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的两次讨论,经过同志们的纠正,我才认识了我的错误。在我最初写给《斗争》的那封信(《我的错误》)里,我不但没有承认错误,其实反而加深了错误。为着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为着党的路线而斗争,我是应当把我现在对于自己错误的认识写出来,而请求中央和同志们的指示的。

我的那些短评,以及其他的文章,虽然没有有系统的叙述我个人对于革命形势的总观点,但是这些意见,不会没有整个的观点做基础。换句话说,就是这些意见有一个有系统的整个的立场。这立场是不是和中央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相同呢?

* 1933年6月至8月,瞿秋白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斗争》(油印)上以狄康为笔名,发表多篇主要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同年9月22日,当时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领导作出一个所谓《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名批判瞿秋白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瞿秋白被迫写了此检讨。

不，不相同的。这是个机会主义的立场。

中央的决议说：“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和残酷的阶级决战。在这次‘围剿’中，帝国主义的作用是更加加强了，没有帝国主义的帮助和组织，新的‘围剿’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实行把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最具体最凶恶的步骤。它同帝国主义在华北的军事侵略及资本进攻都密切的联系着。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就是阻止危机中的帝国主义出路的斗争，就是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斗争。五次‘围剿’的粉碎，将要使我们有完全的可能，实现中国革命在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这个胜利将要更加扩大和联络各个苏区，取得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将要根本打破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来完成殖民地化中国的计划，而我和帝国主义的武力冲突成为必不可免的前途。”

这里两种道路（殖民地化的和苏维埃的）和两个政权（帝国主义走狗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和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的阶级意义，反帝国主义的意义，消灭民族危机，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经济总崩溃，而开辟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前途的意义，都极清楚的，极明显的说明了，而且极清楚的，极明显的指出了这个斗争剧烈和残酷的现在形势，以及它的发展的前途。

而在我的那些短评里，却没有用这种立场做基础的。例如中央的决议，指出“军阀混战的爆发虽是暂时阻滞着，然而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认为国民党正在“团结反革命的各派军

阀，一致向苏维埃和红军进攻”。这里，我显然没有真正了解两个政权对立与军阀内部矛盾的相对关系，虽然我的文章里，也有些“两个政权的对立是主要矛盾”等等字样，然而那只是字面而已。而且，我在《庐山会议的大阴谋》那篇短评里，认为国民党只有封锁——所谓“有组织的饥饿政策”，这也是极大的错误。国民党的封锁，当然是进攻苏区的一种政策，但是这不是主要的唯一的政策，而只是武力进攻的总政策里的辅助政策。而在殖民地化中国的总计划里，封锁政策更加只占着次等的地位。（我的这种错误，当然不仅只表现在《庐山会议的大阴谋》那一篇里，在其他文章里也有的。其他的错误也是一样。读者可以参观四十九至五十二期《斗争》。这种错误，暴露着我对于两个政权对立的阶级内容没有真正的了解，对于两个政权对立的剧烈程度估量得太低。

再则，例如中央决议说：“没有帝国主义的帮助与组织，新的‘围剿’是不可能的。”而我在几篇关于外债问题等的评论里（例如《反帝大会——反对外债的问题》），都没有了解到这一点。虽然一般的也说到帝国主义帮助屠杀和“围剿”，但是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帝国主义的作用的加强”。而且，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现在在更加疯狂的准备和进攻苏维埃红军“在重新训练自己的军官，在调遣新的大批的军队”——这应当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借款和资本的进攻，和白色恐怖的残酷，和武断的欺骗宣传等等，联系着来估量。这也是我当时所没有真正了解的。

中央的决议说：“决定中国革命形势的增长的三个主要的

因素和柱石,是更扩大与尖锐了,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支流是极猛烈增长着”。“革命形势的开展正走到一个急剧的转变的关头。”

这是中央对于革命形势的正确估量。而我在以前的立场上——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是没有看见这个“转变关头”的意义的。自然,对于革命形势之中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就不会有正确的估量。

例如中央的决议说:“苏区是扩大与巩固了,全国红军有一倍左右的数量上的增加,红军的战斗力大大的提高了,苏维埃政权是更进一步的巩固了,他对于全国民众的影响是更加扩大了,不论在苏区与非苏区之中,我们党的工作也有了进步,党的政治影响极大的开展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及本身的组织力量是增加了。”而我在短评之中却说:“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的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虽然下文接着说明白军的不能够“荡平”是因为白军兵士和一般民众之中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影响的扩大,然而这问题的提法根本就是错误的;而且即使单说“物质上的力量”,也是抹杀红军战斗力的大大提高,等于诬蔑红军。这其实是一般的——不但在军事上物质上——对于革命力量,对于阶级力量的估量太低。同时,我的评论里,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力量没有正确的明白的估量,尤其是在一些外债问题、混战问题、经济问题上,都没有指出敌人力量的削弱,没有指出统治阶级的困难是崩溃中的困难,是死亡中的困难。因此,从我的评论里,不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统治阶级力量的削弱,国民党统治的剧烈的崩

溃……将要随着我们的新的胜利与工作的改善而更加加速。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中央决议）

再则，中央的决议并不是不看见我们自己的缺点和弱点（参观决议的第二条下半）。中央说：“所有这些弱点就妨害我们在粉碎四次‘围剿’中实现中心城市的夺取和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正因为我们的弱点和困难是生长中的，胜利中的，萌发中的困难，所以，我们有着一切可能来克服这些弱点和困难，而向着胜利前进。而我呢？在《我的错误》那封信里，以及在第一次讨论中央决议的时候，我想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就说：——我是对于革命的军事物力量估量太低，而对于革命的政治力量（兵士和民众之中的党及苏维埃影响）估量得过高了。这又是加深了错误。难道现在要对政治力量估量得低些吗？！事实上，正因为红军力量的大大加强，党和苏维埃政治影响的扩大——这是丝毫也不应当减低估量的——所以，“蒋介石不能不暂时改变积极进攻为城防的政策，而在新的基础上，调遣新的军队，组成新的力量，以较长期的准备，来进行新的五次“围剿”（中央决议）。而照我短评里的论调来说，却是：“因为革命影响很大了，白军兵士都不肯去打红军了，所以白军军阀不敢再开兵队去打，而只能用封锁政策了。”既然如此，那么，后来我又承认党的政治影响还没有这样大，我就势必至于要承认白军不但敢去打，而且可以在两三个月内“荡平”红军了。这是替悲观主义做开路先锋。中央同志说我从“左”的错误到右的错误，这是的确不错的。

我以前是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恐惧着革命方面的困难和弱点，而用空洞的夸张来自己安慰自己，自欺欺人，后来，在这同样的立场上，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假使我不在中央指导之中纠正我的错误的根本观点——那么，势必至于要认为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影响都很小，而红军的“物质上的力量又比白军差四五倍”，结论当然是革命一定失败，五次“围剿”不能够冲破了。中央同志说我的错误在基本上是和罗明路线^①相同的，我分析自己的错误观点之后，诚恳的接受这个批评，而要为着纠正这种错误而斗争。

我以前的错误是不看见“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根本上是对于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量，不过带着些“左”倾词句的假面具罢了。我在中央的指导之下，揭破自己的这个假面具，觉得非常之痛快！

此外，我的模糊阶级观念的对于地主资产阶级内部的“帮口”问题的见解，否认国民党有理论，至少是否认三民主义对于群众的麻醉性……等等，也都和我的机会主义的立场联系着的。我必须努力的反对这种机会主义立场而斗争。

最后，我要说：假使不是中央的指示，假使不是两次讨论和同志们的批评，我也许直到现在还没有明白自己的错误。我固然很久很久没有能够看中央的决议、文件、材料、机关报等等，然而我的错误的根本原因决不在这里。当我还没有了解自己的错误立场的时候，我还是用“不知道许多材料、事实和消息”来辩解自己的错误，等待别人的解释。这其实是机会主义在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揭发和批评。这在共产国际和中国

党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历史上是常常遇见的：机会主义者总会等待、掩饰，总要企图反攻党的路线。我现在既然知道了自己错误的本质，我诚恳的接受中央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指示。我认为必须继续开展这个斗争，对我有严格的批评。

这种反机会主义的思想斗争——在各地党部，在各方面的问题上——必定能够帮助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巩固、统一、加强。这种斗争和完成党的伟大任务，击破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以至于取得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的完全胜利，是不可分离的。

我希望《斗争》上给我更深刻的批评！

一九三三.九.二七

原载1933年10月15日《斗争》(油印)第56期

署名：康

注 释

① 罗明(1901—1987)，广东大埔人。1925年入党。1933年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和《关于杭、永情况给闽粤赣省委报告》，认为在福建条件较差的边远地区，党的政策应当与根据地巩固地区不同。这种意见被当时中共临时中央认为是“对革命的悲观失望、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随后，在党内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给中央委员会的信*

——五中全会召开的意义与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意义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

中央委员会：

现在这种严重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五中全会^①的开会，将要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进展有极重大的意义。四中全会之后，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事变，我们的党证明了自己的力量，证明了自己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这正因为四中全会把党领导上了布尔塞维克的大路。四中全会为着国际路线，为着反对一切种种机会主义和调和主义的斗争，保证了这三年来的许多次伟大的革命胜利。在现在的中央领导之下，党一天天的发展自己的影响到新的广大群众之中去，领导着苏维埃革命的发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打击社民党、托陈派、右派等等^②的一切阴谋。

关于党的一般任务，关于世界和中国的革命运动的形势等等，我不想说什么话：国际十二次全会以及最近一切指示，中国党中央关于五次“围剿”的决议等，使得我更深刻的了解

* 本文据中央档案刊印。

了这些根本问题，而能够为着党的路线而斗争。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斗争，没有疑问的，还在继续着，发展着，锻炼着更多的新的列宁主义干部。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右的和“左的”一切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现在主要的危险自然是右倾（最近我自己还犯了这样的错误），例如罗明路线^③等等的表现——只有反对这些党内倾向的坚决的斗争，能够保证革命的新的胜利。自然，在残酷的，复杂的，广大范围的阶级决战之中（从粉碎“围剿”红军的战争，苏维埃革命的全国发展，反帝国主义运动一直到工农贫民群众的日常斗争等），不断的产生着许多实际的具体的问题，要求党动员新的力量，运用新的斗争方式，新的组织政策，然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党对于革命形势的正确估量和正确的路线，为着现在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斗争，反对一切种种机会主义，是这一切工作（苏区和白区的一切工作）的根本。

现在，中国形势的特点，我觉得是这样：阶级决战在某些地方已经达到了最高的方式——革命的正式军队的国内战争，而同时，在帝国主义军阀的巨大军事力量直接控制之下的最大城市，以及一些落后的省份里，斗争还在比较初期的方式之中，需要艰苦的日常的争取群众的工作；苏区和白区斗争之间的联系显得十分重要，我们的努力是要怎样使得白区的工作，同红军的战争，苏维埃政权的一切事业很好的联系起来。武装暴动胜利之后的国内战争，怎样同武装暴动还没有胜利之前的争取广大群众的日常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使得这些日常斗争围绕着我们的主要斗争——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在

苏维埃区域,这种群众工作,也是最基本的工作。下层统一战线的实行,领导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以及马列主义的广大宣传——都需要许多改善和刻苦的努力,使得我们党的政治影响不但更加迅速的扩大,而且在组织上更加巩固起来。

再则,党和苏维埃政府日益巩固起来,全国的运动迅速的进展着,运动的方面日益增多起来,党须要更有系统的养成许多方面的专门干部,能够懂得每一种工作和事业的专门技术和知识的。

可惜,我关于实际的具体的问题不能够有什么贡献,又不幸不能够来出席而受着直接的教训!只能够写这一点空话,希望能帮助大家想起一些问题。此致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狄 康

1933.12.10

注 释

①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

② 指当时苏区进行的清查社会民主党、托洛茨基陈独秀派等的肃反运动。

③ 罗明路线,见本卷第653页注①。

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五次战役^①中敌人以持久战来围困我们，企图以长期的战争与封锁来枯竭我们的资源供给。这是他们的梦想！为要粉碎敌人的围困与封锁，节省一切给予战争，特别是节省粮食的任务，已经尖锐地提到我们前面了。

节省粮食，保障红军给养，保障广大群众在今年青黄交接时粮食的供给，预防今年的粮食困难，这一工作，对于我们战争的胜利，对于改善广大群众的生活都有决定的意义。这一运动的胜利不但可以保障红军给养，而且到青黄不接的时期，一般贫苦民众都可以不受奸商、富农的挟制。

应该以最大的力量来完成这一任务，动员每个苏维埃公民来进行节省粮食运动，尽可能用麦子、豌豆、蕃薯等杂食代替粮食，停止制造米粉、米糕、米糖、米饼、米酒，节制饲养家畜方面的粮食消耗，节省出大批粮食集中到苏维埃或合作社来，以防备今年的春荒；加紧春耕，使我们能够得到超过去年的收

* 1934年初，瞿秋白由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苏维埃大学校长。在一段时间里曾担任《红色中华》报主编，这是他在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获，这些都是我们节省粮食中主要的方向。

因为遭受了去年粮食困难的教训，许多地方在今年特别增加了种植面积，提早了春耕，我们的粮食合作社也在这一教训中吸收了数十万社员，解决了群众的粮食困难，今年二月开始的收集粮食突击运动也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节省粮食运动正在各地开展（例如兴国上社区及瑞金中央政府的工作人员等）。每个革命的工人农民，都要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这些优越的条件，都保证我们能够防止或最后战胜粮食困难，胜利是我们的。

但我们必需慎重的估计到，我们有这些优越条件，同时也存在某些部分的弱点；在我们中央苏区，因为各县米谷的生产量消费量的不平衡，粮食问题严重的程度也就有些差异。有些产量丰富的县份，应该把多余的谷子运到缺乏粮食的县份来，这里就需要我们克服过去运输工作的薄弱。我们的粮食合作社，大部分的工作还没有活跃起来，有些粮食合作社完全没有工作（如瑞金个别乡的粮食合作社），在节省粮食运动中，应该切实整理各地区乡的粮食合作社，使他成为抵制奸商、富农操纵粮食的战斗的阵地。

隐藏在苏区的地主、富农、奸商们，正在响应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他们用着一切阴谋来破坏苏维埃的每一设施，破坏群众的每一动员工作。在节省粮食运动中，必须以最大的警觉防止他们私藏粮食，操纵米价，毁坏公谷，偷运粮食出口，破坏粮食合作运动等等阴谋。在必要时，我们可以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进行对地主、富农、奸商的查谷运动，极大地开展

阶级斗争来解决我们的粮食困难。

只有我们对阶级敌人的胜利，才能彻底解决我们的困难。战斗地起来啊！革命的工人和农民们，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提出的每一任务，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红军，来争取战争的胜利，从胜利中来争取自己阶级的彻底解放。

原载 1934 年 3 月 29 日《红色中华》第 168 期

署名：维嘉

注 释

① 五次战役，指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反对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

在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 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

苏维埃大学开学的战斗任务，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材。每个学生同志，都应深刻的了解自己伟大的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的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严厉制止一切地方观念以及开小差的行为，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而斗争。

原载1933年4月3日《红色中华》第170期

* 这是《红色中华》报报道的瞿秋白在苏维埃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摘要，标题是编者加的。

努力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

(一九三四年四月三日)

战斗的春天，一大半时间已经过去了，胜利日益逼近我们前面。英勇的红色战士，正在各个战线上，为了保卫苏维埃领土，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而进行着残酷的战争。广大的革命工农群众也正在为着把一切利益服从战争，开展了各方面的突击。每个工人农民都了解只有革命战争的胜利，才能保证土地革命的利益和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准备了牺牲一切来帮助革命战争。这种坚强的一致，表现苏维埃红军团结了广大群众在自己的周围，成为不可战胜的伟大的力量。

正因为党中央与人民委员会春耕运动的决定，是建筑在群众的革命要求上，所以能够动员广大群众热烈地来进行春耕，把劳动妇女，甚至老头子、小孩子都组织到生产战线上来，为着完成春耕任务而斗争。这些事实说明群众已经深刻地认识了苏维埃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为了保卫苏维埃的利益而进行今年的春耕，要求百分之百的完成我们的春耕计划，增加我们的农产品，多收谷子、棉花、蔬菜和杂粮，来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使我们不至受到粮食困难，使我们能够充裕红军的给养，使我们能够在敌人的封锁中，组织更大的力量去粉碎敌

人的封锁与“围剿”。

对这一任务的任何动摇，都将遭受到群众最严厉的打击，在阶级斗争尖锐地开展的环境中，一分也不能松懈了我们的阶级警觉性。一切冒充工农偷窃土地、毁坏农具、屠杀耕牛、传播封建迷信破坏春耕的反革命分子，都应当受着严厉的镇压和群众的制裁。他们是企图减少我们的收获，制造粮食“恐慌”来扰乱我们的秩序，以响应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的！还有些隐藏在政府机关中的官僚主义消极怠工分子，以空喊春耕来妨碍实际的布尔什维克的动员工作，来抑制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与劳动热忱，使我们的春耕运动在个别地方遭受停滞；对于这些分子的斗争，我们也不能有任何宽容，我们应该把检举运动的火力，首先投射在对春耕消极怠工的官僚主义者身上。从每一实际问题，如水利问题、劳动力问题、肥料、种子、耕牛、农具等问题上，来揭露官僚主义的原形，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来开展春耕运动。

每一个苏维埃公民，都应该为了苏维埃的农业建设，而最大限度发扬革命的热情，广泛的开展农业生产竞赛、劳动合作、以及农业技术的研究运动。运用过去的经验，创造新的工作方式、新的技术，开辟新的耕地，种植新的农产品，一切都为着完成与超过我们今年的春耕计划而斗争。每一个工会会员特别是农业工人，应该在春耕运动中起模范的领导作用，从耕耘到收获，进行不疲倦的宣传说服、组织动员工作。

依靠着广大群众积极性的发扬，我们的春耕运动必然获得最后的胜利。我们要求各级土地部与春耕委员会更紧张的

活跃起来，经过各群众团体深入动员组织的工作，以红军的每一胜利来兴奋群众的劳动热忱，以过去的每一教训提到广大群众面前，说明只有集中我们的力量，完成我们的春耕计划，才能防止今年的粮食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进攻。

土地斗争先进的区域，应该成为春耕先锋队，把群众的热忱尽先组织起来，创造农业建设的光荣模范。土地斗争较落后的区域要极大的开展查田运动^①，吸收查田运动中积极英勇的工农干部来领导春耕。在春耕中，我们的劳动力首先要投在红军公田和红军家属的土地上，使红色战士在前方毫无顾虑的进行战斗，每个工人农民都要了解到，因了红色战士的英勇斗争，我们才可能在敌人的包围封锁与进攻中进行春耕运动。我们的春耕运动在战争中进行着，是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的一环。春耕运动的胜利，将伴随着我们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胜利，开拓我们更大的新的胜利的前途！

已经是准备蒔田种棉的时候了，战斗啊！春耕战线上的战士们，胜利在前面等待着。

原载1934年4月3日《红色中华》第170期

署名：维嘉

注 释

^① 查田运动，1933年至1934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的检查土地分配情况的运动，是土地革命中巩固土地分配成果的一个阶段。

纪念“五一”与援助华北工人斗争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二日)

唐山开滦五矿几万工人英勇的斗争^①，震撼着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的整个的华北。开滦无产阶级以自己的铁手，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的停战协定^②，暴露了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投降出卖的无耻行为，吸引了广大的群众，如华新、启新等工厂的工人加入了斗争的阵营。在整个华北展开了极尖锐的革命斗争形势，成为配合苏维埃红军胜利的进攻，动摇与摧毁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伟大的力量。

这一事件，在我们“五一”纪念的准备中，更清楚的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争取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上，更清楚的显示了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日益崩溃瓦解，在白色统治下形成了尖锐的革命危机，也更清楚的显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的道路。中国苏维埃红军，团结了苏区的白区的广大工农群众在自己的周围，在胜利的奋斗中前进。

苏维埃区域内的工人和农民，坚固地把政权拿在自己手中，举起了广大群众争取自由和解放的苏维埃的旗帜，兴奋了鼓舞了白色区域中千千万万的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一切白

色区域中工农群众的罢工抗捐斗争，都是为着争取苏维埃道路的胜利。群众已经体验到只有苏维埃的胜利，才是自己的胜利，才能把自己从被践踏、被蹂躏、被剥削、被榨取、被屠杀的苦难中解放出来。所以他们不顾一切痛苦与牺牲，在地主资产阶级血腥统治下面，以实际的革命斗争来拥护自己的苏维埃与工农红军。华北工人的英勇斗争，也正是在这样的要求之下，为着挣脱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锁链，为着自己的解放，为着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着！

华北工人的胜利就是我们苏区广大群众的胜利，一刻也不要放松的去进行我们的援助工作！不仅是募捐，而且要在实际的战争动员上，大批工农加入赤少队，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开展我们的扩大红军运动，开展我们苏维埃的胜利的进攻来援助华北工人斗争，是每个革命的工人和农民迎接红“五一”的重要的任务。

原载 1934 年 4 月 12 日《红色中华》第 174 期

署名：维嘉

注 释

① 1934年2、3月间，唐山开滦煤矿工人为要求发给工人罢工期间的工资，举行罢工。3月19日，唐山公安局秘密逮捕工人代表，激起更大规模的罢工，罢工工人遭军警镇压，造成“三·一九”惨案。

② 华北的停战协定，见本卷第605页注①。

阶级战争中的教育

——论教育系统的检举运动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

现在革命战争的紧急关头，一切战线上都开展着剧烈的阶级斗争，教育系统里也是同样的情形。不但如此，而且在列宁小学的教员中间，甚至在教育干部中间，我们可以看见比其他方面更多的动摇，可以发见好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育系统，从学校一直到机关，都比较的松懈，没有充分的阶级警觉性，没有坚定的布尔塞维克的监督。教育方面需要利用一些旧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地主富农或是他们的子弟，这个政策并用不着改变。问题是在于苏维埃政府和党的监督必须加强，阶级警觉性必须提高。我们一刻也不应当忘记：教育也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教育，才能够真正赞助革命战争；如果稍微削弱这个阶级的领导，稍微削弱工农的民主专政，那么，一些地主富农的分子就会利用我们的教育系统来进行他们的“阶级工作”，破坏苏维埃的教育制度，传布反动的复古的思想，甚至于公开的进行反革命的活动。

帝国主义国民党疯狂的进攻苏维埃革命的时候，苏区里面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必然要乘机活动，企图要做白军的内

应的。白军的进逼苏区，在他们是很好的“复仇”的机会——他们没有放弃恢复剥削制度梦想的——他们正在竭力破坏苏维埃政府的收集粮食、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等的中心政策。在白军占领的筠门岭和广昌，地主富农做向导，同着白军来屠杀和奸淫掳掠，夺回土地……这是极残酷的阶级战争。苏维埃的教育机关必须要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加强广大民众的参战潮流，首先就要肃清自己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就是说，彻底的坚决的开展教育系统的检举运动。凡是不忠实于苏维埃的分子，贪污的、消极的、怠工的、破坏苏维埃教育制度的，都要肃清出去，不让一个“白军奸细”暗藏在教育机关和学校里！当然，忠实于苏维埃，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旧知识分子，我们仍旧把他们当做苏维埃职员看待，我们还是要督促他们，勉励他们积极的工作。然而在这革命战争的紧急关头，我们教育系统的全部，是否有充分的阶级警觉性呢？是否有经常的监督和检查呢？可惜得很，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阶级战斗极端尖锐化的当儿，那些利用教育机关的松懈，利用经常的监督和检查的缺乏，而混在学校里、教育部里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动摇消极分子，立刻就显露出他们的本相来：

敌人进逼筠门岭的时候，当地的县教育部长张文辉就表示动摇，县教育部以下的工作人员反水的反水，逃跑的逃跑。最后，到筠门岭已经失去之后，省教育部要调张文辉到省，他就卷了一批谷票反水走了。而城市区和罗塘区的教育部长，也反水逃跑不知去向。

广昌县教育部副部长雷德胜，在敌人还没有来到的时候，

就实行叛变，逃到白区，接着，城市区的教育部长，甘竹区的教育部长，长生区的正副部长都反水了，而且城市区的教员等有十多人投降敌人。

江西的乐安、万太、宜黄教育干部叛变反水的有好些，都是区教育部的部长、科长。福建宁化县教育部副部长包庇地主已经逮捕；代英县的教育部文书反水，长汀边区有两个教员反水。

甚至中心区域的汀州市，也发觉了五六个小学教员参加反革命活动，而逮捕了。会昌城的一个区教育部长有反革命嫌疑，已经扣留。瑞京^①的黄柏区，有一个小学教员写出反革命的法西斯蒂的标语。西江庄埠区的教育部长故意把“国民经济部”写成“国民党经济部……”，把“工农检察委员会的布告”写成“工农检察委员会的罪状”。

这些现象证明我们教育系统的松懈，没有充分的阶级警觉性。是不是可以事前发觉他们的动摇和叛变的企图呢？没有疑问，是可以的。例如杨殷县的事实：杨殷黄圩区教育部部长企图反水，被国家保卫局扣留，副部长王祥发在工作上一贯的消极怠工，在收集粮食突击运动时候，就表现十足的官僚主义，敷衍了事的态度，当时就在会议上批评了他，在历次的斗争之中，他始终不肯承认错误，已经因此撤职。然而黄圩区的区苏粮食部长最近忽然“信任”了他，派他去放哨，他就拖枪反水跑走了。接着，这个粮食部长也反水了。这里，使我们要格外注意叛徒的互相包庇。杨殷县的小学教员反水的有十一个人，而事前杨殷县的教育部就没有警觉的考察过。直到最近，

县教育部才承认了自己的“机会主义的消极”，而开始检举的工作，立刻就又发见了黄圩区、武索区、茶元区，还有三四个教员有可疑的行迹和态度——假使再迟缓些时候，这些分子又可以反水逃跑了。

这里，顺便的要说，凡是不忠实的分子，必然企图欺骗苏维埃政府，而暗中进行反革命的工作。这是要特别注意的。例如：西江县城中的北郊小学有一个教员在教三民主义的教科书；当中央苏维埃剧团经过这地方发见三民主义书籍的时候，他还指使学生藏匿。然而我们苏维埃的儿童是不听他的指使的！反而是西江的县教育部两次写信辩明这教员不是富农，并不教授三民主义。而事实呢？西江查田运动^②开始之后，就发觉了他是富农而不是中农的。当然，他这种人向来就在学生中间散布些“革命无希望”的悲观思想和谣言，事后都被揭出来了。为什么早不警觉呢？

苏维埃的教育是阶级的教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教育。谁在教育方面脱离了阶级路线，他就一定要走上自由主义的道路，同阶级敌人妥协，放任阶级敌人的活动，也就是客观上帮助白军的奸细。因此，在现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必须开展群众的检举运动，肃清教育机关里的坏蛋和阶级异己分子，必须有最高度的阶级警觉性。

自然，在教育文化方面，我们可以并且应当利用旧知识分子，即使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也可以利用。然而，第一，小学教员或是单纯的学术工作（自然科学之类），可以叫他们

担任；而教育机关的领导工作，却决不容许暗藏的阶级异己分子来把持。第二，真正有智识的分子，我们需要；而并没有什么智识的地主富农，根本就不应当容许他们混进教育机关和学校，最近几个月的检查，恰好发见了相反的事实：个别的地方有一些地主富农冒充中农富农，而在充当区的教育部长或是教育科长；更多的是不问有无智识，乱用一些地主富农来当教员，甚至办教育干部学校和训练班的时候，专门招收一些富农地主，连只认得几十个字的也收纳。我们有这些精力和财力来栽培干部，为什么不栽培工农子弟和劳动妇女，而要去教育这些无智识的富农地主！

关于利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旧知识分子问题，最主要的是要记住列宁的话：

“没有给教育的人，知识分子，专门家的一种劝告和领导性的指示，是不行的。任何一个稍微懂点事的工人和农民，都很明白这一点；我们的知识分子不能够埋怨工农方面的注意和同志式的尊敬的不充分。然而劝告和领导性的指示是一件事，而组织实际的监督和估计却又是一件事……所以没有‘民众’之中的实际组织者的帮助和领导作用，无论如何也不行的。”③（列宁：《怎样组织竞赛》）

我们现在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民众的实际组织者的领导作用”和经常的监督和检查。我们文化建设会议的路线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反对“吃知识分子”主义（参看《斗争》二十六期洛甫同志的文章④），我们还要继续反对这种左倾的机会主义。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反对那种脱离阶级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乱用地主富农，不问他有无

智识，也不实行组织群众的监督，甚至完全忽视最近的检举运动，让地主富农和叛徒混进教育的领导机关。

现在的教育是革命战争时代的教育。“打仗就要像个打仗”！何况正在战争的紧要关头。教育系统里暗藏的反动分子——地主富农或是他们的走狗，正在乘机活动。我们必须给他们迎头痛击，必须肃清他们。打仗的时候，难道可以容留一个敌人的奸细在我们的营垒里吗！？不能够，绝对不能够！

教育系统的检举，首先就要着重的指出阶级路线的重要性。战争时代的教育，特别要注意学生的集体的社会工作，——就是一切参加战争的工作，要在学生的社会活动中去进行教育，要在一切日常功课之中去教育他们的阶级的战斗的精神。尤其是成年人的教育，要经过文化团体——消灭文盲协会、工农剧社等，去动员广大的男女群众，使他们在识字读书运动之中加紧参加战争的种种工作，使他们的识字和读书能直接增加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战斗能力，使他们能够在集体的娱乐之中（晚会、演戏等等），得到深刻了解的战争意义的教育，能够学习阶级斗争——揭破反动分子或是机会主义者的假面具，组织和发扬工农群众的革命热忱。这是我们的教育路线。谁在教育工作上对于这种路线消极、怠工、暗中破坏或是阻碍，他就客观上帮助了白军，帮助了地主富农。经常而切实的检查工作，以及突然的“轻骑队式的袭击”，在这次检举运动之中，应当可以暴露那些埋伏在教育系统之中的阶级敌人，或是两面派的机会主义者。

在阶级路线的标准之下，我们不但要检查是否乱用和容忍不忠实的无智识的地主富农，而且要检举在教育政策上表示消极，故意曲解，一贯怠工的分子，“不但检举他们的成分，特别要注意从政治上检举”（共产党中央五月十二日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因为消极怠工动摇悲观的分子，即使不是地主富农，也是他们的走狗。而最主要的，是要检查一切教育文化机关和团体，在这“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的突击运动之中，是否努力动员自己的力量，开展自己的工作，来积极推动广大群众的参加战争的潮流。

而检举运动，应当是伟大的群众的运动，不但教育部本身要严密的检查工作和干部的政治态度，仔细的考察各种学校的教员的工作和表现，而且要有计划发动群众来参加和帮助这个工作。要在这次检举运动之中，提拔和训练新的干部，尤其是妇女干部，要养成大批教育方面的“群众之中的实际组织者”，要建立经常的监督和检查制度的基础。每一乡的贫农团、工会支部、女工农妇代表会议、儿童团，以及学生家长联席会议，都要活跃起来，检举一切反动分子和怠工分子，也就要检举教育系统之中的这种坏蛋，每一次群众会议，每一次少共轻骑队的袭击，每一次工农检举委员会的通信员出发，教育部方面都应给他们具体的任务，向他们指出自己的检举问题，指出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自然，共产青年团的协助要成为这个运动的领导力量。

这是革命战争之中的残酷的阶级斗争，“不是拼活，而是拼死”的战争。教育是这战争的一种武器。我们不要让这种

武器在任何一个地方，落到了阶级敌人——白军奸细的手里！

原载 1934 年 6 月 2 日《斗争》(苏区)第 62 期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 ① 瑞京，即江西瑞金，当时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
- ② 见本卷第 663 页注①。
- ③ 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398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 ④ 洛甫(张闻天)：《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

中国能否抗日？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七月七日)

任何一个革命的工人和农民，任何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不会对于国民党有丝毫“抗日”的幻想。国民党地主资本家官僚军阀们，早已赤裸裸的在群众当中撕破了他自己的假面，暴露了他无耻的投降出卖的走狗的真相。全中国的反日民众，从国民党血腥的屠杀中，从“抗日者杀”的无耻的禁令中，从“中国无力抗日”的武断欺骗中，深深的感到中国法西斯蒂国民党彻头彻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深深的体验到，要争取中国民族的生存独立与自由，首先就要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粉碎走狗们一切掩护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无耻的宣传。

我们不用列举，两年来东北义勇军在日本帝国主义武装镇压下长期的浴血斗争^①，“一二八”上海事变中无产阶级与十九路军兵士英勇的抗战，以及台湾雾社番人和非洲里夫民族顽强的武装反帝行动^②，这些英勇斗争，已经是每个革命工人和农民所不能忘记的史迹。我们且正确的来估计中国抗日动员的力量，揭发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中国无力抗日”的武断欺骗。

国民党对于他的“中国无力抗日”曾下了这样注解：（一）中国军队力量不能抗日，（二）中国经济力量不能抗日，（三）中国人无组织力量不能抗日，因此中国现在要“充实国力”、“集中国力”，而不是抗日。当然在国民党是没有什么能抗日不能抗日，国民党所有的只是无耻的投降与出卖。但是广大的中国工农群众，不愿意领受死亡与奴役的命运，要求中国民族的生存，要求打倒帝国主义，要求抗日，要求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来争取自己的解放。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胜利，相信“中国能够抗日”。

首先我们来检阅中国动员抗日的武装力量。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国民党军阀统治之下有两百多万陆军。非正规的武装，如散在各省的保卫团等更超过正式军队的数目，湖南的保卫团枪枝在十万以上，广西也有巨大的数目。在东北，日本帝国主义收缴了民众三百一十万支枪，到现在满洲还在普遍爆发着反日的血战，可以想见中国武器散在民众中的有着惊人的数量。国民党政府连年的支出，百分之五十用在军事扩充，几次进行的巨大借款，都是为着扩充军备，购买飞机、新式武器及建立军事工业（这是为着进攻苏区与红军）。这些都是中国的武装，应当从走狗国民党手中夺取出来，而成为“抗日”的力量的。

国民党军阀，除了统制着百余万使用现代武器的军队以外，还在继续训练新的法西斯蒂的兵团，但是却没有派遣一兵一弹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而把华北数十万军队调到河南、安徽、江西等地，来进攻唯一领导抗日的苏维埃红军，企

图消灭工农群众反帝的革命力量，为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清除道路，尽他走狗的作用，在五次“围剿”战役中，国民党这种走狗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

国民党这些无耻的卖国辱国勾当，已经激动了全中国劳苦群众的猛烈的反对，就在用法西斯蒂血腥“纪律”统治着的白色军队中，士兵群众的革命要求也一天天生长着，特别是进攻苏区接近红军的部队，士兵群众革命化的过程更加急速，许多实际战斗，使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武断宣传更加失掉了欺骗的作用。国民党从“长期抵抗”、“不抵抗”、“抗日必先剿共”到“抗日者杀”、“中国无力抗日”，这些无耻的宣传只有使士兵群众增长着不满、愤怒与反抗，他们要求抗日，他们反对国民党阻碍红军抗日。许多地方的兵士挣脱法西斯蒂“纪律”的束缚而哗变、暴动，加入红军，参加反日本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在国民党的后方，许多都会的守备队伍中，兵士群众接受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日斗争的影响，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加深了愤恨。在全中国二百万人的白军军队中，除了极少数法西斯蒂的俘虏以外，抗日是兵士群众共同要求。这些武装，无疑的将在革命战争的开展中，迅速脱离国民党的统制，而成为反日战线上一种伟大的力量。

但在国民党掌握底下的时候，这些武装却是阻碍抗日的力量。夺取这些武装，打倒国民党，是抗日的先决问题。

唯一领导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武装——工农红军，在生长壮大的过程中，粉碎了帝国主义国民党一、二、三、四次“围剿”，成为中国反日反帝的基础的力量。在目前，争取

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的战争中，将吸收更广大的反日群众到自己周围，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直接作战。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也就能够阻止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阴谋，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事情是很明显的，只要把镇压反日斗争的国民党汉奸走狗的统治推翻，更巨大的抗日力量会在群众中组织起来，三四十万人的东北义勇军，继续不断的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使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屠杀完全失了作用，这是一个极好的证明。我们中央苏区今年红五月的扩大红军运动，曾经动员了三万多新战士到前方去，照人口比例，全中国的抗日动员应该有五百万军队，这一伟大的群众的力量，不但可以保证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可以保证我们战胜一切帝国主义。苏联的工农群众，曾经打败过帝国主义十四国联合的武装干涉，这一光荣的先例应该更加巩固我们胜利的信心，我们要记着列宁的教训：“群众力量将战胜全世界。”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第一个国际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

根据一九三三年的统计材料，日本有正规陆军二十五万人，这二十五万军队，除了一部分留在本国，以支持帝国主义的统治，镇压革命运动外，都分布在各殖民地，台湾军^③、朝鲜军^④各达二万余人，驻在满洲的关东军^⑤原有二万余人，“九一八”事变后又增加了三万多人。为了要镇压国内的以及殖民地的“叛乱”，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争时，至多能出动二十万军队，上海战争时，日军调来中国的只有第九、第十一、第十

二、第十四等师团，而这些师团在上海工人和十九路军士兵的英勇抵抗中，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使他们认识了中国民众的抗日的力量。

根据这些材料，在数量上比较起来，中国有十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兵力。

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有着精良的器械，但是战争的胜败不完全决定于器械，而决定于使用器械的人，这是很明显的。

虽然日本帝国主义还有着巨大的海军，但是这些海军要防卫太平洋上的霸权，不能作为进攻中国的主力，这又是很明显的（在上海战争中，日本海军完全失利）。

虽然日本帝国主义还有着强迫的义务军役制，有着一百五十万的“预备军”，但是这些“预备军”同常备军一样，他们现在正在穷困、饥饿，生活恶化的环境中增加了对统治者的仇恨，他们决不能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这又是很明显的。

而我们——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们，必须抗日，必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以争取自己的生存。中国所有的工农士兵群众，所有的武器，如果都用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那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

从武装力量上来考察，我们相信，中国能够抗日，而且只有抗日才能保障民族的解放和生存，才能保障中国革命的更伟大的胜利。

我们再来考察我们的经济力量，看中国能不能抗日？能不能支持我们保卫生存的战争？

我们并不掩饰，我们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历年来受着帝国主义的剥削与榨取，国民经济走到了总崩溃的悲惨的境地。而日本却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国富总额约有我们三倍（中国国富计 38,289,000,000 元，日本则为 102,342,000,000 元）。1931 年度的岁入，国民党政府从群众身上拼命剥削的计达 78,352,865 元（公债不在内）。而日本的岁入却为 1,489,000,000 日金，超过中国一倍以上。国民党曾经用这些数目字来证明“中国不能抗日”，证明“中国经济力量不能抗日”，甘心每年支付给日本帝国主义很大数量的外债本息，而不肯拿一个铜片去帮助民众的反日斗争。一方面大借外债，购置军器来镇压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而加上好听的名目，什么“建设”、“复兴中国”、“充实国力”，这就是国民党“中国经济力量不能抗日”的实质。

每个革命的工农都知道，中国的经济破产与穷困，正是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剥削，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日本帝国主义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日本资本主义，主要的是依靠中国市场，依靠榨取中国劳苦大众，而得到兴旺与繁荣。积集在东京、横滨等处银行里的资本，多半是中国劳动群众的血汗，我们看几十年来日本对中国贸易的扩张，更可明白日本是怎样“富”起来的。

日本对华贸易扩张统计表：

1866 年总额 3,674,000 海关两

1876	4,853,831	1896	28,768,977
1886	6,913,525	1906	94,357,287

1916	273,412,978	1918	756,813,000
1917	548,650,230		

这个表上的数目字，说明日本资本主义，是依靠着中国市场而存在。特别是在目前澳洲、非洲、美洲各地开展着排斥日货运动，中国的市场对于日本资本主义更为重要，失去了中国市场，日本资本主义就要更加迅速的死亡。我们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绝交，是我们对于日本的经济封锁，而不是日本对我们的经济封锁。因为中国与日本绝交，日本失去了宝贵的原料与市场，而我们所失去的却是帝国主义给我们的剥削与榨取。

帝国主义者们在苏联十月革命后，曾经凶恶地联合封锁苏联，然而其封锁的结果，使帝国主义自己感觉到停止了与苏联的贸易关系，等于封锁了自己，不能不取消封锁的政策，而逐渐与苏联恢复正式的通商，这一事件，在帝国主义者，在我们，都是很好的教训（虽然对于这个教训的认识，各有不同）。

当然我们不能说，帝国主义对于我们的封锁，于我们没有丝毫损害，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有时会造成我们在物质上的部分的困难，但要是和帝国主义所受的损害比较起来，却是很微小的。

我们曾经受过国民党残酷的长期封锁，但我们并不因封锁而削弱了战斗的力量，这是每个苏维埃公民都能够了解的。

我们来看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根据一九三一年的材料，日本在中国所投的资本有如下的数目：

银行资本	490,620,000元
事业投资	1,500,000,000元

借 款	450,000,000元
中国赔款	350,000,000元
合 计	2,890,620,000元

表上统计，日本在华资本总数达二十八万万九千余万日元，这个数目，国民党正在按年支付利息给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用费。

如果我们没收了这些日本资本，应该是一笔最大的抗日报费，而在日本帝国主义，却是经济上一个致命的打击。

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对于群众的剥削（一切税捐田赋）每年计达十万万元，这又应该是一笔巨大的抗日报费。

中国的经济破产与穷困，正是因为帝国主义榨取和地主资产阶级剥削的原故，只要推翻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的统治，我们尽有着抗日的经济力量以及一切力量。

中国共产党中央所提出的反日五大纲领^⑥中，指出我们必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财产，停止支付一切债款本息，设施累进税来作为抗日的费用，对日绝交，组织广大的抵制日货行动，这些都是绝对正确的主张，这些主张的实现，使我们能得到极雄厚的经济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从经济力量上来考察，我们更相信中国能够抗日。

其次地主资产阶级咒骂群众没有组织力量，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中国没有可能去抵抗“有组织”的日本帝国主义，应该跟随着国民党卖国贼跪伏在日本帝国主义前面，领受亡国奴的命运。

但铁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走狗们的欺骗与咒骂，显示了中

国的工农群众有着强大的组织。在白区里面，无论国民党怎样的解散抗日团体，封闭抗日刊物，取缔抗日宣传，镇压抗日运动，逮捕和屠杀抗日领袖，但反日斗争并不因此而低落，相反的，一天天走向普遍武装冲突的更高的阶段。

我们苏维埃区域里面，工人农民中不断的产生组织家宣传家，团结了千千万万的群众在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周围，像一个人一样，为了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进行着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战斗。这些都是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无法否认的事实。

无论从那一方面考察，我们有着抗日的力量，而国民党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指使之下，阻碍抗日力量，破坏抗日力量，解散抗日力量，企图消灭抗日力量，让日本帝国主义的血手无阻碍的伸到全中国来，扼死中国民众。

国民党向苏区和红军进行的五次“围剿”，正是为了要完成它这种走狗的使命，为了把已经消灭了帝国主义势力的苏维埃领土，重新放到帝国主义的血手底下去。

保卫苏维埃领土，粉碎五次“围剿”，推翻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是抗日的先决条件。

我们要争取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有力抗日”！

原载 1934 年 6 月 23 日—7 月 7 日《红色中华》
第 206—209、211 期

署名：维嘉

注 释

① 东北义勇军,见本卷第207页注⑩。

② 指1930年台湾台中县雾社高山族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起义,1925年以来摩洛哥里夫部族人民反对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军的斗争。

③ 指占据台湾的日本侵略军。

④ 指占据朝鲜的日本侵略军。

⑤ 指占据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军。1919年日本在旅顺口设关东军司令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进一步侵占中国东北全境。至抗日战争时期,关东军总数约100万人,是日本陆军最精锐的主力 and 战略总预备队。1945年8月,在中国人民武装力量和苏联红军强大的攻势下,关东军被消灭。

⑥ 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布“不辞一切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并提出了五项具体主张作为当前奋斗纲领。其内容是: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东三省、热河、内蒙古、华北、福建以及全中国。二、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对日作战。三、号召全国民众自己组织反日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一切财产,并以国民党全部军费,作为反日战费。五、不分男女老幼、宗教信仰、政治派别,普遍组织民众反日团体,开展反对日本侵略与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的活动。

〔补 遗〕

劳农俄国之国内商业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劳农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国内的经济方针在于恢复大工业，国外则整理通商事业。然因久年封锁，饥灾战祸，工业一时不能恢复旧状，以进于极繁盛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与乡村农民作“社会主义的”生产品交易。国外帝国主义的列强，眈眈相视，处处掣肘，暂不能多得原料机器之辅助，实业上的大进步还只能希望将来，所以经济生活中还不得不赖“小生产者”之市场交易经济。于是于去年年底，经济恢复的过程，还只走到“国有商业”与“国家整顿金融”之一步，暂以此与国内小资本家竞争，以取得国家实际尽其分配责任之地位，同时奖励私人企业以助其所不足，流动国内的经济血脉，而渐渐提高国家之生产力。因此，若日诺亚、海牙两会议^①一时不能得大宗的助款于外，全国电气化事业一时不能发达。至于能取小农个人生产制而代之于内，劳农政府经济事业上的全副精神，暂时还只在“国内商业”。（海牙会议的消息不佳，大约不久就要无结果而散，仍旧是英德间的冲突作梗。）

只看俄国商业史上一世纪上占极重要地位之下新城^②市

集，今年又复旧况，便可知其国内商业之现状。“市集”本为东方亚洲式的商业组织，此字的来源，且为蒙古字，大概为定期市场。一年之中集各地商人于此，经营交易，少则几日，多则几月，即散归各处，下期重起贸易。如此不永久的而局面却往往很大的市场谓之“集”。后则参以欧化，遂每每带有劝业会之性质，下新城市集，是俄国历史上很有名的商场，在莫斯科西，沃木斯克^③东，“下新城”即Nijoi Novgorod，音译可作“尼燕郭洛德”。

下新城市集本为俄东航路之要冲，向来是连贯“东”“西”之焦点，挽全俄经济生活之脉络，为“俄罗斯的汉口”。大陆商务与海岸不同，向来水道入大陆愈深，有赖于内地商埠愈甚，则工商之交贯愈利于内地的发展，俄国复尔嘉河^④有此作用。复尔嘉河自北而南入于里海，介于东欧及中央亚细亚之间，汇合此处各种亚欧民族之文化，商务的繁盛足继古代之波斯^⑤。最早市场之发生，约在第八、九世纪之时，其时在伊梯黎城，在霍萨王国^⑥之京城，正在复尔嘉河口。此后渐渐依商务地理的公律，“大陆商务利于航路不利于陆路，航路之入内地愈深且愈密者愈佳。”遂沿此河面移向上流，因四围集合之商人，于此无江河之网络连系，沿复尔嘉河者固有可集舟，其他各地来此当用辘车，所费既多又甚危险。所以至第九、十世纪之时，商务市场已移至当时波勒迦尔王国^⑦，正当复尔嘉河与嘉马河交流之地，此处不但地近中央，而且值两河之交流，航道更便内地之货物。

十四世纪时，复尔嘉、嘉马两河交汇点之商务衰落，遂欲

恢复之于复尔嘉与沃嘉两河交汇的下新城，然因当时组织薄弱，不久即消灭——此中封建制度之诸侯国界也是一层障碍。于是十四世纪，鞑靼（蒙古）势力正尚盘据东西伯利亚嘉赞王国^⑧等处，因而“市集”之制发生，地点即在嘉赞。此后渐入莫斯科王国^⑨统一全俄排除鞑靼之期。莫斯科王华西黎第三^⑩欲夺邻国之商务，特设一市集于华西黎苏尔斯克^⑪，正当莫斯科王国与嘉赞王国交界之地，以与嘉赞对抗。然而嘉赞王国至一五五二年方亡，在此期间，莫斯科王国之“市集”，始终未能振兴——嘉赞本亦当复尔嘉与嘉马二河交流之处。

十六世纪下半期，嘉赞王国已灭，“市集”方自嘉赞移至马嘉里叶夫慈勒托夫寺^⑫——离下新城八十俄里。十九世纪，经过许多争执，方将“市集”迁至下新城，从此一世纪以来，每年十个月空着，冷冷清清，两个月开着，舟车辐辏，商货云集。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下新城已成“东”“西”会合之所，正与一千年前复尔嘉河岸各埠相同，人情风俗已变，货物及经商方法几经改革，而交易的各民族仍旧，鞑靼、嘉尔美、蒲哈尔、波斯、黑华^⑬等。

从此直至一九一八年为止，总共已有一百零一年，一九一八年时国内战争爆发，革命怒潮所播，下新城商务停止。现在的劳农政府走向新道路，实行商品交易的分配制——这本是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如以西欧而论，当然因技术工业的发展，已经用不着“市集”制度的商场——旧风俗已经消灭了。然而通常工业发达国家的商务，往往只须邮、电、银行，便可大宗交易，大概买卖都是工厂生制品，可以看“样本”照办。若在俄国

经济状况之下，大半都是原料或半生货，非得有“市集”挑阅各件，不能行贸易——譬如皮货，每一张皮子，有每一张的好处，有每一张的缺点，决不是看“样本”所能办得到的；所以俄国国内商业，不但东方各民族，就是俄国人的货物也缺不了这市集制度。

固然，以前的下新城市集规模非常之大，现时立刻恢复旧观是不可能的，其中铺面、房屋、货栈等亟须修缮，再则交通方面航路的民船汽船，陆路的铁道，革命以来停滞的居多，亟待整顿。此次劳农政府之计划，仅仅恢复战前规模十分之一二，国家银行也赶办下新城分行，以便承办“信托”事业。战前所有私人银行，在下新城自有分行外，当市集之期，在当地另设直接汇兑处，革命之后商人于小买卖，国家分配机关久不用商业原则，所以往往不经银行，直接交兑。此次下新城市集，国家银行正要努力振兴信托事业，恢复金融之枢纽。

今年是革命后第一次的开张（照旧例自七月一日起至九月一日止），西欧各国来办货的也许很少，然而俄国国内经济照此日益发达，将来必定能重新恢复下新城“东西交贯地”之地位。新俄罗斯的经济生活，一时还当大有赖于此呢。

国家机关参与此市集者共有国立托辣斯及新提嘉^④四十八，各区经济总会二十三，各省供给机关之商业部二十一，国民经济省苏维埃三十二，其他机关十三（食粮委员会、农业省分部、通商省分部等），合作社亦大活动，国家机关及私人商号之贸易外，合作社从中处中介的地位，有极大的作用。现在政府为国家经济机关、合作社、私人商号所预备的运货车辆，总

共约一千零八十至一千一百七十辆火车，其中全俄消费总会却占二百五十辆，这是战前所未有的。货物的种类大约为机器、工厂手工业制品、苧麻、皮货、书籍、米、果、鱼、车轴油、木匙、手套、套鞋等等，大概俄罗斯民族方面工业品居多，东方民族方面原料食粮居多，而他们的手艺制品也不在少数。国内工业，战前政府机关是绝无势力的，现在市集上最重要的买者却是国立工厂。市集之国外贸易与东方各国尤甚，波斯、阿富汗以及在俄国联邦内的黑华、蒲哈尔、亚奏白裳^⑤，特与俄国及中央政府订定特约，大批货物运到，如丝、棉、毛、皮、地毯等等，西欧诸国中，如德国的皮货公司向来是靠俄国货源的，都经通商人民委员会专办。

下新城市集一九二二年七月至九月第一次的开张，暂且以奖励实业起见，是免税的，据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议长白葛达诺夫^⑥说，市集之职任有三：

（一）劝业会之奖励性质。如以交通发达之国家而论，似可不必有此市集制度，然而德国之先例，已见交通发达之国，有时亦不能无“市集”，本可有一种劝业赛会的性质。现在劳农政府各种经济机关，国内有企业的制造品，也可谓受一番试验，然后知道某种企业之制品当如何改良，销售何处，数量多少，以定有计划有组织的经费预算。列宁说：“现在俄国共产党赶紧要进初等商业学校！”这就是。

（二）国内商务之疏通。国内必有地理的分业，各区相互的交易，全赖每年有无一次市集，如得疏通其生产之血脉。西伯利亚、土耳其斯坦^⑦、莫斯科工业区、彼得堡林业区、高加索

果酿区等等，相交相贯于此，实践上才能显现消费与生产之对比。此外国家银行亦得借此而输入其势力于小生产经济中。

(三)国外经济之关键。再以波斯中央亚细亚一带，历史上向赖下新城商场，以得欧俄之工业品，而西欧方面一部分也赖此而取东方之原料，此一“市集”之恢复，又可为东西交贯之关键云。

原载1922年9月19日上海《时事新报》

署名：瞿秋白

注 释

① 日诺亚会议，即热那亚会议。热那亚会议与海牙会议先后于1922年4、5月及6、7月间举行，讨论战后国际经济和财政问题。苏俄力图通过会议改善国际地位，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贸易关系，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由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坚持要苏俄偿还沙皇政府的债务和归还已被没收的外国企业与财产，会议未达成任何协议。

② 下新城，即下诺夫哥罗德，1932年后改为高尔基市。

③ 沃木斯克，今译鄂木斯克。

④ 复尔嘉河，今译伏尔加河，是欧洲最长的河流，苏联内河航运干道。

⑤ 波斯，今伊朗。

⑥ 霍萨王国，今译可萨王国。7至9世纪时处于伏尔加河下游的独立国家。首府为伊提耳(本文译作伊梯黎)。

⑦ 波勒迦尔王国，今译保加利亚王国。10至14世纪地处伏尔加河中游和卡马河一带的独立国家。首府为保加尔。

⑧ 嘉赞王国，今译喀山王国。15至16世纪伏尔加河中游的封建国家，由金帐汗国分离出来而建立。首府喀山(本文译作嘉赞)。

⑨ 莫斯科王国，14至15世纪东北罗斯的封建国家。首府莫斯科。

⑩ 华西黎第三，今译华西里三世(Василий III Иванович, 1479—1553)，1505年为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之子，在吞并了普斯科夫(1510)、斯摩棱斯克(1514)和梁赞(1521)之后，以莫斯科为中心统一了罗斯。

⑪ 华西黎苏尔斯克，今译瓦西里苏尔斯克。俄国城镇，伏尔加河码头，靠近苏拉河流入伏尔加河的汇流处。

⑫ 马嘉里叶夫慈勒托夫寺，今译马卡里耶夫慈勒托夫寺，在今高尔基州雷斯沃区马卡里耶夫镇。俄国16世纪中期至1816年每年7月在此寺院附近举办集市。

⑬ 鞑靼，即蒙古族；嘉尔美，今译加尔美民族；蒲哈尔，今译布哈拉民族；波斯，即伊朗民族；黑华，今译希瓦民族。

⑭ 托辣斯、新提嘉，今译托拉斯、辛迪加，一般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高级及普通的组织形式。苏联在新经济政策初期，也采用这两种组织形式，以便集中地管理和组织国家企业的生产活动。

⑮ 亚奏白裳，今译阿塞拜疆。

⑯ 白葛达诺夫，今译波格丹诺夫。

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发言*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二十日)

一、虽然资本家来自封建阶级，但他们在这个社会里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

二、没有无产阶级参加，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都不会成功。

三、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尽相同，可分两种。

四、尽管现在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但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将会革命。

五、只有国民党能把不同的利益统一起来。

六、不要害怕资产阶级的壮大，因为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在壮大。我们不能采取与他们分离的办法阻止他们的发展。

七、任何事情都在发展；我们不能证明国民党不再发展。国民党从一个没有纲领的政党成长为一个有纲领的政党，现在已接近于一支真正的社会力量。虽然危险，却是正确的通路。它已觉察到工人的力量。

八、我们的职责是领导无产阶级推动国民党，使其摆脱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

* 这是瞿秋白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要点，原件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斯内夫利特)的英文笔记，译文据李玉贞等主编的《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一书。标题是编者加的。

九、我们已经阐明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如果我们不引导无产阶级参加国民党，那怎么能希图国民党发展呢。

十、如果我们等国民党发展以后再参加进去，这是不合理的。假如我们希望壮大力量，假如我们有明确的目标，我们会有充分的机会在国民运动中壮大自己，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

十一、如果我们——作为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参加国民党，后者就势将寻求军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助。

十二、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

十三、在建立国民党支部时，我们不要去抓取组织权和指导权，这是在助长老国民党的办法得以发展。我们要发展的的是一个将改变其策略的组织。

十四、工会运动不同于国民党开展的运动，工会从事的国民运动是有利而无害的，他们可以宣传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这和我们的纲领是一致的。

十五、我们不会放弃对工人进行的宣传，它同国民党的工作没有矛盾，可以继续下去。

十六、要么我们不许工人参加国民党，让国民党得到资产阶级、军阀等给予的帮助从而日趋反动，要么我们领导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使后者具有革命性，哪种办法更好。

〔附 录〕

多 余 的 话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二十二日）

编者按：《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就义前在福建汀州狱中所作。这里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国民政府档案手抄本刊出。其中明显的错字漏字都在〔 〕内标明。

1935年8、9月，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部分刊载了这篇《多余的话》，1937年《逸经》半月刊第25、26、27期发表了全文；与手抄本比较，《逸经》发表的文本有不少遗漏，这里都逐一注明。

《多余的话》至今未见到作者手稿。从文章的内容、所述事实和文风看，是瞿秋白所写；但其中是否有被国民党当局篡改之处，仍难以断定，故作为“附录”收入本卷，供研究者参考。

“知我者
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
谓我何求。”①

何 必 说 ？（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末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有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話。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塞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瞿 秋 白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这一世，甚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的”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了（一九一七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同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②的时

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只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③（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④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〇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么热烈了。我就多读了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⑤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〇年八月）^⑥。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

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⑦（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来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办“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三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的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⑧，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不可能从事于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

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想望着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的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得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自己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罢，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只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

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〇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召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上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像外间所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中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形势实在懒问得。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的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方面也是十几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上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辘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压〕。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经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刚满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算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的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最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癆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〇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智昏瞆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经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

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得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么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炼啊！

或者，这不仅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睿韶还在湖北布政司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的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继续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账。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觉察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

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①——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翻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种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二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着〔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够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没有公开的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一至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的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辨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久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份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个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至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干吗？！我想，假定我还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只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好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的研究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

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①，梁漱溟〔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

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么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有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宣〔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过一道，作为预备，其他，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一九三〇），那是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传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已经有许多新进的青

年，许多比较有系统的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是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的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幼稚的理〔论〕著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〇年，我虽然在国际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智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觉得反而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

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智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的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么简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①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因此我更不必枉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歧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的走去，不知会跑到什么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有气力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Stop。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当我不得不担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做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更进一步的关口，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正确的。武汉分共之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的秋收暴动（一九二七），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无〔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国一般的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义〔美〕、日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

的尝试，结果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以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的；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路线，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的规定下来。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念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严重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候，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

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的更无情的揭发。……

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一九二九年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内斗，觉得互相攻许〔诟〕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俾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的任务之中，最重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之间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一九三〇年夏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斯基的路线，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抑制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之后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的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的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错误路线，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工作上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念——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的逻辑的发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

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革命的成功，其实是党的自己没有把握保持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党的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的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工作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别不出来。事后我可以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末，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致于像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的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的委员。我呢，像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钧担。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二〇到一九三〇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研究——到这时候才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气力也已经衰惫了。自然有可能还是可以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惜接着就是大病，时发

时止，耗费了三年光阴。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可是，既然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负了一部的工作，虽然不必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讨论和决定，然而要完全不问政治却又办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为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党的争辩〔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罢。

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革命奋斗，为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一些，说“奋斗”是实太恭维了。以前几年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却决不应当因此而减轻的，相反，在共产党的观点上来看，这个责任倒是更加重了，历史的事实是抹杀〔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开的裁判。

一九三五·五·二十

“文 人”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

谓“文人”正是无所用之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咏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得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智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有什么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假使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真正的作家，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罢，你可以做错误，但是也会改正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的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些什么！

“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智识〔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固然，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抓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智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消闲的工具。究竟在那

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智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得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却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同三层楼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会怀疑起来，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另外的意见来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连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还没有人出来指摘，甚至其势凶凶〔汹汹〕的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的性格。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急〔激〕烈，其实我是最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急〔激〕烈的辩论，那么，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

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至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再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塞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去。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倒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觉〔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

像煞有介事的。

为甚么？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会总有的。即使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它做好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点小聪明，你会摆好几幅“七巧版〔板〕图”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痛快；正像在中学校的时候，你算出了几个代数难题似的，虽则你并不预备做数学家。

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有〔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候，对于政治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

庞杂而无秩序的一些书本上的智识和累坠〔赘〕而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来，感觉生活的乏味。

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個“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种种名词，概念，词藻，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

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智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候，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

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物，或是清理一本账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那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本是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候，只是创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②。但是，自己仔细想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智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

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的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言语”，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的，我学着比较精细的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

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

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

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的用力。书是乱七八糟着〔看〕了一些，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别不出趣味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这必然的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一个“读者”。

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智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的，极忠实的翻译几本俄国文学名著，在汉文方面每字每句的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在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告 别

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这窠是始终做不成的。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你们去算账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去，而且愈好〔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的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

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做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做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然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的因为我要结束我的生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的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〇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

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我只觉得十分的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

神上的懦弱，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的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科学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到〔照〕过几次X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的状态那一定可以发见一些什么。这对于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得或许是很可笑的。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闭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⑬，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一九三五·五·二二

记忆中的日期

——附 录^⑭

- | | |
|-----------------------------|--------------|
| 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 | 生于常州 |
| 一九〇二 | 入私塾 |
| 一九〇五 | 入常州冠英小学 |
| 一九〇八冬 | 初等小学毕业 |
| 一九〇九春 | 入常州中学 |
| 一九一五夏 | 因贫辍学 |
| 一九一六二月 | 母亲死 |
| 二月 | 赴无锡南郊某小学任校长 |
| | 是年父亲赴济南，弟妹分散 |

- 八月 辞无锡教职返常州
 十二月 抵汉口考武昌外国语专修学校
 一九一七四月 在北京应普通文官考试未取
 九月 入俄文专修馆
 一九一九一月 与耿济之瞿世英等组织《新社会》
 杂志

 五月 任俄专学生会代表
 一九二〇八月 应北京《晨报》聘起程赴俄任通信员
 一九二一一一月 方抵莫斯科
 五月 张太雷抵莫介绍入共产党
 九月 任东大翻译始正式入党
 一九二三一月底 返国抵北平
 七月 参加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
 九月 返沪任上海大学教职
 是年加入国民党
 一九二四一月 与王剑虹结婚
 一月 赴粤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七月 剑虹死，赴粤
 十一月七日 与杨之华结婚于沪
 一九二五一月 参加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被举为中委
 一九二七二月 写批评彭述之的小册子
 三月 赴武汉
 四月 参加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仍任中委

七月	(宣言退出国民党)赴庐山
八月七日	参加“八七”紧急会议后实际主持政治局
一八二八四月三十日	离沪出国
六月	参加共产党六大仍任中委留莫为中国共产党代表
一九三〇六月	撤销驻莫代表职
七月	起程返国仍在政治局工作
九月	参加共产党三中全会
一九三一一月七日	参加共产党四中全会被开除政治局委员之职请病假
一九三二秋	病危几死
一九三四二月五日	抵瑞金任教育人民委员
一九三五二月十一日	离瑞金
二月二十三	抵福建汀州之水口被钟绍葵团俘
二十六	入上杭县监
五月九日	解到汀州三十六师师部

注 释

- ① 语出《诗经·黍离》。
- ② 《新社会》旬刊，1919年1月1日创刊，次年5月被查封。
- ③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在李大钊的组织 and 指导下，由当时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等人发起，于1920年3月创立。
- ④ 《妇女与社会》，即《妇女与社会主义》(Femme et Socialis-

me)。其作者倍倍尔(August Bebel, 1840—1913),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⑤ 《晨报》初名《晨钟报》，是研究系的机关报。1916年8月创刊于北京，1928年6月停刊。

⑥ 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一书中记述，他是1920年10月14日从北京动身去莫斯科的。

⑦ 陈独秀当时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⑧ “四大”选举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和瞿秋白等5人组成中央主席团(即中央常委会)。

⑨ 《逸经》所刊文本，自“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米亚”起，至以下第四段“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一句为止，一共遗漏4段文字。

⑩ 《逸经》本自“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至“文艺评论”，共遗漏36字。

⑪ 《逸经》本遗漏“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一句。

⑫ 《逸经》本自“这些都做了”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共遗漏26字。

⑬ 《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今译《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副标题为《四十年》；《鲁定》，今译《罗亭》；《安娜·卡里宁娜》今译《安娜·卡列尼娜》。

⑭ “附录”的“记忆中的日期”有不准确之处，这里都不一一注明。《逸经》本没有刊登这个“附录”。

目录
正文